
德州简史

主编：梁国楹
撰稿：梁国楹 王守栋 张立胜
黄金元 田桂宝

2012年3月

目 录

绪 论

第一章 先秦初育——英雄史诗与黄河神韵

第一节 德州早期黄河农业文明

- 一、德州龙山文化遗存
- 二、德州早期黄河农业文明

第二节 大禹治水与德州

- 一、禹疏九河 其五在德
- 二、禹息故城与具丘山

第三节 后羿、有鬲氏与夏王朝

- 一、有穷后羿崛起鬲津之畔
- 二、有鬲氏与“少康中兴”

第四节 齐鲁文化与燕赵文化的交融

- 一、会盟之“要津”与河朔之“咽喉”
- 二、晏城与晏婴
- 三、武城与赵胜
- 四、“良将”廉颇
- 五、德州地域文化兼容性的初步形成。

第二章 秦汉肇基——德水安澜与儒学再造

第一节 德水安澜与建制之始

- 一、水德之瑞与安德县的设置
- 二、平原郡的设置
- 三、鬲县与鬲国的设置

第二节 黄河波涛与平原津史话

- 一、汉代黄河决口及其对德州的影响
- 二、秦始皇东巡与暴病平原津
- 三、群雄逐鹿与田荣败走平原
- 四、楚汉交兵与韩信偷渡平原津
- 五、王莽乱政与迟昭平起义
- 六、祝阿之战与汉室中兴

第三节 儒学再造与两汉德州文化的勃发

- 一、群儒之首董仲舒
- 二、滑稽之雄东方朔
- 三、千古忠烈话赵苞
- 四、恃才傲物称祢衡

第四节 德州汉墓与区域民俗文化

- 一、分布广泛的汉代遗冢
- 二、神头汉墓群与东方朔墓
- 三、庞家寺汉墓
- 四、德州汉墓与区域民俗文化

第三章 魏晋风流——儒学传承与世家文化

第一节 风云变幻与文化融合

- 一、刘备治平原
- 二、二袁鏖战平原城
- 三、后赵、后燕、北魏与德州
- 四、魏晋时期德州人口变迁与民族融合

第二节 武城崔氏世家文化

- 一、崔琰与武城崔氏的兴起
- 二、崔宏、崔浩与武城崔氏的兴盛
- 三、“国史之狱”与灭门之祸
- 四、武城崔氏在民族融合中的作用

第三节 “三高碑”

- 一、《高湛墓志》
- 二、高贞碑
- 三、高庆碑

第四节 风流才俊与儒学传承

- 一、易学大师——管辂
- 二、文藻秀出——刘峻
- 三、衔命拥旄——张彝
- 四、乱世史家——崔鸿

第四章 隋唐兴发——运河开通与文运昌盛

第一节 大运河的开通与德州区域经济的发展

- 一、永济渠的开凿
- 二、德州与长河县的设置

三、唐代德州运河区域经济变迁

第二节 文运昌盛与治世能臣

- 一、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状元——孙伏伽
- 二、武城张氏世家——张文瓘、张文琮、张文收
- 三、平昌三孟——孟云卿、孟郊、孟简
- 四、宫词翘楚——张祜
- 五、崔氏余脉——崔义玄、崔胤

第三节 隋唐时期德州的抗暴与抗叛

- 一、窦建德反隋大起义
- 二、颜真卿奋戈平原郡

第四节 唐末五代割据战乱中的德州

- 一、唐末藩镇割据中的德州
- 二、后梁与后唐对德州的争夺

第五章 宋元转折——世事艰危与漳卫清流

第一节 世事艰危与德州区域变迁

- 一、宋元时期德州的区域变迁
- 二、宋元时期德州区域的战争与变乱
- 三、黄河泛滥与陈公堤的修筑

第二节 穆斯林迁入与德州回族的形成

- 一、“色目兵”进驻陵州与“长官司”的设置
- 二、回族群体形成与伊斯兰文化的滥觞

第三节 御河的疏浚与德州运河名城的初显

- 一、御河的疏浚与大运河的畅通
- 二、宋元时期德州区域经济的发展

第四节 人文与词章之盛

- 一、“无棣”李氏——李愚、李之纯、李之仪
- 二、刘翰与《开宝本草》
- 三、毛诗学专家张雍
- 四、南宋重臣吕颐浩
- 五、元代状元张起岩

第六章 明清全盛——九达天衢与运河名城

第一节 “九达天衢”与“神京门户”

- 一、“德陵互易”与德州鲁西北政治中心地位的确立
- 二、靖难之役与德州

- 三、明清德州“靴子城”
- 四、宋礼治河与卫运河的畅通
- 五、德州与康熙、乾隆南巡

第二节 苏禄王墓与中外文化交流

- 一、苏禄国王来华与病逝德州
- 二、苏禄王墓的礼制与修建
- 三、苏禄王墓的修葺与祭奠
- 四、德州安温家族及其“守灵”文化

第三节 明清时期德州区域经济的繁荣

- 一、明初移民与德州人口的变迁
- 二、农业手工业的发展
- 三、商业市镇的崛起
- 四、漕运仓储业的鼎盛

第四节 明清时期德州区域文化的昌盛

- 一、“贝川先生”——董伦
- 二、三朝元老——葛守礼
- 三、来禽馆与邢氏兄妹
- 四、“人文飙起”——田雯与“山左”诗派
- 五、“名卿蝉联”——德州卢氏世家
- 六、顾炎武、钱谦益与德州名士的交往
- 七、董子读书台与德州董子文化

第七章 近代奋起——英勇抗争与孕育生机

第一节 德州早期反帝反封建斗争

- 一、捻军与德州
- 二、基督教的传播与“德州教案”
- 三、朱红灯与鲁西北义和团运动
- 四、王金铭与滦州起义
- 五、保家卫乡“红枪会”

第二节 曲折的近代化之路

- 一、北洋机器制造局与德州近代工业的诞生
- 二、津浦铁路的开通与德州交通区位优势加强
- 三、运河之衰与近代德州城乡经济变迁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德州早期地方组织及其活动

- 一、后里仁庄党支部与德州早期革命活动

二、中共鲁北特委与马颊河暴动

第四节 德州抗日斗争与德州解放之战

一、日军南进与国民军“四八五团”血战德州

二、宋哲元与第二十九军的抗日壮举

三、冀鲁边区根据地的抗日斗争

四、德州解放之战

五、德州“支前”及其对解放战争的贡献

第五节 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近代碰撞

一、庞庄教堂与博文中学

二、德州人才的摇篮——从平原乡师到平原师范

三、近代德州风俗的变迁

四、武术大师尚云祥

五、篆刻家刘淑度

六、医学书画大家罗文杰

七、《德县志》及其德州地方史志的编纂

德州地域文化的基本特征（代绪论）

（梁国楹）

特定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和历史发展路径决定着一个区域的文化总体特征，美国学者斯图尔德（Julian H Steward）把这一现象称为“由适应环境而产生的并代表同样整合程度的特征丛”^①。质朴厚重的齐鲁文化与慷慨豪放的燕赵文化赋予了德州人厚德、包容、创新、图强的禀赋和淳朴诚实、慷慨仗义的文化品格，体现了德州独特的地域文化特征。

（一）九河之州 沃野平川——兼容性地域文化特征之一

黄河从青藏高原奔腾而下，穿越崇山峻岭与幽壑深谷，破龙门而出，浩浩荡荡奔向中原大地。河水裹挟着黄土高原的大量泥沙，经过亿万年的冲刷淤积，形成了今天的华北平原。正是黄河母亲甘甜乳汁的滋养，才造就了德州这块古老而又神奇的土地。

任何文化的产生都离不开特定的自然环境，人类正是通过自身所处自然环境不断地创造物质财富才能得以生存繁衍的。特别是人类早期，由于改造自然能力低下，自然环境对人类文化风貌所起的作用更为重要。黄河文化是一种以农业为主体的混合型文化，具有内聚力和容纳性的显著特点。相对于草原、山岳、海洋型自然环境，平原河谷型自然环境更适宜于农耕，且农耕生活比起从事畜牧和渔猎来衣食之源更有保障。另外，平坦宽阔的大平原，没有高山阻隔，人与人之间交往便利，就如同人与人之间没有戒备一样，所以，追求稳定、平和宽容就成了农耕族群普遍的性格特征。

世世代代的农耕生活，不仅造就了德州黄河农耕文化的基本风貌，而且塑造了德州黄河农耕文化的人文特质。表现在：

第一，农耕为主的生产方式。龙山文化时期，德州早期先民便在自己脚下这块松软肥沃的黄河冲积平原上使用石斧、石镰、石铲、蚌刀等农具，开始了原始的农耕定居生活。当时的德州，地势低洼，气候温润，草木茂盛。黄河的不断冲积改道，造成了星罗棋布的高岗和纵横交错的河岔，从历史和现有的德州一些地名，我们似乎仍能想象出当时的地貌：将陵、陵县、乐陵、方山等都是高地，鬲津、夏津、宁津、黄河涯等则是临水靠河。

秦汉以后，德州人在辽阔的鲁北平原上，创造了辉煌的农耕文明。隋初，任职德州的房恭懿，因为社会安定，农业发展，考绩成绩全国第一，被隋文帝立为“天下模范”。唐代德州，“原野垦，府库实，氓庶安”，“鱼盐隘里巷，桑柘盈田畴”^②，被称为“蚕绵之乡”，唐朝在这里汇聚大批物资，以供北方边镇之军需。明清时期，德州旱作农业日趋精细，各种经济作物种植进一步扩大，商业性农业经营有了明显发展。特别是以麦作为中心二年三熟制的确定，耕作、施肥、管理等各个生产环节形成了一套完备细致的操作程序，极大地促进了德

①[美]斯图尔德著、张恭启译《文化变迁论》，台北远流出版社，1989年版。

②[唐]岑参《送颜平原》，载《全唐诗》卷一九八，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

州农业的发展，农作物产量一般在每亩七八斛。棉花种植从永乐以后以几倍甚至几十倍的速度大幅增长，每到棉花收获季节，“江淮商客，列肆赍收，居人以此致富”^①。到清代道光年间甚至出现了“种花地多，种谷地少”、“上田皆种木棉”^②的现象。

改革开放初期，德州率先推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德州农业由此出现了奇迹般的飞跃。1983年，德州农业总产值达40.83亿元，人均交售皮棉50公斤，粮500公斤。1984年，德州棉花总产36.22万吨，单产居山东省第一位，总产占山东棉花总产的1/3，占全国的1/10，成为当时全国的棉花大区。

第二，和谐兼容的生活理念。在与经年不绝的水患抗争中磨练了德州人的坚强意志和达观情怀。尧舜时期，面对洪水的威胁，大禹改用疏导的办法，疏通河道，挖渠导水，把洪水引入大海，最终治平了洪水。大禹先后开挖、疏浚了九条河道，其中徒骇、马颊、胡苏、钩盘、鬲津五河都在今德州境内。禹疏九河，其五在德，说明德州是大禹治水的核心地区，是大禹文化与中华治水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大禹变“堵”为“疏”，不仅使中国古代治水理念发生了质的飞跃，也对历代统治者的治国理念产生了重要影响。德州现仍存有禹息古城、具丘山等大禹治水的遗迹。

农耕决定了传统德州人的生活理念，男耕女织、粗茶淡饭、乐天知命，聚落共生……以传统民居为例，德州传统村舍以土坯构建而成，墙体厚重，院落较大，能较好地适应冬季寒冷的气候和早晚温差变化大的影响。屋顶用泥土抹成平顶或弧平顶，不易被风吹坏且易于维护修缮，并可作为晒粮之用。这种颜色灰土，外观敦厚而不张扬，虽不如砖石瓦房坚固耐久，但却适应了华北干旱少雨的气候。另外，院内还搭建牲口棚、大草棚、猪圈等生活生产设施，院前一般还建有瓜果菜畦，充满了农家生活的闲适情趣。

第三，以德为先的精神追求。道德是社会群体在生活实践中形成一定共识、也就是共同价值观前提下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它既是人们辨别是非、美丑、善恶的标准，又是社会得以在一定的秩序中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前提。德州是全国唯一冠以“德”字的城市，德州之“德”即来源于黄河。秦朝沿用“五德”始终说，认为周代为火德，克火者必定为水，于是“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此后，黄河下游河道虽屡经变迁，但一直没有脱离德州之境，汉代德州称“安德”、“广川”，隋唐德州称“长河”，明清称“德州”，都与黄河、与“德”有直接联系。

德州是一片以“德”为名而又用“德”文化营造了自己精神家园的土地。从董仲舒的“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到东方朔的“洁其道而秽其迹，清其质而浊其文”；从赵苞的“舍孝取忠”，到祢衡的藐视权贵；从窦建德的奋起抗争，到颜真卿的奋戈抗叛；从吕颐浩的勇于担当，到葛守礼的“正色立朝”；从卢荫溥的“专心职守”，到宋哲元的民族大义……无不体现了德州人以德为先的精神追求。

从汉代直到隋唐，今武城一带曾经有一个显赫的名门望族——清河崔氏家族。东汉尚

① 万历《东昌府志》卷二《物产》。

② 光绪《高唐州志》卷三《田赋》。

书令崔琰，北魏大臣崔宏、崔浩父子，北魏史学家崔鸿，唐代吏部尚书崔邠、刑部尚书崔郾、金吾卫大将军崔郾，等等。历代崔氏位居宰相者多达 23 人。作为山东文化士族的代表，清河崔氏不仅崇尚儒学，诗书传家，而且“实心任职”，以德立身，是厚重博大的黄河文化在德州这片土地上刻下的重要历史烙印。

（二）齐风鲁韵 燕魂赵魄——兼容性地域文化特征之二

德州地处齐鲁之邦、地近燕赵大地，处于齐鲁、燕赵东西两大文化圈交汇处，具有独特的地缘人文环境。多年来，由于受到现行行政区划的思想束缚，不少人在思考德州地域文化特征时，更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在了德州的“齐鲁”属性，而忽略了历史上对德州具有同样重要影响的“燕赵”因素，甚至强调与燕赵文化区别。如果过分强调“齐鲁”与“燕赵”的分野，对德州在两者人文地理意义上的交汇融合不给予足够重视，则必不能在地缘文化层面上揭示德州地域文化的根本特征。其实，两个地缘上最贴近，且对中国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地域文化，在没有巨大地理阻隔的时空中相互融会是极其自然的。

中国著名思想家董仲舒，上承孔子，下启朱熹，对儒学的发展起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董仲舒继承先秦儒家，兼容墨家、汲取法家、融合阴阳家等诸子百家思想中有利于统一集权、尊君爱民、安定社会的主张，根据时代的需要、君臣士民的希望，作了全面的批判和总结，从而建构起了一套“大一统”的理论体系，顺应了百家思想的“合流”趋向，不仅对汉代政治取向和政治道路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汉代以后的中国社会也产生了深刻影响。此后，各朝各代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一致地认同统一，进而使统一逐渐转化为中华文化的社会心理，以江山统一为乐，以社稷分裂为忧，成为中华民族天经地义的政治思维定势和政治价值取向。

董仲舒的新儒家学说之所以被汉武帝接受，不在于他对儒家思想在“纵”的深度上，而是在于“横”的拓展上。这种拓展在儒家文化的核心地带是难以想象的，而发生处于边缘地带的德州则有其基础和条件。这就是边缘文化的优势所在。换言之，边缘文化更易于融会创新。

当然，德州地缘文化的外在属性也并非仅限于此。具体到不同的发展阶段，其表现或为“齐鲁之风”或为“燕赵之慨”，抑或“齐鲁”为主“燕赵”为次、“燕赵”为主“齐鲁”为次。廉颇的“负荆知惧，屈节推工”和“以勇气闻于诸侯”，或许更多的是燕魂赵魄。颜真卿“集兵二十万，横绝燕赵”，外表看似慷慨悲歌，实质却是“坚贞一志”、“死而不挠”的忠君之道。宋哲元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毅然奏响“大刀进行曲”，体现的则是不计个人安危的民族大义！

（三）运河名城 厚德之州——兼容性地域文化特征之三

如果说上古时期对德州影响最大的因素是黄河农业文明的话，那么，隋唐明清时期对德州影响最大的因素就是运河文化和商业文化。由于发达的运河航运，明清时期位于卫运河东岸的德州，在运河的滋润和浇灌下，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代。当时德州是全国三十三大

工商城市之一,不仅为京杭大运河上的四大漕运仓储重地,而且是南北陆路重要的交通枢纽,有“九达天衢”、“神京门户”之誉。

“千乘旌旗分羽卫,九河春色护楼船”。作为一条沟通南北的纽带,京杭大运河南通杭州,北达通州,在经济上实现了南北物资的交流,在文化上加强了南北文化的融通。德州,一座大运河上的重要枢纽之城,由于汇纳了南北之长,得以在更大的空间上吸纳外来物资、人员、技术和思想观念,以致工商繁荣、客商云集、仓储丰富、交易繁盛,“四方百货,倍于往时”。更可贵的是,在运河文化的流动中,德州还开启了“外向型”大门,苏禄国王及其后裔于是在这种交流沟通中落户到了德州,德州人以包容而宽阔的胸怀接纳了这位外国国王和他的后裔。

近代以来,津浦铁路的通车和现代德石铁路、京沪高速公路、京沪高速铁路的建设,进一步加强了德州作为交通枢纽的地位。近些年,德州借助独特的交通优势,商贸、物流、仓储业发展迅速,但这方面的亮点尚不突出。德州需要在打破行政界限的束缚上,在大商贸、大物流空间的开拓上有新的作为。

第一章 先秦初育——英雄史诗与黄河神韵

德州是我国农业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早在旧石器时代，德州人就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这里便开始了耜耕农业，留下了大禹治水的足迹；夏商两代这里隶属兖州；西周隶属齐国；春秋时期则分属齐赵。这里“控三齐之肩背，为河朔之咽喉”^①，地理位置极其重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在春秋战国长达 500 多年的诸侯争霸战争中，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齐、赵都把心腹重臣分封在这里，德州一直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时则成为各国会盟的“要津”，时则成为齐赵争夺的要地。今齐河县城（晏城镇）就是春秋后期齐国“正卿”晏婴的封地；今武城县则是战国后期赵国国相赵胜的封地。受黄河农耕文化以及齐鲁和燕赵东西两大文化板块的共同影响，德州地域文化呈现出了既有齐风鲁韵又有燕魂赵魄的兼容性特质。

第一节 德州早期黄河农业文明

德州历史悠久，是我国早期农业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早在旧石器时代，远古先民就在德州一带采集渔猎，生息繁衍。然而，由于历史上黄河多次改道与决口，大量泥沙淤积于地层表面，原始文化层被埋在地下深处，给考古发掘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所以，龙山文化以前的文化遗存至今尚待发掘。近年来德州区域发现了 20 多处距今 4000—4600 年的“龙山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石斧、石镰、石铲和蚌刀等农业生产工具，说明在龙山时代，古代先民已广泛生活在这一区域，并创造了辉煌灿烂的远古农业文明，成为早期黄河农业文明的典型代表之一。

一、德州龙山文化遗存

近年来，德州区域相继发现了多处龙山文化遗址。如齐河的尹屯遗址，禹城的邢寨汪遗址、窦庄遗址、周尹遗址、小于遗址、将军庙遗址、禹王亭遗址，乐陵的五里冢遗址、惠王冢遗址，庆云的姚千遗址等。这些遗址多分布于地势较高的古冢丘、古烟墩、古台、土冈等处。因为古代德州为水患多发之地，黄河屡决，水漫州境，成为泽国，地势高处才避免水淹；低洼之处则黄土层层淤积，原始文化层被深埋地下，很难发现。这些地势较高冢丘、烟墩、古台、土冈，又往往成为水患来临之时当地百姓的逃生之处，因而，自古以来百姓视之为“神土”，禁止挖掘取土，从而得以保存。

尹屯遗址位于齐河县华店乡尹屯村东南 1300 米处的一座土垒之上，因村得名。此垒古

^① 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九《历代州域形势》。

有“晏婴冢”之称，呈台状，南北长70米、东西宽60米、高5米，面积4200平方米。初发现时表面有散落陶片、蚌片，断面有不同程度的烧灰层及厚近一米左右的陶片层，陆续出土了石铲，蚌匕，白、黑、灰、红、褐陶器及蛋壳残片。尹屯遗址上层为商周和汉代文化层，下层为龙山文化，距今2000-5000年。属龙山时代的文物有石器、蚌器、骨器、陶器四大类，著名的有磨光黑陶片、石铲、石刀和陶鬲足、豆柄等。尹屯遗址于1992年6月12日经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被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邢寨汪遗址位于禹城东北8公里处的邢寨村“邢寨汪”古瓦砾荒坡上，南北100米，东西60米，总面积约6000余平方米，系龙山文化晚期遗址。出土的陶器绝大部分为轮制，黑陶制作精细，光亮，筒形杯器壁很薄，陶器纹饰以素面为主，部分器饰凹凸弦纹、乳丁纹、盲鼻、绳纹，但篮纹少见，未见方格纹，反映了这一时期当地的制陶工艺特点。从出土器物看，袋足肥硕的鬲是其主要炊器。数年来，德州文物工作者做了艰苦而细致的文物清理、复原工作，相继复原了119件龙山文化先民们使用过的陶、石、骨、蚌器。其中除较多的黑陶外，另有蚌刀、刻有符号的古匕、石刀、骨、石制的箭镞（狩猎工具）、陶制网坠（捕鱼用具），还有各种类型的鹿角、陶、石、骨、蚌器等。从邢寨汪遗址出土的器物来看，具有鲁东地区典型龙山文化的一些特征。如式样众多的鸟喙式鼎足、黑陶V字形器足、II式灰陶罐等。但从大的方面看，它也具有其自己的特征，与鲁西茌平县尚庄第三期文化的基本面貌很相近，和梁山县青堍堆等也有不少相似之处，尤其是在75平方米的试掘面中出土7件素面鬲，是在山东龙山文化诸遗址中继尚庄和尹家城之后的又一发现，而且是数量较多的一次。邢寨汪遗址的调查与试掘，虽规模小，遗迹也很单纯，但出土了较多的器物，丰富了我们对山东龙山文化的认识，提供了山东龙山文化不同类型的资料。

窦庄遗址位于禹城市窦庄西400米处，是一处龙山文化时期的古遗址。1992年6月12日被山东省人民政府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窦庄遗址为一高台，圆冢状的土丘高4.05米，表层为灰土。在该遗址先后收集到灰陶、陶纺轮、三孔石刀、残三孔石刀、残陶网坠和残骨凿、单孔花面残石铲各1件和鬲残片、鬲足、印纹等陶片。窦庄遗址器物与邢寨汪出土器物类似，可判定该遗址属龙山文化遗址。该遗址一直未进行考古发掘，具体文化内涵不详。

禹王亭遗址位于禹城市十里望乡十里望村南400米处。遗址为一台状土丘，古称具丘山，南北45米，东西50米，高8米，相传大禹治水时为观察水势而筑。明清时期曾在土丘上建亭纪念，名曰禹王亭。1974年，发现有灰土层，并采集到单孔石铲、石斧、蛋壳陶片、陶弹丸、陶纺轮等上古文物。经鉴定，这些文物为龙山文化遗物。1977年，该遗址被确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五里冢遗址位于乐陵市城关镇五里冢村北30米处，为堍堆遗址，是龙山时代至周的文化遗址。冢为台形，东西长110米，南北宽60米，最高处2.5米，总面积6600平方米。其中，重点保护范围东西长94米，南北宽45米，总面积4230米，为一阜状遗存。1977年被批准为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遗址出土有石斧、石镰、骨锥、鹿角、陶纺轮、鬲足等文

物，还有汉砖、唐罐等。遗址西侧和南面已露出汉砖墓壁。经考查，石斧、石镰等出土地点为龙山文化遗址。遗址和遗存的发现，突破了我省新石器时期文化分布界限，对研究当地历史很有价值。五里冢遗址南、北、西三面为水塘，冲刷比较严重。从西南断面看，文化层厚1.7米以上，文化内涵有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商周文化和汉代文化四个阶段。从该遗址历年采集的文物有石器、骨器、青铜器和陶器等。陶器以灰陶为主，有少量红陶，纹饰以绳纹为多，少量素面和篮纹。此外，还有粗绳纹夹砂深灰陶鬲、粗绳纹鬲足、粗绳纹灰陶缸残器、灰陶豆残器、豆盘、圈足、陶纺轮、黑陶片、红（黄）陶器耳等。石器有磨制石斧、石镰，还有骨锥、商代卜骨和周代的鬲足等。

惠王冢遗址位于乐陵市王寨子乡关王庙李村东南300米处的土垒上，西距乐济公路80米，西北距马颊河7公里。清乾隆《乐陵县志》称之为“惠王冢”、“徽王冢”，又称“灰冢”。该遗址为埕堆遗址，南北长55米，东西宽42.5米，高2.8米，面积约2337平方米。从遗址东北部断面看，文化层在1.4米以上，地上暴露部分为商周文化和汉代文化层，早期文化层则在地表以下。文化内涵有龙山文化、商周文化和汉代文化三个阶段。龙山文化层出土石器较多见，主要有石斧、石铲、石铤、石箭、石镞和捻线坨等；陶器以磨光灰陶为主，器形主要有鼎、盆、罐、鬻、足等。陶器以灰陶为多，也有少量红陶，纹饰以绳纹为主，次为素面，有个别的方格纹。汉代文化层出土的有陶楼、陶鸡、陶豆柄、千秋汉瓦等生产用具、生活用品及观赏制件，极富生活气息，因而惠王冢遗址是一处有墓葬和多种文化因素的遗址。其中陶楼、陶鸡二件，已为山东省历史博物馆收藏。

姚千遗址位于庆云县尚堂镇姚千村南300米，为德州市少见的洼地遗址，南北长800米，东西宽500米，总面积约40万平方米。从坑壁看，地表下1米即为文化层，内含夹砂陶片等遗物，地表下2米为沙坑积水，水面以下文化堆积情况不详。早年村民在此取沙时出土有陶鬲和石斧。遗址东南部地表有大量自然蚌片。采集标本主要有石器和陶器，陶器以灰陶为主，纹饰以绳纹为主，能辨器形的有石斧、陶罐口沿、陶盩、陶鬲等，文化内涵主要是龙山文化。^①

在众多的龙山文化遗址中，比较典型的有禹王亭遗址、邢寨汪遗址、五里冢遗址和惠王冢遗址。这些文化遗址出土的文物较为丰富，种类齐全，保存较完好，反映了古代先民已广泛生活在这一区域，并创造了辉煌灿烂的远古文明。

二、德州早期黄河农业文明

约一万年以前，今德州区域还是一片茫茫的浅海。奔腾咆哮的黄河，夹带着大量泥沙，流经到这里入海，黄土不断淤积，海岸线随之向东推移，约六七千年以前，德州区域才逐渐形成低洼的冲积平原。

距今约五六千年左右，德州早期先民（东夷部落的一支）从鲁东、鲁中地区迁居于此。最初他们是追逐鹿群而至，主要从事渔猎活动。后来，由于德州平原土地松软肥沃，适合农

^① 以上考古资料均见李开岭、马长军编著《德州考古文集》，百花州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耕，他们便刀耕火种，开始了原始农业生产。当时，磨制石器已经占主导地位，磨制技术日趋精致，大多数石器如邢寨汪遗址出土的石刀、石镰等都琢磨得通体光滑，棱角清晰，刃口锋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时还掌握了石器穿孔技术，发明了琢穿和管钻两种方法。如惠王冢遗址出土的石斧、石铲、石铤等。这是工具发展史上的一项重要成就。因为有了这项技术，复合工具的制作就变得轻而易举了。而复合工具的使用，既能减轻劳动强度，又能提高劳动效率。骨器的制作更为精细，如窦庄遗址出土的骨凿，五里冢遗址出土的骨锥都极为精致。工具质料一般分为石、骨、牙、角、陶、蚌等，甚至有迹象表明铜器已经出现，铜镞的发现，是人类进入金石并用时代的实物佐证，是德州古代先民创造力的历史见证。

在陶器制作方面，当时的德州先民已经熟练掌握了轮制技术。这是原始制陶技术的一项重大技术革新。采用轮制法技术，不但能使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而且还使产品器形规整、厚薄均匀，质量空前提高。制作的陶器种类繁多，精妙细致。邢寨汪遗址出土的轮制黑陶筒形杯，器壁精薄，光亮。黑陶纹饰以素面为主，部分器饰凹凸弦纹、乳丁纹、盲鼻、绳纹，反映了这一时期当地的制陶工艺水平。除黑陶外，还有白陶、红陶、青灰色陶、淡黄色陶，以及各种颜色兼有的彩陶。不同的陶色，需要掌握不同烧窑技术，例如红陶用氧化焰，灰陶用还原焰，黑陶则是炭素渗入的结果。这说明当时烧窑技术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知识。器形器类变化多样，常见的有鬲、鼎、豆、壶、罐、杯、鬯、盃、尊、瓶、钵、盆等类别。

值得一提的是，鬲是德州原始文化遗址中最典型的器物。鬲是一种陶制三足空心炊器，相传是由德州古老的原始部落——有鬲氏所发明。在德州古人类遗址中也有反映，如袋足肥硕的鬲是邢寨汪遗址中代表器型，此外，窦庄遗址、五里冢遗址、惠王冢遗址、姚千遗址等也发现了大量的鬲状陶器。可见，德州与“鬲”结下了不解之缘。德州河流及后世城邑，无不因之而得名，如古河鬲津，春秋战国之鬲邑，秦汉之鬲县，东汉之鬲国等。

从德州古人类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石、骨、牙、角、陶、蚌等器物，可管窥德州原始先民的生产、生活状态。石斧、石镰、石铲和蚌刀，说明德州先民早在四五千年前就已在这里从事着原始农业生产；大量的石箭头、蚌箭头、陶弹丸、兽骨镞及少量的铜镞，说明渔猎活动仍是当时人们赖以生存的重要手段之一；众多的陶制器皿，如陶灯、陶盆、陶豆、陶鬲、陶罐、陶鼎、陶杯等，说明当时人们已过着定居生活；特别是陶纺轮和捻线坨的多次发现，说明德州区域当时已有了发达的纺织业。

德州先民已经有了原始宗教信仰，五里冢遗址中出土的卜骨，说明当时已有占卜之风。而陶环、陶俑、陶牛、陶马、陶鸡、陶楼的发现，说明了当时人们的审美观念和审美水平已十分发达。

第二节 大禹治水与德州

古老德州历经 5000 多年的沧桑岁月，既留下了龙山先民的生活遗址，也刻下了大禹治

水的道道痕迹；既传诵着后羿射日的英雄史诗，也流传着嫦娥奔月的美丽神话。历史与传说的交融，更加丰富地折射出德州远古先民不畏艰险、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强烈愿望和不屈不挠的崇高精神。

一、禹疏九河 其五经德

大约距今 4000 年左右，德州远古先民终于迈进了文明的门槛，他们却面临着洪水的威胁与生存的巨大挑战。相传，尧舜时期，黄河中下游洪水泛滥，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而地处黄河下游的德州区域，首当其冲，成为一片泽国。

为了解除人民的疾苦，根据四方部落首领的建议，尧派鲧去治理洪水。鲧用了 9 年的时间，以阻挡的办法，筑堤拦水，结果，不但没有挡住洪水，反而让洪水冲毁了更多的房屋、田地，劳民伤财，一事无成。舜接替尧为部落联盟首领以后，把治水无功的鲧流放到羽山，而派他的儿子禹继续治水。

禹受命以后，经过周密考察，采用疏导的办法，疏通河道，挖渠导水，把洪水引入大江大河，最后归入大海。禹率众先后开挖、疏浚了九河：一曰徒骇、二曰太史、三曰马颊、四曰覆釜、五曰胡苏、六曰简、七曰絜、八曰钩盘、九曰鬲津。关于“九河”的记载，最早见于《尚书》，后《史记》亦载。《尚书·禹贡》云：“九河既道（导）。”《史记·李斯列传》亦云：“禹凿龙门，通大夏，疏九河。”《禹贡》、《史记》仅出现了“九河”的概念，而九条河流的名称并未注明。“九河”之名出于《尔雅》。《尔雅·释水》云：“徒骇、太史、马颊、覆釜、胡苏、简、絜、钩盘、鬲津，九河。”

九河同源、分流而下，合流入海。《尚书·禹贡》：“导河自积石，至于龙门。南至于华阴，东至于底柱，又东至于孟津。东过洛纳，至于大伾。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这句话反映了大禹治水的基本线路：从积石开始疏导黄河，流经龙门、华阴、底柱、孟津、洛纳、大伾、降水至大陆，从大陆向北分为九河，九河最后合流是为逆河，注入大海。据此九河的源流在大陆，大陆在今何地？孔安国曰：“大陆，泽名。”^①，郭璞云：“今钜鹿北广河泽是也。”^②，《汉书·地理志》载：“钜鹿郡有钜鹿县，大陆泽在其北。”可见，《禹贡》所言“大陆”，即今河北邢台市巨鹿、任县、平乡一带的大陆泽，是河流冲积扇与黄河故道的交接洼地。可见，九河同出大陆泽，蜿蜒东流，汇入大海。

古九河虽经 4000 余年之沧桑，但其踪迹并未完全消失，故道仍在。其中鬲津、马颊、胡苏、钩盘、徒骇五河均在今德州境内。

鬲津河故道在今德州市区以东，即四女寺减河，东流经商河及河北盐山、山东无棣诸县境入海。关于鬲津之名的来历，《尔雅注疏·释水》云：“鬲津者，水多厄狭，可隔以为津而横渡也。”古代“鬲”通“隔”，“津”为渡口之意。也就是说，因河狭水浅，可隔水而渡，而名之曰“鬲津”。鬲津的流经区域文献亦有详载。如《尚书正义》卷六孔颖达疏

^① 《史记》卷二《夏本纪集解》。

^② 《尔雅注疏》卷七《释水》。

云：“徒骇在成平，胡苏在东光，鬲津在鬲县。”西汉置鬲县，属平原郡，县治大至在今德州经济开发区抬头寺乡一带，古鬲津呈西南—东北流向，纵贯今州境无疑。

马颊河自高唐入德州境，流经夏津、平原、陵县、临邑、乐陵、庆云，在无棣县黄瓜岭以下注入渤海。关于马颊河之名的来历，汉代大儒李巡解释说：“马颊，河势上广下狭，状如马颊也。”周定王时，马颊沿河各国修筑长堤，以防水患。汉代黄河夺马颊河道，堤防浸毁，古河已湮。唐代重新疏浚，几经治理，成为防洪灌溉的一条重要河流。

胡苏河故道在今宁津、庆云等县。关于胡苏河之名的来历，李巡说：“胡苏，其水下流，故曰胡苏。胡，下也。苏，流也。”胡苏河在汉以后逐渐淤塞。

钩盘河自德州东流，经宁津、乐陵、庆云、阳信等县，自无棣入海。关于钩盘河之名的来历，李巡解析说：“河水曲如钩，屈折如盘也，在东光之南，鬲县之北。”^①可见，古钩盘河在西汉之时，流经今德州境。汉代以后，黄河夺钩盘河道，古河已湮。今钩盘河为后代开挖疏浚。

徒骇河故道亦在德州境内。三国时期经学大师孙炎说：“徒骇者，禹疏九河，功难，众惧不成，故曰徒骇。”^②根据孙炎的解释，徒骇之名是因大禹治理此河时用工极多，众徒惊骇，故名徒骇。西汉时，古徒骇河古道在今德州以东。数千年来，故河早湮，形迹难觅。如今的徒骇河并非禹疏之河，而是金元时期开挖并以“徒骇”而冠名的一条防洪排涝河道。徒骇河源自聊城的莘县文明寨村东，向东北流经山东的莘县、南乐（河南省）、阻谷、茌平、高唐、禹城、齐河、临邑、济阳、商河、惠民、滨城、沾化、无棣 14 个县区，河道全长 436 公里，是山东的一条重要防洪灌溉河。

禹疏九河，其五在德。这说明德州区域曾是大禹治水的核心地区，五河的开凿与疏浚，决定了治水的成败，关系到华夏民族的生存。从这个意义上说，德州先民为中华民族早期的生存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德州也成为大禹文化与中华治水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禹疏九河，功在千秋。他改变以往单纯用堤坝围堵洪水的方法，强调开渠引流，疏导洪水，顺势入海。这种变“堵”为“疏”的方法，不仅使中国古代治水理念发生质的飞跃，也对历代统治者的国家管理理念产生了重要的积极影响，凡是和谐或者比较和谐的朝代，对民众的利益和欲求通常都采取了疏导的政策，而不是堵压，从而使国家长治久安。否则，就会走向反面。“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谐元素”的根基。

二、禹息古城与具丘山

禹王虽逝，禹迹永垂。大禹治水在德州刻下道道痕迹，除鬲津、马颊、胡苏、钩盘、徒骇五河故道之外，禹息古城与具丘山也是重要的禹迹。

禹息故城又称古高唐城，位于禹城市伦镇西北。《太平寰宇记》卷十九：“唐天宝元年，在齐州西北八十里，以祝阿县（今禹城市）西南三十里有废禹息故城为名。”清光绪《高唐州志·高唐故城》载：“高唐故城在城东七十里伦镇西北。”

^① 以上资料均出自《尚书正义》卷六《禹贡》。

^② 《尔雅注疏》卷七《释水》。

今故城遗址占地约 13.5 平方公里。南面有大城子坡村，北面有小城子坡村，相距 3.5 公里；东面燕寨村与西面堂子街相距 4 公里。城址偏西侧有一高台，长 160 米、宽 14 米，高出地面 1.2 米。当地人讲，此台是禹息故城的最高点，曾是制陶作坊。如今田野上仍能看到陶片、瓦砾碎片。1963 年发现了完整的陶罐、盆、鬲数十件，多为龙山文化时期的器物。2003 年曾发现龙山文化期的磨制石锤一块。从地势、形、貌、质分析，古城地域在上古时期是高数十米、底阔二十几平方公里的土丘，古城建于土丘之上。通过城址叠压状况分析，此地有三城叠压。通过土层、出土文物及文献记载分析，故城遗迹的最下层可能是太昊时期的高阳城，中层可能是大禹时期的禹息故城，最上层是西周以后的高唐城。

大约 5000 多年以前，德州区域是黄河漫流入海之地，河岔纵横，湖沼棋布，地势低洼。禹息城位于黄河、古漯水交汇的东南岸一高丘之上，西面有黄河水由南向北奔流，北面有漯水河由西南向东北缓缓入海。北、西有疏水、挡风、避袭屏障；南、东有肥沃土地、丰茂森林，成为人类栖身的物华天宝之地。

相传，东夷太昊部落的一支最早迁居于此，筑高阳城。后来，炎帝派祝融率部族东进，以寻求新的栖身地。祝融来高阳城后，重建了城堡，炎帝东巡狩，封高阳区域为高国。祝融善于用火，称火德帝，教人用火烹煮食物。后有周武王封高阳地区为祝国，秦、汉时又建祝阿县，唐代禹城东门取名“祝阳”，都与先祖祝融中兴高阳城有关。现禹城有朱姓族，家谱续祝融为祖，专供奉之。黄帝时期，将其孙颛顼封于高阳，号高阳氏，古阳、唐不分，故高阳即是高唐，所以高阳城亦称高唐城。

尧舜时期，洪水泛滥，今德州区域成为泽国，高阳城亦被洪水所毁。大禹受命治水，东巡视察水情，来到高阳故城。因为此地地势较高，又处于洪水泛滥之核心，所以将治水督导中心设立于此，规划、指挥疏水导流。大禹初到之时，正值灾祸连绵，水洼沼泽遍野，困在土丘上的百姓，耕耘无田，狩猎无场，采食无果，饮无清泉，寒无裹衣，水浇兽袭无助，伤病瘟疫无医。大禹治水，脱民于困境，躬耕兴农，百姓大悦，敬之为神明。禹率众在高阳故地重建城池，百姓安居乐业。为纪念大禹，后人名之“禹息故城”。

相传，禹息故城上下分九层：一层为水、陆码头；二层为粮草、车、马、牛、羊等急用物资的存放基地；三层为造船、车、耒耜的场所；四层为居住区；五层为众部落首领商讨大计、统筹调度的集合点；六层为物资存放基地；七层为大禹督水总指挥部；八层为酿造作坊；九层为制陶、磨造石器的作坊。各层间有转道、直道相通。斗坡处设木制滑轮车，专运重型物资。当时四方百姓蜂拥来投，一批批青壮年分水、陆从禹息城奔赴治水前线。大批治水物资不停的调集运出。工匠们日夜打造各种器械、工具，百姓们忙于纺织、耕种、养殖等。

关于禹息故城，还有另一传说：鲧受命治理洪水，盗息壤而用，上帝怒而诛之，鲧藏息土于东洲，禹继父业治水时，上帝准用息土。禹受命后东寻息壤，在禹息故城找到且掘而用之。息土者，也称息壤，是指黄黏且带有黑色的有机之土。黄色是源于昆仑山随水冲击而沉积的土，黑色是草木腐烂而成的土。此土肥沃，有生养万物之功能，黏合力强，又有凝聚

力，是建城筑坝的良土，因而息壤被视为宝土。息壤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在治水中发挥了巨大的神威。禹在此建立了治水指挥部，历时八年之久。

具丘山在禹息古城东北 30 余里，相传是大禹登高观察水情之处。据禹城旧志记载：大禹为了解水情，从禹息故城徒步来到此处，为察看水势，率众聚土成丘，后人称之为“具丘山”。大禹恩泽，后人世代垂念。为纪禹功，后人在山上筑亭一座，名“禹王亭”。

禹王亭最早建于何时，已无从考证。嘉庆《禹城县志》记载：唐乾元二年（759），禹城县城移迁善村（现老城址）。建成之初，首任县令登城向西眺望，见河西有一小丘郁郁葱葱、绿荫丛中隐现着一介草亭，似有紫气缭绕。县令随问当地一老者：“此系何山？”老者曰：“具丘山。”老者随将禹王在具丘山上观察水势、疏洪导水之事禀告了县令。并说：几千年来，当地百姓为缅怀大禹为民造福之德，在具丘山上栽树、移植花草、结扎草亭，供奉禹王灵位，祈求禹王保护一方百姓平安。是日，县令召县内豪绅三老，商定在县城西门内修建禹王庙，在具丘山上修建禹王亭，让世人永记大禹治水的功德。此举得到百姓的积极响应，富者自愿献粮捐款，穷者自愿出工。筑亭建庙的工程当年就完成了。禹王亭内供奉着禹王神像，县令亲率官员民众祭祀禹王。此后，历代县令每年春清明、秋中元都亲赴禹王亭祭奠禹王。自唐至元，禹王亭几次被毁。

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当地百姓在具丘山上重建禹王亭，翰林院检讨刘士骥作《禹亭记》，歌颂大禹功德。清康熙五十年，知县曾九皋重修、扩建禹王亭，作《禹亭记》，重述大禹功德。禹王亭占地 40 余亩，座西面东，蓝色砖墙，绿色琉璃瓦顶，余为木质结构。底层三间并排三个拱旋门；二楼二楹三间有平台厦，中间塑有禹王全身坐像，威严肃穆，面朝东方，高 1.89 米，上涂金黄色的油彩。背两侧童男童女手持日月龙凤扇；坐像前上方檐下嵌一横匾，上镌“神功千古”四字。亭前左右有配厢房，并有松柏数株，古雅肃穆。清道光七年二月，民族英雄林则徐离京南下，曾在禹王亭逗留一夜，并将其观感记入日记。明、清时期，禹王亭香火大盛。前来拜祭禹王者络绎不绝。不少文人墨客也来此朝拜观光，留下了不少诗词墨宝。这些作品有的被刻碑留存；有的载入县志，为当地留下了一笔可贵的文学遗产。清至民国，禹王亭香火尚盛。每年还在春、秋季节在此举办庙会。日寇侵华时，禹王亭院内两配殿被战火摧毁，亭之前厦被拆除，禹王亭惨遭破坏。至此，禹王亭逐渐凄凉荒芜。

1977 年 2 月，山东省公布具丘山为龙山文化遗址，属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96 年，禹城市政府拨款集资重建了禹王殿和禹王亭，殿亭金碧辉煌，雄伟壮观，再现了大禹精神的感召力与凝聚力，反映了人们对大禹治水、造福于民的感念。

第三节 后羿、有鬲氏与夏王朝

大禹治水，五河疏浚，鲁西北平原沃野千里，有穷氏、有鬲氏在这里兴起，他们植根于这块沃野的土壤，辛勤耕耘，开疆拓土，逐步发展壮大，创造了灿烂的德州早期文明，对

夏王朝的统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一、有穷后羿崛起鬲津之畔

夏朝初期，在今德州东部流淌着一条河流——鬲津河，为禹疏九河之一。鬲津河畔有一地，名曰“穷石”，是夏朝东夷强藩——有穷氏的崛起之地，其首领就是传说中的射日英雄后羿。

关于后羿的龙兴之地在今何地，有三种说法：其一，在今山东德州境内。《水经注》卷五记载：“鬲津也，……故有穷后羿国也。”鬲津即在今德州境内，有穷氏在鬲津河岸。其二，在今河南，即穷谷，《晋地记》载：“河南有穷谷，羿灭夏，自鉏迁于此。”鉏即今河南滑县，后羿由鉏迁于穷谷。其三，在今安徽，《路史》载：“今寿之安丰有穷谷穷水，即穷石。”在今安徽英山县境。这里取第一种说法。

4000多年以前，德州区域位于黄河下游的冲积扇上，地广野沃，生活在今鲁南、鲁东地区的东夷人陆续迁来。大约在龙山时代中期，太昊部落的一支北迁至徒骇河畔，筑高阳城^①。稍后，少昊部落的一支也北迁来此，在今德州西部平原一带从事原始农耕，创造了发达的原始农业文明。近年来，德州先后发现了20余处龙山文化遗址，从这些考古发掘可以印证，早在4000年前东夷人已在德州区域创造了发达的黄河农业文明。

后羿时期，德州东夷文明达到鼎盛。禹疏九河后，德州平原有鬲津、马颊、胡苏、钩盘、徒骇等五河顺流东下，原来湖沼滩涂棋布的德州东部一带，河道畅通，逐渐变成膏腴之地，暖温带阔叶乔木与茂盛的草地错落丛生，丰美的水草，滋养了大量的食草种群，是獐、梅花鹿、麝等动物理想的生存环境，鹿类种群数量众多。鹿肉质鲜美、皮毛柔软且御寒性强。这就吸引了东夷的一支善射部落——有穷氏的到来。

关于有穷后羿的家世渊源，《史记·夏本记》云：“帝羿有穷氏，未闻其先何姓。帝誉以上，世掌射正。”^②后羿拜吉甫为师，学习射箭之术，由于他臂膀特别长，箭射得格外远，因而便有了“善射”的美名。后羿受封为“司射”，赐予红弓白箭，分封于鉏。夏朝初年，后羿率部由鉏迁到鬲津河畔，定居下来，号有穷氏。

当时的德州平原，物丰野沃，后羿率有穷氏部民春夏耕耘，秋冬狩猎，繁衍生息，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后羿善射，几乎百发百中，徒手能与虎捕，威名远扬。周边部族如有鬲氏、有易氏等纷纷归服，后羿逐步成为东方诸部的首领，率部开疆拓土，辛勤耕耘，国力蒸蒸日上，成为夏初东部最强大的方国。

由于后羿具有非凡的射箭技术，后代赋予了他众多的神话传说。相传，天帝为考验后羿，命“十日”并出，禾稼草木都焦枯了，人们找不到吃的，猛兽毒蛇时常出没，为害民众。于是后羿射掉九日，射杀6种怪兽，为民除了害，万民皆喜。后来，后羿向西王母讨要长生不

^① 高阳城故址在今禹城伦镇禹息故城。禹息故城遗址分上、中、下三层，有三城叠压，下层为高阳故城，中层为禹息故城，上层为高唐故城。在此曾陆续出土过龙山时期的陶罐、盆、鬲、磨制石锤等，这也印证了传说的可信性。

^② 《史记·夏本记》正义引《帝王世纪》。

死药，西王母念其除“七害”解救众多生灵之功，把药赐予了他，不想却被其妻嫦娥偷吃了，嫦娥由此“奔月”。

德州民间还流传着有关后羿与嫦娥的另一传说：有一天，嫦娥在桂树下采花，突遇一只猛虎。嫦娥吓得不知所措，丢掉花篮，大声呼救。后羿正好沿鬲津河狩猎，循声而去，拈弓搭箭，一箭射中虎眼。虎虽受伤，野性犹在，转身扑向后羿。后羿徒手与虎搏斗，打死猛虎，救下嫦娥。嫦娥感激万分，以身相许，二人便以桂树为媒，结为夫妻。后羿在鬲津之畔为嫦娥修造宫殿，夫妻二人恩恩爱爱。当时，天上突然出现了十个太阳，烧焦了庄稼，烤死了草木，人民没有了食物。同时猼訑、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等妖魔鬼怪也开始危害百姓。后羿与嫦娥挺身而出，嫦娥以桂木为杆、神石为镞，为后羿制成神箭。后羿带神箭出征，将凿齿处死在畴华之野，将九婴诛杀于凶水之上，将大风战败于青丘之泽，射掉天上多余的太阳，杀死猼訑，将修蛇斩于洞庭，在桑林擒住封豨。百姓欢天喜地，对后羿与嫦娥感恩不尽。西王母得知此事，赐予后羿长生神药，后羿将神药交给嫦娥保管。后羿有一管家叫寒浞，是个奸邪小人，趁后羿外出狩猎，威逼嫦娥交出神药，情急之下，嫦娥吞下神药，结果身不由己，飞到了天上。由于不忍心离开后羿，嫦娥滞留在月亮广寒宫。广寒宫里寂寥难耐，于是就催促吴刚砍伐桂树，让玉兔捣药，想配成飞升之药，好早日回到人间与后羿团聚。后羿听说嫦娥奔月之后，痛不欲生。王母为二人的真诚所感动，于是允许嫦娥每年在月圆之日下界与后羿在桂树下相会。据说月圆之日，在桂树下仍能隐隐约约听到哭声。这些美丽的传说，表达了人们对先祖与大自然无畏抗争的崇敬。

当有穷氏兴起之时，夏朝第三代国王太康即位，生活日益腐化。他喜欢饮酒、打猎、歌舞，而疏于朝政。太康长期沉湎于声色酒食之中，政事不修，致使内部矛盾日趋尖锐，外部四夷背叛。后羿趁机扩张实力，伺机推翻太康统治，取而代之。

太康带着随从到洛水南岸打猎，百日而不回朝。后羿看到太康外出打猎，长期不归，朝政混乱，怨声载道，便亲自带兵南下，准备夺取政权。后羿率军驻守洛水北岸，截住太康的归路。太康带着猎获的野味，走到洛水边，被后羿挡住归途，不得过河。太康无法回朝，只得在洛水南面过着流亡生活。后羿取而代之，“因夏民以代夏政”^①。起初，后羿还不敢自立为王，另立太康的兄弟仲康为夏王，把实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后羿在仲康在位期间，广罗党羽，独擅朝政，以待时机成熟，便自立为王。仲康死后后羿又立仲康之子相为帝，不久便罢黜相并将其放逐到斟灌，夺取王位。

二、有鬲氏与“少康中兴”

继有穷氏之后，夏代德州区域又兴起了一个方国——有鬲氏。有鬲氏因帮助夏朝亡臣伯靡消灭叛臣寒浞、成就“少康中兴”而名垂史册。

有鬲氏，相传是皋陶之后，偃姓。《太平寰宇记》卷六十四：“古鬲国，郟姓。皋陶之后。”皋陶是东夷少昊之后，生于曲阜少昊之墟。曲阜，偃地，舜帝因而赐皋陶为偃姓。皋陶在舜

^① 《左传·襄公四年》。

帝时，当上了大理之官，负责刑罚、监狱，并制定了五刑之法。后来，皋陶辅佐大禹建立了夏王朝。禹对他非常感激，指定他为接班人，但皋陶先大禹而逝。皋陶的后裔被分封到各地，其中一支号有鬲氏。

有关有鬲氏的记载最早出自《左传》。《左传·襄公》记载：“靡奔有鬲氏。”说的是寒浞作乱，有一个夏朝贵族名叫靡的人，逃往有鬲氏。有鬲氏在什么地方呢？西晋杜预为《左传》作注，对《左传·襄公》中提到的有鬲氏作了如下解释：“国名，今平原鬲县也。”两汉魏晋时期，今德州属平原郡鬲县。杜注明确提出：《左传·襄公》所提到的有鬲氏，就是位于当时的平原郡鬲县。根据杜注，夏朝的有鬲氏之国，当在今德州区域。据考证，有鬲氏故城在今德州市东南抬头寺乡武庄一带。可见，有鬲氏本皋陶之后，夏初被分封到鬲津河沿岸，建立了一个小方国，因地而名，号有鬲氏。

关于有鬲氏的渊源，德州地方还有另一传说：在距今约5000年左右，东夷族的一支——有鬲氏迁到今德州区域。当时这里是古黄河漫流入海之地，地势低洼，土地肥沃，植被茂盛，动物繁多。这支部族初来之时，主要从事狩猎，后由于德州平原土地松软肥沃，适合农耕，他们便刀耕火种，开始了原始农业生产。有鬲氏利用当地特有的一种粘土，制成精美的炊具、食器、盛器以及陶制工艺品，如鬲、鼎、豆、壶、罐、杯、鬯、盃、尊、瓶、钵、盆等用具。其中“鬲”是最为典型的器皿，不仅数量多，而且非常精美，所以这支部族就以“鬲”为族名，号“有鬲氏”。有鬲氏是德州最早的先民，到夏初已经发展成为部落方国。

两种说法，有一点是一致的，即有鬲氏在夏朝初年，是今德州区域的一个方国。有鬲氏初与有穷氏为邻。后来，后羿率部南下，夺取夏朝政权，有鬲氏乘机发展，完全占据了鬲津河两岸。

后羿夺取夏朝政权后，将夏王相先后流亡到同姓方国斟灌、斟寻二地。斟灌在今山东寿光县附近，与夏朝另一同姓国斟寻相距不远。斟寻在今山东潍坊市西南的白浪河中、上游一带。“二斟”是太康失国后夏王室的主要依靠力量，所以从太康到其弟仲康，再到仲康之子相一直在二斟之间流亡避难。后羿夺取了夏朝的权力后，自恃善射，不理民事，整日沉湎于田猎游玩，又弃贤明而用奸佞。武罗、伯困、熊髡、龙圉四人，都是贤德之臣，却被后羿斥逐。而狡诈阴险、阿谀谄佞的寒浞，独得后羿宠信。寒浞本是寒国^①国君伯明之子，因奸佞不法而被放逐。寒浞为伯明所弃，后羿不仅收留了他，而且对他十分信任，委以政事。寒浞行媚于内，施赂于外，笼络民心，后羿的臣民都服从他的号令。后来，寒浞收买后羿的家众，乘后羿游猎归来之际将其杀死。寒浞将后羿烹煮后送给后羿之子，后羿的儿子不忍食父，被杀死于穷门。寒浞霸占了后羿的妻室，夺取了政权。

当时，夏后相还在二斟之地。为彻底消灭夏朝残余，寒浞乃命其子浇率兵先后攻灭斟灌、斟寻二国，并杀死了在这里苟且偷安的夏后相。据说相被杀时，其妻后缙已有身孕，仓惶之际从墙洞中逃走，投奔到其娘家有仍氏（在今山东东平），生下遗腹子少康。少康长大

^① 东夷人的一个部落方国，故址在今山东潍坊市寒亭区。

后做了有仍氏的“牧正”。后因躲避寒浞的追捕，逃到了有虞氏（在今河南虞城西南），做了有虞氏的“庖正”。有虞氏是舜的后裔，支持少康复国。有虞氏之君将两个女儿嫁给了少康，又封给他纶邑（在今河南虞城东南），从此少康“有田一成，有众一旅”^①，总算稳住了脚跟。

寒浞倒行逆施，众叛亲离。一个名叫靡的夏朝遗臣乘机反抗，率残部逃离寒浞，来到了有鬲氏。有鬲君收留了靡，并帮助靡积蓄力量，成就兴夏大业。靡以有鬲氏为基地，迅速壮大，向南发展，收服了斟灌、斟寻二国的余众，实力大增。听说夏后相的遗子少康在有虞氏，率部归服，拥立少康。少康在靡和有虞氏、有鬲氏的帮助下，攻灭寒浞，接着又攻灭寒浞之子浇的封国过（在今山东莱州西北）、豷的封国戈（在今河南东部），夏王朝遂得以重建。此即历史上有名的“少康中兴”。

可见，有鬲氏为“少康中兴”立下汗马功劳。有鬲氏也因助少康而得到赐封，占有鬲津、马颊、胡苏、钩盘、徒骇五河之地，势力范围进一步扩大，成为夏朝东部强藩，延续 400 余年，直到夏朝灭亡。

第四节 齐鲁文化与燕赵文化的交融

春秋时期，德州地跨齐晋，北部是齐国要冲——重丘，西部有晋国屏障——东武城。战国时期，德州横担赵齐，东南部属齐之平原县，西北部属赵之东武城。在长达 500 多年的诸侯争霸割据中，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德州一直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而在文化上，德州南承齐鲁之韵，北兼燕赵之风，齐鲁文化与燕赵文化的交融，形成了德州富有特色的地域文化。

一、会盟之“要津”与河朔之“咽喉”

春秋时期，德州地跨齐晋，为河朔之咽喉，时则成为诸侯会盟的要津，时则成为各国争夺的重地。如重丘（故址在今陵县徽王镇王解村）不仅是齐国北部重地，也因其西临强晋、北靠燕国而成为诸侯的会盟之地。乾隆《夏津县志》载，春秋时夏津为“齐晋会盟之要津”。著名的十二国之盟——重丘之盟也发生在这里。

重丘之盟起因于齐晋争霸。春秋中后期，齐晋两国作为中原地区的两强，交替争霸，时战时盟。齐庄公五年（前 549），齐国大夫乌馀叛齐降晋，把齐国的廩丘（今河南省范县）献给晋国，齐晋关系紧张，战争一触即发。在双方关系交恶之时，齐国发生了内乱，齐庄公六年（前 548）五月，大夫崔杼弑杀齐庄公，立庄公异母弟公子杵臼为君，是为齐景公。此时，晋平公以霸主身份派使臣到齐国去迎接已经流亡在外 12 年的卫献公，准备强令卫国将夷仪让给卫献公居住。齐国执政崔杼看出卫献公有复辟的机会，就浑水摸鱼，扣留了他的家小，迫使他承诺复辟后把五鹿（今河南濮阳南）割让给齐国。这引起了晋国的强烈不满。于是晋平公以齐国崔杼弑君为借口，挟持中原众诸侯出兵伐齐。晋平公、宋平公、鲁襄公、卫殇公、郑简公、曹武公、莒犁比公、邾悼公、滕成公、杞文公、小邾穆公等十一国国君在夷

^①《左传·哀公元年》。

仪（今山东聊城西）会合，组织联军准备伐齐。

面对气势汹汹的诸侯联军，齐国执政卿崔杼被迫向晋国求和。齐庄公六年（前548）七月，晋、齐、宋、鲁、卫、郑、曹、莒、邾、滕、杞、小邾十二国国君在齐国北部重镇——重丘会盟。齐国承认晋平公的霸主地位，并无条件送归在齐国流亡的卫献公。而晋国也承认齐景公的合法地位。重丘之盟使紧张的齐晋关系得以缓解，标志着中原诸侯暂时形成均势。

战国时期，德州横担赵齐，北接燕国，成为河朔之咽喉。齐宣王七年（前314），燕国发生内乱，齐宣王命令匡章率军伐燕。匡章在“北地”（今德州一带）誓师，率“五都之兵”及“北地之众”^①，向燕国进攻，仅以五十天的时间攻下了燕都，燕王哙身死。齐宣王炫耀：“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五旬而举之。”齐灭燕破坏了当时七雄之间均势，各国环顾不安，酝酿救燕，加之齐军在燕“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②，过于残暴，燕人纷纷起来反抗，齐军撤出燕国，退至“北地”。在这此伐燕之战中，来自今德州区域的“北地之众”，成为齐军的先锋和主力，攻破燕都，大获全胜，但这也埋下了燕国复仇的祸根。

齐湣王十八年（前284），燕昭王为了报齐国伐燕之仇，联合秦、韩、赵、魏大举攻齐。五国联军由燕国上将乐毅统领，率先攻入齐之“北地”，双方展开激战。在济水之西（今德州禹城、齐河一带），齐军与乐毅率领的五国联军决战，今德州区域成为当时的主战场。因寡不敌众，济西会战以齐国大败而终，德州区域率先沦陷。乐毅战领德州后，率燕军长驱直入，连下齐国七十余城，齐国一败涂地。

后来，齐将田单虽收复了失地，但齐国损失过于惨重，自此一蹶不振。齐襄王时，赵国伐齐，夺取了齐西北部大片土地，今德州西部各县又属于赵国。公元前221年，秦将王贲自燕攻齐，今德州区域首当其冲，齐军大溃，王贲率军长驱直入，直逼齐国都城临淄，齐王建不战而降，齐亡。秦在齐地建立了济北郡、齐郡和琅琊郡等，德州隶属济北郡。

二、晏城与晏婴

春秋战国时期，处于“河朔之咽喉”的德州，被列强视为禁脔之地，诸侯往往将心腹重臣分封在这里，意在镇抚要地。今齐河县城——晏城一带就是春秋时齐国“正卿”晏婴的封地。

晏婴（前578-前500），字仲，谥号平，习惯上多称平仲，又称晏子。晏子历齐灵公、庄公、景公三代，前后执政50年，节俭力行，谦恭下士，廉洁奉公，深得齐人爱戴。齐君将西北要地——济水以东、河水以西之地（今晏城一带）分封给晏子。为纪念这位古代杰出的政治家，后人在晏城建有晏婴祠、晏公庙，岁时祭奉。晏城因晏婴而得名。晏城内原有晏婴宅，宅旁有一“金华井”，其水以清甜甘冽、调药效佳而闻名。

晏婴祠重建于清代，前殿后祠，造型奇伟。乾隆帝南巡，驻跸晏城，游历晏婴祠，顿发怀古之情，欣然命笔，题写《晏婴》一诗：“彰君赐固服桓子，执彼鞭犹慕史迁。羸马敝车

^① “北地之众”主要指来自齐国北境（主要在今德州区域）的剽悍士卒。

^② 《孟子》卷二《梁惠王下》。

一时耳，晏城千古属斯贤。”清初诗坛盟主钱谦益北游，曾历晏城，临晏子祠凭吊怀古，作《晏城》一诗：“采地遗者谁？相国齐晏子。千驷不匡君，二桃能杀士。激彼梁丘生，浮白为之起。”

晏子施政以“仁政爱民”为先。他坚持“意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①。遇有灾荒，国家不发粮救灾，他就将自家的粮食分给灾民救急，然后劝谏君主赈灾，深得百姓爱戴。晏子主张：“廉者，政之本也，德之主也。”他管理国家秉公无私，亲友僚属求他办事，合法者办，不合法者拒。他从不接受礼物，大到赏邑、住房，小到车马、衣服，都被他辞绝。不仅如此，晏子还时常把自己所享的俸禄送给亲戚朋友和穷苦百姓。晏子生活十分俭朴，吃的是“脱粟之食”、“苔菜”，可谓“食菲薄”，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粗茶淡饭、素食当家；穿的是“缁布之衣”，上朝坐的是弊车驽马；住的是“近市湫隘嚣尘，不可以居”的陋仄之室。他不仅如孔子所说的“戒得”，也十分注意“戒色”。景公见晏子妻“老且恶”，欲以爱女嫁他，他坚辞不纳。他说：“去老者，为之乱；纳少者，为之淫，且夫见色而忘义，处富贵而失伦，谓之逆道。”晏子乐观豁达，一切处其自然，且虚怀若谷，闻过则喜。孔子赞他是“不以己之是，驳人之非，逊辞以避咎，义也夫！”表明了他随和大度，注重自身修养的品格。晏子生性乐观，对生死淡然视之。他说人都是要死的，不论仁者、贤者、贪者、不肖者概莫例外，因此从来不“患死”、不“哀死”，把生老病死看作是自然规律。他始终保持乐观大度的心情，身心健康、延年益寿。

在众国林立、群雄争霸中，晏子则纵横捭阖、折冲樽俎，既不穷兵黩武，又不辱于诸侯，他能巧妙地利用大国之间的矛盾，随机应变，不战而屈人，提高了齐国的声威，维护了齐国的大国地位，因而晏婴在后世人们心目中是智慧的化身，“晏子使楚”更成为千古佳话。

齐景公时期，晏子受命出使楚国，楚王知道晏子的个子很矮，就想捉弄他，命人在城墙的大门旁边又开了个小门，请晏子从小门进去。晏子知道楚王要戏弄他，严词加以拒绝。他说：“到了狗国，才走狗洞，我现在是出使楚国，不应该走狗门。”招待晏子的官员听他这么一说，只好请晏子从大门进去。晏子拜见楚王。楚王故意问：“是因为齐国再没有别人，才派你来的吗？”晏子回答说：“齐国的人多极了，仅都城就有上百条街道，人们把衣袖举起来，就可以遮住太阳；人们甩掉汗水就象下雨一样。大街上人们肩靠肩，人挤人，怎么说齐国没人呢？”楚王接着问：“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派你出访呢？”晏子不慌不忙地回答：“我们齐国派使节出访很有讲究，对那些精明能干的人，就派遣他们出使那些道德高尚的国家；对那些愚蠢无能的使臣，就派他们出使那些不成器的国家。我是使臣中最愚蠢、最无能的人，所以就派我出使楚国来了。”晏子的话使本打算要戏弄他的楚国君臣们面面相觑，半天说不出话来。楚王设宴招待他。正当宾主尽兴之时，两名士兵绑着一个人来见楚王。楚王问道：“你们绑的是什么人，为什么绑他？”士兵回答说：“是齐国人，因为他犯了盗窃罪。”楚王故意看着晏子说：“齐国人天生就喜欢盗窃吗？”晏子从席上站起来，一本正经地说：

^① 《晏子春秋·内篇问下》。下同。

“我听说，橘子树长在淮河南边就能结出橘子，而长在淮河北边就结出枳子，虽然两种植物的叶子一样，但他的果实的味道截然不同。之所以会这样，是水土不同的缘故。现在，这个人在齐国时不偷盗，到了楚国反而学会了偷盗，是不是楚国的水土会使人变得惯于偷盗呢？”楚王听了晏子一番反驳，苦笑着承认说：“圣人是不能同他开玩笑的，我反而自讨没趣。”类似上面晏子使楚的故事还很多。晏子凭自己的智慧，挫败了一些国家有辱齐国国格和晏子人格的阴谋，他的名声也越来越大，成为著名的外交家。

自古以来，晏城人以晏子为骄傲，视晏子为圣人，建晏子祠庙，世代供奉，表达了对晏婴的敬仰之情。

三、武城与赵胜

武城一带，是战国后期平原君赵胜的封地。赵胜（？-前 251）战国四公子之一，赵武灵王之子，赵惠文王的同母弟，曾两度任赵相，以礼贤下士而著名，门下宾客达数千人。赵惠文王元年（前 298）封平原君，封邑在东武城（今德州武城西北）。

明朝嘉靖年间，在平原君封邑武城以东 30 多公里的陵县地界发现了平原君墓。《陵县县志》记载：陵县知县沈斌寻访到一古墓，墓碑上“平原君”三字清晰可辨，便认定此为战国时期平原君赵胜之墓，并于嘉靖十六年（1537）立碑记述。民国《陵县续志》亦有记叙：“平原君墓，为本县有名古迹，旧志已叙及之，兹摄其影，以供好古者观赏。”战国时期并无陵县建置，墓址所在地当时可能在平原君封地之内。平原君墓位于今陵县城北护城河北岸，封土直径 10 余米，高约 4 米，有墓碑高约 2 米，正书“平原君墓”，上有“明嘉靖十六年知县沈立碑”等字。由于年久失修，封土流失，荒芜不堪，呈现一片荒凉景象，为保护文化古迹，1983 年陵县人民政府拨款对古墓进行全面整修，墓前设有平台、供案，将书写着“平原君墓”四个大字的古碑重立于墓前。墓周围砌有青砖墙围绕古墓。墓区植松柏数十株，并撰刻了“重修平原君墓记”石碑一块，立于墓侧。

平原君的主要功绩是解邯郸之围。赵孝成王四年（前 262），秦攻韩，切断了韩国上党郡与韩国本土的联系，上党孤悬于外。上党太守冯亭将上党郡献于赵国。赵成王派廉颇进军长平，抵御秦军。孝成王六年（前 260），赵王中秦的反间计，以赵括代廉颇为将，秦将白起大破赵军于长平。秦军围攻赵的都城邯郸，赵国倾全力死守邯郸，同时又向楚、魏紧急求援。

秦军围邯郸后，赵王派平原君到楚国求救，订立合纵盟约，以联合抗秦。平原君决定在门客中挑选二十名文武全才的人一同去。选来选去，只选出十九人，再也选不出来了。这时候，门客中有个叫毛遂的，向平原君自我推荐，说自己愿意凑满二十人的名额，一齐到楚国去。平原君问他到门下有几人了。毛遂说有三年了。平原君说：“贤士处世，好象锥处囊中，锥尖马上就会露出来。先生在我这里已经三年了，却没有人称赞过你，我也没有听说你有什么本领。你不能去，留下吧。”毛遂说：“我今日才得以入囊。如果我早入囊中，整个锥子都会露出来，不只是露出一点点尖来。”平原君终于让毛遂一同去楚国。

到了楚国后，平原君在楚国宫廷上与楚王商谈合纵抗秦的事，从早上谈到中午，也没有结果。毛遂手按剑，拾级而上，对平原君说：“合纵抗秦有利，不合纵有害，两句话就可以决定了，您们从早谈到中午还没有订结盟约，这是为什么？”楚王问平原君说：“这位是干什么的？”平原君说：“是我的门客。”楚王就大声呵斥说：“还不下去，我是在跟你的主人说话，你上来做什么！”毛遂手按剑把，逼近楚王说：“大王敢这样呵斥我，是仗着楚国的军队多。现在，我跟大王的距离不到十步，大王的性命握在我手里，楚国的军队虽多，也帮不了您的忙。当着我的主人，您为什么这样无礼的呵斥！况且我不仅为存赵，而且为存楚，大王犹豫不决，必为秦国所乘，赵若亡，楚亦将不存！”毛遂的义正词严和威逼，使楚王连声答应说：“是啊，是啊！先生的话有道理，楚国愿结合纵之盟。”毛遂问：“决定合纵了吗？”楚王说：“决定了。”毛遂对楚王身边的人说，去拿鸡、狗、马的血来。毛遂捧着盛血的铜盘，跪着献给楚王，说：“请大王首先歃血定盟，其次是我的主人歃血。”就这样，在殿堂上订立了合纵抗秦的盟约。楚国屡约出兵。

魏国也派将军晋鄙领兵十万救赵。秦王派使者威胁魏王说：“赵国都城很快就会攻下，谁敢救赵，秦攻下赵以后就先打谁。”魏王畏惧秦国，令晋鄙在邺，停军筑垒，不再前进。名义上是救赵，实际上是在观望形势的变化。平原君的夫人是魏国信陵君的姐姐。平原君写信责怪信陵君说：“我以为你有救济别人困难的高义，现在邯郸这样危急，魏国的救兵不来，你却无动于衷。纵然你轻易地抛弃我，难道你也不可怜你姐姐吗？”信陵君屡次请魏王进兵救赵，魏王都不答应。他只好采用了侯赢的意见，使人偷出魏王的兵符，夺晋鄙军救赵。

在邯郸被围，楚魏救兵又都未到的危急时刻，平原君将门客、家丁武装起来，将家财散尽，以飨士卒，组成 3000 人的敢死队，与秦军决战。适逢魏楚的救兵来到，双方里应外合，大败秦军，邯郸解围。

邯郸之战后，平原君就藩东武城。因解围之功，赵王为此增加平原君东武城的封地，平原君辞而不受。公元前 251 年，平原君病逝于东武城封邑。

四、“良将”廉颇

战国时期，群雄争霸。连年不断的战争，锻炼了一批能征善战的杰出军事人才。赵国大将廉颇即是其中之一。廉颇是今陵县刘洋乡廉家寨村人。据民国《陵县续志》卷三记载：“在城东 15 里廉家寨西北约半里许，有砖砌大坟，相传是战国时名将廉颇之墓。并有放马场、饮马井等古迹，现均已湮没。”该村均为廉姓，自认为是廉颇故里，廉氏家谱也有记载，至今已传至 74 代，廉氏后裔按时祭祀。

廉颇以能征惯战、老当益壮而闻名于诸侯，与白起、王翦、李牧并称“战国四大名将”。赵惠文王初，秦国东侵，赵国当其冲要，老将廉颇率赵军屡败秦师。而齐国也趁机扩张势力，引起秦国的不安。为此，秦昭王改变策略，暂时与赵讲和，以联合韩、燕、魏、赵五国之师共同讨伐强齐。廉颇率军长驱深入齐境，攻取阳晋（今山东郓城城西），威震诸侯，而赵国也随之越居六国之首。廉颇班师回朝，拜为上卿，秦国虎视赵国而不放贸然进攻，正是慑于

廉颇的威名。此后，廉颇率军征战，守必固，攻必取，几乎百战百胜，威震列国。

秦国依仗其强大的国力，在外交上恫吓赵国，赵惠文王以蔺相如为使，两次使秦，挫败秦王，不辱使命。蔺相如被封为上卿，地位在老将军廉颇之上。对此，廉颇很不服气，说：“我作为赵国老将，有攻城野战之功，蔺相如只不过会耍嘴皮子，地位反而比我高。我见到蔺相如，必定羞辱他。”蔺相如不愿与其争高下，处处躲着他。但蔺相如的门人却不理解，蔺相如对门人说：“强秦之所以不敢对赵国进犯，只不过是二人同保赵国的缘故。如果二虎相争，势必会削弱赵国的力量。我只是把国家得失放在首位，个人恩怨放在后面而已。”廉颇听到以后，深受感动，于是脱去上衣，袒露臂膀，自背荆条来到蔺相如府中请罪，二人终于和好，结为“刎颈之交”。^①

赵惠文王二十年（前 278），廉颇向东攻打齐国，破其一军。赵惠文王二十二年（前 276），再次伐齐，攻陷九城。次年廉颇攻魏，克防陵（今河南安阳南）、安阳城（今河南安阳西南）。正是由于廉、蔺交和，使得赵国内部团结一致，尽心报国，使赵国一度强盛，成为东方诸侯阻挡秦国东进的屏障，秦国 10 余年未敢攻赵。

公元前 266 年，赵惠文王卒，孝成王立。这时，秦国采取应侯范雎“远交近攻”的谋略，一边跟齐国、楚国交好，一边攻打临近的小国。孝成王六年（前 260），秦国进攻韩地上党。上党的韩国守军孤立无援，太守冯亭便将上党献给了赵国。于是，秦赵之间围绕着争夺上党地区发生了战争。这时，名将赵奢已死，蔺相如病重，执掌军事事务的只有廉颇。于是，赵孝成王命廉颇统帅 20 万赵军阻秦军于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当时，秦军已南取野王（今河南沁阳），北略上党（今山西中部地区），切断了长平南北联系，士气正盛，而赵军长途跋涉而至，不仅兵力处于劣势，态势上也处于被动不利的地位。面对这一情况，廉颇正确地采取了筑垒固守、坚壁清野、疲惫敌军的作战方针。他命令赵军凭借山险，筑起森严壁垒。尽管秦军数次挑战，廉颇总是严束部众，坚壁不出。同时，他把上党地区的民众集中起来，一面从事战场运输，一面加固城防。赵军森严壁垒，秦军求战不得，无计可施，锐气渐失。廉颇用兵持重，固垒坚守三年，意在挫败秦军速胜之谋。秦国看速胜不行，便使反间计，让赵王相信，秦国最担心、最害怕的是用赵括替代廉颇。赵王求胜心切，中了秦国反间计，认为廉颇怯战，强行罢廉颇职，用赵括为将。虽然蔺相如力谏，指出只知纸上谈兵的赵括不适合担此重任，但赵王不听，任用赵括为将军。赵括代替了廉颇的职务后，完全改变了廉颇制定的战略部署，撤换了许多军官。秦国见使用赵括为将，便暗中启用武安君白起率兵攻赵。大败赵括军于长平，射杀赵括，坑杀赵兵四十余万。长平之战，赵国损失近五十万精锐部队。

赵国自长平之战后，国力大大削弱。燕国国相栗腹以给赵王祝寿为名，出使赵国，侦探赵国虚实。回国后向燕王建议，赵国青壮年在长平均被秦将白起坑杀，国内尽是孤儿寡妇，无力再战，乘此良机攻赵必胜。燕将乐间认为赵国连年同秦作战，百姓熟悉军事，若兴兵攻赵，燕军一定会败，坚决反对出兵。燕王喜不听乐间劝告，决意发兵攻赵国。他派栗腹为将，

^① 《史记》卷八一《廉颇蔺相如列传》。

分两路大举进攻赵国。栗腹令部将卿秦率军 20 万攻代，自率主力 40 万攻郃。燕军到达宋子（今河北晋县南）后，赵孝成王不得不起用老将廉颇。廉颇分析燕军的来势后认为，燕军虽然人多势众，但骄傲轻敌，加之长途跋涉，人马困乏，遂决定采用各个击破的方略。令赵将乐乘率军 5 万坚守代，吸引攻代燕军不能南下援救，自率军 8 万迎击燕军主力于郃。赵军同仇敌忾，决心保卫国土，个个奋勇冲杀，大败燕军，斩杀其主将栗腹。攻代燕军闻听主力大败，主帅被杀，军心动摇。乐乘率赵军趁机发起攻击，大获全胜，两路燕军败退。廉颇率军追击 500 里，直入燕境，进围燕都蓟（今北京城西南）。燕王只好割让 5 座城邑求和，赵军始解围退还。战后，赵王封廉颇为信平君，假相国。

廉颇任相国前后约六七年，多次击退入侵敌军，并伺机出击。孝成王二十一年（前 245），带兵攻取了魏地繁阳（今河南内黄西北），说明赵国国力又有恢复。

秦始皇二年（前 245），赵孝成王卒，其子赵悼襄王继位。襄王听信了奸臣郭开的谗言，解除了廉颇的军职，廉颇被迫出走魏国。廉颇出走，秦军卷土重来，赵王想再次起用廉颇，于是派遣宦官唐玖带着一副名贵的盔甲和四匹快马到大梁去慰问廉颇，看廉颇是否可用。廉颇的仇人郭开却唯恐廉颇再得势，暗中贿赂唐玖，让他说廉颇的坏话。唐玖见到廉颇后，廉颇在他面前一顿饭吃了一斗米，十斤肉，还披甲上马，表示自己还可出征，为赵国效力。唐玖回来后，赵王询问道：“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唐玖向赵王谎报说：“廉将军虽然老了，饭量还可以；可是他和我坐在一起，不多时就腹泄三次。”赵王认为廉颇已风烛残年，失去征战的能力，就没再任用他。廉颇失去了为国报效的机会，南下楚国，郁郁而终。

五、德州地域文化兼容性的初步形成。

西周至春秋时期，今德州区域隶属齐、晋，战国时期则分属齐、赵。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这里兼容齐鲁文化与燕赵文化，既有齐鲁之魂，又含燕赵之魄。

由于当时德州地理位置的重要，国君往往将心腹重臣分封在这里。今齐河县城——晏城一带是春秋时齐国“正卿”晏婴的封地；而武城一带则是赵国平原君赵胜的封邑。这些封君又起到文化使者的作用，将文化传播到封疆之内。如晏子将“厚德仁民、崇礼尚义”的儒家文化带给了德州。“仁政爱民”是儒家的政治主张，也是晏子施政的中心内容。他坚持“意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遇有灾荒，国家不发粮救灾，他就将自家的粮食分给灾民救急，然后劝谏君主赈灾，深得百姓爱戴。晏子主张：“廉者，政之本也，德之主也。”他为政以德、崇礼尚义，且虚怀若谷、闻过则喜。孔子赞他是“不以己之是，驳人之非，逊辞以避咎，义也夫！”^①而赵胜则传递了“慷慨悲歌、好气任侠”的燕赵之风。这些对德州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齐鲁之魂，燕赵之魄”在战国名将廉颇身上反映的淋漓尽致。首先廉颇具有“慷慨任侠”之气。他能征惯战：破齐，取阳晋；镇长平，秦军三年无法越雷池一步；破燕军，夺五城；攻魏国，取繁阳，屡战屡胜，“以勇气闻于诸侯”。蔺相如出使秦国，不辱使命，被封

^① 《晏子春秋·内篇问下》。

为上卿，地位在其之上。对此，廉颇好气任侠，说：“我为赵将，有攻城野战之大功，而蔺相如徒以口舌为劳，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贱人，吾羞，不忍为之下。……我见相如，必辱之。”^①后来，赵王听信了奸臣郭开的谗言，解除了廉颇的军职，派乐乘代替廉颇。廉颇因受排挤而勃然大怒，竟率军攻打乐乘，乐乘逃走。以上事例，充分表现廉颇“好气任侠”的一面。

另一方面，廉颇“忠义”当先，“负荆请罪”反映了他知过必改，识大体、顾大局，“义”字当先。廉颇坚守长平三年，有功不赏，反而无故被免，结果导致长平之战的失利，邯郸被围。燕国趁火打劫，大军伐赵。在国家危难之际，廉颇不计前嫌，挺身而出，大破燕军，救国家以危难。秦始皇二年（前245），赵孝成王卒，其子赵悼襄王继位。襄王听信谗言，解除了廉颇的军职，廉颇被迫出走魏国。廉颇出走，秦军卷土重来，赵王想再次起用廉颇，于是派遣宦官唐玖带着一副名贵的盔甲和四匹快马到大梁去慰问廉颇，看廉颇是否可用。唐玖见到廉颇后，廉颇在他面前一顿饭吃了一斗米，十斤肉，还披甲上马，表示自己还可出征，为赵国效力。这些事例都充分彰显了老将廉颇的“忠义”。

总之，至春秋战国时期，德州地域文化的兼容性已初步形成。这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历史的发展，德州地域文化兼容性的特征愈加彰显。浸润着“禹疏九河”所代表的德政懿行和开拓精神，沐浴着董仲舒“下帷读书”所留下的崇礼重教之风，德州走过了四千多年的沧桑历程。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德州人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有齐鲁风、有燕赵风”的地域文化，也形成了自己勇于任事、甘于牺牲、隐忍负重、不事张扬的文化性格。

^①《史记》卷八一《廉颇蔺相如列传》。

第二章 秦汉肇基——德水安澜与儒学再造

秦汉时期，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政权建立起来。当时，德州分别由青州平原郡（国）、济南郡、冀州清河郡、幽州渤海郡管辖。在这块古老的黄河冲积平原上，勤劳的德州人民，努力生产，建设家园，传习诗书，创新艺术，物质文明和文化生活都得到了很大的改观。德州人身上展现出文运、智慧、抗争、忠义、才学的人性光辉。而随着董仲舒对先秦儒学的再造，儒家思想不仅使齐鲁文化上升为国家意识，而且逐渐转化为中华民族的社会心理。德州沐浴着董仲舒“下帷读书”所留下的崇礼重教之风，逐步把“德”文化提升到了核心地位，成为德州文脉的渊藪。

第一节 德水安澜与建制之始

秦朝实行的郡县制，秦初分全国为 36 郡，后增至 40 余郡。山东区域当时分为齐郡、琅邪郡、东海郡、薛郡和济北郡等。德州区域大部属于济北郡。西汉置平原郡，下辖十九县，几乎囊括了整个鲁西北地区，其中平原、安德（今陵县）、鬲县（今德城区东）三角地区是德州的核心区域。

一、水德之瑞与安德县的设置

德州之名的最早起源，与“五德终始”说有关。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信奉“五德终始”说，并据此制定其基本国策。所谓“五德终始”说，又称“五德转移”说，是战国时期阴阳家代表邹衍提出的运用阴阳五行理论来阐释宇宙演变和历史兴衰的学说。“五德”指五行的属性，即土德、木德、金德、水德、火德。按阴阳家的说法，宇宙万物与五行对应，各俱其德，而天道的运行，人世的变迁，王朝的更替等，则是“五德转移”的结果。五行相胜说认为：“众胜寡”，所以水胜火；“精胜坚”，所以火胜金；“刚胜柔”，所以金胜木；“专胜散”，所以木胜土；“实胜虚”，所以土胜水。邹衍根据土、木、金、火、水五行之间的这种循环相克关系创立了五德终始说，来解释历史发展和朝代更替。五德指土、木、金、火、水五种德运，它们之间存在木克土、金克木、火克金、水克火、土克水的关系。历史发展正是按照这种顺序循环往复，每一朝代都有五德中的一种与之相配合，由此种德运决定这个朝代的命运。新的朝代将要兴起之时，上天必然会出现某种符瑞作为征兆。相传，黄帝时出现大螾大蜃，所以黄帝属“土德”，崇尚黄色；夏禹之时，草木秋冬之季仍不枯萎，所以禹属“木德”，崇尚青色；商汤之时，出现金刃生于水的现象，所以商属“金德”，崇尚白色。周文王时，出现赤鸟衔丹书集于周社的奇观，所以周属“火德”，崇尚赤色。按照五行相胜的原理，邹衍

推测代火者必为“水德”，而且会出现水气胜的征兆。水气胜，故崇尚黑色。邹衍创造“五德终始说”，其目的在于为当时的社会变革进行论证，但却陷入了历史循环论。

秦始皇对“五德终始”说深信不疑，认为秦克周而立，周为“火德”，而秦必为“水德”。围绕着“水德”，秦始皇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改正朔”、“易服色”、“更地名”等。其中，更名河水（黄河）为“德水”。《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云：“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螾见。夏得木德，青龙止于郊，草木畅茂。殷得金德，银白山溢。周得火德，有赤乌之符。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于是秦更命河曰‘德水’”。可见，秦始皇以“水德之瑞”，改黄河为“德水”，而德州之“德”字，就源于“德水”。

古黄河自德州区域串流而过，流经今平原、德城区、陵县、乐陵、庆云等地，在今德城区黄河涯镇，黄河故道残迹仍存。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也深信“五德终始”之说，认为自己应“水德之瑞”。《史记》卷二十六《历书第四》云：“汉兴，高祖曰‘北畴待我而起’，亦自以为获水德之瑞。”于是，在“德水”之阳置安德县，取“德水安澜”之意，意为德水（黄河）波澜不惊、安定祥和。这就是德州之“德”字的滥觞。“安德”反映了人们的一种企盼，因为古代黄河桀骜不驯，三年一小决，五年一大决。今平原、陵县一带是古代黄河决口最为频繁的区域之一，取名“安德”，就是寄希望于德水安定下来，使一方太平祥和，不再有洪水泛滥之灾。

二、平原郡的设置

今德州平原一带是隋唐以前德州区域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西周时期，平原为齐地，公元前11世纪，周公讨蒲姑之乱后，“以益（姜）太公封地，遂为齐西境下邑”^①。春秋战国，齐国设平原邑，始有“平原”之名。“平原”之名的由来，众说纷纭，旧志记载不一，有以“平原君”而得名、“原山”而得名、“因地处平原”而得名等三说。1985年重修《平原县志》时，对三说认真考辨、论证，认为“因地处平原”得名说最符合实际。以“地处平原”得名说，见于明万历年间御史张蕙撰《平原县志·新甃砖城记》：“地平土沃无山河之限，此邑之由名。”王国维之《水经注校·地理风俗记》云：“原，博平也，故曰平原矣。”又《尔雅》云：“广平曰原。”由此可见，平原之名的由来，是取地处平原广义说，并非以特定的人和物命名。

秦朝统一后，以平原邑为县城置平原县，先属齐郡，后属济北郡。德州区域在秦代大部分属济北郡，东南一小部分属齐郡。可见，秦代德州尚没有独立的郡级行政单位。

汉承秦制，继续推行郡县制。汉高祖刘邦在德州区域置平原郡，德州始有郡级行政机构。《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载：“平原郡，高帝置，莽曰河平，属青州。户十五万四千三百八十七，口六十六万四千五百四十三。县十九。”

平原郡所属十九县是：平原、鬲、高唐、重丘、平昌（侯国）、羽（侯国）、般、乐

^①乾隆《平原县志》卷一《疆域志》。

陵、祝阿、瑗、阿阳、濞阴、枋、富平（明帝时更名为厌次）、安德、合阳（侯国）、楼虚（侯国）、龙颡（侯国）、安（侯国）等，已超过了今天德州十一县市区所辖范围，但其所辖绝大部分在今德州区域，如平原县（今平原县一带）、鬲县（今德城区一带）、重丘（今陵县北）、平昌国（今临邑县北）、般县（今临邑县德平东）、乐陵县（今乐陵一带）、祝阿县（今齐河一带）、瑗（禹城西北）、濞阴（今临邑县西）、厌次（今陵县神头一带）、安德县（今陵县）等，均在今德州市区域。

汉初之所以把秦朝的原平原县升格为平原郡，大致有四方面的原因：其一，德州区域在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经济快速发展。因地处黄河下游冲积平原，地势平坦，土层深厚，气候温润，雨量充沛，古老的黄河、济水、濞水、鬲津河、马颊河、胡苏河、钩盘河、徒骇河等河流纵贯境内，良好的自然环境为农业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德州区域铁制农具进一步推广，牛耕普及，耕作技术有了明显的改进，成为盛产粮食的重要区域。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丝、麻纺织、制陶工艺亦有快速提高。经济地位的加强，为行政地位的提高奠定了基础。其二，随着经济的发展，德州区域人口有了大幅度的增长，汉初已达 154000 余户，664000 余口^①，已具备了设置郡级机构的人口基础。其三，德州区域是当时黄河决口最为频繁的地区之一，三年一小决，五年一大决。设置郡级行政机构，可以提高地方防洪、抗灾的能力。如一旦出现决口，郡守可迅速集一郡之人力、物力，填堵决口、疏水导洪。其四，郡治设于平原，是因此地地理位置的重要。平原地处鲁西北平原的核心地区，农业、手工业、商业发达，而且这里有当时黄河的主要渡口——平原津，秦始皇东巡、韩信伐齐等都是从平原津渡河，平原成为黄河下游之要津，地理位置相当重要。

今平原一带作为郡级行政机构所在地，前后延续了近八百年，直到隋朝废平原郡设德州，平原一直是古德州区域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三、鬲县与鬲国的设置

禹疏九河，九河之一的鬲津自今德州城东而过，孕育了德州早期文明，与德州结下了不解之缘。秦朝置鬲县，东汉封鬲国，均因鬲津而得名。

（一）秦朝置鬲县

春秋时期，齐在古鬲津畔筑城，名鬲邑，是当时齐国西北边境重镇。鬲县置于何时，历代史家均认为：鬲县始置于西汉。因为《汉书·地理志》确切记载了西汉鬲县的设置。“平原郡，高帝置。县十九：平原、鬲、高唐、重丘、平昌（侯国）、羽、般、乐陵、祝阿、瑗、阿阳、濞阴、枋、富平、安德、合阳、楼虚、龙颡、安。”^②文献中的“高帝置”，是指汉高祖刘邦所设。

鬲县的设置实际可以上溯至秦朝。秦朝时，鲁西北地区属济北郡，济北郡所属各县，文献均未明确记载。但从《史记》、《汉书》所记载的将、相事迹里，能寻出蛛丝马迹。如《史记·曹相国世家》：“韩信已破赵，（曹参）为相国，东击齐。（曹）参以右丞相属韩信，攻

^① 《汉书》卷二八《地理志》。

^② 《汉书》卷二八《地理志》。

破齐历下军，遂取临淄。还定济北郡，攻著、濞阴、平原、鬲、卢。”《汉书·曹参传》亦有几乎相同的记载。曹参随韩信攻齐，在历下（今济南），消灭齐军主力，攻克齐国都城临淄。然后，曹参回军攻克济北郡，收复著、濞阴、平原、鬲、卢等县。据此可知：“著、濞阴、平原、鬲、卢”为济北郡所属各县。此役发生在西汉正式建立之前，且济北郡为秦朝行政建制。所以鬲县应设于秦朝，隶属济北郡。

鬲县从秦汉建置到南北朝北齐省废，延续近 800 年的时间。

（二）东汉封鬲国

东汉初年，光武帝刘秀封大将朱祐为鬲侯，建立鬲侯国。朱祐，字仲先，东汉建义大将军、开国元勋——“云台二十八将”之一。建武十三年（37），因功受封为鬲侯。《后汉书·朱祐传》云：“（建武）十三年，定封鬲侯，食邑七千三百户。”李贤注云：“鬲，县名，属平原郡。”可见，公元 37 年，鬲侯国取代鬲县，正式建立。

朱祐是南阳宛城人，自幼父母双亡，投归外祖父刘氏家，与南阳汉朝皇族刘秀结为好友，出入相伴。莽新末年，随刘秀起兵反莽。克宛城、战昆阳屡立战功。莽新灭亡后，更始帝刘玄以刘秀为大司马，进讨河北。朱祐为护军，“从征河北，常力战陷阵，以为偏将军，封安阳侯”^①。朱祐对刘秀忠心耿耿，左右不离，每战必以身护刘秀，刘秀甚爱之。更始帝刘玄重用奸佞，贬逐功臣，怨声载道。朱祐力劝刘秀称帝，取而代之。刘秀称帝后，拜朱祐为建义大将军。

东汉建立之初，割据势力纷纷拥兵自立，秦丰据黎丘（今湖北襄樊市一带）称帝，延岑据汉中（今陕西汉中一带）称王。刘秀命朱祐率部攻汉中，延岑大败，投奔秦丰。朱祐率军攻秦丰，秦丰大将张成与延岑合兵，退至东阳。朱祐乘胜进兵，破关而入，临阵斩张成，连克东阳、黄郚、蔡阳三城，斩蔡阳守将张康，直逼秦丰老巢黎丘城，将黎丘团团围定。秦丰困兽犹斗，坚壁清野、深沟高垒，与汉军抗衡。刘秀亲至黎丘犒赏三军，并派御史中丞李由持玺书招降秦丰。秦丰却在城上破口大骂，刘秀大怒，命令朱祐困杀秦丰，不准其投降，以警效尤。朱祐围困黎丘长达数月，城中粮尽，秦丰率其母妻子九人肉袒乞降。朱祐不忍杀之，执送长安。接着，朱祐率部攻克阴、酈、筑阳城，江淮地区基本平定。

朱祐为人朴直，尚儒学。将兵率众，戒杀戮，多受降，以克定城邑为本，不存首级之功。又禁制士卒不得虏掠百姓，口碑甚佳，深受刘秀器重。朱祐鉴于历代功臣功高震主，身首异处的教训，功高而内敛。刘秀封朱祐为鬲侯，食邑七千三百户，朱祐自陈功薄而国大，愿受南阳五百户足矣。刘秀不许。朱祐死后，子孙世袭，朱商、朱演、朱冲先后为鬲侯，直至东汉末年。魏晋时期，复置鬲县，至北朝齐时废除。

第二节 黄河波涛与平原津史话

^①《后汉书》卷二二《朱祐传》。

黄河与历代王朝的兴衰息息相关。秦汉时期，黄河纵贯德州，滚滚东流，桀骜不驯，给德州区域造成了巨大影响。平原津是黄河下游重要渡口，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秦始皇东巡、田荣败走、韩信偷渡等无不在此渡河。围绕着黄河与平原津，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一、汉代黄河决口及其对德州的影响

古黄河纵贯州境，德州因“河”而生、因“河”而育，在历史长河中，德州与黄河休戚相关。德州之名，直接源于黄河，秦始皇改黄河为“德水”，成为德州之名的滥觞。德州古今地名如安德、广川、长河、平原津、宁津、夏津、将陵、陵州、陵县等，无不与黄河有关。

“陵”为水中高地，为避黄河水患，建州县治所于高地之上，故德州以“陵”为名的县较多。

黄河含有很高的泥沙量，是我国、也是世界河流中以善淤、善决、善徙而闻名的河流。黄河泥沙主要来自中游的黄土高原。黄土颗粒均匀，疏松易碎，极易于流失。汉代农业的发展，特别是滥垦滥伐严重地破坏了黄土高原的植被。黄土高原成为水土流失极为严重的地区。黄河流经黄土高原，含沙量聚增，浊浪滔滔。它所携带的泥沙一部分淤积在下游河道，逐渐形成“地上河”。汉代，有的河段已高出地面四五尺；其余泥沙淤积于入海口，不断造就新的陆地。黄河的淤积主要在下游，它的溢、决、徙也集中在下游，德州地处黄河下游，首当其冲。

从文献记载来看，自殷商迄秦代，黄河溢、决、徙较少。商代屡次迁都，有人认为与黄河水患有关。但这只是一种推测，并无充足的论据。西周时代无黄河溢、决、徙的记载。春秋时代有一次改道，发生在周定王五年（前622）。战国时期溢一次、决三次，但三次决口都是在战争中人为破坏造成的。谭其骧指出：“这时期河患记载之所以如此之少，一方面应该是由于上古记载缺略，一方面也是由于那时地广人稀，人民的耕地居处一般都选择高地，虽有决溢不成灾害之故。再有一方面也不容否认，那就是其时森林、草原、支津、湖泊还很多，事实上在一般情况下，也确乎不会轻易决口改道，除非是遇到特大洪水。”^①

从“禹疏九河”至周定王五年，河行禹王故道，与德州地区关系不大。周定王五年（前602），河决于宿胥口（今河南浚县淇河与卫河合流处），大河改道南移，经今河南的荥阳北、延津西、滑县东、浚县南、濮阳西南、内黄东南、清丰北、南乐西北、河北的大名东、山东的冠县西，过馆陶镇后，经临清南、高唐东南、平原南、绕平原西南，由德州市东复入河北，自河北吴桥西北流向东北，至沧州市折转向东，在骅县西南一带入海。自此，黄河跨越德州大部，决溢之患即时常袭来。

秦统一中国后，推行“实关中”、“戍边郡”政策。秦亡汉兴，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政策，大批人口被迁到关中地区和西北边郡，垦荒种田。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开垦只能是无计划的、盲目的乱垦滥垦，不可能采取什么有计划的水土保持措施，所以这一地区的大事开垦，结果必然会给下游带来无穷的祸患。历史事实证明了这一点，自西汉起黄河下游河患骤增。

^① 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学术月刊》1962年第2期。

汉文帝十二年（前 168）冬十二月，黄河在酸枣（今河南延津北）决口，这是汉朝建立之后黄河的第一次大决口。

汉武帝建元三年（前 138），黄河在濮阳决口，十六郡受灾，平原郡在其内，汉武帝“发卒十万救决河”^①。

武帝元光三年（前 132），黄河决于瓠子（今河南濮阳南），向东注入钜野泽，并灌入淮河与泗水。武帝命汲黯、郑当时负责治河，征发沿岸郡县民众勉强堵住决口，但洪水汹涌，再次冲开堤防。当时任丞相的是帝舅田蚡，他的奉邑在黄河北面的清河郡鄆县（今德州夏津一带）。黄河决而南流，而鄆县无水灾，租税收入不减。于是，他上奏武帝：“江河之决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强塞。强塞之未必应天。”^②那些“望气者”也都附和田丞相的谎言，武帝信以为真，坐视黄河为害，致使数十郡连年受灾，田赋锐减，财政困难。汉武帝不得不下决心治河。元封二年（前 109），黄河决口已达 21 年。这一年，武帝命汲仁、郭昌统领士卒数万人堵塞决口。这年冬季，武帝祭泰山，回京路上，亲临瓠子，沉白马玉璧以祭河神，命随臣自将军以下皆负薪塞河，瓠子一带的薪草告匮，武帝乃命人砍伐卫国故苑——淇园的竹子，把竹子一根根密密地插进决口处，用草填补，再填土夯实，终于堵住了决口。

汉武帝为表治河之功，在瓠子坝上，建造宫一座，名曰“宣防”，以示纪念。同时，往北引出二渠，沿大禹治水时所开九河故道，分流导洪，此二渠仍徒骇、马颊二河，均流经德州之地。

后来，黄河又在馆陶决口，河水漫至德州。汉政府组织民力，在决口处顺水势开凿了一条与黄河深宽相等的屯氏河，自馆陶向东北，流经德州（今德州城西南运河）注入渤海。此后大约 60 多年，德州区域没有遭受大的水灾。

汉元帝永光五年（前 39），黄河在清河郡灵鸣犊口（今德州夏津县）决口，德州西北部各县首当其冲，受灾严重。更严重的是泥沙堵塞了屯氏河，从此屯氏河淤塞，逐渐废弃。屯氏河堵塞后，河水失去了分流之势，只有沿原河道一路滚涌入海，水势过大，下游河堤岌岌可危。汉成帝即位后，清河都尉冯遂上书：“（清河）郡承河下流，土壤轻脆易伤，顷所以阔无大害者，以屯氏河通两川分流也。今屯氏河塞，灵鸣犊口又益不利，独一川兼受数河之任，虽高增堤防，终不能泄。如有霖雨，旬日不霁，必盈溢。九河故迹，今既灭难明，屯氏河新绝未久，其处易浚；又其口所居高，于以分杀水力，道里便宜，可复浚以助大河，泄洪水，备非常。不豫修治，北决病四、五郡，南决病十余郡，然后忧之，晚矣！”^③然而，他的建议未被采纳。

建始四年（前 29）秋大雨，黄河果然在馆陶和东郡金堤（今河南滑县东）决口。这次决口为害甚大，“泛滥兖、豫，入平原、千乘、济南，凡灌四郡三十二县，水居地十五万余顷，深者三丈，坏败官亭室庐且四万所”。德州南部各县均遭水淹。在这次大决口中，御史

① 《汉书》卷六《武帝纪》。

② 《汉书》卷二九《沟洫志》。

③ 《资治通鉴》卷三〇。

大夫尹忠玩忽职守，畏罪自杀。成帝派遣大司农紧急调运钱粮，赈济受灾郡县，征发河南以东各地船只 500 余艘，将九万七千余口灾民，运至高地，躲避水患。同时命校尉王延世为河堤使者，主持治河。王延世用 4 丈长、9 围粗的大竹篓盛满石子，用两只船载着，行至决口处抛下。这种方法十分见效，仅用 36 天便堵住了决口。成帝特下诏，对王延世治水之功嘉奖赞许：“世长于计策，功费约省，用力日寡，朕甚嘉之”，晋升其为光禄大夫，赐爵关内侯，黄金百斤。^①

汉成帝河平二年（前 27），黄河在平原决口，德州首当其冲。今平原、禹城、齐河、陵县等地受灾严重。成帝派光禄大夫王延世、将作大匠许商等率众治河，历时六个月完工。成帝鸿嘉四年（前 17），黄河下游溢，灌 31 县，毁坏房屋 4 万余所。汉成帝命河堤都尉许商与丞相史孙禁东赴灾区察看水情，共图治水大计。孙禁建议，在平原与滑州之间决开一口，将黄河水引入平原县笃马河，至海 500 余里，水道流畅，其利有二：一则可引水浇灌沿岸三郡田地，能得良田 20 余万顷；二则可“省吏卒治堤救水，岁三万人以上”。儒生李寻、解光等人善言灾异，认为河决乃上天的警示，只要顺天应民，灾害自消，所以应当顺其自然，任其自流，自然而然水流成川，归入大海，何必劳民伤才，逆天而行。汉成帝竟听取了李寻等人的建议，任其自流。德州成为当时黄河漫流之地，良田被毁，人们流离失所，“平原郡比年伤水灾，人相食”。^②

哀帝时，待诏贾让曾提出治河三策，因所费甚巨，未能实施。黄河频繁决溢成为困扰西汉政府的一个重大问题，黎民百姓受害惨重。地处黄河下游的德州受害尤烈。

王莽篡汉后，河防状况并未改观。始建国三年（11），黄河在魏郡决口，河道南移，自濮阳向东北流，在千乘郡（今滨州一带）入海，淹没清河、平原等数郡，德州又遭洪灾。王莽家族自曾祖王贺起徙居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东），王莽父、祖的坟墓都在元城。元城毗邻黄河，王莽担心黄河决口危及元城，淹没他先祖的坟墓，一时很是恐慌。及至听说这次决口使黄河河道南徙，元城无水患，“故遂不堤塞”^③。王莽的统治到地皇四年（23）结束，接着，大小军阀为争夺天下的统抬权而混战厮杀，无人顾及黄河水患。

东汉初年，经济残破，国库匮乏，无力整修黄河。光武帝建武十年（34），阳武（今河南原阳东南）县令张汜上书光武帝刘秀，建议堤塞决口，以安百姓，而浚仪（今河南开封）县令乐俊上书说：“新被兵革，方兴役力，劳怨既多，民不堪命，宜须平静，更议其事。”^④光武帝认同了乐俊的意见，继续任由黄河漫流。

到汉明帝即位时，黄河溃决已经四、五十年，连年大雨，汴水东侵，河水、汴水壅积一片，浩瀚无垠，一片汪洋，民不聊生，怨声载道。永平十二年（69），汉明帝诏令整治黄河，命水利专家王景主持治水。王景东行观察水势，制定出严密周详的治河方略，得到汉明

① 《汉书》卷二九《沟洫志》。
② 《汉书》卷二九《沟洫志》。
③ 《汉书》卷九九《王莽传》。
④ 《汉书》卷六六《王景传》。

帝的支持。王景率几十万民众，历时一年，疏水导流、筑堤固坝，修筑了千余里的黄河大堤。黄河下游两岸几十个县被淹的土地又变成了良田。此后八百多年里，黄河没有改道，一方面归功于王景治河，另一方面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黄河中游地区和河套地区的变农为牧。自王莽新朝以后，大漠游牧民族以各种方式进入西北边郡，那里的农耕地的大部分被变为牧场。这一变化给黄河以巨大影响。谭其骧指出：“黄河中游土地利用情况的这一改变，结果就使下游的洪水量和泥沙量也相应地大为减少，我认为这就是东汉一代黄河之所以能够安流无事的真正原因所在。”^①

汉代黄河的决口，对德州自然生态、社会经济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根据《史记》、《汉书》的记载统计，西汉时期殃及德州的黄河大决口有：文帝十二年（前168）的酸枣（今河南延津县北）决口、武帝建元三年（前138）的濮阳决口、元光三年（前132）的瓠子（今河南濮阳南）决口及馆陶决口、元帝永光五年（前39）的灵鸣犊口（今德州夏津县）决口、成帝建始四年（前29）的馆陶和东郡金堤（今河南滑县东）大决口、河平二年（前27）的平原决口等。这些大决口，大大改变了德州原地势、地貌和自然生态，给德州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其一，由于黄河北泛多次经过德州区域，流向东北入海，整个地势由西南向东北缓缓倾斜，“海拔高度从32.6米至5.3米，地面坡降1/8000左右”^②。其二，地形高、坡、洼相间，微地貌差别较大。高地主要是由黄河决口泥沙淤积形成的，其表现形式不一，可划分为：河漫滩高地（堤防约束下泥沙沉积而成），决淤高地（黄河决口泥沙淤积而成），泛道微高地（黄河泛流泥沙淤积而成）等。这些高地呈带状广泛分布于今夏津、武城、平原、陵县、宁津、乐陵、禹城、临邑等地。坡地是黄河泛滥漫流沉积而成，也是高地向洼地的单斜面，是区域内分布最广的地表形态。洼地主要由黄河决口漫流分割而成，一般由高地包围，呈封闭或半封闭状态。如陵县的金家洼、叶家洼，乐陵的蛤蜊洼、马颊洼、铁营洼，临邑的祥洼、石家洼，夏津的白马湖、莲花池、祝官屯洼，武城的四女寺大洼、刘辛洼、胡里长屯洼，陵县的南下洼、东下洼等。其三，因洪水的冲刷，地表沟壑纵横、川濠交错，其间淀、塘、淖及水洼地星罗棋布。德州有水的大塘俗称“海子”，过去德州的“海子”特多，今市中心的明月湖就是由“老海子”改造而成的。其四，黄河屡决，淹没、淤塞了原有河流，使这些古河逐渐断流、干涸乃至绝迹。德州有“九河”之誉，就因为禹疏九河，流经德州，自北而南依次是：徒骇、太史、马颊、覆釜、胡苏、简、絜、钩盘、鬲津等九河。除九河外，还有笃马河、漯水等古河。两汉以后，这些古河都逐渐湮没。现在的徒骇河、马颊河、胡苏河、钩盘河等都是后来历代黄河决口所形成，附会古河之名而已。

黄河决口对德州社会经济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一，洪水直接造成良田被淹、庄稼被毁、房屋倒塌、百姓流离失所。每次决口，都伴随着大饥荒的漫延。如《汉书》卷六载：“（建元）三年春，河水溢于平原，大饥，人相食。”^③《汉书》卷二十四亦载：“永始二年，梁国、

① 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学术月刊》1962年第2期。

② 冯海昌等《德州地区水利志》，河海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1页。

③ 《汉书》卷六《武帝纪》。

平原郡比年伤水灾，人相食。”^①两则史料均提到了水灾之时“人相食”的惨状。其二，人口锐减。大灾过后的饥荒造成大量人口的死亡，幸存者则背井离乡，外出逃荒，成为流民，造成百里无人烟的状况。明代以前，德州属华北人口较少的地区，明代大量移民的涌入才彻底改变了这一现状。其三，经济发展迟滞。黄河决口除直接造成财产损失外，由于生态的恶化，土地的盐碱，人口的减少等因素，导致了经济的长期迟滞。如土地盐碱薄瘠，粮食产量下降，人们只能外出谋生。明代以前，德州经济长期处于落后状态。

二、秦始皇东巡与暴病平原津

《史记》记载，秦始皇第五次东巡行至平原津突发急症，死于沙丘。平原津在何处？张守节云：“今德州平原县南六十里有张公故城，城东有水津焉，后名张公渡，恐此平原郡古津也。”^②秦时黄河流经今德州区域，平原津是当时平原境内（今平原县南）黄河上的一渡口，后改名为张公渡。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炫耀功德，镇抚四方，在短短十年的时间，五次东巡。除了政治上的目的外，访求神仙、寻找不死之药也是一个重要内容。当时传说在渤海中有三神山，叫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中有仙人、不死之药及金银造就的宫阙。这些传说，通过方士们之口传到秦始皇的耳中。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东巡至琅邪（今山东诸城）时，就有齐地的方士徐福等人上书，要求出海寻找三神山。于是始皇派徐福斋戒如仪，泛海求神仙。徐福出海后，经过一段时间返回，谎报说见到了神仙。但神仙嫌“秦王之礼薄，得观而不得取”^③，要送上童男童女及百工等礼物，方可给不死之药。始皇听后非常高兴，遂派遣童男童女3000人，并配备以五谷种子、各种工匠器具随徐福出海。可见秦始皇求长生之心切。

秦始皇三十六年（前211），忽有一块大陨石坠落在东郡（在今河南濮阳县西南）。有人因痛恨秦始皇焚书坑儒、严刑酷法、穷奢极欲，给天下百姓带来无尽苦难，就借此机会偷偷在这块大陨石上刻了七个大字：“始皇帝死而地分。”^④这件事一出，一传十，十传百，越传越广，越传越神。

东郡郡守得知此事，上奏朝廷。秦始皇闻奏大怒，当下便派出御史前往东郡严行查究。御史到达东郡，传问陨石坠落处周围的百姓，都说陨石从天而降，并没人敢在上面刻字。御史回奏秦始皇。秦始皇听了更加生气，索性发出一道命令：“尽取石旁居人诛之，因燔销其石。”近百姓惨遭屠戮，秦始皇之暴虐，可见一斑。

东郡出现怪石的同一年，一位使臣从睢关经过华阴，出平舒道（今陕西省华阴县附近），忽有一人上前说道：“今年祖龙死。”使臣感到莫名其妙，再想细问，那人却很快地离去了。使臣只好入都报闻。秦始皇听了，更加狐疑。这“祖龙”寓何意义？“祖”字应该作始字解，“龙”为君象，莫非应在皇帝身上？本来，秦始皇是最怕死的，为了长生不老，他耗资无计，

①《汉书》卷二四《食货志》。

②《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③《史记》卷一一八《淮南衡山列传》。

④《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下同。

令人入海求仙。如今，这一咒语，使他惊惧不安。最后，令太史占卜凶吉。太史不敢说出百姓恨始皇，骂他该死，只是巧言相欺说：“游徙吉。”也就是说搬家或到外地巡游，才可避难。于是秦始皇颁下一道诏令，将内地百姓三万家，强行迁往北方边郡。同时准备第五次东巡，以消灾避难。

秦始皇三十七年（前 210），秦始皇从咸阳出发，开始了最后一次出巡。百官从行，只留右丞相冯去疾守京。原本打算让皇子胡亥与右丞相一同留守咸阳，偏胡亥年已弱冠，也想随驾出游开开眼界。秦始皇一向喜欢少子胡亥，欣然应允。随驾的要员还有左丞相李斯及中车府令赵高。赵高本是一个宦官，曾任胡亥的老师。他生性刁滑，善于逢迎，又能熟记秦朝律令，深得始皇宠信。

秦始皇一行经过武关（今陕西丹凤东南），向东南进发，首先到达长江边上的南郡。然后改乘大船，沿江东下，到今浙江一带。渡过钱塘江，至会稽山，过吴（今江苏苏州）北上至琅邪，打算再一次寻找长生不老的仙药。这时正好方士徐福从海上归来，传问徐福，是否求得仙药。徐福因为入海已经数年，求药不得，耗资甚巨，害怕受到惩罚，又谎言：“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蛟鱼所苦，故不得至。愿请善射与俱，见则以连弩射之。”徐福谎称海上有大蛟鱼作怪来蒙骗秦始皇，秦始皇听了，不但不责徐福欺诳，反而信以为真。立即选了数百名弓箭手，令徐福带领，到大海里寻找蛟鱼。徐福得到武装后就出海而去，史载“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据说到达了今天的日本。

秦始皇一行也从琅邪入海，至荣成山，并不见什么蛟鱼，再前行至芝罘，总算碰上了一条大鱼，若沉若浮，巨鳞可辨。各弓箭手齐立船头，猛射出一阵箭雨，霎时间血水漂流，那大鱼受伤而死。秦始皇指大鱼为恶神，现已将它射杀，但徐福却没了踪影，求药不得，只得登陆西还。六月间，行至平原津，秦始皇突然身体不适，寒热交作，不思茶饭，心神恍惚。随驾医官切脉进药，全不见效。秦始皇渐渐昏迷了，不省人事。

秦始皇得病的原因主要有三：其一，精神过度紧张，惊恐烦躁。秦始皇很迷信，最怕死。“始皇帝死而地分”的陨石和“今年祖龙死”咒语，使他感到恐惧不安。这屡屡出现的“死兆”，使其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为了消灾避难，寻找长生不老药，秦始皇听从了相卜者的建议，进行第五次巡游。最后也没有得到仙药，只得郁郁而归。一路疑神疑鬼，至平原津而病发。其二，劳累至病。劳累一方面是由于超负荷的工作量。秦始皇非常勤政，每天批阅的公文简牍达一百二十斤，看不完不休息，可谓事无巨细，事必躬亲。长期超负荷的工作量使其积劳成疾。另一方面是由于长途跋涉之苦。秦始皇东巡，路途万里之遥，在当时路况、车况的条件下，颠簸之苦可想而知。长期的劳累和沿途的颠簸，加之平原津风高浪急，终于引发了疾病。其三，高温致病。秦始皇这次出巡，行至平原津正值六七月份，是北方高温酷暑时期，天气炎热，加上长途奔波的辛苦，增加了发病的机率。平原津作为黄河渡口，风大浪急。一热一风，极易发病，一旦发病又极易使病情恶化。

郭沫若先生认为秦始皇得的是癫痫。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秦王为人蜂准，长目，

鸷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郭沫若推测，秦始皇幼时患有软骨症及气管炎，所以他长大后胸部和鸷鸟一样，声音似豺狼，后来由于政务繁重，引发脑膜炎和癫痫等病症。本次出巡，秦始皇在平原津渡黄河，癫痫病发作，后脑壳撞在青铜冰鉴上，加重了脑膜炎的病情，人处于昏迷状态。

在平原津，秦始皇虽已染病，但没有停止行程。过黄河后，车队继续西行，至沙丘（今河北广宗城北），秦始皇病情恶化而亡。

三、群雄逐鹿与田荣败走平原

秦朝灭亡后，群雄逐鹿，齐王田荣被项羽击败，逃往平原，平原人因田荣背信弃义，招致兵祸，愤而杀之。事件的前因后果如下：

当秦末农民起义的风暴席卷中国大地时，原六国旧贵族也死灰复燃。在山东地区，故田齐的后裔也乘机而起。当陈胜建立张楚政权后，派大将周市略定魏地。周市率军抵达狄（今山东高青东南），狄县的县令据城拼死抵抗。这时，故齐王田氏的族人田儋，求见狄令，乘机杀死了狄令。然后，田儋召集豪吏子弟说：“诸侯皆反秦自立，齐，古之建国，儋，田氏，当王。”^①于是自立为齐王。率军攻击周市率领的农民军，周市被迫撤退。田儋乘胜率军东进，占领了原齐国地区。

秦二世三年（前 208），陈胜兵败被叛徒杀害。秦朝的军队疯狂地向各路农民军和旧贵族集团反扑过来。秦将章邯率军将魏王咎包围在临济，魏王咎向齐田儋求救。田儋率军救临济。结果章邯击败田儋，攻克临济。田儋被秦军杀死，齐国军队在田儋的弟弟田荣率领下，败走东阿。齐人听说田儋战死，乃立故齐王建之弟田假为齐王，田角为相，田间为将。

田荣败走东阿，章邯率秦军紧追不舍。又将田荣包围在东阿。这时，各路反秦武装已形成了新的领导核心。项梁、项羽叔侄领导的江东义军成为当时反秦义军中最强大的一支。项梁得知陈胜遇害后，召集各路义军到薛（今山东滕县东南）计议。项梁、项羽等采纳了谋士范增的建议，在民间找到为人牧羊的前楚怀王之孙，拥立为王，仍号楚怀王，都于盱眙（今江苏盱眙）。同时，决定各路义军互相配合，协同作战，共同对敌。

项梁率军北上驰援田荣。在东阿城下，齐、楚军内外夹击，大败章邯秦军。章邯逃窜，项梁率军继续追击章邯。然而田荣却热衷于争夺齐王名号，引兵东向，挑起内讧。田荣攻击齐王田假。田假抵挡不住田荣的攻势，逃亡到楚地，田角、田间逃亡到赵地。田荣于是立田儋的儿子田市为齐王，田荣自任国相，田横为将，重新统治了齐国。

秦二世三年（前 208）八月，项梁乘胜追击秦章邯军至定陶。由于有了新的兵源和装备的补充，章邯军势重新强大起来。于是项梁派使节至齐、赵，要求发兵共同夹击章邯。然而，田荣这时不以反秦大业为重，反而要挟说，如果楚杀田假，赵杀田角、田间，我才出兵。楚怀王却说，田假曾为一国之王，没有办法才投奔我，杀之不义。赵国也不愿杀田角、田间以取悦于田荣。田荣见要挟不成，竟然拒绝出兵。势单力孤的楚军在定陶遭到章邯的偷袭，项

^① 《史记》卷九四《田儋列传》。下同。

梁被杀，楚军败走。章邯又引兵北上，围赵军于巨鹿（今河北平乡）。对田荣背信弃义的行为，项羽十分愤怒，田齐集团内部对田荣也十分不满。九月，项羽率楚军北上解巨鹿之围。齐将田都摆脱了田荣的控制，也率军北上辅助项羽救赵。十一月，项羽军破釜沉舟，强渡漳水。十二月，项羽军大破秦军于巨鹿城下，击溃了秦朝的主力部队。不久，秦王朝就在起义军的猛烈攻击下灭亡了。

秦亡后，项羽依仗强大的军事力量，先声夺人，自封为西楚霸王，并割地分封，共立十八王。在山东地区，“徙齐王田市更王胶东，治即墨。齐将田都从共救赵，因入关，故立都为齐王，治临淄。故齐王建孙田安，项羽方渡河救赵，田安下济北数城，引兵降项羽，项羽立田安为济北王，治博阳。”这就是所谓三齐王。至于田荣，项羽因为他“负项梁不肯出兵助楚、赵攻秦，故不得王”。田荣对此当然极为不满，就在项羽分封后不久，便自齐地起兵，赶走田都，攻杀田市、田安，“自立为齐王，尽并三齐之地。”^①

项羽听说田荣反叛，立即挥师北上攻齐，项羽势如破竹，田荣不能抵挡，弃临淄西逃，“走平原，平原人杀荣”。平原义众为什么杀死田荣，原因有三：其一，秦末农民战争期间，项梁号召各路义军团结合作，共抗暴秦。而田荣为争齐王王位，置反秦大业于不顾，引兵东向，攻击齐王田假，挑起内讧，齐地战乱再起，百姓流离失所。其不义一也。其二，当田荣被秦将章邯围困在阿城之时，项梁率军北上驰援，解田荣之围。而项梁在定陶与秦军决战，要求田荣出兵，共击秦军。田荣坐视不救，项梁兵败被杀，反秦大业遭受严重挫折。其不义二也。其三，秦灭亡以后，战事刚息，齐地交战数年，百姓思安。而田荣以未得王位为由，起兵反叛。进攻田都，攻杀田市、田安，齐地战乱再起，百姓饱受战乱之苦。其不义三也。齐地百姓皆恨田荣，人人可得而诛之。当田荣穷途末路败走平原时，平原百姓群起而攻之，杀死田荣，为齐地除一大害。

项羽入齐后，并未安抚百姓，而是实行烧杀政策，“烧夷齐城郭室屋，皆阬田荣降卒，系虏其老弱妇女，徇齐至北海，多所残灭”^②，激起山东人民的强烈不满。田荣的弟弟田横，收集逃散的齐兵，拥众数万人，在城阳（今山东莒县）起兵反击项羽。这时，刘邦乘项羽率军北上攻齐的机会，率军东下，直抵项羽的根据地彭城。项羽闻讯，释齐而归。于是田横收复了齐国的地盘，立田荣的儿子田广为齐王。田横自立为相，实际掌握了齐国的政权。自汉元年（前206）至汉四年（前203），田齐政权在楚汉相争的夹缝中维持了三年之久，后被韩信所灭。

四、楚汉交兵与韩信偷渡平原津

汉元年（前206），刘邦拜韩信为将，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袭取关中，拉开了楚汉战争的序幕。刘邦东出武关，从正面与项羽作战。而韩信则采用远距离大迂回的战术，从侧翼千里奔袭赵、燕、齐，迂回包抄项羽。汉三年（前204），韩信、张耳在井陘口（今河北井陘）大破赵军，占领了赵地。韩信占领赵地后，就形成了楚汉战争中的又一重要战场，有力

^①《汉书》卷三三《魏豹田儋韩王信传》。

^②《史记》卷七《项羽本纪》。

地支援了刘邦在荥阳、成皋一线与项羽的对峙。韩信占领赵地后，乘势东进，进攻齐地。汉军首先占领东武城及平原西部一带^①，扼守要地，为大规模攻齐做好了准备。

当时山东地区对楚汉两方来讲都是势在必争，谁占有了山东谁就得到了战略后方。所以刘邦对齐王采取了军事与外交手段并用、双管齐下的方针。他一方面命韩信率军攻齐，另一方面又派酈食其为使节到齐国游说。酈食其见到齐王田广后，说：“大王知道天下将归谁所有吗？”齐王回答说：“寡人不知。先生认为天下将归属谁呢？”酈食其说：“归汉！”齐王说：“先生这样讲有什么理由？”酈食其说：“当年，汉王与项王联合反秦，立下誓约：先攻入咸阳者为秦地之王。而项王背约，把汉王封于汉中。背信弃义，这是项王不义之一也。楚怀王是天下共主，尊为义帝，而项王为夺其位，下令暗杀了义帝。大逆不道，这是项王不义之二也。项王残暴，烧秦宫、坑降卒，屠城掠民，百姓怨恨。残忍暴虐，这是项王不义之三也。项王有大功而不赏，有大才而不用，攻城略地而不封，非项氏而不能用。妒贤嫉能，这是项王不义之四也。有此四大不义，天下必然弃之。而汉王乃仁义之君，入关后，与民约法三章，百姓信之依之。此大仁大义也。义帝遭弑，汉王为义帝发丧，兴义师为义帝报仇，天下归之若市。此亦大仁大义也。汉王有功必赏，有罪则伐，天下诸侯纷纷背楚归汉，此乃众望所归，天之助也。若齐归汉，则社稷可保，首鼠两端必有大祸。”酈食其此番说辞，使齐王田广心悦诚服，举七十余城降汉。

这时，韩信已率军在平原黄河西岸枕戈待发，听说酈食其已说服齐国，本想罢兵，谋士蒯通对韩信说：“将军自拜将一来，攻无不取，战无不胜，攻城略地，一年下来，也不过攻取五十余城。而酈食其一介儒生，仅凭三寸之舌，就下齐七十余城。将军连年征战，出生入死，反不如一竖儒之功！”韩信在蒯通的煽动下，遂起忌妒之心，命令军队全力攻齐。汉军乘着夜色，在平原津偷渡黄河，迅速南下，直取齐国都城临淄。

本来，齐国听说韩信军南下，已派遣华无伤、田解二将军率重兵驻守在历下（今山东济南西），准备抵抗韩信的进攻。齐王听信酈食其的游说，准备归汉后，即命令部队解除了戒备，日夜纵酒欢会，准备迎接汉军。因此韩信得以乘其不备，长驱直入，袭破齐之历下军，并攻占临淄。田广、田横认为上了酈食其的当，一怒之下烹杀酈食其。

临淄失陷后，田广逃往高密，向楚求救。项羽派龙且带领 20 万大军救齐。龙且率军抵达齐境，与田广会合。这时，有人劝龙且说：“汉兵远斗穷战，其锋不可当。齐、楚自居其地战，兵易败散，不如深壁，令齐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闻其王在，楚来救，必反汉。汉兵二千里客居，齐城皆反之，其势无所得食，可无战而降也。”^②可是龙且贪功心切，以为韩信易取，于是与韩信在潍水两岸摆开阵式。韩信乘黑夜命令士兵准备一万多个盛满沙子的口袋，将潍水的上游堵住，然后引军渡河击龙且。行至河的中流，龙且出击，韩信假装败退。龙且大喜：“我就知道韩信是个胆小鬼！”然后率领全军渡河。韩信立即命令上游决开堤坝，河水汹涌而下，直逼龙且军。龙且军刚渡了一半，韩信命令士卒全部出击，大败龙且军，击

① 今平原县腰站镇东韩营、西韩营两个村，因西汉大将韩信在此屯兵而名村。

② 《史记》卷九二《淮阴侯列传》。

杀龙且。幸免水淹的楚军四处奔逃，齐王田广也随之逃遁。韩信乘胜追击，追至城阳（今山东莒县），俘获田广，汉军尽占齐地。

五、王莽乱政与迟昭平起义

在西汉末年农民起义的洪流中，驰骋疆场、威震华北的巾帼英雄、平原女子迟昭平，在漫长的历史长卷中，熠熠闪光，展示着一代女性的尊严与骄傲。

西汉末年，危机四伏，公元9年，外戚王莽乘机夺取了汉室帝位，改国号“新”，建立了莽新政权，统治危机进一步加深。莽新政权建立后，为了解决前一历史阶段积累的社会矛盾，颁发诏令，进行改制。始建国元年（9），王莽根据《周礼》记载的井田制度，实行“王田”、“私属”制。王莽规定：更名天下田为“王田”，私人不得买卖；男丁八口以下之家占田超过一井（900亩）者，分余田与宗族邻里乡党；原无田者，按制度受田，即一夫一妇受田百亩；奴婢称为“私属”，不得买卖。除了这些以外，王莽还陆续地颁布了五均、赊贷、六筦及改革币制的法令。王莽确实看到了当时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但是，这些改制措施特别是王田、私属制，触犯了贵族官僚地主和强宗豪右的利益，遭到他们的激烈反对。而王莽则屈服于压力，朝令夕改。因此不仅未能解决社会问题，反而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动荡。

至于普通劳动人民，改制带给他们的更是巨大的灾难。王田、私属的规定由于地主豪富的抵制，仅为一纸空文。而违背经济规律的币制改革，则使许多人倾家荡产。王莽屡屡改革币制，用大钱换小钱，废除错刀及五铢钱，发行“宝货”、“货布”、“货泉”等等，使社会经济更混乱，“每一易钱，民用破业”，“富者不得自保，贫者无以自存”，“农商失业，食货俱废”，加之吏治腐败，贪官污吏借机鱼肉人民。王莽任用富商大贾如洛阳薛子仲、张长叔，临淄姓伟等执掌五均六筦的大权。姓伟家财有5000万，薛子仲和张长叔也都是家资千万的富商。他们“乘传求利，交错天下。因与郡县勾结，多张空簿，府藏不实，百姓愈病”^①。由于改制造成的社会混乱与吏治腐败，给百姓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使阶级矛盾更加尖锐。

王莽改制的同时，从狂妄的大汉族主义出发，还无端对匈奴等周边少数民族挑起战争，连年的战争使百姓负担更加沉重。为了供应对匈奴战争的军需，王莽“募发天下囚徒丁男甲卒转委输兵器，自负涉江淮而至北边，使者驰传督趣，海内扰矣”^②。战争干扰了正常的生产活动，使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

王莽时期，频繁发生的水、旱、蝗等自然灾害，使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始建国三年（11），“濒河郡蝗生，河决魏郡，泛清河以东数郡”天凤六年（19），“关东饥旱数年”^③。地皇二年（21），“关东大饥，蝗”。人民已无力抵御自然灾害的侵袭，“北边及青、徐地人相食”^④。处于饥寒交迫中的人民，父子流亡、夫妇离散、田畴荒芜、疾疫并起。社会混乱，经济凋敝，人民流离失所。王莽末年，农民起义的风暴不可避免地席卷而至。山东地区，则成为农民起

① 《汉书》卷二四《食货志》。

② 《汉书》卷二四《食货志》。

③ 《汉书》卷九九《王莽传》。

④ 《汉书》卷二四《食货志》。

义军的发源地。

天凤元年（14），琅邪郡海曲县（今山东日照）妇女吕母起义，自称将军，率义军攻破海曲，杀县宰。吕母起义揭开了王莽末年山东农民大起义的序幕。

地皇二年（公元21年）平原县女子迟昭平聚众数千人在河阻中（现平原城西南）举行起义。《汉书·王莽传》载：“平原女子迟昭平能说博经以八投^①，亦聚数千人在河阻中。”迟昭平率众抗官税、荡府衙、杀豪绅、掠贵族、扶危济弱，分粮与贫苦百姓，一时声威大震，成为众豪杰中一位杰出的农民起义女领袖。

与此同时，富平（今阳信）人徐异卿，也率万余人起义。由于斗争形势的发展，于地皇三年（22）夏，迟昭平部与徐异卿部汇合，战斗在平原、富平、乐陵、无棣、盐山等地，队伍很快发展到10万之众。这支农民起义军，攻县郡，杀贪官污吏，抢府衙官库，砸地方牢狱，拯求身陷囹圄的无辜百姓，给王莽统治集团以沉重打击；同时，他们也袭击地方豪强的营堡、乡聚（乡镇民团），打击那些贵族、王孙、公侯，没收他们剥削的粮食和财物，分散给贫苦百姓，深受广大贫民的拥护。起义军的风暴，动摇了王莽统治集团的政治基础。在各地农民起义军的打击下，王莽的统治于地皇四年（23）彻底崩溃了。

六、祝阿之战与汉室中兴

祝阿，古县名，汉高祖刘邦设置，管辖范围大至在今齐河县南部一带。祝阿古城在今晏城东南8公里的祝阿镇。祝阿因东汉初年发生了一次决定性战役而闻名史册，祝阿之战对中兴汉室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王莽政权被推翻后，各路反莽势力纷纷拥兵自立，割据一方，军阀混战开始。其中，汉皇族刘秀势力最大，先后打败了铜马、尤来、赤眉等义军，“跨州据土，带甲百万”^②。公元25年，刘秀称帝，定都洛阳，建立东汉王朝。为“中兴汉室”，刘秀开始了统一全国的战争。

东汉初年，山东地区处于张步、刘永、董宪等封建割据势力的控制之下。张步是琅邪人，新莽末年，乘乱聚众起兵，自称五威将军，占领琅邪郡。东汉初年，利用刘秀西征，无暇东顾之际，张步乘机扩张势力，在剧县（今山东寿光南）举行了大阅兵，任命其弟张弘为卫将军，张蓝为玄武大将军，张寿为高密太守，然后分兵略地，占领了泰山、东莱、城阳、胶东、北海、济南、齐郡、平原等地，“专集齐地、据郡十二”^③，占领了山东腹地，成为东部最强大的割据势力之一。

刘秀完成了西征后，于建武二年（26）东征齐地，采取了远交近攻、先弱后强、各个击破的战术，先稳住张步，集中力量攻灭割据鲁西南的刘永，接着打败占据鲁东南一带的董宪，最后矛头对准了实力最强的张步。

东汉建武五年（29），刘秀决定攻打张步，彻底解决山东问题。张步刚强悍勇，且有智

^①《汉书·王莽传》，服虔注曰：“博弈经，以八箭投之。”

^②《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

^③《后汉书》卷十二《张步传》。

谋，拥兵数十万，占据齐地多年，根基深厚。要想打败张步，非良将不能担此重任。刘秀权衡再三，任用建威大将军耿弇为主帅，率军东征。耿弇为东汉开国名将，勇猛善战，用兵重谋，指挥果断，战功卓著，曾先后攻灭河北王郎、河南延岑、涿郡张丰等割据军阀，深得刘秀器重，受封建威大将军。耿弇受命后，迅速率兵东下。他采取当年韩信伐齐路线，计划破历下、克济南，然后直捣张步的老巢——临淄。

张步闻知耿弇率军来袭，仓惶调兵遣将，封其步将费邑为济南王，率军阻击汉军。费邑分兵把守，三路大军呈环形守势：主力守济南门户——祝阿，一路守钟城（今济南西），一部屯历下。耿弇则集中优势兵力，率先攻打祝阿。汉军渡过济水，直逼祝阿，迅速围城。耿弇率军攻城，张步军顽强抵抗。祝阿城虽小，但城坚壕深。张步军困兽犹斗，坚壁清野、深沟高垒，与汉军抗衡。耿弇令军四面攻城，而守军居高临下，用弓箭、滚木、砲石打退汉军的一次次进攻。战争异常惨烈，双方伤亡很大。自早上一直打到中午，祝阿城仍固若金汤，这大大出乎耿弇的意料。为减少伤亡，耿弇改变战术，决定采取欲擒故纵之计。耿弇命部将刘歆攻西门、陈俊攻南门，自率主力攻北门，故意三围缺一，网开一面。张步军从东门突出，奔向钟城。耿弇乘机追击，张步军大败溃逃。祝阿失守，济南门户洞开。耿弇乘势进军，钟城守军闻知祝阿已溃，大为恐惧，弃城而逃。费邑自将精兵三万余人来救，耿弇闻之大喜，设计围歼费邑。耿弇首先占领有利地形，设下埋伏，以逸待劳。费邑军到，汉军突然出击，费邑惊慌失措，仓促应战。耿弇擒贼擒王，直逼费邑，临阵斩费邑于马下。费邑已亡，叛军群龙无首，纷纷投降，耿弇全歼费邑军，大获全胜。于是，“（耿）弇复收其积聚，纵兵击诸未下者，平四十余营，遂定济南”^①。

耿弇大胜，捷报传至洛阳，刘秀亲自东下劳军，大会诸将，当众盛赞耿弇之功，亲执耿弇手臂说：“昔韩信破历下以开基，今将军攻祝阿以发迹，此皆齐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韩信袭击已降，将军独拔勍敌，其功乃难于信也。”可见，祝阿之战是东汉平定山东的关键战役，对中兴汉室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第三节 儒学再造与两汉德州文化的勃发

两汉时期，德州硕儒文宗辈出，英烈忠义之士涌现，展现出文运、智慧、抗争、忠义、才学的人性光辉。儒家文化从它的发源地曲阜传到德州，董仲舒把它与其他中华文化相融合，将它从一种伦理学说改造成涵纳宇宙自然与社会的“德”文化思想体系，把“德”文化提升到了中华文化核心的地位。而一代“智圣”东方朔相貌英俊，性格诙谐，言词敏捷，滑稽多智，既为汉武帝的强国大业上策建言，又留下了《答客难》、《非有先生论》等优秀辞赋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闪耀着灼灼的光辉。

一、群儒之首董仲舒

^①《后汉书》卷十九《耿弇传》。

董仲舒（前 179—前 104），西汉信都国广川县（今河北景县）人，西汉儒学大师、哲学家、思想家。《史记·儒林列传》记载：“董仲舒，广川人也。”《汉书·董仲舒传》亦有同样的记载。两史都提到了“广川”，今德州西部一带就属汉代的信都国广川县。

西汉建立后，实行郡国并行制，继承秦朝郡县制的同时，又大封汉室宗亲，建立了众多的刘姓王国。今德州市西面之河北枣强、景县一带，西汉为信都国^①广川县，即《史记》、《汉书》中的“广川”，董仲舒的出生地。当时没有运河相隔，今德城区西部一带，属“信都国广川县地”^②。由于地缘关系，董仲舒才与德州结下了不解之缘。董子的足迹深深地印在德州，曾在德州下帷讲习《公羊春秋》，为体悟公羊学之精髓，“三年不窥园”，使公羊学大宏于世。其治学精神，被德州学子一代代传承。为纪念董仲舒，后人任在其驻足处，筑董子读书台，成为董仲舒驻足德州的历史见证。

《春秋》本是孔子依据鲁史修撰的一部政治史。据说孔子晚年见道之不行，于是以著作史书褒贬历史的方法来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伦理观念。为了避免政治迫害，孔子在属辞比事上常常使用隐晦的语言，其微言大义，只口授给弟子，并不笔之于书。孔子死后，弟子各以所闻，辗转传授，于是逐渐形成不同的《春秋》师说。汉代流行有五家：即公羊春秋、谷梁春秋、左氏春秋、邹氏春秋、夹氏春秋等。其中邹氏无师传，夹氏未有书，左氏藏于秘府，只有公羊、谷梁二传，文美义富，最先流行开来，而公羊传只所以大宏于世，是与董仲舒的贡献分不开的。

董仲舒一生经历了文景之治、汉武盛世，这是西汉王朝的极盛时期，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国力空前强盛，人民安居乐业。在思想文化方面，汉初社会也是宽舒自如的。孝惠帝除“挟书之律”，置写书之官；武帝时又广开献书之路。很多因秦始皇焚书坑儒而秘藏起来的儒家典籍，纷纷再现于世间；很多退避于草野的儒学之士，也渐渐走出了山林。民安于太平，士乐于学业，于是讲学通经之士，再聚徒众，复兴儒业。董仲舒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走上仕学之路的。汉景帝时，董仲舒因精通《春秋》而被任为博士，正式走上了仕途。

博士之职，始设于战国，秦继之。始皇有博士七十人，“掌通古今”^③，学识渊博。但博士们学业各有专精；儒墨名法，甚至方技术士，都滥竽其间。秦始皇焚书坑儒，儒学博士逃难隐居，秦廷的博士成了清一色的神仙方术之士和阿谀奉承之徒。汉兴，儒生纷纷归汉，汉亦设博士之官，以安抚之。汉高祖曾起用儒生叔孙通制定朝仪，大加赞赏，由于当时干戈未解，未暇大兴儒教。孝惠高后之时，“公卿皆武力功臣”，不容书生分羹。文景之时，广延名士硕儒为博士，如《诗》有博士辕固生、韩婴，《书》有博士张生、欧阳，《春秋》则有胡毋生、董仲舒。《孟子》、《尔雅》、《孝经》

①高后六年（前 182），吕后封赵王张耳之孙（刘邦长女鲁元公主之子）张侈为信都侯，将信都郡改为信都国，后被取消。景帝二年（前 155），皇八子刘彭祖封于信都，改信都为广川国。宣帝时又恢复信都国原名。

②[清]田雯《长河志籍考》卷一《图说》。

③《汉书》卷一九《百官公卿表》。

亦有博士。但“文帝好刑名”，“景帝不任儒”，“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①，再加之“窦太后又好黄老”，诸博士很难得到重用。

董仲舒在此期间韬光养晦，一方面广招生徒，私相传授，为汉朝培养了一批推行儒学的合格人才。《史记》说董仲舒弟子通经学者“以百数”，而且都很出色，褚大为梁相，嬴公为谏大夫，吕步舒为丞相长史，吾丘寿王则官至光禄大夫侍中。大史学家司马迁也曾师从董仲舒。另一方面，董仲舒又谨慎地观察现实，潜心地研讨百家学说，特别是深研汉初以来一直占统治地位的黄老之学。他要构建一个前所未有的、兼容诸子百家的新儒学体系，以适应西汉社会大一统局面，以求积极有为之效。

公元前141年，孝景帝驾崩。景帝是继文帝之后，又一个奉行黄老清静无为、与民休息之治，从而实现“文景之治”的君王。史称景帝时期，仓禀丰实，府库饶财，移风易俗，黎民淳厚，西汉社会从经济到治安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盛世。但是，由于朝廷的无为放任，诸侯骄恣，豪强坐大，兼并乡里，割据势力业已形成；再加之四夷侵临，匈奴寇边，西汉王朝已受到内外威胁。西汉政治改辙更张已势在必行。汉武帝即皇帝位后，崇儒纳贤，诏举贤良。元光元年（前134年），董仲舒被举为贤良，得以贤良对策。汉武帝连问三策，董仲舒亦连答三章，中心议题是天人关系问题，史称《天人三策》。董仲舒在对策中提出了“天人感应”和“大一统”思想，为后世历代王朝提供了统治的理论基础。

董仲舒以一代鸿儒，论才力，论资历，都应该受到应有的重用。刘向说：“董仲舒有王佐之才，虽伊（尹）吕（望）无以加！管（仲）晏（婴）之属，霸者之佐，殆不及也。”^②可是，董仲舒“为人廉直”，不会阿附取荣，汉武帝虽采纳了他的建议，但却并未重用他。对策之后，汉武帝只是让董仲舒做了易王刘非的相国——“江都王相”。

西汉自吴楚七国之乱后，诸侯国一直是被打击、被削弱的对象，“左官律”规定，侯国官为“左官”，地位低于中央任命的官吏。江都王国在今扬州，易王刘非是景帝之子，武帝的同父异母兄弟。景帝时封汝南王，吴楚七国乱时，佐军有功，改封江都王。其人有才气，好勇力，但广治宫室，素来骄奢。作为一个中央派来的诸侯相，董仲舒既要维护王朝的利益，又不能开罪于自己的主子，实在是左右为难，进退维谷，但他正心正己，“以礼义匡正，王敬重焉”。在江都，董仲舒兴礼乐，致教化，所作所为，皆以利民安邦为本，江都称治。《汉书·循吏传》称：“孝武之初，外攘四夷，内改法度，民用凋敝，奸轨不禁。时少能以化治称者，惟江都相董仲舒、内史公孙弘、倪宽居官可纪。三人皆儒者，能于世务，明习文法，以经术润饰吏事，天子器之。”

元光六年（前129），匈奴大举寇边，江都王刘非上书请求带兵北击匈奴。吴楚七国之乱后，为避免诸侯王与中央抗衡，武帝下令诸侯王只能居国食税，不得治民，更不得治兵。结果，不仅没获批准，而且还连累到了相国董仲舒——董仲舒被降为中大夫。中大夫是郎中令属官，“掌论议，顾问应对”，算是个闲职。也许是为了抒发一下自己的胸中闷气，也许是

^① 《史记》卷一二一《儒林列传》。

^② 《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下同。

为了警示武帝，董仲舒联系到几年前发生的两场大火（辽东高祖庙和高祖陵便殿相继被焚），认为这是上天谴告，于是著《灾异论》，借天人感应，大谈时政得失。不料，书稿被酷吏主父偃窃取，上奏给汉武帝，说这是在“讥刺”圣上。汉武帝大怒，以“私为灾异书”、“罪至不道”将董仲舒逮捕入狱。不过事后，汉武帝又下诏赦免，仍以董仲舒为中大夫。

后来，董仲舒出为胶西王相。胶西国在今山东邹平。胶西王刘端也是汉武帝的同父异母兄弟，阴险狠毒，骄横不端，在董仲舒之前已经杀了几个国相，所以没有人敢到胶西去任职。当时的丞相公孙弘也治《春秋》，但学问不如董仲舒，董仲舒认为公孙弘“从谀”，公孙弘因此嫉恨他，于是对汉武帝说：只有董仲舒可以胜任胶西王相。董仲舒在胶西，虽然得到了胶西王的“善待”，但也担心时间久了恐遭不测，于是托病辞官，回归故里。晚年的董仲舒，“终不问家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但朝廷每每有大的决策，汉武帝总是派使者“就其家而问之”。董仲舒死于何年，不得确考，大概在太初元年（前104），享年75岁左右。死后葬于京师长安西郊。

董仲舒的思相体系包罗万象。在哲学上，他以《春秋》公羊学为核心，广泛汲取了先秦诸子宣扬的“天命”“天志”、“刑名法术”、“无为”等思想以及“阴阳五行”学说，并利用当时天文、历数、物候等自然科学的新成果，构造出了一套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哲学体系。他用“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观点，论证儒家道统的永恒性。其“阴阳灾变”理论，更为历代统治者所推崇。在伦理道德上，他系统提出并论证了“三纲五常”理论，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在中华民族道德体系中打下了深深烙印。他主张“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成为历代士大夫激浊扬清的座右铭。在政治上，强调“大一统”，主张强化中央集权与国家的一统，奠定了中华民族的“大一统”政治观。

董仲舒是儒学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代表人物，其思想影响深远。董仲舒不仅接受和发扬了孟子“仁政”思想以及荀子关于礼法并重、刑德兼用的主张，而且还大量吸收了墨家“兼爱”、“尚同”的理论乃至墨家学说中某些带有宗教色彩的思想。而更为突出的是，在他专攻的春秋公羊学中，充满了阴阳家的阴阳五行学说，并使阴阳五行思想成为汉以后儒家学说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班固说：“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①董仲舒曾向汉武帝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②这是以后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方针的重要根据。从此，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从诸子百家中一枝独秀，居于统治的地位。但必须指出的是，董仲舒这里所说的“孔子之术”，显然已经不是原来的孔子学说，也不是原始儒家学说，而是经过他和汉初其他儒家学者发展了的，吸收了墨、道、名、法、阴阳等各家学说之长的“新儒学”。

董仲舒对于儒学的发展不仅在于学理方面，而更在于他把儒学推向政治制度化方向。董仲舒研究的春秋公羊学，是一种密切联系社会现实的学说。公羊学认为，《春秋》经所载对于各类社会事件的判断和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都具有某种法典的意义，可以作为判断各类

①《汉书》卷二七《五行志》。

②《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

事件和评价人物的依据和范例。这也就是当时社会上相当流行的所谓“春秋断狱”说。由此，他们进一步又认为，《春秋》经中所说的“三统”、“三正”及“三世”等理论，都是为汉王朝的建立作论证的；而《春秋》经中所提到的各种礼义法度也都可以为汉王朝所效法。于是，董仲舒作《春秋繁露》，藉以揭示孔子作《春秋》之宏旨及其包含之微言大义，为现实政治服务。他认为：“《春秋》修本末之义，达变故之应，通生死之志，遂人道之极者也。《春秋》记天下之得失，而见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无传而著，不可不察也。”^①所以，他引述子夏的话说：“有国家者不可不学《春秋》。不学《春秋》则无以见前后旁侧之危，则不知国之大柄，君之重任也。”董仲舒的这些观点在当时是很有影响的，当时就流传着所谓孔子作《春秋》“为汉帝制法”的说法。这样，儒学就开始与当时实际的社会政治制度联系起来。从此以后，儒学已不再是单纯的伦理道德修养和政治理想的学说了，而是同时具有了一种社会制度方面的律条的作用。

董仲舒的思想学说在当时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他借阐释《春秋》，强调“大一统”，指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直接为汉武帝强化中央集权服务。他的“天人感应”理论，固然有宣扬“君权神授”的一面，但还有限制君主滥用权力的一面。他说：“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足以贼民者，天夺之。”^②这是试图以“天”来限制君权，以“天道”来推行仁政。董仲舒还借“奉天法古”，革除秦朝弊政为理由，提出了一系列在当时条件下值得肯定的主张，如：限制豪强占有土地数量，堵塞土地兼并之路；取消盐铁官营，释放奴婢，剥夺主人滥杀奴婢的权力；薄赋敛，省徭役，息兵宽民等等，这在当时土地兼并盛行、统治阶级骄侈淫逸之风大起、汉武帝穷兵黩武的形势下，起到一定的振聋发聩的作用，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二、滑稽之雄东方朔

东方朔（前154—前93），字曼倩，平原郡厌次（今陵县神头镇）人。相传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秦始皇东巡到达今天的神头镇，因为讨厌东方的岚气（雾气），而名之为“厌次”，“次”为停驻的意思。两汉时期，这里曾繁荣一时，规模宏大的汉代墓群，是其盛极一时的历史见证。

东方朔自幼失去父母，由兄嫂抚养成人。他聪敏好学，十几岁时已精通《诗》、《书》、《易》等儒家经典，熟读《孙子兵法》、《吴子》等兵法战策，闻鸡起舞，研习剑术。文韬武略无一不通，以才华横溢、能言善辩，闻名于乡里。在汉武帝广招贤良之际，东方朔便上书自荐。

汉武帝即位初年，征召天下贤良方正和有文学才能的人。各地士人、儒生纷纷上书应聘。东方朔也给汉武帝上书，上书用了三千片竹简，两个人才扛得起，武帝读了二个月才读完。在自我推荐书中，他说：“我东方朔少年时就失去了父母，依靠兄嫂的扶养长大成人。我十三岁才读书，勤学刻苦，三个冬天读的文史书籍已够用了。十五

^①《春秋繁露》卷二《竹林》。

^②《春秋繁露》卷七《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

岁学击剑，十六岁学《诗》，《书》，读了二十二万字。十九岁学孙吴兵法和战阵的摆布，懂得各种兵器的用法，以及作战时士兵进退的钲鼓。这方面的书也读了二十二万字，总共四十四万字。我钦佩子路的豪言。如今我已二十二岁，身高九尺三寸。双目炯炯有神，像明亮的珠子，牙齿洁白整齐得像编排的贝壳，勇敢像孟贲，敏捷像庆忌，廉洁像鲍叔，信义像尾生。我就是这样的人，够得上做天子的大臣吧！”

汉武帝对东方朔的上书大加赞赏，令他待诏在公车署中。公车令奉禄微薄，又很难见到皇帝，东方朔很是不满。为了让汉武帝尽快召见自己，他故意吓唬给皇帝养马的几个侏儒：“皇帝说你们这些人既不能种田，又不能打仗，更没有治国安邦的才华，对国家毫无益处，因此打算杀掉你们。你们还不赶快去向皇帝求情！”侏儒们大为惶恐，哭着向汉武帝求饶。汉武帝问明原委，即召来东方朔责问。东方朔终于有了一个直接面对皇帝的机会。他风趣地说：“我是不得已才这样做的。侏儒身高三尺，我高九尺，所挣俸禄却一样多，总不能撑死他们而饿死小臣吧！圣上如果不愿意重用我，就干脆放我回家，我不愿再白白耗费京城的白米。”东方朔诙谐风趣的语言，逗得汉武帝捧腹大笑，遂任命他待诏金马门，不久又擢为侍郎，侍从左右。

汉武帝喜欢游戏，为政之暇，常出谜语，让侍从猜测。东方朔每猜必中，应答如流，很快得到宠幸。东方朔则利用接近皇帝的机会，屡屡向汉武帝谏诤国政。

建元三年（前138），汉武帝为了田猎游乐，拟划出关中方圆百里的良田，建造规模宏大的上林苑。朝中众臣大多迎合帝意，表示赞同，东方朔却据理力谏：“听说谦虚谨慎，天将降福，骄傲奢侈，天将降灾。现在圣上嫌宫殿不高大，苑林不宽广，要建上林苑。试想，关中一带，土地肥美，物产丰饶，国家赖以太平，小民赖以富足，划地为苑，将上乏国家，下亏小民；为建造虎鹿乐园而毁人坟墓，拆人房屋，将使小民无家可归，伤心流泪，怨恨朝廷。昔殷纣王建九市而诸侯叛乱，楚灵王造章华台而楚民离心，秦始皇修阿房宫而天下大乱。前事之鉴，不可不察。”汉武帝虽不愿停修上林苑，但对东方朔表现出的胆识和忠诚十分欣赏，下诏赐给黄金百斤，并授予太中大夫给事中的官衔。

汉武帝的妹妹隆虑公主老来得子，封昭平君，深得武帝宠爱，但他却骄横不法，酒后杀人，廷尉不敢依法治罪，特向武帝请示。武帝碍于法律，不好明令赦免。于是假意哭泣，想暗示廷尉免罪。左右大臣都看出了皇帝的用意，纷纷为昭平君求情，独东方朔故作糊涂，向汉武帝祝颂说：“圣王执政，奖赏不避仇敌，诛杀不择骨肉。今圣上严明，天下幸甚！”此举使汉武帝难徇私情，不得不忍痛依法惩处了昭平君。

汉武帝好大喜功，也喜欢臣下歌功颂德。一次，武帝问东方朔：“先生以为朕是一位什么样的君主呢？”东方朔回答说：“圣上功德，超过三皇五帝，要不众多贤人怎么都辅佐您呢，譬如周公旦、邵公奭都来做丞相，孔丘来做御史大夫，姜子牙来做大将军……”东方朔一口气将古代三十二位治世能臣都说成了汉武帝的大臣。他语带讽刺，但又装出一幅滑稽相，使汉武帝欲恨不能，破泣为笑，笑恨之余又确实感到自己不如圣王。

东方朔常言政治得失，陈农战强国之计，但武帝始终把他当俳优看待，不得重用，于是写《答客难》、《非有先生论》，以陈志向和发抒自己的不满。司马迁在《史记》中称他为“滑稽之雄”，晋人夏侯湛写有《东方朔画赞》，称其为“洁其道而秽其迹、清其质而浊其文”。从前人的诸多评述中不难看出东方朔是一个被扭曲的带有悲剧色彩的人物，集中表现为东方朔一心想当“天子大臣”而终其一生则为“天子弄臣”。

东方朔以滑稽仕进，以滑稽得宠，以滑稽名世，最终还是以滑稽失意了。他的许多意见被汉武帝视为有理，但他还是没有得到重用，这是为什么呢？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二集·从帮忙到扯淡》一文中说得很好：“中国的开国的雄主，是把‘帮忙’和‘帮闲’分开的。前者参与国家大事，作为重臣，后者却不过叫他献诗作赋，‘俳优蓄之’，只在弄臣之列。不满于后者的待遇的是司马相如，他常常称病，不到武帝面前去献殷勤，却暗暗的作了封禅的文章，藏在家里，以见他有计划大典——帮忙的本领……”鲁迅先生这段话，生动的说明，在最高统治者心目中，臣下分为两种，一种是能在政治上帮自己的忙的，另一种是只能在生活上给自己助兴陪玩的。后一种也就是自先秦以来一直被视为不祥之物的俳优了。东方朔的性格颇为复杂。他既有傲岸伟烈的一面，又有“指意放荡、颇复诙谐”的一面；可以为治世的能臣，亦可以作解忧排遣的俳优，终于被视作弄臣了。滑稽帮了他的忙，滑稽也帮了他的倒忙——定位销似地锁定了他在武帝面前的位置。他梦想作“天子大臣”，结果成了“天子弄臣”，滑稽应该是重要原因之一。所以他是一个被潜伏在自己本性中的“滑稽”异化了的人物。

东方朔的特殊经历和处世态度，注定了他生前身后都要被歪曲和被物议。《汉书》作者班固一边给他作传，一边在赞语中收集了刘向、扬雄等人对他的不无微词的评价。刘向多次向东方朔同时代人作调查研究，“皆曰朔口谐倡辩，不能持论，喜为庸人诵说，故令后世多传闻者。”扬雄也认为东方朔“言不纯师，行不纯德，其流风遗书蔑如也”。意思是说他的学说没有什么深度，迹近逢场作戏。班固预见到“后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语附著之朔”，所以将其著作或全文或目录收入本传，并特别注明：“凡刘向所录朔书俱是矣，世所传他事皆非也。”^①

后来的事态发展果然如此。东方朔去世后很快被涂上一层神奇怪诞的色彩。星相占卜、巫师数术之士，全都试图从东方朔的事迹言行中找出“根据”。为了利用东方朔的巨大影响和传奇色彩，有的更直接奉东方朔为祖师爷。在他的故乡神头镇，每年三月初三，各地占卜盲人云集此地赶会，向“朔爷爷”顶礼膜拜。这种风气始于何时呢？从夏侯湛的“东方朔画赞”一文中“合变以明算、幽赞以知来，自三坟五典八索九丘，阴阳图纬之学，百家众流之论……乃研精而究其理，不习而尽其功”从这些句子来看，世人将东方朔做为卜卦祖师，从夏侯湛所处的晋代已经开始了。这种风气一直沿习到新中国建立以后，到“文革”才销声匿迹。东方朔的故乡——神头近乐陵，盛产枣类，枣树易生一种名曰“布蛆”的害虫，传说东

^① 以上引文均见《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

方朔乃封他的家乡方园四十里以内的枣树不生“布蛆”，而神头四周的枣树果然也就没有这种病害。至今当地老农仍对此津津乐道，感戴恩德。此可为东方朔身后被扭曲的明证。

剔除东方朔形象上的神奇怪异色彩，还其被扭曲被异化的赋作家的本来面目，不自今日始。晋人夏侯湛的《东方朔画赞》实为开先河者。他出于时代的局限，虽然也列举了先生“蝉蜕龙变，弃世登仙、神友造化、灵为星辰”的现象，但随即指出，那不过是“谈者”的“以为”而已。他自己的观点是“此又奇怪恍惚，不可备论者也”。在对此稍作描述后，作者真情贯注，以充满仰止之情的笔墨，称颂东方朔“雄节迈伦，高气盖世”。概括东方朔一生形象为“洁其道而秽其迹，清其质而浊其文”^①，便是中肯恰切的评价。后一句尤其为高度凝练且当之论，即东方朔一生的思想和理论是纯洁的，而行为则显得有些污秽；其本质是清白的，而外在形象则有些污浊。由此又可见，东方朔的形象，自古以来便存有很大争议。夏侯湛的观点和刘向、班固、扬雄等人已有相当程度的差异。

东方朔一生著有《答客难》、《非有先生论》、《责和氏璧》、《皇太子生谋》、《屏风》、《殿上柏柱》、《平乐观赋猎》、《八言上下》、《七言上下》、《从公孙弘借车》、《谏止上林苑疏》、《应诏上书》、《为武帝寿》、《化民有道论》、《据地歌》、《临终谏天子诗》等名篇。此外，《楚辞》收《七谏》，《初学记》收《与公孙弘书》，《艺文类聚》收《诫子诗》、《旱颂》等等，传统上也以为都是东方朔的作品。以上作品大体可以断定为东方朔所著。另外《汉书》“艺文志”说他有文二十篇，但多已失传。明人张溥集为《东方大中集》。至于伪托之作及散见于志怪小说或笔记稗官的杂论之中的东方朔的作品，更是汗牛充栋、不胜枚举。

在东方朔的作品中，以《答客难》、《非有先生论》和《诫子诗》成就最高，对后世影响甚大。《史记》与《汉书》两传皆全文引用《答客难》。班固指出：“朔之文辞，此二篇最善。”（指《答客难》与《非有先生论》）从东方朔现存的作品来看，这是很精当的评价。《答客难》是东方朔长期滑稽失意之后，所作的一篇表达心声的赋作，他巧设“客人难己”：“悉心尽忠以事圣帝，旷日持久，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是不是你的个人品行还有什么缺陷呢？”东方朔为之答辩，大意是说，苏秦、张仪生于乱世，所以都有发挥个人才能的机会。而自己生于汉武盛世，“圣帝流德，天下震慑，诸侯宾服……不得其所”，“贤与不肖何以异哉”。观之全篇，寓讥讽于颂扬之中，尽情抒发了自己忠心耿耿而得不到重用的不平之气，却又使人挑不出毛病来。《答客难》之为文一如东方朔为人，仍然充满了他独特的智慧和机敏，全文写得高屋建瓴、纵横恣肆、铺张扬厉、气势贯通，为汉赋中影响深远、风格独特的一篇。此文一出，后学者众。如汉代扬雄的《解嘲》，班固的《答客戏》，张衡的《应问》，唐代韩愈的《进学解》等，皆学此文。《文选》给这种独特的作赋方法命名为《设论》。《文心雕龙》作者刘勰也给予很高的评论。《非有先生论》在艺术上也很有感染力。它借托司马相如的《自虚上林赋》中的“子虚”和“乌有”两个人物形象，借古讽今，设“非有先生”在吴国做官，三年不发一言。吴王问他为什么缄口不言，他趁机用历史上正谏之臣惨遭横祸

^①《东方朔画赞碑》存于陵县文博苑内。

的故事来启发吴王，仍然是期望汉武帝以吴王为借鉴，察纳忠言，近贤远佞，达到天下大治、长治久安的目的。文中的几个“谈何容易”，充分表达了作者对于自身处境的万端感慨。东方朔作为辞赋名家在古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文学成就彪炳青史、千古流芳。

三、千古忠烈话赵苞

赵苞（？-178），字威豪，东汉甘陵东武城（今山东武城）人。少年勇武好义，侍孝父母，口碑甚佳。

东汉桓帝、灵帝时期，外戚和宦官交替专权，把持朝政，尔虞我诈，争权夺势，一片混乱。一些沉浮宦海之人，纷纷趋炎附势，攀高结贵，拼命钻营。赵苞就在这一时期走上仕途，但他清廉寡欲，耻于与这些人为伍。

赵苞有个从兄叫赵忠，是个宦官。汉灵帝时，赵忠官拜中常侍。中常侍一职在东汉时期由宦官专任，传达皇帝诏令，掌管朝廷文书。张让与赵忠是中常侍的首领，受到灵帝刘宏的信任，把持朝政，气焰薰天，排斥异己，贪污腐败，卖官鬻爵。三国故事中有十个祸国殃民的宦官，称为“十常侍”，赵忠就是其中之一。以张让、赵忠为首的权阉，胡作非为，架空了昏庸无能的汉灵帝，窃取了国家最高权力，横行霸道，祸害百姓。有人劝赵苞，你堂兄在朝中握有重权，何不与之和好，日后还怕享不到荣华富贵？赵苞却说，赵忠欺君罔上，误国害民，我和他不是同路人。我生当孝于亲、忠于君，岂能与他们为伍！许多官员夤缘巴结唯恐不及。赵苞却认为赵忠的飞黄腾达是赵家的耻辱，不但不逢迎巴结，而且坚持不跟赵忠来往。

赵苞以勇武好义、贤孝廉直闻于乡里，被举为孝廉。东汉入朝为官的主要途径是由州郡按限额举荐孝廉和茂才（即秀才）。赵苞被举荐为孝廉。赵苞初为广陵县令，任职三年，政教清明，政绩闻于朝廷。熹平五年（176），赵苞升任辽西郡太守。镇守东北边陲。东汉时的辽西郡较秦汉时面积小了许多。原辽西郡东北部被乌桓族占据。辽西郡只辖阳乐、海阳、令支、肥如、临渝五县，比今秦皇岛市管辖范围略大。郡治阳乐，在今抚宁城西洋河畔。赵苞修缮城防，训练士卒，开垦土地，百姓生活安定。北方少数民族不敢轻易入犯。

东汉末期，鲜卑首领檀石槐，勇猛剽悍，经常率部入侵辽西一带，这一带的百姓年年遭受掠夺，人口死伤、财物损失不可计数。赵苞初任辽西太守的几个月里，边境遭受侵袭就达三十多次。赵苞率部英勇拒敌，屡挫强寇，“抗厉威严，名振边俗”^①，有力地震慑了部落。檀石槐视赵苞为眼中钉，时时处处寻找机会，企图除掉赵苞。

按照东汉制度，地方官到任的第二年就可以把亲人家属接到任所。为了照顾父母妻儿，同时也是为了表达抗击鲜卑的决心，鼓舞士气，当年冬，赵苞派人到武城接老母和妻儿去辽西。不料，这一消息被鲜卑部落刺探得知，当他们行至柳城（今河北昌黎）时，鲜卑部落派出上万人马，将赵苞的老母和妻儿掳掠而去。

熹平六年（177），大年将至。鲜卑人押着赵苞的老母和妻儿来到辽西郡城下搦战。赵

^①《后汉书》卷八一《独行列传》。

苞开城迎敌，看到阵前被绳索捆绑的老母和妻儿，心痛如绞。鲜卑人威胁赵苞母亲向儿子喊话劝降。赵苞悲号谓母曰：“为子无状，欲以微禄奉养朝夕，不图为母作祸。昔为母子，今为王臣，义不得顾私恩，毁忠节，唯当万死，无以塞罪。”赵母亦临危不惧，大义凛然，大呼：“威豪，人各有命，何得相顾，以亏忠义！昔王陵母对汉使伏剑，以固其志，尔其勉之。”^①赵母不顾个人安危，舍生而取义，深深感染了赵苞及汉朝将士。赵苞身先士卒，挥戈直取敌酋，汉军将士杀向敌阵，无不以一当十，大破敌军。赵苞的母亲和妻子不幸遇难。这就是历史上名扬千秋的“赵苞舍妻母大破鲜卑”的事迹。

赵苞之事传至朝中，朝野无不为之感动，汉灵帝亦为之动容，特许赵苞护送母妻棺柩归葬武城故里，并遣使吊唁，赐封赵苞为郾侯。

母亲和妻子的遇难，使赵苞痛不欲生，母亲的大义更使赵苞深感愧疚。葬礼毕，赵苞对乡亲们说：“食禄而避难，非忠也；杀母以全义，非孝也。如是，有何面目立于天下！”说完，号哭呕血而死。

四、恃才傲物称祢衡

祢衡（173-198），字正平，东汉末平原郡般县人（今临邑县德平镇小祢家村）。今临邑县德平镇仍存有古迹“祢衡井”。1933年，原德平县长戴章民立碑勒石于祢衡井旁，碑高二米，正面刻“祢衡故里”四个大字。井水甘甜而清冽，沿用至今。

祢衡自幼聪颖好学，博闻强记，有过目成诵、出口成章的才能。他敢于蔑视权贵，且能言善辩，恃才傲物，20岁就已经是名声远播的大才子了。民国《德平县志·人物志》载：“祢衡，少有才辩，而气尚刚傲。”汉献帝兴平年间（194-195），中原地区军阀混战，德州区域成为曹操、袁绍等军阀逐鹿的主战场。祢衡为避战乱，离开家乡，先到荆州。建安（196-219）初年，自荆州北游许都。当时许都新建，贤士大夫四方云集，英杰济济。祢衡至许都之前，就写好名贴藏在怀中，打算拜谒许都名豪，以求功名。但到许都后，感到无人值得拜谒。有人建议他去投奔在朝任职的名士陈群和司马朗，祢衡回答：“吾焉能从屠沽儿耶！”当时，荀彧是朝中的著名谋士，赵稚长任荡寇将军，也很知名，所以又有人建议祢衡投奔他们，祢衡说：“文若（荀彧字）可借面吊丧，稚长可使监厨请客。”^②其意以为荀彧仅有容貌故可吊丧；赵稚长腹大只会吃肉，故可监厨。祢衡恃才傲物，见不如自己的人连话也不愿说，因此得罪很多士人。在许都士人中，祢衡瞧得起的人只有孔融和杨修，他常说：“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余子碌碌，莫足数也。”孔融也深爱祢衡之才。

当时祢衡年仅20余岁，孔融40岁，二人互相倾慕，结为忘年之交。孔融上疏推荐祢衡，又多次向曹操举荐。曹操本想接见祢衡，可是祢衡恃才高傲，根本不把曹操放在眼中，自称病狂，不肯前往，并且数次流露不逊之言。曹操闻知其情，心怀忿恨，但因祢衡才名甚著，不想杀他。曹操听说祢衡善于击鼓，便任为鼓史，大会宾客，观其表演。会场规定：诸史经过曹操面前，一律脱去故衣，更换岑牟、单绞之服。祢衡参与表演，作《渔阳》参挝，容态

^①《后汉书》卷八一《独行列传》。下同。

^②《后汉书》卷八十《祢衡传》。下同。

有异，声节悲壮，听者莫不慷慨。祢衡行至曹操面前而止，主吏呵斥他停鼓更衣，祢衡答应一声，先脱去外衣，又脱光内服，赤身裸体，一丝不挂，站在曹操面前亮相，然后从容不迫地穿上岑牟、单绞之服，又参挝而去，始终面不改色。曹操只好自我解嘲地笑着说：“本欲辱衡，衡反辱孤。”

事后，孔融批评祢衡，认为大雅君子不当如此，并申明曹操有爱才之诚意。祢衡答应拜见曹操。于是孔融又去见曹操，向他解释祢衡确有狂疾，现已自知失礼，想前来谢罪。曹操一听很高兴，命令门者有客立即禀报，并准备上等筵席以待祢衡前来。祢衡身穿单布衣，头戴疏巾，手持三尺木杖，坐在曹操大营门口，以杖捶地，破口大骂。门吏向曹操回禀说，外面有一狂生，坐在营门，指天骂地，口出狂言，请收捕治罪。当时，孔融尚在曹操身边，曹操闻禀大怒，对孔融说：“祢衡竖子，孤杀之犹雀鼠耳。顾此人素有虚名，远近将谓孤不能容之，今送与刘表，视当如何。”于是派人送祢衡归荆州。祢衡临行，众人在城南设酒饯别，因祢衡平素孤傲，目中无人，得罪了不少士人，所以饯行的众人约定：以他迟到为借口，大家都坐卧不起，对他进行一番折辱。祢衡到场后，无人起而与语，祢衡一见，放声大哭。众人问他何以悲伤，祢衡说：“坐者为冢，卧者为尸，尸冢之间，能不悲乎！”众人想折辱祢衡，反被祢衡所辱。

祢衡到荆州后，深受刘表和荆州士大夫的欢迎和敬佩。刘表重其才名，以宾礼待之，文章议论，非祢衡不定稿。一次，刘表与荆州文人共同起草奏章，各自竭尽才思，对草文颇感满意。时值祢衡外出，回来后看见文稿，没有读完，便毁以掷地，刘表十分诧异。祢衡乃索取笔札，须臾便另成一稿，文笔辞义皆超过旧稿。刘表大喜，更加敬重祢衡。但祢衡傲气不改，对刘表也加以侮慢。刘表不能容，见江夏太守黄祖脾气急躁，企图借刀杀人，便把祢衡送与黄祖。

黄祖起初对祢衡也采取善待态度。祢衡为黄祖草文作书，轻重疏密，各得体宜。黄祖非常高兴，拉着祢衡的手说：“处士，此正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所欲言也。”黄祖长子黄射任章陵太守，与祢衡尤相友善，二人尝一起出游，共读蔡邕所作碑文，黄射爱其文辞，归还后深恨当时没有抄写下来。祢衡说：“吾虽一览，犹能识之，唯其中石缺二字为不明耳。”随后便默写出全部碑文。黄射派人抄回碑文校对，竟一字不差，观者莫不叹服。一次黄射大宴宾客，有人贡献鹦鹉，黄射举杯请祢衡作赋助兴，祢衡握笔，一气呵成，文不加点，辞采秀丽，再次显示出非凡的才华。

后来，黄祖在战船上大会宾客，祢衡又出言不逊，黄祖感到羞惭，呵斥祢衡。祢衡盯着黄祖大骂。黄祖大怒，命执法官拖出笞打。祢衡大骂不止，黄祖愈加忿恨，遂下令杀之。黄射赤足狂奔来救，但为时已晚。事后黄祖也很后悔，命厚加棺敛。祢衡死时年仅 26 岁，其文章多亡佚。

第四节 德州汉墓与区域民俗文化

德州广泛分布着众多的汉代墓葬，这些古墓虽然风格各异、大小不一，但都蕴含着丰富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信息，反映着汉代的社会生活、风俗习惯和历史文化。

一、分布广泛的汉代遗冢

德州汉代墓葬主要分布在陵县、宁津、乐陵、齐河、平原和禹城等地，如神头汉墓群、东方朔墓、庞家寺汉墓、三女冢、朱庄墓群、田冢汉墓、徐楼汉墓、曹冢古墓、冯李汉墓、大丁庙古墓群、双槐南冢等。其中陵县神头汉墓群与宁津县庞家寺汉墓规模最大，文物价值最高。神头汉墓群、东方朔墓、庞家寺汉墓后面有详述，这里不再赘述。

三女冢汉墓位于乐陵市刘武官乡范桥村北 800 米，仲家村西北 700 米处。清顺治《乐陵县志》记载：“三女冢在城南三十五里，有夫妇耆耄无子，止生三女。存则三女各筑一冢听父母择之，没则未审葬于何冢。冢高二丈余，周围数丈，遥望如丘山，三冢其制如一，至今里人覩之孝思津津。”清乾隆《乐陵县志》记载：“三女冢在县南三十里，有夫妇耆年无子，只生三女在侧，女各筑一冢，听父母择之，歿则未审葬于何冢。冢高一丈余，周围数丈，遥望如山。”清宣统《乐陵县乡土志》有相似的记载：“传有夫妇老年无子，三女各筑一冢，听父母择之。”三墓从出土的随葬品来看，系汉代冢墓。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两汉“以孝治天下”，“三女”虽成为孝亲典型，为历代景仰。三女冢对于研究汉代丧葬制度与孝文化具有重要价值。上个世纪 80 年代申报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的材料记载，“三女冢原有冢墓三个，其中一个在 1945 年破坏，现存两座，封土高约 5 米，直径约 35 米。系砖室墓，曾出土玉猪、陶楼、陶鸡、陶盆、陶狗、陶俑等随葬品。其中玉狗 1 个、陶俑 1 个、陶鸡 1 个、陶耳杯 1 个。现有的两个冢墓完整，一号墓高 5 米、直径 35 米；二号墓高 4 米，直径 30 米。”目前仅存两墓，南北向排列，两墓封土顶部均被整平为农田。

朱庄汉墓又称朱家冢，位于平原县城关朱庄村，共三座，南北连成一线。据民国二十四年重修《平原县志》记载，为霍御史墓，其它信息不详。汉墓一面为一土路，其它三面被民房包围。封土已不存在，是一片空地。在这片空地上，村民栽了一些小杨树，直径约四五厘米。空地上有一些破碎的砖石块和柴草。1980 年 11 月平原县文物普查小组的调查记录中写到：“1980 年 1 月，平原县文物普查小组对朱家冢进行了调查工作。朱家冢一号冢、二号冢与三号冢位于城关公社朱庄大队东 500 米处，东南是公社窑场，四周为可耕地，三冢南北连成一线，一号冢东西长 50 米，南北 50 米，高 5 米，占地面积 2500 平方米。二号冢东西 10 米，南北 15 米，占地面积 150 平方米。三号冢东西长 15 米，南北长 20 米，高 3 米，占地面积 300 平方米。三冢呈台状。据中华民国二十四年重修《平原县志》记载，为霍御史墓。二号冢文革期间被社员挖走部分砖土。1992 年 6 月 12 日被山东省人民政府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田冢汉墓位于陵县糜镇田冢村北 250 米处，该村因此而得名。墓冢直径 46 米，封土高约 4 米，根据近年来出土器物、墓葬形制推断，该墓应是一座典型的汉代砖室墓葬。1959

年，该村农田施工时，曾出土过青铜刀、陶器等。战国时陵县位于齐国北边境，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据记载齐国著名将领田儋、田荣均曾征战于此。

徐楼汉墓位于禹城市原前油坊乡西南 15 华里的徐楼村东 100 米处，西距徒骇河 1200 米，俗称东府冢。该墓呈蘑菇形，直径 50 米，高 6 米，在封土上长有茂盛葱郁的松树，根据出土的砖块瓦砾鉴定，是一座规模庞大保存较完整的汉墓。墓主人是何人迄今不详。徐楼汉墓古称东府冢，据旧志记载：“东府冢在七区徐楼村东首。其地三亩余，上植松柏数株，高数丈，夏日荫翳，风景颇佳，人不能道其详。据村老者说，有尊贵者歿葬于此，内修阴宅，外覆冢土，雨后冢内露砖瓦形”。

曹冢汉墓位于临邑县德平镇曹冢村，封土高约 7 米，面积约 1200 平方米。据临邑县志记载，此墓为一帝王墓。该汉墓是我市保存较完整、规模较大的墓葬。相传为汉相曹参墓。2005 年被确定为市级保护文物。

冯李汉墓位于齐河县焦庙镇冯李村南 300 米处。该墓呈“亚”字形，南北 40 米，东西 40 米，砖石结构，墓道及墓室中的墓壁上镶嵌着大量的画像石，雕刻精美。经专家鉴定该墓为东汉晚期画像石墓，规模之大全国罕见。该墓埋藏在冯李村农田中，地表现象不明显，1995 年被该村农民灌溉时发现，目前，该墓保存完好。2006 年 12 月 7 日，被山东省人民政府定为第三批省级保护单位。

大丁庙古墓群位于庆云县城西北大丁庙村东。曾发现墓穴数座，未正式挖掘，已出土陶鸡、陶狗、陶灶等文物多件，经鉴定，断为汉墓。

双槐南冢位于禹城市火车站东南 200 米处，是两个形状类似的土冢。封土直径约 50 米、高 6 米，土冢上各有古槐一株，南北遥相对应，因而得名双槐南冢，又称南北冢。通过对该冢出土器物鉴定，双槐南冢是龙山文化时代遗址。旧志载：“双槐南北冢，在秦老庄南，二冢相距半里，上各有古槐故名。俗传有损枝叶者，举家有殃，故在旷野，其树独茂。”南冢古槐的岁数在秦汉时代，北冢古槐年轻几百年，约在东汉时期。依据南冢出土器物鉴定，属于龙山文化遗址。而北冢在市石油公司建设施工时，发现一座庞大的汉墓。1954 年 10 月 27 日，山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进行了发掘清理工作。通过清理出土器物证实了为 1800 年前的东汉墓。该墓早年被盗，只清理出土了 40 余件文物，其 2 件十二莲灯，全国仅有，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馆。

二、神头汉墓群与东方朔墓

神头汉墓群位于陵县城东北十几公里的神头镇附近，是一处汉代古墓群，1977 年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神头墓群散布在方圆 5 公里的地面上。这些古冢有的状如馒头，有的状似山嶺；或互相依偎，或兀然独立。古冢上杂树丛生，清晨傍晚，每有如锦似带的迷雾缭绕其间。因此，《陵县志》把它列为本县两景，名“疑冢叠翠”、“神头晓气”。

据《陵县志》记载，神头镇在秦汉时称厌次古城，相传秦始皇称帝以后，巡幸天下，“东抚东土”，在此东望，讨厌那里的岚气雾霭，“厌次”就因“秦帝遥看作厌游”而得名。历代

诗人也留下许多歌咏仄次和古冢的诗句，给古墓群披上一层诗情画意。

神头汉墓群相传是秦汉以来“名公巨卿之墓”，1973年文物普查时，古墓存38座，其中多数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这些古墓大的直径近40米，高9米，小的直径约15米，高4米。墓中数“四联冢”规模最大，东西120米，南北30米。1979年夏，考古工作者曾对坐落在张高庄的15号墓和4号墓进行发掘，并对2号墓进行清理。在15号墓室里只有一些浮土掩蔽的碎陶片，他们又深挖了墓前室和中室的左侧室。挖开墓后室后，发现古尸已经尸枯骸散，有30多件精美珍贵的汉陶制品，有完整无损的陶质绿釉八联灯，典雅古朴的博山炉和铜质弩机，还有多枚汉五铢钱，另有陶罐、陶井、陶灶、陶仓等，这些陪葬品证实了这些墓葬是汉墓。在主墓室发现了两件汉白玉石雕，一件为姿态生动的石猪，一件是雕工精细的石蝉，为同类汉墓中少有，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考古价值。这次开掘，初步判明三十八个疑冢都是汉墓，并且得出了“墓墓有尸，冢冢有物”的结论，推翻了认为疑冢不过是废城墙的说法。汉墓耸翠，逶迤多姿。碧蓝的笃马河从中流过，势如游龙穿峡，别具一种风情，成为鲁北平原上的一大景观。

陵县文史研究者赵春万经多方考证，初步判断该墓群系西汉张安世家族墓。^①张安世西汉昭帝时为右将军，始封富平侯，封邑今神头镇，一直传位到东汉安帝，共传九代200余年，且极尽奢华，故有条件构筑巨大的墓群。

东方朔墓位于神头镇西二里处，直径30米，高4米。墓地四周原有界石，其中曾植松柏，占地达数十亩，1978年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东方朔之墓”碑刻，现存于神头镇政府。历史上朔墓有三次较大的修建工程。第一次是唐颜真卿任平原郡太守时，对墓堆加封土，撰书刻墓碑（即后来闻名于世的《东方朔画赞碑》）；第二次是在明朝，正值盲人八卦占卜鼎盛时期，而东方朔为盲人八卦占卜术的始祖，每年三月三，各地盲人云集至此祭祖，又兴起了一次修墓活动；第三次是1992年，神头镇政府又为朔墓追加了封土，并在墓东修建了简易的东方朔祠。至今，民间对东方朔的朝拜、祭祀活动仍未断绝。

关于东方朔的故里长期争论不休。2002年3月，在陵县神头镇东街北邻发现一古代墓葬。该墓座北朝南，为单墓室，长宽各五米，前有墓道，墓顶距墓底有1.5米。该墓出土文物丰富，除出土鼎、瓶、盘、俑、鸡、鸭、狗等大量陶器外，还出土东方朔二十八代孙“东方合墓志铭”一方，有力地证明了东方朔祖籍是今山东陵县神头镇人。墓志铭长43厘米，宽42厘米，厚12.3厘米，全文469字，其中有“公讳合，德州安德县人也，即汉大夫倩之二八代孙”的记载，另有对东方朔的追述：“原夫气禀茫精，道符天纵，滑稽穷于炙，博辩轶于疏属，故得匡衡圣主，佐辅明时，垂裕后昆，流芳来世，自兹云降，代有其人”。

三、庞家寺汉墓

庞家寺汉墓位于宁津县庞家寺村南约300米处，坐北朝南。墓室由墓道、甬道、前室、前中室、后中室、后中东耳室及后室组成。墓道为斜坡式，残长2米许，南北由墓门至后室

^① 赵春万《桑梓笔谈》，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第14页。

北壁总长 14.5 米，东西最宽处为 3.1 米，主室内高 3.6 米。墓室用平砖封堵。前室平面为长方形，进深 0.80 米，东西宽 2.80 米、残高 2 米。东西两壁各有券形墼两个，亦用砖封堵。前中室为正方形，边长 17.5 米。后中室进深 3.25 米，东西最宽处 1.90 米，西壁弧张。后中室东部有一耳室，南北长 1.05 米、东西宽 0.90 米，穹窿顶。后室（即棺室）进深 3.85 米、东西宽 2.50 米，西壁亦为弧张。各墓室之间均有券顶甬道相连。最长者 1.30 米。基底砖均为错缝平铺。墓室内壁，自墓底向上两米许，均有一圈 10 厘米宽白地红土汇成的波折纹图案。各墓室内壁间有彩绘菱形纹、钩云纹、交错纹等二方连续图案，券门处另有两圈色泽鲜艳的几何形图案。

后室靠北置一棺。因墓内长久积水，骨架及棺木已朽。就板座来看，棺木长 2 米许，宽 1 米左右。从残存骨架来看，头北足南，仰身直肢，四周散落红黑彩绘漆皮及 0.25 米长之铁棺钉数枚。棺内人架下随葬大量五铢钱，系用钱绳贯穿后盘曲铺陈，较完整的达八百多枚。人架东侧有银发钗及银圈各一件，另有一红白色相间的玉坠状物。

庞家寺汉墓出土了大量的文物，数量、种类及品质都是德州汉墓发现之最。包括：釉陶器类、灰陶类、白陶类、银器类、铜器类及玉石类六大类。

釉陶器类 45 件，釉质较薄，以灰绿色居多，上施云母粉末状物质，有光泽，颇为精致。如：釉陶楼、釉陶方阙、釉陶十二连枝灯、釉陶井、釉陶碓、釉陶磨、釉陶壶、釉陶屋、釉陶炉、釉陶狗、釉陶鸡、釉陶鸭、釉陶耳环、釉陶灶、釉陶鼎、釉陶勺、釉陶盆，等等。除了大量釉陶类器物，还出土了灰陶、白陶及铜器等珍贵文物。

此墓随葬器物种类繁多，与北京顺义区临河村东汉墓有近似之处。陶楼、狗、鸡、鸭等，都为东汉墓所常见。五铢钱及剪轮五铢两种货币字样一致，“五”字交错两笔弧度较大，“金”字首作三角形，四点较长。“朱”字上部方折，下部圆折。五铢钱直径 2.6 厘米，孔径 1 厘米；剪轮五铢直径 2.5 厘米，孔径 1 厘米。此种货币乃东汉早期所铸造。据此，认定该墓为东汉早期墓葬，距今约 1900 余年。庞家寺汉墓有很高的文物价值，对研究汉代民俗文化提供了丰富的实物佐证。

四、德州汉墓与区域民俗文化

德州汉墓及出土文物，蕴含着大量的文化信息，反映了汉代德州饮食、服饰、居住、建筑、交通、生产、商贸等物质民俗文化，家庭、宗族、里社、婚姻、丧葬、节日、游艺、交际等社会民俗文化及民间信仰、民间哲学伦理观念、民间绘画雕塑等精神民俗文化等丰富的文化内涵。

第一，汉墓所反映的德州饮食、服饰、居住、建筑、交通、生产、商贸等物质民俗文化。

在庞家寺汉墓、神头汉墓、大丁庙古墓都发现了大量的灶具与饮食器具等，反映出汉代德州的饮食风俗。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进步，汉代人民的饮食水平较之前代有了很大提高。人们普遍以谷物为主食，以蔬菜、肉类、水产和果品等为副食，且已基本形成以粟、麦为主食格局。菜肴烹饪流行炙（烧烤）、脍（细切生鲜肉类）、羹（熬肉汤）、脯（将肉煮熟晒干）、

菹（腌渍防腐）等方法，在调味料使用上尤重酱、豉。人们嗜酒成风，这从出土的大量酒器上充分反映出来。德州汉墓中出土了大量的炊具，如神头汉墓出土的陶灶、大丁庙古墓群出土的陶灶、庞家寺汉墓出土的釉陶炉与釉陶灶等，反映了当时炊具是以灶为核心的复合烹饪器。灶的功能和形态多样化，既有日常的不可移动的垒砌灶，也有专供温食、行军使用的小型金属灶；既有单火孔灶，也有适合煮、蒸、温水的多火孔灶。灶上所用炊具是釜和甑，盛食和进食的器具有碗、盘、盆、罐及勺、箸等。这种组合已基本固定，今天我们所使用的炊食具在汉代已基本齐全了。

在三女冢汉墓、庞家寺汉墓出土的陶俑及男女装饰品，基本反映了汉代德州人们的服饰风俗。汉代服饰水平也有明显上升，其总体特点是实用性、身份性、和审美性并重。当时的服装原料主要有丝、麻、葛、皮、毛等。不同阶层的服装样式也有所不同，社会上层服装的典型样式为长袍宽袖，戴冠帽；社会下层服装的典型样式为短衣窄袖，着头巾。鞋履对汉代人来说意义尤其不一般，着履被看做是文明和身份的象征，跣足则是一种谢罪方式。男子佩带刀剑成风。女子以钗、华胜、步摇、珥、挡等为饰物，又喜以粉黛化妆。庞家寺汉墓出土的银发钗、玉坠、釉陶耳环等都反映出当时妇女的装饰风俗。

汉代德州建筑、居住风俗在汉墓中也有大量反映，如三女冢汉墓出土的陶楼、庞家寺汉墓出土的釉陶楼、釉陶屋等。当时的居住状况和建筑技术有了较大改进。贵族府第规模宏大，豪门宅舍亦穷极雕饰。普通住宅的基本形式是一堂二室，豪族大户的宅第则有前后堂之分。在建筑风格方面，西汉流行高台建筑，东汉则流行木结构的多层砖瓦建筑。汉代人经营住宅讲究风水禁忌，如提倡住宅的方位应与主人姓氏所属的五音相宜，忌讳起宅时冲犯太岁，忌讳向西边扩建住宅等。居室内的陈设有床榻、枕席、帷帐、几案、屏风、箱柜、奁具、香炉、灯烛等。如神头汉墓中出土的绿釉八联灯，精美绝伦。分上下二层，可以接，上下八个灯盘伸向四方，底座周围有武士骑射四个，座上端有立塑二男一女舞俑，并小鸟一个，翩翩起舞。灯柄插孔之间有四个鸟型镂空，展翅飞翔，造型别致，工艺精巧，古朴秀丽。此灯结构复杂，工艺精湛，在汉墓出土的文物中比较少见，体现了墓主人身份的显赫和工匠高超的技艺，属国家一级文物。

宁津汉代陶楼于1978年5月在宁津县大柳镇庞家寺汉墓出土，经专家鉴定为东汉早期作品，属国家一级文物，藏宁津文化馆。陶楼高144cm，长64cm，宽36cm。陶楼陶质为釉陶，各层饰有斗拱及廊檐，楼顶为四阿式，有鸟形脊饰，底部有台阶及立柱一对，柱上有鸟型陶饰，每层有长方形小窗3至5个，窗口各有小陶俑一个做向前抬手状。但釉质较薄，多为灰绿色，上施云母粉末状物质，有光泽，颇为精致。陶楼高度创我国之最。它反映了汉代德州楼阁建筑的基本式样与格局。

汉代德州交通、生产及商贸等方面的风俗，汉墓中也有反映。汉代德州水陆交通较为发达，河流纵横交错，除黄河纵贯全境外，还有笃马河、漯水、屯氏河等古河。秦代所修驰路也从德州经过。陆路交通工具主要是车，其中供人乘坐的有安车、轺车、辎车、容车等。水

上交通工具则以船为主，除较大的木制舟船外，还有渡河用的竹筏、草筏和羊皮筏等。汉代生产风俗焕然一新。农业是德州区域最基本的产业类型。庞家寺汉墓出土了釉陶磨、釉陶碓及其他农业生产工具，反映了当时农业以种植业为主，兼有林业、渔业、畜牧业以及某些家庭副业。当时已普遍实行铁犁牛耕，修建沟渠塘陂灌溉农田亦成一代之风俗。畜牧饲养尤重马牛。手工业生产的主要行业有纺织、酿酒、玉石制造等行业，德州汉墓出土的陶制纺织工具模型、大量的酒器及玉石工艺品（神头汉墓发现了两件汉白玉石雕，一件为姿态生动的石猪，一件是雕工精细的石蝉，庞家寺汉墓出土了玉坠等）都印证了汉代德州较为发达的手工业。汉代德州商业也较繁荣。庞家寺汉墓出土了铜货币八百余枚，神头汉墓也出土了多枚汉五铢钱，说明了当时货币经商的发达。

第二，汉墓所反映的德州家庭、宗族、里社、婚姻、丧葬、节日、游艺、交际等社会风俗文化。

冯李汉墓大量的画像石，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俗文化。汉代家庭生活多“五口之家”式，也有一些父母兄弟同居的大家庭。由于对儒家孝悌之道的提倡，以分居为恶、以同居为美，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观念。家庭一般为一夫一妻，贫困家庭还存在多男共妻现象；社会上层则盛行一夫多妻妾和蓄养奴婢的家庭形式。在家庭成员的关系方面，流行家长专制，妇女在家中处于从属地位，又有歧视赘婿的风俗。宗族则兼有祭祀单位、社会活动单位、经济互助单位等性质。聚族而居、聚族而葬的现象普遍存在。神头汉墓群、朱庄墓群、大丁庙墓群等都反映了这一现象。当时的强宗大族在经济、政治甚至军事上都颇具实力，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从西汉豪强贵族、富平侯张安世的家族墓就可以看出其在当时家族的强大实力。

乡村分布着大大小小的自然聚落，有乡、里、亭等管理机构。乡里普遍立社，乡里之社主要是祭祀土地神，其祭祀活动与组织方式对当时的乡村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民间婚姻礼俗以“六礼”为核心，婚姻程序一般包括议婚、问名、占卜、送聘礼、选择婚期、迎亲、婚礼等。奢靡铺张、婚龄偏低、重亲（即亲戚之间联姻）普遍。丧礼通常包括初死报丧、沐浴装殓、停尸哭吊、出殡送葬、葬后服丧等阶段。当时厚葬成风，墓室在形制上模仿地面建筑，且很重装饰，装饰的主要形式有壁画、画像石、画像砖等，时人对随葬品也力求应有尽有。庞家寺汉墓充分反映了汉代德州的厚葬风俗。节日主要有正旦、立春、正月上丁日、正月上亥日、社日（有二月社和八月社）、三月上巳日、五月五日、夏至、伏日、立秋日、八月节、十月旦、冬至、腊日及小新岁等，人们在这些日子要进行祭祖、祭神、宴饮、娱乐、团圆、交往、驱邪、迎季等活动，祭祖、祭神在节日活动中的地位尤为重要。

德州汉墓中出土的舞乐陶俑、乐器及画像砖石，反映了当时的游艺风俗。汉代游艺活动大致可分为乐舞百戏、智力游戏、体育游戏和儿童游戏四个部分。汉代的乐器主要有吹奏、弹拨、击打三种类型，有琴、瑟、箫、笛、笙、竽、埙等乐器。歌唱有清唱和乐器伴奏演唱两种形式。舞蹈有长袖舞、巾舞、盘舞、鼓舞以及各种兵器舞等形式。音乐歌舞常与“百戏”

（包括各种杂技及其他表演）同时演出。较为流行的百戏项目有：叠案倒立、攀索、爬杆、舞盘、舞轮、弄球、弄瓶、戏车、走索等。智力游戏主要是棋艺，包括六博、格五、围棋、弹棋、樗蒲等，此外还有“射覆”（即猜物）、隐语等活动。体育游戏有狩猎、投壶、摔跤、比武、搏兽、禽兽竞斗等。儿童喜以模仿成人生活场景为戏，并拥有种种玩具。汉代游艺活动除具有娱乐功能之外，还是增进人际关系的一种重要方式。一些游戏活动还伴有赌博行为，因此又呈现出较强的逐利倾向。

汉墓画像石与画像砖，也大量反映了当时的人际交往活动。人们在交往中以作揖、叩拜、长跪、避席、握手、抱持等动作表示恭敬或友好之意，以免冠、徒跣、膝行、肉袒、自髡等行为向人谢罪，以啮指、啮臂、断发等行为发誓结盟。交往中用来表明身份的“谒”和“刺”在当时已普遍使用于社会中上层。汉代宴饮担负着重要的交际功能，人们不但讲究尊卑座席次序，还要遵循一系列进食之礼。此外，与人际交往密切相关的社会风尚，如讲信义重名节，任侠、复仇与报恩，重让敬贤，舆论品评等已渐形成。

第三，汉墓所反映的德州民间信仰、民间伦理、民间绘画雕塑等精神民俗文化。

汉代民间信仰主要包括神灵信仰、鬼怪信仰、方术信仰、道教和佛教信仰等。时人崇拜的神灵极其广泛，有天、地、社稷、日、月、星、山、河、海、风、雨、雷等自然神，有门、户、井、灶、司命等职能神，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动物神，有祖先、历史英雄以及西王母等人格神。他们对神灵的信仰带有强烈的付出——索取的实用主义色彩。同时，又普遍相信世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鬼怪妖异，它们能给人带来种种灾害祸祟，或能预示吉凶。人们普遍信奉的方术有求仙、卜筮、相术、望气、风角、日月星占、占梦及其他杂占、各种保护性和破坏性巫术等等。民间伦理道德观念的突出特点是重视道德修养，推崇拙诚、中庸、知足、谦退、恭谨、孝悌等为人处世之道。民间绘画主要包括石画像、砖画像、壁画等，它们内容广泛，大体可分为现实、历史和神话三个系统，具有较浓的道德教化意味和宗教信仰色彩。在艺术技巧和风格方面，常采用散点透视法，画面纷纭万状、粗犷拙重而富有神韵。民间雕塑亦充满力度和生机，体现了蓬勃奋发的精神风貌。

第三章 魏晋风流——儒学传承与世家文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处于分裂割据状态。由于战争连绵不断，政权更替频仍，北方行政沿革变得十分频繁。曹魏时期，今德州区域分属冀州平原郡（国）、清河郡和乐陵国；东晋十六国时期，分属冀州平原国（郡）、清河国、乐陵国、乐安国和青州济南郡；南北朝时，分属冀州安德郡、清河郡，齐州平原郡和青州乐陵郡。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社会经济资源，使得德州在不断变幻的政治风云中，始终是各族政权激烈争夺的对象。时势造英雄，随着历史的风云激荡，一批世代为官、具有丰富统治经验的士族代表人物接踵登场，活跃于政治舞台。

第一节 风云变幻与文化融合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重要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经济资源，使得德州在民族碰撞与融合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金戈铁马，刀光剑影，黄河北岸不时上演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历史活剧。

一、刘备治平原

刘备(161-223)，字玄德，涿郡涿县（今河北省涿州市）人。因为他是汉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刘胜的后裔，辈分上比当时的皇帝汉献帝还要长一辈，所以当时人们称他为“刘皇叔”。

黄巾起义爆发后，各地豪强纷纷组织武装，以镇压起义军为名抢占地盘、扩充实力，割据一方。当时，刘备也率领关羽、张飞等参加了对黄巾军的作战，因镇压起义有功，被任命为安喜县（今河北省定县东）尉，后又先后任下密县（今山东省昌邑县东）丞和高唐县（今山东省高唐县）令。高唐县被起义军攻破后，他投奔中郎将公孙瓒，被任命为别部司马。初平二年(191)，因功“试守平原令，后领平原相”^①。

东汉置平原郡，本初元年(146)，汉质帝封其弟为平原王，遂改平原郡为平原国，下辖平原、高唐、般、鬲、祝阿、乐陵、湿阴、安德、厌次九县。当时平原国的范围囊括了今德州市所属的大部分县市。刘备先为平原县令，后升为平原国相。国相的官秩相当于郡太守。

自东汉初平元年（190）到兴平元年（194）前后四年左右的时间里，刘备先后在平原任县令、国相。在刘备早期的政治军事生涯中，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阶段，是他前十年奋斗的成果，也是他从“布衣白身”跻身于封建统治阶级上层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可以说，平原是刘备走向全国，创立霸业，实现“匡扶汉室”政治抱负的新的起点。在这里，他积累了丰

^① 《三国志》卷三二《蜀书·先主传》。下同。

富的政治经验，博得了百姓的拥戴，贤德之名远播四方。

当时，平原地广人稀，田园荒芜，老百姓生活异常困苦。刘备到任后，以关羽和张飞为别部司马。一方面招兵买马，积草囤粮，积极扩充自己的实力；一方面安抚百姓、轻徭薄赋、招民垦荒，恢复被战乱破坏的农业生产。为了争取地方豪强的支持，刘备十分注意礼贤下士。当时，天下大乱，许多有识之士背井离乡、颠沛流离，刘备尽可能把他们召集到平原，与他们同席而坐，同盘而食，给予很高的礼遇。有个叫刘平的人，平时看不起刘备，于是派一名刺客到刘备处，准备伺机刺杀他。刘备并不知道刺客的来意，热情招待了他，刺客被刘备的行为所感动，便以实情相告。从此，刘备招贤纳士的名声更大了，“士之下者，必与同席而坐，同簋而食，无所简择，众多归焉”。正是借着这种名声和他的出身，刘备才得以在当时纷乱的时局中脱颖而出。

在平原民间，为官怜恤百姓疾苦，重视发展经济，崇礼重义、以德服人，至今仍流传着“巧种罗汉钱”、“偶植盘龙柳”、“仁德感义士”、“首善孝行街”、“育英办义学”等故事。

“巧种罗汉钱”。刘备上任之时，正值战乱之后，土地荒芜，百姓流离失所，他心里非常难过。为鼓励垦荒，他率先垂范，套上自己的马，亲自耕种。忽听犁下一声脆响，刘备俯身一瞧，发现了一枚罗汉钱。刘备心生一计，发出文告，声称当年汉武帝曾亲耕于平原，散埋罗汉钱，希望种钱得金。许多人下田耕地，刘备命士卒助耕，乘机把钱扔在地里，百姓发现了钱币，信以为真，奔走相告，于是男女老少纷纷下田耕地，于是大片的荒地被打开垦出来，变成了良田。

“偶植盘龙柳”。由于粮食欠收，民不聊生，刘备非常忧虑。刘备问民饥苦，百姓都说，已经断炊了。刘备说：“用河堤上苇柳，编篓织席，难道不能换钱粮吗？”百姓都说不会。这是刘备的老本行。于是他亲自教民，通宵达旦。关羽、张飞来找刘备，张飞夺过刘备的柳筐扔到河里，结果柳筐见水生根，沿河长满柳树，形如盘龙。这种柳树枝干粗短，柳条细长，七弯八曲，极有韧性，最适合编织筐篓。老百姓亲切地称之为“盘龙柳”。

“仁德感义士”。刘备在平原多施仁政，除暴安良，豪强恶霸都恨刘备，于是派刺客暗杀他。刺客在店中饮酒，听到的都是对刘备的赞誉之声，他怀疑是刘备沽名钓誉。于是夜间潜入署衙，伏在梁上，见备勤政，心生敬意。深夜，厨子做了一碗鸡汤，让刘备补补身子。刘备生气地说：“百姓挨饿，我怎么能忍心奢侈！”刺客被刘备的仁义所感动，实情相告。

“首善孝行街”。刘备教化百姓，民风趋于改善。有一天，一老太太在路边啼哭，说他的儿子、儿媳不孝，常常不给饭吃，忍饥挨饿。刘备见老人衣衫褴褛，面容憔悴，深感同情，命关羽给老人拿来吃的，又让张飞把老人背到署衙。老人的儿子听说后，感到非常惊讶，到衙前请罪。刘备不加责备，老人的儿子羞愧难当。数日后，刘备才将老人送出，见老人衣衫整洁、面色红润，老人的儿子痛哭悔悟。后孝道大行，世称孝行街。

“育英办义学”。刘备兴办义学、培养人才。他募捐集资，兴办平原书院。四方名儒纷纷慕名而来，讲学传道。刘备还广泛征集图书典籍，兴文重教。平原旧城的东南隅，过去有

学府，称文庙，世传就是刘备当年所办书院处，至今文脉尚存。

刘备在平原的故事是他“仁和”与“恤民”思想的集中反映。在平原任职之时，他体察民情、抚恤百姓、重视农桑、发展经济，做了一些顺应历史发展的事情，从而赢得了民心，为其以后因“人和”而建基立业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

这段时间，刘备在军事上亦有建树。北海相孔融被黄巾军首领管亥围于都昌城（今山东昌乐），管亥攻城甚急，都昌城危在旦夕。孔融欲告急于刘备，派太史慈突围至平原。太史慈对刘备说：“今管亥暴乱，北海被围，孤穷无援，危在旦夕。以君有仁义之名，能救人之急，故北海区区，延颈恃仰，使慈冒白刃，突重围，从万死之中自托于君，惟君所以存之。”刘备感慨答曰：“孔北海知世间有刘备邪！”^①于是领兵三千东征，解孔融之围。

兴平元年(194)，徐州牧陶谦被曹操所围，求救于刘备。刘备率军救援，曹操撤军。陶谦病重，对别驾糜竺说：“非刘备不能安此州也。”^②陶谦死后，糜竺率众请刘备。刘备再三推让，典农校尉陈登、北海相孔融都劝刘备当仁不让，接管徐州。于是刘备离开平原，南下徐州，开始了与群雄逐鹿中原。

二、二袁鏖战平原城

刘备离开平原不久，袁绍打败公孙瓒，占领黄河以北广大地区，领青、幽、并、冀四州。袁绍封其长子袁谭为青州刺史，领平原、齐、北海、安乐、东莱等郡，袁谭坐镇平原城。

建安五年(200)十月，曹操与袁绍在官渡决战，袁绍大败，逃回河北，不久发病而亡。袁绍死后，其地分裂为四：长子袁谭领青州，次子袁熙领幽州，幼子袁尚领冀州，女婿高幹领并州。袁绍在时，宠爱幼子袁尚。袁绍死后，袁绍后妻刘氏勾结谋士审配、逢纪，搞了一个袁绍的假遗嘱：立袁尚为嗣子，继为冀州牧。长子袁谭没能继承父位，又处处受袁尚的压制，兄弟之间的裂隙越来越大。袁尚派袁谭去镇守黎阳，抵御曹操，可是只拨给他几千人马。袁谭怕曹军渡河，请袁尚增兵。袁尚却想：给他增兵，打败了曹操，他就会和我争夺冀州，不如借曹操的刀杀他。袁尚不但不增兵，反而派逢纪做监军，去监督袁谭。袁谭一怒之下杀了逢纪，二袁彻底决裂了。

曹操企图大军北上，吞并河北四州。谋士郭嘉认为时机不到，他对曹操说：“等待袁氏兄弟发生内讧，然后再各个击破，事半功倍。”曹操也觉得，袁氏废长立幼种下的祸根必然酿成内乱，不如隔岸观火，坐享其成。果然，曹操刚刚退军，二袁便发生内讧。建安七年(202)，袁谭被袁尚打败，退保平原。袁尚亲自率兵追赶，把平原城团团围住。袁谭困守平原，坚壁清野，深沟高垒。袁尚城下督战，昼夜猛攻。二袁鏖战平原城，兄弟相残，势不两立。

平原城虽坚，但城小粮缺，城内士兵昼夜苦战，疲惫不堪。袁谭内无粮草，外无救兵，渐渐不支，竟然向曹操求救。曹操本来已经统兵南下准备吞并刘表，听说二袁内讧，袁谭求救，认为机会难得，马上回军渡黄河，抵黎阳。袁尚急忙撤军，退守邺城（冀州治所，今河

^① 《三国志》卷四九《吴书·太史慈传》。

^② 《资治通鉴》卷六一。下同。

北临漳县西南),准备以逸待劳与曹操决战,平原之围终于被解。袁谭求救于曹操,无疑是饮鸩止渴,引狼入室。曹操出兵的目的决非为解平原之围,而是浑水摸鱼,假道伐虢,一箭双雕。袁谭本来就是假投降,曹操心里明白,可是为了稳住他,还是派使者去平原安抚,并与袁谭约为儿女亲家。袁谭心里有鬼,假意应允,还约曹操一同去打邺城。曹操认为邺城为袁氏老巢,实力尚存,一时很难攻下。若强攻不下,陷入持久,袁氏兄弟必联合,那时曹军将陷入被动。因而,曹操仍取郭嘉隔岸观火之计,借口军粮不足,暂时回军,密切注视河北动向,等待时机,枕戈待发。

袁尚不知道这是曹操的计策,就在建安九年(204)春,亲率大军,二次进攻平原。袁尚来势汹汹,袁谭不能抵挡,再次求救于曹操。曹操趁火打劫,率精锐迅速北上,采取围魏救赵之计,乘虚而入,直逼袁尚的老巢邺城。袁尚放弃平原,仓惶回救。曹操围城打援,击败袁尚,占领邺城。曹操打败袁尚,接下来就要收拾袁谭了,平原城中的袁谭末日来临了。

袁谭企图趁袁尚兵败之际,扩大地盘。在曹操兵围邺城之时,袁谭乘机派军攻取甘陵、安平、勃海、河间等地,曹操岂能坐视,攻占邺城后,立即进攻平原。曹操以大将徐晃为先锋,直取平原。袁谭兵败,放弃平原,逃往南皮,曹军穷追不舍,袁谭兵败被杀。建安九年(204)十二月,曹操“入平原,略定诸县”^①。自此,德州区域并入曹操的势力范围。

三、后赵、后燕、北魏与德州

司马氏取代曹魏,建立了西晋政权,统一了三国。仅过了十余年,晋惠帝元康元年(291)就爆发了“八王之乱”。司马氏八个封王,为了争夺政权,混战了十六年,西晋的统治分崩离析,北方、西部少数民族匈奴、鲜卑、羯、氏、羌等“五胡”,乘虚而入,进入中原,纷纷建立政权,历史进入了五胡十六国时期。从西晋灭亡(316)到北魏统一北方(439),德州区域先后属后赵、冉魏、前燕、前秦、后燕、南燕等政权。这段时间,德州屡遭兵祸,战乱不断,民不聊生。

德州区域的战乱始于西晋末年。经过长达十六年的“八王之乱”,西晋统治危机全面爆发,各地纷纷起兵。305年,“八王之乱”的罪魁之一成都王司马颖在战乱中被杀,其部将公师藩以给司马颖复仇为名,在鄆县(今德州夏津县)起兵反晋,战乱遍及德州各地。石勒、汲桑也率部来归。石勒,字世龙,羯族部落首领的后代,少年时被并州刺史司马腾掠卖到山东茌平。汲桑为茌平官马牧场牧帅。石勒善于相马,因此与汲桑结识。石勒招集王阳等8骑为“群盗”,打家劫舍。不久又有郭敖等10人加入,号称“十八骑”。石勒剽悍勇猛,成为群盗首领。石勒联合汲桑,纠合几百人,投奔了公师藩。石勒成为公师藩的急先锋,率军攻下了平原、鬲、高唐、武城等县,横扫鲁西北,声威大震。青州都督苟晞率军平叛,公师藩战败被杀。

公师藩死后,汲桑、石勒继续战斗,转战邺城、乐陵、平原、阳平等地。他们攻掠郡县,释放囚徒,招纳流民,队伍迅速扩大。汲桑自称大将军,以石勒为讨虏将军,担任前驱。永

^① 《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

嘉元年(307)五月，石勒大败魏郡太守冯嵩，一举攻克邺城，杀了都督司马腾，接着又攻下乐陵(今乐陵东南)，杀了幽州刺史，然后在平原一带与苟晞等相持数月，大小30余战，互有胜负。九月，汲桑和石勒为苟晞所败，死万余人，被迫分成两部。一部由汲桑率领，向北转移，在乐陵汲桑遭到伏击，兵败被杀。另一部由石勒率领，向西北转移。于当年十月到达平阳(今山西临汾)，投靠了匈奴贵族刘渊，石勒被封为辅汉将军、平晋王。此后，石勒作为刘渊的部将转战于山东、河北、河南地区，队伍发展到10余万人。石勒所向披靡，先后于永嘉三年(309)攻克信都(今河北冀县)，杀冀州刺史王斌；永嘉五年袭鄆城，杀兖州刺史袁孚；永嘉五年袭蒙城，擒青州都督苟晞；又在苦县宁平城(今河南邯郸城东北)消灭了太尉王衍率领的西晋主力军10余万人。永嘉六年进据襄国(今河北邢台)。接着占领了平原、清河、乐陵、乐安等地，德州区域全部被石勒占领。建兴二年(314)，石勒北袭蓟城(今北京城西南)，擒幽州刺史王浚。至此，石勒已成为据有华北地区的一支强大割据武装。319年，石勒自称赵王，建立赵国，史称后赵，都襄国。从此德州区域处在后赵的统治之下。

后赵初期，北方原西晋将领，纷纷拥兵抗赵，乐陵太守邵续是当时北方抗赵武装的领袖。邵续，字嗣祖，魏郡安阳(今河南安阳西南)人。西晋末年为乐陵太守，屯厌次(今陵县神头镇)。建兴二年(314)三月，西晋镇守华北的主帅大司马王浚被石勒所杀，原西晋华北一带的守将群龙无首，都被迫归附石勒，邵续也假装归附，以保存实力。邵续身处乱世，采取了一系列自保措施。首先，招抚流民，发展生产。当时，鲁西北地区从公师藩起兵以来，战乱不止，人们流离失所，背井离乡，沦为流民。邵续把流民组织起来，屯田垦荒，发展农业生产，四方流民纷纷归附。邵续在今宁津、陵县、乐陵、庆云一带进行了大规模垦田建设，这一带终于安定下来，从而赢得了百姓的拥戴。其次，联合西晋旧将及北方少数民族部落，建立广泛的同盟，以图东山再起，收复华北。勃海郡(河北沧州一带)太守刘胤率众归附邵续，内迁到蓟州一带的辽西鲜卑部落首领段匹磾也愿听其号令。邵续实力大增，待机而起。西晋灭亡后，皇族司马睿于316年在建康(今南京)称帝，是为晋元帝，建立东晋政权。邵续得知后，非常振奋，派刘胤出使建康，归服东晋。司马睿留刘胤为参军，以邵续为平原太守、平北将军。

邵续归晋，石勒闻讯震怒，立刻将留在营中任督护的邵续之子邵义杀掉，又率骑兵围攻厌次。邵续在厌次城下与石勒展开激战，坚守城池，同时向盟友段匹磾求援。段匹磾，辽西鲜卑段部人，西晋末年率部内迁，被安置在蓟州一带。段匹磾派其弟段文鸯救邵续，石勒素来畏惧鲜卑兵，听说段文鸯率兵来救，便撤围退兵而去。邵续击退石勒，名声大震。晋元帝任命他为冀州刺史，统辖华北一带。各地纷纷响应，邵续的女婿刘馥在平原一带起兵反赵，被任为平原内史。段匹磾也因为石勒所逼，被迫放弃蓟州，率部众来到厌次，投奔邵续。邵续在平原一带组织汉族和鲜卑族军民屯田积谷，发展生产。

东晋太兴三年(320)正月，邵续命段匹磾率主力北征，企图夺回蓟州。消息走漏。石勒乘机派其侄石虎率兵围攻厌次，由于主力北征来不及回救，厌次空虚，石虎连连得手，连下

邵续别营 11 处。邵续苦苦支撑，但由于众寡悬殊，形势非常危急。邵续准备拚死一战，夜间率部出击，企图偷袭石虎的大营，但中了石虎的埋伏，不幸被俘。石虎命邵续招降城内部众，邵续对城上众将大呼曰：“吾志欲报国，不幸至此。汝等努力，勿有二心。”^① 邵续的儿子邵缉又坚守厌次长达十三个月，最后才被后赵征服。至此，鲁西北地区抗击后赵统治的斗争暂告结束，德州区域全部被后赵占领。

后赵末期，诸皇子为争夺皇位而自相残杀，汉人冉闵乘机夺取政权，于永和六年(350)建立了冉魏政权。德州区域又处于冉魏的短暂统治之下。但冉闵大杀胡人，激化了民族矛盾，使自己遭到各少数民族武装的包围夹攻，永和八年(352)，北方鲜卑族慕容部乘乱大举南下，灭掉冉魏。德州地区再次陷入战乱之中。

此时，东晋也乘机招抚北方各州，于是德州诸郡县纷纷宣布归晋。鲜卑族慕容部消灭冉魏后，其首领慕容俊在蓟城(今北京)称帝，史称前燕。此后，前燕与东晋展开了一场争夺山东地区的战争。永和八年(352)四月，燕将慕容霸进军绎幕(今平原西北)，开始了争夺德州地区的战争。镇守绎幕城的是段勤与段思聪兄弟。段氏兄弟招抚胡汉各族民众万余人，成为当时德州地区实力最强的一支武装力量。慕容霸大举进攻绎幕城，段勤、段思聪率部抵抗。但绎幕城小粮缺，慕容霸长期围困。段氏兄弟内无粮草，外无救兵，被迫投降。永和九年(353)十一月，由于燕军大兵压境，乐陵守将朱秃、平原守将杜能、清河(今山东临清东北)守将丁饶、阳干(今山东莘县)守将孙元等纷纷降燕，燕主慕容俊以朱秃为青州刺史，治厌次(今陵县神头镇)；以杜能为平原太守，丁饶为立节将军，孙元为兖州刺史，各自留驻原地。至此，鲁西北地区均被前燕占领。

这种局面维持了不到 20 年，德州区域再次陷入战乱。西方氏族首领苻坚建立的前秦强大起来，入主中原，灭了前燕。德州区域沦为前秦的统治。太元八年(383)，前秦在淝水被东晋打败，前秦的统治迅速瓦解。鲜卑族慕容部首领慕容垂趁机脱离前秦，自立为帝，都中山(河北定县)，史称后燕。后燕向南扩张，进攻德州区域。

太元十年(385)十一月，绎幕人蔡匡据城反燕，遭到燕将慕容麟、慕容隆联兵进攻。东晋泰山太守任泰率兵前来援救，进至蔡匡营垒南 8 里，被燕军发觉。燕军遂暂时放弃对蔡匡的进攻，集中全力攻击任泰，大败晋军，斩千余人。蔡匡见援军无望，被迫投降。但燕军进行了残酷的镇压，不仅杀了蔡匡，而且大规模野蛮屠城，今平原、武城一带出现了“尸骨露于野，百里无炊烟”的荒凉景象。德州区域在残酷地镇压下，沦为后燕的统治。

永嘉十六年(439)，鲜卑族拓跋部建立的北魏入主中原，统一了北方，结束了十六国混乱割据的局面。德州区域从此处于北魏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统治之下。这期间，德州区域相对安安，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从北魏末年起，政局动荡不安，农民起义、军阀混战连年不断，德州再次陷入长期的战乱之中。

北魏孝昌二年(526)，鲁西北地区爆发了反抗北魏的农民起义。齐州平原(今平原县)百

^① 《晋书》卷六三《邵续传》。

姓刘树聚众而起，得到各族人民响应，攻城掠地，多次击败魏军。北魏齐州刺史元欣任命平原人房士达为将，房士达率军镇压，采取野蛮的屠杀政策，才勉强将起义镇压下去。德州以南地区惨遭兵祸，十室九空。同年，齐州又发生了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广川百姓刘钧聚众反魏，并建立政权，委任官吏，自行设立大行台。清河百姓房项也聚众而起，自任大都督，占据昌国城(今武城县境内)。北魏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德州百姓惨遭屠杀。与此同时，河北大起义爆发，推举鲜卑人葛荣为首领。葛荣在博野白牛逻(今河北蠡县)斩杀北魏主帅章武王元融，声威大振。葛荣自称天子，国号齐。但葛荣极端仇视汉人，率军南下时，大开杀戒，破信都时，“逐出居民，冻死者十六七”；攻下沧州时，“居民死者十八九”^①。当时鲁西北也惨遭葛荣的杀掠，德州区域首当其冲，百姓纷纷逃亡，流离失所。

经过农民大起义的打击，北魏统治迅速瓦解，各地军阀拥兵割据，战乱不断。在镇压农民起义中起家的尔朱荣控制了北魏政权，尔朱荣部将高欢割据河北与之分庭抗礼。双方在华北地区展开了大混战。德州区域也被卷入了战争，再次遭受战火的洗劫。最后高欢取胜，占领洛阳。驱逐北魏孝武帝，另立孝静帝，史称东魏，大权尽归高欢，魏帝成为傀儡。而原尔朱荣的另一部将宇文泰则割据关中，与高欢抗衡，另立文帝，史称西魏，宇文泰执掌政权。东、西魏相互攻伐，战争不断。公元550年，高欢之子高洋废魏帝自立，改国号齐，史称北齐；不久，宇文泰之子宇文觉也如法炮制，自立为帝，国号周，史称北周。这一时期，德州区域先属东魏，后归北齐。公元576年，北周武帝宇文邕大举东进讨伐北齐，北周军队先在晋阳大败齐军，后在邺城同北齐主力展开决战，北齐后主高纬大败东逃，经平原逃往济州。北周军队尾随追击，战火又在德州区域蔓延。北周大将尉迟勤先占平原郡，再南下济州、青州，齐后主高纬被俘，北齐灭亡。至此德州区域处于北周的统治之下，直至隋朝建立。由于长期的战乱，德州经济残破，土地荒芜，人口锐减，一片荒凉景象。

四、魏晋时期德州人口变迁与民族融合

自初平元年(190)军阀混战至建安十年(205)曹操平定河北，德州境内(时属青州平原郡)连续进行了16年的军阀混战。围绕平原郡的归属，焦和、公孙瓒、袁绍等多年交战，“士卒疲困，粮食并尽，互掠百姓，野无青草”^②，致使境内萧条、土地荒芜，百姓流离失所。后袁绍占领青、幽、并、冀四州，德州所在的平原郡由袁绍占领。袁绍命其长子袁谭为青州刺史，坐镇平原。袁谭穷兵黩武，“北排田楷，东攻孔融，曜兵海隅。肆志奢淫，不知稼穡之艰难”^③，给百姓带来的是更大的灾难。官渡之战后，袁绍败死，袁绍二子袁谭、袁尚为争夺河北统治权互相残杀，混战再起，两次大战于平原，德州百姓深受其害。直到建安十年(205)，曹操灭二袁，占领河北，德州战乱才得以暂时平息。

由于军阀的屠杀、掠夺和混战，加上连年天灾，不仅使无数百姓死于战乱和饥荒，也迫使许多人离乡背井，流亡外地，其中一部分去了辽东。据《汉书·刘虞传》记载：“青、徐

① 《魏书》卷九《肃宗纪》。

② 《资治通鉴》卷六〇。

③ 《三国志》卷六《魏书·袁绍传》。

士庶，避乱归虞者百余万口。”足见当时人口流往东北的数量十分惊人。另一部分则去了江东。如平原人刘惔，举族避乱江东，先为庐陵太守孙辅军师，后又得孙权器重，成为客居江东的北方名士。百姓的大量死亡和外流，使得人口锐减，“是时天下户口减耗，十裁一在”^①，德州是战乱的重灾区，人口减少更为严重。

自曹操统一北方，至魏、西晋百年时间，德州区域比较安定，经济有所恢复与发展，人口逐渐增加，西晋太康初年，平原郡达到31000户^②，但这还是远远低于汉代人口峰值时的户数。

从西晋末年到十六国时期，德州经历了持续的战乱。西晋永安二年（305），公师藩在鄆县（今夏津县）起兵反晋，战乱迅速遍及德州各地。羯族首领石勒也乘乱起兵与公师藩合兵一处，同西晋青州都督苟晞大战于平原，双方相持数月，大小30余战，德州区域饱受战乱摧残，残败不堪。后来，石勒战领中原，建立后赵政权，乐陵太守邵续拥兵反抗，进行了近十年的抗赵战争，德州百姓雪上加霜。永和八年（352），北方鲜卑族慕容部建立的前燕，乘乱大举向南扩张。燕将慕容霸进军鲁西北，战乱再起。太元八年（383），鲜卑族慕容部首领慕容垂建立后燕，向南扩张，进攻德州区域，绎幕人蔡匡据城反燕，遭到燕将慕容麟、慕容隆联兵进攻。燕军破城后，进行了残酷的镇压，不仅杀了蔡匡，而且大规模野蛮屠城，百姓十不存一。公元439年，鲜卑族拓跋部建立的北魏入主中原，统一了北方，终于结束了十六国混乱割据的局面。

从西晋末年公师藩起兵（305年）至北魏统一（439年），德州前后经历了长达134年的战乱，经济残破不堪，百姓纷纷逃亡，人口锐减。十六国时期，平原郡比西晋时期人口又减少了半数以上，最多不过15000户，是历史上本区人口最少的时期之一。在北魏统治的一个多世纪里，德州区域比较安定，特别是北魏中期，经北魏孝文帝改革，德州经济得到较快的发展，人口得到较快增长。再加上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民族的迁入，人口数量超过了西晋峰值时的人口总数。

从北魏末年（526年）至北周统一北方（576年），德州又一次经历了长达半个世纪战乱。北魏孝昌二年（526），齐州平原（今平原县）百姓刘树聚众起义，魏将房士达采取野蛮的屠杀政策，德州以南地区惨遭兵祸，十室九空。不久，广川百姓刘钧聚众反魏，北魏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德州百姓惨遭屠杀。孝昌二年（526），葛荣率军攻入鲁西北，德州百姓惨遭葛荣的杀掠，幸存者纷纷逃亡，流离失所。农民起义被镇压后，军阀割据混战随之爆发。尔朱荣、高欢、宇文泰等长期混战，德州区域数次卷入战争，遭受战火的洗劫。百姓流离失所，人口再次出现锐减的现象。

德州区域在魏晋南北朝近四百年的时间里，虽然战乱不断，但民族大融合是这一时期积极的历史现象。永嘉三年（309），石勒率匈奴、羯等民族组成的武装攻入华北，建立后赵政权，民族冲撞与融合随即开始。乐陵太守邵续屯驻厌次（今陵县神头镇），邵续“绥怀流散”，

① 《三国志》卷六《魏书·张绣传》。

② 《晋书》卷一四《地理志》。

各族流民“多归附之”^①。邵续招集各民族百姓三万余口，屯田兴农，成为德州民族融合的摇篮。辽西鲜卑人首领段匹磾率部众南迁投奔邵续，一时部众达十余万人，邵续在平原一带组织汉族、鲜卑族军民屯田积谷，加快了民族融合的步伐。后来，前燕、前秦、后燕、北魏等少数民族政权先后统治德州，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民族也先后迁入德州，与当地汉族群众共同生活，他们向汉族人民学习农耕、纺织等生产技术，逐步改变了逐水草而居、车马为家的游牧方式，走上了定居的农耕生活。北魏中后期，这些少数民族后裔，开始着汉服、说汉语、学汉文，与汉族通婚，采用汉姓，在生活习俗上逐渐汉族化。与此同时，德州许多汉族士人加入少数民族政权，有的甚至成为政权中的核心人物。如著名世家大族武城崔氏和张氏家族，在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中世代为官。武城崔氏家族中的崔宏、崔浩、崔亮、崔休、崔光、崔长文等都先后成为北朝历代重臣，均为北朝各个时代汉化改革的策划者及民族大融合的积极推动者。武城张氏家族在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中的地位也非常显赫，如张氏四世祖张幸先为南燕东牟太守，后为北魏平陆侯、平远将军、青州刺史；张幸之子张准为北魏青州刺史、平陆侯；张准之子张灵真为北魏平陆侯；张灵真之子张彝在北魏政权中先后任主客令、太中大夫、黄门侍郎、太常少卿、散骑常侍、门下侍中、尚书、安西将军、征西将军等职，出将入相，成为北魏名臣；张彝的长子张始均为员外常侍、兼左民郎中，次子张仲瑀为司空祭酒、给事中、尚书郎，三子张珉为著作佐郎；张始均之子张晏之为北齐兖州刺史等。他们对民族融合都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张彝就是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的主要策划人之一，他主张迁都洛阳及汉化改革，促进了鲜卑政权的封建化和汉化，推动了民族大融合。

第二节 武城崔氏世家文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些“名门望族”，以家传儒学、礼法为家学门风，以广占田产佃客为经济基础，以世代为官封爵为政治保障，以家族血缘关系为维系纽带，形成了享有极高社会地位和社会声望的特权大家族，被称为门阀士族。从3世纪至6世纪，门阀士族享有政治特权，居于统治地位。当时，山东、江南、关陇皆有大姓望族盘踞，而山东崔、卢、李、郑四大士族中，以清河郡武城（今武城县）崔氏最为显赫。

崔氏起源于西周时期的齐国。西周建立后，由于姜尚功勋卓著，被分封至齐国，成为齐国的开国君主。姜尚的嫡孙季子被封于崔邑（今山东西北），其后代以邑名为姓氏，这就是崔氏的由来。季子的后代一直是齐国的卿大夫，秦朝时其第17世孙崔意如被封为东莱侯。到了汉朝，崔业继承了这一爵位，在清河东武城（今武城县）定居下来。崔业的弟弟崔仲牟，则另居于博陵安平。此后，二人的后代繁衍生息，到魏晋时发展成为望族大姓。

魏晋南北朝时期，武城崔氏发展到极盛，以家学深厚、宗祖光耀、传承源远、族大人众、门风高雅、贤士辈出而闻名天下。当时无论是朝中权贵，还是地方郡望，甚至皇亲国戚

^①《晋书》卷六三《邵续传》。

都以与崔氏结亲、攀缘为荣耀。

一、崔琰与武城崔氏的兴起

武城崔氏兴起于曹魏，崔琰可谓家族兴起的奠基人。崔琰（159—216），字季珪，三国时期曹魏名士，东汉清河郡东武城（今武城县）人，被称为“武城崔氏始兴祖”。

崔琰少时朴直木讷，不善言辞，爱好击剑，崇尚武功。23岁时被推举为本乡里正。对此，他很感激，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才发奋攻读《论语》、《韩诗》等典籍。29岁时从经学大师、北海郡人郑玄学习经学。184年，黄巾大起义爆发。不久，徐州黄巾军攻破北海，郑玄罢别诸生，外出避难。崔琰的家在北海西北，由于战乱，归道不通，于是崔琰周游于青、徐、兖、豫诸州之间，四年后方得回乡。回乡以后，崔琰读经习武，抚琴练字，自以为娱。

崔琰学识渊博，相貌出众，“清忠高亮，雅识经远”^①，大将军袁绍对他甚为赏识，辟为幕僚。当时，袁绍占有冀、并、青诸州之地，是各军阀势力中最强大的。但是其军纪不整，士卒横暴，甚至经常干出掘坟挖墓的事情来，士庶百姓深以为恨。崔琰于是向袁绍劝谏说：“昔孙卿有言：‘士不素教，甲兵不利，虽汤、武不能以战胜。’今道路暴骨，民未见德，宜敕郡县掩骼埋骸，示憐恤之爱。”袁绍认为崔琰说得很对，任命他为骑都尉。官渡之战前，崔琰屡次劝谏袁绍，要发展生产，稳定内部，不要轻易开战。但袁绍不听劝谏，结果一败涂地。官渡之战后，袁绍病死，其子袁尚、袁谭争权夺位，相互拼杀。两人都极力拉拢崔琰，崔琰称疾固辞，被关进监狱，幸亏阴夔、陈琳等人从中斡旋，才没有被杀。

205年，曹操攻冀州，破袁氏兄弟，征崔琰为别驾从事。一次，曹操得意洋洋地对崔琰等人说：“冀州真是个大州啊！昨天我查了一下户籍，可得30万兵。”崔琰马上劝谏说：“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冀州因袁氏兄弟相争，黎民百姓暴骨原野，已经是痛苦不堪，未闻明公仁义先行，救民于涂炭，反而首先校计甲兵，这哪里是老百姓所期望的呢？”曹操部下都为崔琰捏一把汗，想不到曹操听后却神情严肃而庄重地向他表示谢罪，诸幕僚宾客“皆伏失色”。

206年，曹操征并州，留长子曹丕守邺城，拜崔琰为曹丕之师。曹丕行为不羁，学业荒废，经常易服换车外出田猎。崔琰引经据典、以史为鉴，苦心劝导，曹丕方才悔悟。曹操称赞崔琰说：“君有伯夷之风，史鱼之直。”对崔琰的器重可见一斑。不久，曹操任命崔琰为东曹掾，掌选官之权。

当时，崔琰与毛玠同在选曹，共掌选举。史载“时毛玠、崔琰并以忠清干事，其选用先尚俭节”。崔琰秉公奉法、以“德”举人，“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拔敦实，斥华伪，进冲逊，抑阿党。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至乃长吏还者，垢面羸衣，独乘柴车，军吏入府，朝府徒行，吏洁于上，俗移于下”。由此形成清正廉明之风，吏治为之一振。曹操由衷叹服：“用人如此，使天

^①《三国志》卷一二《魏书·崔琰传》。下同。

下人自治，吾复何为哉！”^①在此任职期间，崔琰先后对司马懿、从弟崔林、孙礼、卢毓、邢原、张范、杨训等人进行了推荐评价，从而为这些人入仕及升迁提供了依据。史载“魏氏初载，（崔琰）委授铨衡，总齐清议，十有余年。文武群才，多所明拔。朝廷归高，天下称平”。

②

崔琰的才德，深得曹操的赏识，擢拔为尚书。当时，曹操很赏识次子曹植的文才，打算立为太子，但曹丕毕竟是长子，所以心里很矛盾，于是密访诸臣，想听听大臣对此事有何看法。一些大臣不敢直言，崔琰却说：“《春秋》之意，立子以长，曹丕仁孝聪明，应该继承大统。”曹植是崔琰哥哥的女婿，曹操见崔琰如此公正坦诚，赞叹不已，于是升崔琰为中尉。

崔琰“声姿高畅，眉目疏朗，须长四尺，甚有威重”，所以“朝士瞻望，而太祖（曹操）亦敬惮焉”。建安二十一年（216），曹操称魏王，匈奴使者前来求见。曹操认为自己“形陋不足以威远人”，乃让崔琰代之，而自己却“捉刀立床头”。事后，曹操派人问匈奴使者：“魏王如何？”匈奴使者回答说：“魏王雅量非常，然床头捉刀人，真英雄也。”后来，人们便将代替别人做事称为“捉刀”，代人作文为“捉刀代笔”。

崔琰之兄女嫁曹植，崔氏与曹家结为儿女亲家，崔氏家族的地位更为显赫。崔琰的从弟崔林也是在冀州随其同仕曹操的，然后步步升迁，成为武城崔氏兴起的另一关键人物。曹操平冀州，擢崔林为冀州主簿、别驾从事。曹操任丞相后，擢升崔林为丞相掾属，后又迁御史中丞，亦成为曹操的心腹重臣。

曹操加封魏王后，曾经被崔琰推荐为官的杨训上表称赞曹操功德。当时有人讥笑杨训为人虚伪，并说崔琰推荐错了人。崔琰看过杨训的上表后，给杨训写信说：“省表，事佳耳！时乎时乎，会当有变时。”崔琰原本是想说那些议论杨训的人不明事理，虽然现在大家都骂杨训，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来大家会理解的。没想到有人趁机对曹操说，崔琰有不规之心，这封信透露出的分明是“傲世怨谤”，是对丞相的不满。曹操听后大怒，说道：“民谚说‘生女耳’，‘耳’不是什么好词，‘会当有变时’，这分明是出言不逊。”于是将崔琰罚为徒隶，并施以髡刑。

这种处分对于崔琰这样的人来说是很重的。崔琰本是一表人才，道德高尚，很看重自己的形象和名誉，把他的头发剃掉，穿上囚服做苦工，无疑就是对他的极大羞辱。但是崔琰表现得却坦然自若，前来拜访他的门客仍然门庭若市，这令曹操大为恼火。曹操晚年性情多疑，认定崔琰“恃旧不虔”、“腹诽心谤”，于是下令赐死，崔琰遂自杀。

作为汉魏重臣，崔琰文武全才、德高望重，光明磊落、一身正气。崔琰之死，实在是那个时代的悲剧。他的才华，他的相貌，他的威望，都为曹操所忌。陈寿在《崔琰传》中评价说：“太祖性忌，有所不堪者，鲁国孔融、南阳许攸、娄圭，皆以恃旧不虔见诛。而琰最为世所痛惜，至今冤之。”

崔琰虽死，却丝毫没有遏制住武城崔氏的发展势头。曹魏建立后，崔林在中央相继担任

① 《资治通鉴》卷六五。

② 《三国志》卷一二《魏书·崔琰传》裴松之注引《先贤行状》。

尚书、大鸿胪、光禄勋、司隶校尉，官位不断上升。景初元年(237)，司徒、司空并缺，散骑侍郎孟康推荐崔林，说他是“台辅之妙器，袞职之良才”^①。卢毓评价崔林“亮直清方”^②，可堪司徒之任。景初二年，崔林即被任命为司空，封安阳亭侯，邑六百户，“三公封列侯，自林始也”^③，开了三公封列侯的先例。不久又晋封为安阳乡侯，魏明帝又赐崔林食邑，封其一子为列侯。正始五年(244)十二月卒，谥为孝侯。崔林在曹魏辅佐曹操、曹丕、曹睿、曹芳，为四世老臣，其地位之高达到了顶峰，足以显示出武城崔氏在曹魏时期已经开始在政治上占有一席之地。

武城崔氏经崔琰、崔林兄弟的经营，至西晋继续发展，成为名门望族。崔林死后，子崔述袭爵安阳乡侯。崔林的族弟崔融一支在曹魏时期也很显赫，崔融之子崔温任中书令、崔温子崔就任常山太守、崔就子崔公安任上谷太守，祖孙三代均居官五品以上。西晋时期，武城崔氏的世家大族地位进一步巩固。崔琰一支：崔琰孙崔谅为西晋尚书、大鸿胪、中书令；崔谅之子崔毖平州刺史。崔林一支：崔林子崔随为西晋尚书仆射、崔随子崔玮为太子右卫率、崔玮子崔悦为司空从事、崔悦子崔浑为上党太守，崔林祖孙五代冠冕相袭。崔融一支：崔融裔孙崔岳为散骑侍郎、司徒、关内侯。

综上所述，武城崔氏在曹魏至西晋时期，世代为官、冠冕相袭，长盛不衰，标志着“山东甲族”——武城崔氏的兴起。

二、崔宏、崔浩与武城崔氏的兴盛

武城崔氏崛起于曹魏，巩固于西晋，发展于十六国，至北朝时期达到鼎盛，崔氏家族硕儒名士辈出、高官显贵蝉联，崔宏、崔浩父子就是其中的代表。

崔宏(?-418)，字玄伯，历仕前秦、后燕、北魏，历任吏部侍郎、尚书左丞、黄门侍郎、吏部尚书、天部大人，先后封寿光侯、白马公，赠司空、谥“文贞公”，是武城崔氏的代表人物。

崔宏的六世祖崔林仕曹魏，官至御史中丞、司空，祖父崔悦仕后赵石虎，官至司徒左长史、关内侯，父亲崔潜仕前燕慕容暉，为黄门侍郎，“并有才学之称”^④。崔宏“少有隼才”，从小受到家庭的熏陶和严格的教育，耳濡目染，从而积淀了他出众的才学，少年时期，就被称为“冀州神童”。

前秦统一北方后，苻坚以弟苻融为冀州牧。苻融对崔氏甚为礼敬，拜崔宏为阳平公侍郎、领冀州从事。崔宏“出总庶事，入为宾友，众务修理，处断无滞”，俨然如仕途老手。苻坚“闻而奇之”，征为太子舍人，但是崔宏因为其母有病，需要照料而婉言辞谢了。后来又升其为著作佐郎。当时，太原人郝轩以知人闻名于世，他曾称崔宏有“王佐之才，近代所未有也”。淝水之战后，苻坚被姚萇攻杀，前秦灭亡。385年，慕容垂建立后燕政权，以崔宏为

① 《三国志》卷二四《魏书·崔林传》。

② 《三国志》卷二二《魏书·卢毓传》。

③ 《三国志》卷二四《魏书·崔林传》。

④ 《魏书》卷二四《崔玄伯传》。

吏部郎、尚书左丞、高阳内史。崔宏“立身雅正，与世不群，虽在兵乱，犹励志笃学”，从政能力不断提高。他为官清廉，对钱财一向看得很轻，家中几无资产，因而“妻子不免饥寒。”^①

395年，北魏道武帝拓拔珪领兵攻后燕，进驻常山（今河北正定），崔宏东逃。道武帝久闻崔宏大名，为了得到以崔宏为代表的山东汉族地主的支持，他特派遣轻骑追之于海滨，押回军帐，与之交谈后越发感佩崔宏的才智，随即拜为黄门侍郎，与另一著名士族张衮“对掌机要，草创制度”。此后，崔宏为吏部尚书，主持制定军国大制，“制官爵、撰朝仪、协音乐、定律令、申科禁”，并于天兴元年（398年）建议改国号为“魏”，深受道武帝倚重。崔宏虽然身居要职，“势倾朝廷”，但是却“俭约自居，不营私产，家徒四壁”，甚至“出无车乘，朝晡步上”，就连七十高龄的老母也很难吃上像样的饭菜。道武帝得知后，非常感动，特赐食物。当时，有人讥笑他过于简约，有失大臣身份。崔宏不但不改，反而更加简约。道武帝经常向崔宏询问治国之道，诸如：“古今旧事”、“王者制度”、“治世之则”、“明君贤臣”、“往代废兴”等等，崔宏对答如流，且深入浅出，借以劝谏道武帝以史为鉴，实行“仁政”。^②道武帝赐崔宏为“白马侯”，加周兵将军，与功臣庾岳、奚斤等同班立朝，而对崔宏的“信宠”程度则远远超过二人。

天赐六年（409），道武帝被杀，明元帝拓拔嗣即位。崔宏奉诏与宜都公穆观巡行郡国，查处不法官吏，与长孙嵩共坐朝堂，疏决刑狱，所作所为具称“平当”。当时，由于豪强侵夺，贪吏逼迫，北魏所辖的西河、建兴等地起义不断，明元帝于是召集崔宏、北新侯安同、寿光侯叔孙建、元城侯元屈等问计。元屈主张镇压，崔宏则主张以安民为本，实行大赦，以缓解矛盾，达到标本兼治的目的。明元帝采纳了崔宏的建议，宣布大赦天下。

神瑞初年（414），崔宏与南平公长孙嵩等人“坐止车门右，听理万机事”，共掌军国朝政，明元帝无不言听计从。当年秋，并州羯胡兵数万南下掠夺，朝廷派将军公孙表等率兵阻击，结果公孙表大败而还。明元帝对此忧心忡忡，一筹莫展，群臣皆无良策。崔宏推荐寿光侯叔孙建领兵拒敌。明元帝采纳了崔宏的建议，以叔孙建为平虏大将军，统军北上，不久即讨平了并州羯胡。捷报传来，明元帝立即拜崔宏为天部大人，晋爵“白马公”。

泰常三年（418）夏，崔宏病重，明元帝派侍中穆观等侍臣探望，一夜往返数次。崔宏去世后，明元帝非常痛惜，赠司空，谥“文贞公”。为表达对崔宏的哀悼，明元帝破例以“王礼”治丧，当时，朝中文武群臣及附国渠帅皆会葬，自亲王以下，尽命拜送。孝文帝太和年间（477-500），追录先朝功臣，以崔宏配飨庙庭。

崔宏不仅是北魏杰出的政治家，“总机任重，守正成务”，政绩卓著，而且长于书法，书法造诣自成一家，善写草、隶、行书，与范阳卢谌并称“崔卢”。特别是他的行书，效法钟繇，“特尽精巧”，为世所重，时人引为摹本，可惜没有墨宝传世。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地主居于统治地位。当时，山东、江南、关陇皆有大姓望族盘踞，

①《魏书》卷二四《崔玄伯传》。

②《魏书》卷二四《崔玄伯传》。

而山东崔、卢、李、郑四大士族中，崔姓为首。这些士族大家，往往世代为官，家学深厚，具有儒雅的君子之风和丰富的从政经验。崔宏之后，崔氏家族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一直处于显赫地位。崔宏长子崔浩，官至司徒，袭爵白马公；次子崔简，亦善长书法，历官中书侍郎，征虏将军；三子崔恬，历官给事中，上党太守，荆州刺史。弟崔徽历官中书侍郎、秘书监、龙骧将军，进爵济南公；族人崔宽、崔衡、崔敞、崔钟、崔肱、崔怒、崔模、崔景茂、崔道固、崔景徽、崔景业、崔景渊、崔伯灵、崔伯骥、崔祖龙、崔祖螭、崔祖虬、崔和、崔轨，等等，也为一时俊秀。这一时期，武城崔氏达到鼎盛。

武城崔氏累世公卿，崔宏的长子崔浩（？-450），亦为北魏名臣。崔浩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和熏陶，博闻强记，爱好广泛，文学、儒经、史籍，他都精心研读，玄象阴阳、百家之言等也广泛涉猎。所谓“少好文学，博览经史。玄象阴阳，百家之言，无不关综，研精义理，时人莫及”^①。20岁时，他做了北魏道武帝的侍从——直郎。天兴年间（398-403）又入直秘书省，转为著作郎。因其书法工整，道武帝常让他随从左右，书写诏令。

道武帝晚年，性情多疑，精神失常，经常无故发脾气，动辄杀人，搞得人人自危。群臣平时都躲着他，不敢多说一句话，一退朝就赶快回家，以免不测。崔浩却不同，他恭敬殷勤，慎守职事，有时公务太多，他就加班加点，甚至“终日不归”。有一年寒夜，同僚们都回家了，崔浩仍留在官署伏案书写，道武帝知道后，感叹不已，特命侍从将御粥端给他吃。

永兴元年（409），拓跋珪被其子拓跋绍杀死，明元帝拓跋嗣即位。明元帝即位后，到处网罗“豪门强族”和“先贤世胄”，给他们以高官厚禄，崔家是关东士族的代表，而且早就归附了北魏，所以特别受到礼遇。当时，崔宏拜天部大人，进爵白马公，总掌朝政，崔浩被拜为国子祭酒，赐爵“武城子”，掌全国教育事务。每年郊祀，“父子并乘轩轺”，随从皇帝左右，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时人莫不仰慕。明元帝好经书及阴阳术数，经常让崔浩为其讲解。神瑞元年（414），明元帝在听了崔浩讲《易经》、《洪范·五行传》后觉得很有收获，于是命崔浩参考天文，占卜吉凶。崔浩把天道与人事结合起来，加以综合考察，举其大要，用来占卜各种灾祥变异，多有应验。从此，崔浩更加得宠，“恒与军国大谋，甚为宠密”。崔宏死后，崔浩袭爵白马公，朝廷礼仪，军国要政，都参与议定。泰常七年（422），明元帝私下对崔浩说：“朕近年来疾病缠身，医不见效，诸子又皆年少，一旦不测，为之奈何？”崔浩回答说：“皇长子焘，明睿温和，如为储副（太子）则天子幸甚。”不久，明元帝立拓跋焘为“国副主”，居正殿临朝，司徒长孙崇、山阳公奚斤、北新公安同、太尉穆观、散骑常侍丘堆及崔浩六人共同辅弼。

424年，太武帝拓跋焘即位，鲜卑贵族联合起来排挤崔浩，太武帝只好让他归家暂避，但每有疑议，还是征求他的意见。崔浩性情敏锐通达，长于谋划，是不可多得的治国之才。此时，太武帝也意识到，要想治国安邦、稳定统治，单靠驍悍健勇的鲜卑骑兵是绝难办到的，还得依靠崔浩这样有治国经验的汉族士大夫。于是力排鲜卑贵族的阻挠，重新起用崔浩，以

^①《魏书》卷三五《崔浩传》。

三朝元老封崔浩为东郡公，拜太常卿。此后十余年，崔浩一方面监修国史，改定律令，一方面协助太武帝北击柔然，西灭大夏、北凉，东灭北燕。太延五年（439），北魏统一了北方。此间许多重要战役皆出自崔浩的谋划。

泰常元年（416）八月，东晋太尉刘裕北伐后秦，水陆并进。晋军势如破竹，后秦连连败退。泰常二年（417）三月，刘裕率水军自淮、泗入清河，准备逆黄河西上。为顺利进军关中，刘裕派人向北魏请求假道于魏。明元帝召集群臣商讨对策，满朝公卿大臣群起反对，认为刘裕此举必定图魏，应该出兵阻止刘裕军队沿河西上。只有崔浩站出来反对说：“目前柔然不断向我侵扰，如果向南出兵，则北寇进犯；如果出兵救北方，则南方又面临危险。时下正可以纵刘裕入关，然后堵塞其归路，大功可成。”明元帝还是担心中了刘裕之计，最终没有同意崔浩的建议，派司徒长孙嵩带领步骑十万人驻于黄河以北，并派出数千骑于黄河北岸跟随监视刘裕军。

刘裕兵临潼关，明元帝又问计于崔浩，崔浩回复说：“后秦皇帝姚兴一死，二子交战，众叛亲离。刘裕乘其危前去攻打，兵精将勇，必胜无疑。我们兵马虽强盛，但没有韩信、白起那样的将领。长孙嵩虽有治国才干，但无带兵进攻的能力，不是刘裕的对手，而且我们西有夏国，北有柔然，这两个敌人仍虎视眈眈，我认为应静观其变，切忌贸然出击。”明元帝完全赞同崔浩的看法。

太武帝即位后，面临一个重大决策：先灭夏国还是先伐柔然？鲜卑将领们一致主张打柔然，原因很简单，他们贪的是可以俘获大量人畜，怕的是夏国国都统万城（今陕西省靖边县）坚固难攻。崔浩却没有那么短视，他力排众议说：“柔然来的时候，像飞鸟一样霎时集结；去的时候，也像野兽一样霎时逃散。用大军追赶，一定无法追上，如果用少量的军队追赶，又无法把他们制服。夏国土地不过一千里，政治残暴，刑法酷烈，得不到上天保护和人民的拥护，应当先讨夏国。”当时，夏王赫连勃勃病死，诸子争权，国中大乱，太武帝采纳崔浩的建议，准备亲征夏国。

始光四年（427）五月，拓跋焘留下龙骧将军陆俟督诸军以防柔然，亲率大军离开平城（北魏都城，今山西大同市），从君子津渡过黄河，西征夏国。崔浩认为，劳师袭远，利在速战，因而主张出奇制胜，攻其不备。拓跋焘非常赞同，决定留下所有步兵，自己亲率骑兵奔袭夏国都城——统万城。将领们都认为步兵是攻坚主力，不可舍弃，拓跋焘却力排众议：“用兵之术，攻城最下，必不得已，然后用之。今以步兵，攻具皆进，彼必惧而坚守。若攻不时拔，食尽兵疲，外无所掠，进退无地。不如以轻骑直抵其城，彼见步兵未至，意必宽弛，吾羸形以诱之，彼或出战，则成擒矣。所以然者，吾之军士去家二千余里，又隔大河，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者也。”^①于是拓跋焘不顾群臣反对，执意留下多数将领和所有步兵、辎重，以轻骑三万倍道进击。崔浩则是为数不多的随行大臣之一。

①《资治通鉴》卷一二〇。

六月，魏军至统万城外，分兵埋伏于深谷之中，以少量骑兵至城下诱战。夏军坚守不出，魏帝退军示弱，另遣五千骑西掠，夏军仍不出。崔浩献计，故意让犯死罪的士卒逃走报信，夏人终于上当，以为魏军的粮草已经用尽，军中士卒每天只吃菜，而辎重补给还在后方，步兵也未能赶到，于是引兵出城追击。两军展开决战，当时风雨突起，飞沙蔽天，魏军逆风，不利作战，拓跋焘也马失前蹄，险些被俘。宦官赵倪对拓跋焘说：“如今风雨从敌人方向袭来，我们逆风，敌人顺风，这表明天不助我，更何况将士们饥渴交加，希望陛下暂时避开他们的锋芒，等以后再寻找时机。”崔浩厉声喝道：“所谓作战，贵在一气，气散而军溃。我们千里而来，自有制胜的策略。敌人贪图眼前的胜利，不会停止追击，也没有后继部队。我们应该埋伏一支精兵，适时出击，从侧翼向他们发起突然的进攻。刮风下雨，乃自然现象，怎么可以认定是天不助我！”于是拓跋焘重新部署，全力反攻，夏军全军崩溃。

破夏后，为摆脱柔然与刘宋南北夹击的威胁，拓跋焘决意集中力量打击柔然。公卿大臣们担心宋军乘机北进，竭力劝阻，只有崔浩极力赞成，他很有把握地说：“自刘裕去世后，刘宋元气一直未恢复，对我们构不成直接威胁。我们要完成统一北方的大业，就首先应该拿强国柔然开刀。柔然气焰嚣张，不可一世，必须调集精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长驱直入，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一定能获全胜！”根据崔浩的“出其不意，攻其无备”的谋略，这次远征果然全胜而归，柔然主力溃败。遗憾的是，当魏军进抵琢瑯山时，拓跋焘怕有伏兵，下令班师。后来得到情报，假若魏军再行进两天，就可以把柔然残部全部消灭了，拓跋焘后悔不已。战后，柔然提出和亲，从此再也构不成对北魏的威胁了。

在征夏伐柔然等诸多战役中，崔浩表现出了卓越的见识和谋略，深受拓跋焘信任。太延六年（439），北魏君臣讨论如何伐凉，完成统一北方的最后一战。将军李顺曾作为拓跋焘的特使出使北凉12次，对北凉的情况了如指掌。但是此人贪财，已被北凉重金收买。所以他编造谎言说：“姑臧城（北凉都城，今甘肃武威）南的天梯山上，冬天积雪深达几丈，春夏积雪融化，雪水从山上流下来，当地居民以此灌田饮用。我们大军远涉其地，凉州人一定会掘开渠口，让水流尽，我们的人马就无水可用。”崔浩反驳说：“《汉书·地理志》中讲道：凉州的畜产，天下最为富饶。如果那里没有水草，牲畜怎么繁殖？另外，汉朝绝不会在没有水草的土地上兴建城郭，设置郡县。这种话实在是荒谬不可信。”后来，当太武帝亲率大军进抵姑臧城外，看到水草茂盛时，对崔浩说：“你当年说过的话，今天果然应验了。”

作为统一战争的重要谋臣，崔浩参与了北魏王朝三代帝王重大的军事决策，多谋善断，算无遗策，屡建功勋，在北魏统一中国北方的一系列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此外，崔浩在平息薛永宗、盖吴暴乱，征讨吐没骨部落、吐谷浑以及南征刘宋等战争中也屡献奇谋，屡建奇功。拓跋焘对崔浩的才能十分赏识，曾对崔浩说：“你才智渊博，历事我的祖父与我父亲，忠著三世，因此我对你特别看重。希望你凡有所思，直言相告，助我治世。我有时脾气不好，也许不能采纳你的建议，但过后静思，却总觉得你说得很有道理。”429年，太武帝指着崔浩得意地对归降的高车首领说：“此人虽不能弯弓持矛，但胸中却有千军万马。当我在征战

前犹豫不决之时，都是他使我下定决心，而且总是大获全胜。这都是他的功劳！”转而又对各部尚书说：“凡军国大计，你们需先向崔浩咨询，然后方可施行。”不仅军国大政，就是闲杂小事，太武帝也乐意听听崔浩的看法。闲来无事，他就到崔浩宅第与崔浩聊上一聊，吃饭的时候，还经常为崔浩夹菜。而崔浩也经常自由出入太武帝寝殿。431年，魏军攻取夏的都城平凉，太武帝大宴群臣。他拉着崔浩的手对北凉使者说：“所云崔公，此是也，才略之美，当今无比。朕行止必问，成败决焉。”不久，崔浩官拜司徒。

崔浩笃通道教，主张废佛。太武帝在位时曾下令焚烧寺院，捣毁佛像，一时“一境之内，无复沙门”，太武帝由此成为历史上灭佛的“三武”之一。

三、“国史之狱”与灭门之祸

崔浩性情敏锐通达，长于谋划，自比张良，是不可多得的治国人才。十几年里，崔浩推荐和提拔了大批汉族士人参与到北魏政权中，以他为中心，逐渐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汉族士族势力。因此，鲜卑贵族对他非常忌恨。

由于受汉族门第观念影响，崔浩企图按照世家大族的传统思想，抬高士族地位，因而得罪了众多的鲜卑贵族。崔浩之弟崔恬嫁女与王慧龙。王氏是太原望族，世代遗传齯鼻（俗称酒糟鼻）。崔浩看到王慧龙的齯鼻，盛赞为“贵种”，并多次当着鲜卑诸公的面称赞王慧龙长得俊美。司徒长孙嵩听了大不高兴，便向太武帝告状，说王慧龙是从南方归降的，崔浩叹服南人，“有讪鄙国化之意”^①。太武帝大怒，把崔浩传来训斥，崔浩脱帽叩头，自责了一番才得到宽恕。太子拓跋晃监国时，崔浩专制朝政，不顾太子反对，一次就推荐了冀、定、相、幽、并五州人士数十人，皆被任命为郡守。

太延五年（439）十二月，太武帝命崔浩以司徒监秘书事，续修国史。太武帝叮嘱他，写国史一定要根据实录。崔浩按照这个要求，采集了魏国上代的资料，编写了一本魏国的国史——《国记》。当时，太武帝编修国史的目的，本来是为留给皇室后代看的，不想外传。但是《国记》修毕后，参与其事的著作令史闵湛、郗标建议把《国记》刊刻在石碑上，以彰直笔，同时刊刻崔浩所注的《五经》。闵湛、郗标巧言令色，平时以谄事崔浩而获得崔浩的欢心。他们的建议被崔浩采纳，太子也表示赞赏。于是，在天坛东三里处，营造了一个《国记》和《五经注》的碑林，方圆一百三十步，用工三百万才告完成。由于《国记》秉笔直书，尽述拓跋氏的历史，详备而无所避讳，其中直书了拓跋氏一些不愿人知的早期历史。而石碑树立在通衢大路旁，引起往来行人议论。鲜卑贵族看到后，无不愤怒，先后到太武帝前告状，说这是故意张扬“国恶”，丢鲜卑人的脸。太武帝命令收捕崔浩等人，严加审查。

崔浩被捕后，太武帝亲自审讯，他惶惑不能应对。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六月，太武帝族诛崔浩。当时，清河崔氏无远近，尽行诛杀，与崔氏有姻亲关系的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也遭灭门之祸，史称“国史之狱”。

作为政治、军事谋略家，崔浩参与了北魏王朝三代帝王重大的政治、军事决策，多谋善

^①《魏书》卷三八《王慧龙传》。

断，屡建功勋，在北魏创制立法和统一北方的战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并深为道武帝、明元帝和太武帝所器重，可谓“遇既隆也，勤亦茂哉”，同时，“崔浩才艺通博，究览天人，政事筹策，时莫之二”。除了政治和军事上的成就以外，崔浩在天文、历法、饮食、宗教等方面都做出过重要贡献，尤其是研习道家养生之术写成的《食经叙》，比较历代天文历法写成的《五寅元历》，对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但是，历来政治斗争都是极其险恶的，崔浩却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鲜卑贵族和汉人士族矛盾的牺牲品，“谋虽盖世，威未震主，末途邂逅，遂不自全”^①。太武帝族诛崔氏，目的是为了剪除“势倾朝野”的汉族世家，以维护鲜卑贵族的政治利益，“国史之狱”只不过是一个借口罢了。

虽经历了“国史之狱”的劫难，但武城崔氏并未被赶尽杀绝，北魏中后期，崔氏的另一房支重新崛起，再次恢复了武城崔氏的荣耀。崔光、崔亮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人物。崔光官至司徒，北魏孝文帝时，曾“参赞迁都之谋”^②，是孝文帝改革的重要谋臣之一。他对北魏王朝最大的功绩是在宣武帝去世、高氏擅权的危急情况下，冲破重重阻力，毅然迎立太子元翊即位，是为孝明帝。因而深得孝明帝的倚重，官至司徒、太保，位极人臣，得到了北魏统治者的特别礼遇。

崔亮官至度支尚书、吏部尚书等要职。北魏“自迁都之后，经略四方，又营洛邑，费用甚广”，崔亮任度支尚书后，“别立条格，岁省亿计”，与此同时，崔亮还“议汴、蔡二渠，以通边运，公私赖焉”^③。后任吏部尚书期间，还进行了官员选举制度的改革，奏行“不问士之贤愚，专以停解日月为断”的“停年格”。虽然造成了一定的负面效应，但毕竟对中国古代的官吏选举制度具有一定的影响。

清河崔氏中有许多人在北朝是历世老臣，如崔亮、崔鸿、崔休均历孝文、宣武、孝明三世，崔光历孝文、宣武、孝明、孝庄四世，崔长文历孝文、宣武、孝明、孝庄、东魏孝静五世。他们对于北魏王朝可以说是忠心耿耿，崔光临终前曾嘱咐他的子侄们要“以死报国”，他已将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视为自己的“国家”，足见其对北魏王朝已有认同感。

清河崔氏在北朝获得了较高的政治地位，充分显示了家族发展的强劲实力，这种结果亦得益于北魏统治者的民族融合政策。但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虽然实行了民族融合的政策，同汉人毕竟存在着一定的隔阂。民族矛盾在二者合作得比较顺利的时候不易激化，而当二者发生冲突时，这种矛盾便一触即发，崔浩之死便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综上所述，魏晋南北朝时期，武城崔氏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曹魏至西晋是家族的兴起时期。从崔琰、崔林起，家族冠冕相袭，奠定了崔氏世家大族的地位。第二，十六国时期是家族的剧烈变动期。清河崔氏由原先较稳定的发展态势进入到一种频繁变动的发展态势。家族的剧烈变动，表现在家族房支的分化、家族成员的流动、家族政治地位的剧烈起伏以及家族思想意识的全面更新等。在这一时期，清河崔氏始终处于一种极不稳定的发

① 《魏书》卷三五《崔浩传》。

② 《魏书》卷六七《崔光传》。

③ 《魏书》卷六六《崔亮传》。

展状况，不停地游弋于各个民族政权之间。虽然各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者注意与汉族士大夫相结合，但由于原先的世家大族政治局面遭到一定的破坏，清河崔氏的家族成员仅能维持最基本的生存权，家族的政治地位已无法得到保障。这对于世家大族的发展无疑是消极的一个方面，但另一方面，社会的变动，新鲜事物的出现，全面更新了清河崔氏成员的思想意识。汉族接受少数民族统治，进而入仕少数民族政权，已成为以清河崔氏为代表的北方世家大族的共识。这种思想意识的更新，再加上清河崔氏成员的个人努力，成为维系并推动家族发展的动力，使清河崔氏走上了崭新的发展道路。第三，北朝时期是家族发展的高峰期。十六国时期的仕宦经历为清河崔氏入仕北朝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经济上，由于家族发展并没有因战乱而中止，故经济基础没有遭到严重的破坏；在政治上，通过与少数民族的长期合作，积累了许多新的仕宦经验；在思想意识上，抵触少数民族统治的情绪逐步消失。所以清河崔氏入仕北朝并没有经历多大的阻力与曲折。北朝与十六国虽然基本上都是少数民族政权，但北朝的情况却与十六国大为不同。最重要的一点是北朝建立了门阀体制，这种体制无疑为世家大族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因此，清河崔氏在进入北朝以后，政治地位逐渐抬头，一些房支使家族的发展达到高峰。虽然这一时期，清河崔氏的某些房支遭到了毁灭性的冲击，但在整体上，清河崔氏无论在经济基础、政治地位，还是文化素养方面，都表现出极高的优越性。正是在北朝，清河崔氏作为“世家大族”的意义才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综观清河崔氏在魏晋南北朝的仕宦经历，可以看出它是通过某种政治机缘而登上政治舞台，逐渐获得政治地位，从而促进其家族社会地位的上升。而社会地位的上升又会进一步扩大其政治影响力，推动政治地位的再上升。魏晋南北朝是一个乱世，政权此起彼伏，各种力量一次又一次地进行着分化组合。一个大家族如果想在乱世中继续生存下去，就必须抛弃守旧思想，“与时推迁”，随着时代和形势的发展变化，谋求自己的生存空间。清河崔氏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子子孙孙才得以冠冕相袭，至盛唐时期仍然保持其大族地位。

四、武城崔氏在民族融合中的作用

武城崔氏之所以在魏晋南北朝这一乱世时期逐步兴起并达到鼎盛，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顺时而进，改变了“华夷之辨”的传统思想，顺应了民族大融合的潮流，积极参与少数民族政权建设，给他们注入了汉族传统的政治思想与理念，促进了这些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的封建化，推动了民族大融合。

第一，武城崔氏改变了“华夷之辨”的传统思想，顺应民族大融合的潮流。西晋末年起，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进入中原，西晋灭亡，历史进入了五胡十六国时期。这一时期，武城崔氏虽受到一定的冲击，但面对剧烈的社会变动与民族大融合的趋势，他们改变了传统的“贵中华、贱夷狄”的思想意识，接受少数民族统治，并与之合作，逐渐融合。

形成于春秋战国的“华夷之辨”，对后世具有强大的影响力。绝大多数汉人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从大汉族主义立场出发，始终以“华夏”、“中华”的正统地位自居，而对于“蛮夷戎狄”采取歧视的态度，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在持有“华夷之辨”思想的各阶

层中，汉人士大夫显得尤为突出。特别是东汉以来，西部、北部的各少数民族相继内迁并与汉人杂居共处的事实，进一步加深了他们对少数民族的反感，排斥、防范、迁徙少数民族的建议历朝有之。东汉时期，“南匈奴久居塞内，与编户大同而不输贡赋。议者恐其户口滋蔓，浸难禁制，宜豫为之防”^①，这是建议防备内徙少数民族的最早记录。在此之后，曹魏邓艾、西晋郭钦纷纷上言徙戎，西晋江统更作《徙戎论》，使“华夷之辨”在这一时期达到高潮。但是接踵而来的内忧外患，却是汉族士大夫，特别是世家大族所始料不及的。少数民族的入主中原，对“华夷之辨”思想及华夏正统地位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在特殊时期，人的固有观念往往会根据形势的变化而发生转变，留在北方的世家大族便经历了一个思想转变的过程。

武城崔氏在西晋末年政局动乱纷扰之际没有选择南下，也没有逃世退隐，而是选择了留在北方，入仕十六国少数民族政权，这种举动主要是由以清河崔氏为代表的北方世家大族自身的特点决定的。世家大族出现的同时，也随之产生了对立面——庶族。世家大族具有深刻的经济、政治、文化内涵，正因为这些与众不同的因素，使世家大族与庶族有着天壤之别。区别士庶实为世家大族的头等大事，吕思勉先生曾经指出：“以当时士人，区别士庶之见颇深，而民族之义，则尚未昌明也。”^②所以，此时清河崔氏的世家大族地位观念处于主导地位，而民族观念只能处于从属地位。只要能够保持延续世家大族地位不动摇，无论是华夷之辨、华夏正统，还是民族气节，在此特殊时期都是次要的。此外，对于世家大族来说，都有其固定的郡望，它是世家大族繁衍生息之所，是其经济实力之依托，并且是借以标榜其门第的重要工具，就是南渡的侨姓家族如琅琊王氏、陈郡谢氏也仍称自己的旧望。可见，世家大族与自己的故土是紧密相连的，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故其家非万不得已，决无舍弃其祖茔旧宅并与茔宅有关之田产，而他徙之理。”^③正因为如此，再加之清河东武城距江南较远，清河崔氏家族将“不离本土”作为自己的宗旨，只要能够留在北方，保持崔氏香火不绝，就算是投降受辱也在所不惜。如崔彤曾随西晋南阳王司马保至陇右，后仕于西凉，其子崔剖“每慷慨有怀东土，常叹曰：‘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吾所庶几’”^④。他所怀念的是他的故土，并没有亡国之痛，可见，这种“恋土”意识与民族气节没有多大关联。

武城崔氏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对于少数民族从不适应到适应，从反感到支持，从“恒以为辱”到“以死报国”，逐渐抛弃汉族正统思想，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与新环境相适应。尽管十六国政权此起彼伏，但武城崔氏为了求生存，延续家族的固有地位，不惜一人仕多国而寻求更多的发展机会。如崔隐先后仕后赵、前燕，崔宏仕前秦、后燕、北魏，崔逞先后仕前燕、前秦、东晋、翟魏、后燕、北魏等。与此同时，少数民族统治者在其统治的过程中也意识到吸收汉族士人并为之进行合作的必要性。综观武城崔氏在十六国所仕之官职绝大多数属于中高级官员，他们受到少数民族统治者的礼遇并得到重用。由于长期在少数民族政权中

① 《资治通鉴》卷六七。

② 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969页。

③ 陈寅恪《论李栖筠自赵徙卫事》，《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页。

④ 《北史》卷二一《崔宏传附传》。

供职，使之对少数民族政权产生了一定的认同感，为其后来入仕北朝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可以说，十六国时期是武城崔氏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它使崔氏家族跨越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界限，摈弃了保守思想，接受了新鲜事物，使家族成员的政治观念、思想意识及行为方式均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变化。

第二，武城崔氏积极入仕少数民族政权，给这些政权注入了汉族士大夫文化。从十六国至北朝，武城崔氏家族成员纷纷入仕各少数民族政权，并成为这些政权的重要力量。据《晋书》、《魏书》、《北史》等正史及一些墓志资料统计，入仕十六国各政权及北朝的武城崔氏家族成员多达数百人。如在匈奴人刘渊所建的汉政权中，崔玮官至太傅；匈奴人刘曜所建的前赵政权中，崔岳官至侍中、大司徒，辽东公；羯族人石勒所建的后赵政权中，崔牧任尚书右仆射，崔荫任征东大将军，崔遇任特进，崔瑜任黄门郎，崔悦任司徒左(右)长史、新平相、关内侯；辽西鲜卑段部政权中，崔悦任司马、佐史；鲜卑族首领慕容皝所建的前燕政权中，崔逞任著作郎兼黄门侍郎、崔潜任黄门侍郎；氐族人苻坚建立的前秦政权中，崔宏任阳平公侍郎、冀州从事、征东记室、著作佐郎、征东功曹等，崔液任尚书郎，崔逞任齐郡太守；丁零人翟辽所建的翟魏政权中，崔逞任中书令。鲜卑慕容垂所建的后燕政权中，崔逞任秘书监、留后吏部尚书，崔通任尚书左丞、范阳、昌黎二郡太守，崔琮任车骑属，崔遵任少府卿、太常卿，崔整任广川太守，崔宏任吏部郎、尚书左丞、高阳太守，崔荫任大司农卿等。

北魏统一北方后，广泛吸纳汉族士人，武城崔氏家族凭借十六国时期丰富的从政资历与经验，广泛参与北朝政权，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势力，为胡汉的进一步融合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据现有的史料统计，武城崔氏在北魏(包括东、西魏)政权中任职者达98人，这一数字充分表明了崔氏作为当时“煊赫家族”的意义所在。北魏太和十九年(495)，孝文帝“诏定氏族”，北魏新型门阀体制建立，汉人士族的地位得到了确认，清河崔氏因此得入“四姓”，从而为巩固、提高崔氏世家大族地位提供了政治保障；同时，这也标志着汉族士大夫家族被少数民族政权承认、维护并推崇，从而使胡汉融合进一步加深。

第三，武城崔氏积极改造少数民族政权，促进了这些政权的汉化与封建化。崔氏自十六国时期进入少数民族政权之始，就开始了有意识地改造这些政权的工作，为其注入汉文化元素，促使其封建化与汉化。

崔悦仕后赵石虎，官至司徒左长史，助石虎创制立法，制定官制。其子崔潜仕前燕慕容暉，为黄门侍郎，助其采汉法，定国制。崔潜子崔宏，初仕前秦，为阳平公侍郎、领冀州从事；崔宏“出总庶事，入为宾友，众务修理，处断无滞”，俨然如仕途老手。苻坚“闻而奇之”；前秦灭亡后，崔宏再仕后燕慕容垂，为吏部郎、尚书左丞，“立身雅正，与世不群，虽在兵乱，犹励志笃学”；后仕北魏，先后任黄门侍郎、吏部尚书、天部大人等要职，“对掌机要，草创制度”，改革鲜卑旧制，“制官爵、撰朝仪、协音乐、定律令、申科禁”^①，给北魏王朝政治注入中原封建文化因子，深得北魏道武帝拓拔珪的赏识。天兴元年(398)，

^①《魏书》卷二四《崔玄伯传》。

崔宏向道武帝建议改国号为“魏”，被采纳。崔宏在帮助北魏创制立法的同时，还向道武帝经常灌输封建治国之道，诸如“古今故事”、“王者制度”、“治世之则”、“明君贤臣”、“往代废兴”等等，使拓拔珪从一个鲜卑蛮酋转变成为封建帝王。崔宏之子崔浩历仕北魏道武帝、明元帝和太武帝三朝，先后任著作郎、国子祭酒、太常卿、大司徒等，深受器重，“恒与军国大谋，甚为宠密……朝廷礼仪、代文策召、军国书记”^①等军国要务他都参与议定，对北魏政治影响深远。崔光历孝文、宣武、孝明、孝庄四世，官至司徒，曾“参赞迁都之谋”^②，是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的主要参与者与策划者之一。

综上所述，武城崔氏在十六国、北朝时期，积极参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建设，促进了这些政权的汉化与封建化，同时也使少数民族贵族逐步汉族士大夫化，促进了各民族的大融合。

第三节 “三高碑”

“三高”是指高湛、高贞和高庆，三高碑是德州出土的他们的墓志或墓碑。

一、《高湛墓志》

高湛（537-568），东魏禧（今河北景县南）人，字子澄，是高欢的第9个儿子，北齐的第4任皇帝，文襄帝高澄、文宣帝高洋、孝昭帝高演的同母弟。东魏时封长广郡公，建北齐后进封为长广王。历官至太尉、京畿大都督。皇建元年（560），高演许诺高湛为皇位继承人，伙同高湛在邺都（今河北临漳）发动宫闱政变。皇建二年（562）十一月，高演去世，高湛继承皇位，改皇建二年为太宁元年（562）。高湛在位期间，制定《齐律》，首创“十恶”之条，令宦家子弟习诵。一段时期内，齐人多明法令，官吏依律办事。他还颁布均田令，赢得了短期的安定。河清年间，佞臣、侍中和士开劝他：“官及少壮，极意为乐”，高湛听了正对心思，于是不理朝政，日益荒淫奢侈。高湛乱政荒淫，造成北齐政纲紊乱，上下怨声载道。河清四年（565），高湛禅位给太子高纬，自称太上皇。天统四年（568）十二月，病死邺都，年32岁，谥号武成皇帝，庙号世祖。

《高湛墓志》全称《魏故假节督齐州诸军事辅国将军齐州刺史高公墓志铭》，东魏元象二年（539）十月刻，清乾隆十四年（1749）德州运河岸崩时出土。楷书25行，行27字。此墓志与北魏《高庆碑》、《高贞碑》齐名，合称“德州三高碑”。赵万里在《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中缩印辑入。高湛墓志石刻虽已不存在，但它的拓本仍流传后世。据民国二十四年《德县志》记载：“高湛墓志，元象二年（539）刻石。清乾隆十四年（1749），城北第三屯河决石出。石方尺有六寸，邑人封希孔收藏，咸丰季年，某孝廉携于济南，献于某中丞。某中丞回籍不便携带，而把石碑还某孝廉。某孝廉把石碑置济南肆中。事隔数年，未能取回。后闻有陶某，从肆中购出，携赴南省，今不知石归何处。”《山左金石志》卷九《赠齐州刺史高湛墓志铭》条记载：“元象二年（539）十月立碑，方广一尺七寸五分，文二十五行，行二

① 《魏书》卷三五《崔浩传》。

② 《魏书》卷六七《崔光传》。

十七字，径五分，后空一行。在德州封氏。”^①

高湛墓志书法秀劲温雅，字形方扁，运笔雅正含蓄。杨守敬在《激素飞清阁评碑记》卷二中称高湛碑书法骨格整练，说“褚河南似从此出。”^②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将此志与《刁遵墓志》等并列，称“《高湛碑》若秋菊春兰，茸茸艳逸。”^③《山左金石志》也称《高湛墓志》：“碑字秀劲，为唐时褚、虞所本。”^④

二、高贞碑

北齐北平王高贞，字仁坚，是武成帝高湛的第五子。史书记载高贞“沉审宽恕，帝常曰：‘此儿得我凤毛’。”^⑤高贞历任青州刺史、京畿大都督、兼尚书令、录尚书事。高湛出行不在京城的时候，高贞留守负责处理朝政。由此可见，高贞具有很强的理国治政能力。北齐时期，京畿大都督一职非常重要，地位很高，担任者几乎全是高氏人物或其亲信。后主高纬（556-577）即位后，妒忌高贞的才能，对高贞渐生疑忌。佞臣高阿那肱才技庸劣，奸诈佞巧，工于心计，为讨好高纬，密令大臣冯士干弹劾高贞，把高贞逮捕下狱治罪。高贞26岁卒。高贞碑文记载了他一生的功绩。

高贞碑全称魏营州刺史高贞碑。据民国《德县志》记载：“高贞碑，北魏正光四年（523）立，清嘉庆十一年（1806）由城北第三屯出土，孙渊如观察移置学宫。并镌跋语及李斯篆29字于碑阴。”高贞碑的碑文已残缺不全，碑阴的跋语及篆书铭文还可辨识。此碑高2.35米，宽0.95米，厚0.175米。碑额篆书阳刻4行，行3字，即“魏故营州刺史懿侯高君之碑”。碑文魏碑体，共24行，行46字，字迹完好率70%。《德县志》所说的孙渊如观察即孙星衍，字渊如，阳湖人。清乾隆进士，历官山东督粮道。他在德州居官时间较长，深究经史、文字、音训之学以及金石版本，传世著述近二十种，是清代较有影响的学者。他用行草写下“碑浮卫水兮，移之学宫。墓崩阨兮其人传。惟贵戚之尚德兮，曷籍勋名之烂然。我无建树于兹土兮，独好古以穷年。愧岷首之羊公兮，庶后人之宁想乎碑前”的词句，刻在高贞碑阴。并书跋语记载说：嘉庆丙寅年（1806），王保训孝廉告诉我，在德州卫河第三屯，出土高贞碑。我与知州原逊志，库大使沈志水等人把碑移到学宫安置。嘉庆十五年（1810），孙星衍又在高贞碑阴镌李斯篆书铭文29字。跋语是：“篆泰山刻石，以乾隆五年毁于火，传书漫漶。余藏有旧拓本，尚可寻求笔意。严君可均通篆法，因嘱双钩上石，勒德州学高贞碑之阴，以永其传。嘉庆庚午岁元日兰陵孙星衍记。”

跋语所说的“泰山刻石”与高贞碑没有什么联系，是指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登泰山，丞相李斯等为歌颂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功绩而刻的石碑，石碑至明代只存29字。上面跋语说：“以乾隆五年毁于火……余藏有旧拓本，尚可寻求笔意。”孙星衍嘱托精通书法的严可均（字景文，嘉庆举人，文字学家）把收藏的“泰山刻石”拓本铭文，用双钩法摹下来，刻

① 《山左金石志》卷九，仪征阮氏小琅嬛仙馆收藏本。

② 谢承仁主编《杨守敬集》第8册，《激素飞清阁评碑记》卷二，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59页。

③ 崔尔平《广艺舟双楫注》，上海书画出版社1981年版，第182页。

④ 《山左金石志》卷九，仪征阮氏小琅嬛仙馆收藏本。

⑤ 《北齐书》卷十二《武成十二王》。

在高贞碑之阴。孙星衍的用意就是让李斯篆书铭文附在高贞碑这件金石史上的稀世之宝上“以永其传”。1924年，直奉战争时高贞碑因学宫成为驻军场所无人看管。1928年，北伐军进驻德县，这幢碑被迁至民众教育馆。“七七事变”后，又被迁至伪德县民众教育馆。1946年德州解放后，被固定存放在德州市图书馆。德州市图书馆把残破的碑身用水泥粘合完好，在院中修建了碑罩，和其他碑石，一并陈列。

高贞碑在我国碑帖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它和北朝的张猛龙碑、洛阳的龙门二十品并称为北魏时三大名碑。独山莫友芝在《金石笔识》中说：“是碑为石刻之最整峭者，与张猛龙一石同在正光时，可称双绝。”它的拓本可追溯到宋代，分布遍及全国，并远及日本、朝鲜。历代金石碑帖，都把它收集在内。此碑新旧拓本流传甚多，字划神气充足，现藏故宫博物院。王昶《金石萃编》只列其目，未录碑文，陆耀遇《金石续编》方布其文。高贞碑书法方劲峻整，笔势畅达，风格古涩而富新意，是魏碑中方笔风格的规范之作。杨守敬在《激素飞清阁评碑记》中称其“书法方整，无寒俭气。”^①

三、高庆碑

高庆碑全称“魏故光州刺史贞侯高君之碑”。据民国《德县志》记载：“高庆碑，北魏正始五年（508）镌，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秋，第三屯河岸崩拆，石沦于水，二十三年三月水落石出，邑人移于学宫。碑早建于高贞碑十余年，以文考之，当与高贞为雁行碑，字如出一手，惟石质不逮，今移置民众教育馆。”

由于史料缺乏，高庆身世不得其详，只能从碑文残余字句中看出一些端倪。如碑文中有：“文昭皇太后之侄，世宗武皇帝之内弟也”的记载。《中国人名大辞典》中有“高后，后魏宣武帝之后，性悍忌，孝明帝立，为皇太后。”可推知，宣武帝之后，既是高庆的姐姐，又是文昭皇太后的侄女，高庆属于皇亲国戚。

高庆碑北魏正始五年（508）八月镌刻，高2.2米，宽0.98米，厚0.165米，碑额篆书，阴刻4行，行3字。碑文22行，行字数不等，魏碑体，字迹完好率50%。碑阴有“光绪乙未夏六月，河决第三屯，得知决口。于丁酉三月念日，移置学宫”的文字记载。1924年直奉战争中，高庆碑因放置学宫成为驻军场所，无人看管。1928年，北伐军进驻德县，碑被迁至民众教育馆。“七七事变”事变后，又被迁至伪德县民众教育馆。1946年德州解放后，被固定存放在德州市图书馆。50年代末，误作建筑石材，碑文被凿去两行，幸得识者制止。德州市图书馆把残破的碑身用水泥粘合完好，在院中修建了碑罩，和其他碑石一并陈列。1983年转藏山东石刻艺术博物馆。

高庆碑比高贞碑早刻十余年，书法风格及篆额书体如出一手，或为一人所书。此碑碑文平画宽结，结构严谨，笔法干净练达，寓险峭于平稳，端整大方。比略早的《晖福寺碑》显得更加成熟。同《始平公》等相比，字体结法、风神大异其趣，在北魏碑刻中属雅正一路。篆额富于装饰性，篆法亦极精美，同高贞碑碑额并为世人所重。高庆碑是近代才发现的，所

^① 谢承仁主编《杨守敬集》第8册，《激素飞清阁评碑记》卷二，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59页。

以未收入历代碑帖中，流传后世的拓本也少，几乎成为海内孤本。在这个意义上讲，高庆碑更应受到珍视。由于历经风雨剥蚀和人为破坏，碑身阳面已从中断裂，下部碑文已模糊不清。

北朝碑刻一向为世人推重，是因为这些碑刻在隶楷错变的过程中，在楷法未成熟的蜕变时期，争奇斗艳，呈现出各种艺术风貌。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说：“北碑当魏世，隶楷错变，无体不有，综其大致，体庄茂而宕以逸气，力沉著而出以涩笔，要以茂密为宗。当汉末至此百年，今古相标，文质斑斓。”除“三高碑”外，德州比较有名的石刻还有北魏济州刺史高植墓志、北魏高道悦墓志、北魏渤海太守王偃墓志、禹城市张庄镇黎吉寨村的宋代八棱碑石刻、临邑的来禽馆石刻、平原的龙门石刻、临邑的《四体千字文》石刻、夏津的明代栗祁墓志等。

第四节 风流才俊与儒学传承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历史的风云激荡，一批世代为官、具有丰富统治经验的士族代表人物相继登场，活跃于政治舞台。

一、易学大师——管辂

管辂（210-256），字公明，三国时期魏国平原郡平原县人（今平原县人），是历史上著名的术士，被后世卜卦观相者奉为祖师。

管辂自幼聪敏好学，善于思考，悟性超群，对日月星辰、自然万物都有着浓厚的兴趣。八九岁时，常常仰视星空，一看就是几个时辰，对星宿的名称、位置、变化规律无一不晓。父母邻里之人都感到惊奇。自言：“我年虽小，然眼中喜视天文。”常云：“家鸡野雉，犹尚知时，况于人乎？”^①管辂对日月星辰、寒暑节气、阴阳变化等细心观察与研究，悟出其中的内在联系。当时德州一带的名儒与之辩论，都难不倒他。

管辂十五岁时，入官学读书，“始读《诗》、《论语》及《易本》，便开渊布笔，辞义斐然……远方及国内诸生四百余人，皆服其才也”。一些满腹经纶的学者，甚至饱经沧桑的老者也乐于和他切磋辩论。管辂虽然年轻，但出语不凡，很少有人能辩倒他。太守单子春饱读诗书，对管辂的才学有所怀疑，于是召集了100多宾客与管辂辩对。宾客们或群起攻之，或故意相难，但管辂镇定自若，一边饮酒，一边应对，语言“文采葩流，枝叶横生”，把一个个难题都一一化解。于是管辂名声远播，时人“号之神童”。

管辂对《周易》兴趣甚笃，潜心探研，深解其旨，对仰观、风角、占、相之道，无不精通。其相占之术大进，相人卜事无不灵验，世人称为“神人”。据说，当时平原郡人尤其佩服他的神机妙算，以至为奸为盗的人都纷纷收敛了，由此，“外户不闭，无相偷窃者”。平原太守刘毓对管辂的相占术将信将疑，于是，便取来印囊和山鸡毛放在器物内，让管辂卜筮。

^①《三国志》卷二九《魏书·管辂传》。下同。

管辂说：“内方外圆，五色成文，含宝守信，出则有章，此印囊也。高岳岩岩，有鸟朱身，羽翼玄黄，鸣不失晨，此山鸡毛也。”馆陶县令诸葛原晋升为新兴太守，管辂去给他送行。在宴会上，诸葛原亲自去取了燕子卵、蜂巢、蜘蛛放在器物中，让管辂猜测。管辂说：“第一物，含气须变，依乎宇堂，雄雌以形，翅翼舒张，此燕卵也。第二物，家室倒悬，门户众多，藏精育毒，得秋乃化，此蜂巢也。第三物，觳觫长足，吐丝成罗，寻网求食，利在昏夜，此蜘蛛也。”在座的人都惊喜不已。清河郡大旱，久不下雨。清河郡太守问卜于管辂。管辂说：“夜中有雨。”这一天天晴，天气燥热，白天不像要下雨的样子，郡丞和县令都在座，都说不会下雨。到了夜间一鼓的时分，星星月亮全都看不见了，风云同时兴起，竟然下了一场急雨。

据说，曹操晚年多疑，常常梦见黑风中群尸起舞，精神恍惚，一病不起，服药毫不见效。令太史丞许芝卜《易》。许芝推荐管辂，曹操立即差人前往平原召辂。管辂至许都，曹操问卜，管辂答道：“此幻术耳，思则有，不思则无，何必为忧？”曹操听了管辂的话，心情才渐渐平静下来，病也好了。曹操问卜于江东、西蜀之事，管辂卜卦，说：“东吴主亡一大将，西蜀有兵犯界。”不久，合肥守将张辽上报：“东吴陆口守将鲁肃身故。”汉中亦报：“张飞犯境。”曹操欲领兵征伐刘备，问卜于管辂。管辂说：“不可轻动，来春许都必有火灾。”结果，第二年，耿纪、韦晃等人叛操，在城中放火。曹操问西南战事，管辂卜曰：“三八纵横，黄猪遇虎；定军之南，伤折一股。”后来，大将夏侯渊在定军山被黄忠所斩，汉中失陷。

清河太守华表曾任管辂为文学掾，后冀州刺史裴徽授管辂为文学从事、治中、别驾等职。正始九年(248)，39岁的管辂被举为秀才，为少府丞。管辂执《易》卜卦，时为天下第一，朝野皆闻其名。从当朝显贵、封疆大吏到平民百姓，无不敬仰，每遇疑难怪奇之事，皆问卜于管辂，世人称奇。

吏部尚书何晏与大将军曹爽合谋，夺了司马氏的兵权，盛极一时，权倾朝野。何晏曾请教管辂：“君论阴阳，此世无双，请给我作一卦，我能不能官至三公之位？”又问：“我一连梦见有几十只青蝇飞来，落在鼻子上，赶它也不肯飞走，这是什么意思呢？”管辂说：“位峻者颠，轻豪者亡，不可不思害盈之数，盛衰之期。”事后，管辂的舅舅责备管辂说话太直率。管辂说：“与死人语，何所畏邪？”^①舅舅大怒，说管辂狂妄。十几天后，何晏被诛杀，管辂的舅舅这才叹服。

管辂一生探研《周易》，颇得其要。著述甚丰，主要有《周易通灵诀》、《周易通灵要诀》、《破躁经》、《占筮》等，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死后葬于平原城西南周寨村西尚庙附近。旧志记载有墓，今已不存。

二、文藻秀出——刘峻

刘峻(463-522年)，字孝标，南朝齐梁时期著名学者、文学家。平原(今山东平原)人。

^①《三国志》卷二九《魏书·管辂传》。

西晋末年长达十六年的八王之乱，不仅使中原人民身陷战火，而且直接导致了北方少数民族的南侵，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纷纷入主中原，历史进入了十六国及南北朝分裂割据的时代。北方汉族人民为逃避战乱和民族冲突，纷纷举族南迁。刘峻的父亲刘珽离开平原随宗族南迁，曾任南朝刘宋时期的地方小吏。

刘宋孝武帝大明七年（463），刘峻出生不到一个月，父亲刘珽就病逝。刘珽为官清廉，家中积蓄不多，母亲许氏不得不带着刘峻兄弟二人回到故乡。回到故乡后，孤儿寡母，生活极其艰难。泰始五年（469），北魏军队攻占了平原。当时，刘峻才八岁。刘峻母子为乱军所掠，作为奴隶被卖到中山（今河北定州）。当地有个富人叫刘实，看到刘峻敦厚老实，少小年纪即遭此不幸，很是怜悯，以束帛将他赎出，并教他读书。此时刘峻的叔父刘怀珍仍在宋为官，并以军功累迁至黄门郎领虎贲中郎将。北魏对在南朝有戚属者实行隔离政策，地方官员闻刘峻母子江南有亲戚，便把他们强行迁徙到了僻远的代地（今河北省蔚县西南）。刘峻母子衣食难继，为了糊口度日，母亲不得不入观为尼，而把刘峻送进寺庙，做了一个“小沙弥”。尽管颠沛流离，度日艰难，但刘峻非常好学，燃麻杆为灯，彻夜苦读。一夜，刘峻读书昏困，麻杆燎及发须，“既觉复读”^①。

永明四年（486），刘峻在寺庙中已整整生活了十六年。十六年中，他阅读了大量的书籍，积累了丰富的知识，逐渐成长为饱读诗书、眼界开阔的有识之士。刘峻再也不能忍受北魏的民族歧视政策，他隐姓埋名，昼伏夜行，费尽周折，逃出魏地，辗转数千里，来到南齐的都城——建康。

自东晋偏安江南以来，建康一直是中国文化的中心。来到建康，刘峻才愧叹自己读书不博，学问浅薄，意识到如果不发奋苦读，历练才干，就很难改变自己的命运。于是他“博极群书，文藻秀出”^②。凡是建康城里没读过的书，他知道后就千方百计求来阅读。清河人崔慰祖为此送给了他一个雅号——“书淫”。当时，竟陵王萧子良广招学士，刘峻试图凭借个人才学去谋得体面的“国职”，但是由于吏部尚书徐孝嗣的压制而未被录用，仅让他担任南海王侍郎，刘峻愤而不就。

齐明帝时，萧遥欣为豫州刺史，任刘峻为豫州府刑狱，萧遥欣待刘峻为上宾，礼遇甚厚。但不久萧遥欣病逝，此后，他“久之不调”，很长时间里再未遇到知遇之人，抑郁而不得志。十年之后，梁代齐，政权发生了变化，情况才有所好转。梁武帝天监初年，刘峻奉召进入“西省”（中书省的别称），与学士贺踪同为典校秘书。与书籍、文字材料打交道是刘峻的长处，所以这段时间对他来说较为舒心。但好景不长，一次偶然的事件再次让刘峻受到了挫折。刘峻的兄长刘孝庆当时为青州刺史，刘峻驾车赴青州看望兄长，结果，“坐私载禁物，为有司所奏，免官”。

安成王萧秀很推崇刘峻的才学，他做荆州刺史后，马上委任刘峻为户曹参军，同时请刘峻“抄录事类”，名曰《类苑》。书未成，刘峻以疾去职。此后，刘峻游东阳紫岩山，留恋不

① 《梁书》卷五〇《文学》。

② 《南史》卷四九《刘峻传》。下同。

已，因而筑室长居于此。刘峻在紫岩山写了一篇《山栖志》，“其文甚美”，广为流传。此后，“吴、会人士多从其学”，刘峻一方面设帐授徒，一方面筛选收集自己的文章，汇编成集，并写成《自序》一篇总结自己的一生。其中发出“魂魄一去，将同秋草”和“世不吾知”的悲叹。梁武帝普通三年（522），刘峻病卒，享年六十岁。门人溢曰“玄靖先生”。

梁武帝萧衍痴迷佛道，爱好文学，广招文学之士，有高才者多被引进。梁武帝每次策问经史故事，范云、沈约等人往往故意“引短推长”，让皇帝多说话，以显示皇帝的博学多才。而刘峻性格率真，不谙此道，坦抒己见，“不能随众沉浮”，因而不被重用。有一次，梁武帝策问有关“锦被”的典故，文士们说了一点见解后，就“箴言已尽”，以示自己才疏学浅，见闻寡陋。不想，梁武帝试问刘峻，他却毫不推辞，“忽请纸笔，疏十余事”。梁武帝“不觉失色，自是恶之，不复引见”，并一直忌恨着他。当刘峻的《类苑》编成后，梁武帝也组织文士编了《华林遍略》。梁武帝认为管辂“有奇才而位不达”，刘峻则撰写《辩命论》与之相抗。

刘峻在《辩命论》中首先对王充、司马迁、李康、郭象等人的天命观进行逐一评论，然后指出：“士之穷通，无非命也。……所谓命者，死生焉，贵贱焉，贫富焉，理乱焉，祸福焉，此十者天之所赋也。愚智善恶，此四者人之所行也。……天下善人少，恶人多；暗主众，明主寡。”《辩命论》虽然属于哲学范畴，但刘峻面对现实，面向人生，以华丽的骈文写就，辞彩飞扬，辩锋犀利，慷慨激越，情致淋漓，一扫南朝的绮丽文风，吐出了失意文人的内心愤懑，故而千百年来知音甚多。

刘峻的另一篇名作为《广绝交论》。梁武帝天监七年（508），清正廉明的任昉死于新安任所，其儿子流落无助，刘峻“泫然矜之……乃著《广绝交论》以讥其旧交”^①。《广绝交论》仿东汉朱穆《绝交论》，取主客问答的形式，首先提出了“利交”的五种表现形式：“势交”、“贿交”、“谈交”、“穷交”、“量交”，接着分析了“利交”的三种危害：“败德殄义，禽兽相若，一衅也；难固易携，仇讼所聚，二衅也；名陷饕餮，贞介所羞，三衅也”。最后感慨道：“世路险巇，一至于此。太行孟门，宁云崭绝。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弃之长骛。独立高山之顶，欢与麋鹿同群，皦皦然绝其雾浊，诚耻之也，诚畏之也。”^②文章痛揭时弊，针砭世俗，犀利洒脱，酣畅淋漓，对士大夫阶层的人情世态作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引发了后人无尽的感慨。

刘峻一生最大的成就莫过于注释《世说新语》。《世说新语》的作者是南朝刘宋临川王刘义庆。此书采集前代逸闻趣事，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雅量等三十六门，涉及重要人物五六百人，故事一千多则，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士庶僧徒，都有记载。在刘峻注释此书之前也曾有人注过，但仅注四十条，影响不大，流传不广。而刘峻注《世语新说》所引书目有经史别传三百余种，诸子百家四十余种，别集二十余种，诗赋杂文七十余种，佛经道藏三十余种。尤其是他所引用的四百余种书后来大多都已亡佚，所以价值甚高。假如没

①《南史》卷五九《任昉传》。

②《梁书》卷一四《任昉传》。

有他早年的苦读和“书淫”个性，是难以成此宏业的。刘峻的《世语新说注》连同裴松之的《三国志注》、酈道元的《水经注》，其价值甚至超过了原著，被公认为我国历史上三部注释名作。《隋书·经籍志》著录有刘峻的诗文集6卷，已佚。明人张溥辑有《刘户曹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现存有《出塞》、《登郁洲山望海》、《自江州还入石头》、《始居山营室》等诗4首，以写景见长。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有《刘孝标集校注》（1988年）。

三、衔命拥旄——张彝

张彝（461-519），字庆宾，清河东武城（今山东武城）人，是南北朝时期北魏宰相，清河东武城张氏家族最为显赫的人物之一。东武城在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属清河郡，所以称清河东武城。魏晋南北朝时期，清河郡望族辈出，如清河崔氏、张氏等，这些名门望族又都集中于东武城。

武城张氏是西汉开国功臣留侯张良的后裔。曹魏时期，张良的裔孙泰山太守张岱举家迁往东武城，从此张氏在武城扎下了根，到张岱的孙子张幸时，武城张氏开始走向兴盛。张幸起于五胡十六国时期，时值乱世，张幸招纳流民，建立武装，筑坞建堡，屯田兴农，抵御“五胡”侵扰，四方民众纷纷投奔他。张氏部曲从千余家发展到数万户，成为北方不可忽视的政治势力。439年，鲜卑族拓跋部建立的北魏统一了北方，张幸率部归服。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盛赞张幸，赐爵平陆侯，拜平远将军、青州刺史。从此张氏世代袭爵为北魏平陆侯。

张彝是张幸的曾孙，第四代世袭平陆侯。武城张氏家学深厚，经史传家，对子孙教育甚严。张彝自幼聪慧过人，历览经史，无一不精，少年便有才名。北魏孝文帝初年，世袭侯爵，入朝为官，在礼部任职。张彝年少气盛、性情豪放，与当朝才子卢渊、李安民、孙惠蔚等人结为密友，出入相伴，谈经论赋，激扬文字，针砭时弊，聊发少年之狂气。张彝“爱好知己，轻忽下流，非其意者，视之蔑尔”^①，出入殿庭、趾高气扬，无所顾忌，个性鲜明，有“慷慨悲歌、好气任侠”之风骨。当时，执政的冯太后喜欢谦恭谨慎的作风，对张彝等人的张扬看不惯，但又爱惜张彝之才，不忍将其罢黜，所以让百官督导张彝，令其悔改，但张彝恃才自傲，我行我素。

张彝以“孝”为先，其父早亡，与母相依。张彝早晚侍奉，从不懈怠。母亲去世后，张彝悲痛万分，扶丧归葬武城故里，千里徒步，不乘车马。回到武城时，形容枯槁、面色憔悴，其孝行为世人称道，孝文帝也遣使吊慰。

张彝性情果敢、做事干练、明察秋毫，所以常常充使巡察地方。所到之处，秉公执法、法纪严明，人人敬畏。孝文帝亲政后，对张彝非常器重，迁张彝为主客令（掌管少数民族事务）。后为太中大夫、黄门侍郎，这些官职地位虽不显赫，但都是皇帝身边的侍从官，参决机要，草拟诏敕，成为皇帝亲信。

张彝与李冲、李彪、高间、崔光等汉族士大夫辅佐北魏孝文帝实行了以汉化为中心

^①《魏书》卷五二《张彝传》。下同。

的一系列改革。

首先，制礼作乐。张彝与李冲、李彪等人根据中原王朝的礼仪，帮助孝文帝制定朝仪和礼乐制度。如：作明堂、建太庙、正祀典、迎春东郊、耕藉田，祭祀舜、禹、周公、孔子，养国老、庶老，允许群臣守三年之丧。太和十五年（491）十一月，仿照汉官制，大定官品，考核州郡官吏。同年冬天，设太乐官，议定雅乐，除去郑、卫之音；依据儒家六经，参照各国音乐志，制定声律。

其次，迁都洛阳。张彝、李冲等之所以极力主张迁都，主要有四个理由：其一，魏旧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偏北地寒，风沙常起，气候恶劣。其二，平城原是适应拓跋部早期畜牧经济特点及其活动中心而选择的。随着北魏统一黄河流域，中原地区成为北魏统治的中心，农业经济成为国家的支柱。平城偏北的地理位置更不利于北魏对整个中原地区的统治。北魏经济中心的南移，要求其政治中心也要做相应调整。其三，由于鲜卑族的农业化、封建化及北方民族的大融合，要求政治上的汉化改革，鲜卑贵族守旧势力在平城也较强，实行汉化必须摆脱这个阻力。加以北方柔然的逐渐强盛，也要远离这个威胁。其四，洛阳是中原传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各方面条件都比平城优越，是最理想的都城选择。北魏朝廷围绕着迁都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张彝、李冲等汉族大臣支持孝文帝，主张迁都洛阳；一些旧贵族极力反对迁都。面对压力，张彝、李冲等给孝文帝献策，名为南伐，实则迁都。太和十七年（493），孝文帝声言南伐，当行至洛阳时，正值深秋，阴雨连绵，群臣们经长途行军跋涉，疲惫不堪，都不愿冒雨继续前进，于是纷纷跪于御马之前，磕头泣谏，请停南伐。孝文帝乘机宣布如果不再前进，即定都于此。当时许多鲜卑大臣虽不愿内迁，但更畏惧南伐，故只得相从，不敢再提出异议，遂定迁都大计。张彝“以参定迁都之勋，进爵为侯”。

再次，移风易俗。在王肃、李冲、李彪、高闾、张彝等汉族士人的支持下，迁洛之后，孝文帝立即着手改革鲜卑旧俗，全面推行汉化。下诏禁止士民穿胡服，规定鲜卑人和北方其他少数民族人一律改穿汉人服装，朝廷百官改着汉族官吏朝服。改鲜卑复姓为单音汉姓，大力提倡鲜卑人与汉人通婚。改官制、修法律，尊孔、崇儒。孝文帝亲率百官到曲阜祭祀孔庙，封孔氏宗子为崇圣侯，又下令立学校，修明堂，筑灵台，加速了胡族在文化上的汉化，促进了民族大融合。

张彝因帮助孝文帝决策迁都、进行汉化改革等功绩，得以升迁，先后任太常少卿、散骑常侍兼门下侍中，成为皇帝决策班子的核心成员之一。受命持节巡察陕东、河南十二州，所到之处，明察秋毫，公正廉明，处事轻重得当，口碑甚佳。张彝也因此晋升为尚书。

太和二十三年（499），孝文帝去世，16岁的太子元恪即位，是为北魏宣武帝。张彝官至正尚书、兼正侍中，受诏辅政，成为宰相。宣武帝亲政后，张彝罢相，出为安西将军、秦州（治今天水）刺史，守卫北魏的西南边陲。这里是汉、羯、氐、羌等民族杂居

之地，经济文化落后，民俗刁蛮凶悍，部落冲突不断。张彝到任后，首先整饬军务，严肃军纪，加强边防，强化治安。他亲自带队巡察，军容威严，剑拔弩张，以震慑部落强酋。羯、氐、羌等部落畏服，不敢寻衅，一方肃静，号为“良牧”。政治上，张彝改辙更张，推行汉制。取消野蛮的肉刑，明德慎罚，“诸有罪咎者，随其轻重，谪为土木之功，无复鞭杖之罚”。同时，“宣布新风，革其旧俗”，大力推行移风易俗，崇儒兴学，促进了民族大融合，史称“人庶爱仰之”。张彝也因此受到朝廷嘉奖，进号抚军将军，张彝上疏辞去秦州刺史之职，诏不许。张彝治陇，促进了西部边疆地区的开发和经济文化的发展。

正在张彝治陇大有成效之时，仆射高肇却弹劾张彝“擅立刑法、劳役百姓”。原来，张彝妻早亡，陈留公主寡居，张彝想续陈留公主为妻，公主也答应了。但是，仆射高肇也想娶陈留公主，却被拒绝。高肇恼羞成怒，便诬告张彝。宣武帝遣使监察秦州，使臣是高肇的密友，出使前就与高肇密议，欲治张彝死罪。但张彝秉公守法，廉洁无私，使者也没有找到任何把柄。张彝虽无罪，但还是被召回洛阳。

张彝回洛不久，便得了偏风，手脚不便，但却仍心系朝廷。他总结历代帝王的治乱兴衰，“起元庖牺，终于晋末，凡十六代，百二十八帝，历三千二百七年，杂事五百八十九，合成五卷”，取名《历帝图》，献于宣武帝，以图使皇帝“远惟宗庙之忧，近存黎民之念，取其贤君，弃其恶主”，以史为鉴。

延昌四年（515），宣武帝死，孝明帝元诩即位，元诩年幼，由其母胡太后临朝听政。侍中崔光上疏，表张彝之功，孝明帝诏加张彝为征西将军、冀州大中正。张彝虽年近六十，又有风疾，但对于国事，他仍孜孜不倦。朝廷大小事情他都了如指掌，上书言事，口无遮拦，不加避讳。常常集同僚于宅第，裁量国政，品评人物，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汉族政治势力，结果招致朝廷猜忌，特别是鲜卑贵族更加忌恨他，以致引来杀身之祸。

当时，张彝的三个儿子都当朝为官，长子张始均为员外常侍、兼左民郎中；次子张仲瑀为司空祭酒、给事中、尚书郎；三子张珉为著作佐郎。三子中以长子始均最为出众，史称“始均才干，有美于父”。不幸祸起二子张仲瑀。北魏是鲜卑人建立的政权，具有军政府的典型特征，政府官员选用的多是立有军功的鲜卑贵族子弟，他们大多文化水平低下，办事能力不强，却恃强凌弱，贪污成风，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推行汉化政策，对军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任用了很多汉族知识分子，大大提高了北魏王朝的执政水平。孝明帝即位后，鲜卑贵族和汉官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特别是张家位高权重，成为鲜卑贵族的眼中钉。在这样的形势下，张彝次子、身为给事中兼尚书郎的张仲瑀给朝廷写了一份密奏，请求朝廷在任命官员的时候进行考评选拔，特别是上品高官不再参考军功。实际上，按照这个方针就基本断绝了少数民族人士依靠军功出仕升迁之路。消息走漏后，一下激怒了充当皇家卫士的鲜卑贵族子弟——羽林、虎贲。于是，他们私下串通，到处张贴告示，扬言要群起灭了张家。神龟二年（519）二月，上千名羽林军、虎贲军的官兵们聚众闹事，先砸了尚书省官署的大门，然后冲到征西将军府，纵火行凶，烧死了张彝的大儿子左民郎中张始均，把张彝打得奄奄一

息。张仲瑀越墙而走，才得以幸免。身为三朝元勋、一品征西将军的张彝没过两天就气绝身亡，时年五十九岁。事情发生后，面对如此严重的暴乱，政府本应严肃处理以儆效尤。然而，肇事做乱的士兵出身基本是鲜卑贵族，背后有一大帮鲜卑高官做靠山，临朝听政的胡太后从保持稳定大局出发，大事化小，抓了八个没有靠山的羽林军士兵顶罪，对其他所有人给予大赦。张彝死后，胡太后甚为惋惜，“数月犹追言泣下，谓诸侍臣曰：‘吾为张彝饮食不御，乃至首发微有亏落。’悲痛之若此”。但她却不追查元凶，原因是其侄胡虔执掌禁军，其妹夫元叉执掌羽林，胡太后有意袒护。这件事让汉族官员们惴惴不安，心生不满。从此以后，北魏王朝逐渐众叛亲离，走向衰亡。

《魏书》作者、史学家魏收给张彝如下评价：“张彝风力寥寥，有王臣之气，衔命拥旆，风声犹在。并魏氏器能之臣乎？遭随有命，俱婴世祸，悲哉！”

四、乱世史家——崔鸿

崔鸿（478-525），字彦鸾，北魏东清河郟县（今山东夏津县）人，南北朝时期，北魏著名史学家。

崔鸿出身于魏晋世家——清河崔氏。伯父崔光历北魏孝文、宣武、孝明、孝庄四世，官至尚书令、骠骑大将军、司徒、太保，位极人臣。父亲崔敬友曾任北魏梁郡太守。崔鸿生长在这种仕宦之家，从小得以专心读书。他“少好读书，博综经史”^①，以才学闻名于洛阳。

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年（478），崔鸿被任为彭城王国左常侍，开始了其政治生涯；景阳三年（502），迁员外郎兼尚书虞曹郎中，负责撰写宣武帝“起居注”；不久又迁给事中兼祠部郎，再转为尚书都兵郎中。宣武帝即位后，曾在全国范围内召集了三十名儒学名流议定国家律令，崔鸿与其伯父尚书令崔光都在其中，时人莫不仰慕。崔氏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永平年间（508-511），崔鸿为镇南邢鸾行台长史，迁官三公郎中、轻车将军、散骑常侍。延昌二年（513），针对当时官吏升迁制度不问贤愚、三年一迁的弊端，崔鸿上书宣武帝，提出“绩效能官，才必称位者，朝升夕进，岂拘一阶半级者哉？”要求“改而更张”^②，按政绩和才能选拔官吏，但其建议未被采纳。延昌四年（515），加中坚将军，迁中散大夫、司徒长史。孝昌年间（525-527），孝明帝任崔鸿为黄门侍郎、散骑常侍、齐州大中正。

孝昌元年（525），崔鸿伯父崔光病危。崔光掌修北魏国史多年，但他认为本朝历史不是本朝人所能修好的，史官只需记录时事，编著卷目，便算尽责了。所以直到他临终前，魏史仍“阙略尤多”。崔光把修撰国史的希望寄托于崔鸿，认为崔鸿才、学、识兼备，是唯一可以担当撰写国史的人选，并向孝明帝推荐了崔鸿。正光五年（525），崔鸿受诏，开始着手撰修国史，可惜他不幸染病，不久便病逝了，年仅48岁。朝廷追赠镇东将军、度支尚书、青州刺史。

崔鸿一生秉性耿介，遇事直陈，为同僚所钦服。虽然职官屡屡变迁，但一直不曾担任高官要职，政绩也不突出。但是，他却是一位出色的史学家，他撰写的《十六国春秋》，给后

①《北史》卷四四《崔鸿传》。

②《魏书》卷六七《崔光传附崔鸿传》。

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西晋以后，中国北方先后建立了十几个少数民族政权，史称“五胡十六国”。这些政权各有“国书”，但“诸史残缺，体例不全，编录纷谬，繁略失所”^①，内容往往残缺不全，体例不一，繁简迥异，不像前代都有一部统一的完整的史书。“五胡十六国”虽然都是少数民族所建的政权，但他们是这一时代的政治代表和象征，是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善恶兴灭之形，用兵乖会之道，亦足以垂之将来，昭明劝戒”^②，总结这一时代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崔鸿“弱冠便有著述志”，立志于修撰一部全面的、系统的记述十六国历史的著作。

从景明元年（500）开始，崔鸿就广泛阅读公私藏书，特别留意搜集各国旧史及其他资料。由于当时北魏刚迁都洛阳不久，各种书籍“率多分散”，他不得不“求之公私，驱驰数岁”，做到详细占有材料。为了抄录、搜集史料，他几乎竭尽了家产和俸禄，有时甚至没有买纸的钱。正始三年（506），《十六国春秋》初稿已基本完成，但为了撰写最后的5卷“蜀录”，他四处访购常璩所撰《蜀书》，久求不得，为此他又一直耐心等待了近20年，直到正光三年（522）得到此书，才补写了最后5卷，《十六国春秋》才最后完成。

崔鸿把十六国历史作为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阶段，把少数民族政权历史提高到正史地位，并为此倾注了毕生心血。《十六国春秋》100卷，又有序例1卷，年表1卷，合计102卷。崔鸿改各国书为录，主为纪，臣为传，以纪传体例记述了十六国（前赵、后赵、前燕、前秦、后燕、后秦、南燕、夏、前凉、蜀、后凉、西秦、南凉、西凉、北凉、北燕）的史实，把各国史书按时间先后排比在一起，“区分时事，各系本录，破彼异同，凡为一体，约损繁文，补其不足”^③，避免了各国史书各自为界、相互重复、诋毁的情况，将当时中国北方的全貌展现给了后人，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

崔鸿的《十六国春秋》在史学上的贡献主要有三点：一是以民族平等的观念，撰述各民族政权历史。尽管自司马迁写《史记》就为少数民族立传，但少数民族历史在史书中一直处于附属地位。《十六国春秋》则突破传统，“不附正朔，自相君长”。^④记述各国史事以各自年号，无纪年的则用晋年号，既摒弃了南朝视十六国为“偏霸”、“群盗”，又抛却了北朝视东晋、宋、齐为“僭伪”的民族偏见。在尊重客观史实、承认各少数民族政权的前提下，将十六国作为整体区域性政权加以考察。平等对待，互不统摄，分国立史，摆脱了传统的“贵中华而贱夷狄”观念的窠臼，史法公允而高明。二是态度谨严，志存实录。崔鸿“驱驰数岁”，不遗余力地搜集史料，寻查于公府，访之于私藏，为此几乎耗尽了所有的家产和俸禄。同时又如实记史，仗义直书，既不掩饰北魏初期的野蛮落后，又如实记载魏军坑杀后燕降卒的史实，既能让人看到苻坚的不仁，又能让人看到拓跋珪的不孝。三是取材翔实，记述丰富。崔

① 《魏书》卷六七《崔光传附崔鸿传》。

② 《北史》卷四四《崔鸿传》。

③ 《魏书》卷六七《崔光传附崔鸿传》。

④ 《史通》内篇《表历》。

鸿以范亨、韩显宗、姚和都、高谦之等诸国旧志为本，“稽以长历，考诸旧志，删正差谬”，又“约损烦文，补其不足”^①，可谓取材完备，考辨细致。史学理论家刘知几言：“（崔鸿）考核众家，辨其异同，除烦补阙，错综纲纪，易其国书曰录，主纪曰传，都谓之《十六国春秋》，……大行于时。”^②

可惜《十六国春秋》从北宋以后就亡佚了，现行的辑本有两种，一为明代屠侨孙的《十六国春秋补遗辑佚》，一为清代汤球的《十六国春秋辑补》，两个版本都为后人研究十六国历史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①《魏书》卷六七《崔光传附崔鸿传》。

②《史通》外篇《古今正史》。

第四章 隋唐兴发——运河开通与文运昌盛

隋唐时期，政治清明，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稳定，国力强盛，在此大背景下，德州区域也得到了快速发展。大运河永济渠段的开通，使德州的区位优势更显突出，区域经济文化发展明显加快，一批治世能臣和文人贤士涌现出来，德州文化继两汉之后步入了第二个发展高峰。武城张氏、崔氏世家，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状元孙伏伽，“平昌三孟”孟郊、孟云卿、孟简，宫词翘楚张祜等，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唐末五代，藩镇割据，征战不息，王朝更替频仍，德州人民在战乱中遭受了深重的灾难。

第一节 大运河的开通与德州区域经济的发展

中国古代有两项伟大工程：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万里长城横亘东西，起着屏障和防御的作用，京杭大运河则跨越南北，起着沟通与交流的作用。京杭大运河的修建，体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千百年来，它与古老的长城一起饮誉世界。作为隋朝大运河四段中最长的一段，永济渠的开凿尽管给当时河北诸郡百姓带来了沉重的劳役负担，但却密切了华北经济文化联系，促进了沿岸经济文化的发展，德州具有深厚历史积淀的运河文明由此拉开了序幕。

一、永济渠的开凿

为了加强南北交通，巩固隋王朝对全国的统治，特别是为了南粮北运和征伐高丽，隋炀帝下令在大业初年开凿了大运河。隋朝大运河从大业元年（605）至大业六年（610），历时六年时间修建而成。以洛阳为中心，南到余杭（今杭州）北达涿郡（今北京），洛阳以南为通济渠、邗沟和江南河，洛阳以北为永济渠，全长4800里。其中，永济渠开凿于大业四年（608），南起黄河，北通涿郡，全长1000公里。

关于永济渠的开凿，正史、类书、地方志等均有记载。《隋书·炀帝纪》：“（大业）四年（608）春正月乙巳，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①《隋书·食货志》：“四年，发河北诸郡百余万众，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自是以丁男不供，始以妇人从役。”^②《初学记》：“隋炀帝于卫县（今河南浚县西），因淇水之入河，立淇门以通河，东北行，得禹九河之故道，隋人谓之御河。”^③《长河志籍考》：“永济渠者，《隋书》：大业四年，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七

^① 《隋书·炀帝纪上》。

^② 《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③ [唐]徐坚《初学记》卷六《河第三·叙事》。

年，（炀）帝自江都行幸涿州，渡黄河入永济渠。……《金史》：将陵县有永济渠，即今州西卫河。”^①民国《德县志》：“（永济渠）本县境内所经者，为汉之屯氏河，隋欲伐高丽，大业四年疏浚之，用以运输，名永济渠；七年炀帝行幸涿州，历永济渠，又名御河。”^②

史料中的“沁水”是黄河下游重要的支流之一。史料中的“屯氏河”乃黄河下游故道之一。西汉武帝元封（前110-前105）年间，黄河北决于馆陶（今属河北），分为屯氏河，向东北流经今德州、沧州等地入海。田雯《长河志籍考》载：“州城西门外……卫河即汉屯氏河，隋大业中疏为永济渠。其源自河南辉县，合滏、洹、淇三水东流，至馆陶界与漳河合，至清渊与会通河合，北来，自武城县入州境，又北至桑园出境，东光、沧州、天津下，直沽入海”。

隋代开凿的永济渠，南起洛阳，引沁水东流入清河（卫河），经泺水（白河）和桑干河（永定河）到涿郡，主要是在汉代黄河下游故道白沟、屯氏河的基础上开凿而成的，其水源则主要依靠黄河下游重要支流沁水、清水供给。自今河南汲县至河北馆陶之间，基本上是利用了曹操遏淇水入黄河故道的白沟。自馆陶经临清、德州至沧州部分利用汉代的屯氏河和西汉大河故渎。沧州以下，又部分利用了清漳水，至独流口则与清漳水别而另辟新道，并折向西北，经信安镇、永清县溪水（今永定河）相接。永济渠流经今河南省新乡、汲县、滑县、内黄，河北省魏县、大名、馆陶、临西、清河，山东省夏津、武城、德州，河北省吴桥、东光、南皮、沧县、青县，天津市武清、北辰、红桥、蓟县等，全长1000公里。元世祖至元年间（1264-1294）运河取直，不再经过洛阳，故元朝以后清河以南的河北段逐渐堰塞停运。然而，清河以北河段却得到加强，并成为元明清三代不可替代的重要漕运通道。

永济渠在当时是一条又宽又深、运量极大的运输大动脉，至于深宽度多少，不见当时文字记载，但大体上说与通济渠相当，因为开凿此河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运送粮草至涿郡，以征高丽。据民国《德县志·河渠》记载：永济渠在“本县城西”，“面宽二十丈，底宽八丈，深二丈三尺。”大业元年（605）八月，隋炀帝乘坐“龙舟”巡幸江都。大业七年（611），隋炀帝“自江都御龙舟入通济渠，遂幸于涿郡”^③，乘坐巨大的龙舟自江都沿运河北上，带着船队和人马，水陆兼程，最后抵达涿郡，用时50多天。八年（612）春，征高丽的113万大军，号称200万，集结于涿郡，加上运送粮草的200多万民工，总人数达300多万。足见其通航能力之强和运量之大。

为了开凿永济渠，与沿河两岸百姓一样，德州人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艰辛的努力甚至可贵的生命。中国古代负担劳役的人口一般都是“丁男”，即18-60岁的男子，而开凿永济渠时“丁男不供，始以妇人从役”^④，可见其劳役之重。由于督工严厉，1000公里的河道要在一年之内完成，很多人活活累死在工地上。

① [清]田雯《长河志籍考》卷二。

② 民国《德县志·河渠》。

③ 《隋书》卷三《炀帝纪上》。

④ [唐]杜佑《通典》卷一〇《漕运》。

虽然由于隋朝国祚短促，并未享受到大运河所带来的真正好处，但唐宋及以后的各个朝代却因此大获其利。永济渠的开凿与南北运河的开通，打破了原有经济区之间的相互封闭，使中原、江淮及黄河以北地区紧密地连接起来，形成了一个以东都洛阳为中心，南跨江淮直达杭州，西通关中直抵长安，北经临清、德州、沧州直通今北京附近，全长 1000 公里的庞大运河系统，对唐以后历朝历代的南北经济文化交流和国家统一都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正如《元和郡县图志》中所言：“隋氏作之虽劳，后代实受其利”^①。

作为隋朝大运河四段中最长的一段，永济渠沟通了华北经济文化联系，促进了沿岸经济文化的发展，在永济渠一线逐渐形成了经济发展、人文兴盛的经济文化带，而德州具有深厚历史积淀的运河文明也由此拉开了序幕，德州经济、社会、文化由此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

唐代在隋朝运河的基础上继续加以疏浚、补缀、整理、扩充，仍以漕运、军事为主要目的，线路也基本与隋代相同。特别是安史之乱以后，河北强藩盘踞，途经德州的永济渠就成了唐朝廷与河北诸镇联系的唯一纽带，因而这一条大动脉愈来愈得到唐统治者的重视。

唐代沁水断流，永济渠只引清、淇二水。清水发源于河南修武县之黑山，淇水源出河南林县淇山。《元和郡县图志》记载，永济渠“南自汲郡（今河南浚县西南）引清、淇二水东北入白沟，经永清，入临清，穿此县入沧州”。^②为了加大夏季洪水的下泄流量，减轻永济渠对德州、沧州等地的压力，唐朝于圣历三年（700）年在永济渠德州以东开挖马颊河（号新河），增辟了河水入海口；永济渠以西，则利用淀泊滞洪，并在重要的河段加筑堤防，以遏制水患。为了扩大水运交通网，唐统治者还在永济渠两侧开挖支渠，或通向平原中部的产粮区，或连接东部的产盐区，以便把粮食、食盐等物资通过永济渠运往洛阳和长安。当时德州已是永济渠东岸的一个重要城镇，交通便利，商业较为繁荣。

二、德州与长河县的设置

隋唐时期，德州行政区划上有两件大事：一是废汉代平原郡置德州（治今陵县），标志着鲁西北行政中心的北移和“德州”作为鲁西北行政称谓的开始；二是长河县（治今德城区）的设置，标志着德州作为运河重镇的滥觞。

西汉置平原郡，下辖十九县，郡治在今平原县以南。其中平原县（今平原县一带）、鬲县（今德城区一带）、重丘（今陵县以北）、平昌（今临邑县以北）、般县（今临邑县德平一代）、乐陵县（今乐陵县一带）、祝阿县（今齐河、禹城一带）、瑗（今禹城县西北）、漯阴（今临邑县以西）、安德县（今陵县一带）等，均属今德州市区域。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平原一直是鲁西北的政治、经济中心。

隋朝建立后，隋文帝进行地方行政区划改革。开皇三年（583），河南道行台兵部尚书杨尚希上疏隋文帝：“窃见当今郡县，倍多于古，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具僚以众，资费日多；吏卒人倍，租调岁减。清干良才，百分无一，动须数万，如何

^①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五。

^②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一六《长河县》。

可觅？所谓民少官多，十羊九牧”^①。隋文帝根据杨尚希“存要去闲，并小为大”的原则，将州、郡、县三级地方行政区划改为州、县两级制。

开皇九年（589），正式废平原郡，始置德州，州治为安德（今德州陵县），陵县由县治变为州治，这标志着鲁西北区域政治中心的北移。“德州”之名由此开始。隋代德州下辖安乐（今陵县）、平原（今平原南）、将陵（今德州东）、平昌（今临邑东北）、般（今陵县东）、长河（今德城区）、弓高（今河北东光西）、东光（今河北东光）、胡苏（今宁津西南）九县。作为秦汉以来区域政治中心的平原，地位下降，由原来的郡治变为县治。隋炀帝即位后，又改州为郡，实行郡县两级制，虽然恢复平原郡之名，但郡治仍为安德。

唐朝建立后，改郡为州。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平定窦建德后，去平原郡，重置德州，州治仍在今陵县。下辖安德、般、平原、长河、将陵、平昌六县。同年，在德州置总管府，统辖博（今山东聊城）、德、棣（今山东惠民）、观（今河北景县东北）四州军队，德州的行政、军事地位进一步提高。“贞观元年，割沧州之商河（今山东商河）、厌次（今山东惠民南）来属。十七年，废般县，以商河、厌次二县属棣州。又以废观州之蓀县（今河北景县）、安陵（今河北景县东）来属。”^②天宝年间，领县七（安德、蓀县、安陵、平原、长河、将陵、平昌）。其后，虽然天宝元年（742）改为平原郡，但仅仅过了16年，乾元元年（758），又改为德州，此后直到明初，在长达800年的时间里，陵县作为德州的州治，一直是鲁西北政治、经济、军事中心。

《隋书·地理志》“平原郡”条：“开皇九年置德州。统县九，户十三万五千八百二十二”。贞观十三年（639），德州有户10135，口52141；开元年间（713-741）有乡160，户61770；安史之乱前有户83311，口659855。

长河县位于今德城区一带。早在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477-499）曾在此修建土城。作为正式建制，则开始于隋文帝开皇六年（586）。《旧唐书·地理志》：“长河，汉广川县，属信都国，后废。隋于旧广川县东八十里置新县，今治是也。寻改为长河县，为水所坏。元和四年十月，移就白桥，于永济河西岸置县，东去故城十三里。十年，又置河东小胡城。”也就是说，隋初长河县在汉代广川县^③东八十里，初名为广川县，后为避隋炀帝杨广之讳，而更名长河县。元和四年（809），因广川县城被大水所毁，县治东迁十三里，移至永济渠西岸。元和十年（815），再将县治移至永济渠东岸小壶城^④，即今天德城区位置。

隋唐时期，长河县尽管只是一个县级地方行政机构，但是它的设立却标志着德州一个崭新局面的开始。一方面，由于运河的孕育和滋养，今德州市区一带逐渐发展成为汇通南北、物资丰饶、人气旺盛的新兴城镇，进而成为新的县治所在地。另一方面，这里“川陆经途，

① 《隋书》卷四六《杨尚希传》。

② 《旧唐书》卷四三《地理志二》。

③ 西汉置广川县，治所在今河北枣强。

④ 关于“小胡城”，有两种记载：清乾隆《山东通志》认为是唐初窦建德部将王小胡所建；清乾隆《德州志》认为是唐代德州观察使王士真之子王承宗所建。

转输津口，州在南北间，实必争之所也”^①。由于水陆交通便利，是漕运仓储重地，政治军事地位重要，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从而为明清时期的繁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唐代德州运河区域经济变迁

黄河流域地处温带，四季分明，平原广阔，土质疏松，非常适宜农业种植，因此，黄河中下游地区最早发展成为我国古代经济的重心。但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封建割据战争连绵不断，北方大批人口为逃避战乱而纷纷南迁，使这一地区的经济遭到破坏。在长达四百年的割据混战中，德州一直是各族政权激烈争夺的对象，这里屡遭兵燹，人口锐减，经济低迷。隋唐的统一，结束了长期的战乱，永济渠的开凿，促进了华北的物资交流，德州运河区域经济由此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时期。

王夫之曾言：“自唐以上，财赋所自出，皆取之豫、兖、冀、雍而已足，未尝求是于江淮也”^②。德州地属平原郡，是河北道的重要城镇。隋朝虽然短暂，但经济社会发展却很迅速。房恭懿任德州司马，因为社会安定，爱养百姓，考绩成绩全国第一，被隋文帝立为“天下模范”^③。安史之乱前，德州运河区域仍是农业生产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所谓“蚕绵之乡，而天府委辅，待以成绩”^④，“冀州既载，惟复陶唐，提封庶品，波委雾合，财力豪贍，货殖繁滋，遗风祠宇，岿然无易”^⑤。唐朝在这里汇聚大批物资，以供北方边镇之军需。颜真卿之所以能够与安禄山叛军对抗四年之久，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依托了这里充沛的兵员与物资基础。颜真卿《伪降上禄山书》中明确指出：“今河北殷实，百姓富饶，衣冠礼乐，天下莫敌。”而李华在《安阳县令厅壁记》中不仅指出了河北雄厚的物力，并且还指出了河北在全国范围内的经济地位。他说：“天宝以来，东北隅节度使，位冠诸侯，按数军钲鼓，兼本道连帅，以河北贡篚征税，半乎九州。”平定安史之乱后，德州运河区域所在的河北地区随即成为藩镇割据的基础。这里“俗俭风浑，淫巧不生，朴毅坚强，果于耕战……加以土息健马，便于驰敌，是以出则胜，处则饶，不窥天下之产，自可封殖，亦由大农之家，不待珠玑，然后以为富也。天下无河北则不可，河北既虏，则精甲锐卒，利刀良弓健马无有也”^⑥。可见，德州及河北地区优越的经济条件、兵锋物力，足以自强，这就成为安史叛乱的基础和藩镇割据的物资基础。贞观十三年（639），唐太宗下诏在各州设置常平仓储粮，当时德州不在其内，说明德州农业生产水平还不高，还不具备设仓储粮的条件。开元以后，情况有了很大变化，当时，供应关中的大批粮食主要来自贝、济、博、德等州，德州一跃而成了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

杜牧在《罪言》一文中所说：“山东，王者不得，不可为王；霸者不得，不可为霸。猾贼得之，是以致天下不安”^⑦。诗人岑参在颜真卿出任平原太守之际写了一首《送颜平原》，

① [清]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三一《山东二》。

② [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三。

③ 《隋书·房恭懿传》。

④ [唐]杜牧《战论》，《樊川文集》卷五。

⑤ [清]王昶《北岳神庙碑》，《金石萃编》卷八一。

⑥ [唐]杜牧《樊川文集》卷五《战论》。

⑦ [唐]封演《全唐文》卷七五三。

称德州“此地邻东溟，孤城吊沧洲。海风掣金戟，导吏呼鸣驺。郊原北连燕，剽劫风未休。鱼盐隘里巷，桑柘盈田畴”^①。在岑参眼里，德州俨然一个富庶的鱼盐桑柘之地。杜甫《忆昔》诗：“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仓私廩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反映了开元年间的经济繁荣和太平盛世景象。

在唐代，德州之所以成为富庶的农业区，首先得益于均田制与租庸调制的推行。均田制始于北魏，北齐、北周、隋和唐前期均沿此制。它是针对北方人口大量迁徙和死亡、土地荒芜这一现状提出的，政府根据所掌握的土地数量，采用计口授田的方式，授予丁男丁女露田和桑田。它的实施，协调了土地所有权与占有权关系，减少了田产纠纷，有利于无主荒田的开垦，对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桑田的授而不还，则充分考虑到了桑田上所植的桑、榆、枣，非一朝一夕所能成长，给予其长期稳定的归属以保证其生长。而相对缓和的租庸调，减轻农民的负担，刺激了农业的发展，遂使德州地区“财力豪瞻，货殖繁滋”^②，百姓富饶，衣冠礼乐，天下莫敌。其次，隋唐德州农业的发展还同德州运河区域的水利建设密切相关。隋朝开凿大运河，沟通了南北经济交流，运河流域逐步形成先进富饶经济带，为德州农业发展拓展了广阔空间。唐朝在对黄河、永济渠治理的同时，兴建了众多的渠堰。如唐初于永济渠以东（今四女寺处）开减河，增辟入海口，“地用丰润，民食乃甘”^③；武周圣历三年（700）再开马颊河，“号新河”，“以灌田通渠”^④。这些水利工程的兴修，使德州运河区域漕运便利，水害减少，灌溉面积扩大。另外，唐代生产工具得到改进，直辕犁改为曲辕犁，耕作技术大为改进。桑枣等经济作物的种植，也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唐朝政府还吸取隋朝短命而亡的教训，减轻百姓徭役负担，关注民生，赈济灾民。贞观三年（629）秋，贝州（今德州武城）发生水灾，德州（今德州陵县）发生蝗灾，唐太宗特下诏遣使赈恤。唐中宗时，宋颢任贝州刺史，武则天的侄子武三思派人在境内封邑收租，宋颢以河北频遭水灾、百姓饥谨为由，拒绝其入境。

然而，安史之乱中，德州运河地区长期落入叛军之手，遭到空前的洗劫。八年的安史之乱虽被平息，但唐朝无力根除安史旧部，先是河朔三镇后是其他强藩相继割据一方，唐朝陷入藩镇割据的混乱局面。建中三年（782），淄青、魏博、成德、卢龙四镇结盟称王，德州地属幽州节度使朱滔（自号冀王）。兴元元年（784）正月，淄青李纳、魏博田悦、成德王武俊等三人取消王号，归服朝廷。五月，王武俊败朱滔于贝州，德州改属成德军（王武俊）。唐宪宗元和四年（809），成德节度使王士真死，其子王承宗自为留后，宪宗以宦官吐突承璀领兵讨伐，没有取得胜利，只得暂时妥协，承认王承宗继位。安史之乱和藩镇的割据战争，迫使百姓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使德州以及北方广大地区的经济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军阀节

① [唐]岑参《宋颜平原》，载《全唐诗》卷一九八，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② [唐]郑子春《北岳庙碑》，《全唐文》卷三二九。

③ [清]董诰等《全唐文》卷三九〇。

④ 乾隆《德州志》卷四《河渠》。

镇拥兵自守，乘机逐利，四处侵暴，屠烧县邑，残杀不辜。《资治通鉴》永泰元年（765）条载：“今师兴不息十年矣，人之生产，空于杼轴。拥兵者第馆亘街陌，奴婢厌酒肉，而贫人羸饿就役，剥肤及髓。”^①山东、河北地区“寇难荐兴已三十载，服干櫓者，农耕尽废。居里闾者，杼轴其空。革车方殷，军食屡调，人多转徙，田亩芜莱”^②。“当建中、贞元之际，大军聚于斯，兵残其民，火焚其邑。大田生荆棘，官舍为煨烬”^③。唐贞元二年（786），德州蝗旱，米斗1500文，“复大兵之后，民无蓄积，饿殍相枕”^④。从上述事实中可以看出，唐代中后期的藩镇割据，给德州人民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百姓生活十分困窘，农村一派荒凉残破景象。

社会动乱导致德州人口不断流徙，大量逃亡。开皇九年（589），德州户口总数是13.58万，经过安史之乱，天宝后期德州户口总数锐减到8.33万。农民的逃亡，使德州及北方劳动力大量减少，加深了社会危机，形成了“兵兴则户减，户减则地荒，地荒则赋重，赋重则人贫”^⑤的恶性循环。为了解决军粮问题，藩镇不得不实行屯田制度。唐文宗太和年间（828-835），德州观察使殷侗上疏朝廷：沧州、德州的13,694营田户，除老弱之外，其余大半都在耕种。但是，因无耕牛，收获并不大，百姓甚至掘草根冲食，很多人都被饿死。请求朝廷每户自助耕牛一具、绢绫五匹。朝廷从其请。

隋唐时期，德州手工业和商业也十分繁荣，形成了“原野垦，府库实，氓庶安”，“川原林麓之富，舟车士马之殷”^⑥的景象。这主要是因为：德州区域农业经济的发展，为手工业生产奠定了基础；官僚、贵族、富豪和大商人都麇集城市，他们需要大量的手工业品以满足其奢侈生活的需要，刺激了手工业的发展。

隋唐时期，德州丝织生产很普遍，质量上乘，属于上三等。据《唐六典》、《元和郡县图志》以及《新唐书·地理志》等史料记载，当时黄河流域的河南、河北道产绢的州数不仅超过了江南地区，而且质量大为提高。当时，绢分八等：一等宋、亳，二等郑、汴、漕、怀，三等滑、卫、陈、魏、相、冀、德、海、泗、濮、徐、兖、贝、博。德州每年向朝廷贡绢20匹，品种以花绸、绵绸、平绸、绉绢等为主。安史之乱以后，德州频经战乱，或为藩镇所占夺，大量人口南迁，运河区域手工业遭到严重破坏，已不能向唐王朝提供优质丝织品了。

中国古代城市的兴起不外乎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封建王朝出于政治和军事目的而兴建起来的。建立一个城就是设立一级机构，建立一个军事堡垒，建立一个统治中心。第二种情况是由于处于交通要道或者是由于工商业发展带来的人口聚集自然而然兴起的。最初，人们在某个水路交通要道从事餐饮、住宿和商业买卖，久而久之，这里人口越来越多，服务设施越来越健全，地位也越来越高，就逐渐成为城市了。德州是一个典型的因河而生、因河而兴

① 《资治通鉴》卷二二三，永泰元年（765）条。

② [唐]陆贽《议减盐价诏》，《全唐文》卷四六三。

③ [唐]白居易《许昌县令新厅壁记》，《白居易全集》卷四三。

④ 《旧唐书·张孝忠传》。

⑤ 元稹《对才识兼茂明於体用策》，《全唐文》卷六五二。

⑥ [唐]封演《魏州开元寺新建三门楼碑》，《全唐文》卷四四〇。

的城市，德州城的兴起兼有这两种原因。大运河的南北沟通和德州便捷的交通，促进了德州运河沿岸许多城镇的兴起和繁荣。开元十三年（725），横海军节度使郑权上奏朝廷：德州安德县有一所草市叫“灌家口”，近来十分兴旺。不久前，成德军在草市以北十里处筑城，名曰“福城”。这里位于安德、平原、平昌三县交界处，土地辽阔，发展潜力巨大，请求朝廷在此设置新县，命名为“归化”^①。最终，朝廷批准了郑权的请求。

第二节 文运昌盛与治世能臣

隋唐时期，随着大统一局面的再现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德州地域文化继两汉之后再度呈现出了昌盛的局面。不仅世家文化延续了北朝时期的余威，产生了武城张氏、崔氏、平昌孟氏世家，而且在德州这块土地上，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状元和宫词翘楚。古代杰出的文人代表——平原太守颜真卿，“养浩然正气，法古今完人”，更是以其令人敬仰的文化人格和精品力作，为后世树立了一座标杆，给德州地域文化增加了一道亮丽的光彩，成为德州地域文化史上值得珍视的篇章。

一、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状元——孙伏伽

从唐高祖武德五年（622）至清光绪三十年（1904）的1282年间，历代王朝共选拔出有名可考的文状元592名，武状元168名，^②而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状元则是德州武城人孙伏伽。德州武城县先后出现了16位状元，2009年被文化部评为“中国状元之乡”。

孙伏伽（？-658），贝州武城（今山东武城）人，生年不详。早年考中隋朝进士后即步入仕途。需要说明的是，隋朝初创科举，主要科目有进士、明经、秀才三科。当时三科平行，不分主次，进士科尚未形成后来的独尊地位。此后，孙伏伽由大理寺史几经升迁，成为京畿万年县（今陕西西安）法曹，负责审理刑狱，督捕奸盗，查办赃赂。隋亡后，入唐做官。武德元年（618），针对隋朝灭亡的教训，孙伏伽以三事上谏唐高祖李渊：其一，“天子有诤臣，虽无道不失天下”。“子不可不诤于父，臣不可不诤于君”，隋朝灭亡的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不闻其过”、“君不受谏”，希望皇上“开直言之路，选贤任能，赏罚得中。”其二，“百戏散乐，本非正声”。隋炀帝贪图安逸享乐，官场淫风四起，所以败亡。近来朝廷热衷于“散妓”游戏，请并废之。其三，“性相近，习相远”。隋朝灭亡的另一个原因是皇帝身边充斥着奸佞之臣。希望陛下“妙选贤才，以为皇太子僚友”，让皇太子远离那些“好奢华驰猎驭射，专作慢游狗马、声色歌舞之人”^③。孙伏伽的奏疏“至诚慷慨，词义恳切，指陈得失，无所回避”。这是唐朝建立后的第一份谏疏，高祖阅后大喜，把他的上书传阅群臣，任其为治书侍御史，并赐帛三百匹。

当时，唐朝初立，战事频仍，“军国多事，赋敛繁重”，于是孙伏伽“屡奏请改革”，又

① [宋]王溥《唐会要》卷七一《州县改置下》，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64页。

② 参见车吉心《中国状元全传·前言》，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年。

③ 《旧唐书》卷七五，《孙伏伽传》（《新唐书》卷一〇三，《孙伏伽传》）。下同。

请设“谏官”一职，均为高祖采纳。武德二年（619），高祖对宰相裴寂说：“隋末无道，上下相蒙，主则骄矜，臣惟谄佞。上不闻过，下不尽忠，至使社稷倾危，身死匹夫之手。朕拨乱反正，志在安人，平乱任武臣，守成委文吏，庶得各展器能，以匡不逮。……孙伏伽可谓诚直。余人犹踵弊风，俯首而已，岂朕所望哉！”

唐朝平定王世充、窦建德后，曾大赦天下，但不久又“责其党与，并令配迁”，要把王世充、窦建德的部下流放偏远地区，由此引起中原、河北人心惶惶。针对朝廷这种朝令夕改的做法，孙伏伽马上上表谏曰：“《书》云：尔无不信，朕不食言。《论语》云：一言出口，驷不及舌。以此而论，言之出口，不可不慎。……因何王世充及建德部下，赦后乃欲迁之？……今四方既定，设法须与人共之。但法者，陛下自作之，还须守之，使天下百姓信而畏之。……赏罚之行，达乎贵贱，圣人制法，无限亲疏。”高祖接受其劝谏，取消了发配王、窦余党的命令，从而安定了中原、河北民心。

唐朝建立后，在选官制度上沿袭了隋炀帝创立的科举制度，科目主要有进士、明经、秀才等。其中，进士科考试有三场，三场考试都实行淘汰制，被淘汰的不能进入下一场考试。第一场是贴经，主考官从经书中选取一行，然后把其中的几个字贴盖住，让考生写出被贴的内容，测试的是考生对经书的熟练程度。第二场考诗赋，每个考生作诗一首、赋一首。诗赋各有题目，如开元二年（714）赋试的题目叫《旗赋》，且规定必须以“风日云野，军国清肃”八字为韵。李昂写了一篇27句327字的赋，文辞雄劲，用韵准确，名列本场考试第一并最终取得当年状元。第三场是试策，以时务、时事政治为题，考察考生对治国方略的见解。武德五年（622年）冬，孙伏伽参加了唐朝建立以来的第一次进士科考试，主考官是吏部考功员外郎申世宁。在此次录取的14名进士中，孙伏伽名列第一。这是中国科举史上有名可考的第一个状元^①。当时，科举制度初创，状元不像后世那么荣耀和受人推重，所以中状元后，他官位并没有升迁，仍为治书侍御史。

当时，军粮赋敛十分繁重，孙伏伽多次请求减免。武德九年（626），孙伏伽弹劾民部尚书裴矩“苟钓虚名”而不“救恤百姓”。由此，唐朝征收赋税由以户为单位改为以人口为单位，使贫苦的农民得到实惠。太宗即位，赐其男爵，食邑乐安县，随即转为大理寺少卿（副官）。贞观元年（627）唐太宗经常带大臣出去射猎，孙伏伽及时上书劝止，得到了唐太宗的高度赞赏：“卿能言朕失，朕能改之，天下庶有瘳乎！”贞观五年（631）因“奏囚误失”被免官，不久任刑部郎中。贞观十四年（640）拜大理寺卿，成为朝廷重臣。后出为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刺史。唐高宗永徽五年（654）因年老辞官，显庆三年（658）病逝。

孙伏伽为人忠直诚恳，《旧唐书》称赞其“忠纯”、“悟主匡失”。其性格宽宏大量，处事从容，荣辱不惊。拜治书侍御史时，自己已从朝中得旨，归家后却秘而不宣，待朝廷制文到来，合家狂喜，而孙伏伽若无其事，“时人称其有量”。

二、武城张氏世家——张文瓘、张文琮、张文收

^① 唐朝举人凡是赴京参加礼部考试的，皆须“投状”，所以就把第一名称为“状头”或“状元”。

武城张氏是唐代名门望族，西汉留侯张良的后裔。曹魏时期，张良的裔孙泰山太守张岱举家迁居东武城。十六国时期，张岱的孙子张幸筑坞建堡，四方民众纷纷前来投奔，其属众从千余家发展到数万户，成为不可小视的地方势力。北魏建立后，张幸率部归服，太武帝拓跋焘赐爵“平陆侯”，拜平远将军、青州刺史。张幸曾孙张彝于孝文帝时草拟诏敕，参决机要，是北魏决策班子的核心成员之一，参与了孝文帝以汉化为中心的一系列改革。宣武帝时，以尚书兼侍中（宰相）辅政，号为“良牧”。唐朝高宗前后，武城张氏张文瓘、张文琮、张文收等，任官至公卿。

张文瓘（605-677），字稚圭，贝州武城（今山东武城）人，隋朝内史舍人张虔威之子。隋朝大业（605-617）末年，张文瓘举家迁往魏州之昌乐（今河北南乐）。张文瓘幼年丧父，事孝母亲，悌友兄长，远近知名。贞观（627-649）初年，举明经，补并州参军。当时，英国公李勣任并州长史，对张文瓘极为赏识和礼敬，曾赞叹说：稚圭是当今的管仲、萧何，我比不上。李勣入朝后，极力向朝廷推荐，张文瓘得以调入朝廷，任水部员外郎。当时，其兄张文琮为户部侍郎，按照唐制，“兄弟不许并居台阁”^①，兄弟不能同时在朝中任职，遂出为云阳令。高宗龙朔（661-663）年间，累授东西台舍人、参知政事（副相）。乾封二年（667），迁东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宰相），兼知左史事。

此时，正值高宗拨巨资营造蓬莱、上阳、合璧等宫，又征集军马，不断征讨周边部族，仅京城厩马就养马万余匹，因而国库渐虚。文瓘因而进谏说：“人力不可不惜，百姓不可不养，养之逸则富以康，使之劳则怨以叛。秦皇、汉武，广事四夷，多造宫室，使土崩瓦解，户口减半。臣闻制化于未乱，保邦于未危，人罔常怀，怀于有仁。陛下不制于未乱之前，安能救于既危之后？百姓不堪其弊，必构祸难，殷鉴不远，近在隋朝。臣愿稍安抚之，无使生怨。”高宗对他的劝谏甚为感动，并愉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裁减厩马数千匹，并赐缯锦百段。咸亨三年（672），改授黄门侍郎，兼太子左庶子。不久迁大理卿，仍旧做参知政事。

张文瓘办事能力极强，效率很高，赴大理寺后仅仅数日，就判决前任遗留案件400条，且“无不允当”，狱囚甘愿伏法，“皆无怨言”。张文瓘执掌大理寺，坚持平恕执法理念，以教育为主，从不刑讯逼供。《旧唐书》作者刘昫称赞说：“文瓘之议刑，时属哲王，可以理夺”。他身体欠佳，常患疾病，狱囚竟“相与斋祷”，纷纷祈求上苍让他赶快好起来。上元二年（675），拜侍中，兼太子宾客。

张文瓘为人正直，做事严谨，办理公务绝不徇私枉法。当时，很多部门的奏议都被他“驳”。这一点，深得高宗信任，经常被委以重任，处理一些重要或棘手的大政。即便是他“卧疾在家”，不能上朝时，高宗也要求其他宰相和他商议：“朝廷每有大事，上必问诸宰臣曰：‘与文瓘议未？’”如果和他商议了，高宗就同意；如果没和他商议，高宗就会派人和他商议。高宗欲发兵讨伐新罗，当时张文瓘疾病在家，他得悉后，让人抬着他上朝面见高宗，说：“近来吐蕃犯边，我们已经将大兵屯驻西境；新罗虽不顺服，但也没有兴兵内侵。若我朝东

^①《旧唐书》卷八五《张文瓘传》。下同。

西同时征讨，恐百姓负担就会加重，就会不堪其弊，心生怨恨，所以还是恳请圣上息兵修德以安百姓。”高宗觉得他说的对，遂打消了讨伐新罗的打算。

仪凤二年（677），张文瓘病卒，享年73岁。因其一生勤勤恳恳为高宗操持朝政，高宗特敕其陪葬恭陵^①。

张文瓘有四子：张潜、张沛、张洽、张涉。中宗时，张潜官至魏州（今河北大名东北）刺史，张沛官至同州（今陕西大荔）刺史，张洽官至卫尉卿，张涉官至殿中监。父子兄弟五人皆至三品官，时人称为“万石张家”。

张文琮，生卒年不详，是张文瓘的兄长。他自幼爱好书写，笔不释手。贞观年间为治书侍御史。后任亳州（今安徽亳州）刺史，为政清简，深受百姓拥戴。永徽初年，因表献《太宗文皇帝颂》，盛赞唐太宗的功业，文辞优美，被赏赐绢百匹，征拜户部侍郎。

唐高宗即位后，贬妹夫房遗爱（房玄龄次子）为房州（今湖北十堰）刺史。房遗爱是张文瓘的从母弟，与张文瓘有着非同一般的特殊关系，房遗爱被贬，张文琮作诗为他饯行。永徽三年（652），长孙无忌查明房遗爱“谋反”，将其族诛。由是张文瓘也受到牵连，被贬为建州（今福建建瓯）刺史。

建州地处偏远，土地贫瘠，境内不尚农耕，“素尚淫祀，不修社稷”^②。于是张文琮大力倡导农业，兴修水利，百姓衣食得到保障，欣然听从。不久病卒。张文琮著有文集20卷。

张文琮子张戡，官至江州（今江西九江）刺史，曾撰《丧仪纂要》7卷。张戡弟张锡，武则天时为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之前，张锡姊妹的儿子李峤任参知政事，后降为国子祭酒，张锡代外甥为相。中宗时，迁工部尚书，兼修国史，后任东都留守。中宗死，韦后临朝，与刑部尚书裴谈同为宰相。不久，出为绛州刺史。累封平原郡公，以年老致仕而卒。

张文收，生卒年不详，为张文瓘从父弟。张文收擅长音律，早年阅览萧吉的《乐谱》，认为不够详尽明了，便博采众家之说和历代音乐理论，裁制为十二律吹奏，极尽幽玄之妙。当时，唐太宗正准备汇总前代礼乐制度，于是召张文收进入太常寺，与著名音乐理论家少卿祖孝孙参定雅乐。上古太乐有古钟十二，但当时只用七钟，其余五钟，已经没有人能通晓了，俗号“哑钟”。张文收经过研究，反复调试，终于将十二钟全部奏响，当时人都佩服其巧心妙手。不久任协律郎。贞观十一年（637），张文收上表请求订正调和上古太乐，但唐太宗却说：“乐本缘人，人和则乐和。隋炀帝末年，天下丧乱，即便是更改音律，也不会和谐的。只要四海无事，百姓安乐，音律自然调和。”所以驳回了他的请求。贞观十四年（640），祥云出现，河水变清，张文收采纳《朱雁天马》之义，制《景云河清》乐，用管弦演奏，名曰“燕乐”。“燕乐”成为唐朝此后的弦乐之首，成为元旦朝会等朝廷大型活动的第一首音乐。高宗咸亨元年（670），张文收升任太子率更令。后来死于官任上。撰有《新乐书》12卷。

三、平昌三孟——孟云卿、孟郊、孟简

位于今乐陵、宁津、陵县、商河、临邑五县市交界处的临邑县德平镇，早在东汉时就设

^① 恭陵位于河南省偃师市缙氏镇滹沱村南，为唐高宗李治第五子、武则天长子李弘的陵墓。

^② 《旧唐书》卷八五《张文瓘传附兄文琮传》。

为县，此后两千年里，大部分朝代都是县城驻地，直至民国时期。其中，唐代叫平昌县；五代后唐时期，将安德县东北一部分和平昌县合为一县，两地各取一字，名为德平县。盛唐诗人孟云卿、中唐诗人孟郊和唐代大臣孟简都是当时的平原郡平昌县人，号称“平昌三孟”。

孟云卿（725-?），盛唐诗人。祖籍平昌（今山东省临邑县德平镇），生于河南洛阳。元结《送孟校书往南海序》说：两人“以词学相友”^①，只是孟云卿比自己年少六七岁。元结生于唐玄宗开元七年（719），则孟云卿当生于开元十三年（725）左右。卒年不详。

孟云卿幼年丧父，家道中衰。早年耕读于嵩阳，年二十而学成。天宝年间（742-755），他一面耕读，一面奔波求仕，往来于东、西二京，但屡试不第，所谓“二十学已成，三十名不彰”（《伤怀赠古人》）^②，所以，“气颇难平”^③，心情一直很抑郁。

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孟云卿在长安与大诗人杜甫结识，两人谈诗论道，意气相投。杜甫对他的诗作非常推重，但相识不久，杜甫将要出任华州司功参军，孟云卿也要离开长安，杜甫乃作《酬孟云卿》诗一首：“乐极伤头白，更长爱烛红。相逢难袞袞，告别莫匆匆。但恐天河落，宁辞酒盏空。明朝牵世务，挥泪各西东。”^④眷恋与惜别之情溢于言表。同年冬，两人在洛阳相遇，同到刘颙家中畅饮。杜甫又作《冬末以事之东都湖城东遇孟云卿复归刘颙宅宴饮散因为醉歌》诗，表达了邂逅相遇的悲喜心情和诗友间的诚挚感情。

唐代宗永泰年间（765-766），孟云卿举进士，接着做了一个小官——校书郎。此间，孟云卿与诗人薛据、元结交往甚密，友情至诚，互有诗文赠答。然而，安史之乱后，藩镇强横，宦官专权，吏治混乱，百姓饥苦，唐王朝江河日下。此时，孟云卿已步人不惑之年，官场的险恶使他心情沉闷愁苦，朝中又没有靠山，缺乏“知音”，于是他决定辞官离京南游。大历元年（766）孟云卿离京前，元结正好罢道州刺史任回到长安，因作诗赠别，题为《送孟校书往南海》，诗序中称：“平昌孟云卿与元次山同州里，以词学相友，几二十年……材业次山不如云卿，诗赋次山不如云卿，通和次山不如云卿……云卿声名满天下，知己在朝廷。及次山之年，云卿何事不可至。”^⑤盛赞了孟云卿的品德与才学。

其后，孟云卿远游荆楚、岭南，寻访历代名胜，游览江南秀色，体察庶民风情，对社会现实有更加深刻的了解。在广州，孟云卿曾在岭南节度使幕府短暂任职，但不久即北返。之后，他在荆州寓居多年。大历八年（773），孟云卿北上途中在广陵（今江苏扬州）与诗人韦应物相遇，韦应物作《广陵遇孟九云卿》诗一首。此后的情况便无从考稽了。

孟云卿生活在唐帝国由盛转衰的动荡年代，一生仕途不畅，家境困顿，穷困潦倒，漂泊四方。然而，在诗歌创作方面他却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全唐诗》收录了他的诗1卷，共17首，外零句4句。元结所编《篋中集》收录了七个诗人的作品，其中，他的诗有5首。

孟云卿长于五言古诗，格调追摹于陶渊明，境界取法于陈子昂，语言朴素，风格高古，

① 聂文郁《元结诗解》，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23页。

② [唐]令狐楚、殷璠《唐人选唐诗》，昆仑出版社2006年版，第29页。

③ [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二，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36页。

④ [唐]杜甫撰、[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79-480页。

⑤ 聂文郁《元结诗解》，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23页。

淳朴无华，可谓篇篇精华，有很高的文学造诣。内容以慨伤道德风气衰落、反映社会现实为主，如《寒食》：“二月江南花满枝，他乡寒食远堪悲。贫居往往无烟火，不独明朝为子推”，描述了诗人在贫困和相思中无可奈何的境遇，别具一格，被评为历代寒食诗的佳作。而“虎豹不相食，哀哉人食人”（《伤时二首》之一），颇能反映社会现实，为许多诗人所称道。

《唐才子传》称：“当时古调，无出其右，一时之英也”，“为当代推服”。杜甫在《解闷十二首》之五中曾说：“李陵苏武是吾师，孟子论文更不疑。一饭未曾留俗客，数篇今见古人诗”^①，认为孟云卿的诗，源自汉魏以来的“苏、李诗”^②。高仲武也认为他的诗“祖述沈千运（沈四山人），渔猎陈拾遗（陈子昂）”，有古朴之风。韦应物则称他的诗“高文激颓波，四海靡不传。西施且一笑，众女安得妍”。晚唐诗人张为作《诗人主客图》，以孟云卿、白居易等六人为主划分诗歌流派，称他为“高古奥逸主”。可见，孟云卿的诗在唐朝中晚期确实独树一帜，有较大影响。

孟郊（751-814），字东野，中唐诗人。祖籍平昌（今山东省临邑县德平镇），先世徙居洛阳。唐玄宗天保十年（751）孟郊出生时，其父孟庭玢任昆山县尉，后举家定居湖州武康（今浙江德清）。孟郊早年生活贫困，隐居嵩山读书，号称“处士”^③。后曾周游今湖北、湖南、广西等地。他多次参加科举考试，但屡试不第。唐德宗贞元十二年（796），46岁的孟郊考中进士。唐代，相比明经、秀才，进士科考试不仅严格而且录取人数少，考上进士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所谓“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所以，孟郊觉得总算长出了一口气：“昔日齷齪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④此后，他游汴州（今河南开封）、越州（今浙江绍兴）等地，直至贞元十七年（801）才被任为溧阳（今江苏溧阳）县尉。此时，孟郊已是51岁了。诗歌创作上享誉朝野的他对县尉这个小官一点儿也不感兴趣，尽管到了溧阳，但他终日在池塘边纵酒吟诗，把公务完全抛在脑后。县令只好另任“假尉”代行他的职务，并“分其半俸”^⑤，给他一半的俸禄，孟郊遂辞官。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因得到河南尹郑余庆的推荐，孟郊被任命为河南水陆转运从事，试协律郎，徙居洛阳。60岁时，因母丧去职。孟郊性格“孤僻寡合”，在洛阳期间，他交往不多，唯与韩愈友善。“韩愈一见以为忘形之契，常称其字曰东野，与之唱和于文酒之间”，成为忘年之友。此间，他生了几个儿子却都夭折，生活可谓凄苦不堪。元和九年（814），郑余庆出任山南西道节度使，镇守兴元（今陕西汉中），推荐孟郊为兴元军参谋，试大理评事。64岁的孟郊携家前往，行至阌乡（今河南灵宝），暴病而逝。

孟郊一生“拙于生事，一贫彻骨，裘褐悬结，未尝俯眉为可怜之色”^⑥，凄愁潦倒，穷困失意，甚至死后靠亲友的馈赠才葬于洛阳。当时，韩愈等人凑了100贯为他营葬，郑余庆

① [唐]杜甫撰、[清]仇北鳌注《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514页。

② 托名西汉苏武、李陵赠答的五言古诗，内容以赠答留别、怀人思归、感伤人生为主，情调凄怨，被视为五言诗成熟的标志。

③ 《旧唐书》卷一六〇《孟郊传》。下同。

④ 孟郊《登科后》，参见[清]徐松《登科记考》卷二八《别录上》。

⑤ 《新唐书·韩愈传附孟郊传》。下同。

⑥ [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五《孟郊传》，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88页。

派人送 300 贯“为遗孀永久之赖”。但是，他性格孤直，从不随波逐流。对此，诗人张籍、文坛泰斗韩愈都很佩服。张籍私谥他为贞曜先生，韩愈称他为“穷者”，为其不平而“鸣”（《送孟东野序》），说他“行身践规矩，甘辱耻媚灶”（《荐士》），“内外完好，色夷气清”，诗才“雄鹜”，“神施鬼没，间见层出”（《贞曜先生墓志铭》），在品格、为人和才能上，不失为失意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

孟郊是中唐较有影响的诗人之一，以五言诗为主，不论在思想内容还是在艺术风格上都独具特色。就内容而言，有的反映时代现实，揭露藩镇罪恶，如《征妇怨》、《感怀》、《杀气不在边》、《伤春》等；有的愤慨贫富不均，在为劳动人民诉不平的同时，也给予豪门权贵以辛辣讽刺，如《织妇吟》、《寒地百姓吟》等；有的刻画山水风景，讴歌祖国壮丽河山，如《巫山曲》、《寒溪》、《游终南山》等；有的则是悲叹个人饥寒困苦和坎坷不遇，如《赠李纯亮》、《借车》、《秋怀》等；至于表现骨肉情深的诗篇，如《游子吟》、《归信吟》、《结爱》、《杏殇》等则更为人们所传唱，其中，《游子吟》就是其代表作：“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①表现了一种真诚和执着的感情。苏轼评价说：“诗从肺腑出，出辄愁肺腑”（《读孟郊诗》）。

孟郊诗的艺术风格，或长于白描，不用词藻典故，语言明白素淡而又力避平庸浅易；或精思苦炼，雕刻奇险。这两种风格的诗，都有许多思深意远、造语新奇的佳作。但也有些诗过于艰涩枯槁，缺乏自然之趣，所以有人认为孟郊诗最大的特点是苦吟。他作诗寻求新词句，喜用苦语，诗句苦涩古奥，追求险奇拗折的境界，传达出一种生冷、艰涩、荒寞、枯槁的色彩和意味，把自己内心的愁哀刻划得惊耸人心，如：“冷露滴梦破，峭风梳骨寒。席上印病文，肠中转愁盘”（《秋怀十五首》之二）；“病骨可剗物，酸呻亦成文。瘦攒如此枯，壮落随西曛”（《秋怀十五首》之五）；“老虫干铁鸣，惊兽孤玉咆”（《秋怀十五首》之十二）；“蜿蜒相缠掣，萃确亦回旋。黑草濯铁发，白苔浮冰钱”（《石淙十首》之四）；“劲飙刷幽视，怒水慑余湍”（《石淙十首》之十）。他选择“峭风”、“老虫”、“病骨”、“铁发”、“怒水”、“劲飙”、“黑草”、“冰钱”等暗冷枯硬的意象，传达了自己心中难言的愤懑愁苦。后人把他与贾岛并称，苏轼称之为“郊寒岛瘦”（《祭柳玉文》），韩愈称它“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奭”（《荐士》）。晚唐诗人张为称他是“清奇僻苦主”（《诗人主客图》），金代文学家元好问甚至嘲笑他是“诗囚”（《论诗三百首》）。今存《孟东野诗集》10卷，诗500余首。^②

孟简（？-823），字几道，德州平昌（今山东省临邑县德平镇）人。生年不详，卒于唐穆宗长庆三年（823年）。

孟简曾祖孟洗，武则天时任同州刺史，银青光禄大夫。唐德宗贞元（785-804）初年，孟简参加科举考试，连中进士、博学宏辞两科。贞元九年（793）担任浙东观察使皇甫政的助手。十三年（797），随皇甫政入朝任职，累官至仓部员外郎、吏部员外郎。805年，唐顺

① [唐]孟郊《孟东野诗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5页。

②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刊印有华忱之校订《孟东野诗集》，附有孟郊年谱、遗事辑录。

宗继位，以东宫旧臣王伾、王叔文为翰林学士，韦执宜为宰相，他们与柳宗元、刘禹锡等人结成联盟，共谋打击宦官势力，进行改革。孟简反对王叔文等人的改革，王叔文“恶之虽甚”^①，但不敢明显地贬斥他，最后被宰相韦执宜调到别的部门。唐宪宗继位后，王叔文等人尽遭贬逐，俱文珍为首的宦官势力重又掌权。元和四年（809），孟简被拜为谏议大夫，知匭事。六年（811），成德节度使王承宗反叛，宪宗命宦官吐突承璀为招讨使，带兵进讨。孟简以为不当，“抗疏”、“固争”，结果以“语讦”、“悻切”罪被贬出京，出为常州（今江苏常州）刺史。

孟简到常州后，廉洁奉公，勤于政务，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可谓政绩卓著。当时，长江自镇江以下江宽水深，风大浪高，经常发生运粮漕船沉入大江的恶性事故，为避风险，很多粮船都由南运河至润洲（今江苏镇江）过江至对岸六圩入北运河北上。但北运河个别河段地势高昂，一遇枯水，航船经常堵塞。孟简到任后，经过实地考察，摸清了这一情况，同时了解到由于武进西北无通江大河，加上地势高昂，灌溉困难，农业生产受到极大影响，农民苦不堪言。元和八年（813），孟简征集常州郡内及附近民工 15 万人，对北自河庄（今孟河城）附近长江岸起，南至奔牛附近万缘桥京杭大运河岸一线中间 41 里的旧河道进行贯通拓浚。从此，滚滚江水注入大运河，不仅漕运一下子畅通起来，而且“灌溉沃壤四千余顷”，对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后人为纪念孟简的功绩，因而把新开通的河道称为“孟渎”。

由于政绩突出，孟简当年又被征召回京，拜为给事中，加金紫光禄大夫。然而第二年又被排挤，出为越州（今浙江绍兴）刺史、浙东观察使。原任观察使李迺压抑士族，保护庶民利益。孟简到任后，则一反所为，农商多受其弊，因此受到当地一些官员的指责。在越州，孟简继续修建水利工程。越州山阴东北的朱储斗门、北面的新河、西北的运道塘，“皆元和十年观察使孟简开”^②。元和十二年（817），回京任户部侍郎。十三年（818），转为御史中丞，兼户部侍郎。不久再被排斥出京，任襄州（今湖北襄樊）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第二年，朝廷在他所管辖的谷城县置临汉监牧马，以孟简充任监使。不久又改授太子宾客，调至东都（洛阳）。

当时，户部侍郎掌财政大权，是中央政府的重要职位，且“宰相多由此进”，唐朝一般选用有威望的人担任。孟简很看重此职，所以出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后，心里一直闷闷不乐，“政颇严峭”，为政也就严峻多了。孟简任山南东道节度使期间，以心腹陆翰为上都进奏，并暗中指使陆翰“关通阍侍”，向朝中掌权的宦官行贿。因掌握着这一把柄，陆翰一再要挟孟简。为了灭口，孟简派人以土囊杀之。陆翰子弟告到朝廷，御史台劾查获悉，孟简还曾贿赂吐突承璀钱帛七百余万贯匹。长庆元年（821），唐穆宗贬孟简为吉州（今江西吉安）司马。会大赦，升任睦州（今浙江建德）刺史。第二年，又移为常州刺史。长庆三年（823），复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是年年底，孟简病卒。

①《旧唐书》卷一六三《孟简传》（《新唐书》卷一六〇《孟简传》）。下同。

②《新唐书》卷四一《地理志》。

孟简精通佛典，曾受诏与给事中刘伯刍、工部侍郎归登、右补阙萧俛等在醴泉寺翻译《大乘生心地观经》。四人中，孟简功底最深厚。同时，“尤工诗，善行书”，“闻江、淮间”，“为吴中人所称美”（李观《贻先辈孟简书》），所作《咏欧阳行周事并序》，叙写欧阳詹与太原妓恋爱事迹，颇为动人。《全唐诗》卷四七三录其诗7首，《全唐文》卷六一六收其文3篇。孟简“尚节义，与之交者，虽歿，视恤其孤不少衰”，经常抚恤朋友的孤儿。但是，晚年仕途“躁急”，追求功名，且“佞佛甚过”，所以“为时所诮”，多被时人所责备。

四、宫词翘楚——张祜

张祜，字承吉，小名冬瓜，晚唐诗人。清河（今山东武城）人。生卒年已无从确考，大约生于唐德宗贞元（785-804）初年。

成人后，张祜曾参加进士科考，但落榜不第。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张祜赴许州（今河南许昌），投忠武节度使李光颜，任幕僚。藩镇幕僚有较多的闲暇时间，张祜一方面读书写诗，一方面到周围名城胜地游历，倒也清逸雅致，但仕途的不畅和生活的清贫又时常令他百般缺憾。元和十五年（820），张祜游历淮南，一路会友写诗，抒发胸闷，嗟叹穷贱，游至扬州时，就曾感叹自己“坐愁身兀兀”^①。825年，敬宗继位，以李光颜为太原尹、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张祜复往太原（今山西太原），投依李光颜。次年九月，李光颜去世，张祜乃南游姑苏（苏州）。当时，白居易任苏州刺史，张祜登门拜访，两人“日相聚宴”，饮酒、论诗、会友，意气相投。相传白居易戏称张祜“鸳鸯细带抛何处？孔雀罗衫属阿谁？”为“问头”诗，而张祜亦笑白居易“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为“自连径”，遂为诗坛佳话。

文宗大和三年（829），一向器重张祜才华的令狐楚亲书荐表，向唐文宗推荐张祜，希望给予重任：“祜久在江湖，早工篇什，研几甚苦，搜象颇深，辈流所推，风格罕及。”于是，张祜缮写好几十年来自己所作的300篇诗作来到长安进献。时元稹为尚书左丞，作为文坛元老，有较大影响。当文宗问起张祜的诗作时，元稹却说：“张祜雕虫小巧，壮夫不为，若奖激太过，恐变殿下风教。”元稹的压抑，破灭了张祜的希望，他只好“寂寞而归”^②，后客居淮南。武宗会昌五年（845），时任淮南度支使的杜牧自黄州移至池州（今安徽池州），张祜前往同游，两人吟咏唱和，极相友善。杜牧曾赠诗曰：“何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侯”，并数请其为幕僚，但张祜婉言以谢。自后便沉浮人间，浪迹江湖。

张祜晚年，“性爱山水，多游名寺”，更加专注于诗歌创作。他经常伏案苦吟至深夜，“妻孥每唤之，皆不应，曰吾方口吻生花，岂恤汝辈乎！”宣宗大中年间（847-859），因久慕曲阿（今江苏丹阳）风物，张祜遂举家前往筑室种植，终老于此。享年约70岁。张祜谢世后，太常博士皮日休送挽诗：“一代交游非不贵，五湖风月合教贫，魂应绝地为才鬼，名与遗篇在史臣。”

① [唐]张祜《庚子岁寓游扬州赠崔荆四十韵》，参见《张处士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影印版。

② [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卷四，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下同。

张祜早年写有大量宫怨诗，以宫词闻名天下。如《宫词二首》：“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自倚能歌日，先皇掌上怜。新声何处唱？肠断李延年。”诗句简括凝炼，道出了宫人的辛酸，虽然被元稹污为“雕虫小技”，有伤风教，但艺术水平却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何满子”本是一个宫女的名字，后来演变成词调名称。据说唐玄宗时的歌女何满子，因故得罪玄宗，被推出就刑，就刑前唱歌舞一曲，“苍天白日黯然失色”，皇帝闻之，降旨缓刑。白居易曾作诗：“世传满子是人名，临就刑时曲始成。一曲四词歌八叠，从头便是断肠声。”自从张祜给“何满子”配词后，很快流行起来，宫宫廷内外传唱不衰，据说当时凡艺苑伶人没有不会唱的。武宗病危之际，对身旁的孟才人说：“我是不行啦，你可怎么办呢？”孟才人说：“妾最后给皇上唱个张祜的《何满子》。”当唱到“一声何满子”时，孟才人气绝身亡。漂泊扬州的张祜听到这个凄婉的故事，又作诗一首：“偶因歌态咏娇颦，传唱宫中二十春。却为一声何满子，九泉须吊旧才人。”^①不料此诗又风行开来。

张祜后半生，浪迹江湖，诗歌创作便以流连风景及抒写潦倒生活感受、朋友离合聚散之情的作品为多，其中如《题金陵渡》：“金陵津渡小山楼，一宿行人自可愁。潮落夜江斜月里，两三星火是瓜州。”^②写金陵（镇江）夜景，极为清丽，尤为后人传诵。也有关怀时政和评论诗文的诗，如《读韩文公文集十韵》等。杜牧、李涉、陆龟蒙、皮日休等人对张祜的诗都极为称扬。他在纵情声色、流连诗酒的同时，更任侠尚义，喜谈兵剑，心存报国之志，希图步入政坛，效力朝廷，一展抱负。然而由于他的性情孤傲，狂妄清高，终至仕途坎坷而“千年狂走酒，一生癖缘诗”。杜牧说：“七子论诗唯似公，曹刘须在指挥中”，称他的诗有建安遗风，并为他的遭遇鸣不平：“可怜故国三千里，虚唱歌词满六宫。”^③李涉则说张祜：“爱君气坚风骨峭，文章真把江淹笑”，称他的诗超过南朝文学家江淹，则未免有夸大之辞。

张祜不仅是个大诗人，而且是位音乐家，他精通音律，擅长歌曲，唱工极佳。《新唐书·艺文志》录张祜诗1卷。今存《张处士诗集》5卷、《张承吉文集》10卷。

五、崔氏余脉——崔义玄、崔胤

魏晋南北朝时期，山东士族第一家——清河崔氏，世居武城，曾威名一时。虽然“国史之狱”后，清河崔氏重要支脉之一的崔琰从弟崔林后裔被满门抄斩，从此断嗣，但其他支脉的后裔仍然世居高官，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隋唐时期尤其是唐朝前期，尽管受到政府的不断打压和庶族地主的权力争夺，但他们长期以来形成的家学传统和文化素养，却不会随着政治的失势而一朝丧尽。“齐鲁赵魏，学者尤多，负笈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④，特别是他们迅速适应当时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家学传统由“经学”转向了“文学”，

① [唐]张祜《孟才人叹》，参见《张祜诗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8-69页。

② [唐]张祜《张祜诗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5页。

③ 张祜对曰：“古来名下岂虚为？李白癫狂自称诗。惟恨世间无贺老，谪仙长在没人知。”

④ 《隋书》卷七五《儒林传·序》。

因而在仕途上屡屡得心应手，依然余威不减，仅唐代清河崔氏子弟入进士及第的就有 31 人^①。形成了父子进士、兄弟进士、祖孙进士等一大批文化显贵，如崔日用、崔宗之父子，崔良佐、崔元翰父子，崔瑶、崔璆、崔瑰、崔瑾、崔珮兄弟，崔融、崔禹锡、崔巨祖孙等。崔氏世家“在文化积淀上为地域发展提供文化扩张能力；在经济上为地域发展提供文化创新能力”^②，为唐代德州地域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下面，仅以崔义玄、崔胤为例管窥其在唐代的余威。

崔义玄（586-656），唐初大臣。贝州武城（今山东武城）人。

隋朝末年，义军蜂起，群雄割据，隋炀帝的统治摇摇欲坠。当时，威振中原的是李密领导的起义军——瓦岗军。为了建功立业，饱读经书的崔义玄只身往投李密，但却未被重用。李密的部将黄君汉镇守河内要塞柏崖，握有重兵。崔义玄感到不能施展自己的才能，又看到成群结队的老鼠窜过洛水，有的身上还“槊刃有花文”，于是感慨说：“这是王敦^③谋反败亡的前兆啊！”于是，他前往柏崖（今河南孟津西）劝黄君汉说：所谓英雄，须“见机而作，不俟终日。今群盗蜂起，九州幅裂，神器所归，比在有德。唐公（指李渊）据有秦京（指关中），名应符合命，此真主也。足下孤城独立，宜遵寇恂、窦融（寇恂、窦融皆为东汉初大臣）之策，及时归诚，以取封侯也”^④。黄君汉非常赞同他的看法，立即率部与崔义玄一起投归了唐朝。

归唐后，黄君汉被拜为怀州刺史、行军总管，崔义玄被任命为怀州总管府司马。占据洛阳的王世充派兵侵掠河内，被崔义玄击败，崔义玄乘胜追击，攻取了大量的城堡。黄君汉打算把战争中获得的子女金帛分与他一些，崔义玄“皆拒而不受”。不久，崔义玄因功封为清丘县公。621年，李世民率兵东征王世充，双方在洛阳城展开拉锯战，战斗异常激烈，但最后还是李世民击败了窦建德的援兵，俘虏了王世充，占领了中原。其间，崔义玄“屡献筹策”，而李世民“颇纳用之”、“数用其谋”。因此，洛阳平定后，崔义玄转官为隰州（今山西隰县）都督府长史。

唐太宗贞观年间，崔义玄任左司郎中兼韩王府长史、行州府事。期间，以介直匡正府幕，韩王李元嘉（高祖第十一子）经常委以重任。唐高宗永徽初年，崔义玄迁官婺州（今浙江金华）刺史。永徽四年（653）睦州（今浙江建德）女子陈硕真以宗教神话号召群众，与其妹夫章叔胤举兵反唐，有众数万。陈硕真自称“文佳皇帝”，派兵连克桐庐、睦州等地，兵锋直指婺州。崔义玄督军拒战，然而百姓中流传说：陈硕真曾经升天，有神威，犯其兵者必灭族，因而将士畏惧不前，害怕与之交战。崔义玄以司功参军崔玄籍为先锋，督军力战，“身先士卒”，不到两个月就击败了陈硕真。唐朝对崔义玄大加褒奖，拜升他为御史大夫，让他执掌监察大权。

①安祚璋、王志民主编：《齐鲁文化通史·隋唐五代卷》，中华书局 2004 年版，第 450 页。

②安祚璋主编：《山东通史·隋唐五代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14 页。

③东晋权臣王敦，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诸军事，封汉安侯。朝中宰相官吏多出其门，专擅晋廷，两次率军攻入建康，逼迫朝廷就范。后败亡。

④《旧唐书》卷七七《崔义玄传》（《新唐书》卷一〇八《崔义玄传》）。下同。

高宗欲立武则天为皇后，朝中老臣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坚决反对，李勣、李义府、许敬宗、崔义玄则极力赞同。永徽六年（655），唐高宗最终还是立了武则天为皇后。在这场政治斗争中，身为监察御史的崔义玄对武则天的册立起了重要作用。之后，崔义玄又秉承武则天的旨意，拘禁长孙无忌等人，为武则天执掌大权铺平了道路。显庆元年（656），崔义玄出为蒲州（今山西永济）刺史，但不久即病卒，终年71岁。

崔义玄从小“爱章句之学”，熟谙《五经》、音律。唐高宗曾经让他和诸博士一起修订孔颖达等人编撰的《五经正义》。

崔义玄的儿子崔神基、崔神庆皆有政绩，号为“能吏”。崔神基在长寿年间（692-694）为司宾卿、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中宗初年为大理卿。崔神庆出身明经，武则天时历职莱州刺史、并州长史、礼部侍郎等，死后追赠幽州都督，曾“数上疏陈时政利害，则天每嘉纳之”。到崔义玄孙辈时，崔家更加“昌盛”，“皆至大官，群从数十人，趋奏省阙。每岁时家宴，组珮辉映，以一榻置笏，重叠于其上”。崔琳官至中书舍人、太子少保，崔珪官至太子詹事，崔瑶官至光禄，三家府第“俱列荣戟”，都有警卫把守，号为“三戟崔家”。

崔胤（854-904），字昌遐，唐末大臣。清河武城（今山东武城）人。

崔胤出身于宦宦世家，高祖崔翹官至礼部尚书、东都留守，曾祖崔异位终渠州刺史，祖父崔从历任户部尚书、御史大夫，父亲崔慎由位至宰相。

唐昭宗乾符二年（875），崔胤考中进士，被河中（今山西永济）节度使王重荣看中，辟为从事。不久入朝为官，由于同宗宰臣崔昭纬（中和三年进士科状元）屡加荐用，所以官运亨通，连年擢升，历任考功郎、吏部员外郎、郎中、给事中、中书舍人、御史中丞、兵部侍郎、户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崔昭纬被诛后，崔胤被贬为广州刺史、岭南东道节度使。唐末，藩镇势力坐大，崔胤向来与宣武节度使朱全忠有厚交，“委心结之”^①，于是朱全忠马上上疏言崔胤之功，声称“不宜处外”，不可离辅弼之地。崔胤已行至湖南，昭宗迫于朱全忠的胁迫，又下诏恢复了崔胤的相位。

光化年间（898-900），崔胤四拜宰相，世称“崔四人”。光化三年（900），崔胤与昭宗共谋诛杀了另一宰相王抟和宦官枢密使宋道弼、景务修，于是，“朝廷权政，皆归于己，兼领三司（度支、盐铁、户部）使务，宦官侧目”，成为“权震天下”的人物。然而，宦官此时仍拥有禁军的统领权，昭宗与崔胤的抑制，使宦官特别是中尉刘季述等人十分惧怕。十一月，刘季述率禁军冲入宫中，囚禁昭宗，矫诏令太子继位。由于得到朱全忠的支持，刘季述不敢杀崔胤，只好胁迫他率百官请太子李裕嗣位。崔胤致书朱全忠，请求其出师问罪。在大军进逼之下，京城宦官惶恐不安。左神策军指挥使孙德昭与崔胤斩衣带为誓，伏兵诛杀刘季述，昭宗复位。崔胤以功进位司徒，兼领度支、盐铁、三司等职。

昭宗复位后，对崔胤宠遇无比，召见时甚至不喊其名而呼其字。遇有要事，两人便在内殿商议，崔胤经常深夜才回家。当时，宦官对他畏惧万分，事无大小皆向他报告。崔胤与另

^①《旧唐书》卷一七七《崔胤传》（《新唐书》卷一五八《崔胤传》）。下同。

一宰相陆扈主张夺取宦官兵权，由二人分领左、右神策军，宫人只掌内司事，但由于孙德昭等人反对，昭宗只好用韩全晦、张弘彦为左右中尉。不久，崔胤又上书请尽诛宦官，韩全晦等人伺知后，到昭宗面前求哀请命，昭宗只好把崔胤的上奏密封起来，暂时搁置此事。后来，韩全晦等人挑选机灵而知书的美女数名纳入宫中，侍从昭宗左右，将昭宗的一言一行监视起来。韩全晦禁止昭宗单独召见朝臣，崔胤大惊，遂遗书朱全忠，称受密诏，令其以兵迎帝至东都。天复元年（901）夏，朱全忠的大军已取得河中之地，逼近京城。韩全晦等人劫持昭宗西奔凤翔节度使李茂贞，后妃诸王百余人被逼上马，恸哭不绝，京城火光冲天，尸相枕藉。孙德昭率所部守崔胤府第，百官及士民避乱者皆往依之。是年冬，朱全忠取华州（今陕西华县），入长安，崔胤率百官至渭桥迎谒。时值朱全忠五十大寿，崔胤竟屈身为其持板歌唱，捧杯祝颂，极尽献媚之态。

天复二年（902），朱全忠为争夺唐昭宗，取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率大军围攻凤翔。李茂贞每战辄败，只好闭城不出。凤翔城中粮草无继，斗米七千，饿死者日以千计，以致烧人尿煮尸而食。甚至昭宗也不得不自磨豆麦以求生存。于是李茂贞杀韩全晦等20余人，交出唐昭宗，请和于朱全忠。昭宗还京，崔胤复相并兼六军十二卫事。崔胤与朱全忠请诛除宦官，于是，中外宦官尽被诛杀，唐中叶以来历时一百多年的宦官专政之祸，至此结束。此后，朱全忠留步骑万余及党羽佐崔胤，率大军东归。崔胤诛杀宰相卢光君、苏检等人，排斥从幸近臣陆扈等30余人，只留下一个孤立可制的裴贲与己共同辅政。此时的唐昭宗“威令尽去”，“动静皆决于胤”，完全成了傀儡。

朱全忠身兼宣武等四镇节度使，进爵梁王，拥兵数十万，四处攻掠，篡唐之心日益明显。于是崔胤以防李茂贞为辞，召募兵众，充实龙武、羽林、神策诸军，以图发展个人势力。朱全忠表面同意，心里却不高兴，他偷偷地让部下数百人应募，并且让他的儿子朱友伦入宫宿卫，以此牵制崔胤。天复四年（904）正月，朱友伦因击鞠坠马而死，朱全忠怀疑是崔胤所为，大为盛怒，先将与朱友伦击鞠者十余人全部杀死，接着又密遣其侄、宿卫都指挥使朱友谅率军包围崔胤府宅，将其杀死。崔胤死时51岁，长安民众听说崔胤被杀，纷纷向他的尸体投掷瓦砾砖石以泄其忿。崔胤死后十天，朱全忠便逼迫昭宗迁都到了洛阳。

崔胤一生，“长于阴谋，巧于附丽，外示凝重而心险躁”，虽长期为相，权倾一时，但晚年却只是空头宰相，受制于朱全忠。朱全忠靠参加黄巢起义起家，后叛变降唐并在907年灭唐自立，结束了唐朝320年统治。大唐之亡，崔胤难辞其咎。这大概就是《旧唐书》称崔胤“与盗合从”、《新唐书》把他列入《奸臣传》的原因吧。

第三节 隋唐时期德州的抗暴与抗叛

隋朝末年，面对隋炀帝的暴政，以孙安祖（武城人）、张金称（夏津人）、窦建德（武城人）、郝孝德（平原人）、格谦（陵县人）、刘黑闥（武城人）为代表的德州人民掀起了轰轰

烈烈的反抗斗争；唐朝中叶，面对安禄山、史思明反叛朝廷、分裂国家的倒行逆施，平原太守颜真卿不畏强敌、大义凛然，义无反顾地带领德州人民展开了维护国家统一的斗争；唐末五代，德州人民在割据战乱、血雨腥风中艰难度日、聊以求生，期冀安定与和平的曙光早日降临。

一、窦建德反隋大起义

隋朝末年，隋炀帝对人民实行残暴统治，滥用民力，巡游无度，穷兵黩武，阶级矛盾迅速激化。各地人民纷纷举行反隋起义，并逐渐汇集成瓦岗军、河北起义军、江淮起义军三支大军。其中，河北起义军的领袖就是贝州漳南（今山东武城县鲁权屯镇漳南镇村）人窦建德。

窦建德（573-621），出身农家，世代务农，性格豪爽，武力过人，行侠仗义，有勇有谋，年轻时就“重然许，喜侠节”^①，在当地享有很高威信。后来，窦建德曾经做过里长，也曾经因犯法逃往外地，但不久即遇赦而归。他父亲的葬礼上，竟有一千多人前来送葬，所有赠予“皆让不受”^②。

大业七年（611），隋炀帝下诏征讨高丽，窦建德和他的同乡好友孙安祖都被征召，由于骁勇善战，窦建德被任命为“二百人长”。孙安祖以贫穷为由拒绝从征，被县令拷打，孙安祖杀死县令后逃到窦建德住处。窦建德劝孙安祖说：“今水灾严重，民力凋敝，朝廷不但不救济，反而大肆征召，以至人心浮动，群情怨愤。大丈夫当建功立业，现在正是起兵干一番大事业的时候！”又说：“我知高鸡泊中广大数百里，莞蒲阻深，可以逃难，承间而出，虏掠足以自资。既得聚人，且观时变，必有大功于天下矣”^③于是，孙安祖逃到高鸡泊（今河北故城西南），组织数百名贫苦农民和逃亡士兵举起了武装起义的大旗。因助孙安祖起义，隋地方官府捕杀了窦建德的全家老小。当时，高鸡泊还有高士达领导的一支反隋武装。窦建德闻讯，率领部下二百人参加了高士达的队伍，任司兵。

大业十二年（616），涿州太守郭绚率兵士万余人进攻高鸡泊，高士达以窦建德为军司马统帅义军，自己则留守辎重。窦建德率精兵七千人诈降郭绚，首先派人给郭绚递上降书，说自己因与高士达不和而前来投奔。郭绚心怀疑虑之际，高士达也四处宣称窦建德背信弃义投降隋军，并将俘获来的一名妇女以窦建德妻子的名义杀掉。郭绚终于相信了窦建德，放松了警戒，率兵至长河（德州）界地与窦建德相会。窦建德抓住战机，发起突然袭击，大破郭绚军，杀其数千人，获马千余匹，斩首郭绚。此役“威振山东”，士气大振。不久，隋太仆卿杨义臣在清河镇压了另一支起义军张金称部，乘势进至平原（今山东陵县），准备进攻高鸡泊。窦建德对高士达说：“杨义臣乃隋朝‘善将’，又乘胜而来，我们不能跟他硬拼，而应当暂避其锋，寻机破敌。”高士达不同意窦建德的意见，引兵与隋军决战，结果兵败被杀。窦建德只好率百余人轻骑突围，北上攻占饶阳（今河北饶阳）。杨义臣以为解决了高鸡泊，

① 《新唐书》卷八五《窦建德传》。下同。

② [清]嵇璜等撰、纪昀等校《续通志》卷二〇一。

③ 《旧唐书》卷五四《窦建德传》。下同。

大患已除，于是引兵而去。窦建德乘机杀回高鸡泊，为高士达发丧，收集高士达旧部，得数千人，重整旗鼓，军旅复振。此后，窦建德自称“将军”。

经过战争的洗礼特别是高士达的败亡教训，窦建德开始注意斗争策略，争取那些一般官吏。攻克景城后，俘户曹张玄素，窦建德欲斩之，景城县民千余人号泣愿代其而死，并说：“户曹清慎无比，大王杀之，何以劝善！”^①窦建德于是将张玄素释放，以其为治书侍御史，但被张玄素拒绝。直到隋朝灭亡，窦建德再任张玄素为黄门侍郎，张玄素这才受命。饶阳令宋正本，博学有才，被引为上客，参与谋议。凡此等等，效果还是很显著的。当时，“群盗（各支义军）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杀之，独建德善遇之。由是隋官稍以城降之，声势日盛，胜兵至十余万人”^②。

大业十三年（617）正月，窦建德在河间郡乐寿县（今河北献县）筑坛，自立为长乐王^③，建年号“丁丑”，设官置署，分治郡县，建立了自己的农民政权。接着，率兵攻占信都（今河北冀县）、清河诸郡，并俘斩隋将杨善会于清河。当时，隋朝东都洛阳正被瓦岗军包围，左御卫大将军涿郡留守薛世雄奉命带领涿州精兵三万南下增援洛阳，隋炀帝同时下令“所过盗贼，随便诛剪”^④。薛世雄部进占七里井（今河北河间南），准备进攻刚刚在乐寿称王的窦建德。此时，窦建德军在乐寿周围各县分散收麦，窦建德本人在武强（今河北武强西南）征粮，闻薛世雄前来，遂下令撤出义军所占诸城，以麻痹薛军。薛世雄以为义军怕自己，放松了警惕和戒备。窦建德亲率敢死队一千人星夜奔袭薛营。翌日凌晨，窦建德进抵薛营前，正值大雾迷漫，咫尺莫辨。敢死队突然发起冲击，后续部队也很快投入战斗，薛军大乱，纷纷离帐逃命，自相践踏，死者万余人，几乎全军覆没，薛世雄只带了数百骑逃回涿州。

河间战役是河北战场一次决定性的战役。大战之后，薛世雄发病不起，不长时间就死掉了。窦建德乘胜进攻，河北大多数郡县都被义军所占领，唯有河间城高池深，义军围困一年多不果，后来河间郡丞王琮听说隋炀帝在江都被杀，只好投降。王琮率官吏素服面缚至义军营门，窦建德亲自为其松绑，谈到隋朝灭亡时，王琮伏地痛哭，窦建德也受其感染，流泪不已。窦建德部下说：“琮拒我久，杀伤甚众，计穷方出，今请烹之。”窦建德则说：“此义士也。方加擢用，以励事君者，安可杀之！往在泊中共为小盗，容可恣意杀人，今欲安百姓以定天下，何得害忠良乎？”当日，封王琮为瀛州刺史。消息传到河北郡县，各郡县纷纷归附于窦建德。

大业十四年（618），窦建德改国号为“夏”，自称“夏王”，改元“五凤”，以宋正本为纳言，孔德绍为内史侍郎，继续在河北扩大势力。上谷（今河北易县）人魏刀儿于隋末随王须拔聚众起义，活动在今河北、山西一带。王须拔攻涿郡中流矢而死，他自称魏帝，转战于博陵（今河北定州）、信都（今河北冀县）等地，拥众十万，势力颇强。窦建德表面上

① 《资治通鉴》卷一八五。

② 《资治通鉴》卷一八三。

③ 窦建德称长乐王的时间，《旧唐书·高祖纪》为武德元年；《隋书·炀帝纪》、《旧唐书·窦建德传》及《资治通鉴》卷一八三，均为大业十三年。

④ 《资治通鉴》卷一八四。

与魏刀儿结盟，等其放松戒备时，突然发起进攻，魏刀儿被部下擒送于窦建德，余部全部被改编。窦建德还派兵连克易州（今河北易县）、定州（今河北定州），并亲自领兵攻取冀州（今河北冀县）。当年年底，窦建德率十万兵马进攻幽州（今北京西南）。此时，据守幽州的罗艺已经降唐，部属薛世雄之子薛万均献策，以残兵临水背城为阵，引诱窦建德。连续的胜利，使得窦建德也骄傲起来。窦建德指挥大军渡河，半渡时，薛万均率埋伏于城侧的百名精骑邀击，窦建德军大败，只好撤回乐寿。这是河北起义军的第一次失败。

武德二年（619），隋将宇文文化及与李密争夺中原失败后进驻聊城（今山东聊城东北），窦建德抓住战机，率十万大军以夏津为转输地进攻宇文文化及，连战皆捷，宇文文化及被迫退守聊城。窦建德用撞车、抛石，四面急攻。此前诈降宇文文化及的农民军首领王薄则开城引窦建德军入城，宇文文化及被俘。窦建德入城，先拜见隋萧皇后，并穿素服为隋炀帝哭丧尽哀，接着将传国玉玺及卤簿仪仗收为已有，斩杀宇文文化及父子。

此后，窦建德继续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当月，窦建德攻克邢州（今河北邢台），生擒唐邢州总管陈君宾。六月，窦建德攻陷沧州（今河北沧州东南）。八月，窦建德将兵十余万攻克洺州（今河北省永年县东南），唐淮安王李神通率诸军退保相州（今河南安阳），唐总管袁子干率部投降。九月，窦建德乘胜攻克相州、赵州，杀唐相州刺史吕珉，擒唐赵州总管张志昂、慰抚使张道源。十月，窦建德攻破黎阳，俘唐淮安王李神通，李世绩投降。窦建德以李世绩为左骁卫将军，镇守黎阳。农民起义首领徐圆朗归降。滑州刺史王轨为下人所杀，下人携王轨首级投奔窦建德，窦建德认为“奴杀主为大逆”反将其斩首，滑州吏民感而归降。至此，河北大部及河南一部均为窦建德所占。随后，窦建德筑万春宫，迁都洺州。

这时，窦建德的夏政权处在极盛时期。窦建德注意减轻农民负担，并劝课农桑，发展生产。农民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打击的对象主要是地主豪强。在夏政权范围内，“盗贼不行，商旅野宿”，一片太平景象。窦建德虽然是指挥千军万马的领袖，但仍然保持着农民的朴素本质，依然过着艰苦的生活，与士卒同甘共苦。他不吃肉，不喝酒，以青菜、小米、脱粟为食，他的妻子曹氏也“不衣纨绮”。“每平城破阵，所得资产，并散赏诸将，一无所取”，在聊城俘获的宫女有千余名，窦建德下令全部予以释放。所以士卒用命，人民拥护，“兵所加而胜，令所到而服”。

小农经济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小农意识是农民阶层的主体意识。中国封建社会，农民能够忍受“合法”的剥削和奴役，只是在暴君“不仁”、“不恤百姓”时才起来反抗。作为农民典型代表，窦建德无论在他“任气侠”的青年时代，或是在他聚众起义为天下“立大功”称夏王“欲安百姓以定天下”的壮岁之年，骨子里的小农意识从未改变。

窦建德称夏王以后，虽然河北臻于安治，但就当时全国形势的发展变化来说，却使夏政权逐渐转入逆境。随着隋朝的灭亡、唐朝的东进以及夏政权势力的扩张，窦建德逐渐骄傲自大起来。王世充称帝，建国号“郑”以后，窦建德随即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下书称诏。而他骄矜愎谏，生性多疑，爱信谗言，冤杀忠直，也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大将王伏宝随

窦建德征战多年，勇冠三军，才略过人，功绩在诸将之上，结果遭到诸将的忌妒，被诬谋反，窦建德不问清楚便将王伏宝杀死。王伏宝临死时忿然说：“大王奈何听谗言，自斩左右手乎？”宋正本切言直谏，为人谗害，自此，“人以为诚，无复进言者，由是政教益衰”。

窦建德还任用了不少有才干的隋官，隋黄门侍郎裴矩被任为左仆射，隋兵部侍郎崔君肃被任为侍中，隋少府令何稠被任为工部尚书，隋右司郎中柳调被任为左丞，隋秘书监虞世南为黄门侍郎，隋太常博士欧阳询为太常卿。其中，裴矩为窦建德“创定朝仪，权设法律，建德大悦，每咨访焉”^①，对夏政权贡献犹大。但是，降附的大批隋唐官员，虽受礼遇，并委以重任，但大多不忠，有的观望形势，暗持二端，有的阴谋策划，准备叛乱，有的甚至阴谋杀害窦建德，向唐廷邀功请赏。唐将徐世勣被迫降夏，经营河南骗取信任后乘机逃走。

武德元年（618），李渊在长安称帝，建立唐朝。秦王李世民先后平定割据西北和北方的薛仁杲、李轨、刘武周，然后大举东进，全力经营中原。消灭宇文化及后，窦建德曾采取与东都王世充、突厥始毕可汗和好的策略。但窦建德与唐朝相比，无论所处的战略位置，或是军事力量，都居劣势。

武德三年（620），李世民率大军全力围攻洛阳，王世充不得不乞援于窦建德。窦建德的中书侍郎刘彬建议说：“天下大乱，唐得关西，郑得河南，夏得河北，共成鼎足之势。今唐举兵临郑，自秋涉冬，唐兵日增，郑地日蹙；唐强郑弱，势必不支，郑亡则夏不能独立矣！不如解忧除忿，发兵救之。夏击其外，郑破其内，破唐必矣。唐师既退，徐观其变，若郑可取则取之，并二国之兵，乘唐师之老，天下可取也。”^②应该说，这个分析是合理的，关键是采用什么战略。窦建德恰恰用了错误的战略。十一月，窦建德命大将范愿守曹州，自将孟海公、徐圆朗部援救王世充。孟、徐两部都是新附亲征之人，对窦建德并不心服，战斗力和纪律性又差。窦建德统大军西向，到达滑州，屯军酸枣，连克管州（今河南郑州）、荥阳、阳翟等地，水陆并进，抵达成阜东原。在这以前，窦建德致书李世民，要求唐军退回潼关。李世民聚帐下文武会议，宿将屈突通、谋士封德彝主张“退保”，谋士薛收主张围城打援，以逸待劳，被采纳。

唐军进驻虎牢^③，骁将李世绩、程知节、秦叔宝则分别统兵埋伏于关东二十里处。李世民与骁将尉迟敬德仅带四骑出关侦察。在离窦建德军营三里处，猝遇窦军游骑。窦建德闻讯，派五六千骑兵前来追杀，却不想被李世民引入伏击圈，骁将殷秋、石瓚被俘。窦建德屯兵累月，不能攻克虎牢，粮运屡被抄截，频战不利，将士思归。

武德四年（621）五月，窦建德急于求战。李世民故意在虎牢黄河岸边放出千余匹战马，以为诱饵。窦建德部全军出动，“自板渚出牛口署阵，北距大河，西薄水，南属鹤山，至二十里，鼓行而进，（唐）诸将皆惧。”李世民登高瞭望后，认为夏军“度险而嚣，是无纪律，

① 《旧唐书》卷六三《裴矩传》。

② 《资治通鉴》卷一八八。

③ 虎牢关，位于今河南省荥阳市区西北部16公里的汜水镇，因西周穆王在此牢虎而得名。这里南连嵩岳，北濒黄河，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秦汉以后，历代王朝无不在此设防。

逼城而阵，有轻我心”，下令将士按甲不出，待其饥渴。中午时分，夏军士卒饥渴疲惫，争取饮水，唐军全面反扑，突然冲杀过来。窦建德军未及列阵抵抗，仓猝应战，被迫东退。李世民率骁将史大奈、程知节、秦叔宝、宇文歆等精锐突入其阵，斩窦建德军首级三千余，俘五万人。乱军中，窦建德中槊受伤。退至牛口渚，唐车骑将军白士让、杨武威追至，窦建德于慌乱中坠马被俘，夏军溃败。王世充穷蹙乞降，唐军遂取得东都。裴矩“举山东之地，奉传国玺等八里降唐”。七月，窦建德在长安被斩杀，时年49岁。

窦建德自起兵至败亡，前后11年。他“义伏乡间，盗据河朔，抚馭士卒，招集贤良。中绝世充，终斩化及，不杀徐盖，生还神通，沉机英断，靡不有初。及宋正本、王伏宝被诬见害，凌敬、曹氏陈谋不行，遂至亡灭，鲜克有终矣”。虽终因“悞谏”和缺乏政治远见而败亡，但他仍不失为一位杰出的农民领袖。他死后，魏州（今河南安阳）人民为他建立了夏王庙，四时祭祀。窦建德的家乡漳南镇，至今尚有他的“点将台”遗址。一千多年来，窦建德的事迹广为流传。

刘黑闥（？-623），隋朝贝州漳南（今山东武城）人。青年时期，刘黑闥身体强健，头脑灵活，出身农家却不好农事，喜欢结交豪友，一有机会就与他们喝酒下棋，甚至连续几天不回家。他不安本分，不置产业，父亲、大哥多次责骂他，他却秉性不改。与窦建德“少相友善”^①，交往甚密。每年春天，家中难以糊口的时候，窦建德都资助他。

隋朝末年，群雄并起。611年，今鲁西北地区，孙安祖、张金称、高士达、窦建德先后领导贫民起义。613年，平原（今山东平原）人郝孝德又聚众起义。不久，刘黑闥加入了郝孝德的队伍。郝孝德、王薄、孙宣雅等联军攻打章丘（今山东章丘），被隋将张须陁战败。617年，刘黑闥随郝孝德投李密，参加瓦岗军。618年，王世充战败李密，刘黑闥也被俘虏。王世充“素闻其勇”，任他为军马总管，使之镇守新乡。但他看不起王世充，因而率部下投归了河北窦建德。窦建德任他为将军，封汉东郡公。刘黑闥“遍游诸贼，善观时变，素骁勇，多奸诈”，是不可多得的武将，因此，每有战事，窦建德就以他为前锋。他深入敌营，觊视虚实，经常“出其不意，乘机奋击，多所克获”，因而军中号为“神勇将军”。

621年，窦建德被杀后，刘黑闥逃匿漳南，闭门不出。适逢唐高祖李渊下令窦建德部将范愿、董康买、曹湛、高雅贤等人赴长安，诸将疑畏不安。范愿说：“我辈若至长安，必无保全之理……若不起兵报夏王（指窦建德）仇，实以耻见天下人物……刘黑闥果敢多奇略，宽仁容众，恩结士卒，吾久尝闻刘氏当有王者，今举大事，欲收夏王之众，非其人不可。”于是他们共赴漳南，向刘黑闥告以来意。刘黑闥大喜，杀牛会众，举兵得百余人，袭破漳南县。唐朝贝州刺史戴元祥、魏州刺史权威合兵围攻，也被刘黑闥战败。

为了动员更多的人参加起义，刘黑闥设立祭坛祭祀窦建德，并自称大将军。一时，窦建德故将士纷纷起兵响应，兖州起义军领袖徐圆朗也与刘黑闥联合。唐高祖李渊闻讯，极为不安，先后派淮南王李神通、将军秦武通、王行敏领兵进攻，但皆为所败。黎州总管李世绩战

^①《旧唐书》卷五五《刘黑闥传》（《新唐书》卷八六《刘黑闥传》）。下同。

败退守洺州，刘黑闥进军，大破其军，李世绩仅以身免。随后，刘黑闥派兵进攻河北郡县，不到半年，便尽得“夏”故地。唐武德五年（622）正月，刘黑闥称汉东王，建都洺州，建元“天造”，以范愿为左仆射，董康为兵部尚书，高雅贤为左领军，王小胡为右领军。“其设法行政，皆师建德，而决战勇决过之”。

刘黑闥的崛起，对刚刚诞生的唐王朝是一个极大的威胁。于是秦王李世民自请领兵围攻刘黑闥。李世民收复相州，进军至肥乡县，沿洺水列阵进逼洺州城，刘黑闥率精兵二万攻唐军，两军自中午战至黄昏，战斗十分激烈，最后，唐军决洺水堰，刘黑闥兵溃，与范愿等率余部逃奔突厥。

洺水之役后，唐军在河北肆意戮掠，参加义军的将士多被杀戮，妻子多被掳走，而逃脱的义军首领都以死罪悬名缉捕，一旦捕获，即行杀戮。一时，人心危惧。此后，刘黑闥引突厥兵再度南下，攻掠河北郡县，复都洺州。唐高祖以淮阳王李道玄为河北总营，下博（今河北深县东南）一战，李道玄死于军中。唐洺州总管庐江王李瑗被迫弃城西走，相州（今河南安阳）以北州县相继归附，数日之间，尽复故地，再次还都洺州。高祖又诏齐王李元吉进击，亦不能胜。不得已，高祖乃以皇太子李建成督各路兵马合攻刘黑闥。李建成采纳魏征建议，释放所有原窦建德部下及家属，宣布不追究以往“罪过”。李建成“频战皆捷”，刘黑闥步步退兵。义军粮尽，军心动摇，纷纷叛变。623年2月，刘黑闥大败于馆陶，仅率百余人逃至饶阳（今河北饶阳），部下诸葛德威诱执刘黑闥，举城降唐。刘黑闥大骂：“狗辈负我！”诸葛德威把他执送到李建成军前，李建成斩杀之。起义终告失败。

二、颜真卿奋戈平原郡

颜真卿（709-785），字清臣，号应方，唐代书法家。祖籍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后徙居京兆万年县（今陕西西安）。

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26岁的颜真卿中进士甲科，从此踏上仕途。经玄、肃、代、德四朝，历任监察御史、平原太守、刑部尚书、御史大夫、浙西节度使、太子少师、太子太师等职。因其“立朝正色，刚而有礼，非公言直道不萌于心”^①，敢于面折权贵，直言无讳，因此先后受到宰臣杨国忠、元载、杨炎、卢杞及宦官李辅国的妒忌和排斥，虽有高功硕德，却不能久位于朝，屡遭贬谪。然而他却不以去国为忧，忠君爱民，勤于政务，特别是同安禄山、李希烈等叛乱势力展开殊死斗争，并最终献出生命，成为忠臣烈士的典范。

颜真卿出任平原郡（治所在今陵县）太守之前，在京城长安任殿中侍御史。当时，玄宗在位，杨贵妃得宠，杨国忠等一班佞臣横行朝廷，滥施淫威。颜真卿屡进忠言，遂为杨国忠所不容。天宝十二年（753），杨国忠诡称“妙择”，出颜真卿为平原太守。

在平原任上，颜真卿以敏锐的目光察觉到，身兼范阳、卢龙、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必反，便以防淫雨为名，修筑城墙，开挖河池，招募丁勇，储备粮草，做战守准备。元代王恽在《玉堂嘉话》卷四中曾说：“德州城壁堑高深，城门内起直城前障，掩蔽内外，左右壘

^①《旧唐书》卷一二八《颜真卿传》（《新唐书》卷一五三《颜真卿传》）。下同。

道，其尾相属，传云：皆颜鲁公制也。”^①经过颜真卿的修筑，平原城成为“河北雄郡”。颜真卿把招募起来的一万多勇士，全部交由录事参军李择交统领并负责训练，以刁万岁、和琳、徐浩、马相如、高抗朗等为将，做好了防守准备。为了不引起安禄山的注意，他天天大会宾客，泛舟饮酒，赋诗作书，极力给人造成一种文人墨客超凡脱俗、不虑国事的假象。但狡猾的安禄山对颜真卿仍不放心，派幕僚平冽、李史鱼等人，以河北采访使判官的名义，巡视平原郡，刺探防务情况。颜真卿将计就计，陪同平冽等人遍游本郡名胜古迹，并重新刻写了《东方朔画赞碑》。安禄山得到情报，疑虑顿失，认为颜真卿不过是舞文弄墨、儒雅风流的书呆子，不足为虑。

天宝十四年（755），安禄山举兵范阳，率精兵 15 万大举南下。河北郡县或开城投降，或弃城逃窜，大部失陷，“独平原城守具备”，兵精粮足，戒备森严，叛军久攻不下，绕道而去。“渔阳鞞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白居易《长恨歌》），叛军长驱南下的消息传到京城，唐玄宗举手无措，叹息说：“河北二十四郡竟没有一个忠臣，看来河北无望了！”等到颜真卿的司兵参军李平驰马至京报告了平原郡的情况后，唐玄宗大喜，对左右说：“颜真卿这个人真了不起，竟有如此功业！朕怎么就想不起这个人呢？他是什么模样？”

第二年，安禄山渡过黄河，攻陷洛阳，并称大燕皇帝，分兵向潼关进攻。为了消除后顾之忧，安禄山派部将段子光携唐将蒋清等三人首级到河北示众，欲胁迫颜真卿等降服。颜真卿毫不畏惧，腰斩段子光，召集全体将士举行誓师大会，历数安禄山分裂国家的罪行，号召大家齐心报国，勇杀叛贼。此时，颜真卿的从兄颜杲卿在常山（今河北正定）也举起了抗叛的旗帜，与平原成犄角声援之势。不久，河北十七郡联合响应，推颜真卿为盟主，“集兵二十万，横绝燕赵”，切断了洛阳到范阳的联系。清河人李萼和同郡几个人来到平原请求颜真卿派兵援救，称颂颜真卿“义烈”、为河朔“长城”，于是颜真卿与清河、博平之师合兵一处，屯于博平（今山东茌平西）。安史将领白嗣深、乙舒蒙等率兵二万人来战，颜真卿遣其大将李择交、副将平原县令范东馥、裨将和琳、徐浩等分路进兵，大败叛军，斩首万余级。唐玄宗得报，少觉宽慰，下诏加颜真卿户部侍郎，仍为平原太守，据守河北。

唐肃宗继位后，拜颜真卿为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河北采访招讨使。河北形势的骤变，迫使安禄山停止进攻潼关，派史思明、尹子奇率军全力进攻河北，饶阳、河间、景城、东安相继失陷，独平原、博平、清河三郡依然固守，但是，被叛军重重包围，“人心危荡，不可复振”。危难之际，为牵制叛军，颜真卿不顾将士劝说，毅然派自己的独生儿子颜颇冒险跨海去渔阳（今河北密云）联络平卢守将刘正臣，在敌后起兵，夹击叛军。颜真卿的义举极大地感召了人民，他们坚守城池，决心与平原城共存亡。

当时，叛军已夺取长安，气焰正盛，身陷叛军重围的平原，内无粮草，外无援兵，人心恐慌。于是，至德元年（756）十月，颜真卿只好洒泪告别平原，渡河取道江淮、荆襄入朝。第二年四月，辗转来到唐肃宗车驾所在的风翔，被授予宪部尚书、御史大夫。

^① [元]王恽《玉堂嘉话》，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45 页。

颜真卿秉性正直，笃实纯厚，有正义感，从不阿于权贵，屈意媚上，因而屡遭迫害。肃宗朝，为宦官李辅国所忌，贬为蓬州长史。代宗即位，拜利州刺史，迁户部侍郎、尚书左丞、进封鲁郡公。曾弹劾宰相元载等多人。由于言辞激切，文采横生，宦官们争相抄写并向宫外传播。德宗朝，加官太子太师，先后为权相杨炎、奸相卢杞所嫉恨。当时，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反叛，攻陷汝州，于是卢杞乘机上奏德宗：“颜真卿四方所信，使谕之，可不劳师旅”，糊涂的唐德宗竟然同意了卢杞的提议。众朝臣皆惊讶“失色”，知道这是卢杞携私报复，颜真卿此去必将一去不复返。但是，颜真卿以社稷为重，不顾年老体弱，义无反顾地奔赴了淮西。李希烈用尽各种方式，威逼利诱，颜真卿终不为动。后被缢杀，享年77岁。

平定淮西叛乱后，颜真卿的灵柩被护送回京，德宗“痛悼异常，废朝五日，谥曰文忠。”《旧唐书》赞曰：“自古皆死，得正为顺。二公（颜真卿、颜杲卿）云亡，万代垂训。”

德州四年，是颜真卿光辉人生最亮丽的一段时光。在唐朝危难之际，颜真卿挺身而出，率领河北人民展开了同叛军的殊死搏斗，为唐王朝重新组织力量平定反叛势力奠定了基础。这种不畏艰险、忠君爱国的精神，赢得了后人的敬仰。宋代民族英雄文天祥被押解大都途中经过平原，写下了感情挚深的《过平原》，盛赞其精忠之节：“平原太守颜真卿，长安天子不知名。一朝渔阳动鞞鼓，大河以北无坚城。公家兄弟奋戈起，一十七郡连夏盟。贼闻失色分兵还，不敢长驱入咸京。明皇父子将西狩，由是灵武起义兵。唐家再造李郭力，若论牵制公威灵。哀哉常山惨钩舌，心归朝廷气不慑。崎岖坎坷不得志，出入四朝老忠节。当年幸脱安禄山，白首竟陷李希烈。希烈安能遽杀公，宰相卢杞欺日月。乱臣贼子归何处，茫茫烟草中原土。公死于今六百年，忠精赫赫雷行天。”^①

颜真卿是我国古代继王羲之之后影响最大的书法家。作为开一代书风的书法艺术家，颜真卿开创的颜体楷书，筋力丰满，刚健雄浑，遒劲厚重，雍容堂正，完全契合了大唐的胸襟、气度和神韵，对后世书家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其代表作东方朔画赞碑现存于山东陵县文博苑，拓本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画赞碑》额篆“汉太中大夫东方先生画赞碑”，阳额为篆书，碑阴记为颜真卿撰文并楷书，额为隶书。碑四面刻，碑阳、碑阴各15行，一行30字，碑侧各3行，一行30字，共36行1073字。

《东方朔画赞并序》为西晋文学家夏侯湛（243-291）所撰，被萧统收入《昭明文选》，全文如下：

大夫讳朔，字曼倩，平原厌次人也。魏建安中，分厌次以为乐陵郡，故又为郡人焉。事汉武帝，《汉书》具载其事。

先生瑰玮博达，思周变通。以为浊世不可以富贵也，故薄游以取位；苟出不可以直道也，故颀颀以傲世；傲世不可以垂训也，故正谏以明节；明节不可以久安也，故诙谐以取容。洁其道而秽其迹，清其质而浊其文。弛张而不为邪，进退而不离群。若乃远心旷度，瞻智宏材，倜傥博物，触类多能。合变以明算，幽赞以知来。自《三坟》、《五典》、《八索》、《九

^① [宋]文天祥《文天祥全集》，中国书店出版社1985年版，第366页。

丘》，阴阳图纬之学，百家众流之论，周给敏捷之辩，支离覆逆之数，经脉药石之艺，射御书计之术，乃研精而究其理，不习而尽其功。经目而讽于口，过耳而谳于心。夫其明济开豁，包含弘大，凌轹卿相，嘲哂豪杰，笼罩靡前，踰籍贵势，出不休显，贱不忧戚。戏万乘若寮友，视俦列如草芥。雄节迈伦，高气盖世，可谓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也。

谈者又以先生嘘吸冲和，吐故纳新，蝉蜕龙变，弃世登仙，神交造化，灵为星辰。此又奇怪惚恍，不可备论者也。

大人来守此国，仆自京都，言归定省。睹先生之县邑，想先生之高风。徘徊路寝，见先生之遗像；逍遥城郭，观先生之祠宇。慨然有怀，乃作颂焉。其辞曰：

矫矫先生，肥遁居贞。退不终否，进亦避荣。临世濯足，希古振缨。涅而无滓，既浊能清。无滓伊何，高明克柔。能清伊何，视汗若浮。乐在必行，处俭罔忧。跨世凌时，远蹈独游。瞻望往代，爰想遐踪。邈邈先生，其道犹龙。染迹朝隐，和而不同。栖迟下位，聊以从容。

我来自东，言适兹邑。敬问墟坟，企伫原隰。墟墓徒存，精灵永戢。民思其轨，祠宇斯立。徘徊寺寝，遗像在图。周旋祠宇，庭序荒芜。榱栋倾落，草莱弗除。肃肃先生，岂焉是居。是居弗形，悠悠我情。昔在有德，罔不遗灵。天秩有礼，神监孔明。彷彿风尘，用垂颂声。

“赞”是“赋”的一种，是古代一种特有的抒情文体，其特点是激扬的情调和精炼的风格。夏侯湛的父亲夏侯庄，在西晋初年任乐陵郡守，夏侯湛从京都洛阳到乐陵省亲。在省亲返回洛阳的途中，路过乐陵郡西南东方朔的故乡厌次，瞻仰拜谒了东方朔庙，观看了东方朔画像，对东方朔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东方朔才华横溢、谋略超人，有治国安邦的雄心、胆识和魄力，但终其一生，只能以“朝隐”的方式，用俳优的身份，以滑稽诙谐的方式匡扶一下朝政。这其中隐含了无数的无奈无助甚至绝望，经历了难以言说的内心挣扎。夏侯湛一生自负甚高，但宏大抱负长期无法施展，东方朔的仕途、经历和个性引起了夏侯湛强烈的共鸣。相似的人生经历，使夏侯湛感慨万千。

序文开宗明义，说东方朔是平原郡厌次县人，事汉武帝，《汉书》具载其事。因为《汉书》具载东方朔的事迹，所以没有详细叙述东方朔的生平事迹。夏侯湛着重对东方朔秉异的才华、特立独行的性格、渊深广博的学问给予盛赞：“颀颀以傲世”、“正谏以明节”、“诙谐以取容”、“洁其道而秽其迹，清其质而浊其文”、“弛张而不为邪，进退而不离群”……同时，对其立身之道和处事方式，对其圆熟机智的处世哲学和出淤泥而不染的高风亮节，以及精研经书，通晓阴阳术数、医学、书法、武术、辩论、诙谐等百家学问敬佩不已。认为东方朔达到了“嘘吸冲和，吐故纳新，蝉蜕龙变，弃俗登仙，神交造化，灵为星辰”的境界。正文对东方朔傲岸不羁、特立独行的人格更是尊崇有加，辞赞曰：“肥遁居贞”、“涅而无滓”、“既浊能清”、“染迹朝隐”、“和而不同”……可谓文采斐然，跌宕起伏，朗朗上口，成为千古赞赋。

颜真卿的书法成就源自他深厚的家学渊源和自身努力。其五世祖颜之推，善作诗赋，著有《颜氏家训》，在封建家庭教育发展史上有重要的影响。曾祖父颜勤礼“幼而朗悟，识量宏远，工于篆籀，尤精训诂”。父亲颜惟贞“有德行词学，尤善草隶”。^①颜真卿深受家庭和外祖家殷氏影响，史书记载，他少年孤贫，少勤学业，善辞藻，尤工书，因缺纸笔工具，曾以黄土扫墙习字。成人后，他广泛钻研历代书法名家如蔡邕、王羲之、王献之、褚遂良等人的书法艺术，还得到过书法大家张旭的指导。经过融会贯通，形成了雄伟刚劲、大气磅礴的独特风格。姜夔在《续书谱》中说：“晋人挑剔或带斜拂，或横引向外，至颜柳始正锋为之，正锋则无飘逸之气。”^②不言而喻，颜书这种敦厚的艺术风格是中锋用笔的体现，可以说，颜书是在晋人用笔的基础上使中锋用笔更加完善，与晋人的中侧锋用笔有本质的不同，对中锋用笔的完善使对点画的书写更趋于沉稳，少了侧锋取妍的飘逸。值得思考的是，颜真卿不仅使用中锋笔法，还在中锋笔法中掺入篆籀之气。朱长文在《续书断·神品》中提到颜真卿时说：“自秦行篆籀，汉用分隶，字有义理，法贵谨严，魏、晋而下，始减损笔画以就字势，惟公合篆籀之义理，得分隶之谨严，放而不流，拘而不拙，善之至也。”^③颜真卿用饱含篆籀之气的中锋笔法融入书写之中，使他的作品沉著宽宏。书写《画赞碑》时他正值四十五岁盛年。《画赞碑》是他精神、艺术升华的代表作，书艺发展的关键。此前两年写的《多宝塔碑》虽很着力，也得到后人称赞，但用笔略显拘谨，生动不足，与初唐书法相差不大，颜体特征，尚处雏形时期。而《东方朔画赞碑》不同，他用笔酣畅淋漓，气蕴内含，点画刚峻，钩捺厚重，结体宽雄，方圆适中，磅礴豪爽。字体结构端庄雄伟，气势恢弘，一扫拘束矜持之态。此碑除正文楷书外，碑头碑阴的篆书、隶书非常少见，尤为可贵。篆书古雅峻峭、全无俗态。隶书遒劲丰伟、典型大家风韵。与正文相配，遂成完璧，成为传世之宝。

苏轼在《题颜鲁公画赞》中说：“颜鲁公平生写碑，惟《东方朔画赞》为清雄，字间栉比而不失清远。”^④颜真卿的篆、隶、楷三种书法集中到同一块碑上，这在颜碑中是十分罕见的。三个不同朝代的名人东方朔、夏侯湛、颜真卿汇集到同一块碑上，珠联璧合，堪称艺苑奇葩。

据《陵县志》记载，一千二百多年来，《画赞碑》历尽劫难又屡获新生。最初，《画赞碑》立于东方朔庙前，元朝时由东方朔祠庙移到县城衙门内大堂之侧。康熙六年（1667）地震，大堂和碑亭倒塌，《画赞碑》埋入土中达百余年之久，到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才重见天日，并重建碑亭安置。后来碑亭又倒，画赞碑又沉入泥潭，致使下半部字迹脱落几不可辨认。

1964年，山东省文化局拨款重修碑亭。1978年，画赞碑被列为省级重点保护文物，1982年列为国家一级文物。为使《东方朔画赞碑》完整地传于后世，文化部门于1982年底重新复

① 颜真卿《晋侍中右光禄大夫本州大中正西平靖侯颜公大字碑》，《全唐文》卷三三九，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② 姜夔《续书谱》，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第385页。

③ 朱长文《续书断》，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第324页。

④ 苏轼《题颜鲁公画像赞》，《东坡题跋》卷四，人民美术出版社2008年版。

制了《东方朔画赞碑》，保留了原碑风姿。陵县县委、县政府为妥善保存这一珍贵文物，修建了“文博苑”。1985年6月，“文博苑”完工，新落成的碑亭飞檐抱角，琉璃金瓦盖顶，雕梁画栋，玉槛回廊。1988年，建成颜公祠和一高大雄伟、气势恢弘的碑亭，《东方朔画赞碑》原碑珍藏亭中。

第四节 唐末五代割据战乱中的德州

安史之乱后，唐朝中央集权大大削弱，地方藩镇节度使割据一方，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各藩镇不仅掌握军权，同时也掌握政治、经济大权，“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具备了与唐政府对抗的基础条件，成了唐朝的一大顽症。各节度使“喜则连横而叛上，怒则以力而相并”^①，于是，兵祸连年，战火不断，广大人民陷入了深重的灾难之中。

一、唐末藩镇割据中的德州

德州地处山东、河北交界地带，“川陆经途，转输津口，州在南北间，实必争之所也”^②。安史之乱后，卢龙镇（治幽州，今北京）、成德镇（治恒州，今河北正定）、魏博镇（治魏州，今河北大名）、平卢镇（治青州，今山东青州）、横海镇（治沧州，今河北沧县）等强藩骄镇，最为跋扈，对德州的危害亦最大。

德州先属平卢镇。平卢镇本治营州（治今辽宁朝阳），安史之乱之初，安禄山以心腹徐归道为平卢节度使，但不久被安东都护王玄志袭杀。唐朝廷先后以王玄志、侯希逸为平卢节度使，进击安史叛军。后来，由于相持日久、救援断绝和奚族袭扰，侯希逸不得不于唐肃宗上元二年（761）率军横渡渤海，抵达今山东一带，第二年，唐朝以侯希逸为平卢、淄青节度使。平定安史之乱后，侯希逸纵情声色，广造佛寺，引起百姓怨恨，兵马使李怀玉乘机拥兵自立，并得到朝廷认可，赐名李正己。

李正己初有淄、青、齐、海、沂、密、登、莱、德（治今陵县）、棣十州，唐代宗大历十一年（776），汴宋（治今河南开封）留后李灵曜反唐，李正己奉命进讨，乘机再得曹、濮、兖、郓、徐五州之地，据有十五州之地，拥兵十万，成为当时地盘最大的藩镇。李正己将治所移至郓州，而以其子李纳为青州刺史，据守青州，割据山东。为迫使朝廷承认藩镇的世袭权，李正己、李纳曾与魏博节度使田悦、成德节度使李维岳、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共同叛唐。

唐德宗贞元八年（792），李纳死，其子李师古继为平卢节度使。为消减平卢镇的势力，唐朝借机将原属于平卢镇的德州与棣州（治今山东惠民）划归成德镇。成德镇节度使王武俊欺负李师古年少，不仅引兵进屯德、棣二州，而且想伺机夺取德州以东的平卢镇大盐场。平

^① 《新唐书》卷五六《兵志》。

^② 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三一《山东二》。

卢大盐场年产盐数十万斛，获利数万，是平卢镇的重要经济命脉。李纳在德州以南跨河修筑三汉城，扼守通往平卢大盐场之要道。王武俊命其子王士清从德州率军东进，李师古亦遣大将赵镐屯军三汉城抵御。两军在此激烈交战。王士清军营起火，士卒惊惧，不敢前进。唐德宗派宦官调停，晓谕王武俊罢兵、李师古毁三汉城，双方罢兵。

唐宪宗元和四年（809），围绕德州归属，藩镇再起战端。当年，成德节度使王士真死，其子副大使王承宗自为留后，仍掌成德大权。河北三镇亦各相仿效，均置副大使。肃宗、代宗、德宗三朝以来，唐朝无力对付藩镇，只好采取安抚、姑息和息事宁人政策，各藩镇名义上是唐朝辖区，实则是独立王国，军中主帅，或父子相承，或由大将代立，朝廷只是事后承认而已。唐宪宗李纯继位后，认为中央军力和财力都有了一定基础，改变了对藩镇的姑息政策，任用武元衡、裴度、李绛、李吉甫等名臣，着手削弱藩镇，重振唐室。宪宗欲革河北诸镇世袭之弊，想乘王士真之死，由朝廷派遣节度使，削夺河朔三镇世袭特权。因而迟迟没有任命王承宗。王承宗久未得朝命，颇感畏惧，再三上表输诚，并答应献出德、棣二州。

王承宗主动献出德州和棣州，宪宗应允，派京兆少尹裴武到真定宣慰，以探虚实。王承宗受诏甚恭，再次请求献出德、棣二州。裴武回朝复命。于是宪宗下诏：以王承宗为成德节度使，恒、冀、深、赵州观察使；德州刺史薛昌朝为保信军节度、德、棣二州观察使。这样，没废一兵一卒就成功把德、棣二州分出，成立保信军，大大削弱了成德镇的势力。

王承宗献土求封，公开对朝廷示弱，引起了邻镇魏博节度使田季安的不安，若以此为例，河北强藩将被一一分割。所以他极力从中阻挠挑拨，在朝廷使节到达德州之前，也就是德州刺史薛昌朝被任命之前，田季安派人飞马报知王承宗，诬告薛昌朝与朝廷私通，出卖王承宗，才得以高升。王承宗闻讯大怒，“遣数百骑驰入德州，执昌朝，至真定，囚之”^①。起初，朝廷使节过魏州，田季安假装设宴慰劳，故意留下使者，拖延时间，使节持诏到德州后，为时已晚，王承宗早已把薛昌朝抓走。

宪宗遣宦官中使持诏前往成德镇晓谕，令王承宗释放薛昌朝，把他遣还德州。王承宗拒不奉诏，公然与朝廷对抗。宪宗招抚不成，不得不下令削夺王承宗官爵，以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为左右神策、河中、河阳、浙西、宣歙等道行营兵马使、招讨处置等使，兴师问罪。同时令范阳节度使刘济、易定节度使张茂昭、昭义节度使卢从史等同时发兵，共讨王承宗，德州一带战火再起。神策军本是战斗力很强的禁军部队，但主帅吐突承璀身为宦官，指挥无方，威令不振，禁军屡挫，大将郾定进被王承宗所杀，各道节度使观望不进，平叛受挫。王承宗遣使上表谢罪，宪宗感到平叛无望，只好赦免王承宗。王承宗送薛昌朝入朝，但德、棣二州仍归成德。

元和十年（815），淮西节度使吴元济叛乱，王承宗暗助吴元济。宪宗震怒，命魏博田弘正出兵讨伐，并令邻近的六道节度使协同出兵，战端再起。横海镇节度使程元振出兵袭击德州，被王承宗打败，退回沧州。元和十二年（817），淮西节度使吴元济被唐将李愬擒获。朝

^①《资治通鉴》卷二三八，元和四年九月。

廷军威大振，王承宗害怕，再次上表谢罪：“请以二子为质，及献德、棣二州，输租税，请官吏。”^①王承宗令其子王知感、王知信奉表入朝，献德、棣二州图印。

王承宗之乱平定后，德州并未因此而平静。宪宗将德州和棣州划归横海镇，横海镇辖沧、景、德、棣四州，朝廷先后以郑权、乌重胤、杜叔良为横海节度使，数年相安无事。但宪宗死后，德州所在的横海镇便发动了叛乱。穆宗长庆二年（822），唐朝以德州刺史李全略为横海节度使，以王稷为德州刺史。李全略任节度使后，培育亲信，专横跋扈，以其子李同捷为沧州刺史、知州事，兼押中军兵马，作传子之计。德州刺史王稷家资丰厚，优抚士卒，深得民心，为李全略嫉恨，遂将他及其全家杀害。李全略公然杀害朝廷命官，目无王法。但穆宗软弱，没有加罪，致使李全略更为嚣张，与朝廷抗衡。

敬宗宝历二年（826），李全略死，李同捷擅领留后。为继承父位，挟迫朝廷下诏任命，李同捷以重金贿赂邻道节度使。朝廷知其用心，终年不发朝旨。太和元年（827），唐文宗即位后，李同捷遣其弟李同志、李同巽奉表入朝，表示归附，希望朝廷下旨准其承袭父位。为铲除此镇割据，文宗授李同捷为兖海节度使，而以天平节度使乌重胤为横海节度使。李同捷以将士挽留为托词，公然不受诏命。棣州刺史栾濛遣使入朝，告其背叛朝廷，为其所杀。于是文宗遣诸道兵，以乌重胤为主帅，联合讨伐李同捷。德州、棣州百姓惧怕兵祸，纷纷背井离乡，逃往郓州。李同捷又重贿河北藩镇，以求退兵，卢龙节度使李载义向朝廷献其所贿玉帛及妓女47人。此年十月，乌重胤率唐军屡败叛军，掌握战场主动。太和二年（828）三月，武宁节度使王智兴攻棣州，焚其三门，又引水灌城，可怜棣州百姓，十不存一。十月，唐军攻拔平原，逼近德州。德州是横海镇南大门，叛军主力死守。此时，乌重胤已死，朝廷以左金吾大将军李佑为横海节度使。太和三年（829）二月，李佑率唐军再败叛军，进围德州。四月，终克德州，李同捷投降。宣慰使柏耆率300骑入沧州，取李同捷及其家属赴京师。至德州界，柏耆杀死李同捷，献其首于朝廷。长达三年的李同捷之乱终被平定。

安史之乱及其此后持续时间长达150年的藩镇割据，德州一带纷争不已，战乱不断，兵祸连年，给广大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造成人口锐减、土地荒芜，百姓流离失所。德宗建中元年（783），卢龙节度使朱滔率军进攻魏博镇，围困并攻占贝州（今山东武城西），伤亡惨重。为强迫德、棣二州供应军需，将所属各县官吏全部囚押。文宗太和二年（828），朝廷发兵围攻横海镇，武宁节度使王智兴攻棣州，火烧城门，引水灌城，无所不用其极，城破，堆尸如山。

二、后梁与后唐对德州的争夺

公元907年，宣武节度使朱全忠篡唐自立，国号梁，定都开封，史称后梁，历史进入了五代时期。在此后53年的时间里，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相继更替。每个政权的建立都是藩镇节度使以下叛上，通过军事征伐来实现的，每一次政权更迭，都伴随一场大流血、大灾难。在这样的背景下，德州继续遭受战争的摧残。特别以后梁与后唐在德州争夺、

^①《资治通鉴》卷二四〇，元和十三年三月。

后晋时契丹兵对德州的蹂躏为最。

朱全忠的势力中心在今河南，其最大的对手是盘踞于今山西的原唐河东节度使、晋王李克用。双方为争夺河北地区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夺战，而德州首当其冲。900年，朱全忠遣大将葛从周率兖、郓、滑、魏四州之师渡黄河北上，目标直指德州、沧州。葛从周攻破平原、长河二县，兵临德州城下。德州刺史傅公和据城抵抗。葛从周将城围定，四边攻打。傅公和艰难抵抗，誓不投降。葛从周挖地道破城，傅公和被杀。

后梁建立的第二年（908），李克用死，长子李存勖继为晋王、河东节度使。912年，朱全忠被其子朱友珪所杀，另一子朱友贞再杀朱友珪，朱友贞就是梁末帝。在此前后，双方的争夺主要围绕河北一带进行。乾化元年（911），晋军大败梁军，晋将周德威乘胜自临清（今山东临清）攻贝州，占领夏津（今山东夏津）、武城（今山东武城）。此后，晋军由相持转入进攻。梁末帝贞明元年（915），李存勖亲率大军伐梁，后梁贝州刺史张源德率师抵抗。贝州与德州成犄角之势，共抗晋军。李存勖认为，贝州“城坚兵多，未易猝拔”，要想破贝州，必先破德州，将其犄角之势瓦解，使贝州孤立无援，然后破之。于是率精骑500突袭德州，德州刺史弃城而逃，晋军顺利占领德州。李存勖以其部将马通为德州刺史，驻守德州。晋军西进，顺势破长河、平原、武城、夏津等县，再攻贝州。贝州粮尽，刺史张源德每夜出兵3000出城剽掠，周围武城、夏津等县惨遭劫掠。后梁大将刘鄩来救，双方在鲁西北地区鏖战，刘鄩败退，晋军连克堂邑、临清、南宫、博州、贝州、莘县、魏州，直抵黎阳（今河南浚县）。923年，李存勖称帝，国号唐，史称后唐。

天福元年（936），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以割让幽云十六州和岁贡30万匹绢帛为代价，换得契丹主耶律德光的援兵，灭了后唐，建立了后晋。天福五年（940），德州治所一度从今陵县移至长河县（今德城区）。942年，石敬瑭死，其侄石重贵即位。后晋遣使哀告于契丹，称孙而不称臣，惹怒了耶律德光，契丹遂于944年发兵南下，越过沧州，大将麻答率数万之众围攻德州。当时，德州守城士卒仅千余人，但德州刺史尹居璠率师顽强抵抗。尹居璠登城拒敌，终因寡不敌众被契丹所俘，德州失陷。契丹军大开杀戒，德州、贝州、博州一带所俘百姓全部被杀，血流成溪。契丹兵烧杀抢掠，称为“打谷草”，城乡民物被洗劫一空。

契丹军的暴行，激起了中原百姓的强烈反抗。后晋沿河巡检使梁进，招募民众，组织义勇，坚壁清野，与契丹军周旋。契丹被迫退军，梁进乘机收复德州。契丹军北退时，大掠而去，所过之处，无不残破，德、沧等州遭到巨大破坏。

第五章 宋元转折——世事艰危与漳卫清流

宋元时期，社会经济继续发展，社会生产关系剧烈变革，民族矛盾和民族冲突持续不断。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一方面，随着王朝的更替和历史的变迁，受民族矛盾、频繁战争和人口迁徙等因素影响，德州经济文化呈现出了停滞甚至倒退的情势，德州区域百姓受到战争与变乱的艰危时局影响，数度流离，艰难度日。另一方面，随着元代御河的疏浚和大运河的再度畅通，以及陵州仓的设置和回族群体融入德州，德州的区位优势 and 运河名城的地位逐渐显现出来，区域经济文化又有所发展，为明清时期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北宋时期，今德州分属河北东路德州、大名府、恩州、沧州、景州和京东路济南府。金朝分属山东西路、山东东路、河北东路和大名府路。元朝分属直隶中书省、燕南河北道济南、河间、东平三路。

第一节 世事艰危与德州区域变迁

北宋的统一，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实现了局部的统一，由于德州处于中原王朝的缘边地带，因而是契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必经之地。宋元四百余年间，在今德州区域，战争时有发生，频繁易主，先后为北宋、金、元所统治，行政区域变迁频繁且较大。

一、宋元时期德州的区域变迁

北宋（960-1127）时期，结束了唐末五代以来的分裂局面，黄河中下游地区和江南广大地区实现了统一。与此同时，北方的辽、东北的金、西北的夏等民族政权又先后与北宋政权并存共立。为了改变唐末五代时期“方镇太重、君弱臣强”的局面，北宋除集中军政大权于中央外，还在地方行政制度上作了重大调整，按照地方分权而治的方针，建立了路、州（府）、县三级地方行政机构。路置转运使、安抚使、提点刑狱、提举常平，分掌行政、军事、刑狱、赈济等。最初分全国为15路，后来增为18路、23路。在北宋统治的168年时间里，地处黄河以北的德州，在行政区划上虽有一些变动，但基本变化不大，大部分隶属河北东路，包括德州、大名府、恩州、沧州、景州，小部分隶属京东路的济南府。具体来说，今陵县、平原隶属德州，夏津隶属大名府，武城隶属恩州，乐陵、宁津、庆云隶属沧州，德州城区隶属景州，禹城、临邑、齐河隶属济南府。

由于地处宋辽、宋金边缘地带，当时的德州、恩州，“军事”职能都很突出。《宋史·地理志二》载：“德州，上，平原郡，军事。宋初，省归化县。景祐二年，废安陵县入将陵，

后割属永清军。熙宁六年，省德平县为镇，入安德。崇宁户四万四千五百九十一，口八万二千二十五。贡绢。县二：安德，望；平原，紧……恩州，下，清河郡，军事。唐贝州，晋永清军节度，周为防御。宋初，复为节度。庆历八年，改州名，罢节度。崇宁户五万一千三百四十二，口八万五千九百八十六。贡绢、白毡。县三：清河，望。端拱元年，徙治永宁镇。淳化五年徙今治。熙宁四年，省清阳县入焉；武城，望；历亭，紧。至和元年，废漳南县入焉。”^①

1127年北宋灭亡至1234年元灭金，在前后108年的时间里，德州为金朝统治。金熙宗（1135-1149）以前，金代地方行政设置尚不统一。金熙宗时，仿照辽、宋制度进行改革，确定了全国的行政区划，设置路、府（州）、县三级地方行政机构。全国共设置19路，设都总管、同知都总管、副都总管、判官、府判、推官等，分管各项政务。今德州南部分属山东西路德州安德县、平原县、德平县；东部分属山东东路棣州厌次县、济南府临邑县、齐河县、禹城县；北部分属河北东路景州将陵县、蓀县、宁津县，沧州乐陵县、盐山县；西部分属大名府路大名府夏津县、恩州、历亭县、武城县。

元朝（1271-1368）入主中原后，地方实行行省制度，地方行政制度进入划省而治的阶段。元代行省官吏品秩与中枢相同，置丞相、平章政事、左右丞、参知政事等，凡一省军国大事无所不领。行省下辖路、府、州、县，均设蒙古事务官“达鲁花赤”，监督各级官吏，执掌最高权力。路、府、州、县无固定统属关系，经常变动。其大致情况是：今德州区域属中央中书省统辖的“腹里”地区，分隶济南、河间、东平三路，包括三州、九县、一司。三州是陵州、德州和恩州，陵州所在地即今天德城区所在位置，德州所在地为今陵县所在位置，恩州州治在今平原县恩城镇。九县名称与今天基本相同，只是有德平县而无庆云县。一司是位于今宁津县的长官司。

值得一提的是，随唐宋金时期，德州的“州”治所在今陵县，长河、将陵只是县级地方行政机构。随着大运河的开通，在大运河的孕育和滋养下，今德州城区一带逐渐发展成为水陆交通便利，汇通南北，物产丰饶，人丁兴旺的繁荣城镇。经济的发展加上政治军事地位重要，使得德城区一带由县级行政区逐渐升格为州级行政区。宪宗三年（1253）元朝把金朝的将陵县改为陵州。对此，《元史·地理志》特意做了注解：陵州“本将陵县，宋、金皆隶景州。宪宗三年，割隶河间府。是年升陵州，隶济南路。至元二年（1265），复为县。三年，复为州，仍隶河间路”^②。

二、宋金时期德州区域的战争与变乱

（一）宋辽之战

北宋初年，宋辽战事频仍，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军灭北汉后乘胜进攻辽幽州，两军大战于高粱河（今北京西直门外），宋军战败，全线溃退。为了报复，辽景宗三度率军南下亲征，深入河北深县、德州、邢台等州县，大肆抢掠，使宋朝边民蒙受重大损失。雍熙

^① 《宋史》卷八六《地理志二》。

^② 《元史》卷五八《地理志一》。

三年（986），宋太宗派三路大军二次攻辽幽州，再败。从此北宋放弃攻辽，改为军事防御。

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十月，辽萧太后与辽圣宗率兵南下，攻破狼山寨（今河北易县西南），又攻掠祁州（今河北安国）、赵州（今河北赵县）等地，河北州县告急求援，镇定高阳关守将傅潜统步骑8万，畏懦不敢战，闭门自守，不发兵援救，致使北宋大将康保裔战败被俘，河北许多城镇陷落。辽兵继续南下，进攻德州（今山东陵县）。面对来犯之敌，德州知州靳怀德，率领德州军民坚决守土卫家，与辽军展开了一场殊死的战斗。

靳怀德（945-1017），博州高唐人。原名湘，与寇准关系甚密，常常出入其家，寇准的父亲名湘，为避讳而改名为怀德。其父靳隐曾任禹城令，对德州怀有深厚感情。太平兴国（976-983）年间，靳怀德以明法科登第，先后任广安军（今四川广安）判官、鸿胪寺丞，历著作佐郎、太子左赞善大夫、相州通判、广州通判、沧州通判、德州知州。在德州，靳怀德为官廉洁，均徭薄赋，兴修水利，整饬漕运，发展经济，使德州政通人和，百姓安居乐业。

当辽军兵临城下之时，靳怀德坚壁清野，筑深沟高垒与辽军抗衡。辽军把德州城团团围定，四面攻城。德州军民用弓箭、滚木、砲石打退辽军的一次次进攻。当时德州兵少将寡，但靳怀德处惊不乱，沉着指挥。首先，进行全城总动员，敲锣鸣鼓，张贴告示，历数契丹屠城的先例，警告城破则家亡。他号召全城民众同心同德，誓与德州共存亡。德州百姓齐声响应知州号令，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男女老少齐上阵。其次，将城内男丁组成兵卒，增加前线守城部队的力量。以仅有的禁兵、厢兵为核心，组织丁壮配合，日夜轮番固守，妇女帮炊送食。靳怀德巡视城上，军民斗志高涨，辽兵多次攻城，均被击退，德州得以保全。

由于辽兵的烧杀抢劫，黄河以北州县一片残破，当时，德州四周诸县，如将陵（今德城区一带）、平原、德平、武城、乐陵、禹城、临邑、夏津等县，均遭劫掠。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百姓生活无着。辽兵北退后，靳怀德依朝廷之命，招抚百姓，凡遭辽兵劫掠者，免除赋税，并由官府贷以粮种，尽快恢复农业生产。采取上述措施后，受战争破坏的地方才逐渐稳定下来。

靳怀德守卫德州，安抚民众，赢得了百姓的称道。河北转运使刘通上报朝廷，真宗下诏褒奖。后改任知密州（今山东诸城），也是政绩斐然。盐铁使陈恕、判官王济上报其功，改知沧州。大中祥符元年（1008），任满还朝，沧州吏民请于河北转运使李士衡，要求靳怀德留任，李士衡上奏朝廷，真宗准其请，复知沧州。以后历任曹州、益州、长州、昭州、澶州、陕州等地知州。靳怀德有文才武略，为政“强干”，在益州，深得军民爱戴；澶州为辽宋南北交通要道，怀德悉心抚治，人皆称之。天禧元年（1017）返京病卒，年73岁。

咸平二年辽兵南侵时，沧州无棣（今山东庆云）人张凝率兵在瀛州（今河北河间）西设伏，并大获全胜。《宋史·张凝传》记载，张凝少年时期就有“武勇”之名，臂力超群，善于骑射。后经人推荐为宋太宗护卫，补殿前指挥使。淳化（990-994）初年，任绣州刺史、天雄军驻泊都监。真宗即位后，加封庄宅使，迁北作坊使。咸平二年，契丹南侵，张凝率所部将士在瀛州以西设伏。待辽军进入伏击圈后，张凝身先士卒，出其不意，突入敌阵。激战

中，由于寡不敌众，身陷重围，形势十分危机。张凝儿子张昭远，当时年仅十六岁，也随父参加了伏击战斗。看到父亲被辽军团团围住，随即催马扬鞭，单骑杀入敌阵，将父亲救出。第二年，辽军再次南下，张凝与范廷召在莫州以东分据要害，断其归路。辽军乘夜色突围而去，张凝率兵追击，将辽军所抢掠的牲畜、粮食等全部夺回。

景德元年（1004），萧太后、辽圣宗集结 30 万大军发动了大规模战争，自定州抵沧州、德州、冀州、贝州，直趋澶州北城（今河南濮阳），迫使北宋签订了屈辱的“澶渊之盟”。“澶渊之盟”前，宰相寇准主战，张凝任沧州防御使、定州路行营副部署兼北面安抚使，驻防保州。寇准命张凝与魏能、田敏、杨延昭分率精骑，牵制辽军。辽军来犯，皆被各部击败。张凝部掳获辽军战马、兵器数以万计。“澶渊之盟”后，辽兵北返，但沿途抢掠不已。真宗以张凝为缘边安抚使，率兵随辽兵之后，契丹不再敢掠夺。

景德二年（1005），张凝改任高阳关^①部署，统辖杨延昭等所部宋军。加封殿前都虞候，不久病卒。真宗得悉，深为悼惜，追赠为彰德军节度使，派遣中使宦官护卫其灵柩还京，厚为安葬。《宋史》本传评价说：“凝忠勇好功名，累任西北，善训士卒，缮完器仗，前后赏赐多以犒师，家无余资，京师无居第。”^②

张凝之子张昭远，字持正。随父征战，屡建奇功。曾单骑杀入敌阵，解救父亲，以功授左班殿直寄班祗候。后经多次升迁，转至内殿崇班。天禧元年（1017），宋真宗亲自提名，晋升他为西上阁门副使。历任河北缘边安抚使、瀛州知州、东上阁门副使、西上阁门使、雄州知州、忠州刺史、知成德军、新州防御使、步军马军都虞候、左龙武大将军、昭州防御使等职。他善于带兵，战功卓著，死后追赠应州观察使。

《庆云县志》记载，明朝庆云县城“乡贤祠”内，供奉有张凝及其子张昭远等 8 位乡贤。民国《无棣县志》卷十一《人物·武略》篇对张凝、张昭远亦有记载。

（二）宋金之战

北宋末年，统治腐朽，危机四伏。宋徽宗、蔡京、童贯统治集团想乘辽朝衰亡之际，采取联金灭辽的战略，夺回燕云十六州，建立所谓的“万世功业”。然而，联合灭辽后不久，金军就接连对北宋发起了进攻。靖康元年（1126），金东西两路军攻破汴京。翌年，掳徽、钦二帝及后妃、宗室等数千人北归，北宋灭亡，史称“靖康之变”。

南宋建立后，金兵连年南下，德州区域战火再起。建炎二年（1128），金兵逼近德州城下，德州守将兵马都监赵叔皎率部抗击。

赵叔皎系宋朝皇室宗亲后裔，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任德州兵马都监。靖康之变后，金军以兵威招降河北诸州县，原河北守将刘顺、吕拱、刘亨等皆欲归降。赵叔皎将刘顺等诱至德州逮捕收押，号召河北诸州县联合一致，共同抗金。金军攻德州。赵叔皎率精兵千余出城，利用金兵立足未稳之机，发起进攻，迫使金军后退十余里。

^① 今河北高阳东，古淤口、益津、瓦桥三关之南。宋初本名关南，太平兴国七年（982）改置高阳关。地接辽境，为军事重镇。

^② 《宋史》卷二七九《张凝传》。

金军向德州增兵三万余，十倍于宋军。赵叔皎登城指挥，亲发砲石，先后击退金兵六次猛攻，但宋军亦伤亡惨重。部将江喆与知州宗谅密谋降金，赵叔皎挥剑斩江喆，宗谅再也不敢言降。赵叔皎在南门应战，但西门被攻破，金军蜂拥而进，赵叔皎率众与敌展开激烈的巷战，手刃金兵十余人，血染战袍，最后力竭被俘，壮烈殉国。

金军对德州城乡兵民进行了残酷杀戮，血流成河，死相枕籍。德州附近的将陵、平原、德平等县也惨遭劫掠，大量农田被毁，百姓逃离家园，尸骨露野，土地荒芜，一片凄惨景象。

三、黄河泛滥与陈公堤的修筑

（一）宋代黄河下游的泛滥

德州地处黄河下游，“九河”穿行，川泽密布。隋唐以来，黄河主要流经德州的禹城、平原、安德、临邑、厌次等地。五代十国时期，由于战乱，怠于河政，“小以妨大，私而害公，九河之制遂隳，历代之患弗弭，黄河屡屡决口，河患愈加严重”^①，每至夏季，黄河汇聚百川众流，河水暴涨，时常发生决溢泛滥之患，为患甚大。

宋朝立国后，十分重视对黄河的治理。宋太祖建隆元年（960），也就是宋朝建立的当年，黄河先后在德州的厌次、临邑和上游的滑州（今河南滑县东南）等地决口，居民庐舍田畴损坏严重。乾德二年（964），宋太祖“遣使案行，将治古堤”，但因为有人提出国家初立，战事未弭，财政紧张，旧河道治理难度大，将加重百姓力役，赵匡胤只好放弃治理黄河古堤的打算，但是，仍然“诏民治遥堤，以御冲注之患”。当年夏，河决东平之竹村，大水淹没七州之地。三年（965）秋，河决开封阳武、澶州、郟州。面对茫茫大水，朝廷甚至动用“州兵”治河。可是第二年，滑州再次河决。赵匡胤诏遣殿前都指挥使韩重赟、马步军都军头王延义等督士卒丁夫数万人治之，滑州、郟州、曹州等河水泛滥之地蠲免秋赋。

在治理河患的过程中，宋朝确立了一系列的制度。乾德五年（967）正月，“以河堤屡决，分遣使行视，发畿甸丁夫缮治。自是岁以为常，皆以正月首事，季春而毕”，建立了每年春季治河的制度。同时下诏开封府、大名府以及郟、澶、滑、孟、濮、齐、淄、沧、棣、滨、德、博、怀、卫、郑等州长吏兼本州河堤使，为治河第一责任人，负责治河诸项事宜。开宝五年（972），朝廷下诏：沿黄、汴、清、御等河州县，除依旧制种植桑枣外，仍令民户种植榆、柳及其他土地所宜之树，并规定按户籍高下分配种植数量，定为五等：第一等户每年种树五十棵，第二等以下递减十棵，愿多种者不限。同时增设各州府河堤判官一人，由本州通判或判官充任，具体负责治河事宜。为了表示朝廷对治河的重视，赵匡胤还赏赐给修河卒钱、鞋、茶等。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河决孟州之温县、郑州之荥泽、澶州之顿丘。朝廷在征集沿河诸州丁夫堵塞的同时，又遣左卫大将军李崇矩自陕西至沧、棣，调查水势，“视堤岸之缺，亟缮治之；民被水灾者，悉蠲其租”。真宗咸平三年（1000）诏曰：沿河官吏，虽任期届满，也许待河水回落后卸职，“知州、通判两月一巡堤，县令、佐迭巡堤防，转运使勿委以他职。又申严盗伐河上榆柳之禁”。神宗熙宁六年（1073），设置治河专门机构——“疏

^① 《宋史》卷九一《河渠志》。下同。

浚黄河司”，以“铁龙爪扬泥车法”疏通泥沙，减轻河床泥沙堆积。

对于一些造成重大损失的地方官员，宋朝则进行严厉处置。太祖开宝四年（971），河决澶州，泛滥数州，但地方官员却没有及时上报，结果滑州通判姚恕弃市，知州杜审肇免职。太宗淳化二年（992）诏曰：“长吏以下及巡河主埽使臣，经度行视河堤，勿致坏隳，违者当寘于法。”

然而，治理黄河一直是摆在历代统治者面前的一个难题，在大自然面前，人的因素有时颇显渺小。尽管宋政府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但每隔几年，就会出现一次黄河决口的情况。据《宋史·河渠志》记载，北宋160余年间黄河溃堤决口就达50余次，黄河就像一条巨龙在下游不停地“摆尾”。仁宗庆历八年（1048），黄河在滑州商胡埽决口，侵道永济渠、漳水，流经德州的夏津、武城、降陵，向东北经乾宁军（今天津附近）入海，宋人称为“北流”。嘉祐五年（1060），黄河在大名府第六埽决口，经魏州、博州、德州，向东经乐陵、阳信入海，宋人称为“东流”。此后，黄河主河道时而“北流”，时而“东流”，形成“二股河”。神宗熙宁十年（1077）至元丰四年（1081）年间，黄河还一度形成夺淮（淮河）入海和夺济（济水）入海的局面。金朝、元朝时期，情况依然，黄河“或决或塞，迁徙无定”^①。

（二）陈公堤的修筑

陈公堤从今夏津、武城、德城区、陵县向东北延伸而去，是古代德州最大的地上工程。它自河南滑州（今河南滑县）起至山东千乘（今属山东滨州）止，全长一千多里，高4-5米，顶宽6-8米，势若长虹，蔚为壮观。今天，夏津、武城仍能看到其遗迹。据民国《武城县志》记载，陈公堤东临黄河故道，从武城镇肖邢王庄村西由夏津县入境，女寺村东3里处出境。因为它是北宋滑县知州陈尧佐为防黄河西决，组织沿河民众修筑的一条护河大堤，故名“陈公堤”。清代雍正年间恩县知县陈学海曾作《贝野长堤》诗赞誉大堤：“望人修堤一带迷，造堤人去柳成蹊。烟连秀野千家麦，势障黄河万倾泥。草长平湖春浪阔，渔归小艇夕阳低。苍桑莫得民安业，处处丰登乐岁畦。”民国时期，陈公堤曾被誉为武城十二景之一，称为“贝野长堤”。

陈尧佐（963-1044），字希元，号知余子，阆州阆中（今四川南充阆中）人。祖籍河朔，高祖陈翔为蜀新井令，遂举家迁居阆中。陈氏是阆中名门，满门风华。父亲陈省华官至左谏议大夫，赠太子少师，兄陈尧叟、弟陈尧咨皆为状元。太宗端拱元年（988）陈尧佐考中进士，历任地方知县、知州、转运使、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等职，宋仁宗时，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陈尧佐一生为官清正，务实敢为，政绩斐然，特别是在治水方面，其贡献尤为突出，堪称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的治河专家。他发明的“下薪实土”筑堤法，有效地抵挡住了钱塘江的大潮；他采用“植柳固堤”的方法，使汾河大堤坚如磐石；他以“木龙杀水法”筑堤拦水，使桀骜不驯的黄河，变得温顺了许多。其中，最让他名垂青史的还是“陈公堤”的修筑。

^① 《金史》卷二七《河渠志》。

早在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著作佐郎李垂就向朝廷上《导河形胜书》。李垂认为，两汉以来，欲治河者，皆认为以疏通大禹在上古开挖的“九河故道”为第一要务。但“九河”在哪里呢？考察历代图志可知，“并在平原而北”。今天的情况却是“河坏澶、滑，未至平原而上已决矣，则九河奚利哉？”所以，应该将治河的重点上移，从滑州以下，筑堤七百里，然后分为六流，导河入海，则河患即平。但是，执政大臣枢密直学士陈彭年、知制诰王曾等人却认为，筑堤拦水，势必造成“水势聚而为一”；分为六流，则是增加六处河口，而“役夫二十一万七千”则“颇为烦费”。结果，李垂的建议未获采纳。其实，面对滔滔黄河，历代执政者是堵是疏，经常处于“两难之间”而举棋不定。^①

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和四年（1020），黄河在滑州两次决口，水灾非常严重。天禧五年（1021），陈尧佐出任滑州知州，主持黄河决口围堵工作。水势被减缓以后，陈尧佐组织河工填石堆土，在滑州城西北修筑了一条防洪长堤，当时被称为“陈公堤”。《宋史·陈尧佐传》载：“造木龙以杀水怒，又筑长堤，人呼为‘陈公堤’”。关于“木龙”，《宋史·河渠志》有这样的记载：“五年正月，知滑州陈尧佐以西北水坏，城无外御，筑大堤，又叠埽于城北，护州中居民；复就凿横木，下垂木数条，置水旁以护岸，谓之‘木龙’，当时赖焉。”黄河水流湍急，而黄河下游土质松软，单靠黄土是不可能堵住决口的。为了有效地减轻河水的冲击力，陈尧佐首先利用旧河道“开支流，以分导水势”，然后再让河工在决口处砸下一排排的木桩。木桩沿河曲曲弯弯，远远望去，就像一条长龙，所以叫“木龙”。

关于陈公堤，《宋史·陈尧佐传》记载很简单，而《宋史·河渠志》对于以埽岸法修堤治理黄河决口有一段详细记载，从中可以看出当时修筑陈公堤的详细情况：“旧制，岁虞河决，有司常以孟秋预调塞治之物，梢芟、薪柴、榿橛、竹石、芟索、竹索凡千余万，谓之‘春料’。诏下濒河诸州所产之地，仍遣使会河渠官吏，乘农隙率丁夫水工，收采备用。凡伐芦荻谓之‘芟’，伐山木榆柳枝叶谓之‘梢’，辨竹纠芟为‘索’。以竹为巨索，长十尺至百尺，有数等。先择宽平之所为埽场。埽之制，密布芟索，铺梢，梢芟相重，压之以土，杂以碎石，以巨竹索横贯其中，谓之‘心索’。卷而束之，复以大芟索系其两端，别以竹索自内旁出，其高至数丈，其长倍之。凡用丁夫数百或千人，杂唱齐挽，积置于卑薄之处，谓之‘埽岸’。既下，以橛梟阂之，复以长木贯之，其竹索皆埋巨木于岸以维之，遇河之横决，则复增之，以补其缺。凡埽下非积数叠，亦不能遏其迅湍，又有马头、锯牙、木岸者，以蹙水势护堤焉。”

对于当年陈尧佐在滑州所建的堤坝有多长，从滑州向下延伸到何处，史书没有明确记载，《宋史》也仅仅提到陈尧佐是在滑州城西北筑堤。其实，当时的黄河河道是从滑州东流，并不穿越今夏津、武城和德城区。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黄河在商胡埽决口，河道北移，这时的黄河才从今夏津入境，穿过今武城、德城区东部，由无棣入海的。而在这之前的庆历四年（1044），陈尧佐就已病逝。所以，德州段“陈公堤”实际并非陈尧佐主持修建。

历史上，黄河德州段堤坝之所以称为“陈公堤”，合理的解释应该是，由于陈尧佐在滑

^① 《宋史》卷九一《河渠志》。

州筑堤防洪，卓有成效，于是下游各州县的吏民便纷纷效仿，沿用陈公筑堤的方法，修筑堤防，使长堤不断延伸，因为陈尧佐是这条长堤的肇始者和开创者，所以后世也就把这条从滑州延续下来的千里长堤，通称为“陈公堤”了。

“无恙田庐喜俱在，到今人尚颂陈公。”陈公堤的修筑，有效地防御了黄河下游水患。在此后近千年的时间里，成为沿河两岸百姓赖以安生的一条御河长城。

第二节 穆斯林迁入与德州回族的形成

元朝时期，德州借助大运河的交通优势和京城门户的独特位置，吸纳了大量信奉伊斯兰教的回回人，“色目兵”进驻陵州与“长官司”的设置、德州回族群体的形成与德州伊斯兰文化的滥觞，构成这一时期德州地域文化的两大突出特点。

一、“色目兵”进驻陵州与“长官司”的设置

（一）“色目兵”进驻陵州

“色目”是元朝对除蒙古以外的西北各族、中亚以至欧洲各族人的通称。蒙元时期，经过三次大规模的西征，葱岭以西、黑海以东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民族都变成了蒙古帝国的臣民。原生活在这些地区、后来迁居到内地的少数民族，当时统称为“色目”人。在德州“色目”与“回回”意义基本一致，实际上是指信奉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包括阿拉伯人、波斯人和中亚各族人。

德州是华北军事重镇，战略地位极其重要。金朝在稳定了北方的统治以后，着力加强了德州的政治、经济、军事地位。灭辽后，金朝的政治中心逐渐迁至燕京，位于运河东岸的将陵县因而成为燕京粮道的重要枢纽。金太宗天会七年（1129），金朝在德州设置“将陵仓”，以利河漕储运，大批漕粮的装卸，使得这里日渐繁盛。随着德州地位的愈加重要，宪宗三年（1253）元朝将金朝的将陵县改为陵州。至元十九年（1282），通州河、会运河开通，大运河全程实现贯通。元政府把“将陵仓”改名为“陵州仓”^①。当时，今临清至天津段称为“御河”或“卫河”，德州成为御河漕粮的重要基地。为了维持大运河畅通和漕粮运输安全，元朝还在陵州设置“捕盗司”，派遣大量军队驻守。“捕盗司”设达鲁花赤、监支纳、监支大使、监支副使等官职，与当时县级机构同级。《元史·百官志》记载：沿河设河仓17处，其中馆陶仓、旧县仓、陵州仓、傅家池仓管理职官为从七品。^②

元朝驻扎在陵州的军队中，有相当数量的是“色目兵”。陵州仓的“回回兵”后裔，是德州最早的回民之一。据《德县志》记载，元代主持德州政务的24人中，回回人就有6人。其中达鲁花赤3人；州同知1人；州通判2人。明清以后，派驻德州的军队中也不乏回族将领和士兵，如阿老丁，西域回回，明成祖永乐二十三年（1424）入附，授德州卫都指挥同知，子札马儿丁、札刺儿丁皆袭封。后札刺儿丁改为丁姓，名全。丁姓回回在德州繁衍生息，成

^① 陵州仓旧址在今德州市德城区北厂一带。

^② 《元史》卷八五《百官志》。

为德州大姓。再如明英宗正统元年（1436）入华的西域回回虎林比失，被授予德州卫百户，率军屯驻德州，从此，虎林比失及其后裔在德州定居下来，虎林比失有子名“羊羔儿”，后裔因此改姓杨，“遂成德州回回望族。”^①

（二）“长官司”的设置

长官司是元朝管理少数民族的特殊行政机构，全称“蛮夷长官司”。长官司所在地多为少数民族聚居区，长官司官员“秩如下州”，有达鲁花赤、长官、副长官等，一般都是少数民族首领，实行世袭制。长官司最初只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设置，后来，内地少数民族聚居区也普遍设置。

元太宗窝阔台时，已有不少“回回”人被安置在德州，或从事手工业，或经商，或为官。蒙元入主中原后，大批“回回”人陆续迁入德州，定居于运河沿线及交通要道。《宁津县志》载：元朝初年，一部分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回部人”沿运河而来，在今宁津县长官镇定居。因为人数众多，聚居比较集中，于是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1284），在此设立了“长官司”，秩正五品，设达鲁花赤、长官、副长官各一员。《元史·百官志》载：“管领彰、德等处长官司，秩从七品，掌民一百一十有七户，达鲁花赤、长官、副长官各一员。大德二年置。”光绪《宁津县志》记载：“今犹称长官，在县东北40里。按《元史·百官志》，至元二十一年置长官司，秩正五品，领户有五百四十有八。今宁津县北之长官，即当日长官驻扎遗址也”。今宁津长官镇仍有元朝长官司旧治遗址。

长官司设立后，“回回”人的生产方式渐次变化，在从事牲畜养殖、加工的同时也逐渐学会了农业种植。至正二十一年（1361），元将孛罗贴木儿于保定以东，河间以南屯田，今宁津境内仍有即孛罗贴木儿屯田遗迹——孛罗寨。

元朝以后，仍有不少回族陆续迁居到今宁津长官镇。随着回族人口的增加，当地还修建了回族宗教活动场所——清真寺。建于明朝永乐（1403-1424）年间的长官清真寺是明清时期华北规模最大的清真寺之一，与长官毗邻的今河北南皮籍晚清大臣张之洞曾为其书写对联一副。现在清真寺长官镇回族《六宝箴张氏族谱》记载：六宝箴张氏原籍系南京二龙岗拴马桩人氏，明永乐年间北迁至此。

回族有经商的古老传统。现在，长官镇共有50个行政村，总人口3.6万人，其中回族人口约3500人，主要从事牛羊肉和牛羊皮的产、购、销。

二、回族群体形成与伊斯兰文化的滥觞

中国回族最早可追溯到唐宋时期来华经商的大食和波斯人。公元7世纪前后，阿拉伯、波斯商人沿丝绸之路来到长安，或沿海上丝绸之路来到广州、泉州等地从事商业活动。元代，回回商人遍布全国，以经营斡脱（高利贷）、珠宝、香料、药材为主。此时，德州不断有回回人迁入。据禹城《韩寨族谱》记载，韩氏回族穆斯林始于元末，元顺帝至正元年（1341）由青海省循化县移民而来，初居禹城城西白庄。齐河县的老寨子、小寨子的回族穆斯林也是

^① 林松等《回回历史与伊斯兰文化》，今日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

由元代徙居而来的。

当时，回回商人经营范围主要包括皮毛、丝绸、棉、布、粮食、钱庄、票号等。他们沿运河往返于南北各地，客居于运河沿岸城镇，德州遂成为回族聚居相对集中的地区之一。元朝以来，在今德城区的桥口、米市、小锅市、马市街等商业繁华之地形成了相对集中的回族聚居区。如：德州老字号成玉钱庄的东家云昆山，是自外地迁来的回商；小锅市满氏，本姓铁，是元代回回左丞相铁木尔塔识的后裔，迁至德州后改姓满；德城区桥口一带的马姓回族，原居驻于京、津地区；分布今德州各县市的杨姓回族，“居宛平（今北京丰台区）之羊市，故改羊姓”^①，后遂迁居山东各地，并改为杨姓。民国《平原县志》载，恩城镇大北关洪、沙、麻、白、仇、马、王等姓回族相继迁入。冯姓回族是德州陵县回族第一大姓，有“十个回回九个冯”之说。平原田水铺马姓回族，祖居河北青县马家桥，后移居山东德州，先至武城县庙留庄，其后代又分赴德州各地，其中一支迁到平原田水铺村。

德州现有 104 个回族村居^②，除宁津、禹城两县较为集中、各有一个回族乡镇^③以外，德城区、陵县、临邑、乐陵、平原、齐河、武城、庆云、夏津都有回族分布。从回族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可以看出，元代是德州回族群体形成和伊斯兰文化的发育期。从元代开始，德州回族的迁入和分布就形成了以运河为中心、向外逐步延伸、大分散、小聚居的居住特点。这种分布格局的形成，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其一，回族主要沿运河而来，迁入本区。如元明两朝，回族主要沿运河迁来，因而分布于运河两岸地区，然后向四周地区辐射。其二，回族的职业成份复杂。迁入回族，包括军士、工匠、商人、学者、官僚、掌教等。由于职业和生活的需要，对于居住地的环境要求也就不同，因而一开始就分散在许多地方，奠定了大分散的分布特点。军士主要驻防在运河城镇；商人、工匠等多分居在各个交通要道上；官僚和学者多住在州、县、司治所。元代在运河东岸设陵州仓，驻有回回兵，后来这些回回兵及后裔，大部分留居本地，或聚居或杂居，成了普通农民。

透过德州回族 700 年的发展历史，我们还可以看出，伊斯兰教的精神凝聚力在回族的形成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民族与宗教本是两个概念，但回族历史上，“回回”、“回教”和“回族”的含意却几乎是一致的，是回族就必然信奉回教——伊斯兰教，而一旦信奉了伊斯兰教，也就基本意味着是“回回”了。所以说，“回回”是各种职业、身份的穆斯林在城乡定居、生产、生活中，融合新成员的结果；如果没有伊斯兰教的传播，没有穆斯林们的聚居和社会活动，就不可能产生回族。回族虽然从一开始就居住分散，却没有被汉族所融合，能够始终保持一个独立民族的特点，使大分散中的小集中能够存在下来，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伊斯兰教的信仰，这成为回族共同文化心理素质的基础。分居于各地的回回人，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建筑清真寺，并围寺而居，在多民族的环境中，自成格局，从而保持了相对独立的民族风格。迁居德州的回族，不同程度地保留了自己民族的生活习俗、宗教信仰。民国

① 白寿彝《回族人物志·明代》，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② 回族村居指完全由回族人口组成的纯回族村居和回族人口占总人口 50%以上的回汉杂居村居。

③ 两个乡镇是禹城十里望回族自治乡、宁津长官回族自治镇。

《德县志》记载：“（苏禄王后裔）不吸烟，牛羊而外一切杂牲概忌不食。……凡星期日至清真寺礼拜，礼拜必先沐浴，然后服其上尖下圆之白帽。……每年必有一斋月，是月白昼不饮食，见星而后食，名为封斋，至月尽则开斋。开斋之日，凡回教之人皆至清真寺，听其教长诵经毕，即交相庆贺如汉俗之岁俗，此又其祭祀礼节之不同者也。”^①回族提倡内部通婚，但并不绝对排除与外部婚配，先决条件是要求对方改奉伊斯兰教，遵从自己民族的风俗习惯。回男娶汉女或回女嫁汉男的现象，在德州各地历来有之，比比皆是。

第三节 御河的疏浚与德州运河名城的初显

唐宋时期，大运河的中心在洛阳、开封；大运河永济渠段的军事意义大于经济意义且时通时断。元明清三代，中国的政治中心在北京，从至元二十年（1283）到至元三十年（1293），历时十年，元朝先后开凿了从大都到通州的通惠河；从通州至大沽的通州运粮河；疏通了从大沽经沧州、陵州（今德州）至临清的御河；开挖了从临清至东平的会通河；从东平至济州（今济宁）的济州河。自济州河而南与南方原有的大运河相接。从此，在京杭大运河的滋养下，德州才真正意义上步入了它的辉煌期。

一、御河的疏浚与大运河的畅通

（一）宋金时期运河德州段的漕政与漕运

北宋定都开封，当时的漕运，除依恃环绕京畿地区的汴河、惠民河、广济河与黄河为主干的漕运系统网，把各地的物资转至京城外，还凭借这个水运网把各种军需物资通过御河转运到河北及陕西等地，以供国防之用。诸路漕运物资中，“河北卫州东北有御河达乾宁军，其运物亦廷臣主之”^②。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诏令三司以当年江淮所运米200万石转运河北州军，以供河北前线诸军之用。熙宁五年（1072），赐河北常平司内藏库钱5000万缗，于近边或沿黄河、漳河和御河一带可通漕的州军购买粟米以为军储。至和二年（1055），置河北都大提举便余粮草及催遣黄御河纲运公事一职，专以负责和余漕、魏诸地的粟米，通过黄、御河等漕运给边，以为军用。

金朝定都燕京后，京城皇室、百官及其驻军所需，主要依靠今山东、河北、河南等地供应，因此，疏通原有漕路，储备漕粮，保障京城所需就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天会七年（1129）金朝在将陵（今德城区）建将陵仓，以利河漕储运。大定四年（1164），山东地区粮食丰收，金朝廷即令运河运粮“以实京师”。当时由于战乱，只有德州段运河通运，清河等运河段湮塞严重，最后不得不实行陆运。为此，金世宗下诏责命有司：“有河不加浚，使百姓陆运劳甚，罪在汝等。朕不欲即加罪，宜悉力使漕渠通也”^③。后经治理北清河，开凿通州运河，金朝的漕运网才逐步构建起来。当时德州西部的北清河漕路是一条重要的运粮通道。金朝在

① 民国《德县志》卷一三《风土志》。

②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九，中华书局2004年版。

③ 《金史》卷二七《河渠志》。

德州设漕运司提举官 1 人，由景州刺史兼任，并设专人具体掌管催督起运纲船。漕运司下设课使、起运两科，除司吏、孔目官外，特置押纲官 76 人。泰和六年（1206），为加强漕运管理，朝廷规定运河所经之县长官，皆兼掌运河漕运，于是，夏津、武城、将陵等县长官皆加职“管勾漕河事”，负有修护堤岸、督察漕运之责。当时，德州运河两岸栽种了大量的榆树和柳树，“以护河堤”。然而，由于运河来水少，经常造成运道浅滞而难以通舟，故终金之世，运河所起的作用有限。

（二）御河的疏浚与大运河的畅通

元朝统一后，由于连年战乱，货物匮乏，“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①，急需打通连接南北的水运通道。元初的漕路即由江南运河入淮后，溯淮入黄河至今河南封丘南 30 里的濠镇，转为旱路运输，到达淇门后再入御河，经临清、德州、沧州，运至天津，再沿白沙河至通州，最后陆运至大都北京。水陆接运，反复装卸，既费时又费力。因此，在原有运河的基础上，开凿新的运河便捷水运之路，截弯取直，使之南北贯通，便成为元政府亟待解决的大问题。

元朝初年，自天津直沽向西汇合卢沟、巨马、薳水诸河，由靖海境南折，过今河北省青县汇合滹沱、漳水，再过沧州、陵州（德州）至临清，统称南运河，亦即卫河的下游河段。由于长期的战乱，这段运河的许多河段都严重淤塞。从今山东堂邑东南到德州，岸堤毁坏多达 30 余处，河道淤塞达 15 里，且河道蜿蜒曲折，仅夏津至德州段就有 32 处险工。“甲马营，一盘绳，弯弯曲曲到武城”和“九望德州”即由此而来。在沧州河段，由于多年淤淀，河道高出地面形成地上河，春旱时水源缺乏，逢大水又易造成堤防决溢。加上运河两岸的权势之家掘堤挖井，引水灌田或私取堤土，严重威胁着运河的通航安全。为此，元朝廷命各沿河州县堵塞灌溉渠道以复水势。为护河堤堰，又诏令滨河州县佐贰官皆兼河防事，凡有堤防损坏处及时修筑，严禁私自掘堤放水，还令于堤上广植树木以固运堤。

中统三年（1262），忽必烈任命 31 岁的水利专家郭守敬“提举诸路河渠”。至元十三年（1276），郭守敬奉命沿隋朝大运河一路寻访，勘查运河故道，行程数千里，在南起徐州、北抵德州的广大地区做了缜密的考察。经对实地勘察和广泛听取意见，设计了自陵州（德州）至大名，济州（济宁）至山阳湖、微山湖，东平至罍城，东平至清河过黄河接御河，自卫州（今河南辉县）入御河至东平等运河河道开凿、疏浚方案，得到了忽必烈和朝中大臣的一致肯定。

从至元二十年（1283）到至元三十年（1293），在郭守敬、马元贞等主持下，历时十年，先后开凿了从大都到通州的通惠河，从通州至大沽的通州运粮河，疏通了从大沽经沧州、陵州（今德州）至临清的御河，开挖了从临清至东平的会通河、从东平至济州（今济宁）的济州河，自济州河而南与南方原有的大运河相接。至此，北起北京积水潭，南至杭州拱宸桥，贯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总长 1816 公里的京杭运河全线贯通。

^① 《元史》卷九三《食货志》。

大运河的贯通，对于久经战乱的德州及北方经济的振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二、宋元时期德州区域经济的发展

宋元时期，德州一带屡经战火，给社会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但是，由于运河的不断整治和开发，特别是统治者在开拓航运的同时，又屡屡兴建以消弭水患和引水灌溉为主要内容的农田排灌工程，对于德州社会经济环境的改善和经济的恢复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德州人民的辛勤劳作下，德州经济比前代有了新的发展。

（一）宋元时期德州区域农业、手工业的发展

宋朝立国后，一方面大力倡导“养民”、“务农”、“厚农桑”之政，减轻百姓负担，另一方面又在包括德州在内的全国各地兴建了许多水利灌溉工程，从而推动了农业经济的发展，保持了粮价的稳定。《宋史·食货志》载：“建隆（960-962）初，诏除沧、德、棣、淄、齐、郛、乾渡三十九处算钱，水涨听民置渡，勿收其算”，“大中祥符六年（1013），始免诸路州军农器之税”，“元丰元年（1078），滨、棣、沧州竹木、鱼果、炭箔税不及百钱者蠲之”。^①熙宁二年（1069），“判大名府韩琦言：去岁河朔丰稔，斗米不过七八十钱”^②。

利用运河水资源，将含有大量淤泥的河水引灌到那些瘠薄盐碱之地，使之成为沃土，称为“淤田”。当时，德州开始引水淤田并取得一定成效。原来一些盐卤地经连年放淤，“尽成膏腴，为利极大”。熙宁五年（1072），沈括奉命察看德州境内黄河、马颊河两岸私田引水淤灌后给予了肯定，称赞其为“美田”，而“淤淀不至处，悉是斥卤不可种艺”^③之地。就连对熙宁变法持反对态度的苏辙，对淤田也极为赞赏。他说，经放淤后能种上小麦的土地，“比之他田，共收十倍”^④。至熙宁八年（1075），“深州、永静军（当时德州隶属永静军）引河水淤田2.7万余顷”。当时，不仅民户都愿买淤田，就连朝廷的赐田也多是淤田。金章宗时，由于水田开辟，甚至出现了“豪民与人争种稻”的现象。

推行屯田、营田制度，努力拓展耕地面积是宋元时期在德州推行的另一项有利于农业恢复发展的措施。北宋前期，宋朝廷即在德州诸河流开展军屯，不过成效不大。金朝在大名府以东的山东、河北等地组织屯田军进行屯田，有一定成效。元朝“内而各卫，外而行省，皆立屯田，以资军饷”^⑤，把屯田作为土地开发的重点。当时，德州沿运河区域是军屯的重要地区。

宋元时期，德州传统农业生产工具齐备而多样，目前德州发现的北宋和金代农具有犁、锄、铲、镐、铡刀、垛叉、镰刀等。踏犁是北宋出现的一种以人力代替牛耕的耕地工具，四至五人用踏犁耕地可比一犍牛犁，比起铁锹刨地要提高一倍的效率。宋太宗淳化（990-994）年间，德州一带发生牛疫，为不耽误农时，官府急命造踏犁数千具分发民间。

① 《宋史》卷一八六《食货下》。

② 《宋史》卷一七六《食货上》。

③ [宋]沈括《梦溪笔谈》卷一三。

④ [宋]苏辙《栞城集》卷四〇。

⑤ 《元史》卷一〇〇《兵志三》。

粮食产量方面，北宋时德州大致亩产一石左右。宋太宗太平兴国（976-983）年间，粮价上扬，德州知州靳怀德奏请朝廷放开粮食市场，允准商人载米入市，自由买卖，于是，“四方商旅皆至，即米多而价自贱矣”。当时，德州斗米10钱。直到北宋中期，物价上涨，但粮食仍较平稳，斗米不过85文。

农业生产的发展还表现在商品性农业水平的提高。当时，出现了果农、棉农、菜农等专业种植农户。据乾隆《德州志》记载，元代德州一带的居民所食蔬菜已有茄、黄瓜、冬瓜、葱、韭、莴苣、生菜、芥、椒、藕、萝卜、菘、蒜、胡萝卜、茴香、菠菜、豇豆等30余种。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元代中期以后，棉花种植开始以不可阻挡之势在德州发展起来，极大地促进了商业性农业的发展。

丝织、麻织和棉织业都很发达，独立的纺织作坊——“机户”逐渐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并形成规模经营。元代，德州织造的精美绫罗和用金线、丝线混合织成的绵丝罗，行销京城。

德州制瓷业特别发达。1980年德城区大学西路液压元件厂出土了大量宋元时期的碎瓷片、瓷俑，产品风格属于磁州窑系。从2006年4号探坑出土的瓷窑址来看，德州窑为马蹄窑，因其立面似馒头状，俗称“馒头窑”。火膛呈扇面形，火膛与窑室合为一个馒头形券顶空间，窑后壁的正中和两侧共设三个烟道，烟道呈扇形。窑体一半在地下，从下往上有三层结构：最下面一层是灰道，也是通风道；中间一层是窑体，也包括燃烧室（火膛）、窑床、烟道三部分；最上面一层是窑背和烟囱。窑体外用砖砌成。窑底为圆形，窑高3米左右，窑内面积约30平方米。窑门狭窄而低矮。窑顶呈拱形，一侧有通烟的烟道。出土陶片中，有一状似泥人玩具的碎片，一面施釉，色彩较淡，有黄、红、绿三色，胎质疏松，具有北宋三彩类型。有的陶片施黄釉或绿釉，色彩鲜艳，有净面釉，有划花。出土的灰白瓷器，瓷胎纤细，瓷面多数有黑、褐色简单花纹和彩绘，少数有划花。另外，还出土了一些元代白瓷和少量的仿钧窑的青白瓷制品，造型独特，色彩莹润。釉色有暗釉、亮釉两种，暗釉多月白色，有牛毛纹；亮釉多天蓝色，有鱼子纹。瓷器种类最多的是碗、器盖、瓷俑，其次是盆、罐、枕、瓶、灯等。釉色以白釉居多，其次为黄釉、黑釉等。装饰技法有划花、刻花、点彩、加彩黄釉刻花、白釉黑花等。

（二）宋元时期德州区域市镇的兴起与商品经济的发展

运河的畅通，直接带来商业运输的便利，极大地提高了商货运输量。从运输效率来看，人挑畜驮车推，自然不能与动辄数百石、上千石的船运相比，且水运费用低廉，所以宋元时期无论官私都重视利用水运。正是在这样一些基本条件的影响作用下，促使德州运河区域商业经济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元代御河“舳舻相冲，千里不绝，官艘贾舶，联翔方载”。运河商船“南逾苏杭，远浮闽广，北越津京”。每当漕运繁忙季节，运河上“帆樯如林，百货山积”。运河两岸“市肆栉比，绵亘数十里”^①。当时，德州是南北漕运的集散地，陵州仓为华北第一官仓，德州逐步发展成为区域经济中心。

^① 以上引文见乾隆《德州志》卷三《河渠》。

当时，农村集市、市镇和城市的商业流通相互渗透发展。商业市场由局限性大、较封闭的地方性市场向整个运河区域市场推进，并进而辐射延伸至周边市场。德州周边市镇发展很快，如新安镇、桑园镇、边里镇等。桑园镇（今属河北吴桥），位于运河之滨，“舟车所聚，四方商贾之孔道也”。边里镇（今属经济开发区）“井邑之盛，赋入之多，县道所不及”。新安镇（今属临邑）“人物繁阜，商贾云集，不啻一新县”^①。元朝商税征收数量的激增，间接反映了工商市镇的繁荣。《元史·食货志》载，文宗天历元年（1328）的商税额，排在全国前三位的地区为浙江、两淮及山东，而三地均为运河所经的主要地区。德州是当时大运河的重要枢纽，城市人口超过2万，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德州商业经济的繁荣。

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德州沿运城镇工商业者在城镇居民中的比率逐年提高，宋代德州已有“小市藏百贾”之说，元代“大聚四方之俗探奇货于游市，号为百商之渊”。元朝政府还允许漕船搭载竹木、皮革、铁器、绸绢段匹等沿途售卖，“北出燕齐，南抵闽广，懋迁络绎，资用丰沛”。^②色目商人更是善于经商，他们多集中在城内，也有的定居于沿河市镇，经商谋利。

第四节 人文与词章之盛

宋元时期，德州先后为北宋、金、元所统治。尽管德州区域频至变乱，但文化和人文上仍然有可圈可点之处，“无棣”李氏——李愚、李之纯、李之仪；刘翰与《开宝本草》；南宋重臣吕颐浩；金末大将崔立就是其中的代表。

一、“无棣”李氏——李愚、李之纯、李之仪

无棣县设立于隋文帝时期，县治在今庆云县城东北4公里的常家镇于家店村，历经隋唐、五代、宋金，前后530余年。元朝时，无棣分为沧州无棣和棣州无棣。沧州无棣即今庆云县，也称西无棣；棣州无棣即今无棣县，也称东无棣。明洪武年间，因避明成祖朱棣之讳，西无棣遂改名为庆云县，东无棣改名为海丰县。

李愚（？-935），字子晦，渤海无棣（今山东庆云）人。因仰慕春秋时齐国大夫晏婴之为人，曾名晏平。

唐朝后期，藩镇割据，相互争战，今河北地区战乱尤剧。李愚先世居赵郡平棘（今河北景县），世代读书，父亲李瞻业屡应进士而不第，为躲避战乱，举家迁居至无棣。李瞻业以诗书训导子孙，使李愚从小受到良好的儒学教育。李愚少时就“有异常儿”，沉默寡言，敏求好学，及至年长，“厉志端庄，凤神峻整，非礼不言，行不苟且”，家境虽然贫寒，但却谨重老成，有独到见解，爱读经史、古文，有韩愈、柳宗元遗风，因而在当地颇有名气。^③

唐朝末年，李愚被沧州节度使卢彦威任为安陵主簿，但不久因母去逝而辞职。后来，李

① [清]田雯《长河志籍考》卷三《新安镇》。

② [元]陆文圭《巽溪翁墓志铭》，《墙东类稿》卷一三。

③ 《旧五代史》卷六七《李愚传》。下同。

愚试图到长安发展，又因时局混乱，朝廷连年罢停科举考试故而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入仕机会，只好客居于蒲（今山西永济）、华（今陕西华县）之间。光化三年（900），宦官刘季述、王奉先幽禁唐昭宗，矫诏立皇太子李裕为帝。当时，李愚在华阴，痛心切齿、焦虑万分，遂致书华州刺史韩建，劝其领兵攻入长安，恢复昭宗帝位，言辞甚为激越。韩建虽对他深加礼遇，但却不用其言。第二年，恢复皇位不久的唐昭宗又被李茂贞控制在了凤翔，朱全忠率大军西攻，战火骤起。李愚只好东走洛阳避难。

大约在哀帝即位前后，唐朝又重开科举，少师薛廷珪主持贡举考试，李愚连中进士、博学宏辞两科，授官河南府参军，居于洛阳白沙别墅。天祐二年（905），朱全忠尽杀唐朝要官，投尸于黄河，制造了“白马之祸”。李愚愤而“以衣冠自相残害”，从洛阳逃到了河朔，与同宗李延光客居于山东。随后七八年，李愚一直过着隐居生活。

梁末帝朱友贞即位后，以李延光为侍讲。李延光借讲经之机多次称荐李愚，并说他“行高学瞻，有史鱼（春秋时卫国史官，以正直著称）、蘧瑗（春秋时卫国大夫，以勤于改过，与世无争著称）之风”。梁末帝召见李愚，“嗟赏久之”，对其学识倍加称赏，遂任为左拾遗、崇政院直学士。地位的变化并没改变李愚刚强耿介的性格，他“俨然正色，不畏强御”，多次触怒当朝政要，因而逐渐受到冷落。一次，衡王朱友谅入朝，朝廷重臣崇政使李振等人向他行跪拜大礼，惟有李愚只是行了拱手礼。梁末帝于是责备他说：“衡王是我的兄长，我见他也要跪拜，崇政使李振等人见了都行跪拜大礼，你为什么如此傲慢呢？”李愚回答道：“陛下以自家人的礼节见长兄，李振等人是陛下的家臣。我是陛下的朝臣，再说我与衡王素无往来，怎么敢做巴结逢迎的事呢。”晋州节度使华温琪在任期间，违法查抄民众家产，按律应治罪。梁末帝认为华温琪系开国功臣，不忍加法，但李愚“坚按其罪”，梁末帝辩解说：朕若“遂行典宪”，就会被看作“不念功臣”。最后竟用公款偿还了事。贞明（915-922）年间，通事舍人李霄的家臣殴人致死，按照后唐律法，梁末帝同意治李霄的罪。李愚觉得这样做不公平，就上书为李霄辩解。梁末帝早就对李愚厌烦，遂借此加以“忤旨”罪把李愚贬为膳部员外郎，不久改为司勋员外郎，后来干脆把他赶出京城，贬为历许州、邓州观察判官。

923年，后唐庄宗李存勖灭梁，李愚到京师洛阳朝见，诸公卿素闻李愚才学，对其格外尊重，庄宗任他为主客郎中、翰林学士。同光三年（925），庄宗派兵伐蜀，李愚以都统判官职从军。当时，有人主张蜀道险阻，宜缓师待变。招讨使郭崇韬问计于李愚，李愚说：“蜀主荒怠乱国，国人愤怒，今宜乘其内忧，击其不备，风驰电掣，彼必破胆，兵贵神速，不可缓也。”唐军以计南进，蜀兵望风而降。行至宝鸡，因地势艰险，诏讨判官陈义称疾请留，李愚厉声说道：“陈义见利则进，知难而止，今大军涉险，人心易摇，正可斩之以作警示。”由是军中再无人敢言逗留。当时，军书檄文均由李愚拟定。灭蜀后，李愚以功拜为中书舍人。

唐明宗即位后，李愚以中书舍人权知贡举，不久又改为兵部侍郎、充翰林承旨。长兴元年（930），因得罪宰相冯道、赵凤，李愚被罢为太常卿。第二年，赵凤罢相，明宗以李愚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愚为官清廉，衣居简陋，甚至做宰相前连宅第也没有，即命为相，

只好借宾馆暂居。有一次，李愚患疾，明宗遣中使宦宫探望，中使见李愚所居寝室，四壁萧然，床榻之上破席败毡而已，回去向明宗汇报，明宗感叹良久，特赐绢钱帐褥等物。

应顺元年（934），闵帝即位，罢冯道出镇同州，以刘煦代之。李愚进位左仆射。刘煦性偏急，力主革新，而李愚素刚介，称赏古制。刘煦是冯道的亲家，每当他提出新方案时，李愚便讽刺说：这都是你亲家翁定的，更改了恐怕不当吧。因两人政见不一，遇事争吵不休，所以没过多久，两人就一起被罢免了相位。此后，闵帝数召学士问以政事，而以李愚迂阔，一次也未召见询问过。同年五月，末帝即位，李愚加“特进”，充太徽宫使、宏文馆大学士。但末帝也认为李愚“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迂阔不可用，甚至给他起了个“粥饭僧”的绰号。清泰二年（935）秋，李愚病重，请求告老还乡，不允。不久病卒。

李愚学识渊博，具有较高的文学修养，著有《白沙集》、《创业功百传》，曾作《仲尼遇》、《颜回寿》、《夷齐非饿人》等篇，当时流行很广，《旧五代史》言：“北人望风称之”。李愚还对雕版印刷做出过重要贡献。《五代会要》记载，后唐长兴三年（932）二月，冯道、李愚等人奏请刊印《九经》被准许。唐明帝“敕令国子监集博士儒徒，将西京石经本，各以所业本经句度抄写注出，仔细看读，然后雇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随帙刻印，广颁天下，如诸色人等要写经书，并须依所印敕本，不得更使杂本交错”。这次我国历史上最早由政府组织的大规模印刷工程，到后周广顺三年（953），历经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个朝代，用了二十一年的时间才全部完成。除《九经》之外，还刊印出《论语》、《孝经》、《尔雅》、《五经文字》、《九经字样》等，对我国印刷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李之仪（？-1117），字端叔，自号姑溪居士，宋代著名词人。北宋沧州无棣（今山东庆云）人。李之仪早年师从于范仲淹之子范纯仁，为人端正，学问匪浅。神宗元丰（1078-1085）年间考中进士。此时，李之仪“登第几三十年”^①。但因范纯仁反对王安石变法，一再被贬，所以李之仪并未被授官。元祐八年（1088），苏轼出知定州（今河北定县）。苏轼对李之仪的才华早就很敬重。据说，元祐三年（1088）的一天冬夜，苏轼在赏读李之仪的诗作时，越读越有趣，读至深夜，奋笔题诗一首：“玉堂长冷不成眠，伴直难呼孟浩然。暂借好诗消永夜，每逢佳处辄参禅。愁侵砚滴初含冻，喜入灯花欲斗妍。寄语吾家小儿子，他时此句一时编。”诗中把李之仪与唐代著名诗人孟浩然相比，尤其对不能与李之仪一起谈论诗道而感到遗憾。因此，他一到任，便向朝廷申奏，以李之仪为定州通判，作为自己的助手。两人在定州，朝夕唱酬，宾主甚欢。哲宗元祐（1086-1093）初年，范纯仁拜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右相），李之仪遂被任命为枢密院编修官。不久改任原州（今甘肃固原）通判。

元符年间（1098-1100），李之仪监内香药库。御史石豫说他曾为苏轼幕僚，不可以任京官，遂被停职。宋徽宗崇宁（1102-1106）初年，李之仪提举河东常平。当时，奸臣蔡京当权，范纯仁的儿子知谏院范正平对其极为鄙视。李之仪给范纯仁整理遗表，写行状，把范纯仁的生平大节铺叙得一清二楚，文中含有怨愤之语。蔡京知悉后乘机挟嫌报复，将他下狱。

^①《宋史》卷三四四《李之仪传》。下同。

崇宁二年（1103），朝廷将他从官册中除名，交太平州（今安徽当涂）管制。在太平州期间，李之仪处境十分悲惨：“某到太平州四周年，第一年丧子妇，第二年病悴，涉春徂夏，劣然脱死。第三年亡妻，子女相继见舍。第四年初，则癍疮被体，已而寒疾为苦。”^①

数年后，李之仪虽遇赦复官，被授予朝请大夫，但饱尝了官场黑暗和人间疾苦的他，仍旧居住在州南姑溪之地，无可奈何地将自己的余生消磨在写诗作词上。宋徽宗重和元年（1117），病卒。死后葬于当涂县东门外藏云山。

李之仪是北宋文坛上颇具影响的作家。他既善诗词，又能属文，尤工尺牍（书信），苏轼称其“入刀笔三昧”。其诗流畅清丽，名稍不及黄（庭坚）、陈（师道）。其文妙语活脱，“与张耒、秦观上下”。其词清婉峭隽，“多次韵，小令更长于淡语、景语、情语”，如“鸳鸯半拥空床月”、“卧看游丝到地长”、“时时浸手心头熨，受尽无人知处凉”等。李之仪对词的特点深有研究，曾说：“长短句（词）于遣词中最为难工，自有一种风格，稍不如格，便觉齟齬。”他批评柳永“韵终不胜”，张先“才不足而情有余”，而主张像晏殊、欧阳修那样“语尽而意不尽，意尽而情不尽”。他的词作也的确达到了这一境界，如《卜算子》：“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②词学民歌与古乐府，借水言情，明白如话，流畅清丽，委婉峭隽，复叠回环，朴实无华，极其绵婉含蓄，是文人词新巧构思的典范。李之仪曾与秦观、黄庭坚、贺铸等人歌词答谢，学者多将他与这几人并提，甚至说他“不减秦观”，但实际上，他的创作成就比起秦观等人有所不及，清人冯煦在《宋六十一家词选》中评价说：“姑溪词长调近柳（永），短词近秦（观），而均未至”，是较为中肯的评价。

现存《姑溪居士文集》70卷及《姑溪词》1卷。

李之纯（1035-1110），字端伯，北宋沧州无棣（今山东庆云）人。李之仪从兄。神宗熙宁三年（1070），李之纯考中进士，判为度支判官，出为江西转运副使。后来，李之纯出为成都府府路转运使。成都路地少人稠，粮食不能自给，每年靠官府减价发售官米6000石供应民食。盐官上奏，认为这虽然给百姓带来一定好处，但损害了国家利益，应予以免除。神宗下诏朝臣讨论，李之纯说：成都老百姓仰仗皇恩浩荡，依靠这些粮米已经生活了百余年，今天凭何要剥夺他们的饭碗？最终，神宗依李之纯意见，照例售米。

在成都府路，李之纯恪尽职守，为民而谋，政绩颇佳，任期届满时，神宗特命继续留任。数年后，李之纯回朝任职，神宗诏见并宽慰他说：你本该几年前就回朝复命，但朕不想更换命臣，为的是让你这样忠于朝廷、有所作为的大吏在地方任职，使边远地区保持宁静，五谷丰登，民心安顺，以昭彰朝廷的绥远之意。遂授李之纯为右司郎中，转为太仆卿。

哲宗元祐元年（1086），加龙图阁直学士衔，出知沧州（今河北沧州）。后诏任户部侍郎，未至，改集贤殿编撰，出任河北都转运使。元祐二年（1087），以宝文阁待制，出知瀛洲（今河北河间）。元祐六年（1091）二月，以宝文阁直学士权知开封府。十二月，开封府大火，

^① [宋]李之仪《与祝提举无党》，《姑溪居士文集》卷二一。

^② 《卜算子·我住长江头》亦称《卜算子·相思》，据说是李之仪为怀念红颜知己杨姝而作。

李之纯仅以身免。不久，以直学士衔再知成都。诏还，任户部尚书，迁为御史中丞。这几年，李之纯辗转数任，皆称“善治”。

李之纯为人耿直，识大体，知大义，性情耿直，不拘小节，做事不喜声张。李之纯每次公差外出，身边总跟一义仆，专司收葬道野人尸，就地掩埋。元祐八年（1093），御史董敦逸连上四状，弹劾苏辙以名器私赠亲友，紊乱朝政。御史黄庆基亦连上三状弹劾苏轼，言苏轼在任中书舍人时，作词指斥先帝，诋毁朝廷。李之纯与丞相吕大防为二苏申辩，指责董敦逸、黄庆基狭私以害忠良，结果董敦逸、黄庆基被贬斥。他曾奏言：贤明的大臣们和衷共济辅弼朝廷，天下的百姓就能和睦相处，百业兴盛。齐心协力甄辨好坏，把不好的东西转化为好的东西，是每一位臣子应尽的职责。现在有些人看到朝廷不谐，就乱加评论，观望退缩，这不是解决问题的行为，应该加以改变。

绍圣年间（1094-1097），李之纯任工部尚书。御史刘拯劾李之纯阿附苏辙，降职单州（今山东单县单城镇）太守。不久病卒，享年75岁。

李之纯文学、史学成就俱佳。今存其《奏议》五卷，《文集》二十卷。他注重文章内容，提倡平易流畅、委屈婉转的文章风格。他的诗文，简洁明畅而又丰满生动，为北宋文学革新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如《真味堂》：“问渠真味若为言，不著盐梅也自全。鼋鼎大夫徒染指，曲车公子漫流涎。胸中已有五千卷，徽外更听三两弦。此区清饒何所嗜，宦途嚼蜡已多年。”

二、刘翰与《开宝本草》

刘翰（919-990），宋代医学家，沧州临津（今山东宁津）人。刘翰“世习医业”^①，出身医学世家。五代后期，刘翰曾为护国军（今山西齐州）节度巡官。后周显德（954-958）初年，他携带自己几十年来的研究成果——《经世方书》30卷、《论候》10卷、《今体治世集》20卷等到汴京进献给朝廷，周世宗柴荣对他大为嘉奖，并把他献的书交付史馆保存，任命他为翰林医官、卫尉寺主簿。959年，周世宗率赵匡胤等亲征契丹时，以刘翰为御医，随军同行。

北宋建立后，刘翰任朝散大夫、鸿胪寺丞。当时，宋太祖赵匡胤励精图治，大到军政要事，小到医药工艺，都要考核落实，务求实才。乾德（963-979）初年，宋太祖令太常寺考核比较翰林医官的技艺，贬退了其中医术不精的26名医官，而这次考试中，刘翰取得了优等。此后，宋太祖又下诏令各州官吏访求医术优良的人，将他们的名字登记在册，照例酌情赏赐置办衣装之钱，送到朝廷任职。开宝五年（972年），太祖弟赵光义（即后来的宋太宗）患疾，卧病王府，太祖命刘翰与道士马志前去医治，刘翰对症下药，赵光义很快康复。太祖大喜，遂以刘翰为尚药奉御，并赐银器、钱财、鞍马等物。

北宋政府对医学相当重视。因刘翰医术高超，精通医药，开宝年间（968-975），宋太祖特命他组织人力详细修订唐代药学家苏颂等人编著的《唐本草》。刘翰与马志、医官翟照、张素、吴复珪、王光祐、陈昭遇等人经过多年研究考证，最后确定了收录的药物共计983种，

^①《宋史》卷四六一《方技上》。下同。

其中《神农本草》360种、《名医录》182种、《唐本草》增加的药物114种、有名称没有使用过的药物194种，另外刘翰等人还参考各种药书考订增加了132种新药，编纂成当时最为完备的药物学著作——《开宝本草》。书稿编成后，太祖诏令翰林学士、中书舍人李昉，户部员外郎、知制造王祐，左司员外郎、知制造扈蒙详细审查书稿。审查完毕后，李昉等上呈宋太祖，请求付梓刊印，并为之作序说：此书参照历代医家著述，考证辨伪，去非取是，增补了《神农本草》的漏缺，纠正了南朝陶弘景的误说，并按照药性重新划分类别，以白字为神农所说，墨字为名医所传，唐附今附，各加显注，详其解释，审其形性。证谬误而辨之者，署为今注；考文意而述之者，又为今按。义既判定，理亦详明。今以新旧药合九百八十三种，并目录二十一卷，广颁天下，传而行焉。此后，刘翰兼任检校工部员外郎。

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太宗任命刘翰为翰林医官兼检校户部郎中。雍熙二年（985），大同军节度使刘遇病重，太宗诏令刘翰火速前往治疗。刘翰回京后对太宗说，刘遇的病情一定会好转，然而，刘遇很快就死了。刘遇以善射著名，追随太宗征江南、灭北汉，太宗待之甚厚。因为此事，刘翰被贬为和州（今安徽和县）团练副使。端拱年间（988-899），刘翰又被召为尚药奉御。淳化元年（990），又升为翰林医官使。不久病卒，享年72岁。

医学之外，刘翰还善作诗文，《全宋诗》卷一收录有刘翰诗句23首（句），如《哀友人》：“案成歌舞小春娇，何事君随草木雕。从此巴江江上月，有人和泪独吹箫。”再如《种梅》：“凄凉池馆欲栖鸦，采笔无心赋落霞。惆怅后庭风味薄，自锄明月种梅花。”可谓闲适与惆怅之情共存共生，颇具儒医情调。

三、毛诗学专家张雍

张雍（生卒年不详）北宋德州安德县（今德城区）人，毛诗学专家。宋开宝六年（973）考中进士，历任将作监丞，知南雄州（今广东韶关南雄）、太子右赞善大夫、知开封府司录参军事、秘书丞等职。

端拱初年（988），累迁太府少卿加谏议大夫，出为西川转运使，知梓州。此时，四川王小波、李顺起义，聚众至万人。张雍训练士卒，组织城中兵士三千余人，招募强勇千余人守城。不久，李顺攻占益、绵、邛、彭等州，并于成都建立“大蜀”政权。李顺派遣部将相里贵帅众十万围攻梓潼，以“梯冲火车”攻城，“昼夜鼓噪，攻城益急，城中大恐”^①，张雍以“发机石”击毁“梯冲火车”。双方攻守异常惨烈，相持80余日不分胜负。后来剑南、两川招安使王继恩率大军入川，攻陷成都，李顺被俘，梓潼之围始解。事后，宋太宗下诏书给予奖励，并提升张雍为给事中。至道二年（996），改工部侍郎，转礼部、户部、兵部侍郎。景德（1004-1007）初年，权知开封府事。大中祥符元年（1008），以尚书右丞致仕，诰命未至而卒，年七十。

张雍在家乡积极办学立教，招收学生，讲授经术。在教学中，他注重因材施教，培养既有道德修养，又有实际治国能力的人才。由于张雍在任职期间，经常往来于河南、西川和京

^①《宋史》卷三〇七《张雍传》。

都，注意到治河与水利的重大社会效用，所以他在教学中设立“水利”一科，使弟子在学习儒家义利的同时，能掌握一些实际有用的专业知识，以适应社会的需要，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他讲学不拘古法，多有新义。生徒请教经义者，日达数十人，他都和颜相待，耐心予以一一解答，殊无倦色，颇受推重。他终生致力于研究和传授儒家学说，以学术活动来捍卫和重振儒家的正统地位，以“道德论”来阐明和发展儒家的大一统思想，为振兴德州宋代儒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四、南宋重臣吕颐浩

吕颐浩（1071-1139），字元直，南宋大臣。北宋河北东路沧州乐陵县（今山东乐陵）人。

青少年时期，吕颐浩刻苦好学，博览群书，倍受师长称道。今乐陵城南郑店乡旧乐陵村仍有“翠贤亭”故址，传为吕颐浩当年读书处。后来，其家徙居齐州（今山东济南）。其父去世后，家境逐渐贫寒，他“躬耕以瞻老幼”^①，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哲宗绍圣三年（1096），吕颐浩考中进士。初任密州（今山东诸城）司户参军，后由李清臣荐为邠州（今陕西彬县）教授。曾授宗子博士之职，累官太府少卿、直龙图阁、河北转运副使、都转运使。徽宗宣和七年（1125），宋金南北夹攻辽朝，吕颐浩随种师道北伐燕京（今北京），负责转运粮草。宋军收复燕京，举朝弹冠相庆，然而金人虎视眈眈，随时准备南下。于是吕颐浩“奏燕山、河北危急五事”，请议“长久之策”，加强河北边防。这种不合朝廷政策的论调虽然触怒了宋徽宗，受到了贬官的处分，但却赢得了世人的称道，一时称其“切直”。当年秋，金兵果然南下，燕京守将郭药师劫吕颐浩、蔡靖等降金。金人北退后，吕颐浩复为河北都转运使。

宋高宗赵构重建宋朝后，吕颐浩被任命为扬州知州。建炎元年（1127）10月，宋高宗为躲避金人从应天府（今河南商丘）逃到扬州。吕颐浩入见，被任为户部侍郎兼知扬州，旋又升户部尚书。当时，扬州附近张迈率数万游寇屯居金山，吕颐浩单骑与韩世忠前往劝谕归顺，以功晋吏部尚书。建炎二年（1128），金兵逼近扬州，高宗召集群臣商议去留，最后决定渡江南避，同时任命吕颐浩为同签书枢密院事、江淮两浙制置使，屯驻京口（今镇江）阻击金兵。不久改为江东安抚制置使兼知江宁府（今南京）。建炎三年（1129），将官苗傅、刘正彦发动兵变，逼迫高宗让位给三岁的儿子，制造了举世震惊的“苗刘之变”。大敌当前，内部变乱，溃逃中的南宋政权陷入了更加危难的境地。吕颐浩得报后马上写信给知枢密院事张浚，说：事已至此，朝廷也只有靠我们这些人了！张浚也认为吕颐浩“有威望，能断大事”。两人遂约大将韩世忠、张俊、刘光世等起勤王兵平叛。大军至平江（今江苏苏州），张浚与吕颐浩相遇，两人执手而泣，吕颐浩慷慨说道：“颐浩囊谏开边，几死宦臣之手；承乏漕挽，几陷腥膻之域。今事不谐，不过亦族（族诛），为社稷死，岂不快哉！”于是，吕颐浩、张浚统帅中军，以韩世忠为前锋，张俊为侧翼，刘光世为游击。吕颐浩“被甲立水次，出入行阵”，“举鞭誓众，士皆感厉”，可谓同仇敌忾，气壮山河。勤王兵连克秀州（今浙江嘉兴）、

^①《宋史》卷三六二《吕颐浩传》。下同。

临平（今浙江杭州余杭区），顺利攻入杭州。杭州百姓“夹道耸观，以手加额”。高宗罢黜朱胜非，以吕颐浩为右相兼御营使。不久又改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

南宋初立，金兵攻势猛烈，在金兵的攻击下，吕颐浩不得不提出了“且战且避，奉陛下于万全之地”的战略主张，并表示愿意死守常州（今江苏常州）、润州（今江苏镇江），高宗以“朕左右不可以无相”为由拒绝，而以韩世忠守镇江，刘光世守太平。高宗至越州（今浙江绍兴）、明州（今浙江宁波），金兵亦尾随而至。高宗说：“事迫矣，若何？”危机之中，吕颐浩乃陈“浮海之计”，随高宗乘船避至海上。

宋朝立国，实行军政大权两分制度。南宋初期，吕颐浩因“有胆略，善鞍马弓箭，当国步艰难之际，人倚之为重”，身兼宰相、御营使等重要职务，军政大权集于一身，实为有宋以来第一人。但是，他性情暴躁，作风严厉，甚至在朝堂上掌掴大臣，因此朝中颇有微词。建炎四年（1130），翰林学士、吏部尚书赵鼎接连上书十余章，说吕颐浩“颢恣自用”，独断专行，一味避敌，且陈浮海之计，为金人所轻。恰逢浙西制置使韩世忠困金将完颜宗弼（金兀术）于黄天荡，吕颐浩建议高宗亲征，赵鼎以“冒进”为由上疏反对，高宗犹豫不决，吕颐浩因此请辞，除镇南军节度、开府仪同三司、澧泉观使。不久转为江东安抚制置大使兼知池州（今安徽池州）。

绍兴元年（1131），吕颐浩复入朝，二度拜相，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与秦桧分为左、右相。吕颐浩主外而秦桧主内。第二年，秦桧罢相，吕颐浩独秉朝政。他屡请兴师收复中原，受命都督江、淮、荆、浙诸军事，并于镇江（今江苏镇江）开都督府。此时，宋金战争连年，军需浩大，于是吕颐浩与朱胜非创立江、淮、湖南诸路大军“月桩钱”^①，供给军用，结果扰民太甚。又加他“报复恩仇”，挟私用人，排斥李纲、李光等人，复被御史弹劾。绍兴三年（1133），高宗认为吕颐浩“奋不顾身，为国讨贼，群臣所不及，但轻进，其失也”。再度罢免吕颐浩丞相之职，以开府仪同三司、提举洞霄宫任镇南军节度使，改“特进”、观文殿大学士、湖南安抚制置大使兼知潭州（今湖南长沙）。职衔虽升，然已不在权力核心。绍兴五年（1135），除少保、浙西安抚制置大使、知临安府、封成国公。绍兴八年（1138），除少傅、镇南定江军节度使、江东安抚制置大使。

第二次罢相后，吕颐浩取杜甫“穷老真无事，江山且定居”之意，选择台州（今浙江临海）巾子山东麓筑“退老堂”居住，并于景福寺旁建石亭，后人遂以巾子山为“吕亭山”，亭边之村为“吕亭山村”（今括苍镇上坪村）。吕颐浩曾赋诗一首，来表达他此时摆脱繁忙公务后的惬意心情：“东郊卜筑傍溪流，菡萏香中系小舟。脱去簪绅归畎亩，悟来渔钓胜公侯。青云旧好何妨厚，白雪新诗为宠留。又指湘潭问行路，一堂风月阻同游。”

绍兴九年（1139），宋金签订《绍兴和议》，金朝一度归还河南、陕西之地，高宗欲调吕颐浩到陕西，他以老疾辞谢。召赴临安（今浙江杭州），但因疾病未能见到高宗，遂即归台州养病。不久病逝，享年69岁。赠太师、封秦国公，谥忠穆。著有《忠穆集》。

^① 南宋为支应军饷而加征的税款名目，因系计月桩办钱物，故称。

五、元代状元张起岩

张起岩（1285-1353），字梦臣，山东禹城人。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元朝首次开科考试，张起岩一举而获得左榜“首选”^①进士，历任侍御史、燕南廉访使、监察御史、翰林承旨等职务，为官廉正。他学识渊博，史学、文学造诣极高，参与编纂了“二十四史”中的《宋史》、《辽史》、《金史》，著有《华峰漫稿》、《华峰类稿》、《金陵集》等传世作品，且善篆隶书，是元朝著名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

张起岩的祖先世居山东章丘，五代末年，为躲避连年战乱，由章丘迁到禹城，张起岩就出生在这里。张起岩高祖张迪是当时山东割据势力张荣的元帅右监军，曾祖张福为济南路军民镇抚兵钤辖，祖父张铎为东昌录事判官，父亲张范是四川行省儒学副提举。张起岩自幼随父读书，二十岁时，察举为福山县学教谕。时逢蝗灾，县官率众捕蝗，委任起岩处理县事。他处事公正而深得百姓称道，不久升为安丘县令。

唐宋以来，参加科举考试是儒生入仕为官的主要途径，但元朝建立后，科举停废长达半个世纪。皇庆二年（1313），根据李孟等人的建议，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决定重开科举。延祐二年（1315），元朝首次开科取士，张起岩考中“左榜”^②榜首，成为元朝第一位状元。之后，张起岩被授以登州知事。张起岩美髯方颐，面如紫琼，眉目清扬，每每临政决议，屹若泰山，被称为欧阳修式的雅量君子。元仁宗十分垂爱这位与他同日出生的状元，特旨将张起岩任为集贤修撰，后转为国子博士、国子监丞、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泰定帝时，张起岩母卒守制，服除后起为监察御史。后迁中书右司员外郎，进左司郎中兼经筵官，拜太子右赞善，改燕王府司马。

文宗即位后，拜张起岩为礼部尚书，参议中书省事。顺帝元统元年（1333），中书省铨选官员，张起岩因荐人失悦于丞相，被迁为翰林侍讲学士、知制诰兼修国史，修明宗、文宗、宁宗三朝实录。后来一度外放，历任江南行台侍御史、中台侍御史、燕南廉访使。张起岩在燕南任职期间，打击豪强，百姓们都拍手称快。那时滹沱河水时常泛滥成灾，真定一地受害最深，官民祭天拜神，巫术大兴。张起岩撰文抨击封河神为侯爵等迷信活动，派人疏浚河道，修筑堤防，治平了水患。后来，张起岩回京任职，真定百姓相拥而送。回京后，张起岩任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知经筵一事。

至正三年（1343），元顺帝下诏修宋、辽、金三史，以中书右丞相脱脱为三史都总裁，铁木儿塔识、贺惟一、张起岩、欧阳玄、揭傒斯、吕思诚为《辽史》总裁官；铁木儿塔识、贺惟一、张起岩、欧阳玄、揭傒斯、李好文、杨宗瑞、王沂为《金史》、《宋史》总裁官。宋、辽、金三史，虽以丞相脱脱等蒙古大员领衔，但实际主撰者是张起岩等人，他熟悉金元典故及宋儒道学源委，每当立言不当，他总是据理力争。至正五年（1345），三史修成，他上书请求告老还乡。至正九年（1349），张起岩卒于乡里，谥曰“文穆”。

^①《元史》卷一八二《张起岩传》。下同。

^②元代，蒙古人、色目人参加科举考试列“右榜”，汉人、南人则列“左榜”。

第六章 明清全盛——九达天衢与运河名城

明清时期,德州不仅是京杭大运河上的重要漕运码头,而且是重要的南北陆路交通枢纽,有“九达天衢”、“神京门户”之誉,在全国具有极其重要的政治军事地位。当时,德州经济发达,文化昌盛。经济上,工商繁荣、客商云集、仓储丰富、交易繁盛,是全国三十三大工商城市之一。文化上,“人文飙起,名卿蝉连,实甲山左”。涌现出卢世㯺、卢道悦、田雯、谢重辉、冯廷樾、田需、田霖、田同之、卢见曾等一大批文豪硕儒,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文化昌盛局面。由于流动人口激增和市民阶层的兴起,孕育产生了丰富多彩的市井文化;运河航运与人员往来带来了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形成了兼容并包、独具特色的运河风情和民俗文化。在国际交流方面,大运河为德州迎来了一位南洋贵宾——苏禄国东王,使德州成了国际性商业都会。康熙、乾隆二帝南巡,沿运河南下,多次驻蹕德州,对德州多有赞誉。明清时期的德州走向了全盛。

第一节 “九达天衢”与“神京门户”

德州作为运河要津,扼运河漕运之咽喉,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明初,德州是京杭大运河上的四大仓储之一,收储山东、河南两省漕粮数十万石,辖兑69个州县,年货运量、周转量、吞吐量都占运河各港口之首。明成祖定都北京后,随着京城人口的激增,对粮食和各种物品需求大增,于是漕运也不断加大。明王朝不断在德州扩大仓所建设,成为京师物资供应的战略重地。明初,先后设德州正卫与德州左卫,以重兵把守,屏藩京师,所以德州当时有“神京门户”之称;同时,德州又是南九省进京的水旱必经之路,故又有“九达天衢”之誉。

一、“德陵互易”与德州鲁西北政治中心地位的确立

隋唐宋元时期,德州区域政治中心在今陵县。隋朝废平原郡,设置德州(治今陵县)。陵县作为德州的州治和鲁西北区域政治经济中心,历隋、唐、宋、金、元,直到明初近800年的时间。

自元代开始,随着大运河的畅通,将陵县(今德州)的地理位置日益重要,“扼御河之要冲,为神京之门户”,成为贯通南北的枢纽。每当漕运繁忙季节,运河上“帆樯如林,百货山积”,运河两岸“市肆栉比,绵亘数十里”,城内“大聚四方之奇货于游市,号为百商之渊”。将陵逐步发展成为区域交通、商业中心。元朝在运河西岸建立官仓,时为北方第一粮仓,派重兵把守。地理位置的重要、经济地位的加强与战略地位的突显,促使其行政地位的变化。元统治者将其由县升州,改将陵县为陵州,区域政治地位进一步加强。明朝建立后,

这里更是明王朝的仓储中心和军事重镇,也是鲁西北地区的经济中心。因而洪武七年(1374),明朝对本区的行政区划做了进一步调整,将德州州治西移至陵州,而将原德州(今陵县)改为陵县。这就是“德陵互易”。德陵互易标志着区域行政中心西移的完成,德州最终成为区域政治、经济和交通中心。

德州城的重要性随之突显,所谓“郡居南北之要冲,镇漕河之上,与卫水交会”,“地处九河津要,路通九省舟车”,“控燕云而引徐兖,襟赵魏而带溟嶽,神京藉为咽喉,漕艘由之通达。”^①洪武九年(1376)将守御千户所改为德州卫,后称德州正卫;三十年(1397),在卫运河东岸的军队驻扎地修筑了周长十里的砖城。设置了知州署、州同署、州判署、守备署、参将署、城守尉署、德卫署等不下二十多种不同级别的官署。明永乐五年(1407)又增设了德州左卫;九年(1411),置安德马驿于南关,太平马驿于恩县北,安德水驿于西关,梁庄水驿于城南,良店水驿于城北;十三年(1415)于元陵州仓故址建广积仓,即德州水次仓。两卫共有士兵13440人,另有边军、城军、运军,共5600人。德州成为当时华北地区一大军事重镇。

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德州的政治、经济、军事和交通地位更为突出。德州运河码头的年货运量、周转量、吞吐量都位居运河各码头前茅。同时,德州还是河南、河北、山东、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等九省进京的水陆咽喉,史称“京畿达九省御路”。原德州城西北的官道上立有“九达天衢”牌坊一座,印证了德州在当时的重要地位。明亡清兴后,清朝也对德州城不断进行修葺。经明清两代的营建,德州城遂成为“京师所倚重”的重镇。

二、靖难之役与德州

元末明初,德州地区战争频繁,政局动荡不安。元末农民战争和朱元璋推翻元朝统治的统一战争刚结束不久,新创建的明朝皇室内部又爆发争夺皇位的“靖难之役”。德州成为“靖难之役”的主战场,因而这场战争对德州区域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明太祖朱元璋在平定天下的第三年,为确保明王朝江山千秋永固,“惩宋元孤立,宋室不竟之弊”^②,实行分封制,以二十四子分封诸王,巩固边防,翼卫朝廷。其中太祖的第四子朱棣被封为燕王而据北平天险,并“节制沿边士马”,地位显赫,权倾一时,对明廷集权统治威胁最大。洪武三十一年(1398),朱元璋病逝,已故皇太子朱标之子朱允炆即位,改年号建文,史称建文帝。功高权重的燕王朱棣习兵善战,屡率诸将出征,自恃势强兵重,对新继位的建文帝屡有不恭之举,便成了明廷最大的心腹之患。建文帝面对叔父诸王专横不逊的政治局面,权衡利弊,采纳大臣齐泰、黄子澄的建议,实行“削藩”,逐步削夺诸藩王之权,引起了各地藩王的不满。建文帝在“诏责燕王”的同时,并命都指挥使谢贵、布政使张昺以兵守王宫,见机图燕。调都督宋忠屯兵驻开平,并调走原属燕王管辖的永清左右卫官军分驻彰德、顺德,都督徐凯、耿璈、韩观分别练兵于临清、山海关、德州,以控制北平。久经沙场的朱棣临危不乱,密令指挥张玉、朱能潜纳勇士800人入府守卫。以张玉、朱能、邱

^① 乾隆《德州志》卷十二《艺文》。

^②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一五。

福为都指挥僉事，擢李友直为布政司参议，拜精于卜卦的金忠为燕王府纪善，随侍帷幄，为其谋策。建文元年（1399）七月，燕王朱棣以“清君侧、扶国家”为号召，公开举兵反叛朝廷。为师出有名，争取舆论，朱棣便借父亲朱元璋《祖训》中所训示的“朝无正臣，内有奸逆，必举兵诛讨，以清君侧”为由，同时“上书天子，指（齐）泰、（黄）子澄为奸臣。并授祖训，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则亲王训兵待命，天子密招诸王，统领镇兵讨平之”，“书既发，遂举兵。自署官属，称师曰靖难”^①。历史上叔侄皇位之争的“靖难之役”，自此在德州、沧州、东昌一带揭开序幕。

“靖难之役”伊始，朱棣即采取稳守北平、向四周延伸的战略，抢先占领军事咽喉要地居庸关，接着率兵“破怀来，执宋忠，取密云，克遵化，降永平”，很快建立起以北平为中心的大后方基地，做好与朝廷征讨军队长期作战的物资、军事准备。建文帝起用年近古稀的老将长兴侯耿炳文为大将军，驸马都尉李坚为左副将军，都督宁忠为右副将军，率军13万北伐。结果大败于真定。燕军乘势南下，威胁华北重镇德州。

德州不仅是水陆交通要道，战略位置非常重要，而且还储存着百万余石粮食，德州仓为当时华北第一大官仓。因而德州成为燕军夺取的重要目标，强化德州的守卫关系到战争的全局。建文帝听到耿炳文军败，根据黄子澄的推荐，任曹国公李文忠之子李景隆为大将军，李景隆带兵至德州，雄心勃勃，大会诸将，决定大举进攻，直捣北平。

李景隆本是纨绔子弟，素不知兵，且刚愎自用。他调集各路军马，共计50万，自德州北上，进抵河间。朱棣遂命世子朱高炽据守北平，并告诫世子切勿出战，自引兵援永平，直趋大宁。李景隆闻燕王征大宁，果然按朱棣所料，引军“进渡芦沟”，兵临北平城下，筑垒同攻北平九门。朱高炽坚守不战，严密部署，抓住有利时机选勇士夜缒城破营，南军扰乱，退营十里，北平拒守益坚。及燕王率兵自大宁还军，驰解北平之围，李景隆南军与燕军战于郑村坝。南军政令不修，上下离心。李景隆却求胜心切、不计险易，勒兵冒进。朱棣诱敌深入，率军直捣李景隆大营，城中亦鼓噪出兵，内外夹攻，燕军左右冲击，连破其七营，李景隆大败。李景隆见战事不利，令南军乘夜轻装撤退，数十万人的辎重全部留给了燕军，燕军大获全胜。李景隆率军昼夜南奔，败回德州。

李景隆逃回德州后，如惊弓之鸟，不知所措。德州守将韩观建议在城北筑垒，加强德州防御，确保德州官仓的安全。李景隆采纳了韩观的建议，征调民夫与守城士卒数万余众，在德州城北掘土筑城。先后筑起“十二连城”。“十二连城”亦名“十二连营”。南起北营、张庄，北至哨马营，西倚运河，东至长庄王家道口，南北长约10里，东西宽约5里。即鲍家营、王家营、夏家营、肖家营、顾家营、何家营、瞿家营、白贺营、钱家营、哨马营、边家营、陈家营。十二连营建成后，李景隆分兵驻守，以为德州城固若金汤，进可攻，退可守。李景隆北平之败，建文帝非但不责，却“赐黄钺弓矢，专征伐”^②。

①《明史》卷五《成祖本纪》。

②《明史》卷一二六《李景隆传》。

建文二年（1400）四月，李景隆会集 60 万大军，号称百万，在德州誓师，大举北伐，进抵白沟河（今河北雄县北）。双方在白沟河鏖战，南军势众，但政令不一，燕军利用有利时机，力挫南军主力。南军兵败如山倒，李景隆再次退走德州。燕军穷追不舍，兵临德州城下。德州城北有十二连城拱卫，易守难攻。但李景隆早已成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无心恋战，燕军突破十二连城，直抵德州城下，李景隆弃城而逃，奔向济南。德州失守，燕军获德州仓储官粮百余万石，实力大增。朱棣率燕军南下，在济南城下再败李景隆。济南在山东布政使铁铉和都督盛庸的死守下得以保住。朱棣围攻济南三月未下，恐粮道被断，遂回撤北平，铁铉、盛庸率军追击，收复德州。南军兵势大振。建文帝即擢升铁铉为兵部尚书，赞理大将军军务，以盛庸代李景隆为平燕大将军，率大军再次北伐。

九月，盛庸、铁铉统领南军驻德州，徐凯屯兵沧州为犄角。同年冬天，燕兵袭沧州，擒徐凯，所得辎重，悉数解运直沽舟中，送达北平。随后沿运河绕过德州南攻，鲁西州县城均为燕兵攻取。盛庸、铁铉率南军移驻东昌（今山东聊城）驻守，杀牛宴犒将士，激励斗志，背城列阵，并排着火器毒弩，专待燕军到来。此时燕军仗着屡胜的威风，骄横麻痹，一见南军，即鼓噪杀入，结果被南军重重包围。燕军怎禁得火器迭发，继以毒弩，不是糜烂，就是惨毙。燕王见前队将士多半受伤，竟亲率精骑，冒险冲入南军。盛庸见燕王亲至，故意分开两翼，任燕王杀入，待燕王冲入中坚，复纠兵包围。燕王才知中计，慌忙夺路，左驰右突，好似铜墙铁壁一般，无从得脱。燕将朱能、周长等见燕王被困，急率番骑驰救，突入围中，奋力死斗，才杀开一条血路，护翼燕王突围。大将张玉被南军一阵乱箭，射于马下，死于阵中。南军乘胜擒斩万余人，燕兵大败，于是疾驰北平，盛庸率兵追击。燕王独以百骑逃还北平，燕军精锐丧失几尽，盛庸军势大振。燕军经此败，以后再南下，皆由徐沛，不再走山东。

建文三年（1401），是南北之战进入最残酷、最艰难的一年。先是南军盛庸、平安分兵驻德州、真定，断了燕军粮道，燕王决计再度南下。三月，盛庸合兵 20 万与燕兵战于夹河、齐眉山等地，盛庸大败，损失数万人后退回德州。不久，燕军在攻破平安后，再次攻掠顺德、广平、大名，并驻扎于大名，河北郡县望风而降。六月，燕军瞒过南军到达沛县，放火焚烧南军粮船数万艘，粮食数百万石，京师大震，德州陷入窘境。至此，燕军靖难已有两年多。虽然屡战屡胜，但因兵力不足，无法巩固并扩张胜利，不得不放弃新取之地；仅能据有北平、保定、永平三个府。这年冬天，南京有宦官因犯错被处罚，逃到朱棣处，告知南京守备空虚。燕王闻之一振，复于同年十二月再次举兵南下，乘间疾进，逾城不取，直趋京师金陵。

建文四年（1402）春，燕军在先后击败德州和平安的南军后，由馆陶渡河，沿运河顺流南下，接连攻陷东阿、东平、汶上、兖州，进占邹、沛二县，徐、宿二州。南将平安率马步兵 4 万进击燕军，燕王设伏军于淝河，南军大败，自此一蹶不振。燕军乘胜进军，击败驻守淮南的盛庸军，直渡淮河，连克盱眙、扬州、高邮、通、泰、仪真诸城，设大营于高资港，并集舟以备渡江。“仪真既破，北舟往来江上，旗鼓蔽天。京师闻北兵渐近，益危俱”^①。

^①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一六。

朝中大臣为自全计，纷纷出走，都城空虚。建文帝遣庆成郡主至燕王军中，许割地以和，燕王置之不理。同年六月，燕王率大军一举突破长江天险。瓜洲江面，盛庸以海船迎战，也未能扭转战局。燕王攻占镇江后，迅速向京师南京进军，至金川门，谷王穗、李景隆等开门投降，都城陷落。朝廷文武官员俱降，建文帝遂举火自焚。朱棣以胜利者身份进入南京城，即皇帝位。诏令本年“以洪武三十五年为纪，明年为永乐元年”，史称成祖，又称永乐皇帝。开始了长达 21 年的明成祖（即太宗）统治时期。

靖难之役虽系明朝统治者的政治斗争，但对当时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所造成的灾难和损失是难以言述的。德州运河区域地当南北交通要冲，是南北双方激烈争夺的焦点和主要战场，故遭受灾难损失尤为惨重。这场战争长达三年零十一个月，德州因其战略咽喉地位，而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受害最重，原先安定和平的社会秩序再次陷入动荡不安的混乱之中。对此，永乐初年，成祖诏令给德州等被兵之地农器，并免徭役三年，以恢复社会生产。

三、明清德州“靴子城”

明洪武七年（1374），“德陵互易”，德州（原陵州）土城已破败不堪。洪武二十八年（1395）德州大水，城垣毁坏严重。“洪武三十年，都督张文杰、卫指挥徐福建砖城。于城南开窑烧砖。”改建后的德州砖城内实夯土，外砌青砖，城高 3 丈 7 尺，厚 3 丈。外周长 10 里 180 步，内周长 9 里 13 步，城内占地 3721 亩，城墙压地 963 亩。护城河深 2 丈，宽 5 丈。城门有 5：东门曰长乐门，正西门（即大西门）曰聚秀门（本名定边，万历四十年改），偏西门（即小西门）曰广川门，南门曰朝阳门，北门曰拱极门。因形似官靴，亦称“靴子城”。德州因水成“州”，因“州”而“城”，由“城”到“市”，所以德州也叫“州城”、“州都”。

正德五年（1510），刘六、刘七等人在河北霸州起义。德州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而成为农民军的重要目标。为防起义军，保护德州这一明统治者的粮食供应基地，知州宁河、守备桂勇在命妇女居城内的同时，绕东关铁佛寺，南至玉皇阁，西连御河堤筑外罗城，广袤 20 余里。

万历四十年（1612），知州孙森动用 5 万银锭，用了 3 年的时间，重修德州城，将城池修葺一新，并于城东南角城墙上建雁塔一座，在城西墙上建振河阁一座，同时在城上建敌楼、戍舍。

清乾隆八年（1743），动用国库黄金 14 万两重修州城，修葺了城墙、护城河等，并增修门楼、桥谯楼、瓮城各 4 座，敌楼 2 座。光绪元年（1875），山东布政使李元华拨 3 万余金，委托知州张锡纶修城。因资金不足，只修了东城垣，而南、北、西三面未修，城垣破败不堪。

明清德州“靴子城”衙署众多，主要有：

（1）知州署。知州署是一州地方最高官府，也称州衙。元时称陵州署，在御河西岸，知州秦政建。明永乐九年（1411），知州何原利用旧料，由城西移建于城东南隅、南门内偏东繁华之处（今德州一中南）。知州署内设有知州大堂、吏目署、监狱；州署大堂之东依次为州同署、安德马驿、州马号；大堂之西为管粮州判署；其南为管河州判署。

明代设知州、同知、学正、吏目各 1 人，判官 2 人，训导 3 人，安德马驿、安德水驿、良店水驿、梁家庄水驿驿丞各 1 人，递运所、本州仓正副、常丰仓、税课局大使以及阴阳学典术、医学典科、僧正司僧正、道正司道正各 1 人。清代设知州、管河州同、州判、学正、吏目各 1 人，训导 2 人，安德马驿、安德水驿、良店水驿、梁家庄水驿驿丞各 1 人，税课局大使 1 人。

明清时期，还有一些朝廷和省级驻德机构。如：山东布政使分司署、山东按察分司署、太仆寺分司署、都察院分司署等。太仆分司署在南关外旧马神庙，都察院分司署亦叫检察行宫，北察院在永庆寺以东，西察院在城隍庙以西。

由于明朝布政司、按察司辖区大、权力重，于是从永乐年间开始，由布政司的佐官——左右参政、参议各分理一些府州县的钱粮，称为分守道；由按察司的副使、僉事各管理一些府州县的刑狱，称为分巡道。此外，还有督粮、兵备、驿传等道。各道主官统称道员、道台、观察。明清两代，设于德州的道台先后有武德道、武定道分司、济东道、督粮道等。

(2) 武德道署。明清德州武德道实则是兵备道，因管辖武定州和德州而得名。明正德七年（1512）山东布政司、按察司在德州设武德道，以防御刘六、刘七起义军。武德道署设于德州大西门内南侧，以按察司僉事任道台。刘六、刘七起义被镇压后，武德道却没有撤销。崇祯五年（1633）武德道移驻德州城隍庙西。康熙九年（1670），武德道改为济东道。七年后（1679）济东道移驻济南。

(3) 户部监督分司署。户部监督分司是户部驻德州、掌管漕粮仓务的官署负责征收、储运山东、河南两省漕粮。明永乐十三年（1415）建于德州城北水次仓处，长官由户部主事、员外或郎中担任。一年一换，称为“监督”，亦称“部使”。正统十四年（1449）户部监督分司移至城内东南角；天顺五年（1461）改为户部管仓分司署。清康熙四年（1665）户部管仓分司被裁撤。

(4) 济南府兑粮公馆署。济南府兑粮公馆署在德州城北北厂街。明永乐十三年（1415），明朝户部在德州置水次仓及户部监督分司署，济南府因此也在德州建立了济南府兑粮公馆，就地征集所属各州县漕粮交户部监督分司入德州水次仓。

(5) 莱州府通判署。莱州府通判署在德州城内东南隅。通判是明清府级设立的重要官员，位列知府、同知之下，与府同知分掌粮盐，督捕、河工、水利等事务。德州所置莱州府通判署，已超出府级范围，属特别任命，职管德州水次仓，除征管事务外，主要负责押运漕粮。清代卫所军丁输送漕粮必须由押运官随船督押监运，以约束运军，防止失窃、失火以及停滞等，押运官由莱州府通判担任。康熙年间被山东督粮道署取代。

(6) 山东督粮道署。山东督粮道署又称“粮道”，是清代掌管督理粮税、监收漕粮以及督押等事务的官署。康熙十八年（1679）设立，驻原莱州通判署，掌管监收山东有漕粮任务的府州县的漕粮或银两，存于督粮道库，交付漕运或暂贮。乾隆二十四年（1759）原临清仓归并德州仓，故督粮道库又称“临德仓”。光绪三十四年（1908）督粮道被裁撤。

(7) 漕运公馆署。明正德十年(1515)建于德州城西北。明清两代,德州漕运一直由德州卫军来承担,运送漕粮兼搭运商货,漕运公馆即德州卫军办理漕运事务的一个机构。

(8) 户部监兑分司署。明朝户部设于德州、运送赋粮的机构。明初漕运时,官府令交粮民户运至德州仓交军运,“陆输者民也,而理之在守令;舟运者军也,而统之在卫所,势相轧而心相违,于是纷争之患起矣。”^①为此,明初户部在今德州北厂设户部监兑分司署。正统十四年(1449)移于城内。户部监兑分司长官为户部主事,称为“监兑”,亦称“部使”。万历年间(1571—1615),户部监兑分司被裁撤。

(9) 德州守御千户所。明初德州驻军。明代在各军事要地均设卫所,约1120名官兵为一所,长官称“千户”,正五品。洪武九年(1376)撤守御千户所,改设德州卫。

(10) 德州卫与德州左卫。德州卫设立于明洪武九年(1376),统领左、右、中、前、后、中左6个千户所,约6740人。其长官为指挥使,正三品,属官有指挥同知(从三品)、指挥僉事(正四品)、镇抚(掌刑名)、知事(掌出纳文移)及千户、百户等。德州左卫设立于明永乐五年(1407),其规模、职秩均同于德州卫,统领左、右、中、前、后、中左6个千户所,约6740人。

明代,设立德州二卫的目的,一是为了驻防,二是为了屯田。屯田军士与驻防军士定期轮换。士兵遇有战事则集中,没有战事则屯田。军士一般都携带家属,称为军户,世代相袭,不得改籍。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德州左卫被裁撤,归并德州卫,称为德左二卫;光绪二十八年(1902)德左二卫被裁撤,二卫的土地、人员即转归德州管理。

(11) 守备署。明代,一方面在各地设卫所防卫屯田,与省都司、京师五军都督府构成归属体系,另一方面,五军都督府又向军事要地派出镇守一方的武臣,称为“镇守”。德州守备署在德州城西北。永乐年间,驻德州的“镇守”一般为都督府副长官,从一品。万历年间,守备署改为参将署。

(12) 德州营署。天启元年(1621),朝廷准德州设兵2000名,建德州营。分左、右二营,左营由参将统率,右营由游击统领。天启三年(1623)裁右营。崇祯六年(1633)德州营裁减兵额至1000名。清沿明制,光绪二十八年(1902),德州营被裁撤。

(13) 游击署。明隆庆元年(1567),在德州古城二郎庙西,选义勇武生分为两营,游击领一营,都司领一营。一驻济南,一驻德州,如德州一营调赴他处,则济南一营移驻德州,以备应援。

(14) 城守尉署。清顺治二年(1645),德州城始有满洲驻防兵,习称“满洲营”。设有城守尉署,驻城内文庙以东、东门里一带。城守尉是八旗兵防守专城的将领,正三品,总掌一城旗籍和城防事务,属官有防御、骁骑校、章京、笔帖式等。清顺治初年,德州驻防旗兵有300余名,雍正二年(1724)增兵160名,乾隆五十一年(1786),再增50名,至嘉庆十一年(1806),驻防德州城的满洲营官兵及其眷属共计2700人。八旗兵驻德州之初,属京都

^① 潘友林《德州旧志九种校注》下卷《总注释五》,德州市文化广播新闻出版局2010年版。

统辖，雍正九年（1731）归青州都统管辖。民国初年，八旗兵陆续裁撤，1926年全部被裁撤。

（15）德州营。德州营专指清代驻防德州的绿营兵。清顺治元年（1644），清军入关后，德州即有绿营兵驻防，名为“德州营”或“绿营”，驻小西门内。德州营初受临清镇守管辖，顺治十七年（1660）改隶登州镇守，雍正元年（1723）又改隶兖州镇守。德州营统率长官为参将，其下有中军守备、千总、把总等。德州营有马步甲兵共600名，半战半守，战者多随时应调出征，守者则为守护德州城，并先后派驻守陵县、德平、临邑、济阳、商河、济东等县城。光绪十三年（1887），尚存参将以下官员23员，马步兵414名，分防德州、四女寺、陵县、德平、临邑、恩县之河汛。

除以上衙署外，在德州城厢及其附近计有几十个各类大小的衙署和众多的官吏。因德州为“神京门户”和“九达天衢”，是京官出巡、外官进京必经之地，州、县等地方官要占用很多的精力和时间，周旋于驻德衙署和官员之间，迎来送往异常频繁，故明清时期德州有“七十二衙门”之称，在此不一一列举。

明清德州“靴子城”城中官宦富商云集，造园风尚经久不衰，是名副其实的园林之城，澄碧园、濯锦园、见可园、尊水园、罗朴园等就是其中的代表。

澄碧园又名清碧园，坐落于州城东南隅（今德州广电中心东侧），占地四亩多，是明户部监兑分司署、清督粮道署官员们公余游憩之所。康熙《德州志》载：“分司东偏，园亭林木颇胜，中一池，名化龙池。”民国《德县志》载：“户部主事桐城阮自华咏繁露堂诗，当年胜景概可想见。”^①该园呈狭长形，南北长而东西较窄，曲折得宜，别具一格。主体建筑——澄碧堂与老槐、垂柳、松柏、翠竹相间分布，清幽而旖旎。夏日荷香阵阵，凉风习习，秋日百花盛开，金风飘香。清代诗人张庆浩有“阴阴乔木森千章，野花杂蒨纷幽香。园中首辟澄心堂，空庭积翠生清凉”的诗句。堂前荷花池，俗称“化龙池”，夕阳中观池水雁塔之倒影，乃德州当时一大胜景。池中有一四面环水、古朴典雅的亭阁，名曰“伊亭”。由澄心堂到伊亭的红桥三折，极尽空间转换之胜，可扁舟观鱼跃，可小桥踟蹰闻蝉声之鸣，或垂钓消夏，或静观秋色。“化龙池”北岸不远即是“繁露堂”，清幽雅静，古色古香。东西厢房南山连接花墙一道，墙中一月亮门，门楣上镶嵌着清嘉庆年间钱咏所书隶书“平津馆”三字，东有督粮道孙星衍撰馆记，其刊行闻名于世的《平津馆丛书》即在此完成。

濯锦园又叫程氏北园，建于明代，坐落于州城北廓，为明工部尚书程绍的花园，规模较大，气势宏伟。园门口有木石结构牌坊一座，名曰“启秀坊”；入园后依次是咏俊亭，为重檐八角亭；聆燕堂，为砖木结构的三楹厅堂，是当年主人师课二子、读书会客、饮酒吟诗的地方。厅内上悬“研洁笔精”横额，为明太仆卿邢侗所书。园内土阜起伏，羣石为山，峰峦洞壑，逆绕奇胜。园中亭、榭、曲桥、水面四布，富有江南园林特色。园后的假山，路绕峰回，飞梁高台，乔木映衬，构思丰富，实有巧夺天工之妙，堪称德州造园史上经典之作。

^① 康熙《德州志》卷二《建置》；民国《德县志》卷四《輿地志》。

尊水园建于明崇祯年间，坐落于今德城区新湖街道办事处吕家街，为明清德州卢家别墅居宅，第宅壮丽，高耸云汉，楼台高峻，庭院清幽。宅内园林凿池引水，叠石为山，极尽精巧，名曰“尊水园”。园内筑有“杜亭”，“画扇斋、匿峰庵、涪轩，十余间茅屋耳。堆书数千卷，塞破户外，几案排连，笔研置数处，蜡泪纵横。”^①园主卢世澂曾在此写下了《营杜亭成述怀》的诗句：“年来谢客户常扁，特向空园起杜亭。辟地诛茅安简朴，写真设坐表遗型。五衰还作千秋梦，世远惟凭一念惺。”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卢氏后裔将这所古老的宅院赠与户部侍郎田雯，田雯将其略事修缮，当年即移居于此，易名“山姜书屋”，并写下了“草屋三间子美亭，先生醉卧不曾醒。空园竹柏多摇落，九点齐山未了青”的诗句。康熙四十一年（1702）十月，皇帝南巡途径德州，驻跸于此，并亲书“寒绿堂”匾额。

见可园坐落于今德城区新湖街道办事处联云街东部，为德州名门李氏的居宅。清顺治五年（1648），经李源修缮扩建，成为德州名胜园林之一。该园座北朝南，占地约十亩。建有“四清馆”一处，作为招待亲朋好友、来访游客休息之所，门楣上悬“青未了”三字，为清顺治三年（1646）状元傅以渐所书。园内苍松古柏，老槐翠柳，绿荫蔽日，景色蔚然。园内外有六十六棵古老的松柏摩天抚地、气质壮观：“一松当门老龙种，一松秃尾穿晴空。前者两松夹石峙，拄笏痴立双南宫。屋后一松尤怪绝，偏袒左臂撑拳雄。在庭者四隅者一，意气各欲相凭陵。或如冠剑列朝仗，或如孤鹤蹇苍穹。其余大小五十六，儿孙累累罗屏风”^②。康熙末年，李源之孙李庭灿将其曾祖李诚明在今德州经济开发区抬头寺乡文庄村“拙政园”内所建“矩亭”移筑于“四清馆”前，植树、种竹、艺花，朝夕觞咏其中。清代诗人陈志来德州，写下了《见可园赠李东村》：“德州数名胜，首屈见可园。园不过十亩，地僻能避喧。有亭颜曰矩，作者深意存。曾孙克仰肖，移立堂前轩。抚松六十六，高节绝击援。凌霄引松端，孤蹇善托根。揖石合呼丈，辟池鉴潺湲。再传守清白，独立见东村。兀然具傲骨，粹然即之温。步趋念先德，言行清可敦。践迹守遗矩，世世永弗谖。”

罗朴园坐落于州城西隅，今新湖街道办事处新兴街处，为明崇祯监察御史罗国士的别墅花园。罗国士，字尚友，号巛瞻，明崇祯十年（1637）进士，曾任河北固安、河南安阳知县、礼部主事、陕西道监察御史，卸任后营室筑圃于此。清代罗氏后裔罗以深，字渊碧，号朴园，少慧而学，不求仕进，对此园加以修葺，台榭花竹，疏落有致，并榜其门曰“朴园”。此园占地数十亩，门东向，以水池为中心，景点皆环池构建，参差错落，自然呼应，苍茂古朴。门垣不甚峻而曲，流水不甚激而清，土山不甚耸而旷，林木不甚繁而古，亭榭不甚侈而韵。富有江南园林特色，具有浓厚的山野韵味。全园由南向北分五个景区。入口处为第一区，以一座三进院落的精舍为主，名曰“有竹”，昔有门联“专意缥缈，左太冲宜春之里；自栽草木，罗尚友永乐所居。”“有竹”东南有堂叫“酒天”，供宾朋、好友宴会、聚集之用，饶有特色，为第二区。由“酒天”向东为第三区，有建筑叫“松雨楼”，也称“问月”，听松则幽，酌月则畅。前为菊圃，后临池水，有老柳数珠。涧溪曲折，湖旁筑假山一座，峻秀多姿。向

① 田雯《古欢堂集》卷三十三。

② 民国《德县志》卷十六《艺文志》。

东有土假山一座，平岗底坡，有松柏数株，古朴盎然。另有二亭一轩，方亭叫“印濂亭”，圆亭叫“戴墨亭”，轩叫“槐荫清”。第四区是全园中心，以水景取胜，池上筑有七曲木桥，波光桥影，如诗如画。第五区有构筑精致的石砌柳桥，西北“松雨楼”是罗氏藏书处，楼有对联曰：“辟艺苑文林，可称三径；擅春华秋实，无添百城。”

另外，较为出名的宅第园林还有：位于城内的涓园、南门东的偶园、西门内的止园、城东南的拙政园、瓜隐园等。私人园林的大量兴造，客观上改善和美化了德州城市环境，增强了市民对所处城市的文化情感。

明清时期，德州“靴子城”的另一大特色是城内街巷路口遍布着大量的“功德”、“贞洁道德”、“家族”、“标志”牌坊。仅民国《德县志》中记载有地点、有名称的牌坊就达56座。如：九达天衢坊、擢英启秀坊、一门双节坊、军国重寄坊、三世完节坊、怀清摩汉坊、李家节孝坊、李家贞节坊、赵家节孝坊、司计转漕坊、持筹积贮坊、燕南都会坊、齐鲁屏藩坊、历朝进士坊、恩纶世锡坊、宋家贞节坊、瞻礼如在坊、北四牌坊、金榜题名坊、内台秉宪坊、少司马坊、谏议坊、翰林坊、都宪坊、亚卿坊、父子传芳坊、祖孙接武坊、青琐纳言坊、兄弟联芳坊、两朝忠义坊、恩纶洵锡坊、永介寿祺坊、涪宠渥坊、东连齐鲁坊、西通漕运坊、南接藩省坊、北拱京畿坊、孝子坊（两座）、孝行坊、两世完节坊、姜家贞节坊、党家贞节坊、任家贞节坊、忠孝两全坊、蟾宫坊、进士坊、大中丞坊、世科坊、进士第坊、冰操玉洁坊、电察坊、鉴照坊、启秀坊，等等。这些牌坊，不仅具有北方粗犷刚毅的气派，而且也融进了南方细腻繁缛的品味，体现了德州在延续中原文化的同时，又大胆吸收外来文化。

明朝规定，凡是进入国子监读书和获得举人以上功名的人，经地方官府审核批准，可由官方出资建功名坊。至于功德、贞节、孝子等牌坊，则须经当地官府逐级呈报，最后由皇帝审查恩准，或直接封赠，方可建造。德州牌坊，均为四柱三门重檐木石建造，每座牌坊的正门分别刻有不同的碑文。上下、左右两侧也分别刻有善长芳名、立坊年代以及阐述牌坊的典故和传说。明代，德州除建在大西门外古驿道上的“九达天衢坊”外，以通衢十字路口的四柱三门木石牌坊最为著名，东曰“东连齐鲁”，西曰“西通漕运”，南曰“南接藩省”，北曰“北拱京畿”，是德州重要地理位置的高度概括。

无论是哪一种牌坊，在修造、文笔、雕刻等方面都极其讲究。立坊者对牌坊的“高”、“精”、“理”尤为注重。“高”是指牌坊要有气势，要有高大挺拔之感；“精”是指雕刻工艺精致、用料独特讲究；“理”是指牌坊上所刻文字、图案要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生活哲理。斗拱、雀替、花版、垂柱等各个部件要做到设置巧妙，衔接精密。以阴刻、线刻、浮雕、镂雕、双面雕等不同雕刻手法，刻出龙凤、花卉、飞禽、瑞兽、人物等，蕴含不同的象征意义。如明嘉靖年间户部郎中张子顺、户部主事陈志、布政使司李逢时、御史王楠所建的“北四牌坊”，鲤鱼腾浪和鹿的雕刻彩绘图案，象征着科举及第、金榜题名和升官晋爵、高官厚禄。明嘉靖年间工部侍郎程讷所建的“永介寿祺”、“涪锡宠渥”二坊以及程氏濯锦园门内的“启秀坊”，雕绘图案用水塘、鱼、荷莲以及五只蝙蝠组成，象征着连（莲）年有余（鱼）、金玉

（鱼）满堂和健康、长寿、平安、富裕、子孙满堂。

明清德州牌坊除了图案、花纹，牌坊上的雕刻还有文辞，即“坊眼”。从某种意义上讲，文辞的题刻比图案、花纹的雕刻更为重要。牌坊上题刻的文辞，其一称为“题”，为该牌坊名称；其二称为“注”，用以具体说明牌坊是为谁建的、为什么事建的、由谁建的和什么时候建的等内容。如坐落在河西李家庄的节孝坊，是清乾隆十八年（1753）为表彰李文明妻段氏而建；位于河西五里庄的贞节坊，是乾隆五十二年（1787）为表彰李元贵之妻吴氏而建。作为画龙点睛的“坊眼”，牌坊上题刻的文字在文辞上都颇为讲究，一般都是精心之作，富有文采，蕴涵深刻，具有很高的书法价值，有的还出自帝皇御笔和著名文人之手，颇为珍贵。这些文字，都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人们的人生理念及封建礼教、传统道德观念的集中表现。

德州牌坊不仅建筑结构自成一格，别具风采，而且集雕刻、绘画、匾联文辞和书法等多种艺术于一身，熔古人的社会生活理念、封建礼教、封建传统道德观念、古代的民风民俗于一炉，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很高的审美价值和丰富而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

九达天衢牌坊，坐落在旧州城聚秀门（俗称大西门）外古驿道上（今米市街），建于明嘉靖年间。是一座横跨南北驿道、坐北向南的骑街牌坊。高约8米，面宽约10米，4柱3孔，南北向，为木石结构。牌坊上部木斗拱和挑檐撑起的黄琉璃瓦盖顶映衬着朱红色的柱子，金碧辉煌，鲜艳夺目，显得十分壮观。下部为南北向4条青石基础，4根木质圆柱插入基石。在4根圆立柱两侧，各有对称的斜顶柱1根，每根斜顶柱的柱脚下各有一造型奇特的顶柱石兽。中跨横楣上有“九达天衢”四字，相传为明嘉靖年间太子太师严嵩所书。石兽伏卧，头向一侧仰望，脊后生出尾巴。因其头部似虎，故有人称其为石虎，又因其状似青蛙，民间俗称为石蛤蟆。更奇特的是8根斜顶柱只有7个石兽，东南角上的1只却趴在大路下的池塘边上。

明清两代的运河，从明永乐到清代道光，经历四百多年，应该说这是它的黄金时代。在这期间，“九达天衢”牌坊矗立在运河东岸的官道上，以显示德州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重要地位。到了清咸丰五年（1855），黄河改由今道入海，漕粮改为海运，经由运河北上的只余一小部分。光绪二十七年（1901），漕运停止，临清南段运河淤为平地。自此德州运河的商运船只，只能南至新乡，北至天津。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时曾对此坊加以重修。重修后，牌坊造型美观，雕工精细，彩绘富丽，重现了明代建筑的特点。“九达天衢”四字则由时任袁世凯的下属朱启铃（古建筑学家、工艺美术家，后曾于1913年代理国务总理）所书。后因漕运停止，铁路修通，运河已无复当年的盛况，它寂寞地树立在野草丛生的古驿道上，直到德州解放前被拆除。

四、宋礼治河与卫运河的畅通

宋礼（1358-1422），字大本，河南永宁（今河南洛宁）人。自幼聪颖悟知，好学有志，精于河渠水利之学。洪武年间，以明经出身入国子监学习。因才能出众，被选拔任山西按察司僉事。后因故降职为户部主事。建文初年，被推荐任陕西按察僉事，因事被降为刑部员外

郎。朱棣即位后，命其管理礼部，因办事干练升为礼部侍郎。永乐二年（1404）拜工部尚书，直到永乐二十年（1422）去世。宋礼自担任工部尚书后，多次主持治水工程。其中最著名的是开浚会通河。会通河开于元至元十三年至二十六年（1276—1289）。当时称济州（今山东济宁）到须城（今山东东平）安山镇一段为济州河，安山到临清一段为会通河，明代则总称为会通河。它沟通汶、泗与卫河，使南方粮食可以直接水运到通州（今北京通县）。到至元二十九年（1292）又开成通惠河，从杭州到北京的京杭大运河才全线开通。会通河开成后，由于水源不足，运道始终不畅，所以元代粮食主要以海运为主。明初输饷辽东、北平，也是专用海运。洪武二十四年（1391），黄河在原武（今河南郑州北30公里黄河北岸）决口，会通河安山以北的运河河道淤塞。永乐初年，漕粮输运同元代前期一样，实行海运、水运、陆运结合。但海运损失很大，河运则由淮河、黄河到河南阳武，陆运 85公里，再装船由卫河北上，民夫困苦不堪。于是，济宁同知潘叔正于永乐九年（1411）上疏请重开会通河。宋礼和刑部侍郎金纯、都督周长受命前往。由于宋礼等人治理措施得力。加之十余万民工的勤劳劳作，疏浚工程终于历“二十旬而工成”^①。

永乐十年（1412），御史许堪进言卫河水患，成祖再命宋礼前往治理。这年夏天，吴桥、东光、兴济、交河至天津一线雨水很大，卫河（即南运河）多处决口，灾情严重。为防水患，宋礼经对四女寺东至九龙口的老黄河故道地形勘察后，认为自四女寺到老黄河故道仅6公里，其中2.5公里旧有沟渠，2.5公里系古路，1公里系平地，因此开挖也不困难。于是，于同年秋后开始挑挖四女寺减河，确保漕运的畅通。开挖后的四女寺减河全长228.5公里，东北流经宁津、乐陵、庆云、无棣，自大沽河口入海。四女寺减河的下段大致利用了当时的旧黄河（即鬲津河），而减河上口则有一个变化的过程。早在明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尚书宋礼就曾建议：整个卫河两岸地势低洼，若不纵观全河，分析上下游形势，只是一味地筑堤防洪，恐怕劳而无功，还要溃决。应当在德州城西北开一小渠，将运河洪水泄入老黄河，然后入海。这是在南运河上开挖减河，分减运河洪水较早的论述。

会通河的开通和对德州段卫河的疏浚，较之元代初创，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这主要体现在：一是实现了对会通河和卫河的全线疏浚。不仅使运道重新畅通，而且还得以加深。当时“河道深则蓄水”，而“其深三丈”^②，这就使会通河与卫河漕运得以重新连通。为确保河道的畅通不淤，宋礼规定了“每年小挑，间年大挑”的制度，对运河定期挖泥清淤，保证了漕运长期顺利进行，避免了繁重的陆路运输。二是宋礼在疏浚河道的同时，还完成了元朝所未解决的一系列水量调节工程。其一，引汶济运，增加漕河水量。以汶、泗为源，设置天井闸（即元时会源闸）以分其流，分流后，此水南流者由昔日泗水故道进入江苏，与淮河贯通；北流者通过新开河（济宁至安山段运河），取道东昌（今山东聊城）而达临清与德州相连，以保障运河水源。其二，修建水闸，调节漕河水量，以便舟楫过往，保证了南北漕运的

① 《明史》卷一五三《宋礼传》。

② [清]陆耀《山东运河备览》卷四，乾隆四十年刊本。

顺利进行。其三，修筑水柜、水壑，以备不时之需，确保漕河的水量稳定^①。此外，宋礼等又掘济宁、兖州、青州三府七十二泉，顺水性导入各湖存蓄，随时准备弥补漕水的不足。

宋礼治理会通河与卫河德州段，是运河史上的一件大事，不仅重新疏通了河道，而且还对运河进行了综合治理。经过此番整治，运河的运营状况大为改观，从徐州至临清，再从临清经德州达京津，满载的漕船可以顺利通过。由于漕河运输满载的漕船可以顺利通过，漕运“大便利，漕粟益多”，所以到永乐十三年（1380），明廷“罢海运”而专任漕运^②，大运河终于恢复了昔日运输繁忙的盛况。

宋礼去世后，朝廷追念宋礼治河功德，在南旺运河分水口附近建宋公祠，供乡人岁时奉祀。万历元年（1573），朝廷追封宋礼为“开河之勋太子太保”，赐谥号“康惠公”，恩准宋礼故乡永宁县建乡贤祠。清雍正四年（1726），封宋礼为“宁漕公”；光绪五年（1879）赐封宋礼为“显应大王”徽号，故宋公祠又称“宋大王庙”。

五、德州与康熙、乾隆南巡

康乾时期，民殷而国富，天下大治，史称“康乾盛世”。康熙、乾隆二帝，多次巡幸江南，考察各地山川地理，了解民俗民情，游览名胜古迹。由于德州地处进京的咽喉要路，康熙、乾隆南巡，都要经过德州，并多次在此驻蹕。

自康熙二十三年（1684）至康熙四十六年（1707），康熙帝六次南巡，来回都经过德州。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九月，开始了第一次南巡。十月初五到达德州，驻蹕德州南关。当天，召见了前来迎驾的山东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登州总兵等文武官员。看到德州市井兴旺，非常高兴，即兴写下了《次德州即事》诗一首：“近郭人烟集，遥天月上初。析寒添夜漏，不寐但看书。”简练质朴的几句诗，展现了一位不辞寒苦、勤政为民的贤君形象。第二天，康熙一行便离德南下，当晚驻蹕平原七里铺、第三天驻蹕禹城二十里铺。然后继续南行。登泰山、祭孔林，下南京，亲祭明孝陵。返回时，于十一月廿三驻蹕德州西关。第二天启程返京。

康熙二十八年（1689）正月，开始了第二次南巡，正月十三驻蹕德州。当日，召见了前来迎驾的衍圣公孔毓圻、山东巡抚钱瑛等主要官员。第二天驻蹕平原，看到山东农业歉收，令山东巡抚钱瑛即日发布文告，减免地丁钱粮，以示“皇恩浩荡”。第三天驻蹕齐河县晏城村，百姓扶老携幼，夹道跪迎。三月从江南返回的时候，御舟虽经过德州，但没有停泊。

康熙三十八年（1699）进行了第三次南巡，虽经过德州，但没有停泊。康熙再次驻蹕德州，是在康熙四十一年（1702）。这年九月，康熙携太子胤礽、皇四子胤禛、皇十三子胤祥等南下，准备巡视黄河工地。十月初四驻蹕德州。皇太子胤礽突患急症，不得不停止南下，在德州住了下来。康熙一面令太医诊治，一面急召大学士索额图（太子胤礽的外公）来德州侍奉太子。给太子治病期间，康熙利用闲暇时间与随行众臣共赏书法，撰写字联。十月七日，“传旨田雯素能诗著，即进览”，在御览田雯恭呈的“旧刊《山薑诗选》、《长河志籍考》、《黔书》”

①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四。

② 《明史》卷一五三《宋礼传》。

后言：“田雯居官无过失，向未曾赐有匾额”，并亲书“寒绿堂”三字赐之^①。十月十三日，康熙率皇子及侍卫到德州满州驻防营的教军场比试箭法。康熙拈弓搭箭，连发五箭，都命中靶心。十月廿一，太子的病有明显好转后，康熙帝这才起驾回京。这次南巡也因太子之病而取消。

康熙四十二年（1703）正月，进行第四次南巡。正月廿一到达德州。驻蹕德州城外教场。次日驻蹕禹城黎济寨，第三天，驻蹕齐河邱家岸。这次南巡，康熙一行在德州境内前后三天，然后南下。返回时，御舟没有在德州停泊。

康熙四十四年（1705）二月，开始了第五次南巡。二月廿二，进入州境。虽没有在德州停泊，但入境后，地方官为获“恩宠”，率数十万百姓在运河左岸跪迎御舟，绵延十余里。

康熙四十六年（1707）正月，开始了第六次南巡，二月初一到达德州，驻蹕德州第六屯。百姓跪迎圣驾，为减免赋税，“山呼万岁，叩谢皇恩”。康熙有感而发，写下一首题为《德州》的五言诗：“长河绝流渐，晓坐寒仍肃。若使居深宫，安知有冷燠！”表达了康熙帝关注民生的仁政思想。五月十五从江南返回时，再次停泊。这是康熙最后一次在德州驻蹕。

康熙南巡，来回共7次驻蹕德州。乾隆帝即位后，效仿康熙，数次出巡。据《乾隆实录》记载，乾隆帝先后六次南巡江南，五次东巡泰山、曲阜，来回共20次驻蹕德州。

乾隆十三年（1748）二月初，乾隆帝携皇太后、皇后东巡泰山，二月十五，驻蹕德州七里庄。由于直隶、山东连年旱灾。乾隆有感而发，写下了《旋蹕过德州》一诗，其中有“哀此齐鲁民，何独连歉丁”的诗句，反映了乾隆帝对民生的体恤。同时，下旨赈济灾民，蠲免钱粮。同年三月启程返京。三月十一行至德州，乾隆一行弃轿登舟，准备乘船沿运河回京。当晚，随行的皇后富察氏突然死在船中。

关于皇后的死因，正史中没有专门记载，《乾隆实录》也只记了这么一句：“驾至德州登舟。亥刻，皇后崩。”这里只有两点信息，第一，皇后死的地点是停泊在德州的船上。第二，皇后死的时间是晚上亥时，即相当于现在晚上十点左右。至于死因，没有记载，很可能有难言之隐，故意回避。但民间传说五花八门，最流行的说法是：当晚，乾隆皇帝兴致大发，在御舟上欢宴玩乐，富察皇后出来劝阻，乾隆非但不听，还醉醺醺地当众打了皇后。皇后富察氏出身于镶黄旗贵族世家，知书达礼，恭俭贤惠，16岁就嫁与弘历，二人本是结发夫妻，感情甚好。但富察皇后是个烈性子，作为母仪天下的一国皇后，当众被打，羞愧难当，一头扎进了冰冷的运河中。众人一见，惊慌失措，乾隆一惊，酒也醒了，赶紧命护卫随从救人。当皇后被七手八脚打捞上来后，早已断气。乾隆悔恨交加，悲痛万分。第二天，亲自扶柩回京，追封富察皇后为孝贤纯皇后。之后四十多年的时间里，乾隆念念不忘，写诗作赋，寄托哀思。

乾隆二十一年（1756）二月，乾隆一行东巡祭孔。二月廿四，驻蹕德州大营。宣布山东大赦，减免当年赋税，赏赐78岁以上的老人，以示“皇恩浩荡”。同年三月，祭孔回銮，三月

^① [清]田雯《蒙斋年谱》，康熙五十五年刊本。

十二，再次驻蹕德州，第二天起驾回京。

乾隆二十二年(1757)正月，开始南巡。正月十九，到达德州。因为德州是皇帝南巡进入山东的第一站，山东巡抚爱必达在德州城南、御码头以东为乾隆兴建了一座行宫。乾隆二十一年(1757)，行宫落成，宫殿气势宏伟，园林造景别致。行宫旁边有一口古井，名“恩泉井”，所以德州行宫又名“恩泉行宫”。传说，靖难之役爆发后，燕王朱棣率兵南进，攻克德州，天气大旱，士卒口渴难忍，最后在城南发现了一口水井，井水甜甘清冽，而且取之不尽，可供数万人马饮用。燕王感叹之余，树碑题名——恩泉井。行宫的布局，基本上是按古代宫殿“三朝五门”、坐北朝南、中轴对称的建筑格局设计。沿南北中轴线依次是正门、仪门、中门、左右便门、正殿、便殿、寝殿等。两侧是军机房、朝房、膳房、阿哥房等等。此外，还有佛堂和御花园。德州行宫规模略逊于承德行宫，但形制则完全具备。是乾隆南巡途中最为奢华的行宫之一。

正月十九，乾隆驻蹕新落成的恩泉行宫。出乎山东巡抚爱必达的意料，乾隆看到行宫过于奢华，深为不满，写下了《德州行宫示山东大小吏》的七律诗一首：“未敢深宫自晏居，省方展义每廑予。按程移帐安犹便，择向开轩费则虚。一宿迁他赏何有？万民得所乐宁如。由来不说惟成事，此后无须慎戒诸。”批评地方官吏先斩后奏、耗费资财的行为，警示各地官员，以此为戒。但爱必达并没有因此被贬，不久反而高升。四月十七，南巡返京时，再次驻蹕德州行宫。

后来乾隆历次南巡、东巡，来回都驻蹕德州行宫。如乾隆二十七年(1762)、乾隆三十年(1765)、乾隆四十五年(1780)、乾隆四十九年(1784)等四次南巡，乾隆三十六年(1771)、乾隆四十一年(1776)、乾隆五十五年(1790)的三次东巡祭孔，来回都是驻蹕德州行宫。其中，乾隆三十年(1765)南巡，正月廿四这天，还在德州行宫召见了告老还乡的德州名士、原两淮盐运使卢见曾，亲书“德水耆英”的匾额赐之。

乾隆帝驻蹕德州时，多次凭吊古迹，视察治水工程，有感而发，写下了数十首即事诗篇，如《驻蹕德州题董子祠》、《题晏子祠》、《过运河》、《过德州》、《徒骇河》、《鬲津、马颊河》、《阅哨马营减水坝作》等，德州在运河上下的名气也随之增显。

乾隆每次南巡，必需提前一年开始准备。并指定一位亲王督办此事，勘察路线，整修名胜，兴建行宫。他六下江南，仅行宫就修了30多处，德州行宫就是其中之一。

德州行宫坐落在今华联商厦处，是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山东巡抚爱必达(满洲镶黄旗人，姓钮钴禄氏，遏必龙孙。乾隆年间由吏部郎中累官湖广总督。)为讨乾隆帝的欢心，在德州城南兴建。建筑宏伟豪华，园林造景典雅优美。据清代《南巡盛典》记载：“德州行宫，在德州南门外，古广川地，汉儒董仲舒故里在焉。川原旷衍，林木丛茂。前抚臣就其地恭建行殿，皇上南巡，入(山)东省第一程也。丁丑(1757)而后，屡邀驻蹕，叠焕宸章，蕞尔微尘，传为胜地矣。”

德州行宫宫墙一周呈正方形，大宫门三间，南向，有八字门墙，宫门外有照壁一座。行

宫墙以内，共分为中、东、西三部分，主要建筑都在中轴线上。大宫门内有东西配房各一排。二宫门正门三间，东西各有便门。二宫门里，正殿一座为便殿，殿东西有穿廊，院内有东西配房各一排。便殿后院有东西过厅通往东西院。再进垂花门，又有正殿一座为寝殿，东西各有穿廊。寝殿东有一小院落为佛堂。寝殿后院有北房一排为照房，东西也有穿廊。最后紧靠外宫墙，有北房三座，无名称，可能是警卫官兵的住所。

东路外宫墙有便门南向，院内有南房一排为朝房；北房一排为膳房。第二进院北房一排为值事房，东面外宫墙有东华门一座。值事房后为第三进院。再进垂花门为第四进院，有北殿一座，东西都有穿廊，最后院有北房一排为照房。

西路外宫墙有便门南向，院内有南房一排为朝房；北房一排为军机房。第二进院为御花园，院内有山石花木，又有凉亭一座，名“四明亭”，院西南面再有小亭一座，北大殿一座，左右各有穿廊。最后院北房一排为值事房，有东西配房。

第二节 苏禄王墓与中外文化交流

苏禄王墓是迄今为止德州唯一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安、温家族是有史记载传承至今的全国唯一一支古代海外君主留华后裔。苏禄国王墓与安、温家族不仅是明清德州政治、经济、军事特别是交通地位的反映，更是中菲友好关系和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一、苏禄国王来华与病逝德州

明朝实行“怀夷柔远、厚往薄来”的政策，周边各国慕风向化，纷纷入华朝贡。郑和下西洋，曾先后三次遣使访问苏禄群岛。大明使者所到之处宣旨晓谕，以礼为先，展示了明王朝和平友好的外交宗旨，苏禄群岛诸部都心悦诚服，这直接促成了苏禄国王来华朝贡。

明永乐十五年(1417)，苏禄东国首领巴都葛·叭答刺、西国首领麻哈刺叱葛刺麻丁、峒国首领叭都葛巴刺卜率领家眷及臣属 340 余人组成的庞大友好使团，携带珍珠、宝石、玳瑁等贡品，梯山航海，万里来朝，于七月到达泉州，开始了访问中国的行程。《明实录》载：“永乐十五年八月，甲申朔，行在礼部言：权苏禄东国巴都葛·叭答刺、权苏禄西国麻哈刺叱葛刺麻丁、故权苏禄峒者之妻叭都葛巴刺卜，各率其属及随从头目凡三百四十余人，奉金缕表来朝贡，且献珍珠、宝石、玳瑁等物。”^①

文献仅记载了苏禄使团“浮海朝贡”，但航线、航程均未说明。因而，人们往往认为苏禄使团是由苏禄岛向北到马尼拉湾，沿吕宋岛西岸，经台湾海峡到达泉州港，因为这条路最近。其实，当时从苏禄到中国要走传统的“东洋航线”，这比直线距离要远得多。由于航海技术和条件的限制，我国自宋元到明初，去南洋的海上航线主要是“东洋航线”，即按照太平洋季风的规律，每年十一、十二月，利用东北季风从中国的泉州出发，经广州、占城、马六甲，苏门答腊、阁婆(今爪哇)、浣泥(今加里曼丹)到达苏禄，再从苏禄向北经麻逸(今民

^①《明太宗实录》卷一二九。

都洛岛)，最后到达吕宋岛。第二年五、六月，再利用西南季风按原路返回。所以时谚曰：“北风航海南风回。”到了明代后期的隆庆年间(1567~1572)，终于开辟了从中国漳州月港经台湾南部直接到达马尼拉湾、吕宋岛的新航线。若再由马尼拉湾向南航行可到麻逸(民都洛)、巴老酋(巴若望岛)，再向南便可到达苏禄岛。这比原先传统的“东洋航线”要近得多。但这已是苏禄东王访华150年以后的事。所以，当15世纪初苏禄三王访华时，只能走传统的“东洋航线”。

古代苏禄国东、西、峒三个部落在今天苏禄的什么地方，史书上没有明确的记载。苏继庠先生曾对此作过专门考证：西国苏丹名麻哈刺叱葛刺麻丁，其中麻哈刺叱(Maharaja)一词是表示显贵的尊称，葛刺麻丁(Klaibantangan)是人名，麻哈刺叱葛刺麻丁按中国的称谓可翻译成“葛刺麻丁王爷”。在今天加里曼丹岛东北岸有一座山——葛刺麻丁(Klaibantangan)，如果当时西国首领以其统治地区为自己的名字，那么当时西国统治的地区则应在加里曼丹岛东北的葛刺麻丁山一带。^①若以此类推，峒国很有可能在今天巴若望岛(Palawall)的南部，那里有一个地方叫峒巴刺(Tamparam)，峒国的“峒”可能就是该地名的第一音节，可作该地名的简称。至于东国统治的地区可能为今天苏禄群岛的主岛——和乐岛(Jolo)。

苏禄使团在泉州稍作休整，便沿海北上，由吴淞口入长江，经浏河，于永乐十五年(1417)七月末到达应天府(今江苏南京市)的龙江驿。永乐帝下令沿途官员隆重接待，特派专使到应天府龙江驿专候，并在会同馆举行盛大的欢迎宴会，为贵宾接风洗尘。苏禄使团从浦口沿运河北上，经扬州、徐州、济州(今济宁)、德州、沧州、天津、通州等地，于八月中旬到达北京。面对阵容如此壮观的友邦使团，永乐帝给予了空前的礼遇。永乐帝首先在奉天殿(清代改称太和殿)举行了盛大隆重的会见仪式。巴都葛·叭答刺向永乐帝递交了“国书”(金缕表文)，并赠送了从本国带来的珍珠、宝石等珍贵礼品和苏禄特产梅花脑、米脑、竹布、绵布、玳瑁、降香、苏木、胡椒、荜拨、黄蜡、番锡等等。永乐帝按照历代王朝对朝贡国赐封的成例，封巴都葛·叭答刺为苏禄国东王，麻哈刺叱葛刺麻丁为苏禄国西王，叭都葛巴刺卜为苏禄国峒王，并回赠了印诰、袭衣、冠带、仪仗等礼品。

苏禄国王一行在京期间，受到了明朝廷空前的礼遇，受国宴、听雅乐、观杂戏、游名胜……皇宫的巍峨、殿庭的富丽、京城的繁富，让他们叹羡不已。永乐帝为何给予苏禄使团如此高规格的礼遇呢？除了对苏禄国王为加强双方友谊乘风破浪、万里来朝的钦佩与赞赏外，还有其他原因：

第一，靖难之役后，朱棣称帝，朝野上下对朱棣的正统地位提出质疑。为此，朱棣一方面宣布建文帝旧臣为叛逆，以所谓“瓜蔓抄”的野蛮株连法，大杀建文旧臣，清除朝中的反对势力。另一方面又以种种方式证明自己帝位的“正统”，其中以“万国朝宗”来证明自己的正统地位，就是一种顺理成章的政治手段。郑和下西洋，所到之外，宣旨晓谕南洋、西洋诸国入华朝贡。苏禄国王响应永乐皇帝的晓谕，入华朝贡，正合永乐皇帝的心意。

^① 苏继庠《岛夷志略校释》，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78页。

第二，苏禄使团是当时入华朝贡的南洋、西洋诸国中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使团。一是苏禄使团是国王亲莅，而非遣使入贡。苏禄东王巴都葛·叭答刺、西王麻哈刺叱葛刺麻丁、峒王叭都葛巴刺卜及王子、王妃的入朝，大大提高了使团的规格。二是苏禄使团多达 340 余人，是有史记载入明朝贡人数最多的海外使团。庞大的海外使团，引起了朝廷上下的关注，这也正是永乐皇帝政治上所需要的。

第三，苏禄国王向永乐皇帝进奉金缕表文，文词恭谨，输诚慕义之情溢于言表。加之珍珠、宝石、梅花脑、米脑、竹布、绵布、玳瑁、降香、苏木、胡椒、荜拔、黄蜡、番锡等丰富多彩的进贡之物，表达了苏禄国王的诚意，从而得到了永乐皇帝的盛意反馈。

第四，作为大明王朝对外政策的标榜和展示——永乐皇帝对苏禄使团的高度礼遇，还是为了鼓励西洋、南洋诸国入华朝贡，扩大大明王朝在海外的影响，进而加强明帝国与东亚、南亚、西亚诸国的政治、经济往来。

苏禄国王此次入华访问，对苏禄王国自身具有两大意义：

首先，政治上与明朝建立了正式的朝贡关系，提高了苏禄在南洋诸国中的国际地位。永乐帝即位后，依靠富强的国力，制定了“以宣德化而柔远人”的对外政策，着力发展与南洋、西洋诸国的友好交往。南洋、西洋诸国纷纷与中国建立藩属朝贡关系，从而得到明王朝的封赏与保护，这在当时已成为东南亚诸国的政治时尚。苏禄国王审时度势，及时调整外交策略，入华朝贡，并得到大明王朝的册封，从而获得了大明帝国的保护，巩固了其在东南亚的国际地位。

其次，在经济上加强了与中国的贸易往来，促进了苏禄的经济发展。苏禄群岛地近赤道，终年湿热多雨，海岸多悬崖峭壁，山高田瘠，不利于农业生产。然而各岛之间为浅海，多珊瑚礁，水产资源丰富，自古以出产珍珠和海龟而闻名于世。苏禄的自然条件决定了其对海外贸易的依赖性，特别是对华贸易的依赖。因为苏禄对中国的陶瓷、绫绢、绸缎、布匹、铁器等产品依赖性很强，中国当时则是珍珠、香料等苏禄特产最大的消费国。而当时大明王朝实行的是朝贡贸易，只有与大明王朝确立朝贡关系的国家，才能领取大明王颁发的“勘合”^①，取得入华贸易的资格，否则视为走私。通过这次访问，苏禄王国与明朝政府建立了朝贡关系，也就取得了入华贸易的合法地位。

此后，中国与苏禄的贸易往来大大加强。苏禄从中国输入的有丝绸、瓷器、铁器之类；运往中国的有珍珠、黄蜡、棉花、玳瑁、木棉和香料等土特产。中国的丝绸是苏禄人最喜欢的衣料，中国的瓷器则是苏禄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物品，苏禄人甚至习惯以拥有瓷器的多少来计算个人的财产，日常生活中的赠予或赔偿也常以中国瓷器来进行。由中国传入的牛耕、水车、冶炼、陶瓷制作及纺织等生产技术，对推动苏禄社会经济的发展，也起了重要作用。苏禄出产的珍珠既大又圆，颜色青白，被称为“极品”，畅销中国内地。苏禄的其他特产如苏木、豆蔻、降香、藤条等也备受中国的青睐。

^① “勘合”是明朝颁发给外国、允许其来华贸易的执照签证。

苏禄国王一行在京留居 27 日，目睹了明帝国的繁荣与昌盛，深深感受到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然而，远离故土数月，思乡之情日加浓厚。再加上深秋已至，天气渐凉，两个月后必须赶到泉州才能搭乘东北季风鼓帆回国。于是，永乐十五年（1417）九月初，苏禄使团陞辞而归。明政府按照“厚往薄来”的外交礼节，赠送给苏禄客人大量的礼品：“苏禄国东王巴都葛·叭答刺、西王麻哈刺叱葛刺麻丁、峒王叭都葛巴刺卜辞归，人赐金相玉带一，黄金百两，白金二千两，罗锦文绮二百疋，绢三百疋，钞一万锭，钱三千贯，金绣蟒龙衣、麒麟衣各一，袭赐其随从头目文绮、彩绢、钱钞有差。”^①

苏禄使团离京，永乐帝按王礼派专使护送。苏禄东王一行出齐化门（今朝阳门）至通州，沿大运河迤邐而行，经天津、静海，过沧州、泊镇，往德州而来。德州知州闻讯，安排馆驿，做好了迎送苏禄贵宾的准备，忽闻苏禄东王巴都葛·叭答刺突患急症，先将东王安置于德州城北馆驿，急忙寻医诊治。惜救治无效，永乐十五年（1417）九月十三日，东王不幸辞世。《明太宗实录》记述东王病逝德州时，仅用了 16 个字：“苏禄国东王率家属朝贡，既归，卒于德州”^②。关于苏禄东王的病症，目前所见史料，均未明确记载。

苏禄东王的突然病逝，打乱了苏禄使团原定的南下行程，使团不得不暂停于德州馆驿。随行明朝官员一方面安抚东王眷属，一方面入京急报。永乐皇帝闻之，不胜痛悼，敕谕安慰东王的随行眷属，并亲书祭文，派礼部郎中陈士启赶往德州，代表朝廷慰藉王子、王妃及苏禄使团一行。《明实录》载：“永乐十五年九月乙丑（十三日），苏禄国东王巴都葛叭答刺归次德州，病卒，讣闻。遣官赐祭，命有司营坟，葬以王礼。”^③

为表达对苏禄东王的哀悼，永乐皇帝特命按照亲王的礼制，在德州城北的“十二连城”西南，营墓立碑。当时，德州不仅是运河名城，而且地处南北交通要道，是南方各省进京的陆路必经之地，素有“九达天衢”之称。永乐皇帝择此水陆要道营葬苏禄东王，除了表达对这位“诚贯金石”的国王的悼念之外，大概也是为了让过往德州的人们永远记住这位远道来使的苏禄国王。

永乐十五年（1417）十月三日，东王的安葬仪式在德州隆重举行。礼部郎中陈士启宣读御制祭文。永乐皇帝赞誉苏禄东王“聪明特达，赋性温厚”，肯定了东王访问对两国友好关系所做出的杰出贡献，盛赞东王的事迹“昭播后世，与天地相为悠久”，对东王的不幸逝世表达了“不胜痛悼”之情。并按照帝王将相死后赠谥的成例，赐赠东王“恭定”谥号。“恭定”有恭敬、谦逊之意，是对明君、贤王死后的褒奖。以此号赐赠苏禄东王，表达了永乐皇帝对苏禄东王的钦佩与敬仰。为了让后人看到苏禄东王之英容，永乐帝特命宫中画师，绘制了苏禄东王肖像一幅，悬挂于王墓享殿中央，以供后人瞻仰。

二、苏禄王墓的礼制与修建

苏禄东王病逝于德州以北的安陵，为何不就近安葬，而把墓址选于德州城北“十二连城”

① 《明太宗实录》卷一九二。

② 《明太宗实录》卷二六一。

③ 《明太宗实录》卷一九二。

呢？据说，苏禄东王在安陵逝世后，永乐帝下圣旨择地安葬，在安陵附近用秤称土，哪里的土重，说明哪里的土质好，就把东王安葬在哪里。称土的最后结果，是德州城北“十二连城”的土最重，于是便把东王安葬在这里。这虽为传说，但充分表达了人们对苏禄东王的尊敬和让东王在异国他乡安息的美好愿望。关于墓址，《温安家乘要录》有详载：“德州城北二里许，土垒十二所，周方数里，绵亘连峙，旧名十二连城。系前明建文时李景隆将兵屯驻之地。王薨，卜葬于其西南隅。一城拱卫环绕，风水所聚。”^①

古人选墓址很讲究，就连普通百姓都请阴阳先生踏穴，何况当时贵为一国之君的苏禄东王。明朝为东王选择墓址当然要考虑“风水”，选择风水宝地，以彰显东王尊贵。“十二连城”原为明初建文朝大将李景隆屯军之所。建文元年（1399），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率军南下。建文帝以李景隆为帅，坐镇德州，阻击燕军。为保卫德州，李景隆在德州城北自东向西修筑12座土城，称“十二连城”，以重兵把守，拱卫德州城。建文三年（1401），燕军突破“十二连城”，攻克德州。“十二连城”不再屯兵，逐步废弃。东王墓址就选于“十二连城”之一“九江城”的西南隅。《温安家乘要录》称这里：“一城拱卫环绕，风水所聚”。王墓背有“十二连城”拱卫，前有一条小河流过，正是风水所言的“靠山面水”宝地。

根据《明史》及《温安家乘要录》等史料，当时苏禄国王墓的形制大至如下：王墓总体部局为前殿后墓，坐北朝南。自南而北依次为牌坊、御碑楼、神道、享殿、王墓。御碑楼内陈御制苏禄国东王碑，碑文为永乐皇帝亲书。神道南首东西各立华表一对，沿神道两侧为石像生。东王墓神道现仅存有翁仲、石马、石羊、石狮、石虎各一对，初建时石像生的种类、数量可能远远不止这些。享殿为中国传统四合院式建筑布局，正前方为正殿——稜恩殿，前后五楹，殿正中奉东王画像。东王墓封土为圆式宝顶，现高为4.2米，直径为16.6米。墓前立墓碑一方，为安葬仪式结束后的当日所立，上书“故苏禄国恭定王墓”，落款为“大明永乐十五年十月初三日立”，此墓碑今仍完好陈列于西配殿内。

苏禄王安葬后，永乐帝于永乐十六年（1418）敕令在苏禄东王墓前修建祠庙、树碑立传，并亲书碑文：“帝王之治天下，一视同仁，声教所被，无思不服，故曰：‘明王慎德，四夷咸宾。’盖有不恃威而从，不假力而致也。昔朕皇考太祖高皇帝，诞膺天命，统御万方，深仁厚德，薰蒸洞彻，近者既悦，远者毕来，莫不欢欣鼓舞于日日照临之下，猗欤盛哉！肆朕缙承大统，君主华夷，继志述事，惟恐弗逮，劳来绥怀，每殚厥心。而戎狄之君、蛮夷之长，越大小庶邦，亦罔不来庭，朕悉以礼接之。乃者，苏禄国东王巴都葛叭答刺，邈居海峤，心慕朝廷，躬率眷属及其国人，航涨海，泛鲸波，不惮数万里之遥，执玉帛，奉金表，来朝京师。其恭顺之诚，爱戴之意，藹然见于辞表，可谓聪明特达，超出等伦者矣。故特加宴赏，锡以印章，封以王爵，命中人送之还国，道经德州，竟以疾薨，实永乐十五年九月十三日也。讣闻，朕不胜悼痛，遣官谕祭，赐谥恭定。仍命有司为营葬事，以是年十月三日葬于州城之北。命其子都麻含袭爵，率其属而还。礼官以襄事告，请树碑垂示于后。朕惟天无私覆，地

^① 温寿文编修《温安家乘要录·陵墓》，民国二十三年（1934）。

无私载，日月无私照，王者奉‘三无私’以代天出治，君臣之序立，五常之教备，内外之分明，人生之大庆实在于斯。故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今王慕义而来，诚贯金石，不谓婴疾，遽殒厥身，其忠义不可泯，故用纪其实，以诏后世。於戏！人孰无死，若王，光荣被其家国，庆泽流于后人，名声昭于史册，永世而不磨，可谓 得其所归矣。使其区区居海峽之间，一旦殒歿，身与名俱灭，岂不惜哉！王虽薨逝，盖有不随死而亡者，此诚大丈夫矣。乃锡之铭曰：覆载之内，庶类寔蕃；天生圣神，主宰其间。礼乐教化，达于四夷；包含徧覆，恩布德施。敬恭玉帛，朝于明堂；无有远近，山梯海航。粤自古昔，与今斯同；苏禄之君，慕义向风。携其家室，暨其耄倪；泛彼鲸波，万里而至。拜舞婀娜，列辞摅诚；感恩效顺，特达聪明。眷惟贤哲，锡赉是加；金章赤绶，开国承家。秋风载涂，倏然长驱；神游逍遥，风马云车。平原之冈，佳城苍苍；永固厥封，千载之藏。显显令闻，垂于无极；后之来者，视此贞石。”

三、苏禄王墓的修葺与祭奠

苏禄国王墓建成后，明朝对王墓比较重视，加之苏禄王后裔的精心看护，王墓得以妥善保护。明末清初，长期的战乱，民不聊生，王墓逐渐荒废。至康熙年间，已是“太息松楸尽，牛羊上墓阡”^①，杂草丛生，满目荒凉了。

清朝对王墓的修葺是在雍正年间。雍正十一年（1733），苏禄国王母汉末母拉律林遣使访华，上表雍正帝，请求修葺其先祖东王巴都葛·叭答刺在山东德州的坟墓，赐恤留居中国看守王墓的东王子孙。雍正随即敕令礼部负责对东王墓进行勘查、整饬、修葺，并封东王后裔二人为“奉祀生”，赐予顶戴，负责王墓的维护与祭典。

苏禄王墓虽经明清两代数次修葺，但由于日久年深和风雨侵蚀，到清末民初已是“殿宇倾圮”。尤其是1927年，恩县耿李庄运河东决，给墓地造成极大的破坏。当时，德州“水绕城垣，仅露七砖”^②。德州城外，一片汪洋，北营村房倒屋塌，全村只剩下九间房子，大水淹没神道，王墓仅露墓顶。大水过后，御碑被大水冲陷于泥中，翁仲石马东倒西歪。清真寺亦残破不堪，其他如殿堂、房屋门户皆荡然无存。东王后裔变卖枯树，劝募捐款，筹集资金，重筑高台，对王墓和御碑做了必要修整。

20世纪40年代，弃甲从商的原冯玉祥军独立第十八师师长、东王第十五代孙安树德，自天津回乡，捐款捐物，并亲自带领乡亲对东王墓、清真寺、碑亭等进行修葺，并将自己珍藏的国宝——“祭红宝瓶”捐献给清真寺，安置于清真寺礼拜大殿的殿脊顶部，成为清真寺最亮丽的一景。

建国后，政府十分重视保护苏禄国王墓。1956年，苏禄国东王墓被列为山东省文物保护单位；1977年列为山东省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国务院公布德州苏禄国东王墓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1965年至今，各级政府先后十余次拨款，陆续对苏禄国王

^① 谢重辉《苏禄国东王墓》，文见《杏村集·甲申诗》，四库全书本。

^② 民国《德县志》卷十五，民国二十四年（1935）刊。

墓进行修葺和扩建，逐步形成了庄严肃穆、古朴典雅的王墓建筑群——苏禄王墓园。

为表示对苏禄东王的哀悼，永乐帝特意按照中国风俗，准许东王妃、二位王子及随从在中国守墓三年。并拨历城县回民陈咬住、马丑斯、夏乃马三户“永远相兼看守王墓，供给王裔役使，耕种祭田，供王祭祀”^①。为便于对东王的祭奠，明万历年间，在王墓西南隅、墓道西侧修建了清真寺一座。每逢回教大典，由清真寺阿訇率温、安二姓的穆斯林诵经祭奠。崇祯元年，礼部下札符，任命东王后裔温守孝为清真寺长教，明廷颁给札符、冠带，“率众辅教，以崇教化”。

明政府还特设春秋二祭，每逢春清明、秋中元，都举行祭奠苏禄国王的的活动。永乐以后，明政府对苏禄国王墓的祭奠活动一直没有中断。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在明朝灭亡后曾只身北上，途经德州时，凭吊苏禄国王墓，发现了明嘉靖年间祭祀东王所写的“祝板”，在他的《过苏禄国王墓》一诗的诗序中，有这样的描述：“余过之，出祝版一通乃嘉靖年者，宛然如故，其字体今人亦不能及矣。”^②说明明中后期对苏禄国王的祭祀活动并未中止。

清朝对苏禄国王墓的祭奠始自雍正年间。随着中国与苏禄的政治联系恢复，清廷对东王的祭祀活动也随之开始。雍正十一年（1733），正式封东王后裔温、安二姓中各一人为“奉祀生”，同时，设春、秋二祭，每逢春清明、秋中元，德州知州都要乘轿亲赴东王墓，举行隆重的祭奠仪式，代表朝廷宣读祭文。祭文格式如下：维某年岁次某，某月某日，山东济南府德州知州某等，遵承礼部札付，钦奉皇帝圣旨，谕祭于苏禄国恭定王巴都噶·叭答刺，曰：惟王聪明特达，欲顺天道，输诚慕义，归向朝廷，生享荣名，歿承褒宠。今因春(秋)季，谨以牲醴，用申尝祭，神其不昧，来格来歆，尚飨！^③

为保障春、秋二祭的举行，清廷还制定了《清朝谕祭典册》，对春秋二祭的承办事宜做了具体详细的规定。可见，清朝对苏禄国王墓的祭奠已经制度化，即使乾隆二十八年（1763）后中国和苏禄的政府间往来中断，对东王的祭祀活动也未因此而中止。

民国虽为乱世，但对苏禄王墓的祭奠却延续了下来。民国元年（1912），德县县长乘坐四人抬的大轿，打着旗、锣、伞、扇，吹着长号，到东王墓前祭扫，由东王后裔文秀才温如盘、武秀才安福海作陪，摆设供席，搭设临时席棚，并有十余士兵保卫。这是最后一次乘轿致祭的中国政府官员。不过，一直到1923年，德县县长、官员还集体祭拜过苏禄王墓。以后仍有各级政府官员不定期地到苏禄王墓凭吊、祭扫。

民国时期，民间对王墓的保护和祭扫活动也在继续。值得一提的是原西北军将领、东王第十五代孙安树德，卸甲还乡后，看到东王墓被水灾和战火所毁，满目疮痍，痛心万分，于是策划修葺东王墓。他捐款捐物与北营乡亲一起，对东王墓、御碑楼、清真寺等进行了必要整修，并率全村穆斯林对东王墓进行定期祭扫。

苏禄王墓建成后，历代德州文人或途经德州的墨客，多驻足于苏禄王墓，凭吊这位

① 温寿文编修《温安家乘要录·恤典》，民国二十三年（1934）。

② [清]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卷四。

③ 温寿文编修《温安家乘要录·文录》，民国二十三年（1934）。

异国君王，表达对逝者的缅怀与哀思，如王士禛《苏禄国王墓》：“当年重译入长安，属国威仪尽汉官。万里沧波归路远，九河春雨墓门寒。空闻螭首生金粟，无复鱼膏照玉棺。欲荐溪毛重回首，乱鸦残日夕漫漫。”顾炎武《过苏禄国王墓》：“丰碑遥见炳奎题，尚忆先朝宠日碑。世有国人供洒扫，每勤词客驻轮蹄。九河冰壮龙狐出，十二城荒白鹤栖。下马一为郟子问，中原云鸟正凄迷。”

四、德州安温家族及其“守灵”文化

苏禄东王妃葛木宁与东王次子安都鲁、三子温哈喇及从者十人原定为东王守墓三年，但直到永乐二十一年（1423），留居德州六年后，东王妃葛木宁才提出回国的请求，明廷欣然应允，并“厚赐而遣之”^①。然而，葛木宁只是回国探亲而已，仅仅过了一年，于永乐二十二年（1424），她又重返德州。从此，她便与二王子在德州永远定居了下来。客居德州的东王后裔在各方面都享有明朝国宾的待遇：一是享有赐田、减免租赋徭役的待遇。为保障对苏禄王的祭祀之需，明廷“恩赐十二城之（地），共祭田二顷三十八亩，永不起科”^②。对东王后裔的赐田，清代仍予保留。二是享有俸钞钱粮之供的待遇。明廷有制：“行户部，于德州常丰仓内，照孳生男妇每名口月给廩粮一石、布、钞等项”^③。即对守墓人员及其子女按人口数量，每人每月发给粮食一石，以及一定数量的钱、布等，以保障苏禄国王守墓后裔的粮食及生活用品之需。三是享有使役之权。明廷特意从历城（今属济南）迁来三户回民：马丑斯、陈咬柱、夏乃马，“发给札符，着三户永远相兼看守王墓，供给王裔役使，耕种祭田，供王祀事，全户豁免杂泛差徭”^④。三户负责王墓的祭祀、耕种祭田及东王后裔家务杂役等。

从明永乐十五年（1417）至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客居德州的苏禄国王后裔一直享有这种特殊待遇，生活条件优越，衣食无忧。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经过一百多年的繁衍，到万历年间苏禄国王第五代孙安守孙时，苏禄国王后裔“安”、“温”二姓，已增加到75人。如果按照明朝廷原先规定的每人每月一石俸粮计算，每年就得拿出900石的粮食，这虽然不是一个太大的数目，但已超出了德州地方仓库支付的能力。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五月，德州管仓主事张世才借口财政困难、朝廷无钱，上报明朝廷，从每月应发给东王后裔的75石俸粮中减去66石，只发给9石。这一做法，对东王后裔的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每人每月只有1斗多一点儿俸粮，根本无法维持原先那种王族特权阶级生活了。因此，苏禄国王第五代孙安守孙便在万历三十八年（1610）七月上书明朝廷，请求恢复以前每月75石的俸粮，并许诺以75石为最高限额，即从此以后即便人口增加，也不再增加俸粮数。然而，安守孙的上书，并没有得到明廷的答复。

万历二十一年（1593）的“减俸”，对留德的东王后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减俸虽然给东王后裔的生活带来了困难，但却从客观上促进了东王后裔由贵族向平民的过渡，并在很大

① 《明太宗实录》卷二六一。

② 温寿文编修《温安家乘要录·恤典》，民国二十三年（1934）。

③ 《明神宗实录》卷四七三。

④ 温寿文编修《温安家乘要录·恤典》，民国二十三年（1934）。

程度上促成了东王后裔真正融入德州。“减俸”大大减少了东王后裔的生活来源，改变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原先每月一石俸粮，还有布钱钞等供应和 238 亩祭田的地租收入，可谓衣食无忧。“减俸”以后，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向德州百姓学习耕织技术及经商理财之道，从事各种营生，逐步变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苏禄国王后裔除了享受着王族政治特权之外，经济上基本上已和当地人没有多大的差别。

雍正四年（1726），苏禄苏丹母汉末母拉律林委派旅居苏禄的中国商人龚廷彩为苏禄访华使团正使，附马阿石丹为副使，携带“国书”和礼品，到中国进行访问，希望恢复朝贡关系。苏禄使团还专程到德州拜谒了苏禄东王墓，会见了东王第八代孙安汝奇、温崇楷等人。经历了 300 多年的风雨侵蚀，东王墓、庙已荒芜废圯，加之明万历年间停发了东王后裔的俸粮，这时的 193 名东王子孙中，大部分生活比较困苦。安汝奇、温崇楷为此向龚廷彩、阿石丹提出二个要求：一是修葺东王陵庙；另一个则是希望恢复俸粮供给。龚廷彩回到苏禄后如实向苏禄国王回报。

雍正十年（1732），苏禄国王母汉末母拉律林再次派龚廷彩为使臣率团访华。使团于雍正十一年（1733）六月到达北京，向雍正皇帝呈上苏禄国王的信函，信中对上次使团访华所受到的隆重接待和馈赠，表示了深切的谢意，同时向雍正皇帝提出了修葺东王陵庙和恢复德州苏禄王后裔俸粮的请求。雍正皇帝立即命山东巡抚岳濬查清、奏报德州苏禄王墓的实际情况。根据岳濬的报告，经过礼部研究，报请雍正皇帝批准，分别情况，区别对待，做出如下的批复：第一，对于东王陵墓的修葺问题，虽然事隔三百年，但清朝廷考虑到苏禄东王作为海外君王不远万里来朝的精神仍应受到后世的尊重，所以命德州地方官员对苏禄国王墓的墓、庙、神道、享亭、牌坊进行整修，所用经费概由国库开支。第二，按照历代祭祀地方贤哲的惯例，每年春、秋二季由地方官员对东王墓举行拜祭。令苏禄国王后裔安汝奇、温崇楷为族长，看守坟墓。从苏禄国王后裔的安、温二姓中各遴选一名品行端正、有一定文化知识、受群众拥护的人做“奉祀生”，主持每年祭祀王墓的一切事宜。“奉祀生”由清朝廷正式委派，享受政府官员的待遇。按照清朝廷的礼制，只有地方上先贤圣哲的后裔，才可授“奉祀生”，专门负责祭祀其祖先，如山东的孔庙、孟庙等。“奉祀生”若遇死亡或其他事情不能履行职责时，则于同族中另选他人担任，作为一项制度，永远不得更改。第三，关于恢复东王留德后裔月俸的要求，清朝廷考虑到从东王逝世到清雍正年间，已事隔 300 多年，中间还隔了一个朝代，特别是明万历年间停止“俸粮”后，东王留德后裔在实际生活中早已与当地老百姓无异，加之雍正时，东王留德嫡系后裔已增加到 193 人，每月需粮 193 石，每年则是 2316 石，数量太多，地方财政负担太重。所以清朝廷婉言拒绝了苏禄国王母汉末母拉律林的要求，作出了“已经停止，不必更给”的答复。

关于苏禄国王后裔“入籍德州”之事，乾隆《德州志》有如下记载：“（雍正）九年国王苏老丹折奏礼部，查明前明留德守墓人等子孙，以温、安为姓入籍德州，题定二姓各立奉祀

生一名，该抚题明嫡系承袭，给照在案。十年，发帑金修其墓。”^①这里提到的“雍正九年”，与《钦定大清会典事例》、《清世宗实录》所载东王后裔入籍德州的时间不符。后两种文献均载“雍正十一年”。事实上，雍正九年并没有苏禄使节访华，因而《德州志》所载“雍正九年”时间上肯定有误。但《德州志》记载的“查明前明留德守墓人等子孙，以温、安为姓入籍德州”之事，后两种文献虽未提及，但却是事实。因为乾隆《德州志》编于1788年，且编志之时苏禄王后裔肯定已经“入籍德州”。《德州志》将“入籍”时间上推一代至雍正时期，时间不长，一般不会有误。《钦定大清会典事例》与《清世宗实录》之所以没有记载，可能因为此为地方户籍之事，事微而忽略。因而苏禄王留华守墓后裔于清雍正年间入籍中国，不会有误。

入籍德州后的苏禄国王后裔，加速了“华化”进程。除务农、经商外，在文化上，则完全承袭了儒家文化，有的甚至通过读书走上仕途。清雍正年间苏禄国王后裔入籍德州之时，有“一百九十三人”^②。成书于1900年后的《德州乡土志·人类》载：“现二姓共计五十六户，散处北营、西关、小锅市。”当时德州回民总户数为510户，男1412口，女1162口，共计2579人。该书没有单列其中安、温二姓人口，但56户占510户的11%，以此比例推算，安、温二姓人口当在285人左右，比入籍时增加近百人。而280余人若仅仅依靠耕种238亩祭田维持生活，是不可能的。少地无地的人家为了生活或佃种别人的土地，或从事经商。有的甚至以经商致富，如苏禄王第十二代孙安德明以经营餐饮业起家，安家楼成为当时誉满德州的老字号之一。

关于苏禄王后裔的生活习俗，民国《德县志》有详细记载：“不饮酒，不吸烟，牛羊而外一切杂牲概忌不食，婚姻之形式大致与汉俗不殊，惟丧葬则大异。凡人死，用净温水遍洗尸体，殓不用冠裳，以白布裹尸，男三层女五层，三日必葬。不卜兆，不择吉，不用音乐，不用棺槨。开穴之后，以砖石砌成四墙，置尸其中，散以潮脑麝香等香屑，覆以木板，以土壅之。近亦有纯用木材制成棺式者，惟不用底，先置尸穴中，然后以此覆之，盖取土葬之意，此其丧葬形式之不同者也。其祭祀亦与汉俗异，每周年则祭，不用供献，祭时惟请教长之坟前诵经。凡星期日必至清真寺礼拜，礼拜必先沐浴，然后服其上尖下圆之白帽。其帽名为礼拜帽，他时禁弗用。其星期以二十八宿牛娄鬼亢四星日行之。每年必有一斋月，是月白昼不饮食，见星而后食，名为封斋，至月尽则开斋。开斋之日，凡回教之人皆至清真寺，听其教长诵经毕，即交相庆贺如汉俗之岁俗，此又其祭祀礼节之不同者也。”^③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随后建立的民国政府，废除了一切封建特权，苏禄国王后裔耕种的238亩祭田也被收归国有。祭田被没收，使北营苏禄国王后裔的生活更加艰辛。加之连年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北营许多人被迫离家，外出谋生。东王第十六代孙温寿文，到天津谋生，在粮店当伙计，勤学上进，经数十年之努力，于20

① 乾隆《德州志》卷十一，乾隆五十年（1788）刊。

② 道光《福建通志》卷二六九。

③ 李树德等修纂《德县志》卷十三《风土志》，民国二十四年（1935）刊。

世纪 20 年代去徐州，开设保新面粉厂，因经营有术，工厂日益发展，继之在蚌埠、济宁开设分厂，并在上海、南京设有经销处。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要求和他合作开工厂，遭严词拒绝。东王第十五代孙安树德则是因家贫被迫走上吃粮当兵之路的。1913 年春，北洋左路备补军前营营长冯玉祥到冀南招兵，安树德在景县投军入伍，跟随冯玉祥南征北战，战功显赫，官至国民军独立第 18 师师长。1930 年，蒋、冯中原大战，冯玉祥战败下野。1931 年安树德不愿追随蒋介石，弃甲经商。回乡后，多有善举，如捐钱捐物修葺东王墓与清真寺、开办戒烟馆、率村民筑堤抗洪等，口碑甚佳。

1917 年耿李庄运河堤决口，北营村一片残垣断壁，只有九间房屋未被冲毁。日本著名汉学家桑原鹭藏为考察苏禄国王墓来到北营村，看到的仍是一片荒凉景象：“渡过运河约二三里就到了德州。我出城向东就到了明代苏禄国王墓，墓在德州城东北约三里左右。墓高约两间，宽约四间，墓四周的围墙都已渐渐倾圮了。墓前有两个石人默默停立，石马、华表等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下。”^①

抗战爆发后，北营村又屡遭日寇的破坏。原来明朝廷为了纪念东王访华盛举，在东王祭庙中悬挂有东王画像一帧，几百年来画像几经变乱。日军侵华期间，画像存于清真寺中，被驻在寺中的日军军马踩坏了面部，后被十六代守墓人温寿龄悄悄地藏起来，到解放后才交给山东省博物馆。现山东省博物馆馆藏的东王画像的原件，已经残破不全且模糊不清，仿佛向人们诉说着它所经历的几个世纪的沧桑。

第三节 明清时期德州区域经济的繁荣

明清时期，由于移民的大量迁入、京杭大运河的畅通和漕运的发达，德州经济步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在农业、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城市商品经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同时，德州与外部经济交流大大加强，新的生产关系萌芽开始破土而出。

一、明初移民与德州人口的变迁

金元两朝，由于民族压迫、战乱兵祸、社会动乱、自然灾害等原因，德州城乡破败不堪，人口大量逃亡，人口锐减。乾隆《德州志》说：“（德州）鲜林木，罕庐舍，蒿莱极目，观之凄阻”，是一个“疲邑”。

明朝建立后，特别是明成祖迁都北京以后，在德州所在的北方地区采取了一系列安抚民众、稳定社会和发展经济的措施，以巩固刚刚建立起来的明政权。其中，前后延续了 50 年之久的移民政策就是一项重要内容。

明初德州移民规模之大，次数之多，时间之久，实为前代所没有。虽然德州地方史志对此记载语焉不详，但是，从支离破碎的史料特别是家谱资料中也能勾勒出明初德州移民的来

^① [日]桑原鹭藏《考史游记》，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56 页。按：“间”、“町”是日本的长度单位，1 间约等于 1.8 米；1 町约等于 100 米。

源与构成。

第一，军户是明初德州移民的主要来源。

明代屯田分军屯和民屯两种。军屯，即派驻军队到抛荒严重的地方，一方面驻防，一方面垦种荒地。民屯，即招抚流亡，集体屯种。明朝实行卫、所制度，一卫约 5600 人。卫设指挥使，下设千户所和百户所。从事屯田的军士保留军籍，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屯田，其余时间轮流驻防。明朝规定，卫所将士必须携带家属，于是，军人和他们的家属共同构成了军屯的主体。

历史上，德州“控三齐之肩背，为河朔之咽喉”，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随着元朝对大运河的截弯取直和航运再次畅通，明初的德州已成为南北要冲。洪武元年（1368）八月，守御千户韩政镇守陵州，有兵约 1120 人；洪武九年（1376）改守御千户所为德州卫，下辖 6 所，约 6720 人。明成祖朱棣即位后，为了漕运畅通，于永乐五年（1407）在德州卫之外，增设德州左卫，也辖 6 所 6720 人。同年，又在德州城西北设置递运所，以维护陆运畅通。

明初，军户分从征、归附、谪发三种。从征，就是明朝嫡系部队；归附，就是降卒；谪发，就是犯罪后军事管制的罪犯。当时，从外地迁入德州的军户有 4 万人，分布于 111 处军屯开垦点上。其中，德州卫、德州左卫约 13400 人，其余 26600 多人为从军家属和元朝归附的下等军户。每个军士可授田 50 亩。乾隆《德州志》记载，洪武至永乐年间，德州军屯开垦熟田 3231 顷；至明末共开垦粮田 1 万顷。

卢家是明清时期德州的大户，卢见曾曾为生父卢道悦撰写过《墓志铭》，其中说：卢氏“世居直隶之涞水，明初始迁德州左卫”。据乾隆《德州魏氏族谱》记载，德州魏氏是永乐七年由永平卫调任德州左卫指挥同知而定居德州的。德州江氏，系江南丹徒人，“明初以军功授指挥使于此世袭职”；德州马氏，“山东益都之石羊村，徙德州百户”；德州吴氏，本系蒙古人；德州金氏，原籍浙江余姚；德州谢氏，祖籍江西赣州；德州箫氏，原籍辽东铁岭卫，等等，大都是因为德州任军职而定居德州的。永乐十八年（1420）为了迁都北京，明成祖下令部分河南卫所“北调”，于是，一些河南军户被调到德州，作为“客兵”留了下来。

德州附近以“屯”、“营”命名的村落比比皆是，就是明初军屯的反映。洪武年间迁至德州的有：城内的刘氏、周氏、王氏、马氏、李氏、卢氏、谢氏、陈氏，以及王官屯的王氏、赵鲁屯的赵氏、胡官营的胡氏、鲍家营的鲍氏、夏家营的夏氏、肖家营的肖氏、顾家营的顾氏、何家营的何氏，等等。永乐年间来德州的有：城内的叶氏、程氏、魏氏、张氏、宋氏，以及宋官屯的宋氏、于官屯的俞氏、张官营的张氏、尚官营的尚氏、达官屯的达氏，等等。随着时间的推移，至明代中叶，兵士的防卫职能渐失，逐渐变为农民。

乾隆《德州志》载：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德州人口仅 4830 户，28899 人，到万历年元（1573），德州人口增至 8887 户，50130 人。五万多人的德州，军户就占了四万，可见，军户是德州移民的主要来源。

第二，山西民户是德州移民的来源之一。

“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这首民谣在山东、河北、河南等地至今流传很广。明初从这里走出了大量移民。据山西《洪洞县志》记载，洪洞县的广济寺有一株汉代古槐，“树身数围、荫遮数亩”，阳关古道由此穿过。据不完全统计，全国 21 个省市约 400 个县都有大槐树移民。明初移民时，官府在广济寺和大槐树下颁发凭证和路费，强行编排队伍。

其实，华北地区的明代移民并非都是从洪洞县大槐树下迁来的，而且官方组织的山西移民也并非都带有强制性。洪洞县的大槐树和广济寺，只是永乐年间办理移民官牒的机构，很多明代的山西移民都是自愿到北方各地垦种的贫民。据山西《平阳府志》记载，明洪武、永乐年间，朝廷曾先后 8 次在广济寺集中山西移民，办理移民手续。移民去处多为今河南、河北、山东、安徽、北京等地。

《德州地名志》对德州移民的来源有所记载，其中涉及山西移民约有 22 姓，均属零散移民。如：今德城区二屯镇前后赵村的《赵氏族谱》载：始祖于明永乐年间自山西平阳府洪洞县迁居德州城北；二屯镇前小屯的曲氏、王氏，后小屯的郭氏、樊氏、高氏，纪家庄的纪氏，黄河涯镇赵庄的赵氏，耿庄的耿氏，南许庄的许氏，倪庄的倪氏，运河开发区阎庄的阎氏、西李庄的李氏，均为明永乐年间由山西迁来德州。

第三，零星移民。明初，零星迁移到德州的河北移民最多，至少散居在今 20 个村庄。如：今德州市经济开发区抬头寺乡张申村的《张氏族谱》载：祖鹏举，本北直隶顺天府（今北京市）涿州（今河北省涿县）人，从居通州（今北京市通县），明永乐年间自通州迁山东济南府德州，入依仁二里一甲民籍。再如：德城区《安德田氏家谱》载：“其始祖植德公讳畹，明永乐年间自枣强县迁居德州。”另外还有来自安徽、江苏、浙江、福建、河南、河北、山西、北京等省的移民，也有从本省济南、青州、莱阳、栖霞、即墨、潍坊等地迁来，也都是零散移民。

由上可见，政府组织是明初德州移民的主要特征，明代德州移民主要是明洪武、永乐时期由外地迁入的军户、河北及胶东的民户。永乐以后以及清朝、民国时期，虽有移民陆续迁入，但均属零散小股移民。

移民的大批到来，让因战乱而萧条苍凉的德州顿现生机，并由此带来了德州经济、社会、文化的巨大变化。位于运河东岸的德州，在运河的滋润和浇灌下，在土著居民和移民的共同努力下，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代，逐渐繁盛，并成为运河东岸的经济、军事重镇和交通枢纽。

二、农业手工业的发展

明清时期，由于京杭大运河的开通和移民垦荒政策的落实，极大地促进了德州地区的经济发展。作为社会经济的两大生产部门，无论是农业还是手工业生产都较前代有了长足的进步与提高，并由此而奠定了商品生产与贸易发展的基础。

（一）农业生产水平水平的提高

农业是明清两代德州最主要的生产部门，明清德州农业生产水平水平的提高主要表现在：各种农田水利的兴修治理颇见成效，旱作农业日趋精细，各种经济作物的种植进一步扩大，商业性农业经营有了明显发展，等等。

以麦作为中心二年三熟制的确定，是德州农业生产发展与提高的显著标志。实现以麦作为中心的二年三熟耕作制，首要的条件就是麦作生产的扩大。此时，德州农作的安排一般是麦与豆连作复种，经过冬闲，再种植早熟的谷类春播作物，以便收后秋季种麦，形成早谷—一麦—一豆的二年三熟。德州小麦在“八月中种”，翌年“五月初收”。豆类作物“五月初种，九月中收”。为了能接上茬口，豆于麦茬地内实行套种，形成麦豆复种。麦豆地经过冬闲后，再于翌年春播早谷。这就是“二年三熟”^①。由于麦豆复种面积的扩大，明代中期以后，朝廷在德州征收的豆类秋粮数量明显增加。

明清两代，德州农业种植进一步向精细化方面发展，在耕作、施肥、管理等各个生产环节都形成了一套完备的技术操作要求。广种薄收的粗放式经营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不取。在农耕技术上，对实行一年一作的农田，以适时春耕为主；实行二年三作的农田，则进行春、秋两次深耕。

在积肥、施肥上，进一步提高了对肥料的积制和施肥的认识。当时在德州以及北方其他地区的农村，粪肥的种类主要有人粪、牛马羊驴骡猪等各种牲畜粪及灰土。积制的方法：人粪，“必先修厕”，“掏出之粪，微灰拌和，打成饼，发过用”；牛粪，“必修槛畜之”，夏日“每日芟青置牛脚下，微洒以水，草上垫土，使牛践踏，草经牛踏，又著粪腐烂，俱成好粪”。冬日则“锄地边干草，土垫之，不用洒水”；羊粪制法与牛粪略同，但羊圈要更加注意干燥；马驴骡粪，“圈内必每日扫除，垫以新土”；猪粪，“择便为圈，半边掘四五尺深坑，用废砖砌底及四旁”，“砌坑内常入水及各色青草，此草可当猪食，践则成粪，若雨水多则垫土，久之，草土俱成粪矣”；灰土，以“炕土为上”，“多年烟熏房土次之”。所有粪肥，在使用前必须经过“倒发”，促使发酵。即所谓“凡出圈粪，不倒不发，必二十日或半月一倒，倒三、四次，令发热，始冲和发稼，且耐旱，或不发热，不惟太猛生虫，而且生草”^②。明清德州在粪肥积制技术上有所提高，在施肥上积累了许多新的经验，如“凡种田不出粪多力勤四字，而垫底（底肥、基肥）尤为紧要”。施底肥要与深耕深翻结合，只有“垦到极深”，才便于肥气深入，根脉深远，耐水耐旱，苗壮实多。追禾麦肥，多在冬春两季，用发酵过的人粪尿，于“苗出后，视其色留心浇灌”。

在田间管理上，对禾麦的种植管理突出一个“勤”字。就中耕而言，要“锄不厌烦”，禾谷定苗后一般要三四遍。小麦扬花后，结合中耕锄草为麦根壅土，以抗倒伏。收获要精收精打，如收割麦子，如用麦钐，则要镰刀随后，“以拾倒麦，兼拾落脚”，“无论镰钐，俱以楂矮为佳，无遗穗为上”^③。对于棉花的种植管理，德州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操作规

^① 万历《恩县志》卷三《贡赋志·种植》。

^② [清]孙宅揆《教稼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影印本。

^③ [清]蒲松龄《农桑经·农经》。

程，植棉技术与棉田管理已达到了相当成熟的阶段：“种之时，在清明谷雨节，以霜气既止也。种之方，或生地用粪，耕盖后种；或花苗到锄三遍，高耸，每根苗边，用熟粪半升培植。锄非六七遍尽去草茸不可。种之疏密，苗初顶两叶时，止划去草颗，宜密留，以备死伤。再锄尚宜稍密。三锄则定苗颗，宜疏不宜密。大约每花苗一颗，相距八九寸远，断不可两颗连并。苗之去叶心，在伏中晴日，三伏各一次，有苗未长大者，随时去之。花性忌燥，燥则湿蒸而桃易脱落。花忌苗并，并则直起而无旁枝，中下少桃。种不宜晚，晚则秋寒。早则桃多，不成实，即成亦不甚大，而花软无绒。去心不易于雨暗日，雨暗去心，则灌聋而多空干。”^①

明清时期，德州农作物产量有了较大的提高。“树艺丰廐，麦豆合产，岁收亩七八斛”。明制，五斗为斛，二斛为石，“亩七八斛”合3.5至4石。而在一般的“河弃地”，“岁穰亩收一钟（石），犹不失为乐土”。加上复种因素，一般亩产可达2石左右。

商业性农业经营的兴起和发展，是明代以后德州农业经济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明朝继续实行农业经济作物课耕政策，大大促进了包括小枣种植在内的农业经济作物的发展。为使久经战乱的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发展，朱元璋曾颁发榜文：“今天下太平，百姓别无他道，宜用心生理，以足衣食。枣、柿丰年可以卖钞，歉年可以当粮”。据乾隆《乐陵县志》记载，明洪武年间曾下诏书：栽种枣果，不论多少，均无赋税。乐陵小枣生产得以发展迅猛。明万历《乐陵县志》载：“旱涝之地，不任稼穡者则种枣，枣熟则丰矣。”明万历十九年（1591），知县王登庸“教民树艺，劝民种枣。有过者课种枣，以赎愆，故邑多枣”。清康熙、雍正、乾隆年间，金丝小枣被人们誉为“斗地打石粮”、“一年顶三秋”的“铁秆庄稼”，并成为乾隆时期的宫中御膳，倍受皇族、达官显贵的垂青。乾隆还为此给城南杜刘尹村的一株金丝小枣树题写了“枣王”匾牌。清《山东通志》记载，嘉庆元年（1796），乐陵知县张大成“立枣林书院，延名师主讲，庚辰科肄业，乡榜四人皆捷南宫”。由于朝廷和地方官吏重视，免税奖励，加上农民辛勤栽培，乐陵金丝小枣得以大规模发展。

明代中期以后，沿运河区域出现了多种经营的大农业生产模式和“千亩之家，千树梨枣，牛书具张，马百蹄，园畦蔬果称是”^②的大经营主。这种大经营主，多为占地千亩的有势之家，不仅从事粮食生产，而且还种植棉花，经营果园、蔬圃及畜牧，形成了粮、棉、果、菜、牧的综合生产经营。这里仅以棉花、花生、果树为例，说明明清德州的商业性农业发展情况。

棉花元代在德州仅有零星种植，其真正成为德州第一大经济作物则是在明代。明清两代，德州植棉区主要集中在夏津、恩县、武城、平原、陵县、德州、宁津、乐陵、临邑等县，尤以夏津、恩县植棉规模最大，发展也最迅速。徐光启《农政全书》：“齐鲁人种棉者，既墾田下种……亩收二三百斤以为常”，“木棉一亩，可拾得二百斤”。洪武年间夏津县棉课额仅99斤，永乐年间猛增至2196斤；洪武年间恩县棉课额为106斤，永乐年间增至1280斤^③。

① [明]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三六《种植》1639年刊印本。

② 万历《东昌府志》卷二《地理志》。

③ 嘉靖《夏津县志》卷二《食货志》。

武城、陵县、宁津等县棉课额，自永乐以后也都是以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幅度增长。棉课额的增长，说明了植棉比重的增大。

由于棉作比粮作经济效益高，因而明中期以后，以赢利为生产目的的植棉农户在德州纷纷涌现。嘉靖时已有植棉“千亩”、“万亩”的大经营主。万历以后，随着赋役的改革，田赋变为折银交纳，更促进了商业性植棉生产的发展。此时德州地区种植棉花的农户增多，所生产的棉花除交纳赋税和自用外，还把相当一部分棉产作为商品投放市场，供棉商“转鬻四方”，以此赢利。明代后期，德州棉区的商业性植棉日趋兴盛，并成为新兴的商品棉主要产地。因此，每到棉花收获季节，“江淮商客，列肆贾收”，通过运河大量“泛舟而鬻诸南”，“居人以此致富”^①。乾隆时期，德州甚至出现了“种花地多，种谷地少”，“其上田皆种木棉”的现象。

明清之际，花生通过运河传入德州。康熙《德州志·物产》篇载有“落花生”。道光以后，花生作为油料作物已在德州农村大面积种植，“连阡接陌，几与菽粟无异”。清代后期，商业性花生经营有了进一步发展，不少乡镇农民扩大种植规模，花生遂成为外销大宗农产品。清末，种植地域遍及德州整个运河流域，成为仅次于棉花的第二大经济作物。

明清德州经济作物中，果树种植业是一项重要内容。明朝规定，每户“初年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六百株”^②，并允许以枣代税粮。这一政策在德州等地得到了比较好的推行，乾隆《乐陵县志》记载，明洪武年间曾下诏书：栽种枣果，不论多少，均无赋税。在恩县，成化年间参政唐虞在当地推行“种植桑枣等树”。明代中期以后，随着赋税制度的变化，农民栽培果树已不再是为了单纯纳税，而是为了出卖。明万历十九年（1591），乐陵知县王登庸“教民树艺，劝民种枣。有过者课种枣，以赎愆，故邑多枣”。清代，果树栽培在德州地区更为普遍，出现了“千树枣梨”、“千株桃杏”的专业果农户。“每岁以梨枣附客江南”，外销量仅次于豆麦。小枣则被乐陵百姓誉为“斗地打石粮”、“一年顶三秋”的“铁秆庄稼”。

（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

德州自古就是传统农耕区，男耕女织是最普遍的小农家庭生产方式，手工业生产不甚发达。京杭大运河的畅通，不仅给德州带来了商业的繁荣，而且也引发了德州产业结构的变化，其中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尤为突出。

棉纺丝织业。明清时期，伴随着棉花在德州地区的种植扩大，棉纺织生产也迅速发展起来。棉花在元代以前多用作棉絮，一般很少织成布匹使用。明代以后，随着棉织品社会需求的增加，棉纺织技术有了进一步提高。弹花拨弦已用弹椎，弹椎用紧密沉重的檀木制作，两头轮番敲击弓弦，“倒看星象转，乱卷雪花浮”，弹花的效率大大提高。同时，搅车的碾轴也改为铁制，且由原来的二人操作，变为一人操作，功效提高了3倍。

棉纺织业比较发达的县市是德州、平原、夏津、武城。明中期以后，随着赋役征收改折银两，极大地刺激了德州棉纺织商品生产的发展。昔日棉花“泛舟而鬻诸南，布则泛舟而鬻

^① 万历《东昌府志》卷二《地理志》。

^② 《明会典》卷一七《户部四·农桑》，中华书局1989影印本。

诸北”^①的现象，已渐被“自出花布，南织作弃于地”的状况所代替。清代，棉纺织业已成为德州农村主要的家庭手工业。乾隆以后，德州民间土纺土织已十分普遍，并出现了由自纺自织到纺织分离的分工分业趋势，所生产的土布成为对外贸易和交换的第二大产品。市场上，设有专供农家自纺棉纱上市的“线子市”，“每日辰刻，携线而至者约一二千斤”^②，专供只织不纺的织机户采用。那些“治机织布”的织机户，所织出的布“或售或留，一家衣服日用，皆取赖焉”。农村棉纺织生产已由自给性生产向商品性生产转变。清代中叶，陵县出产的白粗布最多，当时滋博店（今陵县滋镇）、神头镇、凤凰店各街有布店7处，资本雄厚，购买白粗布运销辽沈，收入颇为可观。

德州历来有桑麻纺织的传统。明初，朝廷颁布农桑征课之令，强令农户栽桑纳绢，使丝织业成为德州农家一项重要的手工业。明代中期以后，随着“一条鞭法”的实行，德州赋税丝绢开始折银交纳，桑蚕丝织业逐渐摆脱了赋役制度的束缚，开始向商品性生产转化。明嘉靖万历年间，德州的丝织生产已十分普遍且多有精品，德州、夏津、恩县、武城等县生产的丝、绢、绫、绸等产品，多用于市场销售。

烧造和城砖生产。抔土烧砖在我国民间有着悠久的历史。德州为黄泛冲积平原，沿运河两岸多为细腻的褐潮土，俗称“莲花土”，是烧制砖的优质原料。洪武三十年（1397）为筑德州城，在城南窑上、伙房两村开窑烧砖。德州的砖窑厂中，“窑”是基本的生产单位。一座“窑”实际上就是一个制砖手工作坊。当时，每座“窑”内，都是由“窑户”、“作人”、“匠人”及“工人”四种人组成。“窑户”是由官府调发来的窑场窑主；“作人”是窑场生产的参与者与组织者，即“工头”；“匠人”是在窑场中从事制砖与烧制的技术工匠；“工人”则是在窑场中从事取土、筛土、滤泥、踩泥、制胚、装窑、运柴、烧窑、洒水、出窑、装运等各个烧制砖工序上的直接劳动者。以上四种人均称“陶人”。

德州窑厂烧造的砖分素砖和印鉴砖两种，有方砖、城砖两个品种。方砖边长46厘米，厚10厘米；城砖长46厘米，宽23厘米，厚10厘米。烧制出来的成品，必须棱角分明，光华平正，色呈豆青，敲验无哑声者方算合格。然后每块成砖用黄裱纸包好，搭装漕船或民船运往通州，再转运京师及其他工程用地。

嘉靖九年（1530），明朝对工匠服役制度进行改革，废除“窑户”的匠籍，由工部发放砖价银，在德州开窑招商。被招承办砖窑的经营者称为“窑户”。德州砖窑厂由官办变为官督商办，生产经营方式发生了重大改变，民营制因素在逐渐壮大，生产效益也“视昔加倍”。清沿明制，顺治十八年（1661）“裁工部营缮分司，以山东巡抚领之”，承办官为德州知州，分管官为德州吏目，所烧之砖，专供朝廷修建宫殿、城池之用，故称为“贡砖”或“城砖”。《明史》载有“建故宫有德州窑制砖”。

酿造业。酿造业特别是酿酒业也是德州的传统手工业部门。清代以前，德州酿造生产多集中于城镇，清代以后，农村已是“十室之聚有糟房，三家之村有酒肆”，酿造业空前兴旺。

① [明]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三五《蚕桑广类·木棉》。

② 乾隆《德州志》卷四《市镇》。

德州大营街（今进步街）酿制的罗酒，通过运河畅销南北。田雯曾说：“吾州酒极美，色白，清香，鲜洁”，王士禛有“玉井莲花作酒材，露珠盈斛拨新醅。清冷错认康王水，风韵还宜叔夜杯”的诗句。德州籍诗人宋弼亦有“城中贤豪多好事，家家秋酿菊花浓；就中罗酒称第一，清如玉雪传高风”的诗句。民国《德县志》记载：“酒，饮料之有麻醉性者，其种类及制法颇多，通常为谷类和麴酿成之。以高粱酿者，为烧酒，以黍酿者，为黄酒；其九、十月酿者，又名菊酒。昔日，此地酒之最著者，为罗氏酒。”罗酒酿制，夏日用莲瓣，秋日用菊花，数层匀撒于秫秸箔上，吊挂近锅口，严封，使蒸馏气体通过，冷却成酒。酿制原料为“麴材屑麦糜煮黍”，具有荷花与菊花香型。当时德州有成片的荷花园和菊花园，荷花酒中的荷花主要采自今德州市运河开发区的杨家圈；菊花酒中的菊花，则采自当时罗氏的后花园。纪晓岚在品尝罗酒后写下了脍炙人口的《罗酒歌》：“平生不饮似东坡，宪杯已觉朱颜酡。往昔做客东光县，春光三月胡苏河。主人好事携美酒，踏青邀我同相过。风景骀荡客心畅，饮酣起舞争婆娑。乐时意气亦豪举，呼童一酌鸚鵡螺。形神酣适忘物我，便拟倒瓮倾滂沱。曲生风为真可忆，主人云出陵州罗。”遗憾的是，到民国初年，鲁北一代战乱频仍，罗酒由此衰落，最终失传。

历史上，腌制各种咸菜以供冬春之需，是我国民间一种普遍存在的习俗。德州距天津长芦以及山东东部盐场较近，购买食盐十分方便；德州盛产大豆、花生、瓜茄、萝卜等，为酱菜腌制提供了丰富的原料；加之秋冬季节时间漫长，气温低，酱菜不易变质。明清时期，德州的“涌合成酱园”，主营酱菜及腐乳，有缸七八百口，并在河西留智庙村（今属河北景县）设分厂。“呈庆酱园”（后改为义和酱园）资金雄厚，有缸千余口。“聚源长号”主营酱菜、调味品及杂货，所产食醋，远近闻名，被称之为“州醋”。清末，德州酱园已发展到70余家。

竹木加工。德州不产竹子，而明清时期德州的竹木加工业却很发达，这完全是受运河影响的。明清时期，为优恤漕运官兵，允许漕船搭载一定数量的私货沿途贩卖，“免其抽税”。明初是每船限带10石，后增至60石，清代便增至150石。江南盛产竹木，价格低廉，因而大多漕船都载竹木沿着运河北上，沿途发卖，这就给德州提供了充足的竹器加工原料。于是小竹器铺便在运河沿岸纷纷涌现，“御河西徙浮桥，立大、小竹竿巷”^①。

德州的竹器业，起步于明末清初，当时只有10余家竹器铺，开设于大西门外运河岸边，均为前店后坊，自编自销，铺前面街，铺西临河。南方漕船带来的竹料，直接在竹货铺西卸货，破好的竹篾可以很方便地放到运河去浸泡。购买原料、加工生产和出售货物都比较便捷，因此“每遇漕船带货发卖，遂成市厘”^②。清末民初，德州竹竿巷商户已达40余家。在长期的编织经营中，德州人摸索出了许多成熟的经验，他们根据各地竹料的特征，进行选购和加工生产。如竹枝多从湖北等地采买；毛竹则多选自张渚。其产品分为：竹篾编织品，主要有磨坊用的水旱筛子、酱园用的酱油篮、糕点铺用的粘果斗、药材店用的柏子筛以及其他筛药用的盛具，另外还有淘箩、方筐、元宝篮、鸡篮、打油圈、筷子、竹帘、竹席等等；鸟笼制

① 乾隆《德州志》卷四《市镇》。

② 乾隆《德州志》卷四《市镇》。

品，主要有圆笼、大方笼、画眉笼、鹌鹑笼等等；竹轿制品，主要有婚娶花轿、轿棍、伞扇、裙灯等等；鞭条制品，主要有供庄户农民以及运输用的鞭尖、三股四股条等。可以说，德州是明清时期运河北段最大的竹器生产基地和销售市场。直到民国以后，津浦铁路建成通车，德州每年由火车从江南输入大约 50 余车皮竹料进行加工，除供应本地外，还行销省城济南、河北以及周边县市等地。

三、商业市镇的崛起

明清时期，我国传统城市已经形成了比较固定的空间模式，以官衙、文庙、仓廩、书院等建筑构成的行政社区是城市空间的核心；为满足城市消费需求而设置的市廛和商业街道，属工商业社区；街道和市廛中夹杂着许多饭馆、邸店、茶馆、戏园，从而构成了服务性社区；庙宇、道观等构成宗教性社区；另外还有园林等公共空间。这些虽有一定界限，但多数是互相混杂。

中国的传统城市首先是区域政治中心、军事重心，人口密度最大，所掌控的社会财富量多，消费水平高，消费量大。德州不仅是京杭大运河上的重要漕运码头，而且是重要的南北陆路交通枢纽，工商繁荣、客商云集、仓储丰富、交易繁盛，“四方百货，倍于往时”。专业街巷的形成是商品贸易发展的结果，反过来它也大大促进了商业、手工业规模的扩大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德州城内外设有民市、军市、马市、羊市、米市、柴市、鱼市、菜市、果市、绸缎市、旧钱市、新钱市、小锅市等，店铺连门，商品琳琅满目，商业贸易非常活跃，逐渐由一个单纯的政治军事中心转变为政治经济中心。

当时，德州最繁华的商业中心，一在北厂街，二在桥口街。北厂系漕运装卸码头之地；桥口系九省御路必经之路。商业社区靠近运河，便于南北各地的货物进入城镇市场，使本地的货物对外输出转运更为便捷。大运河上，各类船只往来穿梭，昼夜不息，有运粮漕船、进出京城的官船、南来北往的客船、货船，熙熙攘攘，热闹非凡，小贩的叫卖声和船工的号子声此起彼伏。白天，河内帆樯如林，夜晚，河上灯火一片，可谓繁盛一时。

德州城内有庙、寺、观、庵、祠、宫、楼、坛、驿等 70 多处；大小牌坊 50 多座；官署衙门 72 所。据乾隆《德州志》记载：德州“庙宇林立，春秋佳日往往演剧赛神，年有定期，谓之庙会。每届会期则商贾辐辏，士女如云，车水马龙，奔赴络绎，极一时之盛”。城内城隍庙有“腊月会”；城外柴市街有“药王庙”；城东南有“耿家庙会”；“城东有“华家庙会”；城西北有“奶奶庙会”。

运河贯通后，运河两岸的县级城市则纷纷开辟通往运河的水陆交通路线，于是出现了许多作为县城与运河连接纽带的中小城镇。这些小城镇得运河交通之便，迅速发展为区域性商业中心城镇，其繁华的程度有的远远超过了其所在的县城。如运河沿岸的郑家口、甲马营、四女寺等都是较大的水运码头，商业发达。这些城镇是纯粹的商业性城镇，主要是承担市场集散的功能。城镇主体是商人、手工业者和从事搬运业、服务业的人员及城镇居民。这些城镇有很强的经济辐射力，是某一县乃至数县对外商品贸易往来的枢纽。作为德州区域经济网

络中的一个环节,起着联系运河区域的广大城市与乡村,扩展运河区域地理范围的重要作用。

集市贸易是明清时期德州商品经济发展的一大突出表现。夏津县令薛正,主政九年,他在县内推行的“走立集场以贸迁有无”^①措施,即是为邑民所称道的德政之一,这说明多设集市,以利贸易是顺民意的开明之举,也是本地农村经济发展趋势使然。到清代中叶后期,夏津县的乡村集市已由嘉靖时的7个发展到30个^②,恩县发展到46个。而“濒临运河,商业繁盛的德州,南门外各街每日一市,百货云集,乡村集市达70余个。城内外设有棉花、绵绸、线子、陶瓷和粮、柴、草、菜、锅、筐以及牛猪羊、鸡鸭鹅兔等集贸市场。绵绸市“每逢三、八日,货卖者俱馆陶、南宫、堂邑人,日出时咸集于此,不下千余匹”;线子市“凡女红所需,每日辰刻线而至者约一二千斤”;马市“日集数百匹”;猪市“日集千余口”;棉花市“在上码头,日上数万斤”。所以,在明清时期,德州城厢集市的发展,在全省中是最为迅速的,而这样的发展速度,无疑是得力于运河漕运和商品流通的便利。

清代中期以后,德州地区已形成一个具有相当稳定性和密度的集市网。交易半径多在3—5公里之间,步行半日即可往返,不误农时,极为方便。德州农村集市,以每旬开市2次最为普遍,即每5天一集。清代,德州地区的集市开频率开始出现每旬开三四次的趋势。康熙年间,德州的州市“每月三、六、九日为期”,“南门外各街每天一市”。恩县,“县城集以一六、三八日为期”^③。夏津县城,“以二、四、六、八、十双日为期”,每旬开市5次^④;平原县城在东、西、南、北四关轮设市集,每旬二七、四九、五十日共6次轮流开市。德州南门、西门外和城内喧哗角,日日有早集。这种天天开张的集市,出现在德州运河区域的城镇,这在明清时期北方农村中是极为罕见的。

从表面上看,德州运河沿线城市的空间结构呈现某种单一性,几个传统政治中心城市基本上是由原来的政治军事社区和新兴的商业社区构成,新兴的小城镇更是清一色的商业城市。但就商业社区和商业城镇的内部结构来看,又都呈现出空间结构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首先,德州运河区域城市商业社区的基本空间形式是街、巷、胡同,中间是或宽或窄的公共通道,两旁是商业店铺。这些店铺有的从事批发,有的为零售,有的批发兼零售;有的专营某一种商品,有的兼营多种商品;有的商品是从外地运来,有的则是自产。旧时德州商业街道数十条,每条街道有店铺数家或数十家。街市名称多与商业活动相关,如小锅市和盐店口街,是德州南北漕运的两个码头,最初因在此卸锅卸盐而得名。

其次,在德州运河区域城镇的商业社区中,分布着大大小小的手工业作坊,这些手工业作坊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规模较大的生产型作坊,其产品出售给商人,转运至全国各地;另一类是规模较小的生产经营型作坊,其产品由生产者直接售出。

再次,由于各地商贾大量涌入德州,带动了德州城市服务业的发展。特别是明清时期,

① 嘉靖《夏津县志》卷五《艺文志》。

② 民国《夏津县志》卷二。

③ 雍正《恩县续志》卷二《輿地志》。

④ 乾隆《夏津县志》卷二《建置志》。

为适应外来商人和其他流动人口食宿需要，邸店、酒楼、茶馆等行业大量出现在德州的商业社区中。运河附近的桥口、北厂、米市、顺城等粮行客栈汇集的市街以及城内的喧哗角，都有相当规模的茶馆。其他街道、街角巷口、大路旁边，也莫不有小茶馆。如清泉居、迎春居、德香居、柳园等都是规模较大的茶馆。

复次，随着商业而兴起的还有娱乐业。德州运河区域城镇的商人会馆大都建有戏楼，有些寺观庙宇中也有戏台或戏楼，还有因喜庆祝寿还愿等临时搭建的戏棚。明初德州城内的城隍庙、火神庙、大王庙等处，都建有祭神演出戏曲的固定戏楼，是一个公共娱乐场所。清末民初，城隍庙正殿东侧搭建起专供剧团演出的戏棚和“国民大戏院”，进德分会处建有“移风社”。另外，茶馆中普遍都设有书场，还有用席棚临时搭建的书场，各种曲艺如大鼓、渔鼓、坠子、扬琴、三弦平调等都在这里演出，武术、戏法（魔术）、山东快书则在露天演出。

另外，德州因地处水陆要冲之地，“舟楫往来，南北各物云集，居人以是居奇至富，声妓之盛甲一邑”^①，船行、车行、脚行、牙行、标行等服务行业遍布于商业社区中。德州“各行贸易俱有牙侩，亦称经纪。凡故衣杂货布段，有客人入市，即睨视随之，不得谋面，先得牙用。觉而脱之，终入其网。此辈约有数百名者”。德州的脚夫称脚子，各有其势力范围。自北厂至桥口为一界，自桥口至上码头为一界，自上码头至回龙庙为一界。“船载止处，各出运货，不相扰乱”，杂粮纸店又有专属的脚子。

四、漕运仓储业的鼎盛

明清时期，伴随着政治中心的北移和经济中心的南移，贯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承担起了漕运的重任，成为明清两代的“生命线”。德州是著名的“仓储漕运之都”，是维系京杭大运河漕运全局的重要一环，是运河沿岸四大漕仓（淮安、徐州、临清、德州）之一。

水次仓是中国古代为转运存储漕粮而在人工或自然河流沿岸设立的粮食仓库，明代是中国水次仓制度发展的最高峰。永乐九年（1411）会通河疏浚后，十三年（1415）运河全线贯通，明廷在陵州仓故址修建了广积仓，即德州水次仓，由户部分司管辖，主要接纳来自淮、徐、临等水次仓转运的漕粮，然后由山东、河南两地的卫所军队运送到通州，即“浙江都司并直隶卫份官军于淮运粮至徐州，置仓收囤。京卫官军于徐州运粮至德州，置仓收囤。山东、河南都司官军于德州运粮至通州交收”^②。

宣德四年（1429），开封、彰德、卫辉粮运德州仓，其后山东、河南皆运德州仓；五年（1430），德州水次仓增建为德州、常丰二仓，储粮规模进一步扩大；六年（1431）实行兑运法后，南方漕粮由民众运往淮安、瓜洲水次仓，然后由卫所官军运往京城。兑运法的实行虽使德州水次仓地位有所下降，但支运法并没有废除，德州水次仓仍然存储大量漕粮。这一时期每年“运粮之数四百五十万石，而兑运者二百八十余石，淮、徐、临、德四仓支运者

^① 政协德城区委员会《德州文史》第四辑。

^② 《明会典》卷二五。

十之三四耳”^①。通过德州水次仓转运的漕粮仍达三、四百万石，有力地支持了明朝的统治。正统十四年（1449）为护仓廩，明廷将建于北厂的德州水次仓、预备仓移于城内。

德州水次仓作为明廷重点建设的仓储，受到了统治者的高度重视。为维持仓储管理秩序，永乐十三年（1415年），明廷在德州设户部监督分司；天顺五年（1461），改为户部管仓分司督理仓务，后在各水次仓或派户部主事出任“监仓”，或由户部员外郎出任“督某某仓储”。自明天顺到崇祯年间，德州共有“监仓”158人。为防止官员久任专权，自宣德至正统年间，监仓官员3年一换；景泰后每岁一人，并成为定制。起初，监仓只是监督粮仓的管理，不直接对仓务进行具体的管理，由德州地方管辖。后来由于“官军横者难治”，方由户部官员直接管理。其具体管理人员有大使1—2员、副使2—4员，弘治年间裁减为每仓大使和副使各一员。另外还有劳役性人员攒典、斗级、修仓夫等。仓大使主要管理水次仓的日常运作；攒典数名掌管漕粮的接纳和输出；斗级数十名负责粮食的日常晾晒和存储，修仓夫上百名负责粮仓的维护和修理。

明初实行支运法，德州仓不仅接纳由江南转运来的漕粮，同时还接收山东、河南等省税粮，然后运送京通粮仓。为更好的保护粮仓，明统治者用仁、义、礼、智、信等用语将粮仓分类，“各仓门以致仕武官二，率老幼军丁十人守之，半年一更”^②。德州作为南粮北运的中转地，每年都有数百万石粮食在这里卸船、入仓、装船或短期储存。正统年间漕粮450万石，江南粮兑运280余万石，德州及淮、徐、临四仓支运170余万石，四仓所储支运之数约占漕粮总数的30—40%。成化二年（1466）“以各处折粮银四万两命官平余米粟，以实临清、德州水次仓”。

成化七年（1471）实行长运法后，支运法逐渐废除。德州及淮、徐、临仓原支运的漕粮也全部改在水次交兑。虽江北一带交兑不尽的漕粮，仍由以上四仓收储转运，但德、临仓转运作用削弱，只存预备米19.11万石作为填补漕粮缺额所用。遇有灾荒，受灾地区应缴纳之粮可暂时停免，而于邻近地区凑补，待丰年归还。如各府均受灾害，无处凑补，则可动用德州、临清仓所储之粮，运送京师，务使漕粮岁额足400万石。由于德州仓存预备粮过多，年久不用，以至于谷多腐朽。于是于正德二年（1507）令运军于德、临二仓，年支运35万石至京。此后，德、临二仓储粮渐少，而京、通二仓粮多不能容。因此在扩建京、通二仓的同时，令德、临、河西务三仓各废三分之一。到万历时，德州、临清仓均有储粮，而淮、徐仓无米，于是规定德州、临清仓储足50万石，其余存入淮、徐二仓。万历三十年（1602），漕粮多折银交纳，漕运京师的粮食仅为138余万石，京城官军以及边军给饷改为银米兼支，京城以及北边所需粮食多由商人贩运，使德州仓场的规模缩小。天启、崇祯年间由于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尖锐，加之统治者疏于对水次仓进行管理，到清初时原明代的德州水次仓倾毁倒塌。

清沿明制，设“仓大使”管理水次仓，德州仓大使共有59人，其中康熙年间7人。清

^① 《明史》卷七九《漕运》。

^② 《明史》卷七九《漕运·仓库》。

初亦设水次仓监督，户部分司德州仓监督，康熙十八年（1679）并入山东督粮道。

为加强漕运管理，明清统治者建立了专门的漕运管理机构，成立专门的漕粮运输组织，以保证准时足量地把漕粮运送到京城。明代在德州设有管理运军的把总、卫指挥使、指挥、指挥使、千户、百户、总旗、小旗等。在运输过程中，把总或指挥充任领运之官。同时还设置由户部侍郎、郎中或御史充任的攒运官，负责督促漕船按期开行；由户部主事充任的监兑官，督察征收漕粮；济南府兑粮公馆，负责就地征集所属各州县漕粮交户部监督分司入德州仓；莱州府通判，负责押运漕粮。漕运军卒 1100 人，分别来自德州正卫和德州左卫。为保证漕粮安全准时，明统治者制定了漕粮开仓兑运的时限，明中期以前规定 12 月征完漕粮，运军一到便开仓兑运，隆庆四年（1570）后定为 10 月开仓，11 月兑毕，12 月开船起运；漕船至京的时限，江北、江南以及过江支兑的漕船须分别于每年的 7 月 1 日、8 月 1 日、9 月 1 日前抵达京城，不能按时到达的船只，粮入德州仓，以免阻碍后来船只。

清朝漕粮运输的方式大体沿用明朝后期的长运法，但漕运管理机构在明代的基础上更加完备。顺治元年（1644）清朝便设置了漕运总督，从一品，驻淮安。德州设粮道一人，协助漕督管理运军以及漕运事务。江南粮道押运漕船过淮后便可回任，山东、河南粮道须押粮抵通州交卸。当时德州设“监兑官”负责监督漕粮交兑，查验漕粮成色数量。设“押运官”，督促押运漕粮，约束运军。“领运官”，由德州卫、德州左卫守备、千总分别担任。“催运官”，漕船入境后，即按规定的时日催促漕船行驶，不使滞留。

明清两代，贯穿南北的京杭大运河承担起漕运的重任，对国家政治和经济产生了直接影响。德州作为运河岸上的四大漕仓地之一，不仅接纳南方和山东、河南转运来的漕粮、寄囤延期的漕粮，存储和转运的粮食达几十万石到数百万石，起着调节粮食余缺、满足京城供应的功能，而且在战时也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如万历二十年（1592）十二月，为支援朝鲜抗倭战争，德、临二仓各发仓粮 5 万石供应援朝明军，使中朝联军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在漕运期间，大量漕船、民船和商船在德州停留贸易，给德州带来了兴盛与繁荣。

清代晚期，由于运河水源枯竭，泥沙沉淀。防河工程连年失修，运河阻滞，粮道梗塞，南方漕粮部分改行海道，致使德州商业大受影响，昔日的商贸繁华景象已不复再现。津浦铁路建成后，德州与津、沪等大城市直接联系起来，在客观上讲，对发展工商业有了更加有利条件，但由于军阀混战，工商业却未真正繁荣起来。可以说，德州的兴衰与运河的兴衰联系在一起，与运河的命运紧密相连，她既见证了运河的辉煌，也经历了运河的沧桑。

第四节 明清时期德州区域文化的昌盛

明清时期德州区域文化迎来了发展的最高峰，学风浓郁、教育发达，名士辈出，所谓“人文飙起，名卿蝉连，实甲山左”^①，涌现出董伦、葛守礼、田雯、卢见曾、卢荫溥等众多举

^①胡朴安《中华全国风物志》上编卷一，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3 页。

足轻重、影响深远的文化名人和德州田氏、德州卢氏、德州程氏等名门望族。正是他们的文化创造，给德州平添了一份浓浓的文化气息。

一、“贝川先生”——董伦

董伦（1324-1403），字安常，明朝恩县董家堂村（今德州市武城县武城镇蒋王庄）人，早年侨居宛平。

董伦生于元朝泰定年间，1368年明朝建立时已45岁，一生历元明两代。由于元朝统治者对汉人以及读书人实行压制政策，把汉人列为三、四等人，把儒者列为社会职业中的第九等，从而加深了汉人与蒙古族、统治阶层与知识精英阶层的矛盾与对立，读书人拒绝与元朝政权合作，纷纷归隐山林。在此背景下，尽管董伦自幼受家族影响饱读诗书，遍览经史子集，富有才学，也只能“隐居山林间，布褐藜藿，淡然自乐”。他性情质朴刚直，品学俱佳，在当地享有很高的声誉而“从学者甚众”。汉唐以来，今武城一带属广川贝州，故被世人尊称为“贝川先生”。

明洪武十五年（1382），明太祖朱元璋特招五十九岁的董伦至南京，任赞善大夫，侍从懿文太子朱标。董伦之所以如此被器重，原因是已故翰林院侍讲学士张以宁生前的推荐。侍从太子是至为荣耀和大有前途的事情，早在洪武十年（1377），太祖就曾下诏“政事并启太子处分”，初入仕途就侍从太子，足见太祖对董伦的器重。董伦入仕后上书策对，“陈说剴切”，很受太祖赏识，不久晋升左春坊大学士。

洪武二十五年（1392），作了二十五年储君的太子朱标病逝，董伦出京任河南左参议。董伦举贤任能，上疏陈弊，威望日隆。洪武三十年（1397），董伦因受牵连，被贬为云南教谕。当时云南初设学校，办学条件极差，尤其是当地人不愿读书，不重视教育，给兴学立教带来了很大困难。董伦此时已年逾古稀，坚持读书，以身教化，一时“人皆向学”，从学者甚众，当地风气为之一变。

1399年，明惠帝朱允炆登基，改号建文。董伦被从云南召回，出任礼部侍郎兼翰林学士，与方孝孺“同侍讲筵”，为惠帝讲经论史，甚得宠信。皇帝曾赐之御书“怡老堂”匾额、髹几、玉鸠杖，以彰其功德。永乐年间主持编纂《永乐大典》的江西才子解缙，建文初年被奸人谗害而贬为河州（今兰州临夏）卫吏，经董伦力荐，解缙得以重回京城并任翰林待诏，两人也结为忘年之交，解缙《和董安常学士南还》诗其三、其四云：“莫将琴剑老京华，到处溪山即是家。惟有熏风能解愠，不辞相伴到天涯。”“羁怀常是忆东华，梦想金陵即是家。孤寝未酬明月落，只随红日转天涯。”“到处溪山即是家”的安慰，“只随红日转天涯”的牵挂，字里行间充满了对董伦的敬慕。

明初，藩王势力强大，明惠帝主张强力削藩，意图把藩王手中的权利收归中央。秉性忠厚又极富政治远见的董伦，经常规劝惠帝与诸藩王亲善和睦，不能操之过急。惠帝没有采纳他的意见，由此引发了长达四年之久的“靖难之役”，最终帝位被朱元璋的四子朱棣夺取。

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方孝孺拒绝为朱棣草拟即位诏书，刚直不屈，孤忠赴难，被

诛十族。董伦此时年已八十，明成祖没有对其进行过多责难，只是命其致仕还乡，董伦不久病逝。

二、三朝元老——葛守礼

葛守礼（1502-1578），字与立，号与川，晚号疏翁，德平（今德州市临邑县德平镇葛老庄）人，历任彰德推官、兵部主事、礼部主事，河南提学副使、山西按察使、陕西布政使、右副都御史、河南巡抚、户部侍郎、吏部侍郎、礼部尚书（南京）、户部尚书、刑部尚书。一生历经嘉靖、隆庆、万历三朝，被誉为三朝元老。

葛守礼出身农家，自幼贫而好学，明嘉靖七年（1528）参加乡试，取得第一名（解元），第二年进京参加会试、殿试，又高中进士。葛守礼从此步入仕途，被朝廷任命为河南省彰德府推官。推官是专门掌管勘问刑狱的官员，葛守礼思理清晰，善于断狱，甚至能“一讯即得”^①，令府县同僚们无不惊服。河南有一巨盗被缉拿归案后，诬称受某巨富人家指使，此案株连无辜一百多人，葛守礼查明事实，将受到诬陷的人们全部释放。以前主管此案的官员不服，给朝廷的御史写信攻击葛守礼，朝廷派员前来核查。葛守礼将巨盗口供、证据上报御史，陈清案情，御史信服。彰德府是赵王朱厚煜的封地，赵王令当地官员穿朝服向自己祝贺，百官摄于赵王的权势，不敢违命，唯独葛守礼坚守礼制，正色拒绝。不久，葛守礼调回京城任兵部主事，后补礼部主事。在职期间，葛守礼坚持原则，廉洁奉公。宁府宗人因罪入狱，刚出狱即请封爵，交城、怀仁、襄垣三王没有嫡传后人，其近支也请封继承爵位，为此他们大肆向礼部官员行贿，由礼部尚书入阁任宰相的夏言和继任的礼部尚书严嵩受贿后都为他们请封，当时葛守礼任礼部仪制郎中，依制坚决予以驳回。事发后，查出赂银10余万两，有关部门把礼部受贿人的名字列具出来，唯独没有葛守礼的名字，世宗“由是知守礼廉”。葛守礼清正自守的品格在其早期政治生涯中已经显露出来。

嘉靖（1522-1566）前期，葛守礼先后任河南提学副使、山西按察使、陕西布政使、右副都御史、河南巡抚等职。他兴办学校，纠察贪吏，劝课农桑，督办水利，做了大量利国利民的好事。嘉靖后期，严嵩任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学士、上柱国、兼任内阁首辅，成为朝中第一权臣。他结党营私，排斥异己，朝政日非。嘉靖二十四年（1545），严嵩的儿子严世蕃晋升太常寺尚宝卿，满朝文武无不携礼前往严府祝贺，有同僚邀请葛守礼同往。葛守礼此时已经升任陕西布政使，但去严府庆贺时只礼节性地携带了一块丝帕当礼品。嘉靖三十二年（1553），吏部尚书万镗被皇上罢官，世宗准备提拔葛守礼任吏部尚书，葛守礼上疏婉言谢绝。世宗下诏公开推荐，严嵩想趁机任用私人，抢先推荐了屠侨，群臣摄于严嵩淫威，保持缄默，只有葛守礼提出南京吏部尚书周延最合适。世宗最终以曾反对过严嵩的李默为吏部尚书。

葛守礼对严嵩任人唯亲、滥用私人的做法深恶痛绝，屡次上疏弹劾严嵩挟私专政、蒙骗皇上、培植亲信的劣行，于是严嵩将葛守礼排挤出北京，调往南京任吏部尚书，明升暗降。

^① 《明史》卷二一四《葛守礼传》。

后来，严嵩亲信吏部尚书李本考察廷臣，秉严嵩旨意，把葛守礼列为下等。葛守礼愤然辞官，在家乡闲居十余年。世宗后来问起“守礼安在”时，严嵩等人以“老病”回答，世宗听后，叹惜良久。

1567年，穆宗即位，是为隆庆元年。葛守礼被起用为户部尚书。当时，“起科太重，征派不均”，中原、华北等地人民不堪重负，背井离乡沦为流民，明朝的财政陷入了危机之中。葛守礼等人制定了“国计簿式”，大大加强了对财政的监控能力，《明史》称赞他是明代为数不多的“负经济之略者”。

隆庆年间（1567-1572），朝中大臣争权夺利，尔虞我诈，官风败坏至极。当时，大学士高拱与另一大学士徐阶不和，相互攻讦，首辅徐阶弹劾高拱，竟有二十八人跟随上疏。户部侍郎徐养正、刘自强与高拱有旧交，一起敦请葛守礼上疏弹劾高拱，葛守礼予以拒绝。隆庆三年（1569），高拱终于将徐阶挤下台去，遂以葛守礼为刑部尚书。后高拱又被冯保、张居正赶下台，葛守礼出面主持公道，使高拱未遭大难。不久，因在处理世宗晚年宠信道士问题上被给事中赵奋攻击，葛守礼遂改任左都御史。隆庆四年（1570）二月，穆宗皇帝再一次起用葛守礼为刑部尚书。十一月，葛守礼改任都察院左都御史。高拱再次为相后，徐阶的三个儿子胡作非为，抢夺民田，被老百姓联名上告。高拱下令将徐阶的三个儿子一齐逮捕入狱，想治以死罪。葛守礼顾全大局，正言相劝，高拱只好免去徐阶三个儿子的死罪，只将他们充军流放。

万历元年（1573），神宗即位，为了抑制司礼监宦官冯保日益膨胀的权势，高拱上疏“请求夺司礼监之权，还给内阁”。而冯保依仗太后的支持，公开与高拱抗衡。在两人斗争的关键时刻，内阁次辅张居正倒向冯保，将高拱免职遣返原籍。张居正因此升为首辅。不久，又发生了王大臣逆谋案，张居正想借此致高拱于死地，株连高拱九族。危急时刻，葛守礼挺身而出，与吏部尚书杨傅一起及时阻止了张居正，从此引起了张居正的忌惮。神宗万历三年（1575），厌倦了官场尔虞我诈的葛守礼以年老为由退休返乡，明神宗准允，加爵太子少保。葛守礼离开京城的那一天，张居正亲率六部大臣设宴送行，表达了对葛守礼高风亮节的敬重。

归里后，葛守礼筑宜疏园，读书、饮酒、赋诗，聊以度日。葛守礼晚年自号“疏翁”，并对“疏”有过独到的见解：“若疏狂不过放浪形骸，若疏卤不过颠倒衣裳，若疏慵不过日高睡起。言语疏则气固，饮食疏则脾欢，忿闷疏则心静，思虑疏则神完。”^①这恰与他一生行止高度契合。

万历六年（1578），葛守礼病逝，享年77岁。葬于故里（其墓在德平镇东北3里，鬲津河南岸）。神宗辍朝三日，以示哀悼，追赠太子太保，谥“端肃”。世存《葛端肃公文集》10卷。

三、来禽馆与邢氏兄妹

邢侗（1551-1612），字子愿，号知吾，又号来禽生，自号啖面生、方山道民，晚号来禽

^① 葛守礼《宜疏圆记》，康熙《德平县志》卷四。

济源山主，明朝书画家。山东德州临邑县万柳村（今山东省德州市临邑县邢柳行村）人。

临邑邢氏本是河北河间府望族，明初奉旨移民落籍临邑。邢侗曾祖父邢政为岢岚州知州，祖父邢溥为博野县教谕，伯父邢如默为嘉靖八年进士，曾任汉中知府，父邢如约为德王府御医，母万氏，出身德平望族名门，深通经史。邢侗自幼聪慧发奋，7岁就能作“擘窠”大书。13岁作雅宜（王宠）楷书。14岁时已阅尽家中藏书，17岁被督学邹善选拔至济南读书，18岁被拔为贡生，20岁中举人。明神宗万历二年（1574），24岁的邢侗一举考中进士。主考官于慎行看了邢侗的文章后，叹道：“子，天下才，徐淮以北固无此。”第二年，授南宫（今河北南宫）知县。邢侗在任五年，治县如家，不加征，兴学校，严乡约，清理积案，抑制权贵，“大小狱察之以情，豪夺小民者，虽权贵居间，上官示决，不徇私情”，理政之余，纂修《南宫县志》，离任时县境内“野无不耕之田，下无废学之士”，万历皇帝也称其为“梗骨之臣”，老百姓对他十分感激，称他为“邢父”。

万历八年（1579）邢侗擢升为监察御史。万历九年（1581）出按河东，整顿盐政，彻底解决了久困官民的盐税问题，当地民众为之立生祠。万历十一年（1583）改任三吴（今苏州、常州、湖州一带）巡按使，在任上计擒为害民众二十余年的云间大盗张邦陵。针对倭寇侵扰沿海，邢侗草拟对策十数条。第二年升任湖广参议，督漕米，改粮税，民众安定。每每离任或回乡省亲，邢侗从没有贵重物品携带，凡为官之处，邢侗都清明廉政，皆有治绩。

万历十四年（1586），邢侗升任陕西太仆寺少卿，官秩四品，仕途似乎一片光明。但当年五月，36岁的邢侗却突然辞官还乡，过起了隐居生活。其实，邢侗的“急流勇退”是有缘由的。明朝中叶，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帝王“慢弃神器，王纲不守”，大权旁落，宦官弄权，大臣勾心斗角，世风日下，邢侗对时政渐渐心灰意冷，再加上其生性耿直，为官期间，不附权势，不畏奸佞，得罪许多朝中宠臣，使仕途蒙上了阴影，邢侗遂以“亲老归养”为由，三请辞官。

还乡以后，邢侗竭尽家资修筑“涕园”，造景26处。26景中有一景名为“来禽馆”，是邢侗读书和写作的地方。邢侗习书最尊王羲之，尤爱其草书《十七贴》，“来禽”一词就出自王羲之草书《十七贴》，故将习书作画处命名为“来禽馆”。馆内刻有王羲之画像及其书贴数种，其中以《唐人双钩十七贴》最为世人所珍，“来禽馆”因此名扬四海。此外，邢侗还监刻有《澄清堂贴》、《兰亭序》、《黄庭经》等7贴，统名为《来禽馆贴》。

邢侗在“来禽馆”攻读习书、精研碑帖诗画26年，成就斐然，与董其昌、朱万钟、张瑞图并称“明代书法四大家”，时人有“南董北邢”之谓，事实上邢侗各体兼擅，而董只工方寸行书。邢侗书法“笔力矫健，圆而能转”，行草、篆隶，各臻其妙，而以行草见长，晚年尤精章草。其画清淑淡雅，多为兰竹窠石，艺术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水平。皇室、外使纷纷求购他的作品，一时号为“珍品”。在朝鲜，他的作品“与黄金同价”。《明史》上说：“东藩使者入贡，愿少留，买邢书去。”他自己称：“与右军书坐卧几三十年，始克入化。”明史孝先在《〈来禽馆集〉小引》中说：“侗法书工诸体，章、怀、柳、索、虞、米、褚、赵，

规模肖像，咄咄逼人。”《游鹤堂墨藪》则评价说：“近代邢子愿书，精研二王，笔法恒仿佛《十七贴》笔意；即其卷素所书，迹多述王帖，可谓极意临摹者矣。宋、齐而下，书法衰飒，魏晋风轨扫地者，已非旦夕之故，乃公（侗）独哀然辟除陋习，追迹逸少，无论其精旨谓何，即其矢志，则已超人一等矣。”^①

邢侗传世作品有墨迹刻石《来禽馆帖》；书迹有《临王羲之帖》、《论书册》、《古诗卷》、《临晋人帖》等。其中《论书册》著录于《石渠宝笈三编》；《仿王蒙拳石图》扇页，现藏故宫博物院；《文石图》轴，现藏南京博物院^②。《石菖蒲图》扇页，现藏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

邢侗以古文辞名世，最善班、马之学，晚年好作骈丽语。在方志撰修方面，邢侗早年主纂《南宫县志》，世评“核而文，严而直，信史笔也”。又应聘纂修《武定州志》，体例完备，论述精辟。还应临邑知县刘承忠之聘，撰修《临邑县志》。

邢侗一生勤于著述，有《来禽馆集》二十九卷，收入《四库全书》。晋江友人黄克缵说：“余时与（子愿）唱和，每诗筒至，辄私念：‘此中有佳句’，如尹婕妤望见邢夫人，自痛其不如也。”诗作追随汉魏古风，颇有“建安风骨”。其五言、七言诗，宗法唐人，出入李、杜、王、岑之间，“高古典雅，每每工而拙用之”。

万历四十年（1612），邢侗辞世，享年62岁。葬于临邑城西南八里的大卢家。明熹宗时，礼部尚书李维楨所作的《明中顺大夫陕西太仆少卿知吾邢公墓志铭》，今尚存。1986年临邑修建了邢侗纪念馆（公园）。

邢慈静（1573-1640），号蒲团主人，邢侗胞妹，明代著名女书画家、文学家。

邢慈静自幼生长在诗书仕宦之家，与兄邢侗皆为父亲续娶的德平万氏所生，十兄妹中，她排行第八，自幼聪慧，垂髫之年便过目成诵。孩提时代学书就深受兄长影响，与工诗的九嫂杨氏（太子太保杨巍之妹）为闺中密友，少女时代便诗词书画无所不精，深得母、兄钟爱，成人后，书画与兄齐名。清《武定州志》载：“慈静，博学善属文，诗有清致，书画俱称绝品，与兄齐名。”清《临邑县志》、《邢氏家乘·外传》有相同记载。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载：“母万，爱慈静甚，必欲字贵人。年二十八，始适武定人大同知府马拯。”《临邑县志》载慈静出嫁时，对九嫂道：“八月仲秋辞九嫂”，杨氏则应声答曰：“九日重阳盼八姑。”表现出姑嫂间的亲密和才气。

慈静婚后夫妻感情深厚，家庭和睦。马拯，武定州马家堤口村（今惠民县城西北兰里）人，回族，明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为官三十年，两袖清风，历官平阳府同知、大同知府、山西副使、辽东宁前兵备、广东右布政使，万历四十四年（1616）迁贵州左布政使，慈静随往。黔地生活异常艰苦，夫妇二人“败石支床，挡木为案，茶档毁耳，药灶折梁，匙箸长短参差”^③。半年后，马拯中瘴毒不幸卒于贵阳任所。邢慈静断发毁面，一恸而绝，三日乃苏，携幼子扶柩，沿水陆二千里北归，历尽千难万险返回故乡，葬马拯于武定府马家堤口，邢慈

① [明]周之士《游鹤堂墨藪》卷二，崔尔平主编《明清书论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版。

② 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有同样一幅，纵141厘米，横51.2厘米，似为摹本。待考。

③ [清]李衍孙《武定明诗抄》卷二。

静有诗哀悼曰：“当年若稳隆中卧，不到秋风五丈原。”她在著名的《追笔黔途略》中描写的孤儿寡母、单帆孤舟、飘泊在危山险水途中的艰难历程，催人泪下。慈静写了《为夫请恤典疏》赴京请恤，文中列陈先夫勤政之状和个人遭逢之伤痛，言辞真切，万历皇帝阅后为之落泪，当下准恤赐祭，追封马拯太常寺卿。葬夫武定后，慈静便携幼子落藉临邑。

此时，邢家已经败落，父母、兄长、九嫂杨氏皆已谢世，邢慈静独撑门户，艰难度日，抚育幼子成人。邢慈静中年丧夫，晚年丧子和爱孙，身心受到巨大的创伤，生活十分凄凉。平日寡居事佛，自号“蒲团主人”，以书画诗文自娱。

邢慈静在书法方面颇有建树。在明代女书法家中，邢慈静名最著，她师今追古，博采众长，究帖之穷。她擅长楷书，尤以行书见长，其作品妙丽而有姿致，多章草笔意，格调在晋人之间，起落、结字颇类其兄。钱谦益《列朝诗集》云其“书法酷似其兄”，《临邑县志》、《明史》均有她“善仿兄书”的记载。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和发展，她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其晚年刻有《之室集贴》、《自书杂诗》，笔法婉劲、秀拔、浑庄，现代大书法家于右任将她的书体编入《标准草书》。《式古堂书画考》载有她的纸本《自述诗帖》，今苏州博物馆亦藏有她署款为“天启甲子花朝书于雪斋中，蒲团主人邢慈静”的墨本真迹。她的绘画以山水、人物、花鸟为主，尤善作观音。她以泥金作“莲瓣观音”，醇厚流畅，栩栩动人，后被清乾隆内府收藏，录入《秘殿珠林目录》，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济南市博物馆藏其《山水册页》八幅，青岛市博物馆藏有其《白描罗汉》，故宫博物馆、上海、安徽博物馆等亦藏有其真迹。

文学方面，慈静诗文兼擅。有散文《追笔黔途略》等两篇和《非非草》、《兰雪斋集》两部诗集共41首诗遗世，其中《非非草》收入《明史》，且两部诗集均被钱谦益收入了《列朝诗集》。清初渔洋山人王士禛称其诗“有夫子气”，并信手写下了《论诗绝句》：“来禽夫子本神洁，香茗才华未让兄。徐庾文章建安作，悔教书法掩真名。”其诗不事雕琢、雅净清新，真挚别有情韵，有易安之风，晚年寡居，诗风一变而为悲苦寂寥，还透着几分禅机。王士禛兄王士禄不仅将《追笔黔途略》收入自己编纂的《燃脂集》中，而且称其“文笔古高，存斑惠姬之风”，大加赞赏。

四、“人文飙起”——田雯与“山左”诗派

（一）“德州先生”田雯

清代中前期，德州地域文化发展迎来了又一高峰期，作为地域文化突出代表的望族与人才层出不穷，可谓甲族相连，名家辈出，人文飏起。尤其是清初的德州诗坛，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诗人，卢世漉、田雯、谢重辉、田霖、冯廷樾、卢见曾、田同之……，皆为清初山左诗派的生力军。他们中最为杰出的当属田雯。

田雯（1635-1704），字纶霞，又字紫纶，号山姜，又号漪亭，晚号蒙斋，清康熙朝大臣，著名诗人，济南府德州（今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吕家街）人。

明崇祯八年（1635）五月，田雯生于桑园（今河北吴桥县桑园镇），时父亲田绪宗正在

桑园设馆教读。田家为德州的书香门第，父绪宗为清顺治九年进士，母张氏“通诗、春秋传，能文”，著有《茹荼集》，文化修养极高，位列《清史稿·烈女传》第一人。田雯十二岁中童子试第一，开始崭露才华。“年十六，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遂试第一。”^①

田雯 20 岁时，田家发生重大变故。父亲田绪宗正月离德去浙江丽水赴任，七月卒于任。田雯陪母亲张氏千里迢迢至丽水处理后事，扶柩返乡。从此，身为长子的田雯，在母亲张氏的协助下，开始独立支撑门户，此后的几年里，屡遭强族、豪戚、恶奴之欺，历尽艰辛，家道逐渐中落，备尝人情冷暖。

田雯 26 岁，乡试中举第八名。康熙三年甲辰（1664），田雯 30 岁，殿试中二甲第四名，进士及第，33 岁田雯才被授予内秘书院办事中书舍人，从此踏入仕途，先后历官户部福建司主事（正六品）、云南司员外郎（从五品）、署户部江南司郎中（正四品）、工部营缮司郎中、工部虞衡司郎中。这期间，田雯虽然官职屡有升迁，甚至还曾被康熙皇帝三次召见于瀛台，但官职一直在“郎”官范围内，并未有多大实权，因此他自己也不时感叹“十年为郎”。

康熙十九年（1680），田雯 46 岁，升提督江南学政按察使司佥事，开始步入官场高层。学政任上，田雯修复书院，制定条例，“所取士多异才”，为朝廷选拔了大量优秀人才。田雯经常到书院为诸生讲经，每临按试，他都轻车简从，“从二骡、二仆随之，戒有司勿供张，自市蔬菜，脱粟以食，远近称之”^②。田雯政绩尽管突出，届满却受到地方督抚的忌劾而难以离任，最后得力于新任总督于成龙、江宁巡抚余国柱的保护，才顺利卸任归里。50 岁改任湖广湖北督粮道布政使司参议，田雯到任后，按朝廷要求，十日内筹办荆州兵粮六万石。针对存在的种种弊端，他厘定规章、明法纪，革除陋习陈规，粮道得以畅通，“上益才”，得到皇帝的称赞，52 岁应诏回京，补授光禄寺少卿，升大理寺寺丞，再升鸿胪寺卿（正四品），卿寺三职的变动，为时不过一月有余。次年补授江宁巡抚（从二品），成为总理粮储、提督军务的地方大员。离京前，康熙特赐鞍马等物，并“赐宴于瀛台，命内大臣陪宴”^③。田雯到任后，面对灾难重重的百姓，向朝廷连上五疏，请求减免江宁贡米，停止在当地购粮，动用国库钱财疏浚运河，并减赋税，免铜课，所奏都一一得到朝廷批准。54 岁改任贵州巡抚，并兼理湖北川东等地军务。由于贵州地处边远，时值吴三桂叛乱，官员贪暴，黔地千疮百孔，民不聊生。黔境内苗民因生活等各种原由，常常起事犯案，提督拟以武力会剿，田雯据理分析会剿的利弊得失，主张“犯则制之，否则防之而已，无庸动众劳民”^④。力主以防代剿，注重教化，与此同时整顿吏治，“痛戒有司毋虐苗生事”，从而避免了一场血腥的屠杀，争取了民心。在黔五年，田雯除了积极整顿吏治、奖励农桑、轻徭薄赋外，还致力于当地文化建设。他主持重修了甲秀楼、诸葛亮祠、王守仁祠，修葺了龙场书院，可谓政绩卓著，“因有翰林之选，且有诗人之彦”，文化落后的贵州得以诗书流播，文化渐兴。贵州各族人民对

① [清]田需《田雯行状》，刘金鑫主编《冯惟敏冯溥李之芳田雯张笃庆郝懿行王懿蓉年谱》，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19 页。

② [清]赵尔巽《清史稿》卷四八四《文苑·田雯》，中华书局 1977 年版。

③ [清]田雯《蒙斋年谱》，清德州田氏丛书本。

④ [清]田雯《蒙斋年谱》，清德州田氏丛书本。

他的德政十分感激，称之为“德州先生”。后来他因丁忧回乡时，“黔民送者百里不绝”，他离任贵州以后，百姓争相“聚资”为他建造了祠堂，以示纪念。

康熙三十二年（1693），田雯59岁，升补刑部右侍郎（正二品）。62岁，田雯奉命祭告嵩山、淮渚、济渚，迁刑部左侍郎。65岁调户部侍郎，以左侍郎管右侍郎事，管宝泉局，督京省钱法。著名戏剧家孔尚任时任宝泉局监铸，田雯是孔的顶头上司，关系密切，因而常索阅《桃花扇》手稿。“少司农田纶霞先生来京，每见必握手索览”^①，促使孔尚任加快了《桃花扇》的创作进度。是年，《桃花扇》完稿。66岁，与于成龙等督催高堰工程。

康熙四十一年（1702）正月，田雯因病乞假回原籍德州。十月，康熙南巡途经德州，驻蹕田雯山姜书屋，赐田雯《甲子次德州五言诗》绫一幅，诗人献旧刊《山薑诗选》、《长河志籍考》、《黔书》，得御书“寒绿堂”扁额。69岁，康熙巡视河工至德，田雯恭迎三十里外。夏，山东水灾，田雯捐谷六百石济灾。康熙四十三年甲申（1704）二月二十三日，田雯卒于德州故里，葬于州城东南阳胡店村（今德州市经济开发区抬头寺乡），享年70岁。

（二）“奇丽”诗风

田雯是清初诗坛的杰出诗人。卢见曾《国朝山左诗钞》：“先生学博才赡，所为诗如万斛之泉随地涌出，不择细流。早与十子并驱，晚年诸子凋零，独为海内所宗。王钝翁先生序其诗，谓与渔洋相颉颃。”卢雅雨作为田雯的同乡，距其生活年代不是很远，所言田雯晚年在“诸子凋零”的情况下，“独为海内所宗”应为中允。汪婉则认为田雯诗作达到了与渔洋“颉颃”的境界。即使是官方态度，也认为“其名虽不及士禛，然偏师驰突，亦王士禛之劲敌也”。嘉庆朝山东学政张鹏展在《国朝山左诗续钞》序中，将田雯与王士禛、宋琬、赵执信并称，钱仲书在《谈艺录》中称田雯是清初渔洋之外的山左“名家”。

田雯是康熙诗坛的“金台十子”之一，他与王士禛是清初山左诗坛的两位著名诗人，时称“齐鲁二贤”，有“文峰两地峥嵘甚，试看嵩山与华山”（康熙三十五年，田雯奉命祀嵩山，王士禛祀华山，故言）的说法。《古欢堂诗集》有诗768题1389首。记游、风物、山水、怀古、酬答、悼亡、抒怀及讽刺，无不涉及，取材极其广泛。田雯作诗推崇欧、苏、黄、陆等宋代名家，诗风雍容揄扬，纵横奇丽，构思灵活多变，善于标新立异，另辟蹊径，自成一家。《清史稿·田雯传》称：“康熙中，（王）士禛负海内重名，其论诗主风调。（田）雯负其纵横排禛之气，欲以奇丽抗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雯则天资高迈，记诵亦博，负其纵横排禛之气，欲以奇丽驾士禛上。故诗文皆组织繁富，锻炼刻苦，不肯规规作常语。”“雯才调纵横，沿几社之余风，以奇伟钜丽自喜”，同为“金台十子”的同乡好友谢重辉也称：“我友田生称好奇”。可见，“奇丽”是对田雯诗歌审美风格的总体评价。

田雯强调欲达到诗歌之奇，作家本人要奇，重视诗人性情的修养。《稼雨轩诗序》云：“今夫人不奇则诗必不工，诗不工则可以弗作。”田雯本人就是有独特个性的诗人，追求新奇，才思超绝。田雯自己就说：“我生嗜好与俗殊酸碱”。

^① 《中国文学史参考资料简编》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23页。

就诗歌本身而言，要达到“奇丽”的诗美风格，首先要讲求诗歌艺术的独创性。在诸种体裁中，最能体现其创作个性的是古体诗。田雯在《挽石楼二首序》中说：“诗要做出是我向来所未见者，才是好诗。”其古诗《白水岩放歌》就是一首古今罕见的九言体，全诗22句，从形、声、色各个角度，运用对比、夸张、比喻、神话乃至议论等多种艺术手段，写尽了庐山瀑布“何如”、“云垂烟接”的黄果树大瀑布之奇美。《袁罗山五百字》全诗共用了18个“者”字、28个“如”字，组成排比句式，铺张扬厉，联想丰富。

田雯对诗歌的立意与词语都很讲究。《兼隐堂诗序》：“诗变而日新，而造语命意必奇，皆诗人之才与学为之也。夫新非矫也，天下事无一不处日新之势，况诗乎！”^①田雯认为，诗歌应是“日新”的，因为社会生活“处日新之势”，诗歌作为情动于内而发乎外的艺术，其命意也应是“日新”的，但“新”不是矫情做作，而是指要有新鲜活泼的生气，讲究“奇”，也不是追求怪诞，而是指要有巧妙神异的构思和不落俗滑软熟的表现方式，这些主张是非常有道理的；但为了增强新奇之效，田雯大量使用奇字、生僻字，甚至专门收集、运用，虽时有“短钉”之讥，但仍认为这是“雅怀复古”之体现，可见田雯争奇好胜之追求。这样做在一定程度上不可避免地损害了其诗歌的魅力和传播。

清初诗坛，山东籍诗人大放异彩，正所谓“本朝诗人，山左为盛”^②。田雯诗风之奇丽，崇尚“奇丽”的审美风格，给康熙朝以“神韵”为主流的诗坛带来新人耳目的美感，形成与“神韵”不同的格调，成为山左诗学的另一面旗帜。田雯的诗追求奇丽之美，并力求出新，自成一家，较早地体现了清代诗歌的个性觉醒，为清代诗歌理论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并以其坚实的创作实际，促进了清朝诗坛美学风格多样化的形成。

徐世昌在《晚晴簃诗汇》的《诗话》中对田雯不依附“神韵”而趋向“奇丽”的论断应该是恰当的：“与渔洋并时同乡里，而诗派特异。论者遂欲以奇丽驾渔洋上。昔人本学问为文词，各及其所诣。于同时名宿，不相附丽、不相訾警，盖自信皆足以传，初无取于相竞。持此论者，未为知言也”^③。

（三）诗书继世数田家

在德州名门望族中，田氏仕途不算显赫，但诗风赓续，绵延数世，其成就之高，于清代诗坛影响之大，德州各家无出其右者。

田氏诗学除田雯成就之外，诗风彰显自第六世始。田绪宗不以诗名，其为文尚朴实，重实用，“有归震川风味”，有《筮仕记》行世。田氏诗歌成为家学，源于绪宗之妻张氏，张氏为处士张祯之女，在《清史稿·列女传》中位列第一。张氏“幼读诗书，探论圣贤要旨，多所发明”^④，而且理事干练，诚为女中豪杰，无论田绪宗死后携子处置善后事宜，还是晚年就养于田雯抚署之中，其行止皆有识、有度，足为懿范。尤其田绪宗去世之时，诸子尚幼，

① 顾易生《清代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

② 赵执信《谈龙录》，刘丰鑫校点《赵执信全集》，齐鲁书社1993年版。

③ 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卷三五，中国书店1988年版，第438页。

④ 民国二十四年（1935）《德县志》卷一二。

全赖张氏苦苦支撑，“阖户辟绩，以礼自守”、“教三子雯、需、霖皆有文行”^①。张氏颇具诗才，诗清丽雅致，寄托遥深，人谓有空谷之音，渔洋极其赞赏，但因不愿诸女孙效之，所作诗章常常是脱稿即焚，现仅存《茹茶诗稿》绝句三十首，部分被选入《国朝山左诗钞》。

田需诗学乃兄，“其意幽深，其词典贍”，传世《水东草堂诗》诗集一册；田霖，为诗恬淡，有靖节之风，得田园之趣，服膺王士禛神韵之说，著有《鬲津草堂诗集》，《四库全书》存目。田肇丽，著有《有怀堂诗文集》一卷传世。田同之于家学之外，尤笃信谨守渔洋神韵之说，有攻渔洋者必与争。著《诗竹堂诗》二卷、《二学亭文浚》四卷、《晚香词》三卷、《诗说》一卷、《词说》一卷、《文说》三卷、《丛辨》三十二卷、《安德明诗选》遗一卷、《幼学续编》八卷、《诗竹堂历代读诗订本》等，影响颇大。

清中期以后，田氏家族渐趋没落，田氏后辈诗群中，只有田际昌诗歌具有卓尔不群的风貌。田际昌，字映六，号稜香，田同之四子，有《西园近稿》行世，《国朝山左诗钞续钞》收其诗歌6首，五古《古诗》是一首奇情浪漫之诗，风格幻妙：“缩地成一里，四海联跬步。缩天为一日，万古接晨夕，我有意中人，招之共促膝。顾非神仙俦，焉得此幻术。迥薄一寸心，所惧后无述。”全诗想象奇特，“缩地”、“缩天”，打通时空阻隔，不受羁绊，大开大合，令人神往。但“幻术”终究抵挡不住现实的真实，诗人“几度徘徊感路穷”，逐渐“名心漫灭”（《欲往村居述事》其一），在“韶光暗度”中、选择一种“卧听千山响杜鹃”（《春雨》）式的闲适，所能做的是“穷愁不废吾家事”（《欲往村居述事》其三），将一瓣馨香传承下去。

德州田氏著述一览表

序号	姓名	著述名称
1	田实栗	《明儒案》四十卷
2	田绪宗	《筮仕记》
3	张氏	《茹茶吟》绝句三十首
4	田雯	《蒙斋年谱》四卷、《古欢堂诗集》十五卷、《古欢堂文集》十二卷、《黔书》二卷、《长河志籍考》十卷、《幼学编》、《诗传全题备义》、《古欢堂各体读诗订本》、《历代古文选本》、《诗经大题》不分卷
5	田需	《水东草堂诗》、《亦政堂诗》、《厠塾录》、《田子篋中稿》
6	田霖	《鬲津草堂诗集》
7	田肇丽	《有怀堂诗集》一卷、《有怀堂文集》一卷、《南北史纂》、《麻衣消寒录》、《砚北犹存录》、《扈从记程》、《拗体诗钞》
8	田幼安	《宁固堂诗》
9	田中仪	《红雨斋诗》、《红雨斋词》
10	田同之	《诗竹堂诗》二卷、《二学亭文浚》四卷、《晚香词》三卷、《诗说》一卷、《词说》一卷、《文说》三卷、《西圃丛辨》三十二卷、《古欢堂笔

^①赵尔巽《清史稿·烈女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

		记》、《西圃近稿》一卷、《西圃诗册》一卷、《砚思集》四卷、《安德明诗选》遗一卷、《幼学续编》八卷、《诗竹堂历代读诗订本》
11	田徵舆	《石南斋诗词存稿》、《磨石龙顽钝印谱》
12	田佺期	《松尧公遗诗二章》
13	田际昌	《西园近稿》

本表依据《安德田氏家谱》、《德州志·艺文志》、《国朝山左诗续钞》编纂而成。

五、“名卿蝉联”——德州卢氏世家

德州卢氏原为直隶涞水（今河北保定涞水）人，明永乐初年由原籍迁来德州左卫，是跨越明清两代、绵延近四百年的官宦家族、文化世家，自明至清，科甲相继，名卿蝉联，代有闻人。

（一）御史大夫卢世澹

卢世澹是明清之际德州卢氏的早期代表人物，他身处乱世，个性坦荡，嗜书好饮，极具个性魅力，崇尚杜诗，其杜诗学成就与钱谦益比肩，诗歌多抒发内心的“悲感凄怆”之情，代表着清初山左诗风中沉实的一面。

卢世澹（1588-1653），字德水，号紫房，晚号南村病叟，是德州卢氏第九世的代表人物。明天启七年（1627）进士，授户部主事，不久省亲归乡。崇祯间官监察御史，巡视漕运，时值久旱不雨，河道干涸，盗匪丛生，卢世澹上《陈河道情形疏》等数十疏，言漕政之弊，都得到批复施行，展现出杰出的吏才。任职届满，称病回到故里。崇祯十七年（1644）春天，卢世澹领导发动了“诛伪”之举。三月十八日李自成攻陷北京，遣将郭陞经略山东，四月八日克德州，任命阎桀为武德道，吴徵文任知州，并将京城拷赃之法带到地方，“执薦绅而索贿，拷掠靡遗”^①，激起德州世家望族的怨恨，四月二十七日，卢世澹与御史赵继鼎、主事程先贞、推官李赞明、生员谢陞等一起起事合谋将吴徵文、阎桀擒斩，依李嗣成计，举王孙朱师钦为盟主，以为皇帝发丧的名义，发讨逆檄文，并布告天下，德州附近郡邑皆纷纷响应，诛杀了景州、故城、武邑、东光等处大顺军设置的官员。卢世澹在此过程中，扮演了组织领导者的角色，假托名号，设计起事，并“手诛伪牧”^②。“诛伪”事件反映了德州地方绅士与大顺农民政权对抗的政治态度。入清后，清朝以原官征用，卢世澹称病不出，居家近十年而逝。

卢世澹归隐后足不出户，嗜酒善饮，嗜书如命，在读书之余，抄书、藏书、刻书、著书。所刻图书有《订读古本大学》、《唐子西文录》、《许葺翁和陶诗》、《杜生传》等十多种，其著述有《读杜私言》、《春秋闲说》、《尊水园宿草》、《在舆草》、《闲居漫兴》、《杜亭近草》、《画扇斋诗》、《杜亭移草》、《菟庵掌记庐诗》、《紫房篋中小集》、《紫房篋中余集》、《宿草》等。顺治十七年（1660），受业门生程先贞、赵其星，以已刻五种、未刻二种，辑为《尊水

① [清]李嗣成《讨逆檄文》，乾隆《德州志》卷一二《艺文志》。

② [清]王永吉《德水卢公墓志铭》，《尊水园集略》卷一二《补遗》二卷，续修四库全书 1392 集部别集。

园集略》。

卢世澹是明清之际“杜诗学”研究的代表性人物。身处乱世的卢世澹深受杜甫忧国忧时精神的感染，敬佩杜甫为人，归乡后蛰居尊水园，园中设杜亭，自称杜亭亭长，酷爱杜诗，自称“数年间，于杜诗近四十余读”^①，并于崇祯七年（1634）亲手编刻《杜诗胥抄》及《余论》，在杜诗学史上影响巨大。王士禛《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三十二首》其五：“杜家笈传太纷拏，虞赵诸贤尽守株。苦为南华寻向郭，前唯山谷后钱卢。”

王士禛认为在历来注杜诸家中，只有黄庭坚、钱谦益、卢世澹三人是真注家，王士禛将卢世澹与钱谦益并举，评价甚高。

李源在《尊水园集略序》云“著一家之言，自成其为卢，而非他家之能肖，亦不肖沾沾求肖于他家者也。”卢世澹在研杜方面，见识卓异不群，能成一家之言，且“深入少陵之堂奥”、“水乳合者”，是“善于学杜者也”。而于“少陵之堂奥”中，卢世澹体味杜甫的人格、欣赏其诗歌巨大的艺术魅力，也批评杜甫个别诗篇的不足，足见其研杜“近四十余读”的功力。尤其是对杜甫性情的品读，卢世澹更于杜甫一生跌宕起伏的人生遭际中，挖掘出一般读者所难发现的杜甫性情中“侠”、“狂”、“辣”的一面，新人耳目，并揭示出杜甫伟大人格中“真”的底蕴，诗歌创作倡导抒发真性情的主张，是对明七子末流模拟之风的反拨，于明末清初诗坛颇具时代精神与诗史意义，并直接启发影响了从重孙卢见曾的诗学主张。

卢世澹《尊水园集略》存诗300余首，《国朝山左诗钞》录其诗作85首。

生活于乱世，无论是面对明末黑暗政局、颓废的国运，还是面对易代之际的出仕与归隐的痛苦抉择，他日抱沉愁而又无可奈何，只好以诗抒发内心“悲感凄怆”^②的意气。袁行霈亦云“隐遁之诗含蓄而有怆楚之音”^③。如写于甲申之秋的五古《古诗》，诗前小序云：“作诗一首似祭文又似挽歌，……拟刻一石俟大归之日用以殉葬，先兹板行传示故人，以为欢笑留下一杯酒，从今日到刘伶坟上矣。”诗中古怨、古欢、好古、怀古、愧古、续古、望古、古云、古月、古琴、古帽、古井……，连用十七“古”字，通篇充满死气、鬼气，抒发的是诗人内心无路可走的凄楚悲凉。而《清夜读韩子志感》一诗，终现诗人真我：“生来孤冷世情稀，曾向阴府问杀机。自怪此心终不歇，白头灯下读韩非。”

诗人生于末世“孤冷”的品行，其“曾向阴府问杀机”的人生阅历，与眼下“白头灯下读韩非”的形象形成强烈的反差，一个壮志未酬、“可怜白发生”的勇者形象跃然纸上。《正夫家藏思陵石墨钱牧斋先生题诗其上余次韵奉和》一诗更是“语关时事”的现实之作：“石墨镌华蕴宝香，虞山短咏动寒光。可怜云汉成烟雾，凄断银钩四十行。”

诗咏物伤情。思陵为崇祯皇帝陵，诗人与钱谦益、程先贞等明朝遗老一起目睹皇陵遗物，情何以堪，“可怜”、“凄断”将内心的悲怆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其诗情感悲怆沉郁似杜甫，但诗歌意象选择的阔远，情感抒发形式上的真率又与李白更为接近。如《与毛经夫闲谈》诗

① [清]卢世澹《大凡》，卢世澹《尊水园集略》，续修四库全书本，1392集部。

② 邓之城《清诗纪事初编》，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697页。

③ 袁行云《清人诗集叙录》，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5页。

云：“九州之外又名州，万里风声十二楼。索隐探奇须到此，黄河一线贴天流。”写故里德州从天下“九州”起兴，“万里风声”来形容其盛名，以“索隐探奇”必到之地来描写德州的深厚文化积淀，更用“黄河一线”写德州自然景观与黄河的不解之缘，虽题曰“闲谈”，但遣词用语气魄阔大，确有太白遗风。

（二）“风雅总持”卢见曾

卢见曾（1690-1768），字抱孙，号澹园，别号雅雨山人，是德州卢氏第十二世传人。祖父裕，庠生。父亲卢道悦为康熙九年（1670）进士，曾做过陕西陇西、河南偃师县知县，著有《公余漫草》、《清福堂遗稿》等书。康熙五十年（1711），卢见曾中举人，六十年（1721）中进士，名列二甲，授官四川洪雅县知县，从此步入仕宦生涯。

卢见曾到任后，发现洪雅地瘠民贫，税目繁多，狱讼不息，治安混乱，民不聊生。他“除杂派、清积牍，一以俭勤为治”^①，迅速稳定了社会秩序，受到当地百姓的拥戴。雍正九年（1731），出任安徽蒙城县知县，并协理州务。不久迁六安州知州，当地大户侵占水塘为田，导致械斗不止，争讼不息，卢见曾组织百姓大修水利，蓄水灌田，水源争斗随即平息。雍正十二年（1734），卢见曾迁亳州知州，在任期间，组织民众重新开挖了淤塞泛滥多年的龙凤沟，使之有了灌溉之利。雍正十三年（1735），卢见曾调任颍州（今安徽阜阳）知州。到任后，对宋代欧阳修主持开挖、后长期湮塞废弃的颍州西湖，重新进行整修，颍州西湖恢复了往日美景，又有了水利蓄泄之功能，四周农家田庐免受了淹没之患。

由于政绩突出，乾隆元年（1736）卢见曾被擢升为两淮盐运使，治所扬州。据《两淮盐法志》及卢见曾《上宰相书》等资料记载，当地不法盐商勾结官府侵占灶户（盐民）盐池，在所有权问题上，双方久讼不决，盐民深受其害。卢见曾到任后，作出了“灶属商亭，粮归灶纳”的判决，并上报朝廷，转六部备案，维护了盐民利益。当海潮泛滥成灾、灶地淹没时，又疏报朝廷，请蠲缓灶民钱粮。卢见曾赢得灶民爱戴，但却因得罪那些贪官污吏及不法盐商，被诬告贪赃、“为党”。乾隆三年（1738）卢见曾被革职，乾隆五年（1740）充军发配到塞外。

乾隆九年（1744），冤案昭雪，卢见曾被平反赐还，补直隶滦州知州。第二年又升为永平府知府。在任期间，他带领所属抚宁官民筑坝阻水，解除了多年来洋河对抚宁城的威胁。

乾隆十六年（1751），卢见曾出任长芦盐运使。乾隆十八年（1753），复任两淮盐运使，再驻扬州。当时扬州地势低洼，河道湮塞，经常发生内涝。卢见曾募集银两，疏浚扬州城周围河池，消除了城中水患，并沿小秦淮修建了红桥二十四景及金焦楼观，使古老的扬州更加妩媚多姿。

《清史列传》本传称卢见曾“主东南文坛，一时称为海内宗匠”，田雯曾称“我乡后起以诗名家者，当在斯人”^②。王培荀《乡园忆旧录》载：“卢雅雨先生留心风雅，一时坛坫之盛，名士宗仰。昔郭华野总制与渔洋同在坐，雅雨谒见，郭谓渔洋曰，他日继君者此人，渔

① 《清史列传》卷七一《卢见曾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

② 民国《德县志》卷十《人物传》。

洋颔之”^①。

自康熙二十年（1680）后，差不多有一个甲子即六十年左右的时间，江东人文处于式微态势，卢见曾主盟东南文坛的时间，正好处于这一“甲子”末期，正为赵执信逝后至沈德潜、袁枚并起的三十年，这一时段，也是“山左”诗坛逐步式微而江南诗坛呈现新的崛起的时段。卢见曾爱才好客，名公巨卿、骚人词客多至幕府，极一时诗酒之盛。数百士林名流皆被其奉为上宾，戴震、惠栋、厉鹗、郑燮、高凤翰、全祖望、沈大成、杭世骏、马曰琯、程梦星、金农、陈撰、吴敬梓、袁枚等一大批引领学界、画界、诗界风气的名流皆入其幕府，卢见曾受到维扬一带的士林推崇，奉为领袖。乾隆二十二年（1757）春，像当年王士禛任扬州推官时一样，卢见曾在红桥举行“修禊”活动，据《扬州画舫录》载，卢见曾首作七言律诗四首，和者七千余人，编次诗三百卷，一时传为文坛佳话，扬州又成为当时的文化中心，再现清初王士禛名流雅集的盛况。

为政之余，卢见曾以雅雨堂名义刊刻有《雅雨堂丛书》、《经义考》、《周易述》、《经学五本》等清朝经学名著。其中《雅雨堂丛书》又名《雅雨堂藏书》，包括经、史、子、集十三种典籍，合计一百三十八卷，其核心的《郑氏周易》、《郑司农集》、《周易乾凿度》、《尚书大传》、《大戴礼记》、《易释文》、《李氏易传》、《匡谬正俗》八种都属解经之作，是清代乾嘉汉学的早期倡导者与奠基者。主修乾隆《金山志》、《焦山志》，著有《旗亭记》、《玉尺楼传奇》、《曲录》等，为后人留下了丰富而珍贵的文化遗产。这些图书校勘精细，刻印精美，堪称我国古籍中的珍本、善本，至今在出版界、收藏界享有盛誉。

作为山左后学，卢见曾论诗以“诗道性情”为中心，围绕这一核心，强调诗非一格、重视诗人的学问修养、知人论世等主张，具有既严格又通达、既全面又辩证的特点，体现了康乾过渡时期诗坛百家争鸣、流派纷呈的探索精神，是明清以来主张诗歌缘情一派的重要代表，并与浙派、性灵派相互影响，对清代前中期诗学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卢氏喜诗，束发后即习诗，年逾七十而不辍，自称“老而弥笃”。遭抄没和火灾后，其后人得其诗歌 200 余首，辑为《雅雨堂诗集》，其诗写宦宦生涯的平凡生活，情感真挚，诗风多样而有意境。更要指出的是，卢见曾基于“国初诗学之盛，莫盛于山左。……山左之诗，甲于天下”^②的事实，于乾隆癸酉（1753）仲春至乾隆戊寅（1758）仲秋，历时五载编成《国朝山左诗钞》，选清代前中期山东诗人 620 余家，诗作 5900 余首，总计 60 卷，对山东古代文献的保护具有肇始之功。随后，宋弼又编成《续钞》7 卷、《补钞》4 卷，同时辑《山左明诗钞》35 卷；嘉庆间张鹏展辑刻《国朝山左诗续钞》32 卷；道光年间余正酉又编成《国朝山左诗汇钞》，合计以上四种，共得明代至清道光 500 余年间山东作家 2187 家，每人都系有小传。至此，明清山东诗人诗作大体略备。

卢见曾第二次官居扬州、任两淮盐运使长达十年之久，曾将扬州看作是第二故乡。乾隆二十七年（1762），73 岁的卢见曾告老还乡，写于此时的《告休得请留别扬州故人》诗有句

① [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齐鲁书社 1993 年版，第 89 页。

② [清]卢见曾《国朝山左诗钞序》，《国朝山左诗钞》，清乾隆二十六年德州卢氏雅雨堂精刻本。

云：“长河一曲绕柴门，荒径遥怜松菊存。从此风波消宦海，才知烟月足家园。”表达了对故乡的思念，对扬州的不舍。归里后，卢见曾“修坟墓，置祭田，恤宗族，教后学”^①，过起了隐居生活。乾隆三十年（1765），乾隆南巡，驻蹕德州，特亲书“德水耆英”匾额赐之。

乾隆三十三年（1678），“两淮盐引案”发，卢见曾因曾长期担任两淮盐运使，遂牵连入案。据《清高祖实录》载，盐引案牵连出卢见曾贪得盐商古玩银一万六千余两。乾隆下令将卢见曾逮捕押解至扬州查办，抄没家产。卢见曾最终被判死刑，关在苏州狱中待秋后处决。九月二十八日，卢见曾病死于苏州狱中，享年79岁。卢见曾死时，“惟一孙在旁”。三年后，大学士刘统勋上疏乾隆帝，陈述卢见曾为官各地时的治绩，指明扬州贪官与盐商奏折中的不实之词，为其平反。

直隶总督那苏图在给乾隆皇帝的荐表中曾称卢见曾“人短而才长，身小而智大”。观其一生，不仅勤于吏治，足智多才，“有吏才”、“所至皆有殊绩”，既是典型的循吏，而且爱才好士，擅长诗文，“主东南文坛，一时称为海内宗匠”，又是清代有影响的文化巨擘。

（三）“六部尚书”卢荫溥

卢荫溥（1760-1839），字霖生，号南石，卢见曾嫡孙。卢荫溥一生，历经乾隆、嘉庆、道光三朝，从政五十余年，历任军机大臣，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尚书，并多次奉旨按事决狱，“勤劳懋著”、“专心职守”、“殚心竭力”。晚年被授予体仁阁大学士、大学士加太子太保、太子太傅之衔，卒赠太子太师，谥曰“文肃”，是清朝一品要员，清中期的“股肱”、“耳目”之臣。

乾隆三十三年（1768），两淮盐引案发，卢见曾“逮问论绞，死于狱中，籍没家产，子孙连坐”^②，卢荫溥的父亲卢谦因此被“谪戍军台”。当时，卢荫溥年仅九岁。家境的突变，给幼年的卢荫溥留下了深深的烙印。由于贫困无依，母亲只好带着他回到了外祖父家。卢见曾案平反后，卢谦被授予广平府（今河北永年）同知，家境日渐好转。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仅22岁的卢荫溥考中进士，接着又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乾隆四十九年（1784），授翰林院编修。乾隆五十六年（1791），迁为礼部主事。乾隆五十九年（1794），卢荫溥被派往山西主持乡试，充任副考官。乾隆六十年（1795），提督河南学政。嘉庆六年（1801）十一月被任为军机处章京。

清朝中期，阶级矛盾日趋激化，各族人民的反清起义连续不断。这期间，卢荫溥因“多所赞画”，补为原官（礼部主事），接着又升为礼部员外郎。嘉庆九年（1804）四月，京察一等，六月，充浙江乡试副考官。十一月，升礼部郎中。嘉庆十三年（1808），升为鸿胪寺少卿，嘉庆十四年（1809），迁为光禄寺少卿。三月，奉旨偕督察院左副都御使长锈到直隶南皮会审彭希曾“贪赃受贿”案，为彭昭雪。六月，到浙江会审浙江学政刘凤诰“代办监临印用联号”案，判刘凤诰戍守新疆伊犁。嘉庆十五年（1810）二月，会审四川生员易元钧控告当地土司“婪侈攘剥”及民人黄映川控告知县“屈抑民怨”两案，均被判诬，按律治罪。五

^① [清]卢文弨《故两淮都转盐运使雅雨卢公墓志铭》，闵尔昌纂录《碑传集补》卷一七。

^② 《清史稿》卷三四一《卢荫溥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

月，偕托律会审大学士勒保任四川总督时“匿名揭帖指讦总督、藩司款积寢息未办”之罪，最终勒保被罢去大学士之职。六月，卢荫溥被加赏二级。十一月，卢荫溥到涿州房山县一带查访灾情，办理赈济，并妥善处理了热河军粮供应问题。

嘉庆十六年（1811）三月，卢荫溥扈从圣驾出巡山西五台山。期间，奉旨审查凤知县台陈绍贵自缢案。闰三月，赴代州处理了两起久拖未判的命案，削夺了所在知县的职务。七月，卢荫溥被嘉庆帝特以光禄寺少卿加四品衔，仍任军机大臣上行走。不久又迁为通政司副使。嘉庆十七年（1813），转为兵部左侍郎、右侍郎、户部左侍郎，并充顺天乡试副考官。

嘉庆后期，清朝社会矛盾进一步加深，各地人民的反清斗争风起云涌。就在卢荫溥任职兵部的当年，河南、河北、山东等地爆发林清、李文成领导的天理教众的起义。卢荫溥在军机处“赞襄机务”，调遣各地清军会集河南，镇压天理教起义军，嘉庆皇帝加其官品二级，升为经筵讲官，特允他可以在紫禁城内骑马，其子卢本赐举人。嘉庆十九年（1814）五月，卢荫溥充任国史馆副总裁。

嘉庆二十年（1815）九月，卢荫溥转任刑部左侍郎。十二月，因在军机处事务繁多，造成刑部案件积压，被降二级留任。嘉庆二十一年（1816）四月，再因失察降二级。六月，调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

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三月，卢荫溥升任礼部尚书兼国史馆总裁。不久，调为兵部尚书兼署刑部尚书。嘉庆皇帝认为他“实心任事”，特加太子少保之衔。九月，卢荫溥再被调为户部尚书兼吏部尚书。嘉庆二十三年（1818），馆臣将撰写的《明鉴》上呈嘉庆皇帝，嘉庆皇帝看后觉得不满意，于是命卢荫溥偕托律、章煦、英和、和瑛等，选翰林有才识者重加撰修。书成后，嘉庆皇帝甚为满意，并特下诏褒奖。工部主事潘恭辰监督玻璃窑，他做事认真，不随陋习，对部下管理很严，因此得罪了不少人。有人诬陷他“侵冒”公产，被下狱治罪，一时舆论哗然。嘉庆风闻后，命卢荫溥对此案进行复审。卢荫溥秉公断案，认定潘恭辰无罪，释放了他，同时严惩了诬告属吏。潘恭辰后来官至云南布政使，“以清操名”。嘉庆二十四年（1819）十月，卢荫溥六十寿辰，嘉庆皇帝亲书“延禧介寿”赐之。嘉庆二十五年（1820）三月，卢荫溥充任会试正考官，已故大学士陈宏谋玄孙陈继昌得中会元。陈继昌在此前乡试和此后殿试中分别为解元、状元，有清一代，科举连中三元者，只有乾隆朝钱縯及嘉庆朝陈继昌二人。

1821年道光帝即位，卢荫溥任吏部尚书兼顺天府府尹。接着，道光皇帝以“任职较繁”为由罢去了他的军机大臣之职，不久又借口他在工部尚书任内“失察”，将其降四级留任。道光七年（1827），卢荫溥以吏部尚书兼任内阁协办大学士。道光九年（1829）十月，卢荫溥七十寿辰，道光皇帝御书“赞纶锡庆”匾额、“福”、“寿”二字及各种珍物赐之。道光十年（1830）九月，卢荫溥被授予体仁阁大学士之衔。道光十一年（1831）十一月，充文渊阁领阁事。道光十三年（1833）三月，卢荫溥请求致仕，道光皇帝以大学士加太子太保、食全俸，准其奏请。

致仕后，卢荫溥并未回原籍，仍留居京城。道光十九年（1839），道光皇帝大宴群臣，卢荫溥以八十高龄参加，被加太子太傅之衔。不久，卢荫溥病卒。道光皇帝闻讯后特下诏“悼惜”，派成郡王载锐率领侍卫前往祭奠，并赏给陀罗经被及银一千五百两治理丧事，赠太子太师，谥曰“文肃”。

（四）一门八进士的隆盛家声

德州卢氏是跨越明清两代、绵延近四百年的官宦家族、文化世家。在明清封建时代，维系一个大家族声望的是家族成员科举功名、仕宦显赫，德州卢氏也不例外。自明中期至清末，德州卢氏总计有八人高中进士，一门八进士的隆盛家声，使之成为德州地域首屈一指的著名氏族，闻名宇内。卢氏这八位子弟的宦海沉浮，也决定了德州卢氏作为地域望族的起起落落。

根据卢见曾编撰的《德州卢氏家谱》和卢世澹、卢见曾等卢氏后人文集，德州卢氏原为直隶涞水（今河北保定市涞水县）人，明永乐初年由原籍迁来德州左卫，德州卢氏的第一位进士是第六世的卢宗哲。

卢宗哲，字浚卿，明嘉靖十四年（1535）乙未科进士，由翰林院检讨迁光禄寺卿，因忤严世蕃而归里，卒赐葬，崇祀乡贤，作为德州卢氏的第一位进士，被尊称光禄公、涞西公。在德州卢氏的支脉中，宗哲一支枝叶繁茂、科甲蝉联，成为最为显赫的一支。

经过数世积累，自九世至十二世，德州卢氏逐步成长为文化世家，不断有后人步入高层官吏行列，在地方叱咤风云、甚至拥有全国的知名度与影响力，德州卢氏家族进入鼎盛期。家族第二位进士是第九世的卢世澹（详见前文），第三位进士是十一世的卢道悦。

卢道悦，字喜臣，号梦山，清康熙九年（1670）庚戌科进士，官陕西陇西知县、河南偃师知县，著《公余漫草》、《清福堂遗稿》。第四位进士是十二世的卢见曾（详见前文）。

乾隆三十三年（1768）盐引案发，卢见曾落难，德州卢氏被抄，虽然三年后卢见曾案得以昭雪，但卢氏已大伤元气，家族从鼎盛一下跌入谷底。随着卢氏第十四世涌现出的三位进士，德州卢氏才又进入再盛期。

第五位进士是十四世的卢荫文，为卢谦三子，字景范，号海门，乾隆三十年（1765）乙酉科进士，纪昀婿，历官安徽建平、舒城、泾县知县。

第六位进士是十四世的卢荫惠，为卢谦六子，字东桥，号荷亭，乾隆四十五年（1780）庚子科进士，历官四川巫山县、河南浞池县、偃师县、孟县知县。

第七位进士是十四世的卢荫溥，为卢谦七子，字霖生，号南石，乾隆四十六年（1781）辛丑科进士（详见前文）。

自第十五世始，德州卢氏开始走向衰落，突出表现为出仕人员减少，大部分为中低层官吏，多数子弟因受困科场、科考不顺而“绝意仕进”，成为“隐君子”。

第八位进士是第十六世的卢庆纶，卢本子，字理堂，号伴鹤，道光二十一年（1841）辛丑科进士，历官翰林院庶吉士、武英殿协修、编修，武英殿纂修、国史馆总纂。

六、顾炎武、钱谦益与德州名士的交往

明清时期的德州，北依京畿，南邻济南，京杭运河穿城而过，是沟通南北的驿路与运河交通的要冲，历来有“神京门户”、“九达天衢”之誉，是进出北京的必经之路，许多文化名人驻留此处，或宦游小憩，或交游拜友，或讲学题咏，与德州名士织就了一张张复杂的人际网络，为德州地域文化涂抹上了绚烂的光彩。最为著名的当属明清之际的文坛盟主钱谦益、大儒顾炎武。

（一）钱谦益与卢世澹等人的交往

钱谦益（1582-1664），字受之，号牧斋，晚号蒙叟，东涧老人，学者称虞山先生，清初诗坛的盟主之一，常熟人。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探花”，东林党领袖之一，官至礼部侍郎，因与温体仁争权失败而被革职。甲申之变后，马士英、阮大铖在南京拥立福王，钱谦益依附之，为礼部尚书。后降清，仍为礼部侍郎。

钱谦益一生有九次南北往返的经历，其中有两次在德州逗留，并与德州名士卢世澹、程泰、程先贞、谢陞等交游，其中与卢世澹终生保持着密切的亦师亦友的亲密关系。

钱谦益与卢世澹定交应该是在崇祯六、七年间，两人是笈杜南北并称的大家，对杜诗的共同尊崇是交往的媒介。崇祯六年（1633）上半年，卢世澹刻成《杜诗胥钞》，寄交钱牧斋求序。钱牧斋当时因“阁讼”失败归里闲居，卢德水的投书得到了钱牧斋的回应。他在《读杜小笺》自序中对卢世澹笈杜的努力，倍加鼓励。次年春，卢世澹收到了钱谦益所作《读杜诗寄卢小笺》后，即兴作五言长句《奉寄钱牧斋先生》，表达了对钱牧斋的崇拜心情。

崇祯十年（1637）正月，常熟县民张汉儒赴京投诉钱谦益、瞿式耜辞职后在家乡行枉法事。阁臣温体仁受理此案，拟旨逮钱谦益、瞿式耜收审。闰四月初，钱谦益有诗简《将抵德州遣问卢德水》，遣人先行送达正在德州家居的卢世澹，拟请与温体仁关系较好的卢氏的内兄兼亲家、吏部尚书谢陞出面为其周旋，卢世澹马上作《上牧斋先生》，回复钱谦益，表示愿意接待钱、瞿一行。钱牧斋得到回复后，又作《次韵酬德水见赠》，此为钱氏的第七次南北之行。钱、瞿一行到达德州后，为了避免授人把柄，卢世澹将他们安排在好友程泰（字鲁瞻）的家中，逗留十余天。这是钱牧斋一生之中九次南北往返，经过德州逗留时间最长的一次。在德州期间，钱谦益有感而发，诗兴大作，作有《德水送芍药》、《东壁楼怀德水》、《谢德州张太守送酒》、《通州张太公寿宴诗十六韵其子主事文辉知县文挺来请》、《代赠十六韵》、《柳枝十首》、《荷花辞十首》、《德州送王鹿年》、《东壁楼简程鲁瞻》、《为鲁瞻题画二首》、《欲别东楼去四首》等诗篇。钱、瞿两人离开德州后于闰四月二十五日到达京城，入刑部狱。

崇祯十一年（1638）五月，钱、瞿等人得到宽宥，秋八月，被处以轻罚之后获释。中秋之日，卢世澹等人聚会京城，钱送钱谦益南归。钱谦益有《中秋夜钱冯尔赓使君于城西方阁老园池，感怀叙别赋诗八章，时德州卢德水、东莱崔道母及冯五十跻仲俱集》。钱谦益南归途中，匆匆而过德州，未作停留，留诗五首，前四首是《九月九日过德州不及登东壁楼，于城西旅店拾纸作诗属鲁瞻留题楼上四首》，以酬答上年东道主程泰（字鲁瞻）。另一首则是《德州城西赠别谢太宰》诗，此“谢太宰”，即担任吏部尚书的谢陞。

崇祯十二年（1639）十月，担任监察御史的卢世漉奉钦差往瓜、仪等处催督粮运，因而来到南直隶润州（镇江），崇祯十三年（1640）春，卢世漉特邀家居常熟的钱谦益前往镇江官舍一聚。卢世漉在宿迁作《奉寄虞山先生》送往常熟，问候钱谦益。钱谦益接书之后，回报长句《得卢德水宿迁书却寄六十四韵》。又作《得书之夕，梦与德水共简书笥，得徐武功告天文一纸，因口占赠德水有“与我并闲千亩竹、为君长啸一窗风”之句，觉而成之并寄德水河上》，对两人的友情予以肯定。

顺治二年（1645）秋，清廷令在南京降清的大臣一律到北京重新安置，钱谦益从南京到北京，这是钱谦益第八次南北往返之旅。顺治三年（1646）秋，钱谦益称病请假回籍调养，自京返常熟途中再次光临德州，下榻于卢世漉尊水园画扇斋中，柳如是先期到达迎接钱谦益，并题诗于尊水园杜亭壁上，在场的卢世漉、程泰、程先贞分别酬和。卢氏拿出《亡妻谢安人墓志铭》，请钱谦益过目，钱氏评曰：“简古，直逼子厚。觉李北地《志左宜人》为烦。”钱谦益在程先贞家藏思陵石墨上题诗，并为《海右陈人集》作序。

（二）顾炎武与程先贞等人的交往

顾炎武（1613-1682），本名继坤，改名绛，字忠清，南都败后，改炎武，字宁人，号亭林，自署蒋山佣，南直隶苏州府昆山（今属江苏）人。明季诸生，青年时发愤为经世致用之学，明亡后参加昆山抗清义军，败后漫游南北，曾十谒明陵。学问渊博，是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儒。

在顾氏漫游的二十六年中，有二十一年的时间往来居留山东，在其山东交游的行迹中，德州是其经常驻足的驿站，达十一次之多，而程先贞是其交往最深的挚友之一。

德州程氏是明清时期德州的著名文化家族，其祖上原为掖县（今莱州市）人，明初迁来德州左卫。程氏门第兴起于明中叶嘉靖初年，一直绵延至清代前期，连续五世仕宦出身，且雅有政声，代有诗人，诞生了程瑤、程绍、程先贞等著名文人。程先贞（1607-1673），字正夫，号葱庵，程泰子，清初德州著名诗文家、史学家。明末以祖荫官至工部营缮司员外郎，因侍父疾还里，明亡后降清，年三十八，以原官用，不两年告归，杜门简出，家居三十载而不仕，以读书著述自娱。他读书甚广，无书不读，“明十三朝之实录，几能成诵”，“邸报、野史、家乘，无不遍览熟悉”。著有《海右陈人集》、《德州志略》、《葱庵诗草》、《燕山游稿》、《安德诗文搜》、《还山春事》、《州乘》等。其中，《州乘》一书，垂老而成。

康熙四年（1665）乙巳，五十三岁的顾炎武首次正式造访德州，与程先贞相会定交，尽管程先贞比顾炎武大六岁，但两人志同道合，结为挚交。康熙六年（1667）九月，顾炎武第二次来到德州，住程先贞家，为程先贞诗集作《程正夫诗序》，又作《德州过程工部》诗，诗云：“海上乘搓客，年年八月来。每逢佳节至，常得草堂开。老桂香犹吐，孤鸿影自回。未论千里事，一见且衔杯。”并与程先贞同游苏禄国王墓，有《过苏禄国王墓》诗一首。

顾炎武在德州由程先贞引荐，又结识了州城名士李源、李浹、李涛、谢重辉等。康熙七年（1668），山东即墨发生了一桩黄氏家奴姜元衡控告其主黄培、黄坦、黄贞麟“南北通逆”

案。顾炎武自京至德州，知有咨文至原籍逮证，遂决定到济南自动投案。顾炎武下狱后，程先贞、李浹、李源等闻讯，奔走呼号，鼎力相救，终使顾炎武七个月后获释。康熙八年（1669），顾炎武至德州，住谢重辉家。谢重辉将赴京就荫职，顾炎武致信颜光敏，嘱其对重辉多加照拂。康熙九年（1670）四月，顾炎武出都，往德州。六月，应程先贞、李涛之聘，于程家讲《易》达四个月。而顾炎武一生，却是坚决反对讲学的，所以能有如此破格之举，也可见其对德州友人的情谊。八月，程先贞作《赠顾征君亭林序》，文中叙及顾炎武行止：“每过吾州，辄见访，为余谈说经史，不憚娓娓”，“东吴顾征君亭林先生，今之大儒……今年结夏于此，与二三同人讲《易》。复得发其《日知录》一书观之，多考古论世之学，而其大旨在于明经术、抉王道，为之三叹服膺，劝其出以惠学者”。顾炎武后来在《初刻日知录自序》中称：“炎武所著《日知录》，因友人多欲钞写，患不能给，遂于上章阉茂之岁刻此八卷。”可见其初刻《日知录》是因程、李等“二三同人”“劝其出以惠学者”而为之的，程先贞、李源、李涛等人玉成了《日知录》的初刻。康熙十年（1671）辛亥，顾炎武携从子洪善至德州专访程先贞。

康熙十二年（1673）四月，顾炎武至德州，审订《德州志》；十月，程先贞病逝，顾炎武闻讯自章丘至德州哭程先贞，有《哭程工部》诗一首。康熙十四年（1675），顾炎武由章丘再往德州，为程先贞执绑送葬，有《送程工部葬》诗，诗曰：“文献已沦亡，长者复云殖。一往归黄泉，百年若须臾。寥寥扬子宅，惻惻黄公沪。挥涕送故人，执手存遗孤。末俗虽衰漓，风教犹未渝。愿与此邦贤，修古敦厥初。”此举以致于令王蘧常先生觉得有些不可思议，认为：“先贞以祖荫历官工部，《清诗纪事》谓以顺治三年告终养，则曾降清，以原官用，且曾腰玉为清效奔走。虽为时甚暂，而大节终亏。《纪事》以为细节，过已！先生以撑柱正气为己任，而相契之深如此，尤过于史可程，同一不可解者也。”但恰恰是局外人的不理解，可见顾程二人的真挚情谊。

程先贞逝后，顾炎武与德州二李仍保持着非常良好的关系，直到康熙十六年（1677）他将入关中，还特地从京师赶往德州，对二李作告别性的访问，这也是顾炎武最后一次来到德州，此后不复相见，但尚有书信往来。今存《亭林文集》卷三有《与李星来书》一首，卷四有《与李霖瞻书》，《蒋山佣残稿》卷一有《与李霖瞻》一首——均是写给李源的，《亭林文集》卷三有《答李紫澜书》一首，《蒋山佣残稿》卷二有《与李紫澜》一首——均是写给李涛的，都是顾炎武入关中之后写给二李的。

七、董子读书台与德州董子文化

为纪念董仲舒这位先贤，德州人在他读书讲学之地，修建了董子读书台。具体始建于何年不详。据乾隆《德州志》、《长河志籍考》、雍正《山东通志》和民国《德县志》载，明正统六年（1441），德州知州韦景元崇文重教，修建学宫，掘地得石一方，上刻“董子读书台”五字，“石如玉板，字若琅书”，“盖隋碑也”，于是韦景元在其故址复建起董子读书台。这

说明董子读书台至少在隋朝已有，唐、宋、元应该皆有相关建筑。因董仲舒著有《春秋繁露》，后人也称董子读书台为“繁露台”、“董子台”。

明成化九年（1473），知州王缙于读书台后营建祠堂八楹，将董仲舒与其他德州乡贤合祀，建立董子祠，名曰“聚贤祠”。

明弘治八年（1495），山东参政林先甫巡视德州，见董子祠简陋，拟将董仲舒与其他乡贤合祀，经山东巡抚批准，由济南府同知王从鼎招募工匠在学宫东侧营建专祀八楹，以专祀董子，又建前后厢房十二楹，并重筑了董子读书台，将原隋碑立于寝堂之下，并建亭予以保护。

明万历年间，董子祠曾一度倾覆。万历四十三年（1615），德州知州马明瑞将年久失修的读书台和董子祠一并移至西门外、古运河东岸的一块高地上，重建了董子读书台和董子祠，同时还修建了醇儒书院。院中除珍藏诸子百家的经书之外，还重点保存了董子的《春秋繁露》及部分相关著述。据记载，明万历四十三年重建的董子读书台，走向为坐北向南，正门一间，占地约三亩，南半部为一院落，有东西厢房各三间，院内古树参天，浓荫蔽日，幽静肃穆，后半部为读书台，台基座高1丈5尺，有十二级台阶，边长约4丈5尺，正方形，台四周砌有青砖半截花墙。台上正殿三间，楹面宽3丈6尺，进深1丈8尺，为砖木结构，灰瓦盖顶。前抱厦系卷棚式，形式美观，檐柱4根，前后通安花棂门。两山各有圆形窗一个，直径3尺。殿内靠北墙正面砖砌的台基上供奉一木制神龛，龛内木牌上镌刻有“董子读书台”五字。正殿两侧各有小楼一座，系当年钟、鼓二楼。

明孝宗时，为纪念董仲舒，在文庙东侧又修建董子祠。每年像“祭孔”一样，按时祭祀董子。

康熙朝德州名士田霖（田雯之弟）在书院旁边修建有“数帆亭”一座。康熙四十八年（1709）山东督粮道朱廷楨对董子读书台旁的醇儒书院重加修葺，又筑亭植柳，延师课士，一时文风甚浓。读书台旁有一小湖，曰“柳湖”，朱廷楨据此将醇儒书院改称“柳湖书院”，从此，董子读书台、董子祠、柳湖、柳湖书院、数帆亭等景观，错落有致，相互临映，古朴典雅，景色宜人，成为德州人文昌盛的标志。台祠西侧，运河蜿蜒，柳湖岸边，杨柳婆娑，南来北往的钦官巡按、文人墨客及赶考举子，经过德州无不到此游赏。

乾隆二十一年（1756），皇帝南巡，驻蹕德州，乾隆帝在董子台写下《繁露台》诗一首：“天人三策对贤良，已见春秋大义彰。那更高台演繁露，转思董子失之详。”乾隆三十六年（1771），乾隆帝再次南巡，在德州又为董子读书台题诗：“故里千秋疑信猜，城楼耸处久称台。都传繁露春秋演，谁识竹林与玉杯。”

清代德州诗人田致《陵州四时词》：“柳湖西畔御河隈，芦荻萧萧两岸苔。酒户词场多少客，登高齐上读书台。”

明代诗人吴国伦《董子祠》诗：“万木广川村，萧萧古庙存。高粱蟠海气，残碣卧松根。日月黄河逝，文章汉代尊。即看荒草色，犹似未窥园。”

乾隆后期德州知州王道亨《董子读书台》诗：“人物西京重广川，荒台想见下帙年。隋碑文字余苔藓，孔庙春秋肃豆笏。绝学渊源传道谊，醇儒经术贯人天。如何后世谈灾异，多借先生繁露篇。”

柳湖书院有一句名联——“院外桃李白间红，门内杨柳眠东风”，刻画的是柳湖书院清雅的环境和悠悠的文化情结。明清德州的人文之盛，得益于德州经济文化的昌隆，尤其是官学色彩浓郁的、繁荣的书院教育，培育造就了一大批杰出人才。明朝建立以后，由于德州突出的州卫同城的特征，德州书院发展并未出现兴盛的景象，直到弘治年间，随着城镇经济的发展，德州书院初显繁荣，万历后至清中期的近二百年间达到鼎盛。城区内先后创设的崇仁书院、醇儒书院、董子书院、柳湖书院、董颜书院、繁露书院、正谊书院等，都是由纪念董子及其讲学活动衍化而来，深深打上了“董子文化”的烙印，具有鲜明的区域色彩和儒家文化特征。

明清时期是中国封建教育兴盛和发达时期，根据王耀生先生的统计，明代山东进士 1630 人，在全国仅次于浙江、江西、南直隶（今江苏和安徽）、福建，位居第五，在长江以北诸省中名列第一，清代共取山东进士 2240 人^①。其中，明清两朝德州城产生了 347 名举人，124 名进士。明清之际^②，在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济南府共产生 467 名进士、1074 名举人，但地域分布并不均衡，产生进士最多的前五名州县依次是：淄川 55 人、新城 45 人、章丘 42 人、德州 35 人、长山 32 人；产生举人最多的前五名州县依次是：淄川 109 人、历城 99 人、德州 91 人、章丘 79 人、新城 70 人；进士与举人两项相加人数前五名的州县依次是淄川、德州、历城、章丘、新城，德州位居前茅。

明清之际，德州诞生了著名的“三李”（李泮、李源、李涛）、“四大”（冯大木、赵大经、封大受、陈大浩）、“五田”（田绪宗、田雯、田需、田霖、田同之）和卢氏“六代八进士”，他们或出仕为官，或研经写史，或为文作诗，大都在明清时期相关领域取得突出成绩，享有盛誉，成为德州“人文飏起，名卿蝉连，实甲山左”人文之盛的标志与象征。

①王耀生《明清时期山东进士地域分布特点及与经济、区位和民风的关系》，《中国地方志》，2005年第9期。

②此处的“明清之际”，我们将其限定为明万历十五年（1587）至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

第七章 近代奋起——英勇抗争与孕育生机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由此步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晚清时期（1840-1911），德州区域分属山东济南府（包括齐河、禹城、平原、临邑、德平、德州、陵县）、东昌府（恩县）、武定府（乐陵）、临清直隶州（武城、夏津）、直隶天津府（庆云）、河间府（宁津）。民国前期（1912-1927）分属山东省济南道、东临道、武定道、直隶省津海道。民国十七年（1928）分别直属山东、河北省政府（宁津、庆云）。抗日战争时期津浦铁路以东各县分属冀鲁边区、河北区一、二、三专区，津浦铁路以西各县先后属冀南、运东六专区及沧南专区，齐（齐河）、禹（禹城）部分属冀鲁豫一、四专区。解放战争时期至1949年分属渤海区二专区、冻北、沧南专区和冀南二专区。

这一时期，富有革命斗争传统的德州人民，与全国人民一道，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反动军阀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1946年，德州解放，德州历史翻开了新的篇章。

第一节 德州早期反帝反封建斗争

近代以来，德州人民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不屈不挠，顽强抗争。从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起，德州爆发了肖振克起义、郑淳抗漕、捻军起义、德州教案和义和团运动，谱写了一曲曲悲壮的英雄赞歌。

一、捻军与德州

1853-1868年，从大江南北到中原华北，捻军的反清起义持续了16年之久。期间，德州也留下了他们战斗的足迹。

同治二年（1863），李成领导的一支捻军为与宋景诗的黑旗军联合，进兵百里到达长清县松林赵（今属齐河）一带，击溃前来堵防的清朝地方乡团。同治五年（1866），捻军分为东、西两部。张宗禹等率军从河南中牟向西北进军，史称西捻军；赖文光等率部留在中原地区坚持斗争，史称东捻军。东捻军从河南中牟直入山东，鲁北各县如黄河北岸有盐民军（系由盐枭组成的反清武装）等纷纷加入捻军。之后，东捻军转战于河南、湖北、山东等地。同治六年（1867）十二月，东捻军被清军围于扬州。赖文光就义，东捻军最后失败。当年冬，西捻军知东捻军被围，张宗禹等行“围魏救赵”之计，立即由陕西东进，深入清廷腹地——直隶。清廷急忙调集各方力量，山东巡抚丁宝楨由德州北上“勤王”。由于众寡悬殊，张宗禹等突围南撤，经过静海、盐山、庆云，迅速南趋山东。同治七年（1868）四月，西捻军在商河县同清军提督刘松山、总兵张曜等接仗，捻军牺牲800多人，被俘数百人，遂西走禹城。

四月十八日，张宗禹部 5000 余人由茌平北上至平原，遭到刘松山部的堵击，激战一昼夜，捻军失利。张部退至禹城县的大刘庄，清军追至，双方激战，杀清廷官兵 670 人。四月二十日，捻军又同刘松山部战于宁津。

在此前后，清廷命李鸿章、左宗棠等至德州督办团练，加固城池，谋图镇压捻军。四月中旬，清军郭松林、潘鼎新等率部自天津到达沧州、德州一带，引运河水入 100 多里长的减河，使减河水深达一丈余，并在减河北岸修筑长墙。减河及其长墙阻挡了西捻军北上，捻军活动范围缩小。四月二十二日，张宗禹率军北往沧州，欲渡河北上，受清军阻击后，折回盐山，又南下运河之东的乐陵、临邑、平原、禹城。二十五日，张部自高唐至清平、博平，抢渡运河，但因黄河之水已被导入运河，运河水增长数尺，没有成功，只得东退。二十八日，张部被困于运河东岸地区，无法突围。其间，四月十八日与五月十三日，西捻军于临邑两次遭清兵偷袭，张宗禹之弟张宗先部精锐损失殆尽。

此后，雨季来临，黄河、运河与徒骇河水势骤涨，到处一片汪洋，清军的水师炮船可以上驶至德州，加强运河北路的防务，而西捻军马队的优势却难以发挥。六月十四日，捻军北上渡过徒骇河，奔往临邑。次日，在临邑、德平交界的姜镇遭到淮军的袭击。十六日，他们突至德州桑园及第二屯、老君堂，两次拟渡运河，都未能成功。此后在陵县、德平、商河、乐陵、盐山、高唐、茌平一带与清军周旋。二十八日，西捻军从茌平广平镇向东北转移，张宗禹率部突围至禹城王家桥，又被刘铭传、郭松林等部包围，张宗禹视死如归，不屈投河，全军覆没。捻军虽被镇压，但他们不屈不挠的斗争动摇了清朝的封建统治。其最后的奋斗岁月大多活动在山东北部，推动了德州民众的反清斗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基督教的传播与“德州教案”

鸦片战争以后，伴随着经济和军事侵略，西方列强图谋“用十字架征服中国”，实现所谓“中华归主”。到 19 世纪末，在中国的外籍基督教传教士达 3300 多人，建立了 40 个教区，60 多个教会，招收教徒达 80 余万。其中山东、直隶最为集中，竟出现了“教堂林立”，“传教洋人相望于道”^①的情景，甚至穷乡僻壤也有了外国传教士的足迹。

19 世纪末，鲁西北各县大都有教士活动，鲁北一带有茌平洋楼张庄教堂、临清小芦教堂、禹城的御桥韩教堂和苗家林教堂、长清张官屯教堂、武城十二里庄教堂、恩县庞庄教堂等大教堂 7 座；公堂（民房代用）216 处、会所 417 处，有外国传教士 13 名、华籍教士 15 名、贞女 58 名、教徒 18000 余人^②。其中，以美国公理会（基督教的一个宗派）在德州区域传教持续时间较长，影响较大。

咸丰十年（1860），趁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机，美国公理会在天津设传教站。光绪三年（1877），华北春旱秋涝，史称“丁戊奇荒”。趁此机会，明恩溥和另一传教士博恒理（Dr. H. D. Porter）来到恩县庞庄，以赈灾为名，给分散居住在 115 个村庄的 4000 余户、约计

^① 《山东省志资料》1960 年第 2 期，山东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83 页。

^② 《德州风物志》，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89 页。

22000人发放了将近12000元的赈济款。在此后一年里，有150余人入了教^①。光绪五年（1879），明恩溥再次到庞庄，继续以赈灾为名吸收百姓入教。次年，公理会正式派出明恩溥和博恒理驻恩县庞庄（今武城），设立庞庄教会，建立了该会在山东的第一个据点，为其向四周传教打下了基础。

光绪六年（1880）冬，教会谋求在德州一户百姓的宅地上建教堂，德州城南第七屯的寡妇吴夏氏，曾得到过传教士的“赈济”，并入了教。明恩溥等人使她立下字据，将其“宅院一处，北平房三间，西平房四间，平门楼一座，土木相连，舍给教会，作为礼拜堂”^②。此举引起了乡绅和乡民的强烈不满。

德州知州陈嗣良认为其文约违反民意，拒绝盖印并将文约中的将宅地“捐输给耶稣教公理会”改为“捐输给七屯官义学”。博恒理将此事禀告美国驻京公使参赞何天爵，何照会总署，要求按原文约盖印，不得干涉传教士的活动。十二月，博恒理面见知州，再次要求仍按原文约盖印，遭陈嗣良拒绝。

光绪八年（1882），何天爵派“苏领事”及使馆“德翻译”到济南、德州再行交涉。二月二十五日，在德州公署，陈嗣良以“天子守土，尺寸不轻与人”^③予以驳斥。当二人走出衙门时，遭数百民众围攻。三月十五日，二人由济南返京再次途经德州时，又遭到民众围攻。二人回京后，向何天爵报告说：“被人打骂，从城南直到城北。”^④何天爵接连照会总理衙门。清政府慑于美国等西方列强的压力，将陈嗣良撤调，改由陈庆成代理。

德州教案虽以清政府的软弱退让而告结束，但陈嗣良以其刚正、坚贞的民族气节赢得了人民的拥护。德州各界赠匾、万民伞以示拥戴。德州人民的斗争也使美国传教士产生了畏惧心理，此后三十年未再染指德州。

三、朱红灯与鲁西北义和团运动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大地上爆发了震撼世界的义和团运动。这是一次以农民为主体的反帝爱国运动。这一运动首先从山东发起，而德州又是山东义和团的发祥地之一。

义和团是在义和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以义和拳为主，在群众性的反教会斗争中逐渐发展壮大反帝组织。义和拳最初是乾嘉时期一个以民间秘密教门、拳会为核心的反清组织。德州是义和拳发展的中心，以朱红灯、心诚和尚等为首的义和拳义众，率先擎起了反帝斗争的大旗。

朱红灯（？-1899），是义和团运动早期首领。山东泗水县人。他自幼失去双亲，“家无亲属，只身游荡”^⑤。光绪二十四年（1898），为避水灾，朱红灯来到长清县大李庄（今齐河县）舅父刘亭水家谋生。刘亭水家境贫困，朱红灯只好一面行医，一面打短工，晚上则习武练拳。后拜“云禅寺”离卦神拳传人孙佩良（司家营人）为师，武艺大进。他以“保卫身家、

① 《武城文史资料》（第2辑）1986年刊印，第46页。

② 廉立之、王守中编《山东教案史料》，齐鲁书社1980年版，第140页。

③ 民国《德县志》卷九《宦绩志》。

④ 廉立之、王守中编《山东教案史料》，齐鲁书社1980年版，第141页。

⑤ 《山东义和团案卷》上册，齐鲁书社1980年版，第19页。

不受欺侮”为宗旨，设场收徒，号神拳，参加者甚众。当年五月，朱红灯率拳民攻打附近徐家楼、马官屯、瞿庄的教堂，同时清算了柴家洼关正清、前庄孙重兰两家恶霸地主。为了躲避长清地区地主豪绅势力——三十六庄民团的反扑，他转移至在平县的马家沙窝、陈家沙窝、张官屯、焦庄一带，在村庄设场收徒，习拳练武。以“不贪财，不恋花，尊老爱幼，和睦乡里”为口号，倍受百姓拥戴。三个月内，“在平县治八百六十余庄，习拳者多至八百余处”^①。朱红灯成为当地义和拳的首领。

心诚和尚（？-1899），原名杨俊典。因家境贫困，自幼在禹城五龙寺当和尚。白天诵经，晚上习武。武艺高强，他的头功很好，人称“铜头和尚”。光绪二十二年（1896），心诚和尚成为丁家寺的主持僧。后加入义和拳，在寺内设场练拳，成为当地义和拳首领，率众在在平、高唐、禹城、长清等地进行反洋教活动。当年三月，山东巡抚毓贤承认义和拳为民间团练并下令改名为“义和团”，从此，义和拳运动由秘密转为公开。朱红灯提出了“先学义和拳，后学红灯照，杀了洋鬼子，灭了天主教”的反洋教口号。与此同时，高唐州神拳群众至平原县杠子李庄和北堤开展练拳活动，并展开反教会斗争。拳民“夜聚明散，声势汹汹”，带动了平原县义和拳组织的进一步发展。

八月十三日，平原县杠子李庄拳民首领李长水、杨传文等与教民李金榜发生冲突。李金榜向县衙呈控，署县令蒋楷派人逮捕了拳民6人。九月五日，应李长水邀请，朱红灯等人率高唐、在平、长清等州县义和拳众二三百人，开赴平原县杠子李庄。平原、恩县拳民千余人自带武器干粮，前往杠子李庄集中，自曹州转来之一部分大刀会众亦闻讯参加。“有在平、博平传来之义和神拳，旬日间蔓延殆遍杠子李庄”^②，拳民教训了李金榜，冲击了当地的教堂。九月七日，蒋楷率人至杠子李庄搜捕，朱红灯指挥拳民“轮伏轮起，轮退轮进”^③，将勇役击退。是为杠子李庄之战。战斗中，朱红灯竖起“天下义和拳，兴清灭洋”^④的旗帜，扩大了义和拳在鲁西北的声势和影响。

蒋楷向山东巡抚毓贤求援，九月十一日，毓贤派兵前往平原镇压。十三日，朱红灯率队前往攻打恩县城西刘王庄教堂及城西北庞庄教堂，当晚住宿距平原城18里之森罗殿。第二天，清军赶往森罗殿，双方激战数小时，互有伤亡。清政府援军赶到后，朱红灯退回在平。森罗殿之战，朱红灯曾一度击败清军，使鲁西北义和团的声威大振，加强了在平、高唐、平原、恩县等地义和团联系，以至“济南至德州三百余里皆其党羽”^⑤。战后，朱红灯与心诚和尚等义和团首领聚会于禹城丁家寺，商讨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决定兵分两路，开展“反教灭洋”斗争。十月初二，心诚和尚与朱红灯率义和团攻打禹城苗家林庄教堂，放火烧了教堂。然后又向在平进发，攻打在平张官屯教堂，并将平日欺压乡里的教徒王观杰杀头示众。十月

① 李文海等编著《义和团运动史事要录》，齐鲁书社1986年版，第39页。

② 民国《平原县续志》卷九。

③ 蒋楷《平原拳匪纪事》，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56页。

④ 《汇报》，第146号，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初十日。

⑤ 《汇报》，第136号，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一日。

十三，攻打并焚烧了茌平地区的总教堂——大张庄教堂，“因火势蔓延，燃着堂内存储火药，致将洋式教堂十六间及教民住屋一百八十余间延烧。”^①十五日，朱红灯与心诚会合于博平华岩寺，因内部发生矛盾，朱红灯头部被砍伤数处，“受伤甚重”^②。

义和拳的反洋教斗争，引起了西方列强的不满和敌视，他们对清政府施加压力。清政府下令捉拿朱红灯、心诚和尚等义和拳首领。毓贤派济东道吉灿升、东字军正军统领马金叙前往“查办”。马金叙探得朱红灯只身躲到五里庄，便率军扑向五里庄。正好朱红灯身背粪筐往外走，被马金叙捕获。十月，马金叙将朱红灯和在高唐州抓获的心诚和尚一并从茌平县押至济南巡抚衙门。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二人同时被杀于济南。

光绪二十五年（1899）十一月，署山东巡抚袁世凯抵达济南后，随即发布《查禁义和拳告示》，对义和拳实行以武力镇慑为主，招抚为辅的政策，使山东义和团运动很快走向低潮。但是山东尤其是德州区域的义和团运动并没有销声匿迹，并且在清廷实行招抚政策之后，一度有所复起。高唐拳首王立言带领其众，在高唐、茌平、禹城等地坚持斗争。直隶、山东边境地区义和拳互有“往来”，如十一月十三日，直隶献县义和拳前往德州，捣毁该处教堂；二十九日，德州义和拳开赴直隶吴桥庞家桥，与当地拳民联合，聚众二三百人，焚毁教堂一所。

武城县义和拳在王玉振的率领下，继续开展活动。光绪二十六年（1900）二月十一日，百余人进入夏津县师堤庄，将三间教堂砸毁。十三日，他们于杨庄与清军发生激战，王玉振等被杀。三月十四日和十六日，王立东、李传和等率拳众百余人，在临邑田家口、禹城王彩武庄等地开展“闹教”活动，袁世凯派兵镇压。十八日，王立东等于山东临邑之庞河附近村庄与前来追捕之清军发生战斗，拳首王文义、张德胜等战死。

德州义和团不屈不挠的斗争，推动了山东、直隶一带义和团运动的发展，有力地打击了西方教会势力和当地封建统治，向外国侵略者显示了中国人民特别是鲁西北人民不甘被奴役的抗争精神。

四、王金铭与滦州起义

王金铭（1880-1912），字子箴，山东武城县老城镇东屯村人。18岁时弃农从军，入袁世凯新建陆军当兵。因品学兼优，被选送讲武学堂学习，毕业后提升为正目（班长）。后又提拔为北洋常备军第二镇第七标某营左哨哨官（相当于连长）。光绪三十三年（1907），王金铭调升第一混成协某标一营帮带（营副），驻防奉天新民府（今辽宁省新民县）；宣统二年（1910），任新军第二十镇第四十协第七十九标第一营帮带，后升任管带（营长）等。

王金铭仕途上虽比较顺利，但报国壮志难伸。这期间，清王朝的统治愈加腐朽，外国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愈加疯狂。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大举入侵中国。三十年（1904），日俄战争爆发，清政府厚颜宣布“局外中立”。面对愈演愈烈的民族耻辱及人民苦难，王金铭既痛恨帝国主义，又痛恨清王朝的腐败，于是，反帝反清的思想情绪开始萌发。

①《山东义和团案卷》上册，齐鲁书社1980年版，第9页。

②《山东义和团案卷》上册，齐鲁书社1980年版，第16页。

20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宣传日益广泛。光绪三十四年（1908），革命党人孙谏声、戴锡九等从日本归来，打入二十镇，充任下级军官，向王金铭宣传三民主义的思想主张。在革命党人的启发下，他逐渐认识到只有彻底推翻清王朝腐朽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国才能独立富强。当年，王金铭与二十镇青年军官施从云、冯玉祥（八十标三营管带）、郑金声（八十标一营管带）、王石清（八十标二营管带）及岳瑞州等六人，秘密成立了革命团体“武学研究会”，推举冯玉祥为会长。他们以研究“武学”为名，实则传播革命思想，密图举事。

武学研究会发展迅速，在二十镇（统制为张绍曾）反响很大，引起了外间的猜疑。为了隐蔽并继续发展革命力量，宣统二年末，王金铭提议另设山东同乡会，以掩护武学研究会的活动。遂与山东同乡孙谏声等成立“山东同乡会”。因第四十协协统（旅长）潘榘榘也为山东人，便商请潘参加。潘允诺担任“山东同乡会”会长，王金铭任副会长。“山东同乡会”成立后，凡山东籍官兵均为“基本会员”，外省官兵为“名誉会员”。王金铭任“会内干事”，施从云、冯玉祥等任“会外干事”，并派出孙谏声、鹿钟麟等以同乡会名义到奉天、北京、天津等地联络会员。王金铭还动员会员想方设法筹集资金。经努力，筹集了大量资金，秘密购置了一批军火。

宣统三年（1911）夏，王金铭等人和天津“北方革命协会”的白毓昆（字雅雨）取得联系，密买枪械，准备武装起义。同年八月，清朝政府决定举行秋操演习，部队遂开赴滦州。王金铭等本来希望吁请张绍曾、吴禄贞和蓝天蔚趁机起义，攻取北京，但张因本镇高级将领多为立宪派，有所顾忌。结果，张绍曾被削去兵权，离职而去。王金铭等认为革命工作绝不能以张绍曾的离去而中止，继续积蓄革命力量，准备武装起义。

武昌起义发生后，各省纷纷宣告独立。在滦州的王金铭进一步坚定了武装起义的决心。经过酝酿，宣统三年十一月十一日（12月30日），他和施从云、白毓昆、鹿钟麟等于城北师范学堂营部召开军事会议。当即决定起义，并推举七十九标标统（团长）岳兆麟为北军大都督。与此同时，王金铭派人面告冯玉祥起义计划，又派人去秦皇岛约骑兵三张（张之江、张树声、张振扬）如期起事。因滦州革命形势的发展引起清廷戒备，冯玉祥遂被监禁；三张正准备率部出发时，亦被扣留。当晚，王金铭便以施从云、冯玉祥三人名义向清廷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等，发出了主张共和的通电，同时，还向上海议和代表及顺直咨议局等发出了通电。

他们这样大张旗鼓地制造声势，给清军提供了防范之机。岳兆麟是一个反对革命的军官，第二天一早，他就逃往开平，向通永镇守使王怀庆告密。王又转告袁世凯，袁采取剿抚兼施的政策。一面调第三镇统制曹锟配合王怀庆领兵镇压，一面派王怀庆至滦州“劝解抚慰”、“察其真象”。王怀庆采取了软硬兼施的手段，以求说服王金铭，但遭到严词拒绝。第二天，王怀庆借机溜走。就此，王金铭决定立即组织武装起义，宣布成立“北方革命军政府”。王任大都督，施从云为司令官，冯玉祥为参谋长，通电全国，宣布独立。他们计划先取天津，

后进攻北京。然而，部队刚开出滦州城，身为义军副司令的张建功便据城叛变了。王金铭怕贻误战机，只留少数部队殿后阻击，命其余部队悉数登上火车，挥师西进。行至雷庄附近时，铁路被王怀庆破坏，火车出轨倾覆，官兵受伤严重。王怀庆率部以密集火力向起义军猛烈射击，王金铭、施从云身先士卒，率部英勇还击。战至黎明，王怀庆部渐渐不支，后援军赶到，才占据优势。王怀庆提出请王金铭、施从云到雷庄车站议和。王、施认为：“如果和议能成，双方免受无所谓的牺牲，一直可攻京津，如出意外，以身殉志，求仁得仁，有何憾焉。”王、施二人遂不顾众将士劝阻，毅然来到雷庄。王怀庆早已设下埋伏，王、施等人一到，即被扣押。民国元年（1912）1月5日，袁世凯下令将王金铭等就地处决。王金铭英勇就义，年仅32岁。

王金铭去世后，几经辗转，被安葬于武城县。民国二十六年（1937）他又被追认为陆军上将。1990年10月，武城县人民政府为王金铭烈士修建了永久性陵墓，供后人凭吊和纪念。

王金铭领导的滦州起义，虽因准备不足、革命军力量弱小、轻敌等原因而失败，但也沉重打击了清廷的反动统治，极大地鼓舞了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正如民国二十六年《国民政府令》所述：“辛亥光复，发轫于武昌，而滦州一役实促其成。”

五、保家卫乡“红枪会”

民国时期，由于匪乱猖獗、军阀混战所导致的社会动荡，在传统信仰、崇武、械斗之风盛行背景下，以及吏治败坏、自然灾害等诸多因素的作用，活跃于中国北方农村的一种带有浓厚迷信色彩的农民武装组织——红枪会便应运而生。

红枪会是以成员使用的武器——系着红缨的长矛而得名，除红枪会本名外，还有因长矛缨色不同而称为黄枪会、蓝枪会、白枪会、黑枪会等，其中以红枪会最为通行，故史料文献多将这些团体统称为“红枪会”。红枪会起源于八卦教，它继承了八卦教流裔大刀会、义和拳的组织传统，是在金钟罩等民间秘密社会组织发展融会的基础上形成的民众自卫武装组织，从其组织仪式看，具有某种秘密教门特征。从民国初期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其活动范围涉及19个省份。

鲁西北的红枪会多集中在德县、陵县、夏津、禹城等地。他们的目的是“积极御匪，消极御兵”。其中，德县和陵县红枪会在山东发展比较早，影响也比较大。自民国十三年（1924）出现，德县的土桥一带便成为红枪会活动的中心。

1926年，原德县七区王张屯人（今袁桥东部）张老五组织红枪会（九宫道），自称大师兄。“宗旨是保家防匪，联络信号是击鼓敲锣。战斗时，先释坛、唱符，然后冲杀呐喊，不畏刀枪”^①。该年秋，德、陵、恩三县有100多个村庄起来响应张老五，因而这一支红枪会很快成为德、陵一带红枪会的中心。该地区红枪会有快枪，多半由自耕农自置，有一支15000人的队伍，枪支6000余支。靠近德县的陵县北关、于家道口、东凤凰店、赵家寨、霍家寨一带，几乎无村不有红枪会，参加的人数占各村的三分之一，声势很大^②。八月初四晨，由

^① 陆学艺主编《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陵县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582页。

^② 朱玉湘《中国近现代史论丛》，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20页。

德县县长升任德临道的道尹林介钰（安徽怀远人）率一营兵力从德州向袁桥进发，声言要剿灭红枪会。张老五闻讯后便擂鼓聚众，北起桑园、东至德县的各地红枪会会众闻讯蜂拥而来，红枪会四万余人向军队围攻，因红枪会人多势众，林部战败，林介钰被擒。边临镇红枪会会首、士绅刘文远为林介钰说情，加上林氏发誓不再与红枪会为敌，便被放回。

同日，林回德县后连夜到济南向张宗昌求援。张答应派兵镇压，林返回后组织地方官员诱杀了张老五，随后张宗昌大兵压境，进攻袁桥的红枪会。红枪会初期一度获胜，与张宗昌之第五军在德州发生冲突，张军有一个团被完全击溃。但终因红枪会失去首领，加之遭突袭，36个村遭屠杀，百姓死伤数千人，德、陵的红枪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后来，二师兄范金玉又到陵县重组红枪会。1937年3月，陵县的红枪会在德县菜园庄，同张宗昌的贺文良旅相遇，打死贺旅士兵十余人。但终因实力相差悬殊，最终失败。此后德、陵等各县的红枪会走向衰落。

“七七事变”后，韩复榘采取消极抵抗对策，导致山东大部很快沦陷，地方行政混乱，兵匪群起，形成了日伪、国民党与共产党各派势力并存的局面。复杂多变的政治局势既为红枪会的兴起提供了有利的社会背景，同时也决定了红枪会兴起后在政治上呈多元化发展趋势。鲁西北各县大部分红枪会组织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抗日，成为重要的抗日武装。另有部分红枪会组织虽然积极抗日，但独立于政治势力之外，同国民党、共产党都没有瓜葛。此外还有些红枪会勾结敌伪，投日反共。1939年冬，禹城伦镇伪区长李大英被处决后，红枪会头目李德吉接任其职。李德吉变节投敌后横行乡里，期男霸女、无恶不作，后被游击队长耿黄等击毙。解放战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鲁西北各县的红枪会组织大多被取缔或自行消亡，只有少数的红枪会组织仍秘密存在，继续进行传道活动，成为地下反动会道门，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为止。

鲁西北地区的红枪会产生于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初期曾对于抗击军阀、土匪，保卫家园及领导农民抗捐抗税等方面起过积极作用。为此李大钊曾撰文说：“红枪会采用现代新式的武器，这一个事实，将要在我国农民武装自卫运动史中开一新纪元，可以说这是中国农民运动的一大进步，同时亦可以认作乡村中小有产者起来反抗兵匪的一个表征。”^①农民已经被现代化的武器“现代化”了。但是，红枪会的思想意识又具有某种传统落后性，缺乏明确的目标，其组织也极其散漫，甚至出现过危害地方、滥杀无辜的行为，正是由于其落后性及秘密教门性质，新中国成立后即被政府取缔。

第二节 曲折的近代化之路

十九世纪末，随着“实业救国”思潮的兴起，在政府和民间两方面的推动下，德州也开始了艰难的近代化之路。北洋机器制造局的创建，标志着德州近代工业的诞生，津浦铁路的

^①李大钊《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李大钊文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75页。

开通，进一步加强了德州交通优势，促进了德州的近代化之路。

一、北洋机器制造局与德州近代工业的诞生

《辛丑条约》的签订，对清政府在津京地区的军事设施有所限制，光绪二十八年（1902），直隶总督袁世凯将天津北洋机器制造局的残余机器（1900年被八国联军毁坏）移至水陆交通便捷的德州，成立了德州北洋机器制造局，至1925年冬停办，前后在德州存在23年之久。其间，民国元年（1911）德州改为德县，德州北洋机器制造局更名为陆军部德县兵工厂。

德州北洋机器制造局位于德州西门外运河码头东岸的花园，东临（日后所建的）津浦铁路火车站，西枕京杭大运河，南至豆腐巷，北至上码头村，全局南北长近1000米，东西宽约600米，总面积为67万平方米。规模很大，占地700余亩。德州北洋机器制造局工程自光绪二十八年（1902）秋开始动工，经两年零两个月，主体工程基本建成。计有机器厂、快枪子厂、新枪子厂、无烟药厂、棉花药厂、镗水厂等13个工厂。后来又增设了纸盒厂（造纸厂）、炮子房及弹药库。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又进行较大规模的扩建，计扩建厂房113间、储药库一座，办公楼一座。共有大小房屋689间，该局机器设备绝大部分从德英进口，并装有发电设备。主要产品为军火及军用器械，如“七九”子弹和“六五”子弹、炮弹、火药等，各种枪弹一般每年可制造1500万粒至2000万粒，最高可达4000万粒。

德州北洋机器制造局是清政府设立的官办企业，隶属于兵部，其主要管理者称总办（总理局务，副将衔），下有会办、提调、监理等，分别帮办局务、总管厂务和监理军火制造。内设文案处、收支处、报销处等十余个处、所和十三个分厂，各厂厂务由提调总管。进入民国后，工厂隶属于陆军部，工厂长官初称督理，1914年改称总办（将军衔），下设会办。组织机构有的仍称处，有的改为股。各厂管理者改称主任，并设管理员、司事等。

德州北洋机器制造局成立初期，经费较为充裕，工人最多时达5000余人。工人大多来自市郊农村，也有一部分是城内居民和乞讨者，他们构成了德州早期的产业工人。民国成立后，由于政府财政困难，经费无保障及拖欠工人工资等因，工人数量锐减。谢帮清任总办时，员工裁减一半，工人减少到2000多人，到1924年，工人降至1700人。

1916年2月，德县兵工厂强令工人加夜班赶制枪弹，却不给加班费，引起工人的强烈不满，13个分厂的工人同时罢工。工人代表陶文明、马啸与厂方谈判，提出如不补发加班工资决不复工。罢工坚持了5天，迫使厂方答应了工人的要求，罢工取得初步胜利。但工人复工后不久，北洋政府就指令县公署捕杀了陶文明，马啸则化装逃脱。

1925年4月，段祺瑞命张宗昌（1881-1932）督办山东军务，直隶军务督办李景林（1885-1931）则控制着德州以北广大地区。二人虽同属奉系，但为扩充实力、争夺地盘，张宗昌采取了先下手为强的策略，匆忙将德县兵工厂关闭，拆卸部分中、小型机器和部件运至济南新城兵工厂，大型机器设备和厂房则废弃，工人大部被遣散，兵工厂后成为军营，机器设备逐渐被军阀武装以废钢铁出卖，德县兵工厂停办。

德州北洋机器制造局的开设是德州大机器生产的开端，标志着德州近代工业的诞生，

对于带动一些相关产业的近代化起了促进作用。

二、津浦铁路的开通与德州交通区位优势的增加

津浦铁路开通之前，便捷的水陆传统运输使德州成为鲁西北、冀东南一带重要的货物集散地和商业中心，市场影响范围东至陵县(70华里)，西抵枣强(110华里)、南宫(180华里)、冀州(140华里)、武城(110华里)，向北到景县(60华里)，向南到黄河涯(30华里)。以上地区的农产品输出和日用品、洋货输入基本靠德州来维系。津浦铁路开通后，这种状况发生了较大的改变，传统的水路运输方式受到较大的冲击，部分长距离运输被近代化的交通工具——铁路所取代。铁路便于沟通内地和沿海，加速客货流通，德州交通区位优势由此得到了加强。

津浦铁路是近代中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北起天津(今天津北站)，南至江苏浦口，途经直隶、山东、安徽、江苏四省，全长1009.48公里，后因故延至天津东站，正线全长为1013.83公里。

光绪二十五年(1899)四月，清朝政府决定兴修津镇铁路，因义和团事起，未能修建。光绪三十四年(1908)，根据张之洞的建议，清政府改津镇铁路为津浦铁路，与英德两国正式签订《天津浦口铁路借款合同》，自行修建。借款500万英镑(续借480万，共980万英镑)，年息5厘。施工分南北两段，南段自山东韩庄至浦口，长383公里；北段天津至韩庄，长626公里。以山东峄县(今枣庄市峄城区)韩庄运河桥为界，北段由德国工程司承筑(总工程师为德浦弥勒)、南段由英国工程司承筑(总工程师为德纪)。

据光绪二十五年(1899)签订的草合同，英德两国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之前派人将南北两段勘测完毕。

南北两段分别组织雇用沿线农民施工。北段工程于光绪三十四年六月初二开工。宣统二年(1910)第四大段、第五大段施工进入德州、济南一带，经过马颊、徒骇、黄河诸河，因土质松软，桥梁墩台施工困难；济南以南为第六大段，岗峦重叠，步步升高，是北段中施工难度最大的一段。施工期间，德州站至黄河北岸一段，材料从德州陆运，并自鹊山站至禹城站间修运料便线62公里。另据民国《德县志》记载：“宣统二年，津浦铁路在城西阻当(挡)至河干大路，邑人吴光弼等极力交涉，另开桥洞使得通行”^①。南段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二月中旬开工，因为英德之间的竞争，进展也很迅速，宣统三年六月(1911年8月)南段竣工，八月北段竣工，九月南北两段接轨。1911年11月，泇口黄河特大桥建成，随即全线通车^②。

津浦铁路设站85个，山东境内31个。津浦铁路山东德州段共约119公里，自北而南沿线各主要车站如下：德州-黄河涯-平原-张庄-禹城-晏城。德州火车站是当时的一等火车站，于宣统二年(1910)建成。民国二年(1912)2月，德州站改成德县站。民国三十七年(1948)县改市时，复称德州站。德国建筑师吸取中国传统建筑形式的特点，将德州火车站房设计为

^① 民国《德县志》卷二《纪事》。

^② 济南铁路局史志编纂领导小组《济南铁路局志(1899-1985)》，山东友谊出版社1993年版，第69页。

大屋顶。平面为矩形，二层砖石结构，屋顶覆以红瓦，屋顶的主体为四坡顶，正脊的中间与当地居民的做法一样，置房形饰物以求吉祥。屋顶的两端沿正脊的垂直方向各出一歇山顶，形成“工”字形重檐的屋顶形式。屋顶檐口四翼按照清式做法出翘、起翘。为与当地建筑风格协调，其细部做法也采用当地传统做法，如出屋面的壁炉烟囱上端置一个小四角踏尖顶子。整个建筑硕大，颇具气势，是当时中国铁路火车站中独具特色的一座建筑物^①。由于遭到战争破坏，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原站舍残破不堪，1959年2月拆除。

津浦铁路由北而南，将山东境内的德州、平原、禹城、济南、泰安、曲阜、兖州、济宁、邹县、滕县、峄县等地连接在一起，使上述地区的商品流通沿着这条运输线，北可与天津相通，南可与徐州、蚌埠、南京相连，并可通过沪宁线与上海相接。津浦路在济南与胶济路会接，货物运输可直达青岛，从而加强了德州区域与沿海青岛港及上海等地的贸易联系。

津浦路开通后，德州成为该路山东段三个大的集散市场之一。德州通过津浦铁路由天津、济南输入的货物，以煤、煤油、纸、烟草、棉纱、棉布、陶瓷器、杂货为大宗，输出的货物以棉花、皮货、花生、枣、干鲜果、羊毛、粮食、铁锅、藤编物为大宗。据1916年统计，德州每年自铁路输入煤2万余吨、煤油1000余吨、棉织品2000余吨、纸600余吨，每年自铁路输出各种杂货1300吨、皮货1300担、棉花500吨，花生、枣、干鲜果各300吨^②。此时，津浦铁路对德州商业的意义已大大超过运河。1920年代初，德州一度成为鲁西、冀南棉花的集散地，年棉花集散量达6万包，其中4万包运天津，2万包运济南。但是，棉花交易主要在产地花行与天津、济南的花行之间进行，德州一般只是起运输中转作用，而且从趋势上看，棉花集散已出现向济南市场转移的倾向。这一时期，铁路运输增长较快。经由铁路，德州每月要向天津发运皮货2000余担、水果400余担，每年向济南发运棉花1000吨、铁器1000吨、牛12000余头；同时每年自天津输入煤油10万箱，自济南输入盐1万包、棉布1万公斤。通常，德州车站每周要接卸两节货车（每节15吨）的外国杂货，这一情况表明，当地外国商品的商贸流通已达到相当规模^③。

铁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虽是军阀混战和列强掠夺物资的重要工具，但对发展经济、加速社会进步有重要意义。津浦铁路的开通一方面冲击了传统的交通运输方式，另一方面使德州区域在近代交通中的优势得到加强，促进了近代化交通事业的发展，对德州区域经济发展及思想观念的解放有深远的影响。天津、济南、上海等市场的进口货和其他日用工业品，如棉纱、棉布、煤油、火柴等，也开始沿着同一途径按照相反方向输入到沿线城镇和乡村。德州区域在近代化交通方式方面的优势得到加强。

三、运河之衰与近代德州城乡经济变迁

京杭大运河德州段，由卫运河和南运河组成，全长141公里，其中，卫运河96公里，南运河45公里。自四女寺水利枢纽节制闸至天津段称南运河。

① 罗哲文、杨永生主编《失去的建筑》（增订版），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年版，第146页。

② 杉山五郎《最近山铁沿线事情》，1917年版，第336-337页。

③ 庄维民《近代山东市场经济的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89-91页。

卫运河是由卫河与运河汇流而成，汇流后的卫运河向北流经油坊、武城、郑家口、德州，然后经东光、南皮、沧州、静海，最后到达天津。清末，由河南上航天津的货船每年约 5000 只，由天津回航船数大体也不少于此数。另据民国初年临清常关统计，临清与天津间往来民船每年约 4500 只。由临清溯河上行至德州，水程 360 华里，两地间有几处大的水运码头，自临清由南而北依次为油坊（60 华里）—武城（90 华里）—郑家口（70 华里）—故城（70 华里）—德州（70 华里）。各码头间的距离大致均为一天的航程。

德州地当水陆交通要冲，在津浦路修通之前，从天津运济南的货物要在德州卸船装车转运，而从济南运天津的货物也要在德州装船，德州至天津水程约 580 华里，顺风行驶 5 天可到，逆风行驶则需 8 天。德州、天津间有七处大的水运码头，由南而北依次为：桑园—连镇—泊头镇—沧州—兴济镇—唐官屯—独流镇。两地间水路运输非常频繁，仅德州城外码头停泊的船只每天就有七八十只之多^①。

咸丰五年（1855）后，因黄河北徙截断运河，黄水灌入运河，致使河道淤塞，航运受阻，漕运也由此改为海运。同治年间，山东段运河虽曾数次疏浚，但由于不断淤垫，航运仍是时通时阻。受此影响，江北过运漕粮每年不过十几万担，只及过去全漕起运的十四分之一。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被迫停止漕运，此后，山东段运河淤塞更加严重，过往船只数量大为较少，载重量也很小，德州区域的运河商路贸易趋于衰落。

民国以后，运河“岁久失修，淤垫日甚”。由于运河水量不足、淤塞严重等因，运河商路呈衰落之势。津浦铁路的开通，更是给运河运输以致命性的打击。运河昔日在商业贸易中的地位便逐渐被铁路所取代。一些传统的水陆交通受其冲击，货运量逐年减少，运河商路走向了全面衰落。原先依赖于运河商路贸易繁荣起来的沿河商业市镇，也变得一蹶不振，不复有昔日繁荣熙攘的景象。

按照一般的道理，津浦铁路的开通使德州与津、济、青、沪等大城市直接联系起来，有利于发展工商业，能够弥补运河运输衰落的不足，但是由于军阀混战、兵匪战祸等因，德州区域的工商业并未因此而繁荣起来。自 19 世纪末起有着 1000 多年历史的运河区域经济已趋于全面萧条，沿河城镇逐渐衰败。

晚清时期，德州运河区域经济出现了由盛转衰的趋势。明代和清前中期，德州区域经济曾十分繁荣，德州仓成为运河沿岸的四大名仓之一，还是全国商业发达的 33 个城镇之一。清代前期河运兴盛之时，每年承运漕粮的运船六、七千只。按规定，凡漕船出运，除装载正耗粮米外，还可附带一定数量的免税土产货物。如果每年出运漕船以 6000 只计，每船平均携带“土宜”150 石，则嘉道年间漕船每年所带的免税商货有 90 万石之多。再加上旗丁水手携带的走私物品，数量更为可观。漕粮河运使得德州区域相关贸易频繁，推动了德州的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

德州运河区域城镇的商业社区中，分布着大大小小的手工业作坊，清末德州的竹竿巷中

^① 庄维民《近代山东市场经济的变迁》，中华书局 2000 年版，第 115 页。

共有作坊 20 余个，产品上百种，有日用器皿、农具、玩具等。从事铜器、金银器、食品、家庭器用等手工工场在德州运河区域城镇也很普遍，但多为生产经营性质的工场。当地居民也广泛参与到这种商业活动中，“几乎家家户户打锅饼、烙麻酱火烧，或烧羊肉，到处摆摊售卖”^①。德州最著名的杂货店为德合号和德大号，均经营纸类、江大米、红白糖等与运河有关的商品，并随运河的畅通而持续了 200 多年。当地的农产品，如红白麦、吉豆、芝麻、玉米等，畅销外地，“颇属繁盛”^②。

由于各地商贾的大量涌入，德州邸店、酒楼、茶馆等消费行业得到很大发展。由于受南方及京城多茶肆、茶坊的影响，德州的茶馆、茶楼甚多。运河附近的桥口、北厂等粮行客棧汇集的市街以及城内的喧哗角，仍开设着相当规模的茶馆，如清泉居、迎春居等。当时，德州戏楼很多，城隍庙正殿东侧搭建起专供剧团演出的戏棚和“国民大戏院”，进德分会处建有“移风社”。另外还有用席棚临时搭建的书场，多处茶馆中几乎都有书场，各种曲艺如大鼓、渔鼓等可在此演出，武术、戏法、山东快书等则在露天演出，河北梆子、京剧盛行不衰。

由于历史的惯性，晚清时期，德州运河区域的某些手工业，如制瓷业、棉纺织业、酿造业、竹木加工业等依然兴旺。

进入民国后，德州的城乡经济较明清时期已大为衰落。由于津浦铁路天津至德州段沿着南运河东岸修建，南运河在德州经济中的地位已大不如以前。20 世纪 20 年代，德州运河东岸已是商业寥落，人烟萧条，到 30 年代，商业区已转至喧哗角，那些为绅商官僚服务的大饭店如三盛园、鸿盛楼、德庆园、江南春、庆华园等都先后在喧哗角开业。较大的商号多集中在南门里街、当铺街、市府街及州署衙，如公和、瑞合成、中和商行、振兴布庄、华振茶店、广兴合茶庄、永丰茶庄、颐寿堂、延寿堂药店、呈庆酱园、山城玉银号、协记号等都集中于此^③。

整个民国时期，大运河仍然发挥着一定的作用。民国初年，德州至临清、天津的船只，主要有槽船、粮跨子等。据民国《德县志》载：民国九年前后，临清、德州至天津间每年往来的民船约有 4000 余只。从民国初年至 20 世纪 30 年代，德州沿运河地区的各种土产，通过铁路和运河运到天津。而德州区域每年输入的大量洋纱、洋布等，大多从天津水运而来。由德州输出输入的货物，并不是全产于或销售于德州，许多是产于或销于德州附近各县。“德县（德州）每年输出羊毛约 2500 吨，牛皮约 1000 吨，全部经南运河河道运销天津；每年输出棉花约 3000 吨，大部分经南运河运销天津”。由于水陆两方面的运输，民国初年，德州的工商业仍然保持着相当的规模。直、鲁、豫三省商人在该处设肆贸易者已有百余家之多。

津浦铁路的开通使德州区域各城镇的经济到 30 年代有所恢复和发展。1933 年，德州计有棉业、粮业、钱业、竹业等 34 个同业会，入会店铺、作坊合计 428 家。1937 年 10 月初，日军占领德州，德州的工商业受到很大冲击。1946 年，德州解放，德州经济获得较快的恢

① 冯翥《德州乡土志·户口》，台湾成文出版社 1968 年影印本，第 186 页。

② 民国《德县志》卷十三《风土志》。

③ 德州市商业局编《德州市商业志》，1986 年刊，第 5 页。

复和发展。

晚清至民国时期，德州区域水陆运输的变化促进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棉花种植的扩大是其突出的表现。据统计，1919年，德县种植棉花9万亩，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9.1%。到1933年，种植面积达17.05万亩，占13.6%。1937年日军侵占德州后，当时伪山东省政府在全省设立六处棉产指导所，其中德县指导所分管德县、平原、恩县、禹城、齐河等县的美棉推广工作。由于德州地处津浦、石德两大铁路干线交会点，又有运河航运，曾一度成为冀鲁边区的棉花集散重地。当时德州区域经营棉花行业的商号有几十个，一到棉花收购旺季，来自高唐、夏津、恩县、武城一带的棉商大小车辆便云集城内，棉花商行除坐等收购外，还到城郊各集市收购，当时城东土桥、艾家坊等集市，专设棉市，交易十分兴旺。随着棉花种植面积的进一步扩大，德州区域城乡居民输入粮食的需求增加，20世纪30年代，德州城内的粮行有32家，并由此带动了冀鲁边区粮食生产商品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德州早期地方组织及其活动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倍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奴役压迫的中国人民有了更为坚强的领导力量。此后她为争取民族独立、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开展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德州人民也踊跃加入到这一伟大斗争的行列之中。

一、后里仁庄党支部与德州早期革命活动

1924年，由齐河籍党员贾乃甫创建的中共后里仁庄党支部，是目前所知德州区域最早的中共党组织。

贾乃甫（1900—1964），字石亭，齐河县安头乡后里仁庄人。1920年，他考入山东商业专门学校。期间，他参加了王尽美、邓恩铭等领导的“励新学会”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2年，经王尽美介绍，贾乃甫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并随之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任济南青年团地方团宣部长。1923年8月，出席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同年10月任济南团地委委员长。后根据中共党、团地委的指示加入国民党。贾乃甫经常借回乡探亲的机会，宣传中共的政治主张。1924年，受中国共产党的委托，贾乃甫在后里仁庄发展了贾乃俄、曹××为中共党员，组建了鲁北地区第一个党支部——中共后里仁庄党支部。“负责人贾乃甫（贾石亭），成员贾乃俄、曹青年”^①。支部直属中共济南地方委员会领导。

后里仁庄党支部成立后，领导当地人民开展了反“讨赤捐”活动，向人民宣传反剥削、反压迫的革命思想，号召农民不给反动军阀纳税完粮。他们将反“讨赤捐”的传单贴在禹城县政府的大堂上。地方政府最终迫于压力，不得不缓征捐税，中共党组织在地方上的影响随之扩大。

后里仁庄党支部还团结了一部分进步青年，开展了反封建、破除迷信的活动。他们号召

^①中共山东省组织史资料编辑领导小组《中国共产党山东省组织史资料1921-1987》（送审稿）1990年版，第29页。

妇女放足，男人剪掉辫子，组织人员到周围村庄拆庙或把神庙改为学堂。这些活动在当地引起很大震动，也受到上级党组织的表扬。1926年，贾乃甫在济南被军阀张宗昌政府逮捕，后经保释出狱。此时，中共山东省委和一些地方党组织遭到破坏。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后里仁庄党支部被迫停止了活动。

后里仁庄党支部是当时鲁西北第一个共产党支部，也是山东省建立最早的农村党支部之一，尽管存在的时间不长（1924-1926），但它的活动却使当地人民群众受到了一次革命思想的启蒙教育，为鲁北人民的觉醒，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此后，德州区域其他各县也相继建立了共产党组织。1925年，中国山东区委派遣李宗鲁、延伯真、杨笙甫等人先后来到鲁北开展工作，使鲁北各县党组织有了较快发展。第二年夏，杨笙甫在平原县立中学发展了一批党员，并组建了平原县党支部。到1926年上半年，鲁北已有9个县成立了党组织。为了加强党的统一领导，同年秋末，经中共山东区委同意，在平原县建立中共鲁北地方执行委员会，由李宗鲁任负责人。鲁北地委先后隶属中共山东区委、省委，辖平原、禹城、夏津、恩县、德县、临邑、商河、陵县等县党组织。约在1927年夏，杨笙甫任中共鲁北地委书记，李宗鲁、马绳武分别任组织和宣传委员。为了宣传党的思想，鲁北地委还创办了机关刊物《鲁北》（后改为《露白》）。到该年7月，鲁北共有党支部12个，党员87名，团支部5个，团员37名。

1927年中秋节前后，中共山东省委在平原城东三里杨村的共产党员任玉峰家召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省委书记邓恩铭、刘俊才（刘子久）和鲁北县委的主要成员，会议内容是传达党的“八七会议”精神^①。

同年九、十月间，鲁北地委改称鲁北县委，并在平原召开了鲁北第一次党代会。会上，县委书记李宗鲁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屠杀共产党人的罪行，传达了中共“八七会议”精神，提出了建立党的武装力量的主张^②。此后，鲁北县委在平原城东潘庄张宁宇家召开了一次陵县、平原、禹城、夏津、德县、临邑、商河、高唐八县党的工作会议（简称八县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省委派来的延伯真、王乃河（后叛变）、刘秋，鲁北县委的李宗鲁、张宁宇以及上述各县负责人等。现已知禹城出席会议的代表是张巨涛，夏津为刘君雅，陵县为王凤岐。会议内容是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发动八县农民暴动，扩大革命声势，夺取政权，建立苏维埃。成立了暴动行动委员会——“鲁北行动委员会”，鲁北行动委员会的主要成员有李宗鲁、王旭鹏、杨笙甫等。着手组建农民武校，筹划农民暴动。会上还赶制了十二面大旗，规定了纪律^③。同年底，县委领导了平原、德县等8县农民暴动。由于条件不成熟，暴动失败，鲁北党组织遭到破坏。

① 《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编辑组《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一辑（下），山东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1页。

② 《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编辑组《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一辑（下），山东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1-22页。

③ 《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编辑组《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一辑（下），山东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2页。

德州北部的乐陵、庆云、宁津等县，在这时也都建立了党的组织。1927年2月，刘格平在盐山县堤东村建立了中共津南特委。早在1925年5月，津南特委决定将中共庆云-盐山县委(书记为邸玉森)分别成立中共庆云县委和中共盐山县委。1928年春，中共庆云县委组建了津南革命军，并举行了武装暴动。但暴动失败，县委遭到破坏。

二、中共鲁北特委与马颊河暴动

1928-1933年，由于中共山东省委接连遭到几次严重破坏，致使各地党组织也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鲁北党组织与省委的联系时常中断。因此，鲁北党的活动是在较长时间不能得到上级党组织指导的困难条件下摸索前进的。尽管如此，鲁北地区中共党的活动仍在继续。

1928年4月，中共山东省委撤销鲁北县委，组建鲁北特委，李春荣(1906-1928)任书记，金谷兰、李宗鲁、于赞之、张干民为委员。特委在当时执行了“左”倾盲动主义路线，公开成立苏维埃政权和“红团总部”，由金谷兰任团长，姜占甲、靳光荣任副团长，组织举行暴动。结果过早地暴露了党的力量，致使特委被破坏，鲁北党的活动再度转入低潮。

1931年夏，在平原县立中学读书的共产党员段尔平、孙兴桥、万金荣，经中共山东省委批准，成立了平原中心县委，领导平原、禹城、恩县、武城、清平、临清等6个县的党组织，积极开展活动。1934年7月，山东省委组织部长宋鸣时叛变，省临委及下属党组织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平原中心县委书记段尔平被捕后叛变，万金荣被出卖遭逮捕，孙兴桥流亡胶东，还有一些党员也随之分散。鲁北党组织又一次遭到严重破坏，下属党员和党组织与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①。鲁北地区党的活动再度处于低潮。

1934年4月，津南特委负责人刘格平、庆云县委书记胡恒熙等人发动领导了有2万多名民工参加的马颊河大罢工，掀起了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又一次高潮。这次抗暴政、罢河工斗争是由中共津南特委和庆云县委领导的针对国民党统治进行的一次较大规模的群众斗争。

马颊河发源于河南省北部，经聊城、夏津、临邑、庆云、无棣等县市流入渤海，是流经山东的一条大河。1934年，山东省政府下令疏通马颊河河道，并向当时隶属于河北省的庆云拨治河经费3万元。但是，以庆云县县长傅奎升和县保安队队长胡振国为首的贪官污吏，竟将治河款据为己有，反过来再向农民勒索治河经费。春节刚过，傅奎升便发出布告：奉省令，疏通马颊河道，所需费用就地筹措，每亩加捐1元。百姓自带给养出工修河，限期完成，违者严惩。布告发出之时，恰值春季，青黄不接，老百姓面临着断炊断粮的处境，根本无力出工、无钱交捐，加之沿河农户心痛河滩上的大片麦苗被毁，使得治河工程拖延下去。

3月底，傅奎升、胡振国见仍未动工，就接连派出军警下乡催逼，见到农民就撵去出河工，不去就用皮鞭抽打。暴政面前，三、四区有些村庄的民众被迫上了工，但一区、二区的民众依然拒不上工。这时，以一区区委书记胡林晓为首的共产党员挺身而出，他们秘密串联发动群众，并成立了由十几个村庄群众参加的罢河工后援会。同时，他们向津南特委负责人刘格平和庆云县委书记胡恒熙汇报了群众的呼声。

^①《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编辑组《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一辑(下)，山东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7页。

4月15日夜，庆云县委在西安务村范廷俊家召开扩大会议，研究如何领导全县人民罢河工、抗暴政斗争。津南特委负责人刘格平、津南特委成员兼庆云县委书记胡恒熙、津南特委交通员邸玉栋、庆云县委成员范廷俊等人和一区区委书记胡林晓、城南区委书记张笃骞等参加会议。会议决定利用4月18日北林庙会的最后一天，召开群众大会，揭露反动政府利用修河进行敲诈勒索的罪行。人员分工是：刘格平负责草拟宣传提纲和宣言，邸玉栋负责组织传递鸡毛文书，武同心负责刻版油印，胡恒熙主持召开大会，肖佐芝负责会前筹备和布置^①。会后以传递“鸡毛信”的方式，一传十，十传百，将县委罢工的决定迅速告之全县人民。

4月18日凌晨，军警逮捕了胡恒熙和城南区委书记张笃骞。庆云当局还派出100多名军警包围了北村庙会会场。危急时刻，刘格平化装赶来，亲自指挥，设计包围了军警。胡振国见势头不妙，狼狈逃回了县城。群众情绪因此愈加高涨。刘格平等因势利导，决定立即带领群众到县城请愿，让傅奎升放人。刘格平、胡林晓走在前头，跟在他们身后的是数百名共产党员和数千名群众，沿途群众敲锣打鼓，送茶送水，并不断有人加入到请愿队伍中，到城外时已达2万多人。

请愿队伍用橛梁撞开城门，人群像潮水般涌进县城，直奔县衙，把县府团团包围起来。请愿群众提出：第一马上释放胡恒熙、张笃骞；第二停止挖河；第三清算治河款，免除苛捐杂税。迫于群众的巨大压力，庆云县当局不得不当场释放了胡、张两人，接受了群众提出的所有条件，并立字具结，签名画押。

4月19日上午，胡恒熙带领游行群众开赴马颊河工地，治河民工遂停止挖河，拆毁工棚，纷纷加入游行队伍。队伍长达四五里，人数超过3万人。马颊河全线实现了总罢工。

庆云县当局虽然表面上答应了群众的要求，但暗地里却准备进行反扑。他们向国民党河北省主席于学忠求援，请求派兵前来镇压。于学忠急忙调来一个骑兵连，协同庆云县军警镇压罢河工运动。4月20日，刘格平等人在严务村召开群众大会时，遭到沧州和庆云县军警的镇压，刘格平、胡恒熙、杨德然、胡林晓、刘全禄、胡洋河、张云峰、刘子享8名党员和9名群众被捕，张笃骞、范廷俊、肖佐芝被迫离乡，津南特委和庆云县委由此遭到严重破坏^②。德州区域的革命暂时处于低潮。

马颊河农民罢河工、抗暴政的斗争虽然被敌人镇压了，但却充分显示了党领导下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地方政府的统治，在鲁北大地上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为党后来开展各项革命斗争，奠定了坚实思想和群众基础，尤其是为后来的抗日战争埋下了革命的火种。

第四节 德州抗日斗争与德州解放之战

^① 中共德州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鲁北星火》，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14页。

^② 中共德州地区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德州地区党史大事记（1921年7月至1949年9月）》，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8页。

抗日战争时期，德州爱国军民浴血奋战，同日本侵略者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四八五团”血战德州、二十九军的顽强抗战、冀鲁边区根据地的抗日斗争等，是德州人民不畏强暴，奋起抗争的光辉写照。解放战争时期，德州人民踊跃参军、支前，为解放战争做出了重大贡献。

一、日军南进与国民军“四八五团”血战德州

1937年9月，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分四路南侵。第二集团军沿津浦铁路大举南犯。29日，日军攻占泊头，驻扎桑园的第六战区司令冯玉祥兵力单薄，桑园失守。冯率军退守德县。日军随即全力向德州猛扑，侵入德州北郊的于庄、前赵、后赵三个村庄。

德县是津浦线上山东省最北的一个县。这里原由韩复榘第五十五军第七十四师李汉章部驻防，当日军攻陷泊头时，韩已命该师后撤禹城。为了遏制日军攻势，迟滞其南下速度，保住山东的北大门，蒋介石电令韩复榘迅速抽调2个师前往德州布防，但韩复榘百般推拖。后在蒋介石的一再电促下，韩才令展书堂部第十二军八十一师从招远徒步向德州开拔，9月底抵达德州。

第八十一师到达德县后，即在城北郊长庄和县城构筑防御阵地。在冯玉祥指挥下，第八十一师师长展书堂与该部第二四三旅旅长运其昌商定，以第四八五团为主，从全师抽调精兵500组成敢死队，趁日军举棋不定之际，奔袭桑园敌装甲车队。命令下达，全师官兵争先恐后报名参加。展书堂师北上战至桑园，使日军前锋受挫。

此时却接到韩复榘要求其迅速南撤的命令，展被迫率部退回德州城，配合李汉章第七十四师等部，在城乡调用民工，征集物资，构筑城防工事。至9月底，韩复榘又严令德州大部分守军南退，仅留第八十一师二四三旅（旅长运其昌）之一部在城北的北厂、长庄一带设防断后。展书堂率1个团在德州以东游击。

9月30日，日军出动8架次飞机轮番轰炸德州城北门、小西门和火车站。日军第二集团军第十师团（矶谷师团）先头部队兵临德州城北。运其昌旅余部约一团的兵力凭借工事在长庄、前后园一带阻击，双方激战3昼夜。日军改变战术，正面佯攻，两翼夹攻，守军不支，被迫退至城内防守。日军乘机发动强大的攻城战斗，装甲车向城西北隅发炮数百发，其炮兵在长庄、前后园等地也集中火力猛烈轰击德州城。运其昌指挥守军以城墙为防线，将火炮架于城楼上反击日军，打退日军数次进攻。在日军即将攻入小西门的紧急关头，李营长率敢死队与日军展开肉搏战，一连连长赤膊上阵，挥舞大刀带头冲杀，负伤仍不下火线，最后壮烈殉国。至10月3日午夜2时，日军将西北城墙炸出一个缺口，在坦克的掩护下，兵分两路，由城墙缺口和小西门向城内冲击。运其昌率一营与日军肉搏，并击毁日军坦克一辆。日军加强攻势，城墙的西北、东北均被炸毁。运其昌部伤亡惨重，孤立无援，余部只得退出德州城。据展书堂之子回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父亲苦战无援，只好率队突围，虽然突出来了，但所部四八五团包括团长张德允在内，全部壮烈牺牲。突围战况之激烈，可以想见。”^①

^① 展双成《坚持抗日的先父展书堂》，《面对历史·抗日烽火》，内部资料，第107页。

四八五团的英勇抗战在德州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国民党八十一师所部二四三旅四八五团守军在前有强敌、后无援兵的情况下，以一团之众抗击着数倍于己的敌人，孤军奋战数昼夜，最后几乎全团殉国。他们不仅有效地牵制了日军主力的南侵，同时展示了军人在国家危亡的紧急关头卫国保家、慷慨赴死的英雄气概，这是德州抗战史上可歌可泣的一页。

10月3日拂晓，日军先头部队攻入城内，德州沦陷。

德州失陷后，日军沿津浦路南下，10月13日，矾谷师团攻入平原县城。14日，日军侵入禹城县西北部的张庄和黎济寨村。尔后兵分两路，一路与韩复榘七十四师交火，一路沿津浦路继续南下，占领禹城县城。当时，日军主力正在平汉、正太铁路集结，准备进攻太原，津浦线兵力单薄。蒋介石令冯玉祥、韩复榘乘机以主力会攻德州并进击沧州。于是，冯指挥展书堂八十一师自徒骇河向北反击，21日克复德州、桑园，并一路北进直指沧州、马厂。正当展师乘胜进击日军之时，韩突然电令展书堂，限10小时内撤回禹城。展师只得遵令撤回。这时，日军在晋东得手，又调部队增援津浦线，进犯鲁西北，德州第二次沦陷。

日军沿铁路迅速南下，冯玉祥率曹福林二十九师、展书堂八十一师，在禹城设防阻敌；韩复榘率李汉章七十四师、手枪旅一部在济阳阻敌左翼。济阳失陷，韩复榘逃回济南。11月16日，韩下令撤离黄河北防线，并将洛口铁桥炸毁。冯玉祥的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撤至黄河南岸洛口附近。至此，现德州区域内所属平原、禹城、齐河、陵县等县全部沦陷。各县县长均携款弃城逃跑。德州区域遭受了日本侵略者长达8年的法西斯统治。

二、宋哲元与第二十九军的抗日壮举

宋哲元（1885-1940），乳名宋室，字明轩，山东乐陵赵洪都村人（今属乐陵市）。光绪十一年九月廿三日（1885年10月30日）出生于一个读书人家庭，祖父宋堪性善好施，在乡里颇有佳名。父亲宋釜是一个以教书和当幕客为生的清贫廪生，学识广博，以才学称誉乡校。由于家境窘困，他从小在艰难中度日，并不忘刻苦攻读。

1907年春，宋哲元离开家乡，投笔从戎，入北京武卫右军第六镇第二十二标第二营当兵，不久考入本镇随营学堂。1910年，宋结束学兵生活，适逢陆建章奉命为广东北海（今广西北海）总镇，又被调随行任文书委员。不久返京，在陆建章所属第一营任前哨哨长（连长）。1913年后随冯玉祥转战豫、陕、川、鄂、湘等省，历任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军长。1925年任热河省都统。翌年任国民党西路军、北路军总司令。1927年任陕西省政府主席。1931年宋哲元部被正式编为国民党陆军第二十九军。

“九一八”事变后，宋哲元立即通电全国，呼吁四亿同胞奋起抗战，誓雪国耻，“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①。此后，每年“九一八”，他都要举行抗日演讲会，并在馒头上印上“勿忘国耻”四字，提醒官兵铭记国难家仇。

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又不断向热河、察哈尔及关内进行侵略扩张。1933年春，日军占领山海关，热河告急，平津震动。张学良急令宋哲元率二十九军日行160里，从山西赶往

^① 1933年3月22日宋哲元手书，参见陈世松《宋哲元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

通州、三河一带布防。3月，宋哲元率二十九军在喜峰口至罗文裕一线，面对两倍于己且装备精良的日军，坚守阵地，前赴后继，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他还命部队夜袭日军阵地，发挥近战、夜战优势，炸毁敌人大炮，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此役，二十九军十天之内痛歼日军5000余人，因此，宋哲元和二十九军威名大振。长城抗战的捷报使全国振奋。然而，南京国民政府却坚持对日妥协，宋哲元和他率领的二十九军不得不含泪撤离长城。

1935年冬，日军又策动华北五省“自治”，南京政府再次退让，同意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宋哲元为委员长，但委员却多是由日本人推荐的汉奸。面对困境，宋哲元自誓“不丧权，不辱国，不说硬话，不办软事”，忍辱负重，处处以保全主权领土完整为宗旨。他一面对日军、日商及汉奸的为非作歹严加惩处，一方面加紧训练和整训地方武装，举办大学生军训班，并在家乡乐陵招收童子军，以加强后备力量。同时，他还秘密筹借一笔巨款，从国外购买了一批新式武器。宋哲元的爱国义举，受到全国人民的高度赞扬，1936年8月14日，毛泽东就曾写信给他，称赞他“情殷抗日”、“慨然御侮”^①。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炮轰北平西南的卢沟桥，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宋部二十九军奋起抵抗，全歼进攻卢沟桥的日军100多人，但二十九军也有重大伤亡。28日，日军以数倍于我的兵力，配以飞机、坦克，向南苑军营猛烈进犯，二十九军仓猝应战，伤亡惨重，副军长佟麟阁、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先后遇难，二十九军被迫南撤。

南撤后，二十九军被改编为国民政府第一集团军，宋哲元任总司令，布防于冀南、沧县一带。不久宋哲元被委任为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兵权渐失。由于日夜劳瘁，肝病复发，宋哲元不得不离职休养。1940年4月5日，病逝于四川绵阳永安公寓，享年56岁。国民政府追赠他为一级上将。4月17日灵柩安葬于绵阳富乐山^②。

宋哲元病逝后，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联名悼挽：“一战一和，当年变生瞬间，可大白于天下；再接再厉，后起大有人在，可勿忧乎九泉”。

三、冀鲁边区根据地的抗日斗争

抗日战争时期，德州区域是冀鲁边区、冀南区、冀鲁豫区3个抗日根据地的结合部，也是日伪军在鲁北、鲁西北的统治中心，面临着复杂、险恶的形势。但是区域内各县不畏艰难、浴血奋战，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抗争，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诗篇。

冀鲁边区地处河北省南部和山东省北部，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领导的山东抗日根据地六个战略区之一。它东临渤海，西接津浦铁路和运河，南濒黄河，与山东省会济南隔河相望，北至独流减河，与天津相邻。整个地区包括当时隶属山东的陵县、德平、乐陵、惠民、商河、阳信、无棣、沾化、滨县、平原、禹城、德县、临邑、济阳、齐河等县及当时隶属于河北的沧县(东部)、南皮、东光、吴桥、宁津、盐山、新海(今黄骅)、庆云等县，拥有约600万人口。这里交通便利，物产丰饶，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1937年11月，上海、太原失陷后，中共中央根据冀鲁边区的重要战略地位，决定派一二九师一部及一一五师主力挺进山东，开

^①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18页。

^② 陈世松主编《宋哲元研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259页。

展广泛的游击战争。

中共党组织在津南、鲁北有着长期的工作基础。在第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津南特委、鲁北特委和各县基层党组织相继建立，并领导了工农运动、学生运动和抗日救亡斗争，为冀鲁边区抗日武装斗争的开展和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抗日战争爆发后，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鲁北的共产党员脱下长衫，迅速转入农村工作，放手发展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7月中旬，中共津南工委召开会议，认真贯彻中央指示，决定所属各县普遍举行武装起义；工委特派员马振华和交通员邸玉栋分头部署各县党组织，发动群众，举行武装起义。在此基础上，华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和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于7月15日在盐山县旧县镇成立，此后，津南、鲁北各县相继建立了救国会分会。各分会在做好宣传发动工作的基础上，组建抗日武装，救国军很快发展到千余人。10月，由于抗日斗争的需要，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把津浦路东的盐山、沧县、宁津、庆云、乐陵等县党的工作交山东省委领导。中共山东省委派于文彬来到冀鲁边区，与中共津南工委负责津浦路东工作的马振华取得联系，建立了冀鲁边区统一的党组织——冀鲁边工委，于文彬任书记，马振华任组织部长，赵明新任宣传部长，邸玉栋任特派员，王俊峰任委员。冀鲁边工委的建立，统一了津南、鲁北地区党的领导，为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奠定了组织基础。

在救国会和救国军成立的同时，各县土匪、民团、会门武装蜂拥而起，伪军、伪组织纷纷建立。救国军被限制在以盐山县旧县镇为中心的狭小地区，部队给养发生困难。边区党组织决定部队采取“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的方针，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进攻盐山，攻打庆云，奔袭无棣，围攻乐陵，转战宁津、南皮，消灭了大批伪军，壮大了自己。12月，救国军领导决定改救国军名称为“国民革命军敌后别动总队第三十一游击支队”，任命邢仁甫为支队司令，王昭明为副司令。同时，为加强党对部队的领导，在救国军大队、中队、小队都设政工干部，由共产党员担任。1938年2月，河北省委派杨靖远5人来冀鲁边区，杨靖远任三十一支队副司令，负责军事领导；李启华任三十一支队政治部副主任，主持地方党的工作；史甄、赵焕文、杨希玲暂在三十一支队政治部做宣传工作，同时也积极进行地方党组织的重建工作。

6月12日，由于受到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刘景良的围攻，三十一支队在固守庆云、乐陵城的同时，派李广文、冯景恩再赴南宫县，向冀南军区告急，并被特许参加了冀南区党政军有关方面负责人会议。会议由宋任穷主持，徐向前作了重要报告，同时宣布了中央和冀南区党委的决定：鉴于冀鲁边区战略地位很重要，中央决定把这个地区由山东划归中共中央北方局和一二九师领导，责成冀南区代管；派一二九师的津浦支队和一一五师的永兴支队，由冀南挺进冀鲁边区，支援地方党领导的三十一支队，并要尽快行动。同时，冀南区党委决定，派区党委宣传部长马国瑞作为区党委驻冀鲁边区的党代表，随同两个支队一同前往，负责领导冀鲁边区的全面工作。徐向前还宣布：因一一五师在太行山区还没有来到，两个支队及边区地方武装，由一二九师统一指挥。不久，八路军一一五师永兴支队和一二九

师津浦支队跨过津浦铁路到达夏津县的消息传来，刘景良闻讯急将围攻乐陵、庆云的部队撤回惠民。津浦支队和永兴支队于7月8日到达乐陵县城，与三十一支队会师，胜利完成了挺进冀鲁边区的任务。

7月，中共中央军委、八路军总部命令第一一五师三四三旅政治委员肖华率旅部机关和部分干部100余人组成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挺进冀鲁边。9月27日，“挺纵”在司令员兼政委肖华、参谋长邓克明、政治部主任符竹庭率领下抵达乐陵城。肖华抵达冀鲁边区后，重新调整了冀鲁边区军政委员会，他任书记，符竹庭、马国瑞、李启华、杨靖远为委员。“挺纵”到达边区后，还根据上级指示，对边区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统一整编为“挺纵”，下辖3个支队。津浦支队为四支队，孙继先任支队长，潘寿才任政委。永兴支队为五支队，曾国华任支队长，李宽和任政委，刘贤权任政治部主任。平津支队编为六支队，邢仁甫任支队长，周贵五任政委，崔岳南任政治部主任。整编后，队伍迅速发展壮大。到同年年底，边区部队发展到15000人。除3个支队外，还建立了津南、运河、泰山、商河支队和宁津独立营等地方武装。

挺进纵队的战略方针是：以乐陵为中心，向北发展建立津南政权；然后向南发展，建立黄河以北的鲁北抗日根据地。根据这一方针，挺进纵队很快就在津浦沿线的平原、禹城、陵县一带建立了游击活动区域，既与国民党顽敌进行有利有节斗争，又粉碎了日军的多次扫荡。如1938年10月至1939年3月取得了3次反“扫荡”的胜利。第一、二次反“扫荡”中，纵队先后在宁津城北的孔家坊、东光城东的灯明寺、盐山城南的韩家集等地，毙伤日军400余人；在第三次反“扫荡”中，纵队主动放弃了乐陵城，以避实击虚的战术，长途奔袭陵县之敌，全歼守城日伪军1000余人。反“扫荡”胜利后，挺进纵队一部五支队于1939年4月在陵县城东的大宗家，突遭日军步骑兵2000余人包围，双方发生激战，八路军毙伤日军400余人，炸死其指挥官安田大佐，沉重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此役后，挺进纵队又乘势开辟了平原、禹城以东、惠民以西、徒骇河以北的大片根据地，并相继建立了陵县、商河、无棣、阳信、临邑、禹城6个抗日县政府。1940年元旦，肖华为冀鲁边区机关报——《烽火报》撰文，总结冀鲁边民国二十八年（1939）的战果：作战1771次，击毙日军1923人，伪军3845人，俘虏1368人，破袭铁路18次，运走铁轨91条，击毁日伪军车12辆，破敌电话线366里，缴获各类枪械2500余支，汽车、电台、衣粮等军用物质一大批。人民军队阵亡官兵607人，伤746人。

令人痛惜的是，边区军政委员会委员、津南地委书记马振华和宁津县委书记张维明等人在战斗中壮烈牺牲。1940年9月11日傍晚，马振华带领通讯员到宁津县柴胡店区薛庄村参加县、区主要领导干部紧急会议。不料被叛徒告密，日伪军调集柴胡店、大柳、长官、杜集、孟集等6个据点的300多人趁夜间将薛庄包围。12日拂晓战斗发生，由于敌众我寡，力量悬殊，参加会议的人员除区委书记李茂林、区农救会主任陈丙森脱险外，马振华和宁津县委书记张维明等11人壮烈牺牲。该年11月，经上级批准，宁津县改为振华县，以纪念这

位身受边区人民爱戴的党的忠诚战士。

在接下来的两三年中，冀鲁边区在日伪军不断的“扫荡”、“蚕食”封锁下，环境急剧恶化。边区军民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1943年开始摆脱严重困难的局面，进入恢复发展时期。期间发生了黄骅（1911-1943）被刺、邢仁甫叛变事件，使冀鲁边区革命力量遭受了严重损失，对日斗争经受了严峻考验。

1943年6月30日，冀鲁边军区副司令员兼教导六旅副旅长黄骅在驻地新海县大赵村主持召开侦察通讯工作会议。下午6时许，会议仍在进行，黄骅一边听与会人员发言，一边低头记录。突然，军区司令部手枪队队长冯冠奎带领10多人闯进室内，开枪扫射，黄骅、陆成道、陈彪等5人当场牺牲，池田等4人负重伤。此即黄骅被刺事件。这一事件为原冀鲁军区司令员邢仁甫（1909-1950）所策划，事后，邢叛变投敌，故又称邢仁甫叛变事件。

事件发生后，邢仁甫一面频频向山东分局、军区发报，表示自己“始终忠于党，忠于国家民族”，要求上级首长亲自来处理此事，根本不承认刺杀黄骅为他所指使，一方面制造谣言，蛊惑人心，挑拨拉拢一些人，企图把部队拉出来“另开创一个局面”。山东军区由于尚未掌握到邢仁甫指使人刺杀黄骅的确实罪证，继续对他进行争取工作，但是最终邢仁甫叛变投敌。

黄骅被刺和邢仁甫的叛逃，进一步加剧了冀鲁边区的困难。边区党委、军区一面领导军民进行反“蚕食”、反“扫荡”斗争，一面处理邢仁甫事件，向全区抗日军民发出《为邢仁甫叛变告全区同胞书》，并发布了一系列文件、布告，揭露邢仁甫的罪行，逐步稳定了边区形势。10月，山东分局、一一五师派清河军区副政委刘其人处理邢仁甫事件。刘其人在清河区垦区与王卓如、周贯五、李启华、刘贤权等会面，传达了山东分局、一一五师处理邢仁甫事件的指示。

12月，有县团级以上干部参加的冀鲁边区党委扩大会议在清河区垦区老鹅嘴召开。会议由王卓如主持，周贯五传达了山东分局、一一五师对处理邢仁甫事件的指示和分局五年工作总结会议精神。大家认为，邢仁甫的叛变及黄骅的牺牲，给冀鲁边区的抗战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惨案的发生说明当时对被改编部队的成份及改造工作没有高度重视，是有漏洞的。正如惨案发生后罗荣桓、黎玉、肖华等发出的训令中所指出的：“我们的少数干部对土匪流氓的两重性认识不足，对土匪的政策运用上犯了原则的错误”。所以说这个教训是深刻而沉痛的。

1944年1月，为适应新的斗争形势，经中共中央北方局、中央军委批准，中共山东分局和八路军山东军区公布，冀鲁边区与清河区党委、军区合并，建立中共渤海区党委、八路军山东渤海军区，杨国夫任司令员，景晓村任政委，领导两区军民开始新的战斗征程。

冀鲁边区在五年多的时间内，对敌作战近千次，消灭日伪军数万人。冀鲁边区党的队伍和人民武装也在战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党员、八路军发展到数万人，民兵发展到十几万人，不仅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而且为解放战争积蓄了重要力量。冀鲁边区人民为中华

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付出了血的代价。在抗战时期，牺牲在这块土地上的县团级以上干部有黄骅、杨忠、马振华、杨靖远、陆成道、杨承德、张秀石、杜子孚、石景芳、邸玉栋、徐尚武、吴大风^①等 70 多人，干部战士近万人，被杀害的群众 10 万多人。

冀鲁边区是中共领导下创建的最早的敌后平原抗日根据地之一，为全国的抗日战争和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也对于开创华北敌后抗战的新局面和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以及敌后抗日战场的形成起到了积极作用。

四、德州解放之战

从 1944 年起，冀鲁边区军民开始了大反攻，至第二年夏，临邑、德平、庆云、武城等县城收复。同年底，德州区域各县全部收复。

抗战胜利后，德州区域的日、伪军本应向八路军投降，但国民党政府却委派原鲁北剿共司令王继祥出任德州司令长官，全面负责受降事宜。王继祥一到德州，首先放走了三千名日军，不让他们向八路军缴械投降。接着，又把益都、桓台等地的五千名伪军调进德州，改编为国民军十三旅，把原驻德州的一千名伪军改编为德州独立团，使这些民愤极大的伪军摇身一变成为正牌的国军。出任十三旅旅长的是臭名昭著的汉奸张光第。这些倒行逆施的行为，激起了渤海地区人民群众的愤怒，纷纷要求严惩这些匪类，解放德州。

与此同时，为了争取时间部署内战，蒋介石放出了和平的烟幕，提出“和谈”。1947 年 1 月 10 日，国共双方签署了《停战协定》。为了监督执行《停战协定》，全国各地均设立三方组成的军调处，监督各地停战。当时共设有 36 个小组，符浩曾回忆道：军调部向全国派出若干执行小组，德州执行小组是北平执行部派出的第十五小组。当时任渤海军区联络部部长的符浩，后曾担任这个小组的中共代表。

1 月中旬，德州执行小组成立。成员有共产党员宋绍德少校（临时委任的军衔，后由符浩接任），国民党代表刘金铭上校，美方代表怀特中校，渤海区党委代表景晓村、袁也烈、符浩、肖峰作为中共代表分别参加德州、禹城军调小组的工作。2 月 5 日，军调部德州执行小组抵德州，由渤海区对外联络部负责人符浩引领，乘车至德州城东土桥镇，与渤海军区首长举行第一次会谈。6-9 日，又移至德州以东的八路军的一个营部驻地刘家集，继续会谈。国共双方主要围绕着解散伪军、恢复交通、城乡物资交流等问题展开谈判，但进展不大。

自从 1 月 13 日停战令生效到 3 月中旬，国民党军向解放区的进攻从未停止，侵占解放区城镇 300 多处。其基本形势是：关内小打，关外大打。3 月 5 日，德州城内的国民党军队出动，将渤海军区某部驻地赵辛庄、七里铺等村庄的粮食、柴草等洗劫一空。3 月 28 日，120 余名武装特务袭扰德县县大队驻地范庄、高庄；3 月 30 日拂晓，又转攻渤海军区部队驻地刘家集、簸箕刘。这些侵扰引起了德州区域内军民的无比愤慨。

1946 年 6 月，国民党悍然撕毁《停战协定》，以进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内战爆发。在此背景下，渤海军区决定主动出击，攻打德州，彻底切断国民

^① 周贯五回忆，杜文和整理《艰苦奋战的冀鲁边》，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337-338 页。

党军队在华北与山东的联系，以支援华北和山东战场。渤海军区把司令部设于城东土桥镇，并于6月4日召开解放德州作战会议。会议由军区司令员袁也烈主持。中共德州市委书记崔毅汇报守敌布防、军事设施、兵力配备等情况。军区参谋处长王翰西作《关于德州敌情及解放德州作战方案的报告》，提出两套作战方案。与会者对敌我态势、主客观条件等作了详尽的研讨。袁永烈赞同第二套方案，并对敌我战情优劣尤其是我方的优势做了透彻分析。

会议通过的第二套方案大体如下：由渤海军区特务一团、二团和冀南军区五分区独立二团担任主攻，第十七团为预备队；匡五、德平、吴桥、景县、故城、阜东、平原县大队和津浦支队一大队配合作战；德州城郊各村庄组织向导队、担架队、运输队负责战地保障。作战分三个阶段部署：“围攻”阶段，由8个县大队以挖壕推进的方法，掩护主力部队向城下逼进，形成严密的包围圈；“进攻”阶段，由3个主力团分别攻打飞机场、玉皇阁、运河东岸，扫清外围据点，切断敌赖以逃跑的空中和地面通路；“总攻”阶段，主攻南门，佯攻西门和北门，将敌压缩至东地医院，迫其投降，否则就地全歼。

6月5日下午，渤海军区政治委员景晓村作战前动员。6日下午，各主力团在8个县大队配合下，秘密向城下挺进，战役遂进入围攻阶段。按照会议部署，各部迅速完成了对守敌的严密包围。7日零时，解放德州之战全面打响，战役进入进攻阶段。经过激烈战斗，特务一团在团长张冲凌、政治委员王若杰、副团长朱志铭指挥下，其一营占领萧何庄、张庄等地，向城东北机场发起猛攻。迫击炮、机枪、掷弹筒等构成强大的火力，摧毁机场指挥所，全歼守敌1个营。在后3天战斗中，在匡五县大队的配合下，又先后击退国民党军队的8次反扑，胜利完成“占领机场，断敌空中通道”的任务。8日拂晓，特务二团在团长陈景三、政治委员张维兹指挥下，与冀南军区五分区独立二团及景县、故城县大队等部，在团长杜濂、政治委员刘义华指挥下，联合作战，占领了火车站，彻底肃清城西、城西北所有国民党守军，控制了西关，并直抵城墙下，堵住西门和小西门，将城内守敌西逃之路切断。6月8日夜至9日夜，特务一团主攻玉皇阁，胜利占领制高点玉皇阁，将城内守军指挥部和主要街道控制于攻城部队火力下。10日21时，绿、红色信号弹各3颗升入夜空，战役进入总攻阶段。在“八二”迫击炮和机枪掩护下，特务一团三营和一营三连猛攻南门楼，攻入并坚守门楼制高点至二梯队到来，为后续部队开辟出通路。在东七里铺前线指挥所指挥作战的袁也烈司令员高兴地派参谋人员，授予特务一团一营三连“捷足先登德州城”的锦旗，指示部队扩大战果，迅速攻占敌警备司令部、电话局、广播电台，彻底切断敌通信联络。冀南军区五分区独立二团三营伤亡较大，但全歼西北城墙守敌。作为二梯队的一营，乘胜攻破西门。至此，城西皆被该团占领。

11日9时，主力部队相继由南、西、北门等处攻入城内，不断向纵深发展。守敌四处奔逃，部分顽敌藏匿于小巷和民房中负隅顽抗。袁也烈命令特务一、二团等部疏开队形，组成大量战斗小组，采取“交叉射击，跃进向前”的方法展开巷战。若干战斗小组相互配合，遇大股敌人合围剿灭，遇小股敌人分而歼之，遇固守工事拒降者则连同工事爆破炸毁，整个

德州城枪声、爆炸声和喊杀声连成一片。

11日11时，袁也烈司令员发出向东地压缩前进的命令。至15时30分，王继祥仍拒绝投降，袁也烈下令开炮。数十门迫击炮齐声怒吼，摧毁守敌团部和一批工事。在强大的政治压力和军事攻势之下，王继祥方借怀特之口提出3个条件：“国民党军立即放下武器；八路军停止射击；保证政府官员的生命安全。”随后挂出白旗。受降部队开赴院中，将一批批守敌押往俘虏收容所。特务二团政治处主任陈英率4名战士及《前锋报》战地记者、军调小组译员，排除美国代表等的阻挠，冲进怀特的卧室，在其床下活捉国民党驻德中将指挥王继祥、国民党鲁北专员刘麟绂。

经过近5昼夜激战，德州战役共击毙国民党守敌1200余人；俘虏守敌4500余人；缴获长短枪5000余支、轻重机枪161挺、迫击炮和无坐力炮27门、汽车70辆、火车机车17辆、客货列车7列及其它物资一大批。但是，八路军也付出了较大的代价，有近千名指战员伤亡。其中，渤海军区牺牲200人，伤600余人；冀南军区独立二团牺牲150人。

1946年6月11日17时，攻克德州城的八路军渤海军区和冀南军区部队举行入城仪式。各界群众5万余人云集大街小巷，热烈欢迎人民军队入城。同日成立德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29日，德州市召开各界代表会议，选举产生民主政府，并通电全国，呼吁和平，要求停止内战，实行民主。军事管制遂告结束。古老的德州，从此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五、德州“支前”及其对解放战争的贡献

“在解放战争中，有11万多齐鲁儿女血洒疆场，用鲜血和躯体换来了新中国的诞生”^①。其中，德州区域内即当时的渤海军区二专区军民也做出了重大牺牲，革命烈士有9754名。

随着支前任务的日渐繁重，华东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健全、充实了支前组织机构，重建了山东省支援前线委员会。渤海区党委、行署及其所属县、区、乡、村也相应的建立起支前指挥机构，并逐渐健全了制度。1947年3月，渤海二专署成立第二后方指挥部。专员王子彬任指挥，中共渤海二地委副书记刁一民任政委。指挥部下设参谋处、政治处、动员科、柴粮科、兵站科、卫生科等。专署所属11个县，也都成立了指挥部，并组成2至5个轮战营。渤海区党委、行署还积极贯彻“把民工队当成学校来办”的方针，抽调800余名干部充实支前机构，对民工加强阶级、时事教育，注意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员，提拔干部，加强支前工作。专署所辖11个县的各族人民群众，积极参加拥军支前，涌现出了无数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

德州解放后，德州区域内的人民在党和民主政府的领导下，政治、经济得以翻身，思想觉悟逐步提高。为解放全中国，打败国民党，广大青壮年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踊跃报名参军参战。在参军参战的热潮中，党员、团员、民兵和青壮年干部带头报名；妻子送丈夫，父母送儿郎；许多青年因受到参军名额限制而暂未被批准入伍，他们就主动跑到德州驻军或过境部队中坚决要求入伍，出现很多动人的事例。

^① 王东溟编著《山东人民支援解放战争》，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1946年7月至12月间，渤海区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就有1.4万名青年参军，“在渤海二分区1947年上半年的大参军中，父母送子者915人，妻子送郎者127人，兄弟相争者324人”^①。第二年3月，渤海二专署各县千余名回民青年参军，同时成立起回民大队，回民大队政委由周志坚担任。而在德州市郊也涌现许多感人的事迹，如在1947年的大参军运动中，二屯乡许庄村的何景贤当时只有14岁，他在村中第一个报名。在其带动下，全村一次就有40人报名，但只批准了18名，其他暂未被批准的青年参军的决心已定，纷纷跑到德州参加了铁路支队。头百户村的付连栋刚结婚不久，新娘就在全区参军动员大会上第一个送新郎报名。在她的带动下，只有300人的小村一次就送走了一个正规班。据不完全统计，德州市在解放战争时期有2941人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其中，仅在1947年的大参军运动中，就有650人。1947年1月组建的德州市武装工作大队，经集中整训，于同年6月成建制集体加入主力部队；由回民青年组成的回民连，经过3个月集训后，于同年被编入主力部队。

除踊跃参军之外，德州区域内的人民努力发展生产，节衣缩食，开展了劳军、捐款、捐粮、制作军用被服、拥军优属等支前活动，同时还推起小车、抬起担架，运输粮草，救护伤员，加入到支前队伍之中，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为山东乃至全国的解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6月19日，山东渤海军区暨德州市2万余人举行德州解放祝捷大会。德州人民自动掀起劳军热潮。各区均派出了代表，率领秧歌队，拉着肉、鸡、蛋、菜等慰劳品50大车，赶赴部队驻地，亲切慰问在解放德州战役中英勇奋战的指战员。德州城内的居民捐献毛巾、袜子、肥皂、牙刷、牙粉等日用品。1947年4月，德州市民主政府在德州解放后10个月的工作总结中统计：全市共制作军服33万套；军鞋12万双；派出担架105副；献金1400万元（北海币）。1947年年底，德州市民主政府代理市长董焕章在其所作的年度工作总结中统计：全市进行大型劳军活动5次；组织长期支前担架39副，大车128辆，小车100余辆，轮战营1个，出动民兵和民工600人（次）；献金1500万元（北海币）。

专署所辖各县亦争先恐后“支前”。1947年9月上旬，庆云、乐陵、德平等县支前民工担架队立功荣归。其中庆云县第一批常备担架队800余人，在近5个月的服务期中，荣获“陈毅担架队”的光荣称号，获“支前模范”奖旗一面。1948年9月，渤海二专署所属各县人民群众，积极支援济南战役。其中匡五县（今陵县）组织了支前营，出动民工800余名。德州人民纷纷捐款、献粮支援淮海战役前线。其中，建华铁工厂的职工献粮5600斤，献金20万元；北海银行德州支行和渤海合作推进社五分社献金35.7万元；贸易公司献金58.2万元；利民盐业公司献金35.55万元；新华书店和华兴货栈献金31.26万元。德州市区的妇女们先由新生街妇联发起，献金6万元，继之和平街、南门东街等妇联积极响应，踊跃投入支前运动。荣誉军人郑三姓，一次就献出自己半年的残废抚恤金。是年冬，德州铁业公司副主任张振享受全市人民的委托，携带现金6000万元、“将革命进行到底”锦旗1面和大批慰问品、慰问信，随同渤海慰问团，赴淮海战役前线慰问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与此同时，德州市还制

^① 王东溟编著《山东人民支援解放战争》，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47页。

做单军服 11 万套、棉衣 6 万套，纳制鞋底 40 万双。

专署所辖各县人民还大力发扬无私奉献、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支前的民工一方面推起小车，为前线运输粮食，另一方面，还冒着枪林弹雨，舍生忘死，组成担架队，抢救和转运伤员。许多担架队在战斗中立了功。1949 年 1 月，华东支前司令部授予乐陵、陵县两县组成的担架团为“模范担架团”荣誉称号。该团随军转战 8 个月，历经山东、河北、江苏、河南、安徽 5 省，行程万余里，出生入死，历尽艰险，参加了济南、淮海等重大战役，涌现出了特等功臣石连生等 6 人，一等功臣 351 人。

憨厚、朴实、勇敢的德州人民，在解放战争中，无私奉献、积极参军、拥军支前，为争取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第五节 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近代碰撞

随着西学东渐，德州出现了诸如博文中学等近代西式学堂，近代教育也随之产生。随着西学的传播，中西文化在碰撞中融合，对德州的近代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庞庄教堂与博文中学

光绪十二年（1886），美国公理会在中国北方农村建立了第一座基督教教堂——恩县庞庄教堂。教堂的建立与传教士明恩溥密切相关。

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 1845—1932)又作明恩普，美国人，基督教公理会传教士。同治十一年（1872）来华，初在天津，后调至山东传教。光绪三年（1877），到恩县庞家庄（今属武城县）传教，并于六年（1880）建立起当地第一个公理会教会。八年（1882）建房定居庞庄。同时兼任上海《字林西报》通讯员。光绪三十一年辞去教职，居北京附近的通州，专事写作，著述颇丰。

美国公理会传教的特点是行医、教育和布道三位一体。光绪六年（1880），由美国驻华公使馆代办、公理会教徒卫三畏出资，在庞庄开办了教会医院——卫氏医院，教徒免费就医。光绪十二年，公理会在恩县史家堂建庞庄教堂和教会小学。庞庄教堂是一座中西合璧风格的洋楼，山墙上建有一座三层钟楼，楼顶上还安置了一个十字架。光绪十二年（1886），教会小学搬迁至庞庄，升级为中学，小学部称为崇正小学，中学部称为崇德中学。

光绪十九年（1893），女传教士博美瑞（M.H.Porter）创办了女子寄宿学校，称为培贞阁。学生免费读书，每天还发放一定数量的粮食、食品。“一八九三年他们又把教会设到临清……教徒也由一八九〇年的三百六十六人增加到一千二百五十九人”^①。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教会学校 18 所，在校学生 200 人。教会势力迅速向德州、平原、高唐、夏津、陵县、武城、临清、直隶等周边地区蔓延。庞庄教会作为山东北部公理会传教中心，进入巅峰时期。

^① 魏凤祥整理《基督教在庞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武城县委员会《武城文史资料》(第 2 辑)1986 年刊印，第 51 页。

1911年，津浦铁路全线通车后，德县（今德州）交通更加便捷。庞庄教会打算搬迁至德县。1912年，他们俟机在德县（今德州二中住址）购得土地300多亩，为向德州搬迁创造了条件。1916年，公理会在德州东地建起大小楼房10余座，学校、医院、全部搬迁到此。崇德中学扩建更名为博文中学（德州二中前身），培贞阁扩建更名为卫氏女中。卫氏医院扩建为卫氏博济医院，并附设护士学校（现德州人民医院驻地）。原“庞庄教会华丽建筑，即行拆除，所余者仅礼拜堂和几间小屋而矣”^①。德州取代庞庄教会成为公理会传教中心。到1920年，该会在山东发展至总堂2座，正式教堂10座，布道区36个，外国传教士26人，教徒1542人，中小学32所，学生600人，医院两所。公理会势力达到一个新高峰。

1916年后，庞庄作为传教点仍然存在，学校仍然招生。美国传教士还经常来此布道、教学。1937年日军侵占德州后，其活动逐渐减弱。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公理会遭日本人封杀，停止了活动。1949年以后，武城等地的宗教活动逐渐衰退，庞庄教会礼拜堂也失去作用，逐渐闲置，1975年全部废弃。

德州博文中学是一所教会学校，是由美国公理会光绪十二年“创设于恩县之庞庄（今武城县），是德州区域中学之滥觞。原分男女两校，亦无中小等级之称，只有四书、算数、史地、手工等科。1916年，由恩县庞庄迁至德州，男校改名为博文中学，女校改名为卫氏女校。1929年，两校合并，名为“博卫中学。”^②旋又改为博文中学。

庞庄初办的学校，学生仅十数人，借用一间民房教学，类似私塾。光绪二十一年（1895），始分为两等小学。至二十三年（1897）增加了班级，共有学生43人。二十六年（1900）后，美国公理会将男校改为四年制中学，定名为崇正学馆，并附设小学；将女校由蒙学改分两等小学，定名为培贞阁，男女学生共110余名。学校教育着重于宗教传播，宗教课程《福音合参》、《旧约历史》等都是必修科^③。另据记载：光绪十三年（1887）以后，学校有男生五六十人，女生二三十人。而至宣统元年（1909），男生增至八十余人，女生为三十余人^④。这样的“洋学堂”，在当时北方内地农村是不多见的。

学校教学当时多由传教士担任。光绪十二年（1886），博恒理的胞妹博美瑞（Mary H. Porter）来到庞庄任教后，开始招收女生。翌年，卫曙光（Ellen G. Wyckoff）来到庞庄，继博美瑞主持女校的教学工作。卫曙光和卫恩光（Helen G. Wyckoff，孪生姊妹）姊妹二人同时在校担任教学工作。

伴随着教会大部分人员由庞庄迁至德州，学校也开始逐渐迁往德州，光绪三十年（1904）首先在德州南关购地，但南关面积狭小，发展受到限制。由于津浦铁路即将修建，德州的交通更加便利，公理会遂于宣统元年（1909）低价购买了一块位于州城东郊的低洼碱地，约300余亩（包括医院在内）。

① 张圣瑞等《德县基督教公理会五十年史略》，1932年版，第59页。

② 民国《德县志》卷八《学校志》。

③ 《德州市教育志》（1840-1985），南开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55页。

④ 民国《德县志》卷八《学校志》。

美国公理会买到了这一大片土地之后，即称之为“东地”。于1916至1917年间兴盖了男校教学大楼一座，宿舍楼两座，女校洋楼三座，洋人住宅楼房六座，医院方面也建了一座三层大楼。医院楼分左右两都，左边是博济女医院，右边是男医院。据称医院、学校、教堂的全部建筑费用原计划78500美元，以后不够，又追加了4万美元^①。同时还兴建了较为正规化的运动场，包括田径赛场地和球类场地，北东两面有看台。到1916年秋，迁校工作全部完成，公理会并将原来学校所在地正式命名为“三育村（寓意德、智、体）”。

迁校后的第二年9月，京杭大运河德州地段泛滥决口，新校舍全部被淹，水深没及一层楼，所以只能在二楼及三楼进行上课。洪水经数月后方退。为了防止再遭水灾，校园周围筑起了高约丈余，下宽一丈，上宽约五尺的围墙，外面用砖，内部用土。围墙绕校一周，总长约6华里。校内遍植了柳、杨、槐等乔木，部分校园铺设了草坪。校园环境幽静，教学设备完善。

博文中学的办学经费有两个来源：一是来自学生学费；二是来自公理会的捐款资助。1916年，博文中学和美国的歌仁乃乐大学（格林尼尔学院，Grinnell College）建立了兄弟院校的关系。对方针对博文中学师资缺乏的状况，自1916年至1930年，特派了五位教师来校任教。博文中学迁往德县之后的校长先后由美籍的牧师梅克仁、海尼格、麻海如等人担任，同时也有中国教员兼任校长。在博文中学任校长的中国人先后有王景文、朱依仙（1926—1929），自1929年后由王元信任校长。1920年以后外籍人全部退出校长职务。

王元信任校长期间，实行了男女合校，将原博文男校与卫氏女中合为一校，改称“博文中学”。对学校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如减少课程中的宗教内容，加强汉文教学，加强英语和理科教学，开展勤工俭学，提高教学质量。同时规定教师与学生信仰宗教自由，教徒与非教徒一样对待，直至课程中完全取消宗教内容。

1931年，王元信还向山东省教育厅申请立案，成为正式的私立完全中学，学制与课程以及教材全用当时国家统一的中学教材。那时计高中三个班，学生30余人，初中6个班，学生120余人。其高中课程，如西洋史、几何、代数、微积分等，全部使用原版外文教材，外语水平较高。之后，高中停止招生，民国二十年前后，河北阜城县人王历全曾任图书管理员，购买大量进步书籍，如鲁迅、邹韬奋的著作和进步杂志及《东方杂志》、《小说月报》，《生活周刊》等刊物，在同学中宣传进步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933年，全省高中毕业生须经教育厅主持的全省会考，及格后方被承认资格。博文中学应届毕业生参加了会考，考试结果，成绩优良，名列第二，被评为教学质量优秀的学校。又据民国《德县志》载：1935年，初中一二三年级各3个班，学生共281人；教师22名（其中美国人4名），基金增至245100元，年经费29573元，学生纳费男生全年每人25元，女生全年每人15元。全校占地面积170亩，男部校舍14座，面积16601平方米，体育场面积11718平方米；女部校舍8座，面积12722平方米，体育场面积2245平方米。^②

^① 《山东省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5页。

^② 民国《德县志》卷八《学校志》。

1937年10月，德州沦陷，学校关闭。翌年春，学校开学，校长王元信因与日方交涉发生争执，恐遭报复，暂离职，由英语教师芮义德接任校长。不久，王元信复任校长。之后，增设高中，高中每届1个班，初中每届2-3班。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美关系破裂，年底，学校被日军封闭，芮义德等传教士被日军送进潍县集中营。

博文中学的校训、校歌有其显著的特色和时代精神。其校训是：“非以役人，乃役于人。我们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校歌是：“美哉博文，地静风清建筑伟大形势宏。舟车所会，名士所经交通便利见闻增。文明进化，道德日兴，博文前途愈光明。她是社会，她是家庭，更是全国进善旌。”^①

1946年6月，德州解放，同年冬，校舍全部被拆除。1952年在原校址新建德州第二中学。1986年5月，“山东德州博文中学建校一百周年庆祝大会”在北京举办，有49名校友与会。教会学校博文中学的主要宗旨是传教，但客观上却是培养了大量人才，促进了现代科学文化在德州区域的传播。这所持续55年之久（1886-1941）的学校，毕业生约计2000人左右^②。

综上，从19世纪末叶起，庞庄教堂便是美国公理会在华北的八个据点（天津、北京、通州、汾州、太谷、临清、庞庄、保定）之一，庞庄教会发展了美国在华的传教势力，但作为传教的辅助手段，公理会举办了医院、学校等机构和赈济等慈善事业，尤其是它创办的博文中学的不少毕业生在教育界、医学界成为著名教授、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历史地理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侯仁之，著名电影演员项堃，国际知名的蚤类学专家李贵真，获医学博士学位的李庆昌等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所以它在客观上促进了西方文化在德州的传播，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

二、德州人才的摇篮：从平原乡师到平原师范

山东省平原师范学校，是鲁北最早的中等专业学校之一。1931年建校，大体经历了平原乡师（1931年3月至1937年10月）、平原农师（1939年9月至1945年12月）、平原师范（1948年6月至今）三个阶段。建校以来，培养造就了万余名人才，为国家和社会，特别是为德州区域的教育和建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1年3月，国民党山东省教育厅征得平原县政府同意，决定在平原县设立一所简易乡村师范学校。不久，厅长何思源委派邹平人王冠宸赴平原筹建，并任命其为首任校长。王冠宸与县政府商定，乡师设在城东南隅景颜书院（现龙门路北侧）县立中学旧址，县立中学迁至西门内路北。随即对校舍进行了修葺、整理，又购置了教学设备，聘任了教职员工，经过几个月的筹备，于同年9月招生开学。新校定名为“山东省立第五简易乡村师范学校”，成为山东设立的八个省立乡村师范学校之一。王冠宸因健康原因仅在职一年，翌年暑期，省厅又任命惠民人熊秀山为校长。他到任后对校舍进行扩建，先后建起礼堂6间，澡堂3间，教学办公用楼一座，又在附近南关办起附属小学一所（现附小校址），购买占地面积10亩的

^① 政协德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编委会《德州文史》（第4辑），1986年刊，第71页。

^② 政协德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编委会《德州文史》（第6辑），1988年刊，第66页。

农场一处，使校舍和教学设施基本齐备。

平原乡师直属省教育厅领导，办学经费由省厅拨发，校长由厅长任免，统管一切校务。下设教务、训育、事务、推广、农事五部，每部设主任一名，分管本部具体业务。附小设主任一名，由乡师教员兼职。教职员工均由校长聘任。在熊秀山任期内，共聘任教职员工 27 名。其中，南京中央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全国名牌大学毕业生占 70%。当时教职员薪资较丰，校长月薪 150 元(银元，下同)，各部主任 120 元左右，教员和职员一般为 80 至 120 元。

平原乡师为初级师范学校，招收高小毕业生，学制四年。教育宗旨“根据三民主义教育实施之原则，注重乡村小学健全师资之培养，推进教、学、做三者合一之新计划与新精神”。课程开设国语、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历史、生理卫生、心理学、教育学、小学教材教法、农业、农村经济学、乡村社会学、测验与统计、公民、美术、音乐、体育等。此外，还有劳作和教育实习，每周课时 32 到 34 节。平原乡师面向全省招生，学生来源主要为鲁西北各县乡村农民子女，亦有部分来自鲁中、鲁西南等地。学生毕业后，一般自谋职业。1931 年，平原乡师招收一级两个班，学生 80 名。嗣后每年暑期递招两个班。到 1936 年，先后共计招 6 届 12 个班，学生 480 名，前 3 届学生均四年修业期满，如期毕业；后 3 届学生因抗战爆发学校解散而肄业。

平原乡师在办学方面培养目标明确，主要面向乡村小学，在开设的课程中，酌加农村科目；注重“教、学、做三者合一精神之贯彻”，各班学生轮流从事农业劳作，把课堂上所学的农业理论知识同生产实践结合起来；学生课余活动丰富，阅读、写作、文娱、体育都搞的生气勃勃。1932 年秋，进步学生组织了“读书会”，在地下共产党员李竹如指导下，阅读了马列主义著作和进步书刊。当时学生的课余写作风气很盛，各班纷纷组织志趣写作组织。如壁报组、涛声社、西山草木社等，出刊壁报、专栏、《涛声》杂志、《禹声报》等，开展文学创作和政治宣传活动。1937 年抗战爆发。他们不但自编自演了许多宣传抗日爱国的小型文娱节目，还演出了洪深的《香稻米》、曹禺的《雷雨》、《日出》以及反映东北抗日义勇军活动的《三江好》和自编的揭露、讽刺伪满政权的话剧《大登殿》等一批进步爱国戏剧，每次演出都轰动附近城乡。

建校初期，共产党员马霄鹏和李竹如先后来平原乡师任教，他们在学生中进行马列主义和革命思想的启蒙教育。1934 年，一级学生马诚斋、赵毅、张一粟等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建立了乡师党支部，马诚斋任支部书记，赵毅任组织委员，张一粟任宣传委员。翌年春，党支部领导全校学生掀起“反会考”罢课斗争。这次罢课虽然因遭镇压而失败，但在当时震动很大，一些进步学生也从中受到实际斗争的锻炼。抗战爆发后，马霄鹏和马诚斋又在平原乡师和农村发展一批党员和“民先”队员。学校南迁途中，马霄鹏在济宁、兖州将几十名党员和进步学生送往革命圣地延安。

1937 年，日军沿津浦铁路南下，师生大部分各奔东西，平原乡师自行解散。

1939年，日伪山东教育当局设立平原农师，委派益都人冀素铭(又名冀蔚怀)赴平筹办，并任命其为校长，学校改称“山东省立平原简易农村师范”，是年9月招生开学。此时，校舍大减，房屋较大者均为日伪青年训练所“借住”，附小也迁至校内，整所学校处西南一隅，仅占原乡师校舍的三分之一。

学校体制仍为简易初级师范，学制改为三年。为“施行农村师范教育”，学校招收高小毕业生，每届两班，学生100名。学校最大规模为3级6个班，在校生300名。自1939年开办至1945年平原县城解放，计招收6届12班，学生600名。其中前4届学生约370名如期毕业，后两届因学校解散而肄业离校。平原农师的绝大多数师生都具有民族爱国感情，抱有强烈的抗日爱国热情。1944年4月，学生在进步教师的支持下，以李胡、冯元辅两任校长贪污制服款和伙食费为由举行了罢课，表达对日伪当局的不满。在师生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校长承认错误并将贪污财物退还学生，罢课斗争取得了胜利。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年底八路军解放平原县城，平原农师随之解散。为迅速培养军政干部和师资，支援解放战争和新解放区，1948年6月，中共冀南区二地委决定复办平原师范，并派周跃西赴平原筹建，由副专员刘子蔚兼任校长。8月招生160名，分一个干部班，两个师资班，10月1日开学。

学校初称“冀南第二专署联立师范”。1949年10月，平原县划归山东省渤海区洛北专区，又改称“山东省渤海区洛北专区联立第一师范”。1950年夏，沧南、洛北合并为德州专区，才定名为“山东省平原师范学校”。为适应形势的需要，平原师范初期为战时体制。干训班学习半年，师资班学习一年，主要进行政治培训。从1949年元月，始招初师一级两个班，系高小毕业生100名。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胜利发展，是年暑假学校改为正规规范体制，分寒暑假两次招生，自1952年暑期开始增招初中毕业生为中师班。初师、中师学制均为3年。至1956年，计招前师11届21个班，毕业19个班，学生1140名；招中师5届18个班；毕业4个班，学生192名。当时学校发展到有教职工60余名，初师、中师各3个年级18个教学班的规模，在校学生达700多名，为新中国建设培养了大批人才。

三、近代德州风俗的变迁

德州区域为齐鲁之邦、燕赵之邻，其文化习俗具有多样性、兼容性的特点。清兵入关，特别是八旗兵驻防德州，将其民族习俗也带到了德州。晚清以降，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和“西学东渐”的影响，西方的文化习俗也逐渐传入德州，并与当地的社会风俗发生冲突和融合，从而促成了德州区域社会风俗在继承传统的过程中也发生了诸多变化。

和山东大部分地区类似，德州区域各县也出现了自然神(天、地、社稷坛、城隍庙等)崇拜的衰弱、传统宗教信仰(道教、佛教)的衰弱及伊斯兰教反而兴盛的局面。道教方面，正一道、全真道的政治地位日趋下降，整个教团素质也日趋下降，道士中道行可称者日见其少。佛教方面，除个别寺院香火旺盛(永庆寺有田370余亩)外，大部分寺院日趋衰落，如抬头寺原有田百余亩，中经礼耀和尚吸食鸦片，挥霍浪费，只剩下二十余亩。

另一方面，西教各派又竞相在德州区域传教，扩大了自己的势力。天主教传入本区最早为禹城县的于屯，距今已有 400 余年的历史。该村 1732 年的石碑记载了耶稣会教士的传教活动。鸦片战争后，德州区域的天主教发展迅速。民国初年，天主教在德县有了较大的发展，主持教务者为德国人，最盛时有教徒 1825 人。至 1949 年，德州区域各县有教堂 40 处，堂口及聚会点 70 处，神职人员 38 人，教徒 13049 人。开办学校 16 处，医院 7 处，孤儿院 2 处。

基督教传入德州区域始于同治五年（1866）。当年，英国基督教循道公会自天津传入乐陵县朱家寨。同治十年（1871），美国公理会由天津传入恩县庞庄。光绪十年（1884）和 1919 年，美国北长老会由济南先后传入禹城、齐河等县。基督教各派会在德州区域立足之后，便以赈济为名吸收贫苦农民入教，信教人数由少到多，至 1946 年前后，共设有教堂 36 处，宗教职业人员 56 人，教徒约 6028 人^①。西教的传入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具有明显的侵略性，由于中西信仰的冲突等诸多原因，引发了德州教案（1880-1882）和声势浩大的义和团运动。另一方面，它又传播了西方文明，引入西方学校教育和科学文化知识，促进了德州区域民俗的变迁。

随着德州区域内政治、经济诸因素的变化，社会风俗如在婚俗、丧俗、服饰、居住、交通等方面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婚丧礼俗方面，大部分地区仍坚持传统的礼制，结婚风俗一般仍有问名、换柬、纳彩、迎亲、合卺等程序。但是，随着西方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的传入，新的婚姻观念和习俗（如自主恋爱结婚）在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渐趋形成。主要表现为中西合璧式婚礼仪式，如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夏津县，结婚、离婚颇尚自由。

丧礼方面，总体上变化不大。德州旧俗，寡妇多不改嫁，再嫁称后婚或二水，倍受歧视。如若改嫁，婚礼也较简单，嫁时也不论命相、属相和吉日良辰，只要双方同意，便可成婚。20 世纪 20 至 30 年代，寡妇改嫁，在封建伦理道德的禁锢、婆家和娘家的阻挠、街坊邻里的舆论压力下，仍然十分困难。但是在冀鲁边区和渤海军区，随着反封建斗争的深入，阻挠寡妇改嫁的力量逐渐减弱，寡妇公开要求改嫁并获得成功者逐渐增多。

1913 年 2 月，政府严令男子剪辫。但是由于德州区域风气未开，剪发一事遭到了封建守旧势力的抵制和反抗。随着时间的推移及政府机关的倡导，逐步由学界波及民间，由城市推至农村，大约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发辫逐渐在德州区域绝迹。

德州区域的女子放足始于教会的倡导。如 19 世纪 80 年代，公理会设立的“卫氏女校”唯一的入学条件是：凡是来上学的女孩子，必须放足。这就起到了倡导之功。但是由于世俗势力的反对，尤其在农村，还远未形成放足的大气候。光绪三十年（1904），山东巡抚周馥奏请严禁汉人缠足，此为地方官倡导天足的开始。进入民国后，天足运动进一步兴起。民国期间，夏津一带流传民谣说：“缠足苦，缠足苦，一步挪不了二寸五，赶到碰着灾荒年，一

^① 山东省德州地区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德州地区志》，齐鲁书社 1992 版，第 754 页。

命交天不自主。”“天足强，天足强，走道自由又大方，血脉流通身体壮，多加饭食无病恙。”这两首民谣道出了民间对缠足的反省，对天足的认同和向往。1931年10月，国民党山东省政府颁布了《禁止妇女缠足办法》，后又三令五申，对其中的条令不断修改。1936年6月，制定了《山东省取缔妇女缠足办法》，山东的不缠足和放足运动到达高潮，德州区域的女子放足也取得了明显成效。

相对而言，德州区域的居住风俗的变化不太大，大部分县城和乡镇农村基本上是明清时期的自然延续。而在交通方面，德州区域引进了一些西式的近代交通工具。民国元年，津浦铁路全线贯通。火车的通行，方便了区域内铁路沿线居民的外出和货物的运送，开拓了人们的视野。民国初期，黄包车传入德州，为当时市内最先进的短途客运工具。进入民国后，各县城自行车（又称脚踏车）渐趋流行，每辆价值仅20余元，工商业户及各机关，多有购买。上述风俗的变迁在很大程度上是德州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反应，反过来又影响了德州区域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四、武术大师尚云祥

尚云祥(1864-1937)，字霁亭，中国近代武林之中形意拳三大名家之一，山东德州乐陵城南寨头堡乡尚庄人。

尚云祥自幼随父进京经商，开马蹬铺。他生性争强好胜，嗜好武术，白天打铁，晚上跟拳师马天义学功力拳。后又追随形意拳大师李存义学艺十年。练得惊人“踩功”，拳大的砖块，他脚搓成粉，铺地方砖，过步龟裂。“铁脚佛”的美称由此而得。尚云祥还向形意拳郭云深大师学习了“杆子功”。

19世纪末，一批帝国主义“武士”“力士”纷纷来到中国耀武扬威。李存义在天津创办“中华武士会”，大摆擂台，由尚云祥首出擂场，设擂100天，终无一人能将尚云祥打下擂台。由此，尚云祥名誉满津沽。军阀权贵纷纷高薪聘请尚云祥担任保镖或教官，但都被他拒绝了，宁可甘守清贫，在家授徒。尚云祥为人正直，疾恶如仇。当时，通州有个大盗名叫康天心，人称康八太爷。其人武艺高超，官衙也对他无可奈何。尚云祥受政府所托，将其逮捕归案。后来有人编成现代戏《拿康八》、《大闹东皇庄》进行演唱。

为了准备全面侵华，日本人在北京珠市口以开商社为名从事间谍活动，会长名叫佐藤鸠夫。1930年，佐藤找到尚云祥，想聘他到日本讲学，被尚坚辞拒绝。“七七事变”后，日寇大举侵华，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的警卫营长尚其英拜尚云祥为师，并请他任警卫营武术教官。宋哲元见尚云祥艺精品高，便命他在全军中教授五行刀术。后二十九军的大刀片，在与日军作战时大显神威。

尚氏形意五行拳是中国形意拳的重要分支，具有鲜明的风格特点。尚云祥在李存义、郭云深的基础上，大胆对形意拳进行了改革。他将以往形意拳攥拳虚空、略出食指的所谓“鸡心拳”，变成了后四指攥拳如卷饼紧握、大拇指前节横握于食指与中指上、拳头握紧截面朝前的握拳方式，简化了攥拳方式，更利于实战。他教五行拳，按中医内经治病健身、五行相

生的道理，以劈、钻、崩、炮、横的顺序练，即明理义，又增效益，并且纠正了以“鹰提”为“劈拳”的错误。他强调：“起如箭，落如风，追风赶月不放松；起如风，落如箭，打倒还嫌慢。”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尚氏形意五行拳的整体特点：动作舒展大方，内劲充盈，爆发力大，气势宏伟；步法形如槐虫的趟步为主，趟劲大且疾如犁杖翻地，进步快而犹如卷地之风；拳械合一，有何拳就有何器械。

1927年，尚云祥曾应聘在北京蒙藏大学任武术教师。其得意弟子10余人皆成武林高手。民国1929年，南京举行擂台赛，尚云祥被聘为仲裁委员。1937年11月，尚云祥辞世，享年74岁。

尚云祥开一代宗风，为振兴中华武术立下了不朽的功绩。在《当代武侠奇人传》一书中，写有尚云祥“脚踢巨石”等传奇故事。《国术名人录》一书中，也载有其事略。

五、篆刻家刘淑度

刘淑度（1899-1985），原名师仪，亦单名曰仪，字淑度。现代著名女篆刻家。祖籍山东德县（今德城区）长庄乡北厂村。

1918年至1930年，刘淑度先后就读于保定高级小学、上海神州女子中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国文系。大学毕业后，她曾在高等师范附中、河北遵化五中教书，也曾给著名文史专家郑振铎当助手，参与编纂了《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世界文库》、《李长吉诗集》、《岑参诗集》；标点了《二十四史》儒林和文苑传。1935年秋，应中国古史学家顾颉刚之邀，到中央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历史组管理乙部图书。抗日战争中离开北平到南京图书馆，初任编目工作，后为度藏部主任。1945年秋转入教育界，在南京第二女子中学任国文教师。1949年以后，调至金陵大学附中、南京第十中学任国文教员。1958年，60岁的刘淑度在南京退休。不久，定居北京。

刘淑度一生从事学术研究和教育工作，文史功底深厚，学识渊博，潜心于篆刻艺术，成就斐然。她曾投师篆刻家贺孔才，后又得到齐白石真传。1927年9月，经李苦禅介绍，尚在求学的刘淑度拜齐白石为师。她追随齐白石15年，谨遵师教，潜心钻研，反复实践，既避免靡弱，又力戒粗野，特别是临摹了许多古汉印，篆刻技术迅速提高，逐步形成了自己古雅隽秀的艺术特点。齐白石赞誉她“吾弟子数年来技艺大进，与吾乱真”、“已成女子篆刻家先驱”。齐白石亲自篆刻“千石印室”印章一方相赠，并为她的印谱集作序言，曰：“门人刘淑度之刻印，初学古人得汉法，常以印拓呈余，篆法刀工无儿女气，取古人之长，舍师法之短，殊为闺阁特出也”^①。1933年，刘淑度与鲁迅、郑振铎合作篆刻《北平笺谱》，她具体负责其中印章部分的篆刻，受到鲁迅等人的高度评价。第二年1月《笺谱》出版，畅销世界各地，深受日、英、法、苏等国木刻艺术家欢迎。

刘淑度一生刻了许多名作，曾为鲁迅、钱玄同、台静农、朱自清、许寿裳、郭绍虞、郑振铎、谢冰心、李苦禅等名人治印。其中，尤为珍贵的是受鲁迅嘱托，为其镌刻的“鲁

^① 政协德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编委会《德州文史》（第3辑），1985年刊，第152页。

迅”、“旅隼”两方印章，清雅平正、古朴俊秀，深得鲁迅珍视，常在书籍及所著封面上使用，现已收藏于“鲁迅博物馆”，成为珍贵的历史文物。

刘淑度一生治印六十余年，成印逾三千方。“文化大革命”期间，她家藏的精刻印章、丹青名作、善本古籍、稀有印谱等 6800 余件被抢掠一空，“文革”后只找回一小部分。晚年，她从仅有的 500 方印中选出 100 方，自撰说明，编成《淑度百印集》，于 1984 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北京图书馆金石组帮其整理了仅存的部分印章，名为《刘淑度刻石残存集》，从而保存了这一重要的文献。

刘淑度热恋故乡，桑梓情深。曾精心刻制了一方“家在德水之阳”的朱文印章，以表达对家乡德州的怀恋之情。1985 年，终生未婚的刘淑度病逝于北京，终年 87 岁。

六、医学书画大家罗文杰

罗文杰（1879-1953），字亦才，号未若，晚号止园，近代医学家、画家，德州（今德城区进步街）人^①。

罗文杰出生于书香门第，中医世家。他自幼学习刻苦，博览群书，尤喜医学和绘画。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方二十，举秀才，名列第一。光绪三十三年（1907）经考试录为北洋陆军第五镇军医。宣统元年（1909），考入山东省法官养成所，学习法律。民国以后，历任山东惠民县审核所帮审员、恩县承审员、陆军第十一师一等书记官、执法官、湖北宜昌海关秘书、总务科长。福建督办公署秘书兼政务处长等职。罗文杰从政期间目睹军阀混战和官场险恶，产生了弃官思想，遂于民国十五年“挂冠归里，自号止园”（表示中止以前的生活）^②。后定居北京，以行医卖画为生。1935 年，任北平美术学院国画系教授。1938 年复任华北国医学院教授，讲授中医《内经》。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与赵树屏等人组织北京市中医学会。1953 年 8 月 29 日因中风病逝，享年 75 岁。

罗文杰一生，广闻博识，对医学、绘画均有相当深的造诣。他早年崇尚中医，除继承家学外，还曾拜章丘邵敬甫为师，诊断处方，悉遵古训；中年后转而热衷于西医，受业于恩县姜子全和无锡丁福保；晚年以后，经过反复比较，实验对照，逐渐认识到中西医学各有所长，确能“相济为用”，于是大力倡导“新中医”。他说：“医不分中西，凡能愈人疾病者，余辄感兴趣。”罗文杰认为，医学工作者面对中西医学，应该“不苟同，不偏执，不附会，不臆断”。罗文杰的“新中医”论是其重要的学术贡献，也是对近代中国中西医论争的一种积极回应。他认为医学著作关系人之死生，稍有失误，即成为杀人之书，因此“著者必须严于取材，无论阐述医理，列举病例，均应选取经过多次实验，确有实效，毫无可疑者。”他强调医生要精通业务，注重医德，应以救死扶伤为宗旨，不能计较个人利害得失。这些都表现了他高尚的医德和严谨治学的精神。

罗文杰擅长治疗急证与危重疾患。20 世纪 30 年代，在没有抗菌素的情况下，对危及生

^① 山东省科学技术委员会编《山东省科学技术志》，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919 页。

^② 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山东分会《山东中医药志》筹编办公室编《山东中医药志选编》（征求意见稿），1983 年版，第 178 页。

命极大的肺癆病（肺結核），他總結出一套理、法、方、藥皆備的治療方案，可謂前無古人。對腦炎、傷寒、痢疾、麻疹、白喉等疾病，他也有獨特的療法且效果極佳。1950年5月，他以北京中醫學會籌備委員的身份，致書衛生部，提出了重新編纂中醫教科書，設立中醫專科學校，培養新中醫人才等建議，表達了振興新中國醫學的一片赤心。

羅文杰性嗜山水，鬚齡已解畫趣，入學後課餘即珍玩名畫，潛心臨摹，後來步入仕途，遍歷齊魯燕趙、吳楚閩粵、巴峽洞庭等名山大川。他善於從大自然中吸收營養，所做山水畫，氣魄雄偉，意境深邃，寫實主義的內容與浪漫主義的風格相結合，為美術界所推崇。名畫家李苦禪曾尊其為師。不少藝術上卓有成就的人都是他的入室弟子。1949年以前，他曾多次在北京中山公園舉辦個人畫展，並屢屢引起轟動。

羅文杰一生先後出版有《止園醫話續集》、《新傷寒症治庸言》、《肺癆病自療法》、《麻疹須知》、《實驗藥物學》、《松雨樓畫課》、《止園山水畫集》、《經史子集要略》、《國學講習錄》、《止園詩草》、《羅氏家規》等，未出版的手稿有《結核症治發凡》、《骨結核實驗談》等，可謂著作等身。他勤於著述，善於創新，醫、畫、文、哲並臻上乘，堪稱後學師表。

七、《德縣志》及其德州地方史志的編纂

辛亥革命後，山東省政府曾下令重修全省通志，並令各縣修縣志。各縣修志差別較大，有修纂刊印者，有擱置不顧者。1912-1949年間，德州所屬各縣共修纂“民國志”15種，其中大部分系在舊志的基礎上加以增補，也有部分志書為新修。因各縣的具體條件不同，編纂者的立場觀點和水平不同，志書修纂質量參差不齊。多數志書適應了時代的進步，充實了新內容，採用了新體例，但也有一些縣志基本上延續舊志，少有新意。少數肯下力氣搜訪資料，內容詳實，多數搜訪資料功夫欠缺，內容簡陋。

民國《德縣志》十六卷，李樹德修，董瑤琳纂，刊印於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卷一包括總目、序、凡例、目錄、修志姓名、舊志序跋、圖繪等，具體分為輿圖志、政治志、學校志、宦績志、人物志、閏範志、風土志、藝文志等八門。

陵縣在1935年鉛印出版了《（民國）陵縣續志》由苗恩波修，劉蔭岐纂，因是“續志”只收舊志未載內容，僅有四卷，卷下分編，僅亦29編。此外在第二年還鉛印出版了由沈淮等修纂的《（民國）陵縣志》，與《陵縣續志》合刻出版。

恩縣於1937年由張遵孟主修《恩縣志》，不久抗戰軍興，未曾刊行，抗戰期間，敵偽政權在此基礎上重修了《（民國）重修恩縣縣志》十四卷首一卷，由王化三增補，於1942年鉛印出版。

上述三縣縣志均修纂於五四運動以後，隨着民主與科學思想的廣泛傳播，在修志的內容、體例和技術上進步顯著。內容上將天章、恩旨、五行等志刪去，星野由分志降為目，增設新政志，將清末以來的本縣的立法、司法、行政、教育、實業等諸方面的新的機關、團體、設施和活動等分別記述，纂修者注重採錄民國時期政治、社會、經濟事例，比之舊志有很大進步，體例也有創新，如配置地圖、照片，新設政治、實業等卷目等。在技術上，逐步改為石

印或铅印，面貌大为改观。总体而言这三县县志修纂水平较高，

夏津县在1934年以清乾隆志为范本重修县志，修志中对乾隆志十分推崇，称为“以渊博之学问，为一邑之典章，洵为后人所宜法守矣。”所以在刊民国志时，重刊乾隆志，而将其称为《夏津县志前编》，民国志又称《夏津县志续编》（十卷，首一卷，谢锡文修，许宗海纂）。同年铅印出版。

齐河县在民国六年由劝学所刊印过一册《齐河县乡土志教本》一卷，由孙同文编，相当于县志中的“乡土志”。1933年济南中西美术印刷社铅印出版了《(民国)齐河县志》，杨豫修修，阎廷献等纂，全志三十四卷，包括序、目录、凡例、题名、境图(新旧、城图、河图、学区图)、大事记等。杨豫修是当时的县长，参与修纂的阎廷献、赵文豪、迟春京是前任县长。

临邑县在1936年铅印出版了《(民国)续修临邑县志》。此志是由县长崔公甫修，王孟戍纂。崔公甫于志里写道“临邑之有志，始于明万历十九年(1591)知县刘承忠所纂修，而属邑绅邢太仆董其事。明崇祯年间和清顺治年间，知县吴心、陈起凤先后重刊，康熙五十二年(1713)知县唐开陶继修，六十二年(1723)知县巨鹿魏壮补修，道光十七年(1837)知县桐乡沈维四修，同治十三年(1874)知县河内赵敏功，梁城陈鸣翔五修，今所存惟四修，五修合志，余皆亡夫，不可得见矣！”这里把本县的修志历史介绍得很清楚了。

庆云县在辛亥革命后曾修志两次，于1914年庆云藏拙堂马氏石印本的《(民国)庆云县志》四卷，由州判秦夏声修并序，刘鸿逵纂，陆军中将马龙谭题词并书序，知县孟繁荫序，参修阵容颇大，有116人参加。1931年石印本，有郑希侨修，县长刘鸿逵纂的四卷本问世。志前有龚威将军腾溪肖像扉页，马龙潭于奉天(即现沈阳)撰序。志目分为地理志(古迹、职官志、名宦、选举志、举人、拔贡、岁贡、武仕)、人物志(乡献孝友、文学、殉难、书家、画家、名医、堪舆、隐逸)。此志仅天津、广西有藏本。

武城县于1911年刻由王廷纶修、王釜铭纂、李书团增订《(民国)增订武城县志续编》十五卷。此志名为民国年间问世，实际仍应算为清志，不论体裁形式和记事内容都限于清代。

宁津于1931年修有《(民国)宁津县志资料》四卷本，现存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尚未印行，难称定稿，仅是带有县志性的资料而已。

禹城县于1939年铅印出版的《(民国)禹城县志》八册(卷)外叙一册(卷)，由伪县长董景延修，孙似楼等协修。此志仅见省图、省博、省档、北大，中科院等处有藏本。

德平县于1936年铅印出版了光绪十九(1893)的《德平县志》，凌锡祺修，李敬熙纂。共十二卷，包括方輿志、建置志、食货志、典礼志、官师志、选举志、人物志、恩恤志、祥异志、艺文志等。同年济南天成谦记南纸店刊印了民国《德平续志》，吕学元修、严绥之纂。共十二卷，包括方輿志、建置志、政治志、经济志、选举志、人物志、实业志、教育志、交通志、社会志、风俗志、艺文志等，目录与内容上比原来有了显著变化。

上述几县县志的修纂水平虽较德县等三县县志有逊色之处，然而也都记述了当时一方的

人、事、物，为后人了解和研究德州社会政治文化状况提供了重要材料。